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八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4年 北京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8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61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1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八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8 $\frac{3}{4}$ · 插頁 5 · 字数 669,000

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196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 · 581 定价 (四) 2.65 元

目 录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	3—55
一	7—10
二	11—21
三	21—30
四	30—44
五	44—46
六	46—51
七	51—55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

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1872年3月5日和12日.....56—59

卡·馬克思。致“自由报”編輯

60

卡·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会决议

61

弗·恩格斯。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62—63

卡·馬克思。論土地国有化

64—67

弗·恩格斯。致在薩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

大会的代表公民們

68—69

弗·恩格斯。致薩拉哥沙代表大会

70

卡·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倫在

下院的演說的声明	71—78
弗·恩格斯。致費拉拉工人协会	79—80
弗·恩格斯。倫敦来信。一、*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	81—83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庫諾的 迫害	84—85
弗·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顛联合会 委员会的相互关系	86—88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 声明	89—92
卡·馬克思。再論斯蒂凡諾尼和国际（給“玫瑰小报” 編輯部的信）	93—96
卡·馬克思。答布倫坦諾的文章	97—101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 代表大会議事日程的決議	102—10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 年德文版序言	104—105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	106—113
弗·恩格斯。致帕尔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	114
卡·馬克思。致魯尔罢工的矿工	115—117
卡·馬克思。答布倫坦諾的第二篇文章	118—127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128—13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 各支部	135—138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致新馬德里联合会	139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 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	140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	141—177
卡·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 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72年9月2—7日	143—152
弗·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153—16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 表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	165—177
一 关于章程的决议	165—166
二 关于条例的决议	166—169
三 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169
四 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169—172
五 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172
六 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	172—173
七 关于同盟的决议	173—175
八 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	175—177
九 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177
十 记录审订委员会	177
卡·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阿姆 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	178—180
卡·馬克思。致“海盜报”編輯	181—182
卡·馬克思。致“每日新聞”編輯	183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給比尼亚米的信）	184—190

-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191—197
- 弗·恩格斯。倫敦来信。二、*再談海牙代表大会 ……………198—199
-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葡萄牙罢工） ……………200
- 卡·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201—202
- 弗·恩格斯。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
的状况給总委员会的报告 ……………203—208
- 弗·恩格斯。致洛迪下倫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支部） ……………209
- 弗·恩格斯。倫敦来信。三、*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210—212
- 弗·恩格斯。倫敦来信。四、*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西班牙状况……………213—215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驅报”編輯 ……………216—219
-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顛联合会
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220—225
- 卡·馬克思。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顛联
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屬团体和会员书……………226—231
- 弗·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233—321
- 第一篇 蒲魯东怎样解决住宅問題 ……………237—259
- 第二篇 資产階級怎样解决住宅問題 ……………260—294
- 第三篇 再論蒲魯东和住宅問題 ……………295—321
- 卡·馬克思。致“泰晤士报”編輯 ……………322—323
- 弗·恩格斯。普魯士“危机” ……………324—330
- 卡·馬克思。对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謂多数派
的新通告的答复 ……………331—333
- 卡·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 ……………334—340

弗·恩格斯。論权威	341—344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	345—349
一	345—346
二	347
三	347—348
四	348—349
弗·恩格斯。給总委员会的便函	350—35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353—355
弗·恩格斯。*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 (摘自給阿·赫普納的信)	356—358
弗·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359—36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363—36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 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	365—515
一 引言	369—372
二 秘密同盟	373—386
三 同盟在瑞士	387—403
四 同盟在西班牙	404—416
五 同盟在意大利	417—425
六 同盟在法国	426—430
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431—438
八 同盟在俄国	439—483
九 結語	484—486
十 补充	487—500
十一 文件	501—515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	516—520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 西班牙起义的札記·····	521—540
一·····	521—524
二·····	524—531
三·····	531—537
四·····	537—540
弗·恩格斯。英国的选举·····	541—547
弗·恩格斯。帝国軍事法·····	548—557
一·····	548—550
二·····	550—557
弗·恩格斯。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饒舌家毛奇和一位 不久前从萊比錫給他写信的人·····	558—560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 补充·····	561—567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569—623
一 波兰宣言·····	571—578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	579—587
三·····	588—598
四·····	599—609
五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	610—623
卡·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 版跋·····	624—627
弗·恩格斯。支持波兰·····	628—631
弗·恩格斯。半官方的战争叫囂·····	632—640

弗·恩格斯。“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书导言641—64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弗·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記647—654

1. 导言。1500—1789 年647—652

1789—1815 年652

“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个手稿摘要653—654

卡·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

摘要655—708

附 录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711—713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記錄714—715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記錄716—717

弗·恩格斯关于薩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記錄718—721

卡·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

記錄722—723

卡·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724

卡·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725

卡·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726—727

卡·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記錄728—729

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駐在地的发言記錄730—731

紐約总委员会发给卡·馬克思的委托书732

紐約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委托书733

給总委员会駐倫敦負責意大利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的指示734—735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員。总委员会 1873 年 1 月 26 日的決議	736—737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員。总委员会 1873 年 5 月 30 日的決議	738—739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各意大利支部的声明	740
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們	741—742
注釋	745—83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834—867
人名索引	868—907
期刊索引	908—911
譯后記	912

插 图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 的扉頁	5
弗·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书的扉頁,上面有作者写的贈 給劳拉·拉法格的字样	235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 国际工人协会”的扉頁	367
卡·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的一頁	697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2年3月—1875年4月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內部通告¹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2年1月中—3月5日

1872年以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IMPRIMERIE COOPÉRATIVE, RUE DU CONSEIL-GÉNÉRAL, 8

187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冊子

“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的扉頁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①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一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齷齪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²，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

^①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可以說，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統一工人階級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資產階級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傳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們参加由于总委員會的不断反駁而繼續进行下去的論战。³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倫敦，使总委員會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員會，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屬於它的一般責任範圍的职能。⁴ 不言而喻，战敗了的并遭到驅逐的公社社員不可能指望資產階級的援助。至于工人階級，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們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經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給他們以支援，或者帮助他們轉移到倫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錢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⁵为决定关头的爭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緊張斗爭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繳納的会費，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順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規定，这些会費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爭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訊的結果，总委員會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錢，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資產階級的想像中，国际財務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員會能够把資產階級的想像慷慨贈予国际財務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現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員會委員，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員中有的国际的老會員，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聞名的人，选举他們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員會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會議

进行筹备工作。⁶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殘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決議規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1870年7月12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茲召开代表大会。⁷与此同时，它写信給各个联合会，建議把总委员会的駐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別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給代表們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張总委员会留在倫敦。⁸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是我們征詢各联合会的意見，它們就授权我們根据局势的发展情况确定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1865年代表會議⁹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間就組織問題举行的秘密會議的先例，召开了秘密代表會議。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的狂飲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当做刑事犯引渡給他；杜弗尔向地主議會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¹⁰，后来馬魯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贗制品奉送給了比利时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羈押；对国际會員的迫害成了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結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維克多-艾曼努尔也赶忙表示贊同反对国际的協議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賽的劊子手，迫使駐在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¹¹；最后，团结自己的組織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經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請参

加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儘管不是公開的代表大會，但是它的籌備工作仍然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不言而喻，法國由於當時的處境不可能推選代表。在意大利，當時唯一已經組織起來的支部是那不勒斯支部；但它還沒有選舉代表就被武力驅散了。在奧地利和匈牙利，最積極的國際會員都被關進了監獄。在德國，一些最著名的國際會員被控叛國而遭到迫害，另一些會員則被關進了監獄，黨的經費完全用來救濟他們的家庭。¹² 美國人把本應用來派遣代表團的經費用來支援流亡者，只給代表會議送來了一份關於國際在他們國內的狀況的詳細報告。¹³ 但是，所有的聯合會都認為必須召開秘密代表會議以代替公開的代表大會。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倫敦舉行的代表會議，在自己工作結束時曾責成總委員會公布會議所通過的決議，綜合出一個总的組織條例，并用三種語言把它同修改和審訂後的共同章程一起公布，執行關於以會費券代替會員卡的決議，改組在英國的國際¹⁴，以及籌措為完成這種工作所必需的經費。

當代表會議的材料剛一公布，從巴黎到莫斯科，從倫敦到紐約的反動報刊就宣稱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的決議¹⁵ 是圖謀不軌，——“泰晤士報”指責它是“冷靜預謀的鹵莽行為”，——因此必須立即宣布國際為非法。另一方面，譴責了宗派主義的冒牌的支部的決議¹⁶，使國際上的警察得到了一個期待已久的借口，掀起一場似乎是捍衛受它保護的工人的自由自治而反對總委員會和代表會議的侮辱性專制的叫囂。工人階級感到自己受到總委員會如此“沉重的壓迫”，以致總委員會不斷從歐洲、美洲、澳洲，甚至從印度收到要求加入國際的申請書和關於成立新支部的通知書。

二

資產階級報刊的誣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們協會內部得到了同情的反應。表面上反對總委員會實際上是反對整個協會的陰謀，在協會內部製造出來了。在背後製造這些陰謀的總是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俄國人米哈伊爾·巴枯寧的產兒。巴枯寧從西伯利亞回來後便開始在赫爾岑的“鐘聲”報上宣傳他多年實驗的成果——泛斯拉夫主義和種族戰爭。¹⁷稍後，在旅居瑞士期間，他被選入為了同國際對抗而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¹⁸的領導委員會。由於這個資產階級團體的處境越來越不妙，它的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寧的勸告向1868年9月在布魯塞爾開會的國際代表大會建議與同盟締結聯盟。代表大會一致聲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國際是一樣的，那末它的存在就沒有任何意義，或者它別有所圖，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締結聯盟。幾天之後，在伯爾尼舉行的同盟代表大會上巴枯寧來了一個轉變，他在會上提出了一個倉卒拼湊的綱領，這個綱領的科學價值，從“各階級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這句話中就可以判斷出來。¹⁹支持他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數人，於是他和同盟決裂，以便加入國際，企圖用他的偶然的、被同盟否決了的綱領來代替國際的共同章程，用他的個人獨裁來代替總委員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專門的工具——**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並預謀把這個同盟變成國際中的國際。

巴枯寧在他旅居意大利期間結識的那些人中間，以及在一小群俄國流亡者中間找到了成立這個團體所必需的分子；他們替他

当密使，替他在瑞士、法国和西班牙拉攏国际會員。但是，只是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一再拒絕承认同盟以后，巴枯宁才决定把自己的新团体的章程提請总委员会批准，这个章程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伯尔尼綱領的精确的翻版。总委员会于1868年12月22日发出下述通告²⁰作为回答：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約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偉大的平等原則研究政治問題和哲学問題**”，云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1868年12月15日才得知由該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綱領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該协会之外。根据发起者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总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地方組織**之外，还将存在同盟的地方組織，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們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請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攫取了接納加入国际的权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孿生兄弟——**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者的条例，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內举行自己的公开會議**”。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內，又在該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組織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別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內瓦发起小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負有別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民族和任何党派的阴謀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許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見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規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組織条例（見組織条例第十二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組織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須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贊成修改（見組織条例第十三条）；

这个問題在布魯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決議中已預先得到解决；

代表大会在这些決議中声明，**和平同盟**沒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則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則完全相同；

同盟发起小組的某些成員作为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贊成这些決議；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 1868 年 12 月 22 日的會議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規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

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廢除和无效。

(2)不接納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會議主席——乔·奥哲尔

总書記——罗·肖

1868年12月22日于倫敦

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給总委员会，問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則：是还是否？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溶化在国际各支部中。同盟收到的回答是下面这个1869年3月9日通告²¹：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根据我們的章程第一条，协会接受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階級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不同，因此它們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論观点也必然会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討論，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論綱領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綱領并不屬於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綱領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們的任务。对我們來說，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們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階級的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在你們的綱領中，有一句話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們綱領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①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偉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誤。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綱領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誤解的詞句的。我們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則允許每个支部在不違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論綱領。

因此，沒有任何障碍会阻擋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問題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們的条例，必須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會議

由于同盟同意了这些条件，被巴枯宁的綱領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騙的总委员会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它以为，同盟已被日内瓦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承认了，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后者始終避免和它打交道。同盟达到了它最近的目的：争得了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虽然巴枯宁的信徒采取了齷齪的手段，采取了除了这次而外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的手段，但是巴枯宁的打算还是落空了，他本想使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駐在地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內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迁到日内瓦去并正式批准巴枯宁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点提出来的措施，即圣西门主义关于立即廢除继承权的胡說。这就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絕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綱領、尤其是拒絕承认它关于完全放棄政治的学說的国际支部。

还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当涅恰也夫来到日内瓦的时候，巴枯宁就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在俄国的大学生中間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他經常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掩盖起来，从而猎取了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的一切可能的欺騙和愚弄手段来維持的无限权力。这个团体的主要宣傳方法是，从日内瓦用黄色信封給人寄信，信上盖着有“秘密革命委员会”等俄文字样的印記，从而使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俄国警察的怀疑。已公布的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就是卑鄙地濫用国际名义的证明^①。

在此期間同盟开始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論战，起初是在洛克出版“进步报”²³上，后来是在日内瓦的“平等报”²⁴上（这是罗曼語区联合会的机关报，继巴枯宁之后还有几个同盟盟員混入了該报）。总委员会不屑于理睬巴枯宁的私人机关报“进步报”的攻訐，但是对于“平等报”的攻訐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认为，这些攻訐是得到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同意的。于是总委员会便于1870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通告²⁵，其中說：

“在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上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

‘毫无疑问，总委员会輕視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們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它注意它的职責，这一条規定：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等等，

^① 不久即将公布涅恰也夫案件的摘要²²。讀者可以从中找到荒誕的，同时也是卑劣的准則的典范，而巴枯宁的朋友們却让国际对这些准則負責。

我們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問題，这些問題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們將这样做…… 而現在……’云云。

总委员会無論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規定，即它必須同‘平等报’通信或辯論，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問題’。总委员会认为，只有設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語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徑，即通过自己的書記向我們提出質問或指責，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把自己的职责推卸給‘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編輯，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說，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关于組織問題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損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也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擇其一：或者保持緘默而使自己在社会面前丧失威信，或者違反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和‘进步报’一起向巴黎‘劳动报’²⁶ 建議，要它也来攻击总委员会。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²⁷！”

然而，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还在看到这个通告之前就把同盟的拥护者从“平等报”編輯部清除出去了。

1870年1月1日的通告和1868年12月22日以及1869年3月9日的通告一样，得到了国际所有支部的贊同。

不言而喻，同盟沒有履行它所接受的任何一个条件。它的所謂的支部仍对总委员会保持秘密。巴枯宁力图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几个分散的小組，以及由于他的影响而脫离国际的那不勒斯支部，控制在他的个人領導之下。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中，他同一些不是由工人而是由律师、新聞記者和其他資產階級空論家組成的人

数不多的小組保持着联系。在巴塞罗纳，他的影响由他的一些朋友在维护。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中，同盟企图建立以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为领导的分立主义支部，关于这些支部以后还要谈到。简言之，一个国际性团体继续在国际内部进行活动。

同盟打算在1870年4月4日开幕的紹德封代表大会上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夺取瑞士罗曼語区各支部的领导权。

斗争是从关于同盟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问题开始的，日内瓦联合会和紹德封各支部的代表对这个权利持有異議。

虽然同盟的拥护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只是联合会五分之一会员的代表，但他们重施巴塞尔的阴谋詭計，终于为自己保证了一两票的虛假多数。用他们自己机关报的话（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²⁸）来说，这个多数只代表15个支部，可是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30个支部！表决的结果，罗曼語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各自继续开会。同盟的信徒们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自居，把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紹德封，并在紐沙特尔创办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由公民吉約姆主編。这位青年作家的专门使命，就是誣蔑可憎的“资产者”即日内瓦的“工厂”²⁹工人，同罗曼語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传完全放棄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份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馬賽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日内瓦的代表们回去以后，召开了自己支部的全体大会。大会不顾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对，贊同了代表们在紹德封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过后不久，巴枯宁和他的最积极的娄罗就被开除

出旧罗曼語区联合会。

罗曼語区代表大会剛剛閉幕，紹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預，在信上签字的是書記弗·罗伯尔、主席昂利·舍瓦累（两个月以后，該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在7月9日指責舍瓦累进行盜窃）。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1870年6月28日决定，保留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議新的紹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³⁰紹德封的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而大叫大嚷，忘記了是它最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預的。这个委员会頑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場紛爭，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絕了任何正式关系。

在此以前不久，路易·波拿巴在色当率部投降。从四面八方傳来了国际会员抗議繼續进行战争的呼声。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揭露了普魯士的侵略計劃，指出普魯士的胜利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多么危險，并警告德国工人說，他們将首先成为这个胜利的牺牲品。³¹在英国，总委员会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对英国宮廷的亲普傾向进行了反击。在德国，国际的工人会员举行了示威，要求承认共和国和“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

这时，热情洋溢的（紐沙特尔的）吉約姆的好战本性启发他想出了一个发表匿名宣言的好主意，他在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的附刊中，以团结为标题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組織瑞士志願部队来同普魯士人作战；至于吉約姆本人，毫無疑問，他的棄权論的信念妨碍他去打仗。³²

里昂爆发了起义³³。巴枯宁急忙赶到那里去，他在阿尔伯·里沙尔、加斯帕尔·勃朗和巴斯特利卡的支持下于9月28日搬进市

政厅,但是放棄在周圍設置警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正当他的关于廢除国家的法令經過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出世的时候,他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軍兵士从那里赶走了。

1870年10月,总委员会鉴于它的法国委員缺位,便加聘了从布勒斯特来的流亡者公民保尔·罗班,他是同盟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紹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訊員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議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預見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絕了这个建議。罗班一再提出这个問題,甚至建議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作出最終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問題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會議解决的問題之一。

同盟根本不願意让代表會議調查它的陰謀,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經解散³⁴。但是9月15日它又重新出現了,并以无神論社会主义者支部的名称要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項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³⁵,总委员会如果不征求两年来一直肩負着同各宗派主义支部作斗争的重担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就沒有权利接受这一支部。此外,总委员会早先已經向英国基督教工人团体(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青年会〕)宣布,国际不承认有神論支部。

8月6日,即同盟解散的那一天,紹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在重新提出同总委员会建立正式关系的要求并向总委员会声明,它将和过去一样不理睬6月28日的決議,对于日内瓦方面它繼續认为自己是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而且认为“这个問題应由全协会代表大会来解决”。9月4日这个委员会又送来了一份抗議书,对代

表會議的權能提出異議，尽管是它最先提出关于召开代表會議的問題的。代表會議本來也可以質問，在巴黎被圍之前，紹德封的委員會會請求巴黎联合会委員會就瑞士沖突問題作出決議，而这个巴黎联合会委員會究竟有什么權能呢？³⁶但代表會議仅限于批准了总委員會 1870 年 6 月 28 日的決議（理由見 1871 年 10 月 21 日的日內瓦“平等報”³⁷）。

三

一些逃到瑞士來避難的法國流亡者的出現，使同盟有了某些活躍。

日內瓦的国际會員為流亡者做了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他們從第一天起就保證給流亡者以援助，他們展開了廣泛的鼓動工作，從而阻止了瑞士當局同意凡爾賽政府提出的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許多国际會員曾冒着巨大危險到法國去幫助逃亡者越過國境綫。當日內瓦的工人們知道下述事實的時候，他們該是多麼驚異呵！這就是，某些首領，如像貝·馬隆^①，立即和同盟的先生們

① 貝·馬隆的朋友們三個月來喋喋不休地吹噓他是国际的創始人，宣稱他的書³⁸是關於公社的唯一客觀的著作，他們是否知道巴提諾爾市市長的這位助手在二月選舉前夕所持的立場呢？貝·馬隆在當時尚未預見到公社，他想使自己被選入國民議會，為此施展了種種陰謀詭計，希圖以国际會員的資格被列入四個選舉委員會的名單。為此目的，他厚顏無恥地否認巴黎联合会委員會的存在，并向各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他在巴提諾爾建立的支部所草擬的名單，冒稱是全協會提出的名單。——稍後，3 月 19 日，他在一份正式文件中痛罵在這前夕發生的大革命的領導人。現在這個無政府主義者在竭力吹噓或者讓人吹噓，他還在一年前就向四個委員會說過：“朕即国际！”貝·馬隆居然要同

建立了联系，并在同盟前書記尼·茹柯夫斯基的帮助下企图在日内瓦，在罗曼語区联合会之外成立一个新的“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³⁹，这个支部在它的章程的第一条中声明說，它

“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但保留充分的行动和首創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协会的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自治和联邦原則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換句話說，它保留同盟事业繼續下去的充分自由。

1871年10月20日，馬隆先生写信給总委员会，在信中这个新支部第三次請求接受它加入国际。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五項決議，总委员会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后者激烈反对总委员会承认这个“阴谋和糾紛”的新的“策源地”。为了不願把貝·馬隆和同盟前書記尼·茹柯夫斯基的意志强加于全联合会，总委员会是表現得够“权威的”。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信徒們便創辦了以安得列·萊奧女士为最高领导的“社会革命报”⁴⁰，在此之前不久，她曾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烏尔·里果和費雷是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們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誠然，始終沒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⁴¹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費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⁴²以及其他骯髒报纸站在一条綫上，轉載它們攻击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論。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內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經到了。用它的話來說，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

时模仿路易十四和巧克力糖制造商佩龙。后者不是曾經声明，只有他的巧克力……才是可口的！

員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①。

“社会革命报”在确信总委员会的某些委員不会拿他們“首先是高卢人”来吹嘘之后，别无他法，于是只好抓住第二个口号，即欧洲警察当局放出来的口号，大肆宣揚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

他們企图用来为这种幼稚胡說辯白的究竟是些什么事实呢？总委员会曾让同盟自然死亡，并依照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不使它复活。此外，总委员会曾向紹德封的委员会建議，要它取一个能使它和瑞士罗曼語区的絕大多数国际會員和睦相处的名称。

除了这些“权威主义的”行动之外，在1869年10月至1871年10月这个期間，总委员会还怎样行使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它的那些相当广泛的权力呢？

(1) 1870年2月8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向总委员会申請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回答說，該协会的特別章程中，在涉及資本的那一部分所闡述的实证主义原則明显地同共同章程的导言相抵触，因而，应当拋棄这些原則，并且以“无产者”的資格而不是以“实证主义者”的資格加入国际，但是可以保留自由地使自己的理論观点和协会的共同原則协调起来的权利。这个支部在承认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后便加入了国际。

(2) 在里昂，在1865年支部和不久前成立的、除了正直的工人而外还有同盟的代表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参加的支部之間发生了分裂。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在瑞士成立的仲裁法庭的決議沒有被承认。1870年2月15日，新支部不仅要

^① 請看这个委员会的民族成分是怎样的：20个英国人，15个法国人，7个德国人(其中有5个是国际的創始人)，2个瑞士人，2个匈牙利人，1个波兰人，1个比利时人，1个爱尔兰人，1个丹麦人和1个意大利人。

求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七項決議就这一冲突作出決議，而且还給总委员会送了一份現成決議，建議它痛斥 1865 年支部的成員并将他們开除出国际。新支部建議总委员会在这个決議上签字，并連同回信一起寄給它。总委员会譴責了这种聞所未聞的举动，并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1865 年支部在回答这一质詢时說，已呈交仲裁法庭的控告阿尔伯·里沙尔的文件被巴枯宁拿去了，他拒絕送回；由于这个緣故，它不能充分滿足总委员会的希望。3 月 8 日总委员会就这个問題作出的決議沒有遭到任何一方的反对。

(3) 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接受了非常可疑的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因此逐漸变成了一个由費里克斯·皮阿先生为所欲为地經營一切的特种股份公司。他利用这个支部来組織要求杀死路·波拿巴的敗坏声誉的示威游行等等，并且以国际的名义在法国散布自己的荒誕的宣言。总委员会只是在协会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說皮阿先生不是国际的會員，国际不能对他的行为和狂妄行动負責。⁴³ 于是法国人支部宣布，它既不承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历届代表大会；它在倫敦的牆壁上張貼了許多标語，宣称除它而外整个国际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团体。全民投票前夕，法国的国际會員被逮捕了，借口是他們参加阴謀活动。其实，所謂的阴謀活动是警察当局捏造出来的，而皮阿分子的宣言却把它說得好像真有其事。于是总委员会不得不在“馬賽曲报”和“觉醒报”上发表它在 1870 年 5 月 10 日做出的決議，其中宣称，所謂的法国人支部已經有两年多不屬於国际了，它的所作所为都是警察当局的走狗所干的勾当。⁴⁴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以及巴黎的国际會員在他們受审訊期間发表的声明，证实了采取这个步

驟的必要性；两个声明都援引了总委员会的決議。法国人支部在战争初期就瓦解了，但是，正像同盟在瑞士一样，它又在倫敦出现了，而且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取了另外的名称。

在代表会议的最后几天，公社流亡者在倫敦成立了一个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大约有三十五个成员。总委员会的第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就是，公开揭露这个支部的书记古斯塔夫·杜朗是法国警察当局的密探。⁴⁵ 我们所掌握的文件表明，警察当局的企图是，首先使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然后使他钻进总委员会。由于新支部的章程规定它的会员“不接受要他们参加总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委任，除非这种委任是由自己支部提出的”，因此公民泰斯和巴斯特利卡退出了总委员会。

10 月 17 日，这个支部派了两名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会员到总委员会来；其中之一正好就是前炮兵委员会委员肖塔尔先生。总委员会在沒有审查 1871 年支部的章程以前拒绝接受他们加入总委员会。^① 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章程所引起的主要争论点就够了。

第二条规定：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总委员会在 1871 年 10 月 17 日的決議⁴⁶ 中建议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

总委员会声明说：“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

① 过了若干时候，有人打算硬要总委员会接受的那个肖塔尔被自己的支部驅逐了，因为他是梯也尔的警探。揭露他的正好是那些认为他最有资格做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

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調查，尽管在許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工人等等，——沒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們行为端正的保证。但是，如果要求申請者把說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件，那将是一种資產階級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該支部回答說，

“共同章程規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員的行为端正負責，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要求它认为必需的保证”。

11月7日总委员会对这一点作了駁斥⁴⁷：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 teetotalers (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員者，必須宣誓决不飲用任何酒类。’一句話，支部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規定出加入国际的最荒唐的和五花八門的条件，其借口是，通过这种办法它們才能确信自己會員的行为端正…… 1871年法国人支部补充說：‘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对于这种說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駁：罢工基金会常常是虛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調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資不足和付款日期逼近，以及其他許多原因，而不得不經常去典当、借債。这是非采取不能容許的干預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說明的生活来源。因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支部要求說明生活来源只是为了寻求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議是符合这个目的的…… 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条內故意把說明生活来源說成是除了……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資產階級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他們章程的第十一条說：

“將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要求取消这一条，“因为国际的共同章程不承认支部有权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补充說：“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委員的方式：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

确实曾建議倫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違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預先它規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額，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們应担負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員，不是由于他們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員。在最近这次代表會議做出決議以前，倫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員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員是适当的。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談，那是非常錯誤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魯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委员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組成的……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規定的，它的成員除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規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如果注意到前面的条款，那末非常清楚，第十一条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違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規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倫敦各支部代表的會議，

在这个會議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組織的影响所代替。最后，总委員會鉴于它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見日內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組織条例第一条），因此声明，“1871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員會成員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干”。

不过，总委員會声明說，它将按照接受倫敦其他支部的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該支部的两名代表。

1871年支部不滿意这个回答，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宣言⁴⁸，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該支部的全体成員，其中也包括新書記，但这个新書記很快就被流亡者赶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坏蛋。这个宣言宣布，拒絕攫取立法职能的总委員會犯了“最粗暴地歪曲社会思想”的罪行。

我們举几个例子來說明制定这个文件时所表現的正直性。

倫敦代表會議贊揚了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間的行为。⁴⁹非常明显，瑞士代表^①所提出的、受到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的这个決議，仅仅是指德国的国际會員而言，他們由于自己在战争期間的反沙文主义的言行而遭到了监禁，而且直到現在还被关在監獄中。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任何不怀好意的解釋，总委員會的法国書記^②在“誰来了！”、“宪法报”、“激进报”、“解放报”、“欧洲”等报刊上发表的一封信⁵⁰中剛剛解釋了这个決議的真正涵义。然而过了一星期，即在1871年11月20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15名成員在“誰来了！”上面发表了一封充滿了对德国工人的侮辱的“抗議书”，并宣布說，代表會議的決議无可爭辯地证明“泛日耳曼主义思

① 尼·吳亭。——編者注

② 奧·賽拉叶。——編者注

想”支配了总委员会。德国的所有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贪婪地抓住这个事件，企图向德国工人证明他們的国际主义夙願是徒劳无益的。最后整个 1871 年支部完全支持 11 月 20 日的抗議书，把它附入自己的 12 月 14 日宣言。

为了证明“总委员会正在沿着权威主义的陡坡滾下去”，宣言引证說，“总委员会公布了由它自己修改过的共同章程的正式版本。”

只要看一看新版的章程就会曉得，在附录中摘录了新版章程的每一个条文所根据的文献，这些摘录可以证实它們和原本是一致的！⁵¹至于“正式版本”这几个字，那末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决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正式的和必須遵行的文本将由总委员会予以公布”（見“1866 年 9 月 3 日至 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第 27 頁注釋⁵²）。

不言而喻，1871 年支部同日内瓦和紐沙特尔的分裂分子保持着經常的联系。它的一个成員沙兰——他在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表現出了他在保卫巴黎公社时都从未表現过的那种坚毅精神——完全出乎意外地被貝·馬隆恢复了名誉，而后者还在不久前給一位总委员会委員的信中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指責。不过，1871 年法国人支部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宣言，在它的队伍中就爆发了內战。首先，泰斯、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納退出了支部。此后，它分裂成了几个小集团，其中之一的領導人是比埃尔·韦济尼埃先生，他曾因为誹謗瓦尔兰等人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后来又被 1868 年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比利时委员会驅逐出国际。这些小集团中的另一个是由貝·朗德克創立的，他只是由于 9 月 4 日警察局长比埃特里的突然逃跑才摆脱了

“他忠誠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和过問国际的事务”（見“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年版第4頁⁵³）。

另一方面，倫敦的法国流亡者的基本群众成立了一个与总委员会完全一致行动的支部。

四

躲在紐沙特尔联合会委员会背后的同盟的先生們，企图再一次更大規模地破坏国际的組織，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維耳耶召开了自己支部的代表大会。——教师吉約姆在給他的朋友罗班的两封信中还在7月就威胁总委员会說，如果它拒絕承认他們“对日内瓦匪徒們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就要发起这种破坏运动。

桑維耳耶代表大会由16名代表組成，自命代表9个支部，其中也包括設在日内瓦的新的“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

这十六个人一开始就发出了一項无政府主义的指令，宣布解散罗曼語区联合会。联合会也赶忙把同盟分子的“自治”还給了他們，把他們从所有支部中赶了出去。不过，总委员会应当承认，他們还是有一点健全理性的，因为他們接受了倫敦代表會議給他們取的汝拉联合会这个名称⁵⁴。

随后，十六人代表大会就来着手“改組国际”了，它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反对代表會議和总委员会的通告。

通告的作者首先責难总委员会在1871年沒有召开代表大会而召开了代表會議。从上面的解釋中可以看出，这些攻击是直接針对着整个国际的，因为国际一致同意召开代表會議，順便指出，在这次會議上同盟也理所当然地派出了代表，即公民罗班和巴斯

特利卡。

总委员会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有 6 名，而十六人断言：

“代表会议的多数是在总委员会的 6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操纵下事先拼凑好的”。

事实上在参加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的代表中，法国流亡者是巴黎公社的代表，而它的英国和瑞士委员参加会议的机会非常少，这从将要提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有一位总委员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一个全国性联合会发出的，另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代表资格证，正如一封寄给代表会议的信所表明的，由于报上登载了他死亡^①的消息而没有送来。剩下的只有 1 名代表。由此可见，单单是比利时的代表名额和总委员会的代表名额相较，就是六与一之比。

国际上的警察由于想让古斯达夫·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的企图未能得逞，便伤心地抱怨说，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是违反共同章程的。它还不熟悉我们的共同条例，还不知道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必须是秘密的。

然而，警察当局的抱怨引起了在桑维耳耶的十六人的共鸣，他们叫嚷道：

“除此以外，代表会议还决定，总委员会可以自行规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或者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这样一来，全协会代表大会这种国际的伟大的公开会议便有被取消的危险。”

十六人不想了解，国际通过这个决议只是为了在各国政府面

^① 指马克思。——编者注

前证明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它将不顾任何迫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举行自己的全协会的大会。

1871年12月2日举行了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公民馬隆和勒弗朗塞在会上受到了冷遇，他們建議贊同十六人在桑維耳耶通过的決議，并譴責总委员会和拒絕承认代表會議。⁵⁵——代表會議決定，“代表會議不准备发表的決議，将由总委员会通过通訊書記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这个完全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決議，被貝·馬隆及其伙伴們篡改成：

“代表會議的部分決議，将只通知联合会委员会和通訊書記。”

此外，他們还責难总委员会“違反了**真誠这一原則**”，因为它拒絕把那些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国际被禁止的国家內改組国际的決議“公諸于世”，即拒絕把它們交到警察手里。

其次，公民馬隆和勒弗朗塞还抱怨說，

“代表會議侵犯了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授权总委员会揭露和拒絕承认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机关报，如果这些机关报討論协会賴以建立的原則，或者討論支部和联合会的相互利益，或者討論整个协会的共同利益”（見10月21日“平等报”）。

10月21日的“平等报”引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會議的決議，在決議中代表會議“預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們的篇幅內当着資產階級公众討論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會議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討論組織問題的**秘密會議**上予以討論的問題，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責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絕承认”⁵⁶。

为了給貝·馬隆的既酸又甜的抱怨一个应有的评价，必須注意到，这个決議一下子永远地打消了某些新聞記者的企图；他們渴望取代国际的极其重要的委员会，并在国际中起到名士派新聞記者在資產階級世界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同盟盟員才当着日內瓦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用一种和罗曼語区联合会完全敌对的精神来編輯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平等报”。

其实，即使沒有倫敦代表會議，总委员会也可以“公开揭露和拒絕承认”記者們濫用职权的行为，因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曾規定（第二項決議）：

“各支部应立即将一切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論的出版物寄給总委员会”。

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在其 1871 年 12 月 20 日的宣言（12 月 24 日“平等报”）中說：“很明显，通过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把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論的出版物保存在自己的档案中，而是为了使它能够回答，如果有必要，甚至消灭誹謗和恶毒攻击的有害行为。同样也很明显，这一点一般和所有出版物都有关，如果我們不願对資產階級報紙的攻击避而不答，那末我們就更應該通过我們的中央代表机关，即通过总委员会拒絕承认那些在我們协会名义的掩盖下對我們进行攻击的出版物。”

我們順便指出，資本主义报刊中的利維坦——“泰晤士报”、在里昂出版的自由資產階級報紙“进步报”以及极端反动的報紙“日內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在攻击代表會議时所用詞句同公民馬隆和勒弗朗塞所用的詞句几乎一模一样。

十六人通告起初反对召开代表會議，然后反对它的成員和所謂秘密性质，接着又攻击它的決議本身。

它首先断定巴塞尔代表大会放棄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它

“授予总委员会接受或者拒絕接受支部加入国际和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

除的权利”，

然后，通告又将下述罪行加在代表會議身上：

“这次代表會議……通过了各种決議……其傾向是要把国际这个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成一个完全服从总委員會的、服从紀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組織，总委員會可以任意地拒絕接納它們或者讓它們停止活动！！”

接着，通告又提到似乎“歪曲了总委員會职能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十六人通告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見可以归結如下：1871年的代表會議要对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負責，而总委員會的过错在于它遵守了規定它必須执行历届代表大会的決議的章程。

事实上，对代表會議的这些攻击的真正原因带有更隱秘的性质。首先，代表會議的決議防止了在瑞士的同盟的先生們的陰謀。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与比利时的一部分地区，同盟的首領們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和巴枯宁的仓卒拼湊成的綱領之間制造了明显的混乱，并且異常頑强地来保持这种混乱。

代表會議在它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宗派主义支部的两个決議中注意到了这种蓄意制造的混乱。第一个決議粉碎了巴枯宁綱領中所鼓吹的放棄政治的論調，它在自己的以共同章程、洛桑代表大会的決議和其他先例为依据的引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論证^①。

① 下面就是代表會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

“鉴于，

最初的章程的导言中說：‘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偉大目标’；

現在來談談宗派組織：

无产階級反对資產階級斗争的第一阶段，帶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階級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則只有接受、宣傳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來說是棄权論的，即厌棄任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資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权来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断的。他們不仅不会贊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設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決議：‘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會員密謀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說：‘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專門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階級斗争的組織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們的最終目标——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譯文給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給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殘酷地鎮压工人的一切爭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階級差別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階級的政治統治；

鉴于：

工人階級在它反对有产階級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組織成为与有产階級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

工人階級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終目标——消灭階級；

工人階級由于經濟斗争而已經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資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會議提醒国际會員們注意，

在工人階級的斗争中，它的經濟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結社——总而言之，厌棄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絕大多数对它們的宣傳始終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視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願意理睬圣西門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現时曾經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們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薩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薩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組織无产阶级的絆脚石，而最終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須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爭斗的宗派組織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們的組織成为国家的阶级統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組織。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綱領的“工人团体”，这个綱領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綫，而从理論上闡明这些路綫，則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納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內，在它們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換意見加以实现。

正如旧的錯誤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会在短期內重新出現然后又很快消逝一样，宗派組織在国际內部也复活了，尽管表現形式是不大显著的。

同盟以为宗派的复活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然而它本身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宗派的時代已經过去。因为如果說宗派在其产生的初期还帶有进步的因素，那末听命于“沒有可兰經的穆罕默

德”的同盟的綱領，則不过是在响亮詞句掩飾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而那些响亮詞句只能吓唬資產階級的呆小病者或者只能作为波拿巴的或其他的檢察官用来控告国际會員的罪证。^①

有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参加的代表會議一致贊同反对宗派主义支部的決議，深信这一決議重申了国际的真正性质，将标志出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遭到这一決議的致命打击的同盟的拥护者，把決議仅仅看做是总委員會对国际的胜利。他們的通告宣称，由于这个胜利，总委員會保证了它的少数几个委員的“特殊綱領的統治”，“他們个人的学說”、“正統的学說”、“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論”的統治。但是，这不是这些委員們的过錯，而是他們加入了总委員會这一事实的必然結果，这一事实的“敗坏作用”，因为：

“一个有权〈！〉統治与自己相同的人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委員會成了阴谋的策源地”。

按照十六人的意見，国际的共同章程单单是因为它授予总委員會加聘新委員的权利这一点就应受到严厉的指責。他們說，享有这一权力的

“总委員會今后会加聘一大批这样的人，他們会根本改变总委員會的大多数及其意向”。

显然，他們认为只要一成为总委員會委員就不仅会丧失道德

^① 最近在报刊上出現的警察当局对国际的描述，其中包括茹尔·法夫尔致列强的通告，地主議會議員薩卡茲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都充滿了从同盟的嘩众取寵的宣言中摘录下来的話。⁵⁷ 这些宗派主义者的全部激进主义在于說大話，說最有利于反动派阴谋的大話。

面貌，而且会失去健全思想。不然的話，能够設想多数会通过自願的加聘把自己变成少数嗎？

不过，这十六人自己显然还不很相信所有这一切，因为他們繼續埋怨說，总委员会

“五年来一直是由那些經常被連选的人組成的”，

但随后又立即声明：

“他們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我們的合法代表，因为他們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事实上总委员会的成員是經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創始人繼續留任，就像在比利时、罗曼語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內一样。

总委员会必須符合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必須有足够数量的委員，以便完成它所担負的多种的工作；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組成，最后，工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縛而使总委员会的人員經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沒有加聘权，它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結合起来呢？因此总委员会終究认为必須比較明确地規定这项权利；它在最近一次代表會議上表示了这种願望。

在历届代表大会上(英国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很少)总委员会原有成員的連选連任似乎已經证明，总委员会是尽其可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但十六人則相反，他們认为这只是证明了“代表大会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在巴塞尔达到了

“一种仿佛是自願让位給总委员会的地步”。

按照他們的意見，总委员会的“正常作用”应当归結为“簡單的

通訊統計局”的作用。他們从章程的被歪曲了的譯文中摘引了几条来证实这种說法。

和一切資產階級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組織結構問題只是輕輕地提了一笔。它让組織結構在實踐中发展，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进行整頓。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統一和一致才能賦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委员会比对組織的其他环节給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⁵⁸規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組織和地方性組織的**国际机关**”，

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來說明总委员会应当如何行动。在这些例子当中有一个对总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总委员会

“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这一条繼續說道：

“在一切适当的場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議。”

此外，章程还規定了总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作用，并委托它拟訂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問題。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組織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統一行动是沒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規定：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活动将更有成效……国际的会员應該竭力使他們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組織。”

日內瓦代表大会关于組織問題的第一个決議(第一条)声称：

“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这一決議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沒有其他的“被自願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沒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決議是很困难的。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須遵行的文本”。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訂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內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首先我們要指出，这里絲毫也沒有提到可以有特殊的原则宣言，或是某个支部除国际的一切組織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外可以自己承担特殊的任务。这里所說的只是支部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权利。

其次，誰应当确定，地方性章程是否同共同章程一致呢？显然，如果沒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決議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加以規定的，这一条給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該国联合会組織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利。同盟并不輕視这项权利，同时还力图为自己創造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条件。

章程第六条还估計到成立全国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受托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見“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等等”第13頁⁵⁹)。

自从公社复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請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預,以便摆脱警探的糾纏,而另一个大国^①的国际会员則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們自己建立的支部。他們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須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說是前所未見的支部。另一方面,在所謂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中只要一发生冲突,它們就毫不犹豫地 toward 总委员会呼吁,甚至要求总委员会对它們的敌人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在里昂冲突期間所发生的情形就是那样的。就在不久以前,在代表會議已經閉幕后,都灵工人联合会决定宣布自己为国际的支部。在这个联合会发生分裂后,少数派建立了无产者解放社。⁶⁰这个团体加入国际后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汝拉人的決議。它的“无产者报”上充滿了对任何权威主义都表示深恶痛絕的詞句。它的書記^②在繳納該团体的会費的时候警告总委员会說,旧联合会大概也会繳納会費。往下他写道:

“你們大概在‘无产者报’上讀到过,无产者解放社……曾經声明……拒絕支持假装工人来建立工人联合会的资产阶级”,

他还請求总委员会

① 奧地利。——編者注

② 卡·特尔察吉。——編者注

“將這一決議通知所有的支部，並且不要接受 10 生丁的會費，如果有人向它交納這種會費的話”。^①

總委員會和國際的所有組織一樣，有義務進行宣傳。它依靠自己的宣言和通過它在北美、德國和法國的許多城市中為國際的第一批組織奠定了基礎的代表來履行這個義務。

總委員會的另一個義務是幫助罷工工人，保證整個國際對他們的支援（見總委員會向歷屆代表大會的報告）。下述事實同時也可以表明，總委員會對罷工鬥爭的干預具有怎樣的意義。英國翻砂工人抵抗團體本身是一個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在合眾國有分支機構的國際工聯。然而美國翻砂工人在罷工期間認為必須請總委員會來說情，以防止把英國翻砂工人運往他們國家去。

國際的發展賦予了總委員會以及聯合會委員會以仲裁者的職能。

布魯塞爾代表大會決定：

“聯合會委員會應向總委員會每三個月提出一次有關所屬各支部的組織工作和財務狀況的報告”（關於組織問題的第三項決議⁶¹）。

最後，使十六人大發雷霆的巴塞爾代表大會，只是使那些在協會發展進程中在組織工作方面形成的關係固定下來。如果它過分擴大了總委員會的權力範圍，那末這究竟是誰的過失呢？難道不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巴枯寧、施維茨格貝耳、弗·羅伯爾、吉約姆和同盟的其他代表們的過失嗎？他們不是已經開始責備自己“盲目

^① 這似乎是當時無產者解放社的觀點，該團體的代表者是它的通訊書記，巴枯寧的一個朋友。事實上這個支部的意圖完全不是這樣。這個團體因這位極端背信棄義的代表貪污基金以及和都靈警察局長有交情而將其驅逐之後，作了解釋，消除了它和總委員會之間的誤會。

信任”倫敦的总委員會了嗎？

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項決議：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須立即将其申請通知总委員會”

和“五、总委員會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組織，但它們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訴的权利。”

对于在联合会組織之外成立的地方性独立团体來說，这些条文只是证实了从国际产生时起就規定下来的做法，保持这种做法对于国际是个生死存亡的問題。然而有人竟把这种做法加以概括并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一切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这就走得太远了。这几項決議的确給了总委員會干預联合会內部生活的权利，但总委員會从来沒有在这种意义上运用过它們。总委員會肯定說，十六人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來說明总委員會什么时候曾干預了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組織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們在上面所援引的決議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面的決議則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員會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暫時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七、总委員會有权解决屬於一个全国性組織的团体或支部之間、或各全国性組織之間发生的糾紛；但是，它們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員會的决定提出申訴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應該做出最終決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員會从未使用过它們。以上所作的历史概述证明，总委員會一次都沒有采取过暫時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最后，我們談談由于斗争本身的需要所賦予总委員會的那个

职能。尽管同盟的拥护者感到不愉快，但事实却无疑是这样的：总委员会之所以站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战士的前列，正是因为它遭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敌人的猛烈攻击。

五

在制裁了现在这个国际之后，十六人告诉我们国际应当是什么样的。

首先，总委员会在形式上应当成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随着组织职能的停止，它的信件必然会成为协会的各个刊物上已经公布的消息的复制。这样一来，通讯局也会被取消。至于统计，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尤其是——这一点在最初的章程中曾专门指出——如果没有总的领导，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由于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因而局倒是可能有的，不过没有任何统计罢了。总之，总委员会正在消失。根据同一逻辑，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其他“权威”中心也正在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治的支部。

这些自由联合的、幸运地摆脱了任何权力，“甚至是工人所选举和建立的权力”的“自治支部”的使命是什么呢？

这里有必要用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对通告做一个补充。

“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使它的组织“遵循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最后，应当“在我们的

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

这样一来，自治的工人支部突然变成了学校，而同盟的先生們将成为这些学校的老师。他們将用它絕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們将它“灌輸到我們的工人組織中去”。对他們說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須經他們的圣灵的吹拂。

这一切只是重彈同盟旧綱領⁶²的老調。同盟旧綱領是以这样的話开头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脫离了这个同盟”，打算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承担起研究政治問題和哲学問題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从綱領中“引出”的思想！

“这个倡議……将給欧洲和美洲的真誠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找到共同語言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①。

可見，一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少数派，根据它自己的招认，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钻进了国际，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国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分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这門科学可以归纳为四句話，它的頂点是“各阶级在經濟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除了这种“理論使命”之外，向国际推荐的这个新組織还有自

① 同盟的先生們不断地指責总委员会召开秘密代表會議的做法，而当时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一种最大的贩卖行为或愚蠢行为。这些不顾条件主張喧囂和公开的人，違反我們章程的規定，在国际内部組織了一个真正的秘密团体，其目的在于反对国际本身和使国际的对什么都不怀疑的支部服从最高祭司——巴枯宁的領導。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調查这个秘密組織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

己的實踐方面。

十六人通告說：“未來社會應當只是國際將具有的組織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們必須設法使這個組織尽可能地接近我們的理想。”

“從權威組織中是否能產生一個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礎上的社會呢？不可能。國際是未來人類社會的萌芽，它現在就應當正確地反映我們的自由和聯邦的原則。”

換言之，正像中世紀的寺院顯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樣，國際也應當成為新耶路撒冷的原型。這個新耶路撒冷的“萌芽”已在同盟的內部形成了。自然，如果巴黎公社社員了解到公社是“未來人類社會的萌芽”，那他們一定不會遭到失敗，他們一定會把紀律和武器——這些只有當不再有戰爭的時候才應當消失的東西——拋得一干二淨！

但是，為了更好地證明，儘管十六人進行了“徹底研究”，這個在國際正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的時候來瓦解國際並使它解除武裝的可愛計劃，却不是他們苦苦思索出來的。巴枯寧不久以前在其關於國際的組織的札記中公布了這個計劃的原本（見“1872年人民年鑑”日內瓦版）⁶³。

六

現在請讀一讀汝拉委員會向十六人代表大會提出的報告。

他們的正式機關報“社會革命報”（11月16日）宣稱：“閱讀它能夠使人明確地知道就自我犧牲精神和實踐理性而言可以從汝拉聯合會的信徒們那里期待到什麼東西。”

報告一開始就說，它認為普法戰爭和法蘭西內戰“這些可怕的

事件对国际各支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使人沮丧的……**”影响。

如果說普法战争由于动員了大量工人参加两国军队必然促使各支部**瓦解**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末同样正确的是，帝国的傾复和俾斯麦的公开宣布掠夺战争，在德国和英国，在站在普魯士人一边的资产阶级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感情的无产阶级之間引起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单单是因为这一点，国际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影响就必然要增长。在美国，这些事件在人数众多的德国工人侨民中引起了分裂；它的国际主义部分同沙文主义部分断然分离了。

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宣告成立，以空前的力量推动了国际的广泛发展以及所有各民族支部对国际的各项原则的坚决维护，只有汝拉各支部不在此例。汝拉各支部的报告继而說道：“巨大战斗的开始发人深思…… 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力而躲开…… 对許多人說来已經造成的局势（在他们的队伍中）是分崩离析的征兆”，但是“恰恰相反……这种**形势完全能够**”按照他們自己的样子“把国际改造过来”…… 在对这种如此有利的形势做了比較深入的考察后，这个小小的願望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不算被解散了的后来为馬隆的支部所代替的同盟，汝拉委员会应当提出关于二十个支部的情况的报告。这二十个支部中有七个支部已然和它断絕来往；关于这点在报告中說道：

“比恩的**套匣制造工**支部，以及雕刻匠和花飾瓦工支部对我们給它們的任何一个函件都没有答复过。”

“紐沙特尔的各行业的支部——**細木工、套匣制造工、雕刻匠和花飾瓦工**——从来没有对联合会委员会作出任何答复。”

“我們不能从瓦尔-德-留支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洛克尔的雕刻匠和花飾瓦工支部对联合会委员会的函件没有作过任何答复。”

这就是所謂自治的支部同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自由来往。

另一个支部，也就是

“庫尔特拉里区的雕刻匠和花飾瓦工”支部，“在經過三年的頑强坚持后……現在……組成一个抵抗团体”——

这个团体处于国际之外，但是这絲毫也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4个完全僵死的支部：

“比恩中央支部現在瓦解了；但是它的一个忠誠的會員不久前写信告訴我們，对国际在比恩的复活还没有失去全部希望。”

“圣布勒茲支部瓦解了。”

“卡特巴支部在經歷了光輝的存在之后，由于当地雇主〈！〉所进行的、企图解散这一勇敢的〈！〉支部的阴謀而被迫退却了。”

“最后，科尔热蒙支部也成了当地雇主的阴謀的牺牲品。”

然后是庫尔特拉里区中央支部，它

“采取了明智的办法：暂时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四个支部，这些支部是否存在都大可怀疑。

“格朗惹支部縮小成小小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核心…… 他們的地方性活动由于他們人数过少而瘫痪了。”

“紐沙特尔中央支部由于各种事件而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會員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积极性，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洛克尔中央支部，好几个月来都介乎生死之間，最后瓦解了。不久以前它又重新組織起来”——

显然,其唯一目的是要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紹德封社会主义宣傳支部处于危急状态…… 它的状况不仅沒有好轉,反而在恶化。”

然后是两个支部——**圣伊米耶启蒙小組和桑維耳耶启蒙小組**。关于它們只是稍帶談了一下,對它們的情况只字未提。

剩下一个模范支部,根据它的**中央支部**这一名称来判断,它本身只不过是其他业已消逝的支部的殘骸而已。

“**穆蒂埃中央支部**无疑比其他支部受害都小…… 它的委员会同联合会委员会保持着經常联系…… **各支部均尚未成立……**”

其原因如下:

“穆蒂埃支部的活动由于保存了民俗的工人居民的热心关注……而处在特別有利的条件之下;我們希望,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对任何政治因素保持更多的独立性。”

于是,这个报告事实上

“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們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他們应当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告,加上一句話:紹德封——他們的委员会的最初駐在地——的工人始終拒絕同他們发生任何关系。不久以前在1872年1月18日的大会上,这些工人用下述一致行动回答了十六人通告,这就是他們批准了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及1871年5月罗曼語区代表大会的決議,这个決議說:

“将巴枯宁、吉約姆和他們的信徒永远赶出国际。”

既然所謂的桑維耳耶代表大会,按照它的参加者的說法,“在国际內部引起了一場战争,一場公开的战争”,那末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做只字片語的补充嗎?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辯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們那方面；他們对总委员会的誹謗，他們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們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們的有资产階級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敗。在意大利，支持他們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不久前在斯蒂凡諾尼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以羅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論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組織，是无神論修士和修女的寺院，它的章程規定，在會議厅里要給每一个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⁶⁴最后，在德国他們受到了俾斯麦派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魯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⁶⁵的角色，至于他們出版的警察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⁶⁶就更不必提了。

桑維耳耶的教皇选举会向国际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感人的号召：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制止”，——正如公民馬隆和勒弗朗塞所說的——“倫敦总委员会逐步篡夺权力的行为”，而实际上則是要用同盟来偷換国际。这一号召得到了极其令人鼓舞的响应，以致他們只得立即着手伪造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的決議。他們在自己的正式机关报（1872年1月4日“社会革命报”）上声明說：

“最后，比較重要的是，比利时各支部在其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一致作出了和桑維耳耶代表大会的決議相符合的、关于必須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必須指出，比利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相反的決議。它責成将于6月以后举行的下次比利时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共同章程的草案，以便提交国际**应屆代表大会**审查。⁶⁷

在絕大多数国际會員的同意下，总委员会只准备在 1872 年 9 月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七

代表會議閉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同盟**的最有影响的和最卖力气的盟員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来到了倫敦，他們所負的使命是，在法国流亡者中搜罗准备为帝国复辟效劳的帮手，在他們看来，帝国复辟是摆脱梯也尔的唯一手段，而他們自己也不会无利可图。关于他們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总委员会曾向有关系的人，其中包括布魯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提出过警告。

1872 年 1 月他們拋棄了假面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帝国和新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著。1872 年布魯塞尔版。⁶⁸

他們以同盟的詐騙家所固有的謙虛精神宣告：

“我們是組織了法国无产階級大軍的人……我們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領袖^①，我們幸而沒有被枪杀，我們来到这里，是要在他們（徒驚虛名的

① 在 1872 年 2 月 15 日的“平等报”（出版于日内瓦）上，在“揭穿丑行”的标题下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叙述法国南部公社运动失败的历史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我們这些人大多数是 4 月 30 日里昂起义的惨痛失败的目击者，我們現在就可以声明，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加·勃朗的胆小、背叛和盗窃行为，他无孔不入，执行着躲在暗中的阿·里沙尔的指示。

这些坏蛋蓄意用他們早就策划好的阴谋来败坏許多参加过起义委员会准备工作的人的声誉。

不仅如此，这些叛徒把国际在里昂的威信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时候，里昂的工人对国际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就是完全缺乏組織性的原因，这就是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而起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議員們、腦滿腸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豎立起引導我們進行戰鬥的旗幟,並且不顧我們將要遭到的誹謗、威脅和各種攻擊,向驚愕不已的歐洲發出出自我們意識深處的呼聲,很快就會在所有法國人的心中得到共鳴的呼聲:‘皇帝萬歲!’

“需要給橫遭屈辱的拿破侖第三好好地恢復名譽”,——

于是從“侵略第三”的秘密經費中獲得犒賞的阿爾伯·里沙爾先生和加斯帕爾·勃朗先生就擔負了替他恢復名譽的專門任務。

不過,他們承認,

“我們思想的自然發展進程使我們成為帝國的擁護者”。

這就是一定會使他們在同盟中的夥伴聽起來悅耳的招認。正如在“團結報”的那些美好的日子裡一樣,阿·里沙爾和加·勃朗慎重其事地重彈他們關於“放棄政治”的老調,根據“自然發展進程”的材料來看,這個主張只有在最嚴酷的專制暴政下才能實現,那時工人們將放棄參加無論哪一種政治活動,就像囚犯放棄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散步一樣。

他們聲明說:“革命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共產主義已在德國和英國,首先是在德國確立起來了。順便說一句,正是在德國,共產主義老早就認真地在制定,以便隨後在整個國際中推廣。德國的影響在協會中所達到的這些令人驚慌的成就,對阻止國際的發展起了不小作用,或者更確切些說,給國際在法國中部和南部各支部中的發展指出了新的方向,這些支部從來沒有從任何一個德國人那裡接受任何一個口號。”

這裡我們不是已經聽到最偉大的祭司長^②的聲音了嗎? ——

僅僅依靠自身力量的公社的復滅。只是在這個血的教訓之後,我們才得以用宣傳的辦法把里昂的工人團結在國際的旗幟的周圍。

阿爾伯·里沙爾是巴枯寧及其同伙的寵兒和先知。”

② 米·巴枯寧。——編者注

自从同盟产生以来他就以一个俄国人的資格承担了代表各拉丁种族的特殊使命。或者这是“社会革命报”(1871年11月2日)的“真正傳教士”的声音?——这些傳教士郑重宣告

“德国的和俾斯麦的智者們企图把倒退运动强加給国际”。

但是,国际的真正傳統幸而保存下来了,——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沒有被枪杀!因而,他們的个人的“工作”就是給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国际“指出新的方向”——其方法是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支部,单因这一点就已是“自治的”支部。

至于讀到倫敦代表會議所建議的使无产階級組織成为一个政党的問題,那末“在帝国复辟之后我們”——里沙尔和勃朗——

“不仅将迅速消除社会主义理論,而且将迅速消除在群众的革命組織中获得反映的实现这些理論的企图”。总而言之,利用偉大的“支部自治原則”,这一原則“构成国际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拉丁种族各国内”……(1月4日,“社会革命报”),——

这些先生把賭注押在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上。

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們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階級运动的目的——消灭階級——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剝削者对由生产者組成的社会絕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簡單的管理职能。同盟則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階級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剝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組織。为了給梯也尔的共和国披上皇袍,使之永世长存,国际上的警察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情了^①，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都昂·阿尔諾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弗·庫尔奈
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納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納	罗赫納
馬格里特	孔斯坦·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納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維塔勒·雷吉斯
約·罗茲瓦多夫斯基	約翰·罗奇
呂耳	加·朗維耶
薩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泰勒	威·唐森
爱德华·瓦揚	約翰·韦斯頓
F. J. 賈罗	

① 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地主議會議員薩卡茲首先攻击国际的“組織”。他憎恨这一組織。他在指出了“这个可怕的协会的前进运动”以后，接着說：“这个协会攢棄了……在它以前的宗派的秘密活动。它的組織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地成立和改变。由于这一組織的强大……它的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这种影响正在渗入一切国家。”然后，薩卡茲对这个組織作了“簡短的描述”，末了他說：“这一广泛組織的計劃……在其英明的統一性上就是这样。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意向本身中。它的力量也在于它的为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广大信徒中，最后，在于促使他們行动起来不可抗拒的动因中。”

通訊書記：

卡尔·馬克思——俄国和德国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約·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奥·賽拉叶——法国

沙尔·罗沙——荷兰

J. 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會議主席 沙尔·龙格

財務委員 海尔曼·荣克

总書記 約翰·黑尔斯

1872年3月5日于倫敦

拉脫本廣場33号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會議
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
分裂的決議

1872年3月5日和12日⁶⁹

一

关于两个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鉴于各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为了保证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共同章程第七条）；因而，在同一个联合会中存在两个互相竞争的中央委员会是明显违反共同章程的行为；

总委员会号召紐約的两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重新团结起来，并在不久将要举行的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作为合众国的统一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

第二条——鉴于这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中如果包括过多的不久前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它的工作能力将被削弱，总委员会建议新近成立的和人数較少的支部联合起来委派几个共同的代表。

二

合众国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条——总委员会建议于1872年7月1日召开美国各支部和所属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条——这个代表大会应当选举合众国联合会委员会。它可以——如果认为这是合适的话——授予由此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加聘少数委员的权利。

第三条——只有这个代表大会才具有制订合众国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的地方章程和条例的权利，但是，此种地方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

三

支 部^①

第一条——鉴于纽约第十二支部不仅正式决定：“每个支部”有“独立地”任意解释“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权利”；并且它已把这一原则彻底付诸实施，而如果这一原则被所有的人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名称；

鉴于这一支部经常利用国际工人协会来实现同国际的任务和宗旨格格不入或者直接对立的目的；

①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这一节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编者注

因此，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履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四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⁷⁰并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听候应于1872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裁决。

第二条——鉴于：根据共同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只应由“工人团体”所组成（见共同章程第一、七和十一条）；

共同章程第九条（这一条规定：“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虽然也给予不是工人^①但是积极拥护国际的人个别地直接加入国际或被接受参加由工人组成的国际支部的权利，然而它绝不认为成立纯粹是或主要是由非工人阶级的成员组成的支部是合法的；

因此，总委员会几个月前不得不拒绝承认纯粹由大学生组成的斯拉夫支部⁷¹；

根据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的规定，可以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每个国家的当地条件”；

合众国的社会条件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对工人运动的胜利极其有利，但是也特别容易使伪改革家、资产阶级骗子手和卖身投靠的政客钻进国际；

因此，总委员会建议今后仍不接受新的^②美国支部加入协会，除非它的会员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雇佣工人。

第三条——总委员会提请美国联合会注意伦敦代表会议第二项关于“宗派主义”^③支部或关于“妄想执行”与协会的共同目标不同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的决议第三条；协会的共同目

①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不是工人”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②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新的”两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③ 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宗派主义”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标是使劳动者从“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垄断者支配”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见共同章程导言）。

卡·马克思写于 1872 年 3 月 5 日
左右

载于 1872 年 4 月 6 日“解放报”第
43 号，1872 年 5 月 4 日“伍德赫尔
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103 期和 1872
年 5 月 8 日“人民国家报”第 3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并根据报纸上刊载
的原文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自由报”⁷²編輯

1872年3月12日于倫敦

編輯先生：

仅仅几天以前我才讀到了公民古·勒弗朗塞著的“公社运动研究”一书，在該书的第92頁上我發現有下面一段話：

“国际德国支部的主要鼓舞者卡尔·馬克思后来就2月8日的选举写給公民賽拉叶的信，稍帶伤感地批評法国支部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封信充分证明，——不管这是否正确——国际那时是不大願意干預政治的。”⁷³

在那封据說是我写給賽拉叶的信在报刊上出現以后，我立即在“泰晤士报”、“欧洲信使报”以及柏林“未来报”等报纸上声明，这封信是“巴黎报”捏造的。賽拉叶也公开揭露了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个警方記者。既然国际的几乎所有的机关刊物，甚至巴黎的一些报纸都发表了我們的声明，那么使我真正感到惊異的是，公民勒弗朗塞竟然还相信昂利·德·佩恩在报上捏造的謊言。⁷⁴

閣下，謹向您致崇高的敬意

卡尔·馬克思

載于1872年3月17日
“自由报”第1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自由报”

卡·馬克思 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会決議⁷⁵

1871年三月十八日起義一周年紀念大会通过下列決議：

一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

大会声明，由于仇恨工人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三

大会声明，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卡·馬克思写于1872年3月13日和
18日之間

載于1872年3月24日“自由报”第12号
和1872年3月30日“国际先驅报”第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馬克思的女儿
燕妮·馬克思所抄的并經
过作者校正的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們已收到你們3月15日的來信，非常感謝你們詳細地報道了我們協會在西班牙的實際狀況，這種狀況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形勢下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你們報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準備發表。我們將把給薩拉哥沙代表大會的賀信寄給你們，稍後，還要發一封賀電^①。賀電將以總委員會和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名義發出。至於法國，由於有反國際的杜弗爾法，聯合會委員會在那裡不可能存在；但是，我們將給巴黎寫信，讓費雷支部⁷⁶把給代表大會的賀信寄給你們，——賀信上不會有個人的簽名，不過，只要你們能在上面看到費雷支部的署名，那就行了。在德國，不久前進行的幾次審判案使得協會暫時解体，並且你們已經知道，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被判處兩年監禁，主要是因他們根據國際的精神進行活動；所以，從那裡拍發賀電，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仍然把你們的信寄到德國去了。

至於會費券，那沒有任何困難。你們計劃一下，需要用多少就要多少吧，請把截至7月1日為止所收到的會費或者是會費的一部分轉交給我們；其餘的會費至遲請在全協會代表大會召開前三

^① 見本卷第68—70頁。——編者注

个星期连同沒有用完的会費券一起寄給我們。会費券我們已經存得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們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退还給我們千把張，也不要紧。

昨天晚上財務委員荣克沒有参加总委员会的會議，我把收据送給了他，让他上面签字；只要我一接到收据，就把它和給薩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賀信一起寄給你們。

我們希望，你們会把倫敦代表會議的各项決議提交你們的代表大会通过。目前承认这些決議的有：德国联合会、罗曼語区联合会、瑞士德語区联合会(苏黎世)、英国联合会、荷兰联合会和美国联合会，还有法国和爱尔兰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3 月 27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 年第 1 版第 26 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信稿譯的

卡·馬克思

論土地国有化⁷⁷

土地所有权——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現在成了一个大問題，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於這個問題如何解決。^①

我不想在這裡給自己提出一個任務，即討論土地私有制的擁護者們——法學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全部論據，我僅僅指出，第一，他們都花了不少精力用“天然權利”來掩蓋掠奪這一原始事實。既然掠奪給少數人造成了天然權利，那末多數人就只得積聚足夠的力量，來取得奪回他們被奪去的一切的天然權利。

在歷史進程中，掠奪者都認為需要通過他們自己硬性規定的法律，來賦予他們憑暴力得到的原始權利以某種社會穩定性^②。

於是出現了一些哲學家，他們宣稱，這些法律是得到人類^③公認的。如果土地私有制確實是以這種公認為基礎的，那末，當社會的大多數人不願意再保存這種私有制的時候，顯然它就應當被取消。

然而，我且不談所謂的所有“權”，我確信，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這些情況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採用

① 在草稿上這句話的前面標有“第一點”幾個字。——編者注

② 在草稿上不是“穩定性”，而是“承認”。——編者注

③ 在草稿上不是“人類”，而是“社會”。——編者注

集体的和有組織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一切拥护所有权的言論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須而且一定会得到滿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給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我們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断增长的生产，而当一小撮人按照他們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調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滿足的。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学知識，我們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規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既然从經濟观点来看^①，大規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淪为牛馬的資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經營农业优越得多，那末全国規模地經營农业，难道不会給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嗎？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漲，这些都不容爭辯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②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經營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現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

在这里討論这个問題时发言的所有公民，都主張土地国有化，但是他們所持的观点极不相同。^③

① 在草稿上“从經濟观点来看”这几个字删掉了。——編者注

② 在草稿上接着是“由国家出資，并为了国家的利益”。——編者注

③ 在草稿上沒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編者注

人們常常援引法国的例子，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①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土地分成許多小块，由資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屬劳动的人来耕种。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現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被束縛在土地上，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他必須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在土地上，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国家，以訴訟費的形式交給訟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給高利貸者；他对于自己小天地之外的社会运动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純粹有名无实的所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

既然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目前情况下的法国，无疑不是我們应当寻求这个重大問題的解决办法的地方。

在資產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給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們之間的殘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給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

1868年，在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們的一位朋友說过：

“科学注定小土地私有制要灭亡，正义則注定大土地所有制要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必須或者成为农业协作社的财产，或者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解决这个問題。”⁷⁸

① 在草稿上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五点”几个字。——編者注

与此相反，我认为^①，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②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③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④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 1872 年 3—4 月

载于 1872 年 6 月 15 日“国际
先驱报”第 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① 在草稿上，下一句话原为：“未来将决定，土地只能为国家所有”。——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上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是“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编者注

③ 在草稿上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上“人道”一词删掉了。——编者注

NO MAS DEBERES SIN DERECHOS. NO MAS DERECHOS SIN DEBERES.

LA EMANCIPACION.

PERIODICO SOCIALISTA.

SE PUBLICA TODOS LOS SABADOS.

Año II.	PRECIO DE SUSCRIPCION: 4 rs. trimestre. ADMINISTRACION: San Pedro, 18. 3.º	Madrid 13 de abril de 1878.	Para suscripciones dirigirse á la librería de San Martín, Puerta del Sol.	Núm. 66.
---------	---	-----------------------------	--	----------

弗·恩格斯 致在薩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們⁷⁹

1872年4月3日于倫敦

公民們!

在西班牙各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向你們轉致它的祝賀。的确，你們可以庆賀自己在这样短的期間內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国际的成立还不到三年，如今它的支部和联合会已遍布全国；它在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組織，目前它正向乡村深入。由于你們的活动，以及你們国家的互相更替的政府的荒謬而又愚蠢的迫害，你們才能够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并使国际在西班牙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但是，也不应当忘記，这些成就之所以可能取得，只是因为我們协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組織結構，这种結構給予每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而对于协会的各个中央机关則只是在必要的範圍內才給与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順利地为綱領的統一性和共

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致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的玩物。^①

可能，你們还会遭到不少迫害。那时就請你們記住，有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在那里国际会员正遭受政府方面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但他們終究沒有屈服；因为他們和你們一样地知道，对于我們协会說来，迫害是一种最好的宣傳手段，而且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根除現代无产阶级的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要消灭国际，就必须消灭自然产生国际的基础，即現代社会本身。

敬礼和兄弟情誼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
第44号，1872年4月28日“自由
报”第17号和1872年5月4日
“人民国家报”第36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譯自“解放报”，
并根据信稿校对过

① 在这封信的草稿上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話：“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組織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存在下去；現代无产阶级的最大功績在于，它为了进行共同斗争而建立了一个遍布一切文明国家、但是絲毫也不損害每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自治的协会。”——編者注

弗·恩格斯
致薩拉哥沙代表大会

1872年4月6日于倫敦

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謹向薩拉哥沙代表大会表示
祝賀。

无产階級解放万岁!

恩格斯

載于1872年4月13日
“解放报”第44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譯自“解放报”

卡·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柯克倫在下院的演說的声明⁸⁰

以消灭国际为目的的凡尔赛地主議会和西班牙議会的功績，在不列顛下院貴族代表們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于是貝·柯克倫先生——这是能借以判断出上等階級智力水平的那种人物的鮮明代表之一——于 1872 年 4 月 12 日提請議會注意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言行。他不大喜欢讀書，所以为了准备談这个問題，就在去年秋天作了一次旅行，目的是要了解一下国际在大陆上的某些总部的情况；旅行归来后，他便赶忙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保留了在該問題上的某种优先权。他在議會中发表的那篇演說，任何一个別的人都会說，是存心有意不談当时所談的事情。国际的許多正式出版物，除了一件而外，他都不知道；他不去引用这些正式文件，反而从私人在瑞士出版的印数不多的书刊上引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話，对于这些話国际这个組織根本不能負責任，就像不列顛內閣不能对柯克倫先生的演說負責任一样。按照他的話說，

“在英国加入国际的人共有 18 万，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些打算实现的原則，这些原則当他們加入国际时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

但是，国际打算实现的那些原則，在共同章程导言中就闡明

了，柯克倫先生幸运地不知道，無論是誰，如果不明确表示同意这些原則，就不能加入国际。往下：

“协会在初成立的时候是以工联主义原則为根据的，那时沒有赋予它任何政治性质”。

不仅最初的共同章程的引言部分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质，而且协会的政治傾向在 1864 年同这个章程同时公布的成立宣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闡明。⁸¹ 他的另一个使人惊異的发现，是巴枯宁曾“受托”以国际的名义回答馬志尼的攻击，这完全是撒謊。他从巴枯宁的小册子⁸² 中引用了一段話之后繼續写道：

“这类嘩众取寵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許能博得我們的一笑，但是，既然这些文件来自倫敦〈可是它們并不是来自倫敦〉，那末外国政府发出了警报，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柯克倫先生成了外国政府在英国的喉舌，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下一个責难，——說国际不久前开始在倫敦出版“報紙”，——也是撒謊。不过柯克倫先生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际在欧洲和美洲有許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們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語言出版。

但是整个演說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話中：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設在〈？〉倫敦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毀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現在我們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 1868 年 9 月举行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是 1868 年欧仁·杜邦的論断和 1871 年公社的行动之間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

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員，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令人极其信服的論据說来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公社委員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則不是公社委員。第二个证据——

“1869年7月巴枯宁在日内瓦在一次由他主持的代表大会上說：‘国际宣布自己是无神論的’。”

但是，1869年7月在日内瓦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代表大会；巴枯宁从来没有主持过国际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第三个证据：国际在維也納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⁸³写道：

“紅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当心，不要使它成为普遍恐怖的象征。”

不仅如此，該报还不止一次地声明說，倫敦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总委员会，即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第四个证据：在一次对法国国际的审讯过程中托倫嘲笑了檢察官的論点，仿佛

“只要国际的会长〈根本没有这个职位〉一揮手，就能够使全世界俯首听命”。

柯克倫先生的糊塗脑瓜把托倫的这个否定变成了肯定。第五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倫先生从这个宣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須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倫先生贊同凡尔赛分子进行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們应当得出結論說，这是他下令进行屠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而外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第六个证据：

“在纵火焚燒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領袖們举行了會議。”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傳的一則消息差不多。这則消息說，国际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鍾爱的儿子亚历山大·貝利·柯克倫到大陆上来进行視察，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滿意的关于組織的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說，参加組織的會員現已达 1 700 万。最后一个是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搗毀旺多姆广场圓柱的命令在內的指令中說，国际贊同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問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贊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沒有提到这回事。

据“泰晤士报”所載，柯克倫先生的不可辯駁的证据就是如此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根据駐在倫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对馬嘴的胡說和薩卡茲先生在凡尔賽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議會議員和这位不列顛的道勃雷之間仍然存在着的差別。

关于柯克倫先生的 *fidus Achates* [忠实的阿哈特] 伊斯特威克先生，如果他不是荒謬地硬說国际要对韦梅希(学者柯克倫先生把他改名为韦尔穆特)的“度申爸爸”报⁸⁴負責，我們會借用但丁的一句話來說：“看他一眼就从旁边走过”。

如果說有柯克倫先生这样的对手，是一件极端愉快的事，那末受到福塞特先生的随便什么样的保护，簡直就是一种天災。如果說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国际，使之免受英国政府至今都不敢采取，而且也认为不需要采取的那些鎮压措施的迫害，那末他同时也

具有义务感和崇高的道德勇气，促使他向国际表示自己的最高尚的教授式的譴責。可惜，他所攻击的所謂的國際的學說不是別的，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產物。

他說：“國家應當做這樣，做那樣，並且籌措資金來實現國際的一切方案。綱領的第一條說，國家應當購買全部土地和一切生產工具，並按照公平和適當的價格租給居民。”⁸⁵

至於說在一定情況下由國家購買土地並按照公平和適當的價格租給居民，那末讓福塞特先生自己同他的理論問題的老師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先生一起，同他的政治領袖約翰·布萊特先生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吧。綱領第二條“建議國家調節勞動日的長短”。當我們這位教授把國際變成不列顛工廠法的起草人時，他的淵博的歷史知識就極其輝煌地顯露出來了，而在評價這些法律時，他在經濟問題上的學識也顯得毫不遜色。第三條：

“國家應當保證免費教育”。

關於在美國和瑞士實行免費教育並取得了良好結果的事實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這些事實和福塞特教授的陰暗的預言比較起來還有什麼意義呢？第四條：

“國家應當把資本貸給合作社”。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錯誤：福塞特先生把還在國際創立之前就已死去的拉薩爾所提出的要求和國際的原則混為一談了。順便指出，拉薩爾曾援引過一個先例，即不列顛的土地占有者在改善農業的借口下通過議會非常慷慨地賜給自己的公債。第五條：

“最重要之點是，要求對地產征收累進稅，以此充實國家的全部預算收入”。

把罗伯特·格萊斯頓和他的拥护者——利物浦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家們的要求当成是国际綱領的“最重要之点”，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政治經濟学大专家福塞特先生渴求获得学术上的声誉的奢望完全是以供中小學生用的約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政治經濟学簡明教程的通俗本为基础的，这位大专家承认，貿易自由的拥护者“二十五年前的大胆論断被事实推翻了”。

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他只要以更索然寡味的形式不断重复这些虛假的預言在二十五年前所依据的那些陈腐不堪的辞句，就能够遏止当代的規模宏大的无产階級运动。他这样假装捍卫国际，实际上是低首下心地悔悟自己过去对工人階級表示的虛假的同情，可以預料，这必定会使那些仍然看不清福塞特先生一直企图用来掩飾自己不学无术的那种温情的英国工人睜开眼睛。

如果貝·柯克倫先生代表不列顛下院的政治智慧，而福塞特先生則代表不列顛下院的經濟科学的話，那末是否可以把这家“倫敦所有俱樂部中最愉快的俱樂部”同美国众議院相提并論呢？美国众議院于1871年12月13日通过了一条关于成立劳动統計处的法律⁸⁶并声明說，这条法律是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迫切願望通过的，众議院认为，这一願望是当代极重要的現象之一。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阿尔諾
馬·巴里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弗·庫尔奈	比·德拉埃
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納尔
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納	罗赫納
沙·龙格	馬格里特
孔·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梅欧	乔·米尔納
查·默里	普芬德
約·罗茲瓦多夫斯基	維·雷吉斯
約·罗奇	呂耳
加·朗維耶	薩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揚
約·韦斯頓	德·沃尔弗斯
F. J. 賈罗	

通訊書記：

-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 阿·埃尔曼——比利时
-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 奥·賽拉叶——法国
-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
- 沙·罗沙——荷兰
- J. 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 海尔曼·荣克——瑞士

約·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書記 約·黑尔斯

卡·馬克思写于1872年4月13日
和16日之間

以傳单的形式发表,并載于1872年
4月20日“东邮报”第186期,1872
年5月18日“解放报”第49号和
1872年5月“社会思想报”第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弗·恩格斯 致費拉拉工人协会⁸⁷

公民們！

在回答你們3月3日的亲切来信时，我代表总委员会对你們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表示感謝；同时，我应当通知你們，总委员会在批准之前要求你們解釋一下你們对自己的“自治”所提出的保留条件的含义。

任何一个团体成立的时候，都首先必須制定章程和組織条例；你們自己有这样的文件，国际也有这样的文件。也許，国际的这些文件你們还没有讀过，所以我附帶給你們寄上一份国际文件的法文本。請你們把它交給你們的协会，如果你們同意它，就請通知我。这个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是我們协会唯一的法律，它們可能会使你們的自治受到限制。但是，你們自己也知道，国际不能有两种支部：一种接受共同法律，而另一种則拒絕接受。^①不过我希望，你們絕不会反对接受这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是整个欧洲工人創立的，是七年来在他們的各次年度代表大会上制定并为所有的人所承认的。

組織条例第五节第一条規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

^① 在信稿中接着刪去了：“并挽救自己的自治”。——編者注

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訂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①

組織条例第二节第五条規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个新支部,并責成它审查这些新支部的章程和条例是否符合上述条文;因此,請把你們的章程寄一份給总委员会,以便履行这一手續。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4 月 16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 1935 年第 1 版第 26 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信稿譯的

① 在信稿中接着刪去了:“既然在意大利至今还没有常設性的联合会委员会,所以总委员会仍有审查意大利各支部的章程和条例的責任”。——編者注

Eguaglianza	LA PLEBE	Prateltanza
CONDIZIONI	GIORNALE REPUBBLICANO	CONDIZIONI
<p>Lodi e domicilio e per tutto il Regno. Anno L. 80. — Semestrale L. 3. 80. — Trim. L. 3. Un numero cont. 80. — Affrettato cont. 80. — Per l'estero si aggiungono le spese postali. — Per ora si pubblica solo tre volte alla settimana.</p>	<p>I soci della Plebe non sono tali se non perché non sono in grado di lavorarli.</p>	<p>Si respingono gli atti non autografi. — Non si restituiscono manoscritti. — Si dà l'annuncio delle opere che vengono spedite in dono. — Per le inserzioni il prezzo è da convenirsi col l'Amministrazione. — Pagamenti anticipati.</p>
Libero	Lavoro	Lavoro

Per Abbonamenti e Annunci rivolgersi all'AMMINISTRAZIONE DEL GIORNALE, Corso Falstria N. 7, pian terreno, e alla Stamperia Cooperativa-Tipografica Via Cavour N. 19

弗·恩格斯 倫敦来信⁸⁸

—

*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

1872年4月20日于倫敦

英国工人运动近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相当扎实地在农业工人中发展起来。大家知道，在大不列颠，全部土地都归为数不多的大所有主所有，在这些大所有主中，最穷的每年的租金收入也有10万里拉，而最富的則有好几百万里拉。韦斯明斯特侯爵的年收入在1000万里拉以上。

土地被分成大的地段，由人数不多的为租佃农场主做工的农民用机器耕种。这里沒有小业主；农业工人的人数同他們耕种的土地比較起来本来已經很少，而由于采用新机器，人数还在逐年縮減；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被束縛于土地上的、同时也是竞争的牺牲品的无知的英国农业工人，就构成了居民中工資最低

的一类人。他们一再起来反抗自己的悲惨命运：1831年在英国南部，他们焚毁了农场主的草垛和谷堆⁸⁹，几年前在约克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有时，还试图在他们当中成立抵抗团体，但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可是，目前的运动在几星期之内就已达到了能保证它获得巨大胜利的规模。这个运动是从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中开始的，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要求把工资从每周11—12先令（13—14法郎）增加到16先令（19法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个抵抗团体，并且立即举行罢工。⁹⁰全郡的土地占有者、租佃农场主、保守党人都惊慌万状。农业工人，这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奴隶，竟敢在千百年来第一次起来造反，反抗老爷们的权力！而他们的确掀起了暴动，举行了罢工，并且进行得这样顺利，以致在两三个星期内，运动不仅席卷了瓦瑞克郡，而且波及了邻近的八个郡的所有农业工人。农业工人联合会对于心惊胆战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就像国际对于欧洲的那些反动政府一样，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只要一提它的名字就会使他们丧魂落魄。他们同联合会进行了斗争，但是徒劳无益；联合会由于有产业工人抵抗团体出主意、提供经验这些帮助，就更加巩固了，并且一天一天壮大起来了，甚至还受到了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资产阶级尽管和贵族结成了政治联盟，但经常同贵族进行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战；由于当时工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几乎所有罢工的农业工人都转入城市就业，在那里他们挣的工资比他们在农业中可能得到的要多。因此，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动地把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25—30%。首次取得的这个巨大胜利在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大批农村无产者投入了城市无产者反对资本压迫的运动。

上星期英國議會研究了有關國際的問題。狂熱的反動分子柯克倫先生譴責這個可怕的工人組織命令巴黎公社殺害大主教並縱火焚毀城市！然後他要求對當時駐在倫敦的總委員會採取鎮壓措施。當然，政府回答說：國際的會員，正如英國的一切居民一樣，只對法律負責，既然迄今他們都沒有違法，那就沒有理由對他們採取殘酷措施。⁹¹ 可以預料，協會總委員會對柯克倫先生造謠誹謗將作出回答^①。

弗·恩格斯寫於 1872 年 4 月 20 日

載於 18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報”
第 48 號

署名：弗·恩·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見本卷第 71—78 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关于对国际会员
泰奥多尔·庫諾的迫害⁹²

若干时候以来大家就已知道，德、奥、意政府签订了一项迫害国际会员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所起的作用如何，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侨居米兰的著名国际会员、公民泰奥多尔·庫諾——他出生于普鲁士，是一位工程师，被一家大机器制造企业解雇了，——于2月25日被捕，他的全部文件和他个人所有的照片（包括他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没收。他被戴上镣铐押送到维罗纳，在那里他们把他同小偷和杀人犯关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他们完全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地对待他，他的文件甚至被寄往罗马审查。3月29日，他被用一条锁链同刑事犯系在一起押送到国境，并被转交给奥地利当局。在这里他才第一次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他无限惊奇地读到之所以被捕，是因为：

“在米兰他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即流浪汉，没有任何生活资料，此外，还是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的危险的代理人；根据这一切理由，将他驱逐出意大利王国”！

实际上，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3月1日，他就要在科摩的一家工厂担任报酬优厚的厂长职务；至于说生活资料，意大利当局在送走他时不得不把他自己的111个法郎交给他就是证

明！奥地利人无法摆脱这个矛盾，但是，他們并没有釋放他，相反，却派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到巴伐利亚边境，并且押送他的这个警察的費用还必须由他負担。因此，庫諾不仅还得在監獄里呆一星期，而且还得耗費掉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錢。在巴伐利亚边境，毫无疑问，由于沒有必要的指令以及由于巴伐利亚警察当局的天生愚蠢，他設法使警方給他的親屬拍了一封电报，在得到滿意的回答后終于被釋放了。可見，在欧洲为反对国际而建立的警察联盟是实际存在的。他們本来可以把庫諾送到瑞士边境并在那里将他釋放的，但是他們却把他轉交給奥地利人，而奥地利人又把他轉交給巴伐利亚人，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犯从一个監獄轉到另一个監獄。这就是这些“自由的”君主立宪国的自由主义。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4 月
22—23 日

載于 1872 年 4 月 27 日“东邮报”
第 187 期和 1872 年 5 月 7 日“玫瑰小报”第 12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东邮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⁹³

作者在总委员会 1872 年 5 月 14 日会议上的发言稿

公民恩格斯說：这个建議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各爱尔兰支部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轄。这是各爱尔兰支部绝对不会同意的、而总委员会也既无权利又无权力强加于它們的事情。根据章程和条例，总委员会无权强迫任何一个支部或分部承认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轄权。毫无疑问，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管轄下的任何一个新支部以前，必須听取該委员会的意見。恩格斯断言，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并不比在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或意大利人支部^① 更应该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轄。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組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他們讲英語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們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組織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

公民黑尔斯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間的关系說成像克里木战争期間在英国和法国之間存在过的关系那样最富有田园詩的性质，当时英法两国的統治阶级无休止地互相吹捧，一切都充滿了最高度的和諧。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

① 在总委员会的記錄簿里接着是：“和波兰人支部”。——編者注

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说来，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辱。爱尔兰同英国的关系，就像波兰同俄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如果总委员会号召各波兰人支部承认在彼得堡的俄国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号召普属波兰、北什列斯维希或亚尔萨斯的各支部承认在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会怎么说呢？要知道，对各爱尔兰支部提出的要求实质上 and 这一样。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很广的一种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说来他们是贵族，正如蓄奴州的最堕落的白人认为自己对黑人说来是贵族一样。

在像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会。所以，各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甚至必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种对抗使人想起了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英国宪章派被爱尔兰人逐出曼彻斯特科学厅这件往事⁹⁴。现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第一次有可能协同一致来争取自己的共同解放——这种结果至今英国的任何一次运动都还没有达到。但是，在这个目的尚未达到之前，就有人要求我们向爱尔兰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说，他们不应

发展自己的运动,而应服从英国委员会的领导!要知道,这等于在国际内部实行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

如果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是那样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那就请他们把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迁移到都柏林去,并服从一个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管辖,以便证明这一点吧!

至于各爱尔兰支部同各英国支部之间的所谓冲突,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企图干涉各爱尔兰支部的事务,强迫它们抛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承认不列颠委员会的领导。

此外,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不能同在爱尔兰的各爱尔兰支部分割开来;不能允许有一些爱尔兰人受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而另一些爱尔兰人则受都柏林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是我们对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工人进行工作的据点。只要使各爱尔兰支部处在更有利的条件下,那它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爱尔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行。难道我们应当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这些据点,毁灭国际在整个爱尔兰扩大自己影响的唯一手段吗?不应该忘记,各爱尔兰支部绝不会同意放弃自己独立的民族组织而受不列颠委员会的管辖,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此,问题在于:给爱尔兰人以行动自由呢,还是把他们推出协会?如果提出的建议被总委员会接受,那就等于说,总委员会要向爱尔兰工人声明:在英国贵族统治爱尔兰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爱尔兰之后,现在他们应该准备接受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
14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并
根据记录簿校对过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 委员会的声明⁹⁵

几个星期以前，出現了一本名叫“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屬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想在国际內搞一次 *coup d'état* [政变]。它宣告成立了第二个总委员会，并对国际的整个組織和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提出指控。但是这个新的自封的委员会的委员是誰呢？这些指控的作者是誰呢？登載在这个文件末尾的署名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总委员会委员和总委员会前任财务委员、公民約翰·韦斯頓。但他写了一封信給总委员会，声明說，他的署名沒有征得他的同意。其次是一个和国际絕不相容的团体——共和大同盟⁹⁶的六名代表。第三是国际根本不知其存在的“国际共和联邦主义支部”的两名代表。第四是一个根本沒有加入国际的团体——土地和劳动同盟⁹⁷的两名代表。第五是两名自称是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其实只是由于公开敌視国际而被这个协会开除的一小批德国人的代表。⁹⁸最后是总委员会拒絕承认为国际的支部的两个法国团体（它們的会员总共不到十二人）的四名代表；其中我們发现有被 1868 年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所委派的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的韦济尼埃先生，⁹⁹ 以及朗德克先生，这位先生由于路易·波拿

巴的警察局长于1870年9月4日慌忙逃走才解脫了他向这位官員許下的自願的和“忠誠地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和过問国际的事务”(見已公布的关于对巴黎国际的第三次审判的报告¹⁰⁰),而且这位先生在不久之前剛被倫敦流亡公社社員团体驅逐出去。

甚至对于那些在这个文件上署名的人來說,事情也应当是很清楚的:由这样一批和国际根本格格不入的人举行的大会根本无权干涉国际組織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国际总委员会,就像国际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北部大铁路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它的管理局一样。

毫不奇怪,这伙人既根本不知道国际的历史,也根本不知道国际的組織結構。他們怎么能知道,根据我們的章程总委员会应当向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根本不是向他們提出自己的报告?或者,他們怎么能知道,当1870年爆发的战争使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的时候,所有的联合会一致決議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直到情况允許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时为止?至于总委员会为救济流亡者而募集的基金,那末进款总数是定期在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告中公布的,而且在我們的财务委員、公民荣克——克勒肯威尔区北安普頓广场查理街4号——那里保存着开銷每一个法寻的收据;每一个捐款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对这些收据以及报告。这样查对将表明,总委员会不仅分出了相当大一部分時間来做这件完全不屬於它的通常职权范围以內的事情,而且無論是作为一个組織的总委员会本身还是它的个别委員都尽自己的能力捐款来充实流亡者基金。

自从国际发展和强大到目前这种規模以来,同国际进行斗争

并使敌视国际的以及同国际相竞争的組織有某些获胜希望的唯一道路，就是假冒国际的名义来破坏它的强大力量。被政府和統治階級收买的一切下流报刊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些报刊——从警察报刊直到所谓的民主派和共和派报刊——都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总委员会的任何正式声明，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全欧洲报道诸如“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所发表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和荒诞无稽的言論。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安·阿尔諾
馬·巴里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比·德拉埃	欧仁·杜邦
約·格·埃卡留斯	威·黑尔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納尔
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納	罗赫納
沙·龙格	馬格里特
孔·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梅欧	乔·米尔納
托·莫特斯赫德	普芬德
約·罗兹瓦多夫斯基	維·雷吉斯
約·罗奇	呂耳
加·朗維耶	薩德勒
乔·賽克斯頓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揚

約·韦斯頓

德·沃尔弗斯

F. J. 賈罗

通訊書記:

列奧·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弗·庫尔奈——丹麦

奧·賽拉叶——法国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J. 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主 席 查·默里

財務委員 海·荣克

总 书 記 約翰·黑尔斯

1872年5月20日于倫敦拉脫本广场33号

卡·馬克思写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72 年 5 月 26 日“东邮报”第 191 期；1872 年 6 月 1 日“国际先驅报”第 9 号；1872 年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1872 年 6 月 2 日“自由报”第 22 号；1872 年 6 月 8 日“解放报”第 52 号；1872 年 6 月“社会思想报”第 16 号；1872 年 6 月 23 日“平等报”第 13 号

俄文譯自“东邮报”

卡·馬克思 再論斯蒂凡諾尼和国际

(給“玫瑰小报”編輯部的信)¹⁰¹

1872年5月23日于倫敦

編輯先生：

在3月28日的“自由思想”上，斯蒂凡諾尼先生很有把握地預料，尽管他从李卜克內西那里沒有撈到什么东西¹⁰²，但我今后仍然会用沉默来回答他的无休止的誹謗。我現在打破了这个沉默，这只是因为，卡尔·福格特先生这个在德国被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击毙了的人，原来是慫恿自己的同道者斯蒂凡諾尼发表声明的人。

斯蒂凡諾尼先生从福格特的书中抄录和摘引反对我以及反对整个德国共产党的、关于我和密探舍尔瓦尔之間的相互关系的无稽之談，但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約·菲·貝克尔(日內瓦)的信，因为这封信用幽默的笔触揭穿了福格特的蠢笨的捏造(見“福格特先生”第21頁¹⁰³)。

这个誹謗以及福格特那本卑鄙无耻的书中所充斥的其他类似的誹謗瀆言，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柏林“国民报”¹⁰⁴轉載了。我立即从倫敦对该报起訴，控告它进行誹謗。但是，按照普魯士立法我必須首先經過一道預备手續，即获得司法机关的对“国民报”編輯

进行訴追的許可。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訴諸許多訴訟申級，从偵查員到最高法院，結果却一无所获。簡言之，他們不准我起訴，因为这会使福格特先生声誉扫地（順便說一句，他在“政治研究”¹⁰⁵中曾建議普魯士以武力占領德国的其余部分），同时也会使那家打着所謂反对派的幌子，实际上为政府效劳，而后来又表现为俾斯麦的最馴服的工具的报纸声誉扫地，——他們不准起訴，因为这会使一个在当时遭到所有卖身投靠的德国报刊根据上面的命令加以瘋狂攻击的人感到十分滿意。

我同普魯士各級法院作斗争时經歷的一切波折，以及我向这些法院提出的证明我是无辜的文件，一起发表在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所以英勇的斯蒂凡諾尼先生是应当知道这些材料的。

斯蒂凡諾尼先生还从我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¹⁰⁶中摘录了一些話来证明（究竟证明什么呢？）我同德国共产党人有联系。我对这一点感到驕傲。

不过，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刑法典上所指的那种秘密团体，正是由于这个緣故，普魯士政府才不得不迫使卑鄙无耻的施梯伯和他的同謀者捏造一系列伪证来誣陷我和被告們。現在在德国，甚至連俾斯麦的拥护者在內，都找不出一个敢于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斯蒂凡諾尼先生不仅同福格特有勾結，而且同施梯伯也有勾結，这个情况甚至对像斯蒂凡諾尼这种 *esprit fort*〔自由思想者〕說来也是太明显了。

斯蒂凡諾尼先生在他4月18日的杂志中重新实行进攻。我在自己的那本书里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福格特先生在1859年就卖身投靠波拿巴，成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主要代理人。十年以后，由于他的朋友們——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不謹慎，使这

一点能够得到文件的证实。¹⁰⁷

說什么我为了德国的利益而维护奥地利并反对意大利的英勇捍卫者福格特先生,这是绝对不正确的。1848—1849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捍卫了意大利的事业而反对德国议会的多数派和大部分德国报刊。¹⁰⁸以后,在1853年,以及别的一些时候,我曾在“纽约论坛报”上捍卫过一个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经常同我发生分歧的人——馬志尼。¹⁰⁹总之,我始终是站在革命的意大利一边反对奥地利的。

但是,1859年的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揭露了这场战争,说明它的作用就是要使波拿巴帝国的寿命再延长十年,使德国服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把意大利变成它现在这个样子。¹¹⁰馬志尼例外地赞成我的观点(見1859年5月2—15日“思想和行动”¹¹¹)。那时他和我一样也遭到了那位无孔不入的福格特先生的攻击。

虽然我随时准备揭露福格特先生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但是我必须否认我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印发的反对福格特的匿名傳单的作者。斯蒂凡諾尼先生从福格特的話中摘录了福格特弄到的印发傳单的印刷厂厂主和排字工人的声明,企图证明布林德不是傳单的作者,而傳单也不是由那个印刷厂厂主印刷的。

但是,如果斯蒂凡諾尼先生真像他所說的那样讀过了我的书的話,那末他就会在第186—187頁¹¹²上看到我提到的那个排字工人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向英国法院宣誓后所作的声明,这两篇声明明确证,匿名傳单的作者恰恰是卡尔·布林德!

斯蒂凡諾尼先生攔下福格特,調轉話題来談赫尔岑。他首先硬說赫尔岑参加了建立国际的那次大会,并且說协会創立于1867

年。誰都知道，国际是 1864 年 9 月在朗-爱克街举行的集会上成立的，赫尔岑根本没有参加那次集会。唯理論的福音书作者斯蒂凡諾尼先生对待年代和地形的态度，完全像他的十八个世紀以前的新約方面的前輩一样。大約还在国际成立之前十年，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我就曾拒絕同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先生在同一個讲坛上发表演說。

赫尔岑本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出版的一本对我作了滿篇錯誤論断的书¹¹³中，也不敢像真理的崇拜者斯蒂凡諾尼先生声明的那樣，断言我什么时候會說他是俄国奸細。不过，如果有人渴望弄清楚應該如何对待肤淺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的話，只要讀一讀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的“我們的家务事”¹¹⁴这本小书就够了。

編輯先生，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馬克思

写于 1872 年 5 月 23 日

原文是意大利文

載于 1872 年 5 月 28 日“玫瑰小报”
第 148 号和 1872 年 8 月 1 日“自由
思想”杂志

俄文譯自“玫瑰小报”

卡·馬克思 答布倫坦諾的文章¹¹⁵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工人問題杂志”“协和”第10期給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論。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順便引用了格萊斯頓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預算演說中的一句話，而这句話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薩德議会議事录中是沒有的。¹¹⁶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邏輯直截了当地作出結論說：“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这句話”，因此它幸災乐禍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語写道：

“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話！”

說什么，最初用英語在倫敦当着格萊斯頓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話是我强加給他的，而且这句話在七年半的岁月里暢行无阻地載遍了倫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現在才終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聞。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話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p. 6, Inaugural Ad-

dress etc.) (逐字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實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在“双周評論”(1870年11月)上的一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倫敦各家报刊討論的文章中，倫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頁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話：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s Mr. Gladstone observed,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階級。”)117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現的呀！那好吧！我們来看一看一本专为倫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現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兌換論。1844年銀行法”。倫敦，1864年，T.考特萊·紐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118 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詳盡的批駁，在該书第134頁上引用了預算演說中的一句話：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財富和實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这同我引的話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經无可辯駁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謠說这句“話”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謊”！

我們順便指出，作風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轉載了格萊斯頓嘟嘟囔囔地說出的另一句話，他說英国工人階級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說来都是異乎寻常的和沒

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隱瞞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強調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話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統計”（«appalling 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間的尖銳的对比。^①

“兌換論”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薩德，而是根据一家倫敦報紙摘录那句話的。这家報紙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預算演說。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筆記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報紙的報名，但是沒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損。虽然倫敦各报上登載的議會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沒有哪一家報紙能够完全忽略格萊斯頓的这个极其聳人听聞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現在一样是格萊斯頓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預算演說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話：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譯成德文是：“从財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

① 这篇演說中的其他胡謔的辯护詞我在“資本論”一书（第638、639頁）¹¹⁹中曾予以批駁。

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①的話。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可見,根据格萊斯頓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階級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iam, Itaiam!»〔“意大利! 意大利!”〕^②最后,我們来談談汉薩德。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經過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說中刪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財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話;不过,这是英国常見的議會傳統,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 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¹²¹。把“泰晤士报”上登載的格萊斯頓实际发表的演說和格萊斯頓本人事后刪改过的演說全文仔細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評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篤信宗教的、畏畏縮縮地把自己的虔誠和自由主义的 «attitudes of mind»〔“情緒”〕展示出来的**資產階級英雄**。

我的“**資本論**”一书引起了特別大的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許多官方材料来評述**資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錯誤。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們也迭有所聞。但是他們想:

① «easy classes»,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一語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階級中的确实有錢的部分的。¹²⁰

②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編者注

“智者看不見的东西，
却瞞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①

說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們感到怀疑的引文，他們便向倫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薩德議会議事录上白紙黑字写着的那段話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現在他們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語。他們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請看“卡尔·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們應該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沒有花費一文錢来对問題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結局也許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員們表明：不管他們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們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彈琴一样。

卡尔·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倫敦

載于1872年6月1日
“人民国家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① 席勒“信仰的話”。——編者注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Official Organ of the British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No. 13

SATURDAY, JUNE 29, 1872.

ONE PENNY.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 和代表大会議事日程的決議¹²²

1. 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决定在巴黎召开下次代表大会，后来由于代表大会无法在巴黎召开，于是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規定，总委员会又于1870年7月12日确定美因兹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其次，鉴于目前無論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国际都遭到政府当局的迫害，以致代表大会無論在巴黎还是在美因兹都无法召开；

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的規定，确定国际工人协会下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日星期一在荷兰海牙召开。

2. 鉴于原定1870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事日程的内容目前已不适应国际的迫切需要，因为这些需要已由于发生的各种巨大历史事件而起了重大的变化；鉴于各国的許多支部和联合会都建議下次代表大会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鉴于目

前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国际都遭到迫害，因而国际面临的任务是巩固自己的組織；

总委员会决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作为海牙代表大会应予討論的最重要問題列入議事日程，同时保留以后根据各支部和联合会的建議，拟定代表大会的較詳細議程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6月18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72年6月29日“国际先驅报”第13号；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1872年7月7日“平等报”第14号；1872年7月13日“解放报”第57号；1872年7月14日“自由报”第28号

俄文譯自“国际先驅报”，并根据法文手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 德文版序言¹²³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組織，1847年11月在倫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們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詳的理論和实践的党綱。結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倫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譯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譯的，于1850年在倫敦“紅色共和党人”¹²⁴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譯本在美国出版。法譯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紐約“社会主义者报”¹²⁵上登載；現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譯本。波兰文譯本在德文本初版問世后不久就在倫敦出現。俄譯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¹²⁶ 丹麦文譯本也是在原书問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說来直到現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現存历史条件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現在这一段在許多

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¹²⁷，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1872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

弗·恩格斯 国际在美国¹²⁸

我們的讀者已經從我們的美国通訊中知道，合众国的国际會員中發生了分裂。最近几个月來在紐約發生的事情，在国际的历史上的確是不平常的，因此有必要詳細報道。我們的報道是以馬德里“解放報”(6月22日)上的一篇文章為基礎的，並且用我們所掌握的真实文件對它做了一些補充。

大家知道，在欧洲，資產階級和各國政府都把国际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怪物，并用这个怪物來吓唬一切善良的公民，因此現在可以不必擔心資產階級分子會充斥国际并使国际背棄它原來提出的任務。在美国，情形完全不同。使欧洲資產階級和各國政府害怕得要命的東西，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被認為是非常有趣的東西。對於一個沒有土地貴族、沒有君主制度，在純粹資產階級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社會說來，還沒有擺脫君主制度和貴族的監護——甚至在法國，至少在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的欧洲資產階級的幼稚恐懼是滑稽可笑的。因此，国际在欧洲顯得愈可怕，美国報紙的記者們把国际描寫得愈加駭人聽聞（誰也不可能像這些先生們那樣描繪得如此有聲有色），在美国人們就愈相信，現在可以利用国际撈一筆資本——貨幣資本和政治資本。

這首先是兩位美国太太的發現，她們企圖利用国际來做一筆

賺錢生意，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社会远远走在欧洲社会的前面。当欧洲資產階級的男人们在国际面前发抖的时候，两位美国資產階級的太太維多利亞·伍德赫尔女士和她的妹妹田納西·克拉夫林女士（“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¹²⁹ 的两位发行人）却制定了一个利用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計劃。她們的企图几乎成功了。

这两姊妹，两个百万富翁，两个鼓吹妇女解放、尤其是“自由恋爱”的人，勇敢地参加了国际。在克拉夫林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九支部，在伍德赫尔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十二支部；接着，其他支部也在美国各地相继成立；这些支部都是这两姊妹的崇拜者所建立的。根据現行条例，每一个支部都有权向正在紐約开会的中央委员会派遣一名代表。結果，这个最初由德国工人、爱尔兰工人和法国工人組成的联合会委员会，很快就充滿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美国資產階級男女冒險家。工人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两个姐妹冒險家的胜利看来是穩有把握的了。于是，第十二支部便挺身而出，向美国国际的創始人說明事情的原委。

1871年8月30日第十二支部发表了一篇由書記威·威斯特署名的宣言。¹³⁰ 这篇宣言說：

“国际的最終目的很簡單：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首先包括：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一切人都必須遵守的法律的拟訂、通过和实行。社会自由就是充分保障每个人在一切純屬个人性质的問題上，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不受任何无理的干涉。其次，它还包括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总政府。不言而喻，这个綱領也要求消灭一切語言差別。”

为了对这里所說的目的不致有任何誤解，便要求建立这样一

种組織，在这个組織下面，

“尽可能在每个选区都要設有自己的支部来促进政治活动……在每个城市必須有一个相当于現存市議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必須有一个相当于州立机关的州委员会，而在全国范围内，則必須有一个相当于合众国国会的全国委员会…… 国际的任务不外是在現有形式内建立一种新的管理形式，以代替旧的管理形式”。

由此可見，国际的使命不是推翻現存国家的基础，而是利用現存国家。的确，威斯特先生完全有权宣称：

“第十二支部宣言的公布是国际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872年3月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为了保证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首先需要摆脱至今一直具有无可爭辯的法律效力的国际共同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決議的束縛。果然，第十二支部宣称（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每个支部的自主权就是自由解釋代表大会決議，以及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決議（即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因为每个支部都对自己的言行負責。”

不久事情就变得更加不成体統了。繼續出現的不是工人支部，而是形形色色的由資产階級騙子手、自由恋爱的拥护者、降神术士、招魂的震教徒¹³¹組成的支部。于是，第一支部（德国人支部）这个在美国最先成立的国际支部，終於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呼吁书针对这一騙局，強調了协会的无产階級实质。其他各美国支部的始祖——第十二支部，立即作了回答。它在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通过自己的書記威斯特宣称：

“在对劳資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應該先在全世界推行妇女的公民平等权…… 第十二支部还应当反对作为整个抗議（第一支部的抗議）基础

的錯誤前提：似乎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人階級的組織。”

11月25日，第十二支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抗議。它說：

“断言〈共同章程断言〉工人階級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对的，不过，这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說的，即工人階級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解放。”

于是，以主張利用国家政权的人、钻营家、自由恋爱的拥护者、降神术士以及其他資產階級騙子手为一方，以真誠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也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的工人另一方，終於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德国人第一支部要求中央委员会驅逐第十二支部，并把所有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雇佣工人組成的支部的代表开除出去。这一要求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一部分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一些法国人支持第一支部，而美国人以及大多数法国人支部和两个德国人支部（施韦澤的支持者）則成立了一个新中央委员会。

旧委员会（我們称它为第一委员会）在12月4日发表了一个通告，对当前状况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改良主义欺騙活动的屏障的中央委员会里，終於形成了由現在几乎已被遺忘的改革派和慈善家构成的多数；結果，宣傳自由恋爱的福音的人們和那些想用全能語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間地坐在一起；經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投机商人、降神术士、无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他們每一个人都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 为了我們运动的利益而必須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組織起来，同时使工人和資本家的对立利益中孕育着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 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們鑒于一切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沒有結果，因此决定，在旧中央委员会不定期地停止自己的活动（1871年12月3日）之后，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組成的新委员会。”¹³²

然而，第二中央委员会(伍德赫尔)还在继续活动；它增添了很多所谓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主要是由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建立的，但是，它们大部分人数很少，以致几乎难以凑够充任最必要职务(书记、财务委员等)的人员。

两个委员会都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这时，某些支部(如法国人第十支部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同两个委员会都断绝了联系，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

3月5日和12日，总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决议^①，这些决议已在“人民国家报”(第37号)上发表。总委员会暂时开除了第十二支部，建议两个委员会联合起来，听候将从实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国代表大会的处理，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的支部。尽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决议只是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的，但是它们对国际在美国的命运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决议实际上承认了第一委员会是正确的，这就使得第二委员会的资产者们不可能滥用国际的名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¹³³要求，协会的一切内部事务只应在各支部和联合会之内讨论，决不能公开。但是从分裂的最初日子起，第二委员会就公然违反这一决议，邀请纽约报刊的记者参加自己的一切会议，并尽力使一切事情成为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报纸的题材。现在，当这个委员会自以为已经用狡猾手法欺骗了总委员会，因而起来攻击它的时候，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下流的纽约报纸如“先驱报”¹³⁴等依靠第二委员会的帮忙，把整个事情

^① 见本卷第56—59页。——编者注

說成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等等的冲突。紐約工人的敌人由于国际在美国的所謂瓦解而兴高采烈。

同时，第二委员会始終想使全世界相信，国际不是工人的組織，而是资产阶级的組織。还在1871年12月16日，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就宣称：

“我們委员会无须說明，某一支部的三分之二或某一部分成员应当是**雇佣奴隶**，似乎做一个自由民，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1872年5月4日，它又宣称：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指令中大言不慚地建議，今后不接受任何一个不是起碼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也应该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假改革派和慈善家、资产阶级騙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的渗入最感到担心的，恰恰是那个由仅仅依靠**雇佣奴隶的劳动所得的工錢**过活而别无其他謀生手段的公民組成的阶级。”

看来第二委员会已經把話說絕了。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工人的联合組織原来是一种絕大的蠢事；不仅如此，这个协会只有开除全体工人、全体**雇佣奴隶**，或者至少宣布他們是可疑分子，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沒有工人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們現在也得到了明确的回答。选举合众国新总统的日期临近了。

这家什么事情都要管的妇女报纸“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年3月2日发表了一篇題为“即将举行的联席會議”的文章，其中說：

“全国各种改革派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討論5月間在这里举行一次全体大会的建議…… 的确，如果这个大会开得巧妙的話，也許已經消逝的民主主

义的〈即对奴役制抱有好感的〉党派的残余还会出现并参加这个会呢……必須使一切激进派都有代表出席大会”，等等。

同一家周刊一期接着二期地向全世界的革新家，

“向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方面的改革家，向一切和平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拥护者，向国际的拥护者和妇女投票权的保卫者以及向一切认为实现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发表呼吁书。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然后是西·H. 班克斯、罗·威·休谟、乔·艾伦、威·威斯特、G. W. 馬多斯、T. 米洛特，总而言之，是第二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所有这些呼吁书都直接指出，代表会议应提出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非常特别的代表会议终于在5月9、10和11日在纽约阿波罗大厅举行了。所有美国的男女狂徒们济济一堂。第二委员会全班人马都出席了。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被提名为合众国总统候选人，并且还是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

整个美国对此报以哄然大笑，当然，这并没有使那些企图从这桩生意中捞一把的美国投机商人感到难堪。可是，让人把自己拖入这场丑剧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反应却不一样。第二支部（法国人支部）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也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格罗塞博士（他一度担任柏林的施韦泽的私人秘书），并且退出了第二委员会，直到第二委员会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时为止。5月20日，又有八个支部（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退出，这样一来，第二委员会现在所代表的仅仅是那些在加入国际以前实际上就已经结成一伙的美国的可疑分子——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及其周围的人。现在他们宣称，他们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完全由美国人组成的

国际；自然，他們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

同时，总委员会在回答圣路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支部的詢問时宣布，总委员会只承认第一委员会（现在是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¹³⁵ 維多利亞·伍德赫尔女士对国际的討伐就这样告終了。

“解放报”补充道：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面对这些事实，都应该反躬自問：如果没有总委员会，如果总委员会没有维护国际的基本原则的充分权利，没有开除那些企图把国际变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个人目的的工具的支部和联合会以听候应屆代表大会裁決的充分权利，这件丑事到什么时候才能結束并且将怎样結束呢？”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7月9日
左右

載于1872年7月17日“人民国家
报”第5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致帕尔馬工人階級解放委員會¹³⁶

你們6月7日发出的盖有6月9日邮戳的信，这里是7月13日收到的。从这封信我可以得出結論說，你們的团体希望加入偉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因为你們章程的內容同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沒有任何抵触的地方，所以你們加入国际是沒有任何障碍的。

只有一点应当肯定，就是你們必須承认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我随信給你們寄去一份这些文件的法文本（因为意大利文本不全，并且不太确切）。請你們討論一下这个建議，如果决定承认，就請通知我，以便我能办好接受你們入会的一切必要手續。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7月1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信稿譯的

卡·馬克思

致魯尔罢工的矿工

德国資本主义报刊建議你們放棄你們提出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把工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的要求，并恢复工作，使德国工业不致被迫从英国輸入用煤，从而导致德国資金外流，弄得无錢支付德国人的劳动报酬。

每当工人們采取独立行动，力求实现某种要求的时候，資产者便发出这种悲痛的哀号。在英国，这种老調子差不多已經唱了四十年，它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但是，这一次需要指出，資本主义报刊故意企图欺騙你們，把事情說成好像只要矿业主和工厂主們向英国写一封信，他們想要多少煤就能得到多少煤。

在英国，自从 1869 年以来，煤的消費量增加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英国工业普遍高漲，工厂数目增加了，铁路用煤增加了，海运业急剧扩展了，而主要的是因为冶金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它在最近三年中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繁荣时期。关于这一点，自由資产階級報紙“每日新聞”¹³⁷（本年 7 月 12 日）写道：

“当前煤价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冶金工业空前急剧的高漲。英国北部生产的煤大約占全国采煤量的四分之一，它的大部分运往倫敦以及英国南部和东部；輪船也消耗了很多的煤；但是不久前克利夫兰（它离煤矿很

近)的冶金工厂的发展突然造成了当地对煤的需求。目前每年至少要消耗**五六百万吨**^①煤的工业部門的这一增长,自然引起了采煤量的巨大增长。此外,西海岸赤铁矿区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坎伯兰和郎卡郡的高炉几乎完全是从德勒穆煤矿区取得燃料的,根据最低計算,每年也需要**150万吨**。单单是英国北部正在建設的新高炉每年就需要**75万吨**。此外还应加上西海岸的軋鋼厂和新高炉的用煤。因此,毫不奇怪,燃料問題很快成了整个英国北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煤价也就自然迅速地上漲了。在南斯泰福郡、苏格兰、南威尔士、得比郡、西約克郡和其他地区,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引起了煤价的上漲。”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矿工采取了同你們一样的行动:他們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英国煤矿老板們的見識和处世經驗总是远远超过他們的德国竞争者,他們沒有做什么重大的反抗就滿足了一切要求。請听“每日新聞”往下是怎么說的:

“工資有时增加了…… 矿工仍然要求不断地縮短工作日。加之,专家們断言,現在一个工人的采煤量只达到他以前在情况比較差、工資比較低时的采煤量的五分之三。因此本来是可以多雇工人的;但是現在恰恰很难找到他們。誠然,从农业区招募了很多工人;但采煤工人需要长期訓練,因此,情况只能慢慢地和逐漸地得到改善。目前工人們在某些地区已經达到了把每日劳动時間限制为八小时的目的;同时工資到处都在迅速提高,所以,除了提高煤价以外,看来别无出路。”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在全英国上部煤层差不多已經采掘完了,矿井必然越来越深。請听“每日新聞”的文章往下是怎样說的:

“南斯泰福郡这些有价值的煤矿的最好煤层被濫事开采。在这个曾經是丰富的产煤区的許多地方,矿井都已枯竭,貧矿区愈来愈多地变成了耕地和牧場,虽然还有数千摩尔根^②(貧矿区)正在荒廢。然而这个区的資源还没有耗尽。在旧采煤地点的周圍布滿了愈来愈深的矿井…… 但是情况是这样的:即使使用最新的技术,采煤的費用也愈来愈貴;何况矿井离冶金工厂很

① 英制1吨差不多正好相当于2000磅或1000公斤。

② 普魯士的旧面积单位,約等于 $\frac{1}{4}$ 公頃。——譯者注

远…… 我們所讲的南斯泰福郡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許多地区。必須愈来愈往深处挖掘才能采到煤,并且必須經過长途运输才能送到指定地点。”

这样一来,正如“每日新聞”所說,在就地用煤的条件下,煤价“增加了一倍”,真正的煤荒来到了,它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另一家杂志,英国資本家的主要經濟刊物“經濟学家”¹³⁸在7月13日出版的那一期中說道:

“从本年初起,煤价就不断上漲,現在它的价格比一年前高60—100%……再过一个星期煤价就可能高过100%;而且沒有一点真正的迹象表明煤价今后不会繼續上漲。今年6月輸出的煤达1 108 000吨,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4%以上,但是它的价值是758 000英鎊,比去年貴53%。今年6月輸出的煤的每吨平均价格为13先令9辨士(即4塔勒17½格罗申),而去年是每吨9先令4辨士(即3塔勒3½格罗申)。”

第三家資產階級報紙“旁观者”¹³⁹(7月20日)也指出,在倫敦,日用优质煤的价格从23先令即7塔勒20格罗申上漲到35先令即11塔勒20格罗申。

根据这些事实,你們可以相信,矿业主和工厂主們揚言要从英国輸入煤的威胁究竟有多大意义。阿尔弗勒德·克虏伯先生想下多少道命令就可以下多少道命令,但是要买英国的煤,他就必須比买魯尔的煤花更多的錢,而且,一般說来,他能否买到英国的煤,还是一个大問題。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書記,我认为有責任把这些事实告訴你們。

卡尔·馬克思

1872年7月21日于倫敦

載于1872年7月27日
“人民国家报”第6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卡·馬克思 答布倫坦諾的第二篇文章¹⁴⁰

在7月4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萊斯頓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預算演說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們的机关刊物（第10期）声明道：

“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說，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編造这句话的。

“协和”說：“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萊斯頓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萊斯頓”。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兌換論”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謊^①。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說的，它从倫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見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現在用什么謊言来自圓其說呢？請听：

“我們說馬克思給格萊斯頓的演說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話，这無論在形式

① 見本卷第97—101頁。——編者注

上或者在實質上都並沒有斷言，他自己也編造了它。”

顯然，這裡發生了工廠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種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個奸詐的工廠主同他的同行們談妥，向他們推銷一批縲帶，聲稱每盤縲帶有三十埃勒^①，而實際上只有二十埃勒，這樣一來，他事實上增添了十埃勒，而這正是因為他“沒有編造了它”。增添的縲帶是這樣，那末增添的句子為什麼就不能是這樣呢？亞當·斯密說：“絕大多數人的智能，必然會以他們的日常事務為出發點，並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¹⁴¹，工廠主的智能自然也是這樣。

通過“人民國家報”我不僅用從“兌換論”上摘錄下來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資本論”一書中涉及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的那些篇幅豐富了工廠主機關刊物的科學知識。現在這家機關刊物企圖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來證明：有爭論的那個地方我不是從“倫敦報紙”上，而是從“兌換論”中摘錄下來的。這種證明手法是工廠主邏輯的新範例。

我告訴工廠主的雜誌說，“兌換論”第134頁上引證的話和我引證的話完全一樣。而該雜誌卻發現，我引證的話和“兌換論”第134頁上引證的話完全一樣。

往下竟說！

“馬克思對於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評論，在這本書中也已經有了。”

這純粹是撒謊。在“資本論”第639頁上我是把我的評論同格萊斯頓演說中的一句話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麼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貧極已經縮小。”關於這一

^① 埃勒(Elle)是德國舊長度單位。——譯者注

点我曾指出：“多么卑鄙的詭辯！工人階級仍然是‘穷’的，只是随着他們給有产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已变得‘不那么穷’了，这也就是说，工人階級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貧极沒有縮小，这也就是说，貧极由于富极增大而增大了。”¹⁴² 这些“評論”在“兌換論”中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

“……評論，在这本书中也已經有了，而且‘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5 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給“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讓他們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說，这段引文是从“兌換論”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5 中我直截了当地說，“兌換論”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來說明”“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断出現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說：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頁上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引用的 London Orphan Asylum [倫敦孤儿院] 的关于生活資料漲价的材料，但是，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沒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見“資本論”第 640 頁注 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記告訴自己的讀者，“这本书”沒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襲了格萊斯頓的演說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說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說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評論”（1870 年 11 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談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

布的，是根据馬克思本人提供給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說道：

“对协会的成就，誰的貢獻也沒有像卡尔·馬克思博士的貢獻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統計而言，是沒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¹⁴³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沒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見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評論”在批評他的那篇文章¹⁴⁴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說，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①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萊斯頓的演說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們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說：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資產階級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輝煌的文件。还从来沒有人能用短短 12 頁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闡述。我願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話。”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藍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統計”之后繼續說：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統計轉过来談到关于所得稅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課稅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 20%；‘財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萊斯頓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

① 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給我，提醒我注意这种 quid pro quo [偷梁換柱的手法]。

号外面,当做自己說的話,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萊斯頓的演說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倫敦同行才知道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鎊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繳所得稅”(見“协和”第10期和第27期)一样。但是英国稅务人員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100英鎊的人才免稅。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爭論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我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則报道中引了一段話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話,因为格萊斯頓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这样的断語需要加以評論。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話指出,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語句在德文中沒有确切的詞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錢的人”,有产階級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階級叫做 *«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說法是,“不太富裕的階級”^①。

工厂主的作風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釋只字不提。它給我引用的那段話加上“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話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讀者了解,它引的話是我的譯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譯文不同,它不是把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① *«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 [“中等階級或不太富裕的階級”] (“英国和美国”1833年倫敦版第1卷第185頁¹⁴⁵)。

譯成“富裕的階級”，而是譯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階級”。它还使它的讀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財產始終被看成是有产階級的所有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們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話的翻譯，格萊斯頓先生也把他所描繪的資本主义財富的增加形容为“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劳动人民的状况”；在結尾时他說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拥有財產的階級”。可見，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給格萊斯頓先生的那句話，“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給他的那句話，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貴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馬克思还要厚顏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見，根据格萊斯頓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萊斯頓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說，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獻給广大的讀者！

我已經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讀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沒有引用格萊斯頓关于英国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話，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別強調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間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

它說道：“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話到此为止，我們繼續往下引证。”

为了反駁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爭論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

們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萊斯頓对資本家財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頌之后，就轉过来談工人階級。他根本沒有說，工人階級从“**財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

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萊斯頓接下去說了这样的话：

“**但是資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間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說，“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財的議會朋友們“**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議會調查和統計資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說来获得了異乎寻常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宣布說，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萊斯頓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預算演說中除了描写資本家財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階級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鳴得意的話。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責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謊，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貿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問題并不在于格萊斯頓用来安慰和庆賀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說的只是，照格萊斯頓的观点，所謂工人階級状况“異乎寻常的”改善跟“**財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資本的辯护人——而格萊斯頓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丰厚的辯护人之一——的正統學說正是认为，工人們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剝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頂点的一件

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薩德速記記錄中**确切引用**的話。”^①我們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

摘自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所載的格萊斯頓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說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階級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剛剛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階級的增长。但是資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間接的好处，等等。”

二

摘自汉薩德 1863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8 日議會議事录第 170 卷所載的格萊斯頓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說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異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 (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 的話。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繳所得稅的人的状况，**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一般真相 (!)** 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 (!)** 或者**(!)** 他們的**收入**的增长。資本的簡單增长对工人階級說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間接的好处，等等。”

① 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倫敦的各家大报在它們关于議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記材料。

我让讀者自己去把汉薩德版中的这种夸張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 Office [繁文縟礼局]①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話——“**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剛剛描述过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階級**”——在汉薩德版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傲慢的“含义确切的話”，凡是听过这次演說的人沒有一个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¹⁴⁶（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的預算演說）。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階級（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話。財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階級（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說来应当有間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¹⁴⁷（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預算演說）。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說，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階級（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話。財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說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階級（classes possessed of

① 这是狄更斯的小說“小杜丽”中的用語。——編者注

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階級說来应当有間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見,格萊斯頓事后在汉薩德的半官方的出版物中隱瞞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說中的下面这句话——“**財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階級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倫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現在教导我說,照批評的“慣例”,引用議會演說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說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說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慣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狹隘的普魯士忠順臣民的見識。由于沒有時間,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請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說来至少和“协和”相当——說过下面这句有分量的話:«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

卡尔·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倫敦

載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
第6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
全体会员书¹⁴⁸

公民們！

总委员会有必要向你們公开揭露国际内部的一些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你們当中大多数人却从来没有怀疑到它們是存在的。

在我們 1872 年 3 月 5 日的内部通告“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①中，我們不得不提醒你們注意所謂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宗派分子的阴谋，这些阴谋的目的，就是要在我們的队伍中制造糾紛，偷偷地把我們协会的最高领导权轉交給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为首的集团。

你們記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成立的时候曾經印行了一个章程，如果我們批准这个章程，它就会保证同盟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国际之内，同时又存在于国际之外。事实上，同盟也就会一方面有自己的同国际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并存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同时却又企图成为国际的一个組成部分。同盟的目的在于，用巴枯宁先生的特殊綱領来代替我們的共同章程，并把

① 見本卷第 3—55 頁。——編者注

巴枯宁的个人独裁强加于我们的协会。

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通告¹⁴⁹中拒绝了这种狂妄要求。它表示只有在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即同盟不再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它必须解散自己的组织，它的各个支部将根据普通地方支部的权利加入国际。同盟正式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在它的所谓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日内瓦中央支部加入了我们协会。而其余的支部对总委员会仍然保持秘密，因此总委员会只能认为这些支部是不存在的。

现在，过了三年多以后，我们掌握的一些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违反自己正式许下的诺言，过去和现在始终都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且是以秘密团体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内部；它现在仍然受巴枯宁先生的领导；它的目的依然如故，最近一年来表面上是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而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的整个组织的一切攻击都来自同盟。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他们要求国际按“自下而上”的原则组织起来，但他们自己作为同盟的盟员却俯首贴耳地听从“自上而下”的命令。

用不着证明，在国际内存在这类秘密团体显然违反了我们的

共同章程。我們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会员；同盟却把他們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組織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謠、伪装和欺騙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們欺騙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們隱瞞秘密組織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国际的綱領包含在它的章程中，是尽人皆知的；同盟的綱領則一貫被隱瞞起来，而且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不知道。

同盟的核心是汝拉联合会；由它提出口号，而秘密組織所控制的其他支部和报纸則立即响应和拥护。在意大利有一些受同盟领导的团体。这些自称为国际支部的团体，从来没有申請过加入国际，从来没有繳納过会費，从来没有履行过我們的条例中規定的任何一个条件。在比利时，同盟有几个相当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法国南部，同盟有自己的通訊員；其中有一个人还把这种职务和警察局秘书的职务結合于一身。但是同盟組織得最好的还是在西班牙，它在那里分支最多。在那里一开头它就不露形迹地混进了国际的队伍，并且几乎一直抓住历届联合会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他們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这个秘密組織在我們协会内部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組織似乎是每个人的义务。倫敦代表會議（在这次會議上，一个身为同盟盟員的西班牙代表^①，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巴枯宁的忠实信徒按照他的旨意立即对代表會議和总委员会所散布的謠言和进行的瘋狂攻击都澄清了

① 安·罗倫佐。——編者注

上面那种糊涂看法。在同盟内部经过长期斗争后，那些把国际看得比同盟珍贵的西班牙会员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他们立即遭到了那些仍然忠实于秘密团体的人的最恶毒的侮辱和诽谤。他们被两度开除出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是明显违反现行条例的行为。当他们想组织一个新马德里联合会¹⁵⁰的时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不准他们这样做，并退回他们寄去的会费。这里需要指出，就我们所知，联合会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中有五名是同盟盟员（维散特·罗塞耳、佩雷格林·蒙托罗、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弗朗西斯科·托马斯和弗朗科·马丁涅斯），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人。这样一来，因自己的自治而无比自豪的西班牙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自己根本没有怀疑到自己正是像一群绵羊那样地顺从自瑞士发出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联合会委员会必须盲目地执行，如果它不愿意这样做就会被同盟宣布为非法。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被选举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于7月7日向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要求它们缴纳额外会费，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费用，并权威主义地命令它们按照全西班牙的一张共同名单来选举这些代表，以便由它，即联合会委员会，来负责计算选票。这种选举方法是要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不仅如此，联合会委员会还通知说，它草拟了一份这些代表绝对必须遵从的共同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当我们一获悉这个用国际会员的经费派遣同盟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方案以及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秘密团体一起搞阴谋活动的证据后，我们便在7月24日向它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

在国际中所担负的职务；

(2) 调查西班牙同盟的性质和活动, 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3) 寄一份 7 月 7 日的内部通告给我们；

(4) 向我们说明, 为什么你们认为, 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 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5) 在回信时要作详尽回答^①。

我们至迟在 8 月 1 日以前就应当收到回答。但是, 直到 8 月 5 日我们才收到一封标明“8 月 1 日于瓦伦西亚”的信(邮戳已辨认不清), 信中借口说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懂我们用法文写的信, 因为需要时间来翻译这封信, 所以回答推迟了。然而就是这个委员会却在 6 月 15 日的信中请求我们在给他们寄我们的刊物等等的时候尽可能寄法文的, 因为他们(委员会的委员们)多少懂得一点这种语言! 可见借口是虚伪的: 他们只不过想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间。

因此, 我们不得不向协会的全体会员, 尤其是国际的西班牙会员宣布,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背叛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不但没有严格遵照国际西班牙会员所赋予它的权力行事, 反而成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 而且甚至是敌视国际的团体的机构。它所服从的不是共同章程和条例, 以及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和西班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而是巴枯宁发出的秘密指令。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都是同国际格格不入的秘密团体的成员, 所以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显然违反共同章程的。

^① 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公民們，这就是在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之前必須告訴你們的一些事实。在工人階級斗争的历史中，我們第一次在工人階級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現存的剝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因此，凡是我們接触到这个阴谋的地方，我們都看到，它在鼓吹起削弱作用的绝对放棄任何政治活动的学說。当不了解这一阴谋的普通国际会员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都遭到迫害和逮捕的时候，“英勇的”同盟盟員却享有不受任何侵犯的特权。

公民們，你們应当作出抉擇。現在問題不在于支部自治、小組自由联合，不在于“自下而上”的組織，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夸夸其談的和响亮的詞句。現在問題在于：你們希望我們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除了你們所賦予的权力而外不承认别的权力的人来組成，还是希望我們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通过欺騙的办法选举出来并从你們那里获得权力，但是决意遵照在瑞士的某位神秘人物的秘密指令把你們当成一群綿羊来驅使的人組成？

揭穿这个秘密的騙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同盟的先生們并不会笨得相信，当国际的广大会员群众知道存在这个組織时还会自觉服从这个組織。在騙子手和他想欺騙的人之間，在同盟和国际之間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必須一举永远地結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組織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糾紛。这些糾紛只是浪費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現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撓国际反对工人階級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要求海牙代表大会将同盟的全体盟員开

除出国际，并授予总委员会以必要的权力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阴谋。

总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4—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¹⁵¹

1872年8月8日于倫敦

鉴于同盟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員进行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¹⁵²在1872年7月24日的会议上，委托西班牙书记、公民弗·恩格斯将下面这封信送交瓦倫西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公民們！

我們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設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們偉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絕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們从塞維尔的“理智”¹⁵³上知道，你們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員是同盟的人。

1868年当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公开团体成立时，总委员会不得不拒絕在它仍然保持自己的国际性质的时候接受它加入国际，因为它妄图成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外活动的第二个国际联合組織。同盟只是在答应仅仅作为日内瓦的一个

普通地方支部存在之后，才加入了国际（見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頁及以下各頁^①）。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組織和性质就已經同我們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違背，所以，它違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們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會員；同盟却把他們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組織来領導。国际要求自己的會員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則；同盟却責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須向国际的非亲信的會員隱瞞这个秘密組織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总委员会已經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調查該同盟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还知道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应同盟的先生們坚决要求而采取的那些有利于他們团体的措施，于是总委员会坚决决定取締这些阴谋活动。为此，总委员会要求你們完成以下事項，以便起草即将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同盟的报告：

(1) 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員的名单告知我們，并注明他們在国际中所担負的职务；

(2) 調查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組織和国外分支；

(3) 寄一份你們 1872 年 7 月 7 日的内部通告；

(4) 說明为什么你們认为，在你們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員这一事实，同你們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① 見本卷第 11—15 頁。——編者注

如果总委员会收不到作出确实的和最后的答复的回信，它将被迫不仅在西班牙国内，而且也在西班牙国外公开宣布，你们违反了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并且为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利益而背叛了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7月24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一封标有“8月1日于瓦伦西亚”字样并于8月5日在伦敦收到的信件中，对总委员会的要求作了如下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收到了你们最近的来信，但是，由于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而我们的常任翻译又不在瓦伦西亚，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信的内容。我们已请另一个同志尽快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回答。”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872年8月8日会议决定，在等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回答的同时，必须公布这封信，以便敦促西班牙的所有联合会和支部对称为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存在、活动和目的进行调查。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通讯书记

J.帕·麦克唐奈——爱尔兰通讯书记

弗·恩格斯——西班牙和意大利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通讯书记

勒穆修——美国通讯书记

海尔曼·荣克——瑞士通讯书记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通訊書記**會議主席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書記)****會議秘书 弗·庫尔奈(荷兰書記)**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2年8月8日

載于1872年8月17日“解放报”

第62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譯自“解放报”，并

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致新馬德里联合会¹⁵⁴

执行委员会受总委员会委托暂行代理协会的一切组织工作，
鉴于新馬德里联合会 8 月 5 日来信请求总委员会予以承认；
鉴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7 月 16 日做出的拒绝接受上述联合会加入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同意总委员会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加以反对的、其大部分成员都是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观点，即使从形式上来看也是荒谬的；

考虑到，在西班牙首先敢于同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划清界限、揭露并挫败其阴谋诡计的，实际上正是新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者，——

为此，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理由，代表总委员会，
决定承认新馬德里联合会，并同它建立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

代表执行委员会

西班牙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 年 8 月 15 日于伦敦

载于 1872 年 8 月 24 日
“解放报”第 63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 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¹⁵⁵

1872年8月23日于倫敦拉脫本广场33号

我們收到了标明日期为“8月6日于里米尼”的某个据称是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联合会的代表会议的決議，¹⁵⁶ 決議断然表示同倫敦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擅自規定在紐沙特尔(瑞士)召开^①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建議这一派的各个支部都要派自己的代表前往紐沙特尔，而不是前往即将举行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海牙。

必須指出，有代表在这个決議上签字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其余20个支部中没有一个履行我們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規定的接受新支部的任何一个条件。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正是那些妄图建立这个联合会的人，在偉大的工人协会之外建立自己的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将就这种假冒名义的行为做出決議。

代表总委员会并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

意大利書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部分載于1872年8月28日“人民报”
第95号，全文載于1872年9月29日
“平民”第2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平民”譯的，
并根据信稿校对过

^① 在信稿中接着是：“所謂的”。——編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¹⁵⁷

1872年9月2—7日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
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¹⁵⁸

1872年9月2—7日

公民們^①！

自从我們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

巴黎的国际会员們^②公开而明确地警告过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法国国内专制和对外战争。¹⁵⁹ 1870年4月23日，即全民投票的前夕¹⁶⁰，他們被逮捕了，借口是他們参加了谋杀路易·波拿巴的阴谋。同时在里昂、卢昂、馬賽、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城市也跟着逮捕国际会员。总委员会在1870年5月3日的声明中说¹⁶¹：

① 在傳单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們”，而是“工人們”。——編者注

② 在“国际报”、“自由报”等报纸上，这段话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当帝国要求法国通过新的全民投票来使它的存在神圣化的时候”。——編者注

“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經傳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囂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騙局。”^①

而事实上，在十二月帝国傾复以后它的后继者們公布的文件也已經证实，最近这次阴谋是由波拿巴警察当局亲手制造出来的¹⁶²，在全民投票前夕，奧利維耶在一个秘密通告中直接指示他的下屬說：

“必須逮捕国际的领导人，否則全民投票便无法令人滿意地进行。”

全民投票这出鬧剧演完以后，在7月8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員們果然受到路易·波拿巴的法官們的审訊，但这仍然只是因为他們“罪恶地”参加了国际，而不是因为他們参与了臆造的阴谋。¹⁶³ 可見，波拿巴政府认为，要发动一場法国任何时候都沒有遭到过的为害最大的战争，就必须先对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进行征伐。不應該忘記，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地擯棄了全民投票。也不應該忘記，

“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統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輝煌胜利”（1870年7月23日“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¹⁶⁴）。

全民投票以后几个星期，波拿巴主义的报刊就开始在法国人民中間煽起好战狂热，巴黎的国际会员們不顾政府的迫害，于7月12日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痛斥正在发动的战争是“犯罪的瘋狂行为”，而且对“自己的德国弟兄們”說：

^① 在傳单和“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我們看对了。”——編者注

“我們相互仇視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他們声明說：“我們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不承认任何国界。”¹⁶⁵

这个号召在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因此总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断言：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誼的音訊。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偉大事实……表明，同那个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誕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則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統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7月23日宣言）

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前，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們一直被囚于獄中。而协会的其他会员每天都被当众痛罵为被普魯士收买的叛徒。

第二帝国像它以模仿剧开始一样，以色当投降而告終，于是普法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普魯士曾不止一次地庄严宣称，它拿起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击退外国侵略，而現在則抛开了假面具，宣布进行侵略战争。从这个时候起，它不仅要在法国反对共和国，而且也要在德国反对国际。在这里我們只能对这一斗争的經過作一个概略的叙述。

宣战以后，北德意志联邦的大部分領土（汉諾威、奥登堡、不来梅、汉堡、不倫瑞克、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梅克倫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魯士省）馬上宣布戒严，让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將軍在那里逞凶肆虐。这种作为防御外国入侵的措施宣布的戒严，立即变成了一场反对德国的国际会员的战争。

在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的第二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考虑到邦的法律的情况下成立的国际支部——的不倫瑞克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瓜分法国，要求实现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且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¹⁶⁶ 宣言譴責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意图是一种犯罪行为，其结果会使整个德国都变成普魯士的兵营，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9月9日，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下令逮捕不倫瑞克委员会委员，给他们戴上镣铐，发配到600英里以外位于俄国边界的普魯士要塞勒特岑去。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卑鄙虐待同国王的贵宾在威廉堡¹⁶⁷ 受到的特意款待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大肆逮捕并把工人们从德国这个邦流放到那个邦去，尽管封闭工人报刊，尽管进行军事镇压和警察百般刁难，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仍旧按照国际的精神和根据不倫瑞克宣言行动。因此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9月21日^① 下令禁止社会民主党举行任何集会。这道禁令被10月5日的另一道命令廢除了，在后一道命令中他狡黠地指示警探们，

“要把一切公开发表言论鼓励法国反对德国提出的和谈条件的人都报告给他本人，以便他能够使这些人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致为害”。

普魯士国王一方面让毛奇照料国外的战争，另一方面自己则竭力使国内的战争发生新的转变。根据他本人10月17日的命令，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必须把勒特岑的囚犯们交给不倫瑞克地方法院审理，而该法院则应该找到法律根据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交回给残暴的将军严加看守。

^① 1870年。——编者注

自然，全德国都效法了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的先例，而俾斯麦在外交通告中却采取了一种侮辱欧洲的手法，把自己装扮成维护法国主和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义憤填膺的卫士。正当他要求法国要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民議會的时候，在德国本国他却因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在德国国会中代表国际发言反对过他而下令把他們关进監獄，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阻止他們再度当选。¹⁶⁸

他的主子征服者威廉支持了他，从凡尔賽发出了命令，延长了戒严的期限，就是說，在整个选举期間廢除一切民法。国王实际上只是在同法国簽訂和約两个月以后才准許在德国解除戒严。他頑固地坚持在国内实行戒严，他多次亲自参与对他自己德国国内的俘虏的处理，这一切证明，在无敌武器的轰隆声中和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疯狂的喝彩声中，他对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恐惧。这是物质暴力对精神力量的迫不得已的重视。

这场反对国际的战争起初只是在法国（从全民投票日起到帝国崩潰为止）进行，后来只是在德国（在共和国反对普魯士的整个斗争期間）进行，但是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之日起以及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就成为遍及一切地方的战争了。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外国发出了通告，要求把公社流亡者^①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并且号召对国际——这是以法夫尔本人为当然代表的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敌人——发动一次全面的十字軍征討。¹⁶⁹奥地利和匈牙利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6月13日，在佩斯对他們认为的工人联合会的領袖进行了强

^① 在傳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社流亡者”，而是“公社委員”。——編者注

盜式的突然襲擊；他們的文件被沒收了，他們本人被逮捕并被控以叛國罪而交付法庭審判。¹⁷⁰ 這時正在佩斯的國際維也納支部的某些代表也被解送到維也納去作同樣處置。博伊斯特再向議會要求并得到了 3 萬英鎊，

“作為政治情報工作的開支，因為國際日益危及整個歐洲，這種工作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

從此以後，在奧地利和匈牙利便建立了对付工人階級的真正的恐怖統治。奧地利政府甚至在垂死的時候還拚命掙扎着抓住它舊有的、扮演歐洲反动派的唐·吉訶德角色的特權不放。

茹爾·法夫爾的通告發出以後過了幾個星期，杜弗爾向自己那個地主議會提出了一項現在已經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只要參加國際工人協會或承認它的原則，就以犯罪論處。梯也爾以證人身分向地主議會的杜弗爾法案委員會講話時，吹噓說這個法律是他本人睿智的產物，說什麼他自己最先發現了這個可靠的法寶：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付異教徒的辦法来对付國際。但是，即使這一點他也不能以獨創性自詡。早在他就任社會救主的職位以前很久，統治階級用于國際會員的這種真正的法律理論就已經由維也納各法院制定出來了。

1870 年 7 月 26 日，奧地利無產階級政党的最卓越的代表們被認為犯了叛國罪，判處每月禁食一天的多年苦役。判決書的原文如下：

“犯人們自己供認，他們接受了在愛森納赫舉行的德國工人代表大會（1869 年）的綱領，并根据這個綱領進行了活動。這個綱領包括了國際的綱領。國際的建立是為了把工人階級從有產階級的統治和政治上的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同奧地利國家的現存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凡是接

受和傳播国际綱領的基本原理的人，就是进行預謀顛复奥地利政府的活動，从而犯了叛國罪。”

1871年11月27日，对不倫瑞克委员会的委員們作出了判決。他們被判处了期限不同的監禁。法院非常明确地把維也納作出的判決书的根据当做先例加以援引。

在佩斯，被監禁的工人联合会的成員在經受了英国政府用以对待芬尼亚社社員¹⁷¹的那种卑鄙虐待几乎整整一年以后，才在1872年4月22日出庭受审。在这里檢察官也要求按照維也納制定的法律理論將他們治罪。但是，他們被宣告无罪。

在萊比錫，1872年3月27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被控犯有圖謀叛國罪，判处了两年要塞監禁，——也是根据維也納作出的那份判決书。所不同的只是維也納法官們的判決在这个場合是由薩克森的陪審員們批准的。

在哥本哈根，国际中央委员会的三位委員布里克斯、皮奧和盖列夫于5月5日^①被投入監獄，因為他們不顾警察当局的禁止，坚决要举行露天集会。他們在被关进監獄以后才得知，對他們提出的指控具有更加一般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同丹麦国家的存在不相容，因此，单是宣傳这种思想就构成了違反丹麦宪法的罪行。又是維也納制定的那一套法律理論！被告直到現在还被拘留，听候审讯。

由于对茹尔·法夫尔关于引渡公社社員的要求作了表示支持的答复而大出風头的比利时政府，赶忙通过馬魯提出了一个照抄杜弗尔法的法案。

^① 1872年。——編者注

至圣的教皇庇护九世在告瑞士天主教徒晋謁团书中发泄了他的愤怒。

他說：“你們的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应当为那个叫做自由的东西作出重大的牺牲。它給大批最下等的人提供了避难权。它在自己国内容忍一个叫做国际的教派，而这个教派是想要像对待巴黎一样来对待整个欧洲的。对于国际的这些先生——說来他們根本称不起什么先生——是应当加以提防的，因为他們是按照天主和人的死敌的利益来行事的。为什么要保护他們呢？应该为他們祈禱。”

先把他們絞死，然后再为他們祈禱！

受俾斯麦、博伊斯特和普魯士特务头子施梯伯支持的奥皇和德皇于1871年9月初在薩尔茨堡会晤，毫不掩飾他們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神圣同盟。

俾斯麦私人的 *moniteur* [通报] “北德报”¹⁷² 声称：“只有这种欧洲同盟才是拯救国家、教会、财产、文明，一句話，拯救欧洲各国所賴以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显然，俾斯麦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即将爆发的对俄战争中獲得同盟者，而国际不过被用来撩惹奥地利罢了，就像斗牛者用紅布来撩惹公牛一样。

朗扎干脆下令禁止国际在意大利活动。薩加斯塔宣布国际在西班牙不受法律保护，¹⁷³ 他大概指望以此来博得英国证券交易所的好感。自从农奴制廢除以来被迫采取一些冒险措施——今天对人民的要求做些小心翼翼的让步，为的是明天能够把这些让步收回——的俄国政府，从迫害国际的普遍号召中找到了在国内重新加緊反动的借口。为了刺探我們协会的秘密，它在国外进行活动，劝說一个瑞士法官当着—一个俄国密探的面搜查俄国的国际会员、

我們的罗曼語区联合会机关报——日内瓦“平等报”的編輯吳亭的住宅¹⁷⁴。只是由于瑞士的国际会员們进行宣傳鼓动工作才防止了瑞士的共和国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引渡給梯也尔。

最后，格萊斯頓先生的政府虽然沒有能够在大不列顛本土按照这种精神行事，但是至少也证实了他的善良意图：它在爱尔兰肆意使用警察恐怖手段来反对我們在那里建立的支部，并且命令它的代表在国外收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情报。

但是，欧洲各国政府合力謀划的一切镇压措施，同文明世界的造謠力量发动的誹謗战争相比，都会黯然失色。强加于国际的各种无中生有的事件、对国际的“秘密”的揭露、无耻伪造的公文和私函、聳人听闻的电訊，接二連三地迅速出現；出卖灵魂的可敬的报刊所控制的一切誹謗的閘門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齷齪的洪流汹涌而出，要把可恶的敌人淹死。这场用誹謗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規模來說，还是按照統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來說，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全世界傳遍这样一个电訊：这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他們沒有把蕩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說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总委员会在它过去各次年度报告中通常总是对协会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成就作一个概述。公民們^①，这次使我們不得不打破这个慣例的原因，你們当然会了解。况且各国代表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弥补这个缺陷，他們知道得最清楚，他們在自己的报告中可以談到什么程度为止。我們只是指出，自从巴塞尔代表

① 在傳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們”，而是“工人們”。——編者注

大会，尤其是 1871 年 9 月倫敦代表會議以來，國際在英格蘭的和愛爾蘭本地的愛爾蘭人中間，在荷蘭、丹麥、葡萄牙都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它鞏固了自己在合眾國的組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有了分支。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 1848 年時期，工人階級在沒有國際組織時和有了國際時的區別就顯得特別明顯。要使工人階級自己認識到 1848 年六月起義是它自己的先進戰士的事業，曾經需要很長的歲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歡欣鼓舞的聲援。

你們，工人階級的代表們，聚會在一起，為的是加強旨在解放勞動和消滅民族糾紛的協會的戰鬥組織。幾乎與此同時，舊世界的帝王們也在柏林聚會，為的是鍛造新的鎖鏈和策劃新的戰爭。¹⁷⁵

國際工人協會萬歲！

卡·馬克思寫於 1872 年 8 月底

1872 年在不倫瑞克印成傳單：“倫敦總委員會在國際代表大會的公開會議上作的正式報告”，並載於 1872 年 9 月 18 日“人民國家報”第 75 號；1872 年 9 月 29 日“自由報”第 39 號；1872 年 10 月 6 日“國際報”第 195 號；1872 年 10 月 5 日和 13 日“解放報”第 68、69 號；1872 年 10 月 5、12 和 19 日“國際先驅報”第 27、28 和 29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國際先驅報”，
並根據德文傳單校對過

弗·恩格斯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
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的报告¹⁷⁶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在1868年底建立的。这是一个企图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和外部同时进行活动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是由协会会员组成的，他们要求有参加国际会员的一切集会的权利，但是却希望有权同国际并列地保留自己的地方性组织、自己的全国性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见，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的派系。

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我们总委员会当时来往的信件，已经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第7—9页^①（第一号文件）上刊印出来了。只要同盟保持着独特的国际性质，总委员会就拒绝接受它；总委员会答应，只有在同盟解散自己特殊的国际组织，它的支部变成我们协会的正常支部，并且总委员会知道每一个新的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的条件下，才能接受它。

这个^②以后在自己和总委员会的交往中自称为“社会主义民

① 见本卷第11—15页。——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名称”。——编者注

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69年6月22日对这些要求做了如下的答复：

“根据你们的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商定的条件，我们向同盟的各组织提出了解散同盟这个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的组织的问题……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绝大多数组织都赞同中央委员会打算做出关于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定的意见。今天关于解散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在把这一决定通知同盟各组织的同时，已建议它们按照我们的榜样组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并且争取你们或者各相应国家的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承认它们为这样的支部。为了证明你们寄给前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已经收到，我们今天把我们支部的章程送给你们审查，并请求你们正式承认它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签字）临时书记 沙·佩龙（第二号文件）。

文件中附有一份同盟的这个章程，列为第三号。

日内瓦支部是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的唯一的支部。关于同盟其他那些似乎存在的支部，毫无所闻。然而，尽管同盟分子在不断搞阴谋，力图把自己特殊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并夺取我们协会的领导权，当时可以认为同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解散了自己。可是^①，总委员会收到了相当确凿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不能不做出结论：同盟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把自己解散，和它庄严地许下的诺言相反，它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过去存在过，并且现在还继续存在着，它正利用这个地下组织来像以前那样追求它原来的目的——取得统治权。由于同盟本身发生内讧，它的存在特别是在西班牙的存在这件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关于同盟内讧的经过，我们下面再作叙述。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就是由曾身兼同盟西班牙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那些旧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起草的通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从今年5月以来”。——编者注

告(見“解放报”第 61 号第 3 版第 2 栏, 第四号文件¹⁷⁷) 暴露了同盟的存在^①。[在更早的时候,] 1872 年 6 月 2 日的通告就通知同盟在西班牙的所有支部說, 通告的签署者刚刚把自己的同盟支部解散了, 并且建議其他組織效法它們。¹⁷⁸ 通告发表在“解放报”(第 59 号, 第五号文件)上。

这个通告的发表, 迫使同盟的报纸即巴塞罗纳的“联盟”(1872 年 8 月 4 日, 第 155 号) 也发表了同盟的章程 (第六号文件)。于是, 这个团体的存在便被完全证实了。

我們把秘密团体的章程和同盟日内瓦支部向总委员会提出的章程做了比較, 首先, 我們发现第一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和第二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是一样的, 只是文詞上有一些不同, 即在秘密章程中巴枯宁的特殊綱領表述得更加明确。

下面就是准确的統計表:

日内瓦章程	秘密章程	
第 一 条	第 五 条	一字不差
第 二 条	第 一 条	大体相同
第 三 条	第 二 条	一字不差
第 四、五 条	第 三 条	大体相同
第 六 条	第 四 条	大体相同

秘密章程本身是以日内瓦章程为基础的。例如, 秘密章程第四条和日内瓦章程第三条一字不差; 秘密章程第十条是由日内瓦章程第八条和第九条压缩成的, 同样, 秘密章程第三条是由日内瓦章程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压缩成的。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 “由于无法把自己在国际中的义务同自己又身为国际内部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的处境調和起来, 他們在 6 月 2 日表示”。——編者注

和同盟分子目前的做法相反，日內瓦章程第七條鼓吹國際的“強有力的組織”，規定同盟的一切盟員必須“支持……代表大會的決定和總委員會的權力”。這一條在秘密章程中沒有，但是原先有過，馬德里 seccion de oficios varios [各行業聯合支部] 條例（第七號文件）第十五條幾乎是一字不差地照搬了這一條就是證明，該條例也包括了同盟的綱領。

顯而易見，同我們打交道的不是兩個不同的團體，而是同一個團體。一方面，日內瓦中央委員會向總委員會保證說同盟已經解散，並且根據這一聲明被接受為國際的支部，而另一方面，以巴枯寧先生為首的這個中央委員會的首領們卻加強了這個同盟的組織，把它改變成秘密團體，並且保持了他們答應要放棄的它的國際性質。他們用不體面的辦法騙取了總委員會和得到書面通知的整個國際的信任。這些人既然開始就撒了這樣的謊，當然再也沒有任何理由不去進行各種陰謀詭計，以便控制國際或者一旦失敗，就破壞國際。

現在我們把秘密章程的主要條文引在下面：

“(1) 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由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組成，目的在於宣傳和發展自己綱領的原則，並且研究能夠推進直接和立即解放工人階級的一切手段。

(2) 為了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好成就，並且不致於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的聲譽，同盟應當是完全秘密的。

(4) 凡是事先不完全地和不真誠地承認綱領的原則的人，均不能被接受為盟員，等等。

(5) 同盟將尽可能從內部影響工人的地方聯合會，使它不致走上反動的或者反革命的道路。

(9) 多數盟員可以不說明理由而把任何盟員從同盟中開除出去。”

可見，同盟是在國際內部建立的、有特殊綱領的秘密團體，它

的綱領根本不是国际的綱領；这是一个旨在宣傳这个它认为是唯一革命的綱領的团体。这个团体規定其成員有义务在他們的国际地方联合会中进行活动，使这种联合会不致走上反动的或者反革命的道路，就是說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違背同盟的綱領。这就是說，同盟的目的是要依靠自己的秘密組織把它的宗派主义的綱領强加于整个国际。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秘密組織的力量爭取把同盟盟員选入各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这些委员会都抓在自己手中。凡是同盟认为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它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如果同盟盟員^① 宣傳自己的綱領，那誰也不可能對他們有意見。国际是由屬於各种极不相同的派別的社会主义者組成的。它的綱領非常广泛，足以容納所有这些派別；巴枯宁派是根据和其他派別同样的条件被接受进来的。巴枯宁派之所以受責备，正是因为他們違反了这些条件。

至于說到同盟的秘密性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許多国家，在波兰、法国、爱尔兰，秘密組織都是保护自己免遭政府的恐怖措施之害的合法手段，国际不能忽視这一点。但是，国际在倫敦代表會議上已經声明，它願意仍旧完全不同这些团体发生关系，并且不承认这些团体是自己的支部。可是主要的是，在这里我們面对着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它的建立不是为了反对各国政府，而是为了反对国际本身。

組織类似的秘密团体不仅显然違反对国际承担的义务，而且

① 手稿中接着刪去了：“公开地”。——編者注

也显然違反我們的共同章程^①的文字和精神。我們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會員；同盟却把他們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貴族和平民，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組織来領導。国际要求自己的會員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則；同盟却規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謠、伪装和欺騙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們欺騙国际的非亲信的會員，向他們隱瞞秘密組織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同盟的創始人知道得很清楚，国际广大的非亲信的會員群众只要一知道存在类似的組織，就永远不会自觉地服从这种組織的。这就是他們要把它变成“完全秘密的”組織的原因。因为有必要強調指出，这个同盟的秘密性质并不是为了瞞过各国政府的耳目，否則它开始就不会作为一个公开的团体而存在了；这种秘密性质^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欺騙国际非亲信的會員，同盟对总委員會进行的不体面的欺騙便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反对国际的真正陰謀。在工人階級斗爭的历史中，我們第一次在工人階級內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毀現存的剝削制度，而是要摧毀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爭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陰謀。

而且，可笑的是硬說什么某个团体之所以要处于秘密状态，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各国現政府的迫害，而这个团体自己却在到处鼓吹起削弱作用的完全放棄政治活动的学說，并且在自己的綱領（秘密章程导言第三条）中宣布：它

“反对不以工人反对資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的任何革命行动。”

① 手稿中接着刪去了：“和条例”。——編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刪去了：“事实证明了一点”。——編者注

这个秘密团体在国际内部搞了些什么活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的分裂”中已经部分地做了答复。但是由于当时总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秘密组织的规模，而从那个时候以来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答复。

首先必须指出，同盟的活动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为两个阶段。起初，它以为它能够控制总委员会，从而在我们的协会中夺得最高领导权。正是那个时候，它要求自己的拥护者支持国际的“强有力的组织”，首先是支持

“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和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正是那个时候，同盟的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要求总委员会必须有广泛的权力，可是后来他们又如此厌恶地把这种权力当做是权威主义的权力来加以反对。

巴塞尔代表大会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同盟的希望^①。从此以后，它就策划“所谓的分裂”中所谈到的那些阴谋；在瑞士汝拉地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它都不断地用自己特殊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结束了国际内部这种 *qui pro quo* [偷梁换柱的手法]。同盟便立即又重新活动起来了。同盟在瑞士的堡垒汝拉联合会用它的桑维耳耶通告来反对总委员会，强有力的组织、总委员会的权力、在这个通告上签字的人自己提出并投票通过的巴塞尔各项决议，都被宣布为权威主义的，——看来，只要给戴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活动就是在各地搞阴谋。在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各个宗派主义的支部的决议，强调指出国际的最初纲领和同盟的纲领不同……以前，它一直是相当锁定的”。——编者注

上这頂帽子就足以不分皂白地給它們定罪了；这个談到“在我們队伍中爆发的一場战争，一場公开的战争”的通告要求使国际具有一种不是适合于当前斗争的需要，而是适合于未来社会的什么玄妙莫测的理想的組織形式，等等。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了。命令下达了。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倫敦代表會議的各项权威主义的決議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瘋狂的攻击。所談的不外乎是关于支部自治啦、自由联合小组啦、无政府状态啦，等等。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国际的公开組織的削弱，国际内部秘密团体的影响自然要加强起来。在同盟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是总委员会，所以首先遭到攻击的也正是它，但是现在我們就会看到，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們对各联合会委员会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除了国际或多或少地处于同盟影响下的那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汝拉通告無論在哪里也沒有产生影响。在西班牙，同盟和国际都是紧接着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同时建立的，他們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同盟的綱領和国际的綱領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組織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組織似乎是每个人的义务。倫敦代表會議（在这次會議上，一个身为本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的西班牙代表^①，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汝拉通告本身都澄清了这种糊塗看法；而汝拉通告对代表會議和总委员会的瘋狂攻击和誹謗馬上得到了同盟所有机关报的响应和支持。汝拉通告在西班牙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在西班牙的同盟内部，在那些首先是国际会员的人和那些由于国际不服从同盟而不想承认

① 安·罗倫佐。——編者注

国际的人之間发生了分歧。这场斗争起初是非公开性的，但很快便在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公开地激烈展开了。当瓦倫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¹⁷⁹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它宁愿服从国际而不愿服从同盟以后，同盟占统治地位的馬德里地方联合会就把该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开除了¹⁸⁰。在薩拉哥沙代表大会¹⁸¹上，他们被恢复会籍，其中有两个人^①，莫拉和罗倫佐，又重新被选入新的^②联合会委员会，虽然旧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事先就声明說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两个人^③。

薩拉哥沙代表大会使同盟的首領們担心西班牙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同盟立即发动了一个反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权力的运动，重复了汝拉通告用来反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权威主义的权力的那些攻击。在西班牙，完全民主的、同时又非常明确的組織形式，是由巴塞罗纳代表大会¹⁸²和瓦倫西亚代表会议制定出来的。由于瓦倫西亚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經代表大会专门投票表示贊同），这个組織获得了在总报告^④中已经談到过的那些輝煌成就。在薩拉哥沙，同盟在西班牙的灵魂莫拉哥宣称，联合会委员会在西班牙組織中的权力是权威主义的，必須加以限制，必須剝夺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新支部的权力，即决定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联合会章程的权力，总而言之，就是把委员会的作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最积极的成員”。——編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設于瓦倫西亚的”。——編者注

③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代表大会选择了瓦倫西亚作为联合会委员会的駐在地，是希望瓦倫西亚成为一个中立地区，并且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糾紛。但是在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五名委員中有三名是同盟的走狗，而由于加聘委員的結果，同盟的走狗的人数至少又增加到了五名”。——編者注

④ 見本卷第 143—152 頁。——編者注

用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代表大会否决了莫拉哥的建议，决定保留现有的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见第八号文件“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摘录”第109、110页¹⁸³。关于这一点，薩拉哥沙代表大会代表公民拉法格的证明将是重要的）。

为了使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摆脱在馬德里发生的分歧，代表大会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瓦倫西亚。但是，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同盟和国际之間已经开始发展的对抗，并不是地方性的。代表大会由于甚至連同盟的存在也不知道，所以成立了一个完全是由这个团体的成员组成的新委员会；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即莫拉和罗倫佐，却成了它的反对者，莫拉并且拒絕参加这个委员会。作为对汝拉通告的答复的总委员会通告“所谓的分裂”使得一切国际会员必须声明自己或者拥护国际，或者拥护同盟。以“解放报”为一方，以同盟的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和塞維尔的“理智”为另一方的論战，越来越尖锐化了。最后，6月2日，前联合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解放报”的編輯們和同盟西班牙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們——决定向一切西班牙的同盟支部发出通告，宣布解散自己这个秘密团体的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們。报复跟着就来了。他們馬上又重新被驅逐出了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显然違反了現行条例。于是，他們組成新馬德里联合会，請求联合会委员会予以承认。

但是，这时同盟分子在委员会中已經用加聘委员的办法巩固起来了，取得了完全的統治，而罗倫佐也已退出了該委员会。新馬德里联合会的請求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方面的断然拒絕，因为联合会委员会当时已經在集中全部力量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此目的，它給各地方联合会分別寄去

了7月7日的内部通告，重复了“联盟”周报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向各联合会提议派一个由多数票选出的全西班牙共同的代表团去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人的名单将由该委员会自己确定。（第九号文件）对于一切知道在西班牙国际内部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的人来说，这很明显就是要选出同盟的先生们，由国际的会员出钱派他们去出席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告没有寄给它）一知道这些事实^①，就在7月24日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附在文件^②（第十号）中。联合会委员会^③于8月1日回信说，它需要时间；以便把我们这封用法文写的信翻译出来，而8月3日它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发表在“联盟”周报上（第十一号文件）。在这封回信中，它开始站在同盟方面。总委员会接到了8月1日的信以后，就在“解放报”上发表了这次来往信件。

这里补充一句，秘密组织刚一被揭露，有人就断言说，同盟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已经解散。但是，这一点并没有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第四号文件）。

新马德里联合会否认这个事实，而它是应当知道这件事的。而且，硬说像同盟这样一种国际性团体的西班牙支部同其他国家的支部商量就可以解散，实在是可笑的。

此后，紧接着同盟就企图发动 coup d'état [政变]。同盟鉴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重新使用在巴塞尔和绍德封使用过的手法已无法保证自己获得虚假的多数，¹⁸⁴于是就利用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正是在它得到了关于存在有秘密组织的第一批不可辩驳的证据的时候。”——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5—138页。——编者注

③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起初力图赢得时间，声称似乎”。——编者注

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以便公开宣布分裂。聚集在那里开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见第十二号文件）。这样同盟的代表大会就和国际的代表大会分庭抗礼。但是，他们很快就考虑到，这个计划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定前往海牙，就是那些在 21 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是属于我们协会的意大利支部，在否定了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厚颜无耻地派自己的代表到海牙来了。

鉴于：

(1) 由米·巴枯宁建立和领导的同盟（其主要的机关是汝拉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不是竭力使国际服从它的统治，就是竭力破坏国际，因此它是一个敌视国际的团体。

(2) 因此国际和同盟是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决定：

(1) 把米·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现有的全体盟员一律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他们只有公开同这个秘密团体断绝任何联系，才可以重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 把汝拉联合会这个组织开除出国际。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8 月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在海牙举行的
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決議¹⁸⁵

1872年9月2—7日

一

关于章程的決議

在章程第七条之后，应该补入下列概括倫敦代表會議（1871年9月）第九項決議內容的条文。

第七条（a） 工人階級在反对有产階級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組織成为与有产階級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

工人階級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終目标——消灭階級。

工人階級由于經濟斗争而已經达到的力量的团結，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剝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資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权来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階級的偉大使命。

以 29 票对 5 票通过；8 票棄权。

投票贊成的有：阿尔諾、約·菲·貝克尔、伯·貝克尔、庫尔奈、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埃卡留斯、恩格斯、法尔卡什、弗里德兰德、弗兰克尔、赫普納、海姆、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龙格、勒穆修、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維耶、賽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瓦揚、維耳莫、麦克唐奈。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克楠、格尔哈特、施維茨格貝耳、万·德尔·豪特。

棄权的有：万·登·阿伯勒、达夫、艾伯哈特、弗留茲、吉約姆、埃尔曼、索瓦、馬尔塞劳。

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定，承认由于忙于各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的代表所投的票有效。下列代表投票贊成：庫諾、呂肯、馬克思、維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共計 6 票。沒有一票反对。^①

二

关于条例的決議

1. 总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章的第二条和第六条改用下列条文：

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則。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刪去了：“由于決議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票，所以根据共同章程第十二条規定，它从現在起就成为共同章程的一部分。”——編者注

以及联合会暫時开除^①，直到应屆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該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建議該联合会各支部在 30 天以內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暫時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內召开非常代表會議，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爭論的問題做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在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第二条——以 40 票通过，4 票反对，11 票棄权。

投票贊成的有：阿尔諾、巴里、約·菲·貝克尔、伯·貝克尔、庫尔奈、庫諾、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赫普納、海姆、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列斯納、勒穆修、龙格、呂肯、麦克唐奈、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維耶、罗奇、索瓦、肖伊、賽拉叶、賽克斯頓、左尔格、斯瓦尔姆、舒馬赫、瓦揚、維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弗留茲、格尔哈特、斯普林加尔、万·德尔·豪特。

棄权的有：阿勒里尼、克楠、达夫、艾伯哈特、吉約姆、埃尔曼、莫拉哥、馬尔塞劳、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維茨格貝耳、万·登·阿伯勒。

^① “暫時开除”在法、英、德文版中是 «suspende», «suspend», «Suspendiren», 意为“暫停会籍”。——譯者注

第六條——以 36 票通過，6 票反對，16 票棄權。

投票贊成的有：阿爾諾、巴里、約·菲·貝克爾、伯·貝克爾、庫爾奈、庫諾、德雷爾、杜邦、杜瓦爾、恩格斯、法爾卡什、弗蘭克爾、弗里德蘭德、赫普納、海姆、若昂納爾、庫格曼、拉法格、列斯納、勒穆修、龍格、路德維希、麥克唐奈、馬克思、米耳克、皮爾、朗維耶、賽拉葉、舒馬赫、賽克斯頓、左爾格、斯瓦爾姆、瓦揚、維沙爾、瓦爾特、符盧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對的有：布里斯美、克楠、弗留茲、埃爾曼、索瓦、斯普林加爾。

棄權的有：阿勒里尼、西里耳、達夫、杜蒙、艾伯哈特、吉約姆、呂肯、馬爾塞勞、莫拉哥、莫特斯赫德、法爾加·佩利塞爾、羅奇、施維茨格貝耳、萬·登·阿伯勒、萬·德爾·豪特、維耳莫。

2. 關於應向總委員會繳納的會費。

由於收到了許多申請書，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會費，另一方面，有人要求減少，代表大會應該決定改變現有的每年繳納 10 生丁的會費數額，或者保持不變。代表大會以 17 票贊成、12 票反對、8 票棄權決定保持 10 生丁的會費不變。

投票反對改變會費數額的有：約·菲·貝克爾、布里斯美、克楠、西里耳、杜邦、杜瓦爾、艾伯哈特、埃卡留斯、法爾卡什、弗留茲、格爾哈特、埃爾曼、赫普納、賽拉葉、左爾格、斯瓦爾姆、維耳莫。

投票贊成改變會費數額的有：杜蒙、恩格斯、弗蘭克爾、海姆、若昂納爾、拉法格、勒穆修、龍格、呂肯、麥克唐奈、皮爾、索瓦。

棄權的有：阿勒里尼、達夫、德雷爾、吉約姆、馬爾塞勞、莫拉哥、法爾加·佩利塞爾、施維茨格貝耳。

下列代表由於不得不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就離開海牙，他們

用书面的方式投票贊成增加会費：阿尔諾、庫尔奈、朗維耶、瓦揚。

三

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間的国际联系的決議

特責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以后一个月以内总委员会应当写出一个呼吁书，譯成一切文字出版，并分別寄給所有加入国际或虽未加入国际而知道其地址的工人团体。

在这个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应当号召一切工人团体按行业成立国际联合会。

由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加入該行业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責成总委员会收集贊成建立国际联合会的团体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且起草一个共同的草案，建議願意加入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团体暂时采納。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将确定各种国际联合会的正式章程。

除几个人棄权以外，一致通过，棄权的人数未記入記錄。

四

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決議

代表資格审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員組成：格尔哈特（50 票）、朗維耶（44 票）、罗奇（41 票）、馬克思（41 票）、麦克唐奈（39 票）、德雷尔（36 票）、弗兰克尔（22 票）。

1. 北美联合会第二支部（紐約，法国人支部）。——該支部曾

經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它是独立支部。代表大会不允許这个支部参加。反对它参加的有 38 票，9 票贊成，11 票棄权。

2. 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北美联合会第十二支部(紐約, 美国人支部)^①。

在討論关于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資格证問題的过程中，在 47 位代表投票贊成，无人反对，9 票棄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下列提案：

“以消灭階級的原則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不能接受任何資产階級的支部。”

投票贊成的有：阿尔諾、約·菲·貝克尔、巴里、布里斯美、庫尔奈、庫諾、克楠、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弗留茲、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吉約姆、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納、埃尔曼、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納、呂肯、馬克思、米耳克、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維耶、索瓦、肖伊、舒馬赫、賽拉叶、賽克斯頓、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揚、維沙尔、維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万·登·阿伯勒。

棄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哈尔科特、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罗奇、施維茨格貝耳、万·德尔·豪特。

49 票决定开除第十二支部，无人反对，9 票棄权。

贊成开除的有：阿尔諾、巴里、約·菲·貝克尔、布里斯美、庫尔奈、克楠、庫諾、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蒙、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弗留茲、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納、埃尔曼、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納、呂肯、麦克唐奈、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維耶、罗奇、索瓦、肖伊、舒馬赫、賽

^① 見本卷第 57—58 頁。——編者注

拉叶、賽克斯頓、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揚、万·登·阿伯勒、万·德尔·豪特、維沙尔、維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

棄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吉約姆、哈尔科特、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莫特斯赫德、施維茨格貝耳。

3. 馬賽支部。——該支部未被允許參加，因为总委员会和与总委员会有通信联系的法国各支部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支部。反对它参加的有 38 票，无人贊成，14 票棄权。

4. 日内瓦宣傳和革命行动支部。——該支部无非是 1871 年 8 月解散了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的复活，它既未得到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也未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总委员会已把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会費退还該支部。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把它开除，在关于秘密同盟的問題討論結束后再行处理。^①一致表决通过暂时开除，只有几个人棄权，棄权的人数沒有記下来。

5. 新馬德里联合会。——新馬德里联合会由原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部分委員組成，这些委員由于揭露秘密同盟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陰謀而被旧馬德里联合会明显地違反現行条例加以开除。該联合会起初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申請，該委员会拒絕接受它。于是它向总委员会申請^②。总委员会未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协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刪去了：“代表大会由于在这个討論以后不得不立即結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沒有解决這個問題。”——編者注

②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刪去了：“总委员会承认了它，沒有按照組織条例規定，事先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在这件事情上总委员会是沒有遵照条例而自己負責处理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 8 名委員中至少有 5 名是秘密同盟的盟員。他們之所以想把新馬德里联合会开除出去，正是由于这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陰謀被揭露了出来。”——編者注

商,就由自己負責承认了它,① 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 8 名委员中,至少有 5 名参加了秘密同盟。

代表大会在 40 票贊成、无人反对、几个人棄权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联合会,棄权的人数沒有記下来。

五

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为了审查总委员会(在 1871—1872 年期间)财务报告而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包括下列公民:杜蒙代表法国;阿勒里尼代表西班牙;法尔卡什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布里斯美代表比利时;拉法格代表新馬德里联合会并代表葡萄牙;皮尔代表丹麦;約·菲·貝克尔代表瑞士德語区;杜瓦尔代表罗曼語区联合会(瑞士);施維茨格貝耳代表汝拉联合会(瑞士);达夫代表荷兰;德雷尔代表美国;庫諾代表德国。

向該委员会提出的财务报告經該委员会全体委员批准并签字,只有缺席的达夫除外。

财务报告宣讀以后获得了代表大会的一致批准。

六

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 委员会給与的权力

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給与国际遭到

① 見本卷第 139 頁。——編者注

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国际会员的权力一律取消，并且授予新的总委员会以在这些国家任命国际工人协会全权代表的唯一权利。”

除几个人棄权外，一致通过，棄权的人数沒有記下来。

七

关于同盟的決議

受委托調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秘密同盟)活动的委员会，由下列公民組成：庫諾(33票)、呂肯(24)、斯普林加尔(31)、維沙尔(30)、瓦尔特(29)。

該委员会的多数在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声明，“秘密同盟是根据同国际章程完全对立的章程建立的”，并且建議：

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創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开除同盟盟員吉約姆和施維茨格貝耳；

开除被揭发进行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的貝·馬隆、布斯凱^①(法国貝济埃警察局秘书)和路易·馬尔尚；

认为阿勒里尼、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和茹柯夫斯基与此事无关，因为他們已經正式声明他們不再屬於同盟。

授权委员会公布它据以做出結論的文件。

代表大会决定：

1. 开除米哈伊尔·巴枯宁。27票贊成，6票反对，7票棄权。

投票贊成的有：約·菲·貝克尔、庫諾、德雷尔、杜蒙、杜邦、杜

^① 委员会不知道公民布斯凱已經根据本支部的要求被总委员会正式决定开除了。

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納、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呂肯、麦克唐奈、馬克思、皮尔、賽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維沙尔、維耳莫、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达夫、弗留茲、埃尔曼、克楠、万·登·阿伯勒。

棄权的有：阿勒里尼、吉約姆、馬尔塞劳、莫拉哥、索瓦、斯普林加尔、施維茨格貝耳。

2. 开除吉約姆——25 票贊成，9 票反对，8 票棄权。

投票贊成的有：約·菲·貝克尔、庫諾、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納、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呂肯、馬克思、皮尔、賽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維沙尔、瓦尔特、維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西里耳、达夫、弗留茲、埃尔曼、克楠、索瓦、斯普林加尔、万·登·阿伯勒。

棄权的有：阿勒里尼、德雷尔、弗里德兰德、麦克唐奈、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維茨格貝耳。

3. 不开除施維茨格貝耳。15 票贊成开除，16 票反对开除，7 票棄权。

投票贊成开除的有：約·菲·貝克尔、庫諾、杜蒙、恩格斯、法尔卡什、海姆、赫普納、庫格曼、勒穆修、馬克思、皮尔、斯普林加尔、瓦尔特、維沙尔、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开除的有：布里斯美、克楠、西里耳、达夫、德雷尔、杜邦、弗留茲、弗兰克尔、埃尔曼、若昂納尔、龙格、索瓦、賽拉叶、斯瓦尔姆、維耳莫、万·登·阿伯勒。

棄权的有：杜瓦尔、拉法格、呂肯、麦克唐奈、馬尔塞劳、莫拉

哥、法尔加·佩利塞尔。

4. 委员会的其他关于开除的建議不提交表决。一致通过，只有几个人棄权。

5. 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一致通过，只有几个人棄权。

有必要指出，关于同盟的这次表决是在大多数法国^①和德国代表不得不离开以后进行的。

八

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駐在地和成員

1. 关于变更总委员会駐在地問題的表决。26 票贊成变更，23 票反对变更，9 票棄权。

投票贊成的有：巴里、約·菲·貝克尔、布里斯美、庫諾、达夫、杜蒙、杜邦、恩格斯、哈尔科特、若昂納尔、庫格曼、拉法格、列斯納、勒穆修、龙格、麦克唐奈、馬克思、罗奇、索瓦、賽拉叶、賽克斯頓、左尔格、斯瓦尔姆、維沙尔、万·登·阿伯勒、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阿尔諾、伯·貝克尔、庫尔奈、德雷尔、杜瓦尔、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納、埃尔曼、呂肯、路德維希、米耳克、皮尔、朗維耶、舒馬赫、斯普林加尔、瓦揚、維耳莫、瓦尔特、万·德尔·豪特。

棄权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弗留茲、吉約姆、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維茨格貝耳、阿勒里尼。

2. 总委员会駐在地迁往紐約。30 票贊成，14 票反对，他們贊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是：“英国”。——編者注

成留駐倫敦，12 票棄權。

投票贊成紐約的有：約·菲·貝克尔、伯·貝克尔、布里斯美、庫諾、克楠、达夫、杜蒙、杜邦、恩格斯、法尔卡什、弗留茲、弗里德兰德、埃尔曼、庫格曼、拉法格、列斯納、勒穆修、龙格、呂肯、麦克唐奈、馬克思、皮尔、罗奇、賽拉叶、賽克斯頓、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維沙尔、万·登·阿伯勒、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贊成倫敦的有：阿尔諾、庫尔奈、德雷尔、杜瓦尔、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納、路德維希、米耳克、朗維耶、舒馬赫、瓦揚、維耳莫、瓦尔特。

棄權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格尔哈特、吉約姆、若昂納尔、阿勒里尼、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左尔格、施維茨格貝耳、万·德尔·豪特。

3. 代表大会决定选出 12 名委員組成駐紐約的总委員會，并授予它再加聘 3 名委員的权利。

当选的有：

倍尔特兰，德国人—— 29 票

波尔特，德国人—— 29 票

劳雷耳，瑞典人—— 29 票

卡瓦納，爱尔兰人—— 29 票

圣克萊尔，爱尔兰人—— 29 票

勒維埃耳，法国人—— 28 票

卡尔，德国人—— 28 票

大卫，法国人—— 26 票

德雷尔，法国人—— 26 票

福尔納契耶利，意大利人—— 25 票

施佩耶尔, 德国人—— 23 票

华德, 美国人—— 22 票

九

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由于有人建議下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并且要总委员会明确确定地点, 就这个问题表决的结果如下: 贊成瑞士的有 15 票, 贊成倫敦的有 5 票, 贊成芝加哥的有 1 票, 贊成西班牙的有 1 票。

十

记录审訂委员会

一致选出: 杜邦、恩格斯、弗兰克尔、勒穆修、馬克思、賽拉叶。

委员会:

欧·杜邦

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

勒穆修

卡尔·馬克思

奥古斯特·賽拉叶

1872 年 10 月 21 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

1872 年以小册子“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決議 (1872 年 9 月 2—7 日)” 在倫敦出版, 并載于 1872 年 11 月 2 日“解放报” 第 72 号和 1872 年 12 月 14 日“国际先驅报” 第 37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決議 (1872 年 9 月 2—7 日)” 譯的, 并根据恩格斯的手稿校对过

卡·馬克思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
演說的通訊記錄稿¹⁸⁶

演讲人說：在十八世紀，世界上的君王和权貴往往在海牙集會，商討与自己王朝的利益有关的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我們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我們要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证实我們偉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和未来的希望。

當我們的决定公布以后，就有人說我們派出了密使去准备基础。是的，我們并不否认我們到处都有密使，但他們当中的大部分人我們并不認識。我們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們的劳动非常沉重；在阿姆斯特丹，我們的密使也是工人，是那些每天工作16小时的人。这就是我們的密使，此外我們沒有其他任何密使；在我們所到的一切国家中，他們都随时准备友好地接待我們，因为他們很快就了解到，我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他們的状况。

海牙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三項重要工作：

它宣布，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內必須像在社会領域內一样，同正在崩潰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們可以庆幸的是，倫敦代表會議的這項決議今后便包括在我們的章程中了。^①

^① 見本卷第165頁。——編者注

我們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棄政治活动。我們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則對我們的事業是极其危險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須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組織；他們如果不願意像輕視和擱棄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應該推翻維護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們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應該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們知道，必須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們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終地建立劳动的統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須采取暴力。^①

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員會以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事实上，正当柏林召开君王會議，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的有权势的代表要在这个會議上采取新的、更殘酷的鎮压措施来对付我們的时候，正当迫害已在策划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认为加强总委員會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为分散会使这种活动沒有成果。除了我們的敌人以外，还有誰能对总委員會的权力感到惊慌呢？难道总委員會有官僚机构或武装警察来强迫別人服从它嗎？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純粹道义上的嗎？难道总委員會不应当把自己的決議通知有义务执行这些決議的各联合会嗎？如果让那些君王处在这种沒有軍隊、沒有警察、沒有官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这句话，而是“然而，并不是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这样的。”——編者注

吏的情況下，如果他們僅僅把自己的權力建立在道義影響和道義威信上，那他們就只是革命道路上的微小的障礙了。

最後，海牙代表大會把總委員會的駐在地遷往紐約。看起來，許多人，甚至連我們的朋友在內，都對這項決定感到驚奇。他們顯然忘記了，美國正在成為一個以工人為主的世界，每年有 50 萬工人遷移到這個第二大陸上來；國際必須在這塊工人占優勢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此外，代表大會還決定總委員會有權加聘它認為對共同事業有益和需要的會員為總委員會委員。我們相信總委員會是慎重的，希望它會挑選出稱職的並能夠在歐洲高舉我們協會旗幟的人。

公民們，讓我們回憶一下國際的一個基本原則——團結。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切國家的一切工人中間牢牢地鞏固這個富有生氣的原則，我們就一定會達到我們所嚮往的偉大目標。革命應當是團結的，巴黎公社的偉大經驗這樣教導我們。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①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沒有同時爆發同巴黎無產階級鬥爭的高水平相適應的偉大的革命運動。

至於我個人，我將繼續自己的事業，為創立這種對未來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團結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會退出國際，我將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貢獻出來，爭取我們深信遲早會導致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統治的那種社會思想的勝利。

載於 1872 年 9 月 15 日“自由報”
第 37 號，1872 年 10 月 2 日“人民
國家報”第 79 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自由報”，並根據
“人民國家報”校對過

^① 在“人民國家報”上接着是：“別國的工人沒有表現出團結的精神”。——編者注

卡·馬克思 致“海盜報”¹⁸⁷編輯

閣下：

9月11日“費加羅報”轉載了一篇似乎是我同“夜晚報”¹⁸⁸記者的談話。像“費加羅報”這類報刊可以隨便進行誹謗，誰也不會費神去駁斥它，但是，如果某個記者的出賣靈魂的想像力竟然豐富到了這種地步，硬說我說過嚴厲譴責前總委員會內我的朋友們的話，那我就不能不聲明，只要他敢於斷言他和我交談過哪怕是一句話，那就完全是撒謊。

我要借此機會向我們的朋友和敵人聲明：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要退出國際，把總委員會遷到紐約去的建議是由我和前總委員會的幾個委員提出的。

關於巴枯寧及其走卒吉約姆已作為所謂聯邦黨的領袖而被開除的消息，是不真實的。開除巴枯寧和吉約姆的原因，是他們在我們協會內部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這個秘密團體企圖引導國際去實現同國際的原則直接相反的目的。

倫敦代表會議關於工人階級政治行動的決議得到了代表大會絕大多數代表的贊同，他們贊成把這個決議列入共同章程。

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對代表大會完全表示支持。

反动报刊的消息的价值就是如此。

謹致

敬礼

卡尔 · 馬克思

1872年9月12日于海牙

載于1872年9月15日“海盜報”和
1872年9月21日“解放報”第66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海盜報”

卡·馬克思
致“每日新聞”編輯

閣下：

我从海牙回来后获悉，貴报硬說我打算随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紐約去。請让我发表一个声明作为答复：我打算并且一向打算留住倫敦。好些月前，我就告訴我的倫敦朋友和大陆上的通訊員說，我毅然决定不再当总委员会委員或其他任何领导机关的成員，因为我的科学工作不允許我再担任这种职务。至于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情况的歪曲报道，即将公布的代表大会的正式記錄将予以澄清¹⁸⁹。

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9月17日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

載于1872年9月18日“每日新聞”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每日新聞”

弗·恩格斯 海牙代表大会

(給比尼亚米的信)

1872年10月1日于倫敦

亲爱的比尼亚米：

国际工人协会的64名代表从9月2日到7日在海牙举行了會議。这些代表中，有16名法国代表，10名德国代表，7名比利时代表，5名英国代表，5名美国代表，4名荷兰代表，4名西班牙代表，3名罗曼語区联合会(瑞士)代表，2名汝拉联合会(瑞士)代表，1名爱尔兰代表，1名奥地利代表，1名匈牙利代表，1名波兰代表，1名葡萄牙代表，1名澳大利亚代表和2名丹麦代表。按民族成分來說，有20个法国人，16个德国人，8个比利时人，6个英国人，1个波兰人，1个爱尔兰人，1个科西嘉人和1个丹麦人。¹⁹⁰

审查代表資格证用了两天多的時間。通过这一形式，对国际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在关心的所有内部問題进行了研究，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場合，都涉及到总委员会的活动。

公民拉法格持有三份代表資格证，他是葡萄牙的代表和两个西班牙地方联合会的代表。其中有一份，即新馬德里联合会的那份，遭到了其他西班牙代表的反对。新馬德里联合会(它是由那些

被任意地、而且是違反章程地从旧联合会中开除的国际会员成立的)沒有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于是,它便向倫敦总委员会提出申請,总委员会承认了它。①

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决定。

总委员会根据过去各次代表大会的先例派出的6名代表,被允許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他們除了一人以外都持有別的代表資格证。日内瓦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这个沒有为总委员会承认的支部的代表的資格证,被宣布无效,他不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會議,而該支部本身也沒有被大会承认②。西班牙联合会的4名代表只是在向总委员会繳納了1871—1872年期間的会費以后,才被允許参加代表大会。最后,被总委员会暫時开除的紐約第十二支部的代表尽管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还是沒有被允許参加代表大会。这几項決議都以四分之三的多數通过,它們同时也是对总委员会信任的表现;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威主义的”(像有人所乐意称道的)做法得到了代表大会絕大多数代表的完全拥护。

这些辯論解决了国际内部发生的許多意見分歧,因而絕不是无益的。在此以后便立即轉到关于总委员会本身的問題上来了。总委员会是否应该取消呢?如果要保存它的話,是让它仍然保留自己的权力呢,还是把它貶为一个簡單的通訊統計局,也就是說变成一个 *boîte aux lettres* [信箱] 呢?代表大会对这一点的回答毫不含糊。組織条例第二节第二条条文如下:

“总委员会必須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一点作了补充:

① 見本卷第139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70—172頁。——編者注

“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①（40名代表投票赞成做这样的补充，5名反对，11名弃权）。

同一节的第六条授予总委员会以暂时开除某一支部的权利，该条条文如下：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內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在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②

显然，条例的这一新的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总委员会的权力。同时也提供了防止滥用这些权力的必要保障。

代表大会希望总委员会具有权力，但是行使这种权力是责任重大的。这一条文在9票弃权的情况下，以36票对11票的多数通过了。

接着讨论关于新的总委员会的问题。如果任期已满的总委员会希望它的成员重新全部或部分当选的话，它几乎保证能得到一致的支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已经脱离了少数派而赞成伦敦。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符卢勃列夫斯基、杜邦和

^① 見本卷第166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66—167頁。——編者注

前总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因为纽约是除了伦敦以外唯一具备能够保证档案安全并使总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国际性质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地方。这一提議证明他們絕不是为了自己而要求給予总委员会以更广泛和更确定的权力的。前总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議中，这是唯一遇到了阻难的建議，因为除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和西班牙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仍然由至今一直领导国际的那些人来领导国际。只是在前总委员会那些最积极、最著名的委员正式声明他們拒絕接受新的委托书以后，迁往纽约的問題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随后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总委员会，新的总委员会由2个爱尔兰人、1个瑞典人、1个意大利人、3个法国人、1个美国人和4个德国人组成。并有权再选三人参加总委员会。

大家知道，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的第九項決議，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遭到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們、某些西班牙人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瘋狂攻击，他們說這項決議是与国际的原則相抵触的。然而，這項決議現在已作为第七条（a）列入了国际的共同章程，这一条的条文如下：

“第七条（a）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組織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終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

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來奴役勞動，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使命。”

這項決議以 28 票對 13 票（包括棄權的在內）的多數通過，並且由於這是超過了三分之二的多數，所以這項決議被列入了共同章程。這個多數還應該加上 6 名德國代表和 4 名法國代表的票，他們由於不得不離開海牙而以書面形式投票贊成這項決議。這樣一來，放棄政治的主張便遭到了四分之三的多數的譴責，只有四分之一表示贊成。剩下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總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揭露了存在於國際內部的一個不是旨在反對各國現存政府，而是旨在反對我們協會的秘密團體。這個由創建人米哈伊爾·巴枯寧領導的秘密團體的成員，按其親信程度不同，被劃分為三類。這個秘密團體的目的是要奪取國際的中央領導，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破壞國際，從而更好地保證自己的影響。為此目的，他們散布了支部自治、反對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的”傾向等口號。代表大會成立了一個調查有關這一團體的問題的委員會，在最後一次會議上，宣讀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報告證明：這一秘密團體是存在的，它具有敵對性質。報告最後建議把巴枯寧、吉約姆、施維茨格貝爾、馬隆以及另外兩個人開除出國際。

這個報告的結論，特別是關於同盟的結論，都為代表大會所接受；至於這幾個人，那末巴枯寧和吉約姆被開除了；幾張票救了施維茨格貝爾；其餘的人被赦免了。

海牙代表大會各項決議的內容就是如此，這些決議十分明確，但是也極有分寸。為了保證新的總委員會具有清楚而十分明確的地位，為了毫不含糊地宣布遭到少數宗派主義者懷疑的國際的政治綱領，為了摧毀那個不去同各國現存政府作鬥爭，而是策劃反對

国际本身的阴谋的秘密团体，受到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而只有四分之一表示反对的总委员会竭尽全力。随后，总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表示不愿意再度当选，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自己的辞职建议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主要是由法国、德国、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表，以及瑞士罗曼语区的代表组成的；少数派则是由比利时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汝拉联合会代表和一个美国人组成的。英国人意见不一，选票分散。在64名代表中，少数派（连同弃权者在内）每一次都没有超过20票，一般是在12票到16票之间摆动。

出席大会的有一个意大利代表^①，即在里米尼成立的联合会的主席，但是，他没有交验代表资格证；不管交不交，反正代表大会是绝对不会同意他的代表资格的。他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

从海牙回来后，我在曼都亚出版的“火花报”¹⁹¹上发现了一篇作者署名为“无神论者”^②的文章，这篇文章反驳了这样一种公正的意见，即在21个派代表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这种看法。

“其次，总委员会断言只有那不勒斯支部是有权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米兰工人小组、吉尔真提协会、腊万纳协会、罗马协会、以及作为倡议者的都灵支部，都早已经缴纳了共同章程所规定的10个生地西母。”

为了证实究竟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总委员会的说法呢还是“无神论者”先生的说法，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无论米兰支部、都灵支部，还是吉尔真提支部都不是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

① 卡·卡菲埃罗。——编者注

② 卡·特尔察吉。——编者注

而羅馬支部只是在这一次代表會議之后才向总委員會提出申請的（而且我想，这根本就不是曾經派代表去里米尼的那个支部）。

国际的意大利會員可以相信，只要国际、代表大会、总委員會、共同章程和条例存在，那末無論哪一个支部，如果不承认共同章程和条例規定的、所有的人都必須遵行的条件，它就不会为代表大会或者总委員會所接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72 年 10 月 1 日

載于 1872 年 10 月 5 日

“人民报”第 106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¹⁹²

由于最近一个时期许多議員背叛了自己的选民，已被 1789 年革命廢除了的中世紀的陈旧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又流行起来了。我們不想在这里对这一类委托书作原則性的討論。我們只是指出，如果所有的选民就有关議程上的每一項問題都給自己的代表一張限权代表委托书，那末，代表們开会和討論就会是多余的。如果那样，只要把委托书送到任何一个計算选票和宣布选举結果的中央計算机构去就够了。这样会省事得多。

对我們說来，重要的只是指出，限权代表委托书使它的持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陷于极不寻常的境地，这可以作为这种委托书的热烈崇拜者的极好的教訓。

我們大家都知道，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是在联合会委员会的操纵下选举出来的^①；他們領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這張委托书指令他們要求：

“統計票数时应以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們所代表的組織的人数为准，而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們所代表的會員的票数，只有在他們所代表的支部或联合会就代表大会上所討論的問題进行討論并做出決議之后才

① 見本卷第 131 頁。——編者注

算数…… 如果代表大会要坚持傳統的表決制度，那末，我們的代表就只參加討論而不參加表決”^①。

可見，這張委託書要求代表大會在討論任何問題之前先要做
出下述三項決議：

1. 修改條例中有关表決方法的條文。
2. 規定沒有限權代表委託書的代表沒有表決權。
3. 宣布這些修改在本屆代表大會上立即生效。

西班牙聯合會的代表們立即接到一項聲明：即使代表大會接受他們的第一、二兩個要求，那第三個要求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海牙代表大會是根據協會的一定的組織規章召開的。它當然有權修改那些規章；但是，如果海牙代表大會修改了那些規章，它就會使自己失去存在的權利，這樣一來它就絕對必須立即自行解散，宣布按新的組織規章重新選舉代表，召開新的代表大會。把這些新原則運用于本屆代表大會，就意味着使這些原則具有回溯效力并破壞一切正義原則。因此，不管代表大會是否接受第一、二兩條建議，無論如何它不能接受第三條建議。如果西班牙的代表們接受了一張極端矛盾的委託書，使他們不能在代表大會的一切會議上參加表決，那末，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

問題非常明顯，無論是少數派，甚至是西班牙的代表，都不能提出任何異議。結果，他們留在代表大會上了，但沒有參加表決。

^① 大家知道，同盟首領的機關刊物汝拉“簡報”¹⁹³最近一期上發表了一則關於海牙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報道，這則報道的可靠性如何，從下面我們一字不易地摘錄下來的這句話中就可以看出：“得到比利時人和汝拉人支持的西班牙人要求不要以個人投票的方式而是以聯合會為單位的方式來進行表決。”難道西班牙聯合會的委託書提出這個要求了嗎？

这件事终于激怒了荷兰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问道：

“既然你们的委托书禁止你们参加表决，并且使少数派每次表决时都失去四张票，那末你们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

但是，作为真正的同盟委托书并且在按照同盟的方法使用委托书方面，汝拉联合会的委托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

下面就是汝拉联合会代表的委托书：

“汝拉联合会代表领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受命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以下述原则作为国际的组织基础：

任何劳动者团体，只要承认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同章程的引言中所阐述的国际的纲领，并保证在反对资本壟断的斗争中同一切工人和工人组织在经济方面团结一致，就可以成为国际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支部。”¹⁹⁴

可见，共同章程和条例在这里已经被取消了。如果绪论部分仍然有效，那不过是由于它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从中已得不出任何结论了。

我们再往下看：“由于联合的原则是国际的组织基础，所以，各支部和联合会是彼此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它们享有充分的自治，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它们认为必需的一切联络机构、统计局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汝拉联合会主张取消总委员会，取消国际内的任何权威。”

由此可见，具有“权威”的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以及各种章程和条例，都应当取消。每一个人都将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享有“充分的自治”。

“汝拉代表必须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一切公开反对权威原则的代表完全团结一致地行动。因此，如果拒绝这些联合会的任何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汝拉代表就应立即退席。同样，如果代表大会不承认上述国际组织基础，代表们就应同那些反权威主义的联合会的代表一起离开代表大会。”

現在我們来看看汝拉代表是怎样使用这个限权代表委托书的。首先，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反权威主义的法国代表，仅有一个疯子是例外，他的确几次大吵大闹地“退席”，但是由于他未能拖走任何别的反权威主义的代表，所以每次又都回来了。纽约第二支部（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代表索瓦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了^①，而汝拉人却仍然待在代表大会上。直属于汝拉联合会的日内瓦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期间被宣布无效^②，而汝拉人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受他们唆使而同总委员会进行斗争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③，而汝拉人却仍然不动声色。至于一个出席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④的委托书，他们甚至不敢把它拿出来。

那末汝拉代表们所提出的组织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所提出的瓦解组织的原则，是否被代表大会接受了呢？恰恰相反，代表大会决定加强组织，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加强权威。在这以后，他们退席了吗？根本没有，他们只是宣布，今后他们不参加表决。

请看，下面就是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真正方法。一个代表，如果觉得委托书对他合适的，就服从它，否则，就借口情况不明，到头来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做。归根到底，难道反权威主义者的责任不是蔑视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以及其他一切权威吗？在汝拉人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十足的同盟精神，在

① 見本卷第 169—170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71 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 170 頁。——編者注

④ 卡·卡菲埃罗。——編者注

代表們玩忽自己委托书的真正无政府主义的手法中又得到了补充发挥。难道由此不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代表在同盟中比他們的西班牙伙伴处于更高的亲信等級？

汝拉的委托书还使人有理由做一些别的思索。这个委托书完全揭露了同盟的内部状况，这就是和一切关于无政府状态、自治、自由联合等等的空話相反，在同盟内实际存在的只是权威和绝对服从。施維茨格貝耳和吉約姆自己給自己伪造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取消了共同章程的一切規定，仅仅保留了緒論部分，在此以前几个星期，他們的朋友，里米尼联合会的代表（非国际會員），根据协会共同章程緒論部分和联合会的条例拟訂了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的章程。这样，在里米尼代表會議上成立的这个組織就拋棄了共同章程。由此可見，同盟的先生們在自己的行动中始終服从秘密的和划一的命令。突然鼓吹瓦解国际的巴塞罗纳“联盟”周报¹⁹⁵无疑也是服从这些秘密命令的。問題在于，我們协会在西班牙的坚强的組織对同盟的秘密首領們說来，已开始成为一种威胁。这个組織給工人階級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因而会給那些特別善于混水摸魚的同盟的先生們的秘密統治造成困难。

你們搞垮組織吧，那时你們就可以在渾水中大撈一把了。你們首先取消工会，向罢工宣战，把工人的团结变成一句空話吧，那时你們就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宣揚你們的响亮的、然而空洞无物的和学理主义的詞句了。不过，只有当西班牙工人允許你們毀掉他們四年来的工作成果，消灭他們的无疑是整个国际最优秀的組織时，这才是可能的。

我們再回来談談限权代表委托书，这里还有一个問題我們必須解决：为什么同盟分子，即一切形式的权威原則的不共戴天的

敌人，这样顽强地坚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呢？因为对于像他们那样一个存在于国际这个公开组织之内的秘密团体来说，限权代表委托书是最方便不过的了。同盟盟员的所有委托书都是一样的，而未受同盟分子影响的或反对同盟的支部的委托书则各不相同，因此，绝对多数经常都会属于秘密团体，更不用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拥有相对多数了，同时，在一个不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会议上，那些独立自主的代表们的健全思想将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秘密团体的拥护者。限权代表委托书，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统治方法，正因为如此，同盟才不顾自己的全部无政府主义而捍卫它的权威。

在结束以前，我们还要指出：对于由同盟分子组成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说来，最适当的行动方式就是制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委托书就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书，或者，也就是同盟分子的委托书。各西班牙联合会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和条例相抵触的建议，把额外会费寄到瓦伦西亚去作为代表们的旅费，而同会费一起寄去的还有表决结果，而同表决结果一起寄去的还有自己联合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目的是要“把所有委托书凑在一起，制造一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我们乐于承认，如果联合会委员会态度老实和心地善良，本来是可以委托它来统计所有地方联合会的选票的，但是，为了从各地方联合会的各种决议中创造出一种一致的意见，就必须或者具有非凡的智慧，或者具有能够熔炼各种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绝妙坩锅。从这种新型坩锅中到底熔炼出了什么呢？只能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我们向所有的同盟分子挑战：请他们向我们指出一种能够提供别的结果的选举诡计来吧。

可見，那样反对权威，那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精神等等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了派代表到海牙去，把会費集中在自己手中；它非常狡黠地自行安排了这些代表的选举，結果当选的都是同盟分子，最后，它还拟定了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反映了西班牙国际会员意志的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很难設想，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尊重自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10 月初

載于 1872 年 10 月 13 日“解放报”
第 69 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譯自“解放报”

弗·恩格斯 倫敦來信

二

*再談海牙代表大會

1872年10月5日於倫敦

我希望，海牙代表大會的結局將促使我們意大利的“自治的”朋友們深思一番。他們應當知道，哪兒有組織存在，那兒就必然要為了行動的一致而犧牲一部分自治。如果他們不了解，國際是一個為了鬥爭，而不是為了發明堂皇理論而組織起來的團體，那是非常遺憾的，不過可以說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意大利還沒有服從大家都要遵守的一切規章以前，偉大的國際可以讓它自行其是。

秘密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內有三級：國際兄弟（他們人數不多）、民族兄弟和普通盟員。C^①同吉約姆（巴枯寧的總參謀部的首腦）和一兩個西班牙人一樣，屬於國際兄弟之列。

法國代表中有五個人是化名從法國來的，其餘的都是流亡者、公社參加者。附上名冊一份¹⁹⁶，其中沒有寫明法國各支部的名稱及其所在地，以免有人把它們出賣給警察局。但是，我們的組織已

① 卡·卡菲埃羅。——編者注

經在法国的三十多个省份里恢复起来了，在那里国际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壮大、更加活跃。

令人高兴的現象是，在海牙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进行表决时始終是一致的，这就清楚地证明，对于国际說来，既不存在战争，也不存在征服，也不存在民族糾紛。正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这一联盟保证了一切決議能毫无例外地通过。

把总委员会迁往紐約的理由是：1. 馬克思、賽拉叶、杜邦和恩格斯毅然决定不接受新的委托书。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科学著作需要完成，而最近两年来，他們沒有時間做这一工作。2. 确信在他們辞职以后，代表法国人参加倫敦总委员会的将是**布朗基主义者**，如果我們在法国的支持者全跟着这些人走的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会由于这些人玩弄阴谋而遭到逮捕；代表英国人参加倫敦总委员会的将是被收买的分子，这些人經常把我們出卖給自由资产階級和格萊斯頓先生的激进的代理人；至于其他各民族，它們可能根本沒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因为沒有馬克思等人，符卢勃列夫斯基、麦克唐奈、弗兰克尔是不願意留在总委员会里的。

不管资产階級报刊怎么說，海牙的工人很好地接待了我們。有一次，反动分子暗中派了一些醉汉到我們这里来，要在开完会以后唱荷兰王国的国歌。我們讓他們唱，同时我們唱着“馬賽曲”从他們中間走过，作为對他們的回答。要想驅散他們，有大会的少数代表也就足够了。在星期六最后一次會議上，无数群众不止一次地为发言人鼓掌。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10 月 5 日

載于 1872 年 10 月 8 日“人民报”

第 107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葡萄牙罢工)

1872年10月16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民們!

我荣幸地通过公民杜邦在你們9月26日的會議上把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寄給我的一份通知告訴你們，这个通知談到了与該地国际各支部进行的經濟斗争有关并且要求在英国立即采取措施的一些事情。¹⁹⁷我已經看到，“国际先驅报”刊登了这个通知，但是我不知道联合会委员会是否就这件事情采取了什么进一步的措施。

由于我有义务向我的里斯本通訊員們說明，我为有关方面做了些什么，所以我希望，联合会委员会不会拒絕告訴我，委员会在这方面是否有所作为，如果有，究竟是什么。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們的 弗·恩·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編輯部

“人民国家报”第 84 号上的社論“論海牙代表大会。三”中有一件涉及我的事是錯誤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糾正，这只是因为，这个錯誤正好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現的。如果是敌視我的报刊的造謠、誹謗、中伤以及无意的“錯誤”需要我进行駁斥的話，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实际行动的！

上述社論中說：

“拉法格决非馬克思的‘副官’，所以在要开除吉約姆的战友施維茨格貝耳的时候，他棄权了，虽然开除的建議是由馬克思提出的。”¹⁹⁸

上述建議是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一个調查委员会提出的，而不是由我提出的。至于我，我曾建議代表大会开除同盟，并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調查同盟的活动。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我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原告方面的证人。只是到調查快要結束时，也就是說到了最后的时刻，而且是在代表大会的一次會議正在进行时才听取了我的证詞。在此以前，委员会的一个委員为了弄清一些純屬事实的問題，曾表示希望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談話。我拒絕了这次会見，免得被人怀疑我对委员会施加个人影响。

我在向委员会作证时，無論对施維茨格貝耳还是对他的领导人吉約姆，我都只字未提。我只提到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同盟

盟員^①，而且还表示相信他不是“秘密”同盟的盟員，或者至少他早已脫离“秘密”同盟。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會議上，我投票贊成开除施維茨格貝耳，因为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和吉約姆一样是这个“秘密”同盟的成員。在这种情况下，施維茨格貝耳的沉痛的悔过詞已經不能說服我了。順便指出，当吉約姆先生在“汝拉簡报”上提出保证，說什么施維茨格貝耳曾宣布和他团結一致，这显然是撒謊，而撒謊則是“秘密”团体的每个成員的义务。相反地，尽管吉約姆非常热情地宣称，施維茨格貝耳的命运同他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結在一起，可是施維茨格貝耳对这种 *in extremis* [临死前] 的号叫却充耳不聞！他在自己的悔过詞中只字未提吉約姆，而正是这篇悔过詞打动了大多数人的心。我作为代表大会文件公布委員會的委員，当然仔細地研究了代表大会的正式記錄。

至于拉法格，那末必須指出，“誠实人”比德曼^②在撒謊，說他是巴塞羅納的代表。拉法格是葡萄牙联合会委員會、新馬德里联合会以及一个西班牙支部的代表。

卡尔·馬克思

1872年10月20日于倫敦

載于1872年10月26日
“人民国家报”第8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① 托·莫拉哥。——編者注

② 俏皮話：《Biedermann》——“誠实人”，Biedermann [比德曼]——“德意志总汇报”編輯的姓。——編者注

弗·恩格斯
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
意大利的状况給总委员会的报告¹⁹⁹

1. 西班牙

国际在西班牙最初是作为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的一个简单附属品建立起来的；它必须充当同盟的一个特殊的招募人员基地，同时也必须成为同盟影响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杠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同盟仍然在公开设法使西班牙的国际回复到它过去所处的那种从属地位。

由于这种从属关系，同盟的各种特殊理论——立即废除国家、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放弃一切政治行动，等等——在西班牙都被当做国际的学说来宣传。同时，每个著名的国际会员都立即被列为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且使他们相信，由秘密团体领导公开协会的办法是到处都采用的，并且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

这一切都是在1869年发生的。那个首先在西班牙为国际，同时也为同盟奠定了基础的意大利人法奈利，现在一反自己的弃权论的信念，成了意大利议会的议员。1870年6月在巴塞罗纳举行了国际的西班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组织的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彻

底制定出来了；现在这个计划正在付诸实行，并且已经带来了最卓越的成果。

我们协会参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以及别人硬说它做过的其他事情），这一活动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在西班牙也把国际提到了首位。这种情况，以及紧接着发生的政府的最初几次迫害，使我们在西班牙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到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如果不算各个地方的几个孤立的支部，全西班牙总共有 13 个地方联合会。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决定，根据巴塞罗纳代表大会的决议驻在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留在那里；委员会的委员也几乎完全没有变动；但是，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托马斯·岡薩勒斯·莫拉哥（海牙代表大会代表）没有重新当选。当联合会委员会在 1871 年 6 月政府进行最初几次迫害期间必须暂时迁到里斯本去避难的时候，莫拉哥在紧急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此被开除出新联合会委员会。从此就开始了一场隐蔽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公开的分裂而告终。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就举行了倫敦代表会议（1871 年 9 月）。西班牙人派遣安賽尔莫·罗倫佐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罗倫佐第一个给西班牙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秘密同盟不仅不是我们协会内部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且恰恰相反，总委员会和大多数联合会都坚决反对它，因为它的存在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此后不久，薩加斯塔就开始迫害国际，宣布它为非法。而当时仍是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莫拉哥，再次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并呈请辞职。但是，在政府的这些威胁之后没有采取什么严厉措施。

誠然，国际会员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被取消了，可是，各个支部和委员会却继续无阻碍地举行自己的会议。政府的这些迫害的唯一结果是国际拥护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到1872年4月薩拉哥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协会已经拥有70个整顿好组织的地方联合会，同时，在其他100个地区也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宣传工作。此外，还成立了受国际领导的、遍布全国的8个工会，看来，组织所有西班牙工厂工人（机械工人、紡紗工人和織布工人）的统一的总工会的计划已接近于实现了。

这时，国际内部的隐蔽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开始发生了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转变。莫拉哥（尽管他一再开小差，但在馬德里仍有很大影响）对瓦倫西亚代表会议上选出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私恨，已经不是这一斗争的唯一动力了。倫敦代表会议关于同盟的公开支部的决议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激起了秘密同盟的首领们，尤其是那些直接从巴枯宁那里接受指示的高级亲信分子的狂怒；莫拉哥也是这些高级亲信分子之一。这种狂怒表现在要求立即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汝拉联合会桑維耳耶通告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许多支部未敢反对总委员会和倫敦代表会议；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罪行。不仅如此，1872年1月保尔·拉法格来到了馬德里，他同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用大量事实向他们证明了，汝拉人的所作所为，全是以誣蔑为基础的瓦解国际的阴谋活动。从此，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同时也是“解放报”的編輯，所以地方委员会就和这个报纸鬧对立，并把他們从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开除出去。虽然薩拉哥沙代表大会撤销了关于开除他們的决定，但是，利用无謂的私人糾紛使联合会委员会不

能駐在馬德里这一直接目的却已經达到。联合会委员会确实迁到了瓦倫西亚，委员会的委員全被更換了。在重新当选的旧委员会的两个委員中，莫拉立即辞职，而罗倫佐也由于发生意見分歧很快就引退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員大部分是秘密同盟的成員。^①

薩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后，同盟的拥护者和倾向于国际的人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1872年6月2日，当时在同盟馬德里支部占多数的旧联合会委员会委員（梅薩、莫拉、鮑利、帕赫斯等人），终于向这个秘密团体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宣布解散自己的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們的榜样。²⁰⁰第二天便以捏造的理由并且違反章程把他們全部开除出国际馬德里地方联合会。在130个會員中，只有15人参加这次表决。被开除的會員建立了一个新联合会，然而，联合会委员会拒絕承认它。他們向总委员会申訴，总委员会沒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承认了他們，后来海牙代表大会也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上届总委员会当时沒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原因是：已經获得了足够的材料，证明在西班牙有同盟存在并进行活动，也证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員、甚至是全部委員同时也是同盟盟員，因此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給这个委员会要求它說明和报告有关这个秘密团体的情况^②。西班牙委员会在其1872年8月3日的回答中公然袒护同盟，宣称同盟已經解散。在国际同建立在国际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斗争中，这个委员会已經站

① 手稿中刪去了：“随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預訂在1872年9月召开）的临近，同盟为使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据多数而使用的手法就更加露骨了。”

——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35—138頁。——編者注

到了秘密团体方面，同它商量显然是多余的，因此海牙代表大会完全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当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不让总委员会知道其内容的秘密通告，使用了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已在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如果不是海牙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表现了罕有的容忍精神，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西班牙联合会的4名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成为无效。

因此，目前西班牙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西班牙只有两个地方联合会完全公开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新总委员会；这就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和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联合会。如果这两个联合会不能把西班牙大部分国际会员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末，它们将形成一个新的西班牙联合会的核心。

西班牙的大部分国际会员仍然在跟着同盟走，同盟不仅统治着联合会，而且统治着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但是，有很多迹象表明，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西班牙群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在那里的声望很大，而国际的正式表现——代表大会——具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因此，同盟的先生们要想使群众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就愈来愈困难了。反对运动日益强烈。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卡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和拥有4万会员的工会；他们要求召开西班牙各组织的非常代表大会，以听取海牙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报告和调查联合会委员会的行为。现在也许是国际最好的报纸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机关报“解放报”，每周都在揭露同盟。根据我寄给公民左尔格的那几号，总委员会就可以确信，该报是多么坚决、多么干练并且多么正确地根据我们协会的理论原则在进行斗争。该报现任编辑霍塞·梅萨按其品质和才能来说，无疑是我们西班牙的人当中

最卓越的人，同时无疑也是我们整个国际的优秀人材之一。

我曾劝告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不要特别急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而要认真地进行准备。同时，我已把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文章^①寄给“解放报”，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因为梅萨（在马德里现在他是唯一擅长写作的人）即使能力出众，一个人也应付不了一切事情。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同志们得到总委员会的充分支持，我们就能够克服那里的一切障碍，使国际最优秀的组织之一摆脱同盟的骗子手们的影响。

前西班牙书记 弗·恩格斯

1872年10月31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约·菲·
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
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
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見本卷第191—197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致洛迪下倫巴第工农协会
(国际支部)²⁰¹

1872年11月13日于倫敦

公民們!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你們建立了一个国际支部。我立即把这件事情通知了紐約的新总委员会。在这封信的末尾，我把同总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地址告訴你們，同时我随时准备为你們提供一切消息，或者做你們希望我做的其他任何事情。

敬礼和兄弟情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載于1872年11月17日
“人民报”第117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倫敦来信

三

*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1872年11月14日于倫敦

英国的自由派政府目前在它的監獄里至少監禁了42个爱尔兰政治犯，政府不仅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那样来对待他們，而且更为恶劣，更为殘酷。在炮彈国王^①的光輝时期，現今的自由派內閣的首脑格萊斯頓先生曾在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并在那不勒斯探訪了政治犯；回到英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向欧洲痛斥了那不勒斯政府对政治犯的虐待。²⁰²

这并不妨碍同一个格萊斯頓先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仍然被他監禁在要塞里的爱尔兰政治犯。倫敦的爱尔兰国际會員决定在海德公园(倫敦最大的公园，在政治动蕩时期一切大規模的人民集会都在这里举行)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来要求大赦。他們聯絡了倫敦的所有民主組織，成立了一个委員會，参加这个委員會的，除其他人外，还有国际前总委員會委員麦克唐奈(爱尔兰人)、默里

① 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英格蘭人)和列斯納(德國人)。

產生了一個困難。在最近一次議會會議上，政府使議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授權政府制定在倫敦各公園舉行公眾集會的條例。政府利用這一權利，下令張貼了一張條例，規定凡是想舉行這種公眾集會的人，必須在舉行集會前两天以書面形式將此事通知警察局，並註明演講人的姓名。²⁰³ 這個對倫敦報刊嚴密封鎖的條例，一筆勾銷了倫敦勞動人民最珍貴的权利之一——即隨便在什麼時候和隨便以什麼方式在公園舉行公眾集會的权利。服從這個條例就是犧牲人民的权利。

愛爾蘭人是居民中最富革命性的部分，他們是不肯示弱的人。委員會一致決定照樣行動，就当不知道有這個條例，不顧政府的禁令舉行集會。

上星期日下午3點鐘左右，兩支龐大的遊行隊伍，帶着樂隊，打着旗幟，擁向海德公園。樂隊高奏愛爾蘭民族歌曲和“馬賽曲”，打的幾乎全是愛爾蘭旗（綠色，中央綴有一金色豎琴）和紅旗。公園入口處只有幾個警探；遊行隊伍沒有受到任何阻難，就進入公園，在指定地點集合，並開始演講。

參加集會的至少有三萬人，其中半數以上都在胸前別着綠色彩帶或綠色紙條，以表示他們是愛爾蘭人；其餘的人是英格蘭人、德國人、法國人。由於人太多，不可能都聽到演說，因此又在近旁組織了另一個群眾大會，由其他人在那裡發表關於同一問題的演說。通過了強有力的決議，要求大赦和廢除在愛爾蘭經常實行戒嚴的特別法令。5點左右，遊行隊重新排成大隊，人群離開了公園，這樣一來便踐踏了格萊斯頓政府制定的條例。

這是愛爾蘭人在海德公園舉行的第一次示威；這次示威取得

了巨大成就，这点甚至倫敦的資產階級报刊都不能否认。这是我們居民中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第一次友好团結。工人階級的这两个部分的互相敌視曾为政府和富裕階級的利益很好地效过劳，現在它們互相伸出了手；这件令人可喜的事情首先是由于国际前总委员会的影响造成的，前总委员会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11月3日举行的大会在倫敦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可是，你們会問我，政府会怎么办呢？难道它会輕易地容忍这种鄙視嗎？它会让人不受懲罰地踐踏自己的条例嗎？

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它在海德公园的讲台附近安置了两个警官，随带两个警探，他們記下了演讲人的名字。第二天这两个警官便向治安法官控告了演讲人。法官向演讲人发出傳票，要他們在这个星期六出庭受审。这类行动方式十分清楚地证明，不想对他們进行大規模的审讯。显然，政府承认，爱尔兰人，或者如这里所說的芬尼亚社社員，使它遭到了失敗，因此只满足于判处一笔为数不大的罰款。不管怎样，法庭上的辯論将是很有趣味的，下一封信里我将向你們报道辯論的情况。^①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就是爱尔兰人凭自己的毅力拯救了倫敦居民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各个公园举行集会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1月14日

載于1872年11月17日“人民报”

第117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213—215頁。——編者注

弗·恩格斯 倫敦來信

四

*海德公園的群眾大會。——西班牙狀況

1872年12月11日於倫敦

英國政府對海德公園愛爾蘭人群眾大會^①上所有演講人的審訊，招致了一場猛烈的風暴。誠然，治安法官對被告判處了五英鎊罰款，但是，法庭上的辯論表明，無論從什麼觀點來看，公園新條例都是非法的，因此，現在受理這個案件的上訴法院必然會宣布被告無罪。

不僅如此，第一次群眾大會之後，在海德公園里沒有一個星期日不舉行公開集會的，而政府不敢阻撓任何一個演講人。有一次集會是為保衛宣布罷工的警察而舉行的；另一次群眾大會則純粹是為了確保在公園舉行集會的權利。

警察罷工？——你們會問道。是的，先生們，因為英國是個着了魔的國家，在那里罷工運動遍及全國。我記得，十五年前曼徹斯特的警察曾宣布罷工，要求提高工資，不出兩三天就獲得了完全勝利。

① 見前一篇文章。——編者注

几星期以前,首都的警察由于提高工资20%左右的要求遭到拒绝,便威胁要举行罢工。在最后时刻,政府出于利害考虑,满足了他们的一切要求;但是,政府处罚了警察自己成立的抵抗团体的书记以示惩戒,由于他不愿服从处罚而被解职了。于是,警察队伍里便掀起了抗议运动,并宣布在海德公园召开大会。政府又让步了,大会还没有举行就赦免了所有的暴动分子,只有上述那个书记除外。这证明,英国虽然有一个十足贵族气的外壳,但是资产阶级精神已无所不在。事实上,还有哪一个别的国家已经资产阶级化到这样程度,以致可以允许警察的抵抗团体存在和警察罢工的事情发生呢?

这里收到的关于国际各联合会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态度的消息令人非常满意。在荷兰(这个国家的代表们在表决时会和少数派站在一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符合我们伟大协会的真正精神的决议。²⁰⁴ 这里力求按照纽约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行动,不过还保留了在将于1873年9月举行的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必要修改意见的权利,同时否认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有通过涉及协会共同利益的这种或那种决议的权利。

在西班牙,尽管海牙代表大会少数派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是能够左右局势的人,但工人的正确意识仍然占了上风。领导联合会委员会的同盟的拥护者们确定于12月25日在哥多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²⁰⁵。按上次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程,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全协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整顿西班牙联合会的组织机构。与此相反,联合会委员会却把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反国际的代表大会的决议²⁰⁶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列入议程。这是明显违反共同章程的行为。因此,新马德里联合会向所有忠实于国际的联合会(承认共同章程和历

次代表大會決議的聯合會)發出呼喚,號召它們選舉一個新的臨時聯合會委員會。²⁰⁷這一號召已得到了列里達、巴達洛納、德尼亞、龐特-德-維魯馬拉這些地方的重要的聯合會和支部的支持。此外,格腊西阿、托勒多、阿耳卡拉的聯合會,以及加迪斯和瓦倫西亞的許多聯合會也都表示反對現在的聯合會委員會。在巴塞羅納近郊的工業區——格腊西阿,經過同巴塞羅納的同盟分子連續進行了三個晚上的辯論後,這個聯合會(共有 500 個會員)一致贊同海牙代表大會的一切決議,並決定譴責西班牙代表在最近這次全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行為。在瓦倫西亞,聯合會委員會感到自己在這次全聯合會會議上有被打垮的危險,便阻撓可能對它不利的表決的進行;這一行動引起了分裂。²⁰⁸西班牙還只是剛剛踏上這條道路;再過幾個星期,運動將會強大到足以證明,西班牙工人不會容許某些秘密團體的領導者為自己的利益來破壞國際。

在海牙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關於一個叫布斯凱的人的問題^①,他是貝濟埃警察局的秘書,混進了國際隊伍,不過,根據他所屬的支部的要求,已經被前總委員會開除出國際。這個傢伙後來被梯也爾提升為該城警察隊長,他竟在“汝拉簡報”第 21 期上找到了一個保護者²⁰⁹。既然在汝拉聯合會的隊伍里出現了阿爾伯·里沙爾和加斯帕爾·勃朗這樣一些現在充當路易-拿破侖的走卒的英雄好漢,那末對這一點就用不着特別驚奇了。

弗·恩格斯寫於 1872 年 12 月 11 日

原文是意大利文

載於 1872 年 12 月 14 日“人民報”

俄文譯自“人民報”

第 122 號

署名:弗·恩格斯

① 見本卷第 173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先驅报”編輯²¹⁰

亲爱的公民：

直到現在我們一直认为答复“自治的”約翰·黑尔斯先生不遺余力地對我們进行的造謠和誣蔑是多余的。可是，当这类誣蔑是盜用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的名义，被說成好像是受該委員會的委托而散播出来的时候，当誣蔑的目的在于損害整个国际的时候，我們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位突然装扮成爭取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的战士的黑尔斯先生，实际上把这种自治理解为他个人的专橫独断。他爭取到把自己任命为：第一，負責記錄的書記；第二，通訊書記（英国国内和国外通訊書記）；第三，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財務委員；但是，由于他自己不能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所以，第四，他又任命了这个委員會的其他一些委員專門充当自己的奴僕。并且，第五，他事先沒有报請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批准，便以这个委員會的名义給世界各地写信。

例如，在“汝拉簡报”第 23 期上我們就发现了分裂分子的汝拉委員會写給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的一封公开信，以答复“簡报”上发表的約翰·黑尔斯先生的一封信。我們相信，不列顛联合会委員會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

黑尔斯先生在这封信里断言：

“这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揭穿了前总委员会的活动家的伪善面目，他们企图在我们协会内组织一个广泛的秘密团体，其借口是要消灭另外一个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秘密团体。”

黑尔斯先生的逻辑是非常奇妙的。代表大会把同盟开除出国际一事，成了他证明前总委员会伪善的证据，前总委员会是不承认这个组织的。至于所谓总委员会所发明的同盟和总委员会所策划的秘密阴谋，那末联合会委员会现任委员，公民荣克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在提供这种资料方面他是任何人所不能相比的。他当过瑞士书记，因此知道同盟的丰功伟绩，他又是前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知道约翰·黑尔斯所发明的“阴谋”的一切内幕。公开的同盟的丰功伟绩在前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已经公诸于世了。而这个秘密团体的活动也将被海牙代表大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掌握的、目前正在准备公布的文件^①所揭露。

黑尔斯先生抱怨说：

“我当总委员会总书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大陆各联合会的通讯处，也根本无法得到它们。”

在黑尔斯先生当总委员会的书记，而且是总委员会独一无二的领报酬的负责人的时候，他除了整理记录，把记录摘要送去刊印以及同英国各支部和工联团体通通信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责任了。

同其他联合会，即同大陆上和其他地区的联合会通讯的工作

^① 見本卷第 365—515 頁。——編者注

則委托給那些不領報酬的書記去做，而他們的活動如何，他是無需過問的。至于他究竟怎樣執行委托給他的通訊任務，從總委員會專門通過的一項決議便可以看出，根據這項決議，他的通訊任務已轉交給公民米爾納執行。²¹¹

黑爾斯先生接着聲明：

“有一次，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收到了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寄來的一封信，可是寫信人，公民安賽爾莫·羅倫佐忘記了把通訊處通知他；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曾向當時的西班牙通訊書記公民恩格斯打聽羅倫佐的通訊處；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絕回答。不久以前，我們向他詢問里斯本聯合會委員會的通訊處，他也同樣拒絕答复我們。”

關於這個問題，公民恩格斯只知道以下情況：上面所說的那封西班牙的來信是公民榮克寄給他并請他代為翻譯的，這件事他照辦了。至于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請求通知羅倫佐的通訊處一事，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能把委員會關於這個問題的記錄的摘要寄給他的話，他將表示感謝。

至于里斯本的事情，葡萄牙委員會曾寫信給恩格斯，請他支持罷工；恩格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予以協助，同時他也採取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其他一些措施。恩格斯在通過聯合會委員會的委員們再三轉達口頭請求并提出一份書面請求^①以後，大約過了兩個月光景才收到黑爾斯先生的一封信，黑爾斯先生在信里通知他說，委員會在這件事上採取了某些步驟，同時也請求把里斯本的通訊處寄去。恩格斯沒有寫回信，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黑爾斯完全是為了他個人的陰謀而要這些通訊處的。對

^① 見本卷第200頁。——編者注

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們从来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态度。当荣克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柏林、萊比錫和維也納的通訊处时，立刻就把这些通訊处給他寄去了。

公布大部分出自这位黑尔斯先生之手的前总委员会记录的摘要，将会揭露出他反对总委员会的恶毒用心。那时，事情就会昭然若揭，用他給汝拉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話來說，

“任何一个不十分了解前总委员会情况的人，甚至不能想像，事实被歪曲到什么程度”……而这个歪曲事实的人恰恰就是約翰·黑尔斯先生。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72年12月20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72年12月21日“国际
先驱报”第38号和1872年12
月28日“解放报”第80号

俄文譯自“国际先驱报”

弗·恩格斯
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
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²¹²

工人同志们！

由于一伙自称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的人发出了一个号召你们参加他们反对我们协会的根本原则的公开叛乱的通告²¹³，我们认为有责任向你们呼吁。

在这个通告里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硬说，少数派使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并且使事情陷入绝境，因为最近一次会议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主席宣布散会，以便阻止讨论的进行。

骤然看来有点奇怪，少数派居然能把多数派逼入绝境，须知只要简单地表决一下本来就可以迫使少数派沉默的。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情况总是少数派脱离出去。关于多数派脱离出去的事，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单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人怀疑，这里面一定有点问题。至于对一次会议的主席^①表示不满这件事，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那一次主席宣布散会的时间比平时晚半个小时，即在11点半才散会的，因为多数派的拥护者坚持要暂停讨论，宣布休息。²¹⁴

① 賽·維克里。——編者注

正如通告所說，在是否應該承認我們協會 9 月間在海牙舉行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有效的這個問題上，聯合會委員會發生了分裂。但是，對於國際的會員來說這是根本不成問題的。根據國際共同章程第三條的規定，全協會代表大會應當“採取使我們協會順利進行活動的必要辦法”²¹⁵。代表大會是它的立法機關。代表大會的決議全體會員都必須遵行。凡是不喜歡這些決議的人可以或者退出協會，或者在下次代表大會上設法廢除這些決議。但是，任何一個協會會員、任何一個支部、任何一個聯合會委員會、任何地方性的或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只要還想留在國際內，就無權宣布這些決議無效。

簽署通告的人聲稱，海牙代表大會是不合法的，它絕不代表協會的大多數會員。代表大會是由總委員會按照共同章程第四條的規定通過合法手續召開的。出席大會的有 64 名代表，他們共代表 15 個國家，而且代表本人也分別屬於 12 個不同的民族。大會代表的這種真正國際性是過去任何一次代表大會都不可比擬的。大會所通過的決議都貫穿着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關於這一點下述事實可以作證：幾乎全部決議都是以四分之三的多數票通過的，而且不久前被卷入骨肉相殘的戰爭的兩個民族的代表——法國人和德國人——幾乎在所有的場合都一致投票贊成這些決議。如果英國由於它本身的過錯而沒有派一個人數眾多的代表團出席代表大會，難道這能成為宣布代表大會是不合法的理​​由嗎？

通告的作者們不滿意代表大會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他們說，這個決議是在大多數代表離開以後通過的。“國際先驅報”第 37 號（12 月 14 日）上發表的正式報告表明，就這個問題進行表決時，64 名代表中有 48 名參加了投票，其中有 35 名贊成

这个決議。在这三十五名代表中我們发现也有現在在推翻这个決議的通告上署名的莫特斯赫德先生的名字。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決議呢？就其內容和大部分措詞而言，它同 1871 年 9 月倫敦代表會議上通过的、由总委员会在同年 10 月 17 日和其他各項決議一起正式公布的決議²¹⁶是一致的；在这个決議上署名的除其他人而外，还有約翰·黑尔斯、托·莫特斯赫德、海·荣克、弗·布列德尼克、亨·梅欧和約翰·罗奇！既然总委员会应当貫徹执行代表會議的決議，那末为什么这些公民当时沒有一個人呈請辞职，退出总委员会并抗議这个他們現在突然认为是如此危險的決議呢？

通告完全歪曲了这个決議的涵义，只要讀一下“国际先驅报”第 37 号上发表的決議全文^①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和通告的断言相反，決議並沒有規定工联和其他政治上中立的組織必須从事政治活动。它只是要求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就是說，它号召这里的即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再做“偉大的自由党”的尾巴，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就像它在偉大的宪章运动的光輝岁月里所做的那样。

可見，关于对工联背信棄义的武断說法完全是一种捏造。但是請問，那些当时加入国际的工联現在在哪里呢？上年度会費收支平衡表表明，在公民黑尔斯担任書記时期它們几乎全都不知去向了。

其次是抱怨总委员会迁到紐約去了，抱怨总委员会中既沒有英国人，也沒有美国人。新的总委员会是由屬於五个不同民族的

① 見本卷第 165 頁。——編者注

人組成的，如果說在紐約的英國人置身于國際之外，那末這要怪他們自己沒有派代表參加總委員會。當總委員會駐在倫敦的時候，英國人的代表總是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代表要多得多，而且往往占絕對多數；同時，法國人有一個時期在委員會里卻根本沒有代表。但是，英國人不能把這種狀態看做是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當海牙代表大會根據共同章程第三條賦予它的權利和義務選舉新的總委員會的時候，它選擇了在它看來是最好的駐在地，並且在這個地方選出了最好的人。在通告上署名的人可以持另一種見解，但是這并不能縮小代表大會的權利。

通告硬說，由於這種做法，各支部和聯合會原有的、決定它們應該在自己國內實行什麼政策問題的權利被剝奪了。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管總委員會駐在哪裡——駐在倫敦、紐約，還是別的什麼地方——各支部和聯合會的權利仍舊不變。但是通告却說，為了防止不服從，

“代表大會授予了這個總委員會不說明理由就擅自暫時開除任何支部、聯合會或聯合會委員會的權利”。

這又是不正確的。暫時開除任何支部的權利是由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年）授予總委員會的。正式發表的海牙代表大會決議中的第二項決議第一條^①（載於“國際先驅報”第37號）指出，即使總委員會的權力擴大了，或者確切些說，更加明確地規定下來了，那末它們也是受到一些過去沒有的附加條件的限制的。例如，總委員會要解散某個聯合會委員會，它必須在30天內採取措施選出一個新的委員會，可見，歸根到底決定權還是保留在這個聯合會手

^① 見本卷第166—167頁。——編者注

中。在总委员会要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的时候，如果其余的联合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就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所有联合会都派有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提出自己的决定，以便做出最后裁决。这就是通告中所说的不说明理由地暂时开除的权利！

工人同志们！你们自己赞成还是不赞成在海牙通过的、现在已成为国际的法律的这些决议。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赞成这些决议，那他可以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支部，不管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不管是它们召开的任何全国性代表大会，都没有权利推翻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企图这样做，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处境恰恰就是这样。听任这种行动在国际内泛滥，就等于是解散国际。

甚至在海牙的少数派所代表的那些国家里，也开始出现了对这些代表们所表现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强烈反抗。在美国、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和整个瑞士，除开一小撮人（不超过 200 个）而外，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荷兰的国际会员们也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支持纽约总委员会，并决定把他们中间可能产生的意见只提交将在 1873 年 9 月召开的、合法的下次代表大会处理，而不提交任何别的代表大会。²¹⁷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挑起上述通告所制造的那种分裂运动，但是就在西班牙，对这种分裂运动的反抗也在一天天地高涨，各支部也纷纷表示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工人同志们！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反对召开企图对协会中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制定的规章作出判决的任何不列颠代表大会。

我們反对在 1 月 26 日这样近的日期召开任何代表大会。

我們坚决要求所有支部把上述情况交給自己的成員討論，因为，我們协会在英国的前途取决于他們在当前的危机中的态度。

只有那些維護海牙代表大会的威信和努力实現在那里作出的各項決議的人才能被认为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合法代表。

于 187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举行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大会上通过。

向我們协会的全体会员致兄弟般的敬礼

会 議 主 席 P. 苏希尔

总書記和德国書記 F. 庫佩尔

法 国 书 記 O. 維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12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1872 年 12 月 23 日印成傳单，并
載于 1873 年 3 月 8 日和 15 日
“工人报”第 5 号 and 第 6 号

卡·馬克思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告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各支部、
分部、所屬团体和會員书²¹⁸

公民們！

在委员会 1872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我們研究了英国分裂分子的代表們发表的通告。我們立即决定，向所有的支部发出一份通知，建議它們在沒有收到我們的答复以前，对这个問題不要发表意見，我們的答复将立即发出。在 12 月 23 日即星期一晚上举行的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特別會議上，一致通过对上述通告中的凭空捏造的說法作如下的答复：

1. “困境”是由于黑尔斯經常只干私事而造成的；他和莫特斯赫德两人相互指控对方营私舞弊，几乎在总委员会里也造成这种困境。通告里所提到的那次会上出現的“困境”，是由莫特斯赫德造成的。他当时喝醉了酒，叨叨不休地对主席^①进行带侮辱性的人身攻击，企图以此迫使主席在 11 点半宣布散会；而提出散会要求的不是別人，正是黑尔斯。不列顛联合会的會員們大概早就在“国际先驅报”上讀到，南朗伯特支部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多数

① 賽·維克里。——編者注

派不讓他做任何真正的事情。

2. 这个通告出現的真正原因是：海牙代表大會上的分裂主義少數派的代表們彼此商定：聖誕節前後在所有國家里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要大會贊成他們所進行的分裂活動。於是，這類代表大會就定於12月25日在比利時和西班牙召開（反對召開這種大會的，在西班牙有一個日益壯大的反對派）。現在他們又企圖用欺騙手法迫使不明真相的英國各支部支持這一陰謀。

3. 這裡所談的通告沒有呈交聯合會委員會。通告的作者們背着委員會在秘密會議上搞出了這篇東西，這一事實最好不過地證明，他們害怕討論。什麼時候看見過這樣的多數派，他們不是通過表決來取得對少數派的勝利，相反地，卻自己脫離了少數派呢？既然多數派在他們似乎占優勢的委員會里，只要簡單地表決一下就會使問題得到有利於自己的解決，那末他們為什麼還要要求召開特別代表大會呢？

4. 所有在這個通告上署名的人都不敢表示完全贊同大陸上的分裂分子，這些分裂分子直言不諱地聲稱，除了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外，他們不接受任何一次代表大會的權威。但是，他們卻從否認海牙代表大會的合法性着手，而這次代表大會就其代表組成而言是最具有國際性的，的確是協會的第一次真正世界性的代表大會，因為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多數派第一次不是由某一個國家的代表所組成，甚至也不是單由地方性組織的代表組成的。如果這次代表大會是非法召開的，那末曾經身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公民羅奇為什麼要在這個委員會的報告上署名呢？現在他卻又在反對這次代表大會的通告上署了名。

5. 他們說，他們將擁護海牙代表大會以前的那個共同章程。

这个章程的第三条規定：代表大会……采取使协会順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第十二条規定：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須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贊成修改。共同章程并没有授予任何一个地方性代表大会或联合会代表大会修改任何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決議的权利。因此，在这个通告上署名的人正在掀起一場公开暴动，以便不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上批准的國際的宪法，而且也反对据說他們也拥护它的那个共同章程。

使得在通告上署名的人感到那样厌恶的海牙代表大会的那些決議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決議呢？

首先，这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他們硬說，这个決議是在大多数代表离开会场以后通过的。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64名代表中有48名参加了对这个決議的表决，其中有35名代表，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投票贊成，公民莫特斯赫德也投了贊成票，然而他却在通告上署了名。此外，許多代表在离开时也都給主席留下了书面声明，表示他們拥护決議。

这个決議本身正是对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同其他各項決議一起发表的倫敦代表會議（1871年9月）第九項決議的扼要叙述。在这个決議上署有公民布列德尼克、梅欧、莫特斯赫德、荣克、罗奇和作为总書記的黑尔斯等人的名字。代表會議的这个決議援引了共同章程、成立宣言、洛桑代表大会決議和总委员会从創立以来的全部活动来证明，決議中所确定下来的，仅仅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对协会一向公开采取的政策的解释。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建議代表大会把这个決議列入共同章程。²¹⁹ 那天晚上由公民荣克担任書記，因为黑尔斯暂时被解除了

職務。甚至諾定昂代表大會在實質上也通過了和這同樣的決議，²²⁰ 儘管通告曾把這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當做一個先例來援引。

至於說什麼這個決議撇開了工聯，那末，海牙代表大會恰恰相反，它為工聯所做的事比共同章程或者以往任何一次代表大會都多得多。它責成新的總委員會建立國際工聯聯合會，甚至吸收那些不屬於國際的工聯參加，它建議每一個工聯自己提出它們願意在哪些條件下參加這個聯合會，以及起草一個共同計劃，這個計劃在下次代表大會最後批准以前將先提交所有參加聯合會的工聯批准。

下一件受抱怨的事情是總委員會遷往紐約。歸根到底他們不過是想說，沒有黑爾斯、莫特斯赫德、榮克、布列德尼克、梅歐和羅奇等先生們的席位的總委員會是無權代表國際的。

另一個抱怨涉及擴大總委員會的權力問題。在海牙通過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一項決議說：“總委員會必須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並且監督每一個國家嚴格遵守國際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條例的原則。”這個決議是在前總委員會一致贊同的基礎上向代表大會提出的。²²¹ 如果總委員會無權把那些在國際內部進行反國際活動的組織暫時開除，直到下次代表大會為止，難道這個決議能得到貫徹執行嗎？此外，海牙代表大會關於暫時開除支部、聯合會委員會和聯合會的各項決議，實際上限制了巴塞爾代表大會所授予的權力（見組織條例第二節第六、七條），並在每一個事件中使總委員會的行動受到特殊監督。²²²

大陸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報刊都支持那些竭力想在國際隊伍里引起分裂的人的企圖，而那些忠於國際的人則紛紛被捕，他們的報紙則遭到警察迫害。儘管分裂分子吹噓說，由於他們的努力，

国际到处都处于瓦解和受到反对海牙各項決議的暴动襲击的状态中,但是实际上协会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有力,海牙的各項決議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麦、波兰和瑞士都得到了完全的拥护;在瑞士只有 150 名左右的分裂分子不在此例。虽然荷兰代表在海牙和少数派一起投票,可是在荷兰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仍然忠于总委员会,并且除了即将于 1873 年 9 月在瑞士召开的下次代表大会以外,不承认别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在西班牙,分裂分子指望能够达到一切目的,因为联合会委员会是站在他們一边的,但是那里反对他們的力量正日益加强。甚至在意大利,各支部仍继续不断地来信表示自己拥护新的总委员会,而玩弄召开一次英国代表大会的詭計是分裂分子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

为了答复这个通告中的建議,我們必須宣告如下:

1. 我們声明,凡是为了修改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而在英国召开的任何代表大会都是非法的,因为每一个联合会都有权向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見。其次,我們宣布,根据 1872 年 7 月諾定昂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将于圣灵降临节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代表大会是不列顛联合会唯一合法的代表大会。

2. 建議各支部撤銷它們授予那些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权力,并派遣自己的新的代表参加联合会委员会。

3. 建議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将联合会委员会的會議記錄交給这个委员会,由它来断定,誰在阻碍协会的工作和誰在促进协会的工作,以及誰的行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

4. 建議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弄清各支部的組織情况、它們的成員人数、它們成立的日期,尤其是它們通常派到联合会委

員會里去的代表的人數。

既然各支部現在掌握了兩個文件，我們就讓它們自己來處理這件事情，我們只是請它們把它們作出的決定立即通知我們。

但是，我們要毫不猶豫地說，我們的行動是符合協會的章程和憲法的，是符合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的。

國際工人協會萬歲！

F. 哈里——南朗伯特支部，主席

艾·希爾斯——西頭區支部

弗·列斯納——諾定昂代表大會，前總委員會委員，創建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

威·哈·賴利——諾定昂代表大會

查·默里——諾爾曼比支部，前總委員會委員

喬·米爾納——全國改革同盟，前總委員會委員

J. 密契爾——萊斯特郡亨克萊支部

G. 亞·魏勒爾——在倫敦的德國人支部

賽·維克里——柏肯海德支部

歐仁·杜邦——曼徹斯特支部，前總委員會委員，創建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

所有通知應寄倫敦弗利特街紅獅子大院 7 號“國際先驅報”編輯，公民賴利收。

1872 年 12 月 23 日於倫敦

卡·馬克思起草於 1872 年 12 月 20 日

1872 年 12 月 30—31 日印成傳單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單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
論住宅問題²²³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
1873年1月

載于1872年6月26日和29日、7月
3日、12月25日和28日“人民国家
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
年1月4日和8日、2月8、12、19和
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
15和16号，并于1872—1873年以三
个分册在萊比錫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87年版本譯的，
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1 April 73.

Laura Lafargue
des Verfassers

Die Wohnungsfrage.

Von

Friedrich Engels.

Separatdruck aus dem „Volkstaat“.



Leipzig, 1872.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lkstaat“.

弗·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书的扉頁，
上面有作者写的贈給勞拉·拉法格的字樣

第一篇

蒲魯东怎样解决住宅問題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后几号上，連載了六篇关于住宅問題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們是——除了某些早已被人忘記了的四十年代的半美文学式的文字之外——把蒲魯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嘗試。对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正好給了蒲魯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①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來說，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嘗試立刻加以反駁。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謂住宅缺乏現象，并不是說工人階級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它甚至也不是現代无产階級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階級。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現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統治階級对劳动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压迫。今天所說的住宅缺乏現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戶愈加拥挤，有些人簡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現象之所以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

^① 見馬克思“哲学的貧困”1847年布魯塞尔和巴黎版²²⁴。

工人階級，而且也傷害到小資產階級。

我們現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現象，只是從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並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做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後果。這種剝削才是社會革命力圖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石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現代的社會制度使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迫使工人的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償付勞動力的價格所必需的時間，而從這個勞動力中榨取遠遠超過其價值的價值。這樣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就在全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階級及其所豢養的奴僕（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間進行分配。至於這種分配怎樣進行，這同我們毫不相干；但是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凡是不勞動的人，只有靠這個剩餘價值中通過某種方式落到他們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參看馬克思的“資本論”，那里第一次闡明了這一點²²⁵）。

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並從他們那里無償奪去的剩餘價值在各個非勞動階級中間的分配，是在極值得玩味的爭吵和互相欺詐的情況下進行的：既然這種分配是通過買賣來實現，所以它的主要杠桿之一便是賣主欺騙買主，而這種欺騙現在在零售商業方面，特別是在大城市里，已經成為賣主維持生活的真正條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麵包店主在商品價格或質量方面欺騙工人時，並不是把工人當做有工人的特點的人來欺騙。相反地，只要某種平均的欺騙程度已經在某一地方成為社會通例，它過些時候就一定会在工資的相應提高中得到補償。工人對小店主說來是買主，也就是現金或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勞動力出賣者身分出現的。

尽管欺騙行为伤害工人和一切貧苦階級比伤害社会的富有階級厉害，但是欺騙行为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禍害，不是唯有工人階級才遭受到的禍害。

住宅缺乏現象也是这样。現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經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滿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毀，在原地兴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①大規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詐勒索，中飽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倫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論在柏林或維也納也都很逍遙自在。結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貴，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貴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場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現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階級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样，也根本不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階級的禍害，并且由于它損害了工人階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續一定時間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的补偿。

^① “在巴黎”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正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住宅問題，決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同樣，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反過來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也決不是偶然的。

“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這完全不對。

在住宅問題上有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從後者那裡買得住宅的暫時使用權；他有現金或信用，儘管他還必須按高利貸價格，即以額外房租形式向這個房主買到這種信用。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個工人——總是作為一個有錢的人來活動的；他或者應該事先賣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勞動力，以便能用賣得的錢作為住宅使用權的買主來活動，或者應該有能力擔保這個勞動力一定賣得出去。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在這裡是完全沒有的。資本家迫使買到手的勞動力首先再生產出它自己的價值，然後生產出在資本家階級中間進行分配以前暫時保留在這個資本家手裡的剩餘價值。於是，在這裡就產生出一些過剩價值；現有價值的總量就增加了。租賃交易時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論從承租人那裡索去多少，這始終只是已經存在着的先前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轉讓，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價值總量仍舊不變。一個工人，無論資本家償付他的勞動時償付得低於、高於或等於它的價值，反正他

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則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超过住宅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关系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們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間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調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經濟規律进行的。首先是估計到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估計到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决定問題的是当时的供求关系。这种單純的經濟关系反映到我們那位蒲魯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余地偿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內，原先的費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魯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忽略了一点，即房租不仅應該补偿房屋建筑費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繕費用，濫賬和欠租的平均額，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閑置而受的損失；最后，由于房屋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所以房租應該每年抵銷建筑房屋时所投資本的相当部分。^① 第二，这里还忽略了一点，即房租还應該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額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誠然，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立刻解釋說，这种价值的增长是未經土地所有者干預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應該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說实际上就是要求

^① 后半句从“最后”起，是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廢除土地所有權。關於這點，我們現在不去多談，因為這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最後，他沒有覺察到，在這場交易中談到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購買房屋，而只是購買一定期限內的房屋使用權。蒲魯東既然從未考慮過造成某種經濟現象的真正實際條件，當然也就弄不清楚，為什麼原先建築房屋的費用在一定情況下竟會在五十年內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償還。對於這個並不困難的問題，他不是從經濟方面去研究，並切實查明它是否真正同經濟規律相抵觸以及怎樣相抵觸，卻以大胆地從經濟學領域跳到法律領域的辦法來挽救自己說：“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一種永恆的法權理由”每年獲取一定的款項。至於這究竟是怎樣發生，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法權理由，蒲魯東卻默不作聲。然而這卻正是他應當說明的。假如他研究過這一點，他就會發現，世界上一切法權理由，不論怎樣永恆，也不能賦予一所房屋以這樣大的權力，使它能在五十年內以租金形式獲得原來建築費用的十倍；這只可能是經濟條件引起的結果（這種經濟條件可能在法權理由形式下獲得社會的承認）。說到這裡，他不得不又要從頭講起了。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律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各種現象間的經濟聯繫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逃到法權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恆公平。

“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權關係中提取他的永恆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論據，說商品生產形式像公平一樣也是永恆的。然後，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權。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現實的物質新陳代謝規

律,并根据这些規律解决一定的問題,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的新陳代謝,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們該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對高利貸的了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5頁226)

我們那位蒲魯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租賃合同在現代社会生活中,就像血液循环在动物身体中一样,是必要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当然,使这一切交易都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經濟生活,應該像蒲魯东所說的那样提到經濟法权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精确地描述了蒲魯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用德文把这种謬論刊印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設想的嗎?这全部胡說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支配現代社会的經濟規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侮辱了作者的法权威,而作者却虔誠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災禍能够消除。——是啊,癩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癩蛤蟆了!难道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剝削工人的特权的观念嗎?如果作者向我們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們就会前进一步嗎?

我們还是回到住宅問題上来吧。我們那位蒲魯东主义者在这里听任其“法权观念”自由馳騁,并向我們发出如下一套动人的議論:

“我們毫不犹疑地断定說，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們这个倍受贊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集中点，即自己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風卷走…… 我們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現代无产階級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篇哀歌中蒲魯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創立現代革命階級即无产階級，就絕對必須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除了織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織工，虽然貧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現狀、“充滿虔誠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脫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現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沒有財產、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鎖^①而被置于法外的^②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經濟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劳动階級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資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現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階級的状况”²²⁷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紀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驅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历来的枷鎖”，而是“历来的文化”。——編者注

② 双关語：«vogelfrei»既有“被置于法外”的意思，也有“像鳥一样的自由”的意思。——編者注

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从資本主义生产被大規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們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²²⁸，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嗎？恰恰相反。只有現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并被驅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剝削和一切阶级統治的偉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織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們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魯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魯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去交換；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魯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門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門中的单独劳动，

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是渴望着“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计算现代工业产品中的这种价值，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生产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

取生产品来供自己消費的两个生产者間的直接交换。① 因此，整个蒲魯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业、蒸汽机、紡織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們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規，那也沒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魯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現代大工业制約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只要这句话一般來說还是有意义的話。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須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純由工人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們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去消費，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資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費的后备基金。②

* * *

看了上面所說的一切之后，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我們的蒲魯

① 这一句的后半句从“即互相換取……”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
——編者注

② 整个后一句从“但是……”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伟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他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原来建筑房屋的費用在房租形式下得到二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法权理由为依据的，而这个法权理由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廢除法权理由，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抵銷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如果接受了这种本身就包含有最終結論的前提，那末当然只要有任何一个魔术师所具备的那种巧妙手法，就可以从口袋中掏出預先准备好了的結論，并且夸耀說引出这个結論的邏輯是不可摧毀的。

这里也正是这样。把廢除住宅租賃制宣告为一种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贖买出租住宅……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付清給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償付給資本的永恒权利的貢賦，而現在，从宣布贖买出租住宅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規定的金額，就成为补偿轉归他所有的住宅价值的每年付款……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各个不依賴別人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組成的总体。”

在蒲魯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于房屋上面的資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違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須停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这部分資本現在成了所购的地皮，所以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現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損害。工人受剝削現象所环繞的关键是：劳动力出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

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資本家与工人間的这种交易創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潤、資本利息、捐稅等等形式在各类資本家及其奴僕之間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于是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就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資本家——而且是并不直接购买劳动力，因而也不迫使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資本家——去获取利潤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剝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階級身上剝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額也絲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宣称：

“这样，廢除住宅租賃制是在革命思想內部发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魯东本人的集市叫卖声一模一样，他那母鸡咕嗒咕嗒的叫声总是同他所生的蛋儿的大小成反比例。

但是，請想像一下，每个工人、小資产者和資产者，都不得不用按年付款的方法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宅的全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因为那里工业的規模很大，而工人的屋子很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住着单独的一所小屋子，——这也許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規模很小却附有很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人。假定說在宣称贖买一切出租住宅的救世法令頒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經過一年以后，假定他成了汉堡門附近他所住的五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間的 $\frac{1}{15}$ 的所有者。后来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諾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华美的三层楼上一个相似的住宅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恰好获得了所有权的 $\frac{1}{36}$ ，突然一次罢工再

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 11 个月，成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地下室^{11/180}的所有者。以后又经过多次迁移，现代工人时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又硬使他得到了圣加连一处同样体面的住宅的^{7/360}，另外一处是在里子的住宅的^{23/180}，以及第三处在塞兰的住宅的^{347/56223}——其所以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致违反“永恒公平”。我们的彼得怎样来处置各个住宅的这一切零碎部分呢？谁会给他这些部分的真正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宅其余部分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既然一座有多层楼房的大楼中，比方说，共有 20 套住宅，而这座大楼在贖买期满和住宅租賃制廢除后也许就要分屬散居世界各地的 300 个部分所有者，那末对于任何一座这样的大楼中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魯东主义者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魯东的交换銀行，这个銀行将随时对每个人的任何劳动生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收入，因而也会对住宅的每一部分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魯东的交换銀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論住宅問題的一些論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謬論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魯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經在英国以 Labour Exchange Bazaar²²⁹ 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們指出过的那个反动的蒲魯东主义原則上的，这个原則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創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贅疣，必須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順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規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

地恢复已經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假如工人重新被拋回到这种因循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風”被順利地排除了,那末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贖买論就不会显得那样荒謬了。但是蒲魯东忘記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撥一百年,从而把現代工人又弄成象他們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狹隘和阿諛成性俯首貼耳的奴隶。

蒲魯东的这种解决住宅問題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和可以实际实现的东西,現在都在实行起来了,但这并不是在“革命思想內部”产生的,而是……在大資产者中間产生的。我們且听一听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論及这个問題的一段話:

“还有另一种由蒲魯东提出的解决住宅問題的方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輝夺目,但仔細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魯东建議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宅价值的款項,而承租人經過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魯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現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迫使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耳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个制度,不仅为了榨取金錢,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統治階級最老練的領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階級的軍隊。上一世紀的資产階級革命曾把貴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許多零星的小块土地,——現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階級,这个階級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因素和城市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的經常障碍。拿破侖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額国家公債券的方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階級,而多耳富斯先生及其同僚按逐年付款的条件把小住宅卖给自已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們束縛在他們做工的工厂里。可見,蒲魯东的計劃不仅絲毫沒有減輕工人階級所受的

苦痛，而且甚至反轉來直接反對他們了。”^①

怎样解决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会里，解决这个問題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問題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問題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說，一点也沒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問題呢？这不仅要以時間地点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問題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預备凭空設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結構，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剝夺現在的房主，让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階級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現代国家剝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 * *

但是，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并不滿足于自己在住宅問題方面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問題从尘凡提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的領域，以表明这个問題在那里也是“社会問題”的极其重要的“一

①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产生出这种把工人束縛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房屋”上来解决住宅問題的做法，有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 1886 年 11 月 28 日从印第安納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話可以证明：“在堪薩斯城內，或者确切些說，是在城郊，我們看見了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算是有三个房間，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 600 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 600 美元，所以为了获得泥濘曠野中离城要走一个钟头路的一所倒霉的小房，总共要費去 4 800 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負起沉重的抵押債務，才能得到这种住所，于是他們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們被束縛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們所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加的注。）

部分”。

“我們假定，資本生產率真正已被握住雙角加以馴服了，——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把一切資本利率硬性規定為一厘的過渡性法律，並且還要使這個利率漸漸接近於零，以至最後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別的要償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產品一樣，都要服從這種法律……房主自己將第一個力求賣出房屋，因為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會根本沒有用處了。”

這段議論包含蒲魯東的教義問答中的一個基本信條，並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亂觀念的一個明顯例證。

“資本生產率”是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粗率地抄來的胡說。誠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時也肯定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他們也應當說明，為什麼資本家把資本投到工業或手工業企業以後不僅能收回他所投的資本，並且另外還取得利潤。因此，他們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說資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產率。說明蒲魯東還多么深地陷在資產階級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證據，莫過於他所學會的這種談論資本生產率的姿態了。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看到，所謂“資本生產率”，無非是說資本具有把僱傭工人的無酬勞動攫為己有的性能（指在現在的社會關係下而言，因為沒有這種關係，資本就完全不成其為資本了）。

然而，蒲魯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同，他不嘉許這種“資本生產率”，而是相反，發現它是破壞“永恒公平”的。也正是它阻礙工人得到自己勞動的十足收入。因此必須把它廢除。怎樣廢除呢？用強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以至最後降到零。那時，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看來，資本就不再是生產資本了。

貨幣借貸資本的利息，只是利潤中的一部分；不論工業資本的

利潤或商业資本的利潤，都只是資產階級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階級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調整利率的經濟規律对決定剩余价值率的規律独立的程度，就像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种規律之間一般可能有的互相独立程度一样。至于說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資本家間的分配，那末很明显，对于自己企业中有其他資本家大量投資的工业家或商人說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利潤率的提高应当与利率的下降成正比。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廢除利率决不会把所謂“資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馴服”，而只会确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資本家之間分配从工人階級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資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資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

蒲魯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釋利率以及一切經濟現象。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順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魯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頒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話——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魯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紙空文了。不管頒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来調節。能得到信用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依照情况按二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錢，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謹慎，只把金錢借給那些不会弄出訟案来的人。况且，这种使資本失去“生产率”的偉大計劃来源极其久远，它同目的正是要限制利率的高利貸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高利貸法現在到处都已經廢除，因为实际上它們經常被破坏或規避，而国家不得

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只要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居然就可以“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愈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愈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在食利者阶级看来，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就会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办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平均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是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整个说来，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对，不对，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要点是在另一个地方：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吧）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其中究竟，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²³⁰）。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①也就废除了。

① 俏皮话：Zins 是利息，Miethzins（或 Miethe）是房租。——编者注

因为“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把自己部下的一位志愿入伍者叫来吩咐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士，那末请你常到我家走走；一个人家里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看病。”

那位志愿入伍者说：“对不起，少校大人，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我倒无所谓，反正士就是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无所谓，反正金就是金，士就是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vulgo [即]所谓的租金的构成部分是：（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并且因为后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资本息金。士就是士。对通常的资本息金说来，高利贷法仅仅是因为有人规避就失了效，而对房租来说这些法律则从来也没有丝毫受到损害。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不顾一切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息金，而且还能不顾一切地调整和逐渐废除复加的租金。²³¹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再贴些钱谋求摆脱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就仍旧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社会主义(老师蒲魯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建树了这番偉大功勋以后，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权更加展翅高飞了。

“現在只要再做出几个結論，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闡明我們探討的极其重要的問題。”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結論呢？从前面的議論中很难引出这些結論，正如从廢除利率中很难引出住房貶值一样；如果勾掉我們的作者加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詞藻，那末这些結論不过是說，要順利完成贖买出租住宅这件事，最好要有：(1)精确的房屋統計，(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負責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詞令，它們并不能“充分闡明”蒲魯东漆黑一团的糊塗思想。

誰做出了这样的功績，誰就有权来郑重地訓誡德国工人說：

“这些問題以及类似的問題，在我們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希望他們像这里研究住宅問題那样清楚地来研究其他如信用、国家債務、私人債務、稅收等等同样重要的問題，”等等。

这样，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就向我們許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問題”的論文，如果他論述这些問題，也像他論述这个“同样重要的問題”一样詳細，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答案我們是能預料到的，——到头来是同前面說过的一样：資本利息一被廢除，国家債務和私人債務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語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个別場合都靠无法辯駁的邏輯得出同一妙不可言的結論：一旦廢除了資本利息，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們的問題也实在漂亮。

信用！除了在前后两次領工資中間的时期或者从当鋪里借到手的信用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借給工人的是无息或有息信用，或甚至是由当鋪索取高利的信用，——对工人說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別嗎？即使一般說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生产費用也变得便宜些了，难道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下降了嗎？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說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問題，如果小资产者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那他当然要感到特別方便了。**国家債務！**工人階級知道，它沒有借过这种債款，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借过这种債款的人去偿还。**私人債務！**——請參看信貸項吧。**稅收！**这对资产階級利益关系很大，而对无产階級利益关系則很小；工人当做稅款繳付的一切，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費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資本家来补偿。所有这里当做对工人階級极其重要的問題向我們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于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們則同蒲魯东相反，断言工人階級并不負有保护这些階級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問題，資本家怎样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問題，我們的蒲魯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誠然，他的老师研究过這個問題，但根本沒有搞清楚，甚至他最后的几篇著作在这方面实质上也沒有超出“貧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²³²一步，而这本书的淺薄无知，早在1847年就被馬克思极其光輝地揭穿了。

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語的工人就几乎沒有过任何別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假如蒲魯东主义的理論現在还会在德国泛濫，那就

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論方面已經比蒲魯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問題作为例子說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繼續操心了。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一

在論蒲魯東主義者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那一篇中，已經說明小資產階級對於這個問題有多大的直接利害關係。但是，大資產階級對這個問題也有頗大的、雖然只是間接的利害關係。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周期性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傷寒、腸熱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總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區被污染的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這些疾病在那裡幾乎從未絕迹，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於是越出它們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和空氣較好的比較衛生的城區去。統治的資本家階級以逼迫工人階級遭到流行病的痛苦為樂事是不能不受懲罰的；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凶肆虐。

當這一點由科學確定之後，在仁愛的資產者心裡就激發起了爭先恐後關懷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貴精神。於是就建立協會、著書立說、草擬方案、討論和頒布法律，以求根絕時常重復發生的各種流行病。工人居住條件已經開始受到調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嘗試。在大城市最多因而最可能使大資產者遭到危險的英國，對開展這方面的活動也特別賣力；委任了調查工人階級生

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因而成了多少带些激进精神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它们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以致这种治疗工作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德国是照例需要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才能够使得这里也经常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非常剧烈的程度，而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不过，也许真是走得愈慢，就走得愈远吧，最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可怜的摘录，只是靠一些响亮华丽的词藻，才骗人地赋予了它一种见解高明的外貌。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艾米尔·扎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²³³。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处理方法，只是因为它企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这位作者当“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太好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主要的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整本书都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是他却援引了一系列庸俗资产阶级的、善意市僧的、虚伪慈善家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耳、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社会胡说）大会的报告，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公报，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公报，“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切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尤利乌斯·孚赫！

在这个資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庫奇克²³⁴了。

扎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任何誤解，就在第 22 頁上声称：

“我們称之为社会經濟学的，就是关于国民經濟的学說在社会問題上的运用，确切些說，是这門科学提供給我們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目的是要根据这門科学的‘铁的’規律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範圍內把所謂〈！〉无产者階級提高到有产者階級的水平。”

我們且不去深究这种认为“关于国民經濟的学說”或政治經濟学一般除了“社会”問題以外仿佛还研討其他什么問題的糊塗观念。我們要立即研究主要点。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階級經濟学的“铁的規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範圍”，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謂无产者階級”的状况却應該提高到“有产者階級的水平”。然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則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謂的而是真正的无产者階級，这个階級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沒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給工业資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經濟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內部，在这个社会制度範圍內，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問題解决了。也許他会殷勤地給我們指出，怎样能把法国軍隊中所有从拿破侖第一时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里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吧。或者給我們指出怎样使德意志帝国的 4 000 万臣民都变成

德国皇帝吧！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於既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正如“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²³⁵。我們已經看到，扎克斯先生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他認為解決住宅問題就會使社會問題得到解決；他所持的意見是：

“用改善各勞動階級住宅的辦法就能有成效地減輕上述那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貧困，用這種辦法〈即僅僅用廣泛改善住宅條件的辦法〉就能把這些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從他們那種幾乎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純潔的高峰”（第 14 頁）。

順便說說，抹煞無產階級的存在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所造成的而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係繼續存在的條件這一事實，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此，扎克斯先生在第 21 頁上向我們說明道：各勞動階級應該理解為除了工人本身以外還包括一切“貧窮的社會階級”，“一般小百姓，即手工業者、寡婦、領恤金者（！）、下級官吏等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了手！

住宅缺乏現象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它是怎樣發生的呢？善良的資產者扎克斯先生當然不會知道，這種現象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宅缺乏現象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社會中，絕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得不專靠工資來過活，也就是靠為維持生命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來過活；在這種社會中，機器技術等等的不斷改善經常使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社會中，工業的劇烈的周期波動一方面決定着大量失業工人後備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時而把大批失業工人拋上街頭；在這種社會

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会知道这点的。它不敢用现存条件来说明住宅缺乏现象。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说教的词句来把住宅缺乏现象归之于人们德行败坏，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罪过……一部分在那些对住宅提出需求的工人本身身上，一部分并且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在那些负责满足这种需求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身上，即在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身上。后者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不设法保证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正像蒲鲁东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律领域去一样，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中去。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这种说教正像老母鸡在池边向它孵出的在池里活泼游泳的小鸭说教一样。虽然水上没有木头，小鸭总是在水上活动；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利润。“在

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澤曼早就这样說过²³⁶，这一点他比扎克斯先生了解得透彻些。

“良好的住宅很貴，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資本……畏避建造住房供各劳动階級享用……因而这些階級在滿足自己对住房的需要时，就大部分落入投机事业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事业！大資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碍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邪恶的意旨，而只是他們的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滿足住宅需要这种事該有……多么巨大和重要的作用；他們不知道，他們这样不負責地照例供給人們以恶劣的、有害的住宅，会使人們受到怎样的損害；最后，他們不知道，他們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 27 頁）

但是，資本家的无知一定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使住宅缺乏現象产生出来。扎克斯先生承认說，“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弄得完全没有栖身之所，总得〈！〉随便找一个地方来过夜，因而他們在这方面是完全沒有保障，无能为力的”，然后就向我們叙說道：

“大家知道，他們〈工人〉中間有許多人由于輕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是很巧妙地使得自己的机体失去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的条件，絲毫也不懂得合理的卫生，特別是不懂得住宅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 27 頁）

但是这里，資产者露出馬脚来了。資本家的“罪过”已經消散在无知之中，而工人的无知却只是被用来作为确认他們有罪的理由。請听一听吧：

“所以，結果就是〈正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們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宅，簡言之，搬进对一切卫生要求都是一种嘲弄的住宅……而且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套住房，甚至只是一个房間——这一切都是为了少花

一点房錢，同时他們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地浪費在喝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浪費在烟酒上面”(第28頁)的錢、“像一个鉛秤錘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級拖到泥污中去的酒館生活及其一切悲惨后果”，——这就确实像一个鉛秤錘那样梗塞在扎克斯先生喉嚨里。至于在現在环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是他們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其必然性已經到了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数来的程度，这一点又是扎克斯先生不会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老师就常說“平民进酒館，老爷跑戏院”这句话，因为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廢話，归結起来无非是主張劳資利益調和的濫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說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俯首貼耳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輩所宣傳的那一点上。劳資調和的福音到現在已經宣傳了五十年，資產階級的慈善家为了試图設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調和也已經花了不少錢，可是我們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五十年內絲毫也沒有改变。

我們的作者現在就来实际解决問題了。蒲魯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計劃是多么缺乏革命性，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早在蒲魯东以前就已經企图——并且現在还在企图——实际上实现这个計劃。扎克斯先生也宣

称，住宅問題只有使住宅所有权轉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 58 頁和第 59 頁）。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詩兴大作，写出了如下激动人心的篇章：

“在人所特有的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怀恋心情中，在这种連現代劇烈活动的營利生活也不能削弱的意向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不自觉地感到土地所有权这种經濟权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一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就获得了巩固的地位，仿佛是在地里牢固地生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經濟（！）都在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最穩固的基础。然而，土地所有权的賜福的力量还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誰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像的最高度的經濟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領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了一定的权力，在困难的日子就有了一个可靠的避難所；他的自我意識就增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增长起来了。因此所有权在这个問題上是有深刻意义的…… 这样一来，現在无可奈何地由市面情况的变动摆布的、总是依靠自己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不稳定的境况；他会成为資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險。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产者階級上升为有产者階級。”（第 63 頁）

扎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則他就不会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怀恋土地所有权的心情，有这种到現在誰也沒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的心情。对于我們城市工人說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們只能成为一条鎖鏈。如果讓他們有自己的房屋，把他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們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資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許偶然能卖出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①，一切被这种事变牽連的工人的房屋全都会交到市場

^① “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上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买主,那末扎克斯先生全部偉大的住宅改良计划就会毫无结果,于是又只得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像世界里的;扎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像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避难所”,已经在“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等等。但是,让扎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的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他们的“地产”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的确是可想像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了,但这是对……高利贷者而言的!而为了使工人能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这样独立自主地来支配,善意的扎克斯先生就殷勤地向他们指出他们能够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不必加重慈善救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扎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这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但是,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一千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們这个工人的資本家面貌还有其另一方面。假定在某一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件事已經成了通例。在这种場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內。但是，劳动力生产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經济学的铁的規律”，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資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節約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貨幣形式交給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給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确实会成为某一种資本，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資本，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

可見，扎克斯先生甚至連在紙面上也沒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資本家。

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对于一切归根結底是会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所謂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資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它們一直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末它們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規模实现这种改良是同現存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們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采用消費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末这个地方的工資經過一些时候就会大約降低20%，即降低得适合于那些食品費用在工人收支总額中所占的比率。譬如說，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費自己一周工資的 $\frac{3}{4}$ ，那末工資終于会降低 $\frac{3}{4} \times 20 = 15\%$ 。簡言之，只要这种使工人節約开支的改良办法一旦普遍推行起来，工人由于这种節約能縮

减少多少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 52 塔勒的独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 1 塔勒。总之，他愈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愈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东西能用来“最有力地激发他的……节俭精神，即首要的持家之道”呢？（第 64 页）

不过，扎克斯先生也接着就向我们说，工人应当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使自己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看一眼处于这种状况的扎克斯先生〉……^① 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产者阶级，那末能使得在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 65 页）

换句话说，扎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僕。这应该引起蒲鲁东主义者的深思。

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福利，——这个有许多人徒然企图猜出的斯芬克斯^②的谜语，——现在对我们说来不是已经可以感触到的事实吗？它不是因此就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这一点如果实现了，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最极端派的社会主义者也当做自己理论高峰的最高目的之一吗？”（第 66 页）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引文较长，在“假如……”前面，还有“土地所有权……能减少为反对有产阶级统治而斗争的人数。”——编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它就杀掉谁。——译者注

我們已經攀登到这个地方，真是幸运。这一声欢呼正是扎克斯先生这本书的“最高峰”，此后作者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領域”走向平凡的现实；而当我们走到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丝毫没有改变，真是一絲一毫都没有改变。

我們的向导让我们往山下走第一步的时候，教导我们說，工人住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間的是德国北部采用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确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而营房制則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靜說来都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貴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應該感到滿足了（第 71—92 頁）。

我們不是已經往下走了一大段路了嗎？把工人变成資本家，解决社会問題，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留在高高在上的那个“理想領域”里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只是在各处乡村里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把工人营房安排得尽可能像样些。

可見，資產階級解决住宅問題的办法由于碰到了城乡对立而显然遭到了失敗。这里我們也达到了問題的中心。住宅問題，只有当社会已經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

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不过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恰好与扎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很荒谬的。但是，现代的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问题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

扎克斯先生进一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大谈特谈应当建立在大城市附近的工人移民区，他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例如公共“自来水、瓦斯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晾晒场、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设备齐全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能把动力传送到整个房子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发动机，——然而这丝毫也不会使情形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襲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一笔勾销而完全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正是因此它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丝毫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

而且除了在法国的吉茲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有这样的移民区了；况且就連这个移民区也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实验而建立起来的。^①同样，扎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四十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那个《Harmony Hall》²³⁸ 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哩。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議論，都只是可怜地企图再度飞上“理想領域”，但是立刻又要掉下来的。我們現在又大踏步地走下山来了。現在最簡單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合适的住房，或者是由自己出錢修建住房，或者是鼓励和帮助工人自己进行建筑，供給地皮，貸給建筑資金等等。”（第106頁）

这样一来，我們就又落到了根本談不到这类事情的大城市以外，又被移到乡村里去了。扎克斯先生馬上证明說：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宅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資方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必然

“由此产生的工人生活的提高……一定会使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加解决住宅問題的正确观点；这种参加是**无形組合**的結果，是雇主大半隱蔽在人道意向的外衣下的对工人身体、經濟、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結果，这种关怀自然会因为产生应有的結果，即因为吸引和保持許多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而在金錢方面获得报酬”（第108頁）。

胡貝尔企图用“**无形組合**”²³⁹ 这个詞儿給资产阶级慈善家的鑿語加上一些“崇高的意思”，但是这詞句絲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

^① 并且这个移民区也終於成了剝削工人的地方。見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²³⁷。（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沒有这个詞句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許多村鎮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已經发展为城市了。可是工人并不感謝慈善为怀的資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議。問題不仅在于他們必須为房屋付出壟断价格，因为厂主沒有竞争者；而且在于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們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一句話不說立刻就把他們赶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詳細情形，可以參看我写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第 224 頁和第 228 頁²⁴⁰。但是，扎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論据“未必值得一駁”（第 111 頁）。然而，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嗎？自然是想的。但是，既然連“雇主也應該随时有可能支配住宅，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就能有一个地方让接替的人安身”，那末……他当然就應該“預先規定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廢除所有权，以便适应这种情况”（第 113 頁）。^①

这次我們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跑了下來。起初是說工人應該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們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現在又對我們声明，这种所有权在乡下也應該

① 在这一方面，英国資本家不仅早已實現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扎克斯先生一切宿願。187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在莫尔珀思，法庭为了审定議會选举人名册，必須就 2 000 名矿工申請把他們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判決。結果发现：根据这些人那里工作的矿場的規章，他們大多数都不是被当做他們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一些被恩准住在那里的人，不經任何預告就可以随时被抛到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判決說，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承租人，不过是些僕役，因此他們无权被列入名册（1872 年 10 月 15 日“每日新聞”）。

“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廢除”了！由于扎克斯先生为工人发明的这种所有权，由于工人轉化为“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廢除”的資本家，我們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尘世，而在这里我們就可以研究資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問題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了。

二

如果听信我們这位扎克斯博士的話，那末資本家老爷們現在已經做了許多事情来減輕住宅缺乏現象，并且这就证明住宅問題可能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扎克斯先生就把我們带到了……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覽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者階級状况的报告，实际上則是为了給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繪成真正天堂一般的状况。而扎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制度貪污成性的奴僕所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結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所說，对法国是充分完备的”！这些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了报告的 89 个大工业企业中間（包括股份公司在內），有 31 个完全沒有修建工人住宅；在已經修建起来的住宅中，据扎克斯先生自己估計，頂多能容納五、六万人，而且各个住宅几乎都是一戶兩間房子！

不言而喻，随便哪一个資本家，只要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苗等等的位置——束縛在一定的乡村地方，而又沒有現成的工人住宅，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是“无形組合”存在的证明，看做是“对問題及其崇高意义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是“大有前途的

开端”（第 115 頁），——那就須要具备极其慣于自欺的本領。但是，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具有穩定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扎克斯先生在第 117 頁上向我們說：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强活动。特別是在乡下遙远的村鎮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經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的原因。同时，对这种关系有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良同其他一切无形組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愈来愈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們…… 海德的埃士頓、塔尔頓的爱釋华特、柏立的格兰特、博林頓的格萊格、里子的馬歇尔、貝耳珀的斯特腊特、索尔特尔的索耳特、科普利的艾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神圣的單純，更加神圣的无知！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宅！亲爱的扎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資本家不仅就錢袋讲来，而且就脑袋讲来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現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在农村进行工厂生产的情况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資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間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資產者之間进行的斗争給予德国工人以結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厂主实际上就已經确信，假如他們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們对于罢工的工人該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萊格、埃士頓、艾釋华特这些人的“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四十年以前它們就已經被資產階級当做模范加以宣揚了，而我自己二十八年前也描写过它們（見“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第 228—230 頁脚注²⁴¹）。馬歇尔和艾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創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腊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紀就开始出現。既然英国工人住宅的平均寿命是 40 年，

那末扎克斯先生就是用手指也可以算出“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倾圮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位置现在大多数都不在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圍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处在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城市中間，但这并不妨碍以扎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恭敬地重唱那些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的1840年的英国老贊美歌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艾克罗伊德^①。这位勇士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約克郡的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競争者们常常說：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的亲生儿女！可是，扎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愈来愈少了”（第118頁）。完全正确，沒有結婚生出来的私生子减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是与工厂同时建造工人住宅，这在近六十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村鎮有許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所环绕的核心，并且有着工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問題，而是第一次在当地造成了这种問題。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即在法国，尤其是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些巨型冶金工厂（如克列索的施奈德尔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决定修建一些工人住宅。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业家都让自己的工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老艾克罗伊德”，而是“老艾——我不願意指出他的姓来，因为他早已死去并已經安葬了”。——編者注

人冒着炎暑或雨雪在清晨步行几德里到工厂，晚上再步行回家。这种情形，在多山的地区，例如法国和亚尔萨斯的佛日山脉，在烏培河、济克河、阿格尔河、累内河和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是特別常見的。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見得好些。不論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是同样可鄙地吝嗇。

扎克斯先生分明知道，無論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或是繁荣的移民区也好，都沒有絲毫意义。因此他現在就企图向資本家证明，他們从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获取多么巨大的收入。換句話說，他企图向他們指出一个欺騙工人的新方法。

首先，他給他們举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质、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許多倫敦建筑公司做例子，这些公司已获得了4%到6%以及更多的純利。至于投在工人住宅上面的資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扎克斯先生来向我們证明。投在建造工人住宅方面的資本不比現在所投的資本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昂貴的住宅給所有者带来更大的利潤。因此，扎克斯先生給資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說教罢了。

至于这些被扎克斯先生大肆鼓吹說具有輝煌成績的倫敦建筑公司，那末这些建筑公司据他自己的估計(而他却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总共也只是让2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像这样一些儿戏，在德国居然有人敢于煞有介事地把它描繪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倫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过活！所有这些慈善的努力，实际上都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专談工人状况的英国議會报告书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它們。

在这整篇內暴露出来的对倫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們在这

里就不去說它了，我們只指出一点。扎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棧之所以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扎克斯先生以为整个倫敦西头区都是一个很豪华的城市，殊不知最华丽的街道背后就是极污秽的工人街区，例如索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扎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二十三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荷区模范客棧，起初是客人很多，但它后来已经歇业，因为誰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棧之一呢。

那末，亚尔薩斯的牟尔豪森工人鎮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嗎？

牟尔豪森的工人鎮对大陆资产者說来，正如埃士頓、艾釋华特、格萊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自夸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鎮不是“无形”組合的产物，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亚尔薩斯资本家的完全公开組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这个实验垫付了 $\frac{1}{3}$ 的資本。在14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对这件事有較好理解的英国一定行不通的恶劣制度修建了800所小屋子；工人們在13—15年内每月付出昂貴的房租，然后才可以获得这些房子的所有权。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建筑合作社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亚尔薩斯的波拿巴主义者来发明。为贖买房屋而付出的額外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漸次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場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 $6\frac{2}{3}\%$ 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給他，但不付分文利

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公司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的。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宅，只因为它是位于城外半农村地方这一点，就已经比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宅好些了。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扎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就用不着去讲它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宅一事，即使不践踏一切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这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全部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宅缺乏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宅呢？于是扎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来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缺乏现象，这点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扎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谈述自助办法的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办法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地方，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也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扎克斯先生就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即自助〉方法，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制原则有力量影响住宅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制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文体的“质量”没有起过丝毫改良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办法

在英国却产生了非凡的奇迹，以致“由于实行了自助办法，在其他各方面为解决住宅问题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building societies»〔“建筑公司”〕，而扎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一般流行有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意见。英国的 building societies 根本不是……什么住宅建筑公司或住宅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置房屋协会’；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缴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因此，building society 对于一部分会员来说是储蓄银行，对于另一部分会员来说是信贷银行。可见，building societies 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同他们一起存款的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可以料想到，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保证，并且规定短期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利息并不支付给存款人，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名下……想要把存款连同积累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 170—172 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 2 000 个以上……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 1 500 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 10 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家屋；这简直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 174 页）

可惜，这里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但是”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对于卫生条件也很少予以注意。”（第 176 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却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实行自助办法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虽然可能出现真正的住宅建筑协作社，但它们又遇到“各种很显著和严重的困难”（第 179 页）。这些协作社只能修建

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話，“这种协作式的自助办法”不可能“在現有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对解决这一問題起主要作用”。这种住宅建筑协作社还只处在“始初的、尚未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 181 頁）

总之，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不能夠。我們本来可以把这一篇就此結束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式的資產者总是把英国的 building societies 摆出来給我国工人做模范，所以就絕對必須对英国的 building societies 稍加說明。

这些 building societies 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們的主要目的也根本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們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种 building societies 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組織，并且不論小規模的 building societies——即其始初的状态——还是它們的大規模的模仿者都是这样。在某一个酒館中，——通常是由酒館主人发起，然后就每星期在他这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們的朋友，如小店主、店員、推銷員、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資產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其他一个屬於本階級貴族階层的工人，湊成一个住宅建筑协作社。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按自己的职业說，都不是非要固定在什么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許多小店主和手工业者在城內只有鋪子，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烟雾瀰漫的城市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起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来。比較有錢的會員們湊出的貸款就能买地皮；每周繳納的会費，再加上一些小額借款，就足够每周的建筑費用。那些

想購置自有住宅的會員，凭抽籤分得現成的小宅子，再用額外房租償清買價。其餘的小宅子就出租或出賣。住宅建築公司本身，在生意順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財產，这笔財產在會員們交納會費期間是屬於會員們的，並且在他們之間常常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住宅建築公司十有九个的經過情形就是这样。其餘的則是較大的公司，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但它們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資產階級的儲蓄能有較好的投放处所，使其有抵押作保證，又能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紅利。

至于这些住宅建築公司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顧，这可从一个极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最公司的說明书中看出。倫敦《Birkbeck Building Society, 29 and 30, Southampton Buildings, Chancery Lane》〔“伯克貝克建築公司，昌塞利巷南安普頓大廈 29 号和 30 号”〕自成立以來收入已達 1 050 万英鎊（合 7 000 万塔勒），它存入銀行和投入國家證券的款項在 416 000 英鎊以上，現有會員和存款人 21 441 人，这个协会的自我介绍如下：

“許多人都知道鋼琴廠主採用的所謂三年制度，其內容是租賃鋼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終了時即成為鋼琴所有人。在採用這個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們很難購置一架好鋼琴，正如很難購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樣；人們年復一年地出錢租鋼琴，所花的錢比鋼琴價格高一兩倍。但是，在鋼琴方面採用的辦法，在房屋方面也可以採用……然而由於房屋比鋼琴要貴……所以要有較長期限才能用房租償清買價。因此，經理們便與倫敦城內各處和郊外各處房主成立協定，使經理們可讓 Birkbeck Building Society 會員及其他人在城市各處有大量房屋可供挑選。經理們決定遵循的這樣一個制度：房屋出租期限為十二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繳納，出租期滿之後，房屋就成為承租人的絕對財產，無須再付其他任何費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縮短期限，或減低租金以延長期限……凡屬收入有限的人們，即在大小商店

中服务的人員等等，一加入 Birkbeck Building Society，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一切都說得够明白了。絲毫也沒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們，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員等等；并且还假定主顾通常已經有了一架鋼琴。事实上，这里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資产者的人，而是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总是在逐漸上升的人，例如店員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則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們的收入数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不能預先承担十二年半的义务。不屬於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①

① 关于倫敦各住宅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倫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屬于一打左右的貴族，其中最显貴的是韦斯明斯特公爵、培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 99 年，期滿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們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謂 repairing lease [附带修繕租賃] 条件出租一个較短的时期，例如 39 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条件把房屋修理得适于居住，并且繼續保持这种状态。签订了这种合同以后，土地所有者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該区建筑管理局的視察員(surveyor)去檢查房屋并确定必需修繕的地方。修繕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能包括重建全部前牆、屋頂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約当做抵押交給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項，——每年租金 130 至 150 英鎊的可以借到 1 000 英鎊以至 1 000 英鎊以上，——由自己出錢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整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是要保证大土地貴族能够毫不費力地利用公众的資金，把他們在倫敦的房屋經常修整和保持在适于居住的状态中。

而这竟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問題的措施！（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加的注。）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牟尔豪森工人鎮的波拿巴主义者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住宅建筑公司的可怜模仿者罢了。不同的只是波拿巴主义者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騙却比这些建筑公司要厉害得多。他們的条件大体說来是比英国平均的条件更为苛刻的；在英国，每次繳納的錢都計算出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牟尔豪森的工厂主則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納入腰包，只把原来用 5 法郎硬币繳納的基本数额退回。沒有人会比扎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異更感到驚訝了，因为他在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懂得它們的意思。

可見，工人自助办法也是不会有什么結果的。剩下的只是国家帮助了。扎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們拿出什么东西来呢？能拿出三件东西：

“第一，国家必須关怀到，凡国家立法和行政方面能加重劳动者阶级住宅缺乏現象的一切，都应予以廢止或相应地改善。”（第 187 頁）

总之：修改有关建筑的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有关建筑的立法范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鳥一样自由，而住宅缺乏現象却依然存在。况且，現在英国的建筑已經便宜到极点，只要附近有一辆馬車駛过，房屋就会搖晃起来，所以每天都有一些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 年 10 月 25 日，曼彻斯特城内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見，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引起这种灾难。”

总之：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使当局有权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宅，像英国从 1857 年

起就已經实行的那样。但那里是怎样实行的呢？1855年頒布的第一个法令(Nuisances Removal Act [消灭傳染病法])，扎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終是“一紙空文”，1858年頒布的第二法令(Local Government Act [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頁)。然而，扎克斯先生认为，只推行于住有一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Artisans' Dwellings Act [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議會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頁)；但是，这个說法又只是扎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近代大工业的祖国，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闊，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扎克斯先生竟认为，一个議會法案只須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刻見諸实现，那他就大錯特錯了。任何議會法案(只有 Workshops' Act [工場法]除外)都是这样，而 Local Government Act 更是这样。这个法律委托給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貪賊枉法、徇私舞弊和 jobbery^①行为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由于种种裙带关系謀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沒有能力实行便是不願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負責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大半是以严格忠于职守著称的——不过現在已經沒有二三

① *Jobbery* 一詞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謀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說，某一国家中的国家电报局局长暗自作了一个造纸厂股东，他用自己的森林中的木材供給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紙，那末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頗为像样的 job，完全足以表明 jobbery 的原則是什么东西；順便說說，这在俾斯麦統治下是天經地义和十分自然的。[在“人民国家报”上沒有“順便說說……”这一句。——編者注]

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設備不良和有倒塌危險的房屋的所有者，在市政局中直接或間接总有勢力強大的代表。按小选区进行市政局委員选举，总是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最小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局委員，都不敢投票贊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一切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現在还只是在最出丑的場合才被采用，并且还是在已經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政大臣进行的請願总是只有在这种場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經存在的法律則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許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即当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工人的压力下終于决心加以实行的政府手中，它才会成为强有力的武器来把現代社会制度打破一个缺口。

“第三”，据扎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应用它所拥有的一切积极措施来緩和当前的住宅缺乏現象。”

这就是說，国家政权应当給自己的“下級官吏和職員”（但这些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一些营房，“真正的模范建筑物”，并且“貸款給……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階級的住宅”（第 203 頁），英国按照 Public Works Loan Act [公共工程貸款法] 正在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牟尔豪森也这样做过。但是，Public Works Loan Act 也只是一紙空文；政府撥發給委員們支配的至多不过 5 万英鎊，即頂多能建筑 400 所小宅子的資金，因而 40 年就建造 16 000 所小宅子，即至多只能供 8 万人用的住宅。但这不过是滄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員會的資金在 20 年

后已由于收还貸款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 20 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 4 万人用的住房，但这也仍然是滄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維持 40 年，所以在 40 年后每年就得花 5 万或 10 万英鎊現金来整修势将傾圮的最旧的小宅子。扎克斯先生在第 203 頁上正是把这一点称之为实际正确地和“在无限大的規模上”实行了原則！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那里国家也可說是“在无限大的規模上”毫无作为以后，扎克斯先生就結束自己的书，而这不过是对一切有关人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說教罢了。①

十分明显，現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願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来反对被剝削階級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总合权力。个别資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資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国家也不願意做。因此，如果說个别的資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現象感到遺憾，也不大願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飾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合的資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頂多也只是会設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进行已經成为常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① 最近在保证倫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有权征用地皮以供修筑新街道用的英国議會法令中，开始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給予了若干注意。这里插入了一項决定：新建的房屋必須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居住。因此为了从字面上履行法律，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五层或六层的出租营房或住房。这种为工人所完全不习惯并且对于古老的倫敦的情况又显得完全陌生的新設施結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納的工人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整頓市街而失去住所的人数的四分之一。（恩格斯在 1887 年版上加的注。）

但是，有人可能反駁我們說：在德國，資產者還沒有占統治地位；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因為這樣，所以這個力量也就代表社會的總合利益，而不是僅僅代表某一個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國家能夠做出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做出的種種事情；在社會領域中，也應該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來。

這是反動派的論調。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在普魯士——而普魯士現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同一個仍然強有力的大地主貴族並存的，還有一個比較年輕和極其胆怯的資產階級，它至今既沒有像在法國一樣取得直接的政權，也沒有像在英國一樣或多或少地取得間接的政權。但是，跟這兩個階級並存的，還有一個人數迅速增加、智力十分發達、一天比一天更加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因此，這裡除了舊專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近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不論在舊日專制君主國中或者在近代波拿巴主義君主國中，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較少的部分由上層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這個似乎站在社會以外並且可以說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等級的獨立性，就使得國家好像獨立於社會之外。

在普魯士（並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條件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就是偽裝的憲政制度；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日專制君主國的現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的君主國的存在形式。在普魯士偽裝的憲政制度

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掩蔽了专制君主国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条件中的变革，以及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以大大增长的规模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投机倒把活动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漩涡中。1870年从法国大量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散布着。施特鲁斯堡和貝列尔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犹太经纪人作投机竞赛，而国家也承认他们的平等身分，把交易所犹太经纪人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忘了尊贵的昔日，现在都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殷实的或不大殷实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愈来愈轻视把盗用公款作为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公职置之脑后，一味追逐收入更多的管理工业企业的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加入”铁路或诸如此类的企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并不反对搞些投机事业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日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要被揭穿，而且整个旧日的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①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应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即令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

^① 现在，即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依靠保护关税来巩固的联盟——之所以还能支持下去并联合起来，不过是因为害怕从1872年以来按人数和阶级意识说都已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罢了。（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愈來愈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如果說1866年以來經濟方面的立法對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適應沒有超過它實際表現出來的程度，那末這是誰的過錯呢？主要是資產階級自身的過錯：第一，因為它過於胆怯，不能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要求；第二，因為它對於任何可以同時把新武器授予威脅着它的無產階級的讓步都加以抵抗。如果說國家政權，即俾斯麥，企圖組織一個自己御用的無產階級，借以箝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那末這豈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義手段嗎？這個手段對於工人沒有任何義務，只是對他們說一些善意的空話，頂多也只是像路易·波拿巴那樣給予建築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國家幫助罷了。

至於工人能從普魯士國家那里期待一些什麼，最好的證明是看那筆曾使普魯士國家機構再度暫時在社會面前保持其獨立性的法國數十億賠款²⁴²的用途。難道這几十億中有過一個塔勒是用來使流落街頭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嗎？根本沒有。當秋天來臨時，國家甚至把工人們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幾間可憐的木房也下令拆毀了。這50億賠款就很快地照舊揮霍在要塞、大炮和軍隊上；儘管瓦格納說了許多善意的蠢話²⁴³，儘管同奧地利舉行了幾次施梯伯會議²⁴⁴，這几十億賠款中用在德國工人身上的數目，甚至還不及路易·波拿巴從他在法國盜取的幾百萬法郎中用在法國工人身上的數目多。

三

實際上資產階級只有一個以他們的方式解決住宅問題的办法，即每解決一次就重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一次。這就叫做“**歐斯曼**”的办法。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么一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敷设了新街道，修建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拆除和改良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虽然从那时以来卫生警察的监督已经加强，却还有许多街区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然而，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展，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所以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已经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各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²⁴⁵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基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

偉大的勝利。但去年夏天發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災，因為由於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們的大城市中築有堤堰的河流總是一年比一年招來更大的水災。那時人們才發現，原來小愛爾蘭根本沒有被消滅，只是從牛津路南邊遷移到了北邊，並且仍然像以前一樣繁榮。下面就是曼徹斯特激進資產者的報紙曼徹斯特“泰晤士週報”在1872年7月20日關於這點所寫的报道：

“我們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個良好的後果：把公眾注意轉移到對一切衛生法的顯然嘲弄上，那里的人們當著城市官吏和市衛生委員會的面忍受這種嘲弄已經很久了。本報昨天刊載的一篇犀利的文章，還沒有充分揭露出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魯克街幾處地下室的可恥狀態。仔細調查了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們有權證實其中所引用的一切消息，並聲明說：這個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應該封閉了；更確切些說，它們本來就不應當作為人們的住宅。在查理街和布魯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在這些房屋上面，布魯克街最低處的鐵道高架橋下，行人每天來來往往，決不會料想到在他腳下深深的洞穴中還住著稱為人的生物。這個大院是公眾看不到的，能接近它的只是那些迫於貧窮不得不在其墓塚似的幽閉環境中找尋棲息之所的人。甚至在被堤岸所擋住的通常停滯不動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過它的平常水位的時候，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過只高出水面幾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嘔吐的髒水溢出來，把有毒的氣體散布到這些住宅中去，這就是每次河水泛濫所留下的紀念……四方大院比布魯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還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從污水坑中溢出來的髒水漲到了屋頂。我們知道這一點，因而料想這個大院會不再住人，或者會有衛生委員會的人在把那發臭氣的牆壁加以洗刷和消毒。可是相反，我們竟看見一個理髮師的地下室中有一个人正在……用鐵鏟把牆角的一大堆腐爛的髒東西鏟到手推車中。這個理髮師的地下室打掃得還算乾淨，他叫我們到更下邊的一些住所去，關於這些住所，他說他如果會寫作的話，就要向報紙投稿，要求把它們封閉起來。這樣我們最後就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健康的、看樣子是愛爾蘭的女子，她正在洗一大堆衣物。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

夫——已經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六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 他們剛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經沒了屋頂，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木片。据这个人讲，他每两月要用石灰把牆壁粉刷一次，才能使这个房子沒有不可忍受的臭气…… 在我們的記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見有三个房子，后牆紧靠着剛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个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钟之后也一定会嘔吐起来…… 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們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說，如那个妇女所立刻改口說的，他們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弄得不断嘔吐。星期六他們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們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連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沒有工錢。这个大院和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內的居民，給予人們一个簡直无可奈何的印象。此外，我們必須指出：根据我們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許多地方的一个复本——也許是稍微夸大的复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們的卫生委员会是应負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是允許住人，那末，卫生委员会所負責任的严重性，以及威胁邻近地区的傳染病的危險性，就簡直不用說了。”

这就是資產階級实际上解决住宅問題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錮我們的工人的这些傳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經濟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們，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們。当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問題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劳动資料。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一

在“人民國家報”第86號上，阿·米爾柏格宣稱他就是我在該報第51號和以下各號中^①批判過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對我大加責難，同時把所談到的一切觀點大肆歪曲，以致我不論是否願意都必須予以答復。雖然很遺憾我的反駁大部分只是涉及米爾柏格給我劃定的個人論爭的範圍，但是我們將竭力使自己的反駁具有一般的意義，即把主要的論點再次加以發揮，而且儘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儘管米爾柏格又會責難我說這一切“其實不論對他或對‘人民國家報’其他讀者說來都不包含任何新的東西”。

米爾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內容。說到形式，只要這樣反駁就夠了；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論文出自誰的手筆。因此，根本談不到對於作者有什麼個人“成見”；不過對於這些論文中所闡述的解決住宅問題的办法，我當然是有“成見”的，因為我早已從蒲魯東那裏知道了這個解决办法，並且對這個办法的看法是確定不移的了。

關於我的批判的“語調”，我不想同朋友米爾柏格爭論。像我這樣參加運動很久的人，皮膚已經厚得不怕什麼攻擊了，所以很容

^① 見本卷第233—259頁。——編者注

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感到满意，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表皮（即最上面一层皮肤）的敏感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点特别感到冤屈，他断言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才好；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这里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就连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完全不公平的：

“一个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理论，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在二十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那里“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所谓蒲鲁东“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硬给加上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Organisation des forces économiques, Liquidation sociale [组织经济力量、社会清算] 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体现者”，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谈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消除百病的万应灵丹仅仅作为被巴枯宁弄得更糟糕的变种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

国，蒲魯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則根本不願理会蒲魯东提出的那些以 Liquidation sociale 和 Organisation des forces économiques 聞名的社会改良方案。順便說說，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經有过表現。虽然蒲魯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魯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組織經濟力量的嘗試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則，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廢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罰款、沒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給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魯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魯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絕沒收法兰西銀行，而这却是公社复灭的一部分原因。所謂布朗基主义者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們企图由純政治革命家轉变为具有一定綱領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別——如那些流亡到倫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²⁴⁶ 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們就不是宣告蒲魯东的拯救社会計劃的“原則”，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階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动，必須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廢除階級并和階級一起廢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經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魯东这一点做出結論說，德国人对于罗曼語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的运动缺乏理解，那末就請他为证明这个結論而举出一种哪怕同德国人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內战的宣言那样正确理解和描写了公社的著作相近似的罗曼語的著作吧。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魯东的“原則”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

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²⁴⁷。

如果我认为罗曼語地区的工人在二十年內只是从蒲魯东那里才直接或間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末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則”的蒲魯东的改良药方在那里占有完全神秘的統治，而是在于他們对現存社会的經濟批判受了完全謬誤的蒲魯东观点的傳染，他們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魯东主义的影响敗坏了。至于問到究竟是誰“更久地停留在革命中”，是“蒲魯东主义化的罗曼語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無論如何要比罗曼人理解自己的蒲魯东好得不知多少的德国工人，那末我們只有知道了“停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問題。我們曾經听說过某些人“停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寵中”等等。但是岂能“停留”在革命中，即在最富于暴力的运动中！难道“革命”是必須信仰的教条般的宗教嗎？

其次，米尔柏格責难我，說尽管他文章中說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說他宣称住宅問題仅仅是有关工人的問題。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一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不可寬恕的，因为这是表明他的論文的全部傾向的最具特征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这样說：

“由于人們常常对我們提出可笑的責难，說我們实行階級政策，力求实现階級統治等等，因此我們首先要強調說：住宅問題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階級的問題，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間等級，小手工业者、小資產階級、全部官僚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住宅問題正是社会改良办法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在无产階級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等階級的利益之間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在租賃住宅的压迫的桎梏下，各中等階級所受

的痛苦同无产階級一样厉害，也許还更厉害些…… 現在社会中各中等階級本身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具有充分力量……与年青力壮、精力充沛的工人政党結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結果将首先为他們所享受。”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指出了如下几点：

(1)“我們”不实行“階級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階級統治”。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階級政策”，即工人階級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統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爭得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統治，即“階級統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階級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階級政策，把无产階級組織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階級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于无产階級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

(2)住宅問題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真正的中等階級”由于住宅缺乏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階級“一样厉害，也許还更厉害些”。誰要是宣称小資產階級——哪怕仅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階級也許还更厉害些”，那末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中間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了。因此，米尔柏格实在沒有理由抱怨我說的如下一段話：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别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魯东所屬的那个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专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国的蒲魯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問題，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們已經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問

題。”^①

(3)在“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果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等阶级所“享受”，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受”。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在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正当合理了。而这种主张两种观点权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米尔柏格的做法前后是完全一贯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25页上²⁴⁸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因为小生产按其本质来说就结合着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并且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而没有对个人发展能力作任何的限制”；而且他责难现代工业，特别是责难它破坏这个培养正常人的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自觉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眼光投向哪里去的人”。可见，小资产者在米尔柏格看来是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在米尔柏格看来则是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

^① 見本卷第240頁。——編者注

沒有必要進一步證明蒲魯東的改良計劃的目的是要把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了。同樣也沒有必要去詳談小資產階級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間的所謂的同一性。必須講的一切，都已經在“共產主義宣言”中講過了（1872年萊比錫版第12頁和第21頁）²⁴⁹。

總之，我們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在“關於小資產者蒲魯東的神話”旁邊，出現了關於小資產者米爾柏格的真事。

二

現在我們就來談主要點。我曾指責米爾柏格的文章按蒲魯東的方式歪曲了經濟關係，把它翻譯成了法律術語。我舉出了米爾柏格下列論點作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一種永恆的法權理由來獲取一部分的社會勞動，儘管這房屋的实际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餘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築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原先的費用就由於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補償。”

米爾柏格對這點發出了如下的怨言：

“這樣簡單冷靜陳述的事實，竟成為恩格斯規誡我的借口，說我本來應該說明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法權理由’的——可是這完全不在我的任務範圍以內…… 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隨着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應當滲透着法權觀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現代社會本身，在這個社會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權觀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權觀念，——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我們首先來談談這所一旦建造起來的房屋吧。這所房屋出租以後，就以房租形式給建造人帶來地租、修繕費以及建築時所投資

本的利息，其中包括建筑資本的利潤。按照情况的不同，陸續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費用的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朋友米尔柏格，这就是“簡單冷靜地陈述”具有經濟性质的“事实”；如果我們想知道怎么“結果就是”这个事实存在着，我們就必須在經濟方面进行研究。我們且把这个事实更仔細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个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誤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互相差異的地方，就中还在于消費它們所需要的时间的不同。一个大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褲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比方說要一百年才住得坏。因此，对消耗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把使用价值零星出卖，每次有一定的期限，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漸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預付的資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潤立刻收回，就要借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和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而是由政治經濟学的規律决定的。在一百年終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們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以及地租在这个期間的若干提高数额，（2）日常修繕費用，——那末我們就会发现，余数平均起来是由下列各項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資本，（2）建筑資本的利潤，以及（3）逐漸收回的資本和利潤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間終了之后，承租人並沒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沒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屬於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經不是房屋了。如果房屋在这个期間“原先的費用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末我們將看到，这全是由于地租的上漲；在像倫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誰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两个人。租金

的这种巨大增加，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①，而絕不是发生在乡下某个地方，因为在那里建筑地皮上的地租几乎是始終不变的。大家知道，扣除了地租的上漲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資本（包括利潤在內）的7%，并且还得从中开銷修繕費等等。一句話，租賃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論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劳动力的买卖才是一个例外；在實踐上，这个租賃合同是作为資產階級千百种欺詐形式之一出現于工人面前，关于这些欺詐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頁^②上已經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个形式也受一定的經濟規律的調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賃合同无非是純粹的“任意行为”（見他的著作第19頁），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說：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經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經濟研究，都不会使我們把廢除租賃住宅变为“在革命思想內部产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尙的意向之一”。为了达到这点，我們必須把这个簡單的事实从冷靜的政治經濟学領域中轉移到在意識形态方面高級得多的法学領域中去。“房屋是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結果就是”，房屋的价值能以房租的形式得到二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怎么“結果就是”这样的，“法权理由”对我們沒有絲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說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法权理由之后，才能知道怎么“結果就是”这样。只有当我们像我那样研究了房租的經濟本质，而不是对統治階級用来批准房租的法律術語表示憤慨的时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是“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中”。——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238—240頁。——編者注

候，我們才能知道这点。誰要提議采取經濟措施来廢除房租，誰就应当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說它是“承租人偿付給資本的永恒权利的貢賦”。对于这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完全不是永恒的房屋就变成了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了。不管它“結果就是”怎样，我們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法权理由，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譯成法律術語，我們便順利地远远离开了經濟学領域，所以我們只看到这样一个現象，即房租的总額逐漸能偿付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們用法学来思想和談話，那末对这个現象我們也只要用法权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現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权观念”——不論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相符合的，因而法权理由也就是完全要不得的。其次，我們又发现，这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資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們就有理由把这几种所有权从其他各种所有权里划分出来，并且加以特別的考察。这种特別的考察就要求：（1）剝夺所有者廢除合同的权利，即剝夺他索回自己財產的权利，（2）把租借給承租人、債務人或租佃人但并不屬於他的財物的使用权无偿地让渡給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偿清財產而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們就說尽了蒲魯东在这方面的“原則”。这就是蒲魯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說說：十分显然，这整个改良計劃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資產者和小农，因为它巩固着他們作为小資產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据米尔柏格看来，神話式的“小資產者蒲魯东”这个形象在这里就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触知的历史现实性了。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說社会的經濟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現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方面得到滿足。米尔柏格要求社会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院执行吏来命令我偿还一笔債務，那末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債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則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間的主要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們描述——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与米尔柏格的說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說明这一事物，——我們描述經濟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經濟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資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則要求現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經濟发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規定（“法权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我們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說教和哀訴。

“革命的法权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測。誠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奇怪的錯誤，把1789—1794年的資產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談。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要举1868年出版的“革

命的总观念”²⁵⁰ 第39—40頁做例子就够了。但是，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魯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魯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权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①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但是，不论蒲魯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永恒公平’来说明现存的不公平的状况，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样，期望诉诸这个公平来改善这些状况。”

米尔柏格大概以为“蒲魯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道”吧。蒲魯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②，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²⁵¹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²⁵²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表现着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頁）：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則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嗎？……这个原則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創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曾是虚无。它将来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一切。”

① 意即极度的黑暗，語出旧約“出埃及記”第10章。——譯者注

②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而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条件和理論的、哲学的、宗教的原理”。——編者注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統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則的公平，这个虽然如此而至今都是虛无但将来应是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不是在任何冲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那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正是断言，蒲魯东在判断一切經濟关系时不是依据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經濟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从而掩飾自己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嗎？既然米尔柏格要求“現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都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公平要求来实行”，那末他与蒲魯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閱讀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說：

“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經濟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这一点蒲魯东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权观念只是經濟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現、反映和产物…… 总之，法权在蒲魯东看来是历史上形成的經濟产物。”

如果蒲魯东对这一切“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我且不管米尔柏格的含糊說法，就算他的善良願望是事实），那末我們还爭論什么呢？但是問題正在于，蒲魯东的知識实际上不完全是这回事。每一个社会的經濟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現出来。而在剛才引证过的蒲魯东的主要著作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統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其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繼續說：

“……蒲魯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經濟法权观念，同拉薩尔在其‘既得权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战争与和平”²⁵³ 可以說是蒲魯东的許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沒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魯东似乎領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經濟生活条件來說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这部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精神，以至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对于战争的見解：

“但是，为我們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1869年版第2卷第100頁)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識，这从它竟相信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費勁地就滿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饒而宁靜的时代。”(同上，第102頁)

蒲魯东的經濟观点是最粗糙的馬尔薩斯主义的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頁)

那末，这本书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一口咬定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还是“貧困”(例如，第143頁)。布雷济希大叔曾經也是同样巧妙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1848年的演說中郑重地发表过“大貧穷的原因就是大pauvreté〔貧乏〕”的偉論。

拉薩尔的“既得权体系”²⁵⁴ 一书不仅陷于法学家的全部幻想中，而且还陷于老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幻想中。拉薩尔在序言第VII

頁上明确地宣称：“在經濟方面，既得权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繼續向前发展的出发点”；他想证明：“法权是一个从自身以內（这就是說不是从經濟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 XI 頁）；在拉薩尔看来，任务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經濟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第 XII 頁）。然而这部书在这里有什么相干呢？蒲魯东和拉薩尔的差別只在于拉薩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魯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經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魯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見，好像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來說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論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傾向說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論即使偶尔出現也表現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規則概括起来，設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規則首先表現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維護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現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經濟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經濟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內在本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繼續发展的根据。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权起源于他們的經濟生活条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現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

在其进一步发展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相应經濟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統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則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終只是現存經濟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产者階級的公平观則要求廢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魯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說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詞甚至应用于社会現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誤会，可是在关于經濟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們所看到的，这些名詞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現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論的術語会引起的混乱一样。如果人們像蒲魯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謂“公平”原則，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断定說燃素論^①是与氧气論一样正确，則这种混乱就会更加厉害了。

^① 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們为了說明物体能在空气中燃燒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別的燃燒体，即在燃燒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們发现燃燒的簡單物体在燃燒后比燃燒前重，他們就說燃素是具有負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

三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議論叫做反动的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們这个倍受贊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說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現时代的慘状”，那末我当然就不会說出一句坏話来評論“他和他的朴素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慘状”描述为工人“都沒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的結果。不論是抱怨“現时代的慘状”是由于工人对于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被廢除的結果，或者是如容克們所說的那样是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被廢除的結果——在这两种場合，都只能是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正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于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就在于他所設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个工人再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别的。往下他又写道：

“我极其坚决地认定：斗争純粹是为反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只有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出发，才能期望住宅状况的改善。恩格斯絲毫看不出这一点…… 我把社会問題的完全解决当做是着手贖买出租住宅的前提。”

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們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漸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顛倒了。当人們发现燃燒就是燃燒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結合并且已取得了純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經過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說打破了。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在他的著作第 15 页和第 16 页上）：米尔柏格拿来作为废除出租住宅的前提的，不过是……出租住宅本身。只有在第 17 页上他才“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关于这点我们回头还要讨论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当时问题倒是在于表明怎样从现有情况出发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改造。”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是：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東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耳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己房屋的慈善主义努力，看做唯一可能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那末他自然就不会信仰这个计划了。而且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府提议仿效多耳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赞美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至于就中说到城乡的对立，那末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 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

的其他矛盾上面，看一看這會使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例如：

“至於就中說到”資本家與僱傭工人間的“對立”，“那末想把它消滅就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產生的。問題不是在於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於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這樣才有可能達成和平協議，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均衡”。

這樣一來，我們又到了舒爾采-德里奇那里了。

消滅城鄉對立並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僱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論農業化學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著作中的第一個要求總要人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並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礙了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更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少巨大的建築物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弄臭倫敦全城，——那末你就知道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是具有極實際的基礎了。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魯東那樣想改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持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繫，並使交通工具隨着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說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當有人企圖“從現存關係出發”，預

先規定一种應該借以解决現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取蒲魯东解决住宅問題的公式时,就是在这样做。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认为他对“蒲魯东关于資本和利息的古怪見解”要負一定的責任,因而宣称: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早已規定了的,而調整利息率的过渡法律却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社会周轉即流通关系的…… 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說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廢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硬說是我讲的那样由于取消利息的过渡法律的結果而实现,而是由于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的結果而实现的。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崇拜〈!〉贖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沒收办法,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讀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說过,他的贖买出租住宅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际占有”这些話。不过在第17頁上却說过:

“我們假定,資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馴服了,——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資本利率硬性規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应服从这种法律支配……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从这一方面來說贖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資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

可見,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轉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說,对于資本生产率——他这个含糊的說法显然是指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确实是可以通過廢除利息的法律真的“被握住双角加以馴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贖买出租住宅是根本

消灭資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現在米尔柏格却說，絕對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法律“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流通关系”。碰到这种像歌德所說的“無論对于智者或愚者都同样神秘的”²⁵⁵ 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設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刊印出来的东西“硬說”是他写的。

至于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請教他們在实际占有时將“崇拜贖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沒收办法”，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願什么也不“崇拜”。但是，要知道，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問題根本没有談到，而談的只是米尔柏格断言(第 17 頁)“解决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买这个名詞中”。既然他現在承认这种贖买是极成問題的，那末为什么还要給我們两人和讀者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呢？

不过，必須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魯东主义的“贖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將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則“劳动人民”將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給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轉交給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

一般說来，問題并不在于无产階級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簡單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漸地贖买这些財產。企图預先回答和針對一

切可能場合来回答这个問題，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願让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費这样多的笔墨紙張，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附带条件和遁詞，終於达到米尔柏格在自己的答复中竭力避免涉及的問題的要点。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了些什么肯定見解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的原来費用同它的現今价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於社会。用經濟学术語來說，这种差額就是地租。蒲魯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点我們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頁中可以讀到。

第二，住宅問題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每个承租人都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

第三，这种解决办法应借一种規定把支付房租变为支付住宅买价的法律来实行。——第二第三两点都是从蒲魯东那里抄襲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頁及以下各頁中看出这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頁中甚至还有完全編好了的有关的法律草案。

第四，借一种过渡法律把資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馴服，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后还要繼續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魯东那里抄襲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頁中可以詳細地讀到这点。

关于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抄本所依据的蒲魯东原书的段落。現在我要問：我是否有权把一篇貫穿着蒲魯

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一篇除了蒲魯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魯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見蒲魯东所特有的某些說法”就称他为蒲魯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說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內容則是蒲魯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魯东的話来补充蒲魯东主义的論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說我把蒲魯东的“古怪观点”悄悄加到他头上了！

那末我对这个蒲魯东主义計劃提出了什么反駁意見呢？

第一，把地租轉交給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土地所有权。

第二，贖买出租住宅并把住宅所有权轉交給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現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議这样做是既荒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步。

第四，强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会侵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而又不能实现的办法。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資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現在已經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駁。而这恰好是正在爭論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答复并不是反駁；他极小心地迴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經济学方面的問題；这个答复不过是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他埋怨我預料到了他对其他問題如国家債務、私人債務、信用問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且說他对这些問題的解决办法到处都会是像在住宅問題方面一样，即廢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轉变为清偿資本，宣布实行无息信用。虽然如此，我現在仍願意打賭說，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公布于世，它們的內容本质上将与蒲魯东的

“总观念”（信用——第 182 頁，国家債務——第 186 頁，私人債務——第 196 頁）相符合，正如他的关于住宅問題的文章与我从同一书中所引证的各段相符合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教导我說：这些問題，——即捐稅、国家債務、私人債務和信用問題，加上公社自治問題——对于农民和乡村宣傳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表示同意，但是，（1）我們直到現在並沒有談到过农民，（2）蒲魯东对于这些問題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于住宅問題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經濟学上是荒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資產階級的。米尔柏格暗示說我不认为必須吸引农民加入运动，对于这一点我无須为自己辯白。但是，企图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魯东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魯东的理論，所有这些田庄都應該分割成为細小农戶，这种办法在現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經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經驗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相反，現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將給我們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組合工作者經營大規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規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現代輔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組合原則的大規模經濟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²⁵⁶

至于責备我似乎把現代工人住宅的慘状看做“没有什么意义的瑣事”，我也同样无須为自己辯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把这种慘状按其在英国那样典型发展了的形式描写出来的人，而这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說的那样是因为它們“損伤了我的法权威”，——誰要是想把一切損伤自己法权威的事情都写成文章，那他就不胜勞碌了，——而是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²⁵⁷中所指出的那

样，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来给当时刚产生的徒托空言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不想从事解决那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而且有足够的房屋使现在就有可能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复，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过了，他首先用了 28 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贖买这个名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开始迷乱地唠叨：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究竟将崇拜贖买办法”或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这其实还是很成问题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实际关系”时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那他也可能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系。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见的又是什么呢？看见了整整两个论点，即：

(1) “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前面，在单行本第6页^①中，已经证明这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则对此根本无言可驳……

(2) “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就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所谓的**资本生产率**，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一切压迫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必须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握。全部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却能神妙地在地面上建造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绝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说乱扯的人，竟敢以向德国工人指示新的更好的途径为己任，并且自命为“至少大体明白将来社会结构的建筑师”！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他用了25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关系，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到处都包含有种种在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认为这还不够。这一切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著作丝毫没有告诉他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可是却给予了他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

^① 見本卷第240—241頁。——編者注

現成的拯救社会計劃，把这个蒲魯东体系奉送給德国工人，借口說他想“拋棄体系”，而說我則“选定了相反的途徑”！要理解这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聾子，我們彼此根本讲不通。

够了。这场論战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益处，無論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們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禍害的实际建議，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無論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現的宗派創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魯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認識：再沒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預先虛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場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認識。对具有这种認識的工人阶级說来，要在每个具体場合决定應該反对哪些社会机构，以及應該怎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無論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

卡·馬克思 致“泰晤士报”編輯

閣下：

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題为“卡尔·馬克思和国际”的短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短評硬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建議各联合会和支部自己提出全权代表候选人以报請总委员会批准的时候，曾宣布：

“把精确的副本同时寄給倫敦的卡尔·馬克思是极其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說，只有在倫敦的卡尔·馬克思认为可以接受的并經他贊同的人才能获得全权。不言而喻，既然这些代理人将同他保持經常的联系，所以实际上运动的领导者将只是他一个人”。

这里提到的这个通告²⁵⁸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在12月25日萊比錫“人民国家报”上。該通告建議德国的协会会员把他們的建議的副本寄給前德国通訊書記(即我本人)以鉴别文件的真偽。很明显，新的总委员会既不了解这些人本身，也不認識他們的笔迹。紐約总委员会认为，要我在這個問題上起这样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們甚至沒有預先通知我。至于在那些国际的自由組織遭到立法方面阻碍的国家里的“代理人”，我同证明他們的身分的事情沒有任何关系。

短評接着說：

“在法国这些代理人把不听他們的話的會員开除出去，并擅自解散支部、委员会和联合会。”

貴报通訊員必須說明，在这些“代理人”中連一个还没有被任命的时候，他們怎么能干出这些駭人听聞的事情来呢。在法国有些人果真被开除出国际了，但是这是由各地方支部开除的，而决不是由紐約总委员会开除的。

閣下，我仍然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

1月2日

載于1873年1月3日“泰晤士报”
第2757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泰晤士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普魯士“危机”

的确，法兰西这个“偉大民族”被德意志这个“偉大民族”公正地排挤到次要地位去了。凡尔赛发生了政治危机，因为法国的頑固的容克地主图謀以君主制来代替現存的共和制；而这时在柏林也爆发了危机，因为普魯士的頑固的容克地主不願牺牲他們在法国革命过了 80 年以后仍然保存着的旧封建地主警察制度。現在还能怀疑德国的“文化”比法国的文明优越嗎？法国人以他們通常所抱的輕率态度吵吵嚷嚷地爭論空洞的**形式**：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严肃认真的普魯士人穷根究底，终于在 1872 年最后在欧洲（如果不算梅克倫堡和俄国）解决了这个問題：即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的脊背是否能够免受地主鞭笞的問題！

要說明普魯士資產階級的可鄙行为，沒有比这出頒布专区法²⁵⁹的鬧剧更好的事实了。1848 年在普魯士发生了革命；政权落入資產階級手中；只要軍隊宣誓效忠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資產階級就能保持住政权。封建主和官僚已經害怕得要命，以为当时消灭还保存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殘余是不言而喻的了。事实上，1848 年宪法，甚至 1849 年宪法的初步草案，虽然用的是普通的鄙陋的形式，但是已經包含了这方面的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資產階級只要稍微反抗一下就会使封建权利不可能得到恢复。除

了少数頑固的容克地主或者再添上一个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再也沒有人对恢复封建权利感兴趣了。然而欧洲反动派刚一获得胜利，普魯士资产阶级便馬上匍匐在曼托伊費尔脚下，用搖尾乞怜的感激姿态来报答他的鞭子的每一次抽打。资产阶级不仅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恢复了世襲領地的警察制度和其他的一切封建廢物，甚至还自己懲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的自由主义，亲手廢除了在1808年确定的工业自由并且在十九世紀中叶恢复了行会制度²⁶⁰。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沒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紀的英国和十八世紀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輝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爭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爭得的。就在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为了摆脱六月日子的恐怖曾拜倒在伪善者的脚下。就在这个英国，1848年以后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反动派都在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免受无产阶级的侵害的借口下进行活动。在普魯士，由于革命的结果，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中世紀的宿願才终于得到了滿足，这是因为胜利了的反动派取消了很多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到施泰因和哈登堡这段期間偷偷渗入普魯士国家的反浪漫主义的設施。在保护资产阶级社会免受无产阶级侵害的借口下，使这个社会重新受封建主义的統治。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都不会拿諸如在曼托伊費尔当政时普魯士资产阶级所经历的那个可耻的时期来夸耀。在别的哪个国家中又能把辛凱尔迪当做自由的保卫者和殉道者来崇拜呢？²⁶¹

最后，由于复杂的宮廷傾軋，一个新紀元来到了²⁶²。旧自由主义內閣出人意外地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这个在使旧自由主义內

閣产生方面沒有尽一点力的資產階級，这个世界上最胆怯的資產階級突然設想，它已經执掌政权了，旧普魯士軍事警察国家已經消失了，它已經能够任免大臣并且对宫廷发号施令了。如果說曼托伊費尔时期表明了它的怯懦，那末新紀元則暴露了它政治上的无能。

成立旧自由主义內閣的代价是改組軍隊。意大利战争²⁶³造成了向議會提出这项要求的很好的借口。一方面，1859年的动員表明，軍隊的旧編制已完全过时了。另一方面，并吞薩瓦和尼斯在法国所遇到的冷淡反应表明，只有用占領萊茵河的前景，亦即对普魯士作战才能真正煽起法国的沙文主义。因此，非常明显，只要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由于法国的內部事件而重新遭到危險，那末避免这个危險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对普魯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旧普魯士軍隊如果沒有盟軍，就必然会遭到失敗。另一方面，普魯士本身虽然实际上是一个軍事国家，但它沒有創造必要的前提来組織一支現代化的龐大的軍隊。它要做到这点是太沒有力量了。然而，它想要迴避在大陆上已經成为普遍必然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何况它的模稜两可的“行动自由政策”切断了它和別国簽訂多少有点可靠的同盟条約的道路。最后，不管普魯士資產階級如何看待改組軍隊的問題，它应当知道，它是不能阻碍这件事的。因此，对它來說，唯一正确的行动計劃只能是，以同意这个不可避免的改組来为自己換得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好处。但是，这个被曼托伊費尔的皮靴踢得遍体鱗伤至今斑痕犹存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現在却突然变得趾高气揚起来了。它突然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决定力量；它拒絕改組軍隊。于是幻想便破灭了。俾斯麦向它解釋說，它的一紙宪法和議會表决分文不值，統治普魯士

的是国王，而議會只是为了表示同意才存在的。宪法被抛在一边，军队实行了改組，議員們又被按照曼托伊費尔的方式对付了。资产阶级在装模作样地反抗了一阵（这种反抗使它自己比它的对手俾斯麦更快地感到了厌倦）以后，就在丹麦战争²⁶⁴中为謀求可耻的和解找到了第一个借口；在薩多瓦会战²⁶⁵以后，它更洋洋得意地匍匐在俾斯麦的脚下而不以为耻，从那时起它就只以俾斯麦的僕从的姿态出现了；在法国战争²⁶⁶之后，它更是欢喜若狂，从那时起它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俾斯麦了，它完全和俾斯麦融为一体了。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认为“历史的諷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諷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魯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魯士政策的渴望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魯士国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旧普魯士所依靠的实质上是容克地主阶级，军官和官僚主要也是从这个阶级的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容克地主阶级现在只有在东部的六个省内仍然处于全盛时代，在容克地主的地产大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若干封建特权；没有这些特权，大多数容克地主很快就会降到一般地主的水准。只要同容克地主相对立的还只是西部的两个省，它就不会感到有任何危险的威胁。但是，1866年的兼并²⁶⁷已经极大地加强了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引起施塔尔-格尔拉赫派²⁶⁸反抗这种兼并的并不是正統派的胡言乱語，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自己受到的威胁有了正确的了解。许多小邦的加入北德意志联邦²⁶⁹，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交给这个联邦，从而使普魯士貴族院变成附庸，以及南德意志各邦的最后归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中人数愈来愈少的容克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到現存的种种条件，否則它就要招致灭亡。普魯士可以使小德意志听命于它，但它不能把自己的容克地主阶级强加于居住在易北河以西的 2 500 万德国人。相反，旧普魯士所需要的容克地主阶级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累赘。正如俾斯麦不得不違反自己原来的观点而实行工业自由、准許德国各邦間的迁徙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性改革一样，——自然，是被官僚主义弄得不倫不类的改革，——俾斯麦这个 *par excellence* [道地的] 容克地主也被历史的諷刺所注定要用专区法来彻底鏟除容克地主阶级。

这个专区法是以往頒布过的最可怜的法令之一。它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話来说明。它廢除单个容克地主由于封建特权而享有的权力，以便在实行专区自治的幌子下把这个权力归还給容克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仍将在东部各省的农业区占統治地位；容克地主阶级的权力甚至还会由于至今一直屬於国家的权力轉入它的手中而增长起来。但是单个的容克地主却丧失了他作为封建老爷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它降到現代的一般大地主的水平，而不再是容克地主了。但是，这样一来旧普魯士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因此貴族院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反对专区法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专区法的实施容克地主阶级就要灭亡，而沒有容克地主阶级也就不会有特殊的普魯士了。

普魯士资产阶级在这件事情上不愧为普魯士资产阶级。起初說，专区法只是走向自治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必須走的，因为当时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据說，这是和政府的妥协，不过以后再也不能作絲毫让步了。貴族院否决了专区法。政府虽然已經和众議院签订了妥协性的协定，但是又要求众議院再作让步。众議

院的确是够勇敢的，它无条件地同意了；为此答应册封大批資產階級为新貴族和改革貴族院。册封新貴族这件事实现了：有 25 名將軍和官僚晋升为貴族；貴族院接納了他們。妥协得救了。但是……貴族院的改革却擱淺了。然而，人們安慰自己說，专区法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但突然傳来了內閣危机的消息。罗昂、澤耳霍夫、伊岑普利茨想辞职；自由派在全綫获得了胜利；自由派內閣已經不可避免了嗎？不，决不是，**联合內閣**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資產者多么知足啊！甚至比这更少的东西也能使他們滿足。俾斯麦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专区法的反对者罗昂接替了他的职位，参加內閣的还有一个將軍，澤耳霍夫和伊岑普利茨仍留原任，联合內閣原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联合，在这个內閣里封建分子加强了，而資產者还若无其事地喝它的啤酒，因为他高傲地意識到，归根到底俾斯麦依然是一切的灵魂。

这个例子清楚地說明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立場。俾斯麦使普魯士所处的那种历史地位，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迫使俾斯麦去做一些普魯士資產階級在 1848—1850 年由于胆怯而沒有敢做的那些事情，普魯士資產階級則把这看做是它自己的功劳。它甚至沒有胆量去迫使自己的俾斯麦简单地用公开的資產階級方式来实行这些小小的改革，而不要經過警察国家的歪曲。它为俾斯麦現在被迫閹割它自己在 1846 年提出的那些要求²⁷⁰ 而欢呼；不过应当看到，这仅仅是一些經濟方面的要求，即使有一千个俾斯麦想阻止这些要求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关于把政权轉交給資產階級的問題，如果說現在还在談論它的話，那也仅仅是为了面子而已。普魯士資產階級不想要政权；就像远在伏尔泰时期的官方俄国一样，尙未成熟就已腐朽了的普魯士資

产阶级，还没当政就已经堕落到法国资产阶级经过 80 年斗争和长期统治之后所达到的那种退化的地步。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和娱乐! ——堕落的罗马平民曾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panem et circenses! ——投机利润和穷奢极侈! ——普鲁士资产阶级而不是普鲁士人民则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罗马的平民同他们的皇帝一起被日耳曼的野蛮人消灭了；而在普鲁士资产者的背后德国工人正在巍然奋起。

弗·恩格斯写于 1873 年 1 月初

载于 1873 年 1 月 15 日“人民国家报”第 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馬克思

对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
所謂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²⁷¹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謂多数派的新通告似乎是用来答复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两个呼吁书^①的。其实，它并没有駁倒这两个呼吁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点。它只是企图用人身攻击、誹謗和撒謊来蒙蔽讀到通告的人，以为不久前成立的那些支部一定不大了解国际的历史。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在通告上署名的六个执行委员会委員中有两个——荣克先生和佩普先生——在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已不再享有 *locus standi* [合法地位] 了。他們当过代表：前者是密德尔斯布罗的代表，后者是諾定昂的代表，然而这两个支部中一个支部已經取消了它的委托书，而另一个支部則一致否決了这个通告。我們只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个文件的論断是多么无耻。

关于所謂“正式报告”，該文件說：

“虽然呼吁书中也談到了海牙代表大会的‘64’名代表，但是在报告中根本没有列举他們的名字。”

① 見本卷第 220—231 頁。——編者注

这里所說的“报告”不过是指正式出版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²⁷² 在正式出版的決議中列举代表的名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名字已經在海牙公布并为大陆上的大多数报纸（包括国际的机关报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在内）所轉載。此外，关于每次表决的情形，报告列举了投票的人数，凡是票数分散的地方还列举了投票人的姓名。

“一些決議沒有提到或者被篡改了。例如，关于向总委员会繳納会費的決議要求把协会，包括工联在内的每个会员每年向总委员会繳納的会費提高到1先令。”

正式报告第二点——标题是“应向总委员会繳納的会費”——中写道：由于收到了各种要求，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会費，另一方面，有人要求减少，代表大会以17票贊成、12票反对、8票棄权决定保持1辨士的会費不变。^① 这里究竟隱瞞了什么东西呢？

至于說“篡改”決議，那末报告中的決議哪怕有一个地方和記錄不完全一致，就讓他們大胆地指出来吧。

另一方面，这个通告的作者們对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決議所下的断語表明，他們自己在“篡改”方面多么內行。首先，关于“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偉大使命”这句话是一字不漏地从国际成立宣言（1864）中搬到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九項決議中去的，而他們却声明說，这句话是海牙代表大会杜撰的。

第二，通告的作者們断言，把法文«doit servir»譯成英文«ought to serve»〔“应当成为”〕是錯誤的。如果这里真搞錯了的話，那末这是前总委员会在把代表會議的決議由法文原文正式譯成英文本

① 見本卷第168頁。——編者注

时造成的。但是，这里并没有错误。看来，通告的作者们的英文和法文都不怎么高明，所以我们不得不介绍他们去查一查任何一本英法辞典，例如，“布瓦耶英法辞典。1854年巴黎博德里出版社版”，在那里对《*ought*》一词的解释是《*Ought to be so—cela doit être ainsi*》〔“应当如此”〕。

为了推翻关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麦、波兰和瑞士完全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一论断，约翰·黑尔斯在通告中要求把这些国家的书记的通讯处告诉他。关于德国，他只要看一看“人民国家报”和半打其他的工人报纸就够了；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意志报”²⁷³；关于葡萄牙，可以看一看“社会思想报”；关于丹麦，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者报”；关于西班牙，可以看一看“解放报”；关于荷兰，可以看一看“工人报”；关于意大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报”；关于瑞士，可以看一看“平等报”和“哨兵报”；²⁷⁴至于美国，那里现在仅有的一个工人联合会，在去年把现在成了总委员会委员的那些人选入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至于波兰和法国，当然不能把相应的通讯员的地址告诉像约翰·黑尔斯之流的人。

关于分裂运动的“自发”性质，只要提一提下述事实就够了：去年9月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同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在各地组织这个运动的正式决议，“立即与各个”对分裂抱好感的“支部和联合会达成协议”，以便有可能“至迟在6个月内”召开分裂分子的“国际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写于1873年1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3年1月25日“国际先驱报”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第43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²⁷⁵

“工人階級不應該組織成为政党；他們不應該以任何借口过問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触的！工人不應該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提高工資或者阻止工資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階級的永恒原則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階級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爭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触的。因此，應該拒絕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經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工人不應該努力去爭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對他們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剝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剝削而已。他們也不應該浪费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从立法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孩的剝削。他們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則的純洁性的新妥协！”

“工人更不應該爭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編制預算的国家負責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讀、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則，即使愚昧无知

和每天 16 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他们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僕,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了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

末工人階級就要叫他們滾蛋；工人階級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資產階級空談家和腐化墮落的貴族對他們的侮辱。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說，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階級使用一切現實的鬥爭手段，因為這種鬥爭手段必須從現代社會中索取，因為這個鬥爭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這些社會科學博士們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階級的运动現在已經十分强大，以致這些慈善的宗派主義者在經濟鬥爭方面不敢再重复他們在政治鬥爭方面所不断宣揚的那些偉大真理了。他們太胆怯了，不敢把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他們援引老傳統、正直、誠摯和永恒原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脫。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門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为一个战斗的階級，所以他們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譴責工人階級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們不應該否棄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学家不能否棄他們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們就應該努力無論如何不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些錯誤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在英国已經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魯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論的人中間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題为“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現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²⁷⁶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論述工人想通过他們目前的鬥爭来爭取

的一切局部改善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評了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經濟运动；他譴責了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時間、調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进一步尖銳化。

现在来談談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魯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論——互助論相矛盾的任何經濟运动(如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經濟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駁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詭辯^①。但是在1864年，当奧利維耶法（誠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範圍內給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魯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問世的。

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資產階級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倫敦裁縫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贊賞地譯載了蒲魯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說过的話来斥責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夫-德-紀埃的采煤工人宣布了罢工；为了使他們头脑清醒，給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魯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夫-德-紀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权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是，它是像羅馬人布魯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魯土斯不得不在父愛和自己执政官的職責之間作出选择：必須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便拯救共

^① 見“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一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277。

和國。布魯士斯沒有動搖，而且他的后代也不敢譴責他。”^①

沒有一個工人想得起，有哪個資本家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工人的時候曾經動搖過。這些資產者算是什么布魯士斯！

“因此，——沒有聯合的權利，就像沒有欺騙和盜竊的權利，沒有血親相奸和私通的權利一樣。”^②

但是，必須承認，大概會有愚蠢的權利。

為了永恒原則，這位老師發出毫無意義的詛咒，這些永恒原則究竟是些什麼貨色呢？

第一條永恒原則：

“工資數額決定商品價格。”

即使誰對政治經濟學一無所知，並且不知道偉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²⁷⁹ 中已經一勞永逸地駁倒了這個傳統的錯誤，他也会知道英國工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它能以低於其他任何國家的工業品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國的工資卻相對地高於歐洲其他任何國家。

第二條永恒原則：

“准許聯合的法律是極端反法學和反經濟學的，是同任何社會和秩序相矛盾的。”

總之，它是“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相矛盾的”。

如果這位老師不是一個嚴重的 chauvin [沙文主義者]，他会

^① 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 1868 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²⁷⁸ 第 327 頁。

^② 同上，第 333 頁。

自問，在英國，早在四十年前就頒布了一項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極其矛盾的法律，這該如何解釋；為什麼隨着工業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競爭的發展，這個同一切社會和制度極其矛盾的法律，甚至連各個資產階級國家本身也被迫把它當做是某種必要的東西加以採納。如果這樣，他也許會發現，這種眾所周知的權利（大寫的權利）只存在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無知兄弟們所寫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在這些教科書中也可以找到下面這些瓊珠般的經濟學詞句：財產是勞動成果……但是他們忘記了加上他人的這幾個字。

第三條永恒原則：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階級擺脫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個公民階級，即老板、企業主、僱主和資產者的階級；他們煽動工人民主派鄙視和仇恨這些不體面的中等階級的代表；他們寧肯要商業戰爭和工業戰爭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寧肯要階級鬥爭而不要國家警察。”^①

為了阻礙工人階級擺脫他們的那種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這位老師譴責使工人階級組織成同僱主、企業主、資產者這類可敬的人相敵對的階級的聯盟，這類人當然和蒲魯東一樣，寧肯要國家警察而不要階級鬥爭。為了使這個可敬的階級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魯東在互助論王國到來以前，向工人推薦“自由或競爭”，認為它（儘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為“我們的唯一保障”。^②

老師宣揚經濟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自由，或者資產階級的競爭——我們的唯一保障。學生們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資產階級的自由——他們的唯一保障。如果說也曾宣揚政治

① 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頁。

② 同上，第334頁。

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經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們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則根本不相信，他們的永恒原則使他們必須放棄世間的欢乐和資產階級社会的暫時特权。但是必須承认，他們会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 14 小时或 16 小时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工厂工人承担的！

1873 年 1 月于倫敦

卡·馬克思写

1873 年 12 月載于“1874 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1874 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弗·恩格斯 論 权威²⁸⁰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軍征討，来反对他們称之为权威原則的东西。他們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給它定罪了。这种簡單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須比較詳細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这里所說的权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强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說法都不好听，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問題：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創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沒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現代資產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經濟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們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們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趨勢。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龐大工厂的現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馬車和貨运馬車已被铁路上的火車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却一貫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見，联合活动、互相依賴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

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組織起来，而沒有权威能够組織起来嗎？

我們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現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財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資本家。我們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体財產。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們就来看一看。

就拿紡紗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工序才会成为棉紗，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車間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運轉，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檢修，需要許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車間搬到另一个車間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時間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們首先必須商定劳动時間；而劳动時間一經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車間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要求馬上解决，否則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頓下来。不管这些問題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領導各該劳动部門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別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說，問題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時間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門上写上这样一句話：**进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²⁸¹ 如果說人靠科学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組織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紡紗机

而恢复手紡車。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須依照准确規定的時間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屬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負責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決議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論在哪一种場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現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員工对乘客先生們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論据来反对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赋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們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簡直是开我們的玩笑。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組織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賴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們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

論者仅仅是想說，未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說，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維護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廢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过來說，难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嗎？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观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
10月—1873年3月
1873年12月載于“1874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1874年
共和国年鉴”文集

弗·恩格斯
*关于国际在大陆上
活动情况的报道²⁸²

—

我們从大陆收到了如下消息：

国际在意大利的机关报“人民报”报道說，从来不妨碍各分裂主义支部活动的意大利政府，对承认新总委员会和拥护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洛迪支部展开了一个疯狂的迫害运动。支部被解散了，发布了逮捕委员会全体委員的命令；其中有三个委員已被投入監獄，而其余的六人隱藏起来了。被捕的人中有“人民报”編輯比尼亚米。載有总委员会呼吁书（发表在“国际先驅报”第34号上）²⁸³的那号报纸也以这个理由被沒收了，然而分裂分子的最疯狂的宣言却可以自由地傳播。被捕的人将被控犯有叛国罪而出庭受审。

我們的馬德里“解放报”证实，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分裂活动的反抗正日益加强。这个委员会刚刚决定于12月26日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²⁸⁴，以便接受或拒絕海牙的各项決議，新馬德里联合会就宣布，委员会采取这种行动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队伍之外，并号召各个支部和地方联合会不派代表出席分裂分子的代表大会，而临时选举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²⁸⁵ 列里达、托勒多、

薩拉哥沙、維多利亞、阿耳卡拉-德-埃納雷斯等地方的联合会以及新加迪斯联合会和瓦倫西亞、德尼亞、龐特-德-維魯馬拉和其他地方的有影响的支部已經同意这个建議。此外，格腊西阿（巴塞羅納城郊工厂区）联合会表示拥护海牙的各项決議并譴責西班牙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而格拉納達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出席哥多瓦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但是为此目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决反对分裂的人。²⁸⁶毫無疑問，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哥多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到来。

从葡萄牙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国际組織的工人运动在那里已經达到了罕有的規模。仅仅在里斯本以及邻近的地区就有 15 000 多工人組織在工会中，这个組織还正在向波尔图和北面扩展。所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国际建立的，而且現在仍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然而国际本身，由于該国現行法律的限制，已失去了自由进行組織的可能。国际的“社会思想报”現在能够自己維持自己。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在葡萄牙沒有分裂分子。海牙的各项決議不仅得到一致拥护，而且被热烈地接受了。“思想报”第 25 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說，海牙代表大会是国际建立以来所有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而它的決議則标志着协会在自己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²⁸⁷

从上面所引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前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多数派的活动完全重复了西班牙分裂分子委员会的活动。由此可見，分裂分子無論在英国或西班牙，都是按照同一个計劃进行活动的，而且領導他們的也是同一批阴谋家。可惜，国际在西班牙的許多真正会员这批力量由于参加最近爆发的起义而消耗掉了，这就为分裂分子造成了暫时的优势。²⁸⁸

二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使我们注意到，在西班牙爆发了火车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但是铁路公司正在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招募工人，以便破坏在公司中就业的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²⁸⁹ 我们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它就这件事写一篇评论并把它寄给报馆。这个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委托给它的任务，星期六出版的报纸登载的评论就是证明。为了使英国的火车司机和司炉了解西班牙的罢工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三

我们从大陆上得到的消息非常有意思。

从德国传来了大胜利的消息。国际会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倍倍尔由于在一次演说中说了带有“侮辱性”的话，曾被萨克森法庭判处九个月监狱监禁和剥夺议员的一切权利，但在最近，即1月20日，他又以10 470票对4 420票（政府候选人所得的票数）的多数重新当选。这已经是倍倍尔第三次在自己的选区当选，而且这一次他所得到的选票比过去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多2 500票。这样一来，俾斯麦又不得不和这个唯一敢于在现在的帝国国会中公开反对他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打交道了，不得不和这个唯一使他真正感到恐惧的人打交道了。为了阻止倍倍尔重新当选，用尽了一切办法：恐吓、警察驱散选举会议等等；同倍倍尔竞选的候选人是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他们虽然卖了这样大的力气，但是格劳豪和近郊的工人们几乎每四票中就有三票投给了倍倍尔，而且那儿根本没有什麼赛米尔·摩里在收买选票。

收到了关于在西班牙召开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的更详细的报道。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少数派的代表大会。在包括398个支部的101个地方联合会中，只有41个地方联合会，或者说57个支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可见，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只是由西班牙现有支部中不到六分之一的支部的代表投票通过的。这些数字是从分裂分子的“联盟”报上摘录下来的，它们是无法辩驳的。采取突然的行动和争取少数人投票赞成，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批准，这就是分裂分子到处实行的政策。这又一次证明他们到处都是遵照那些同样的秘密指令进行活动的。

在法国，几乎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大肆逮捕被当做国际会员的人。当然，无法知道协会的真正会员是否已被发现，即使知道了，为了维护被捕者，也不能把这件事公开，因为现在在法国参加国际是要受到惩罚的。现在仅仅知道一点，即在法国几个分裂分子没有遭到迫害。相反地，他们和梯也尔先生的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在贝济埃的一个姓布斯凯的警局督察员就是他们的代表，分裂分子的福音书“汝拉简报”不久前还非常热烈地为他的诚实品行打保票。

四

根据我们从葡萄牙收到的材料来看，葡萄牙联合会得悉在哥多瓦召开的僭称的西班牙代表大会赞成分裂的消息后，立即书面通知忠于国际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说：葡萄牙会员全体一致拥护协会，反对分裂分子；有人企图把秘密同盟拉进他们的队伍；巴枯宁本人曾写信给他们的一个会员，想说服他们支持这个秘密团体，但是联合会全体会员一致决定向巴枯宁表示正式谴责同盟的行动。

这封給新馬德里联合会的信，是書記弗朗薩受各支部代表的委托并以他們的名义写的，他在信上签了名，原信刊載在2月1日馬德里“解放报”上。葡萄牙联合会現在共有15 000多人；仅仅里斯本一地就有48个职业支部，其中每个支部都成立了工会。請看分裂分子认为一切有組織的支部都站在他們一边的說法究竟是怎么回事！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1月—
2月中

載于1873年1月11日、2月
1、8和15日“国际先驅报”
第41、44、45和4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国际先驅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給总委员会的便函²⁹⁰

(1) 定期寄出的“国际先驱报”和“解放报”諒已收到。

(2) 黑尔斯那帮家伙在1月26日居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参加者有整整十个人。他們甚至不敢說出，他們冒名代表的是哪些支部。一場慘敗。当然，做出了决定，既不承认海牙決議，也不承认总委员会。报告的前半部分发表在2月1日的“东邮报”上，但是今天的該报却沒有任何下文！联合会委员会将正式把这些材料寄給你們。除了在倫敦东头区有一批黑尔斯的个人追随者以外，这些先生們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信徒。第一个黑尔斯通告的签字者之一貝奈特由于接到自己支部(哈里法克斯)要他站在我們和 lawful [合法的] 协会这边的严格命令，已經回到我們同志們这边来了。只是在他沉痛地 eating humble pie [垂泪悔过] 以后才重新接受了他。(見今天的“国际先驱报”)

(3) 在洛迪，“人民报”表現得很勇敢，虽然同其他人沒有公开决裂；因为它暂时还不能这样做。但是那些人自己使情况尖銳化了。他們在3月15日召开意大利代表大会，但是只想让那些已經承认或者将在一定期限内承认里米尼決議²⁹¹的支部参加！这就叫做自治和自由联合。国际的章程可以任意踐踏，但里米尼決議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总委员会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 汝拉人由于拒絕了海牙決議并且建立了自己特殊的联盟, 从而自行退出了組織, 它沒有这样做, 而只是把他們暂时开除。²⁹² 这样一来, 第一, 他們随时可以要求召开代表會議。第二, 这个問題会在代表大会上被用完全另一种形式提出: 在对他們代表的代表資格证是否有效問題进行表决以前, 就应当允許他們参加。第三, 总委员会不得不用对付黑尔斯那帮家伙的 ditto [同样的] 办法去对付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 而这种接連不断地开除的办法影响很不好, 总委员会不如再等待几个星期, 直到知道比利时代表大会和西班牙代表大会的結果以后再在一个唯一的声明中宣布这一点, 而在这个声明中除了說明正式的理由以外, 还可以明确地指出, 不能同时既在国际之内又在国际之外, 不能一方面說自己屬於国际而同时又宣布国际的法律是无效的, 这样一来, 就可以 purement et simplement [輕而易举地] 证明, 某某、某某是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

(5) 我希望, 你們已把相应的決議寄到桑維耳耶和日內瓦去了, 因为我沒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至于說到賽拉叶, 在目前, 当逮捕事件接連不断地发生, 而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又已断絕的时候, 他是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寄到那里去的。

(6) 你們的全权代表拉罗克在这里自己为自己取得了全权——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已离开这里到圣塞瓦斯田去了, 在那里他也会把事情办妥的。

(7) 在葡萄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这从今天寄出的“解放报”可以看出。我們还收到了从那里寄来的私人信件; 同志們正在工会中大力进行工作。

(8)只有比尼亚米还留在洛迪。党的汉堡委员会给他寄去了20塔勒,維也納的奥伯温德寄去了50盾,这是一定会收到效果的。

(9)庫諾化名卡佩斯特罗进行活动的方法已经被布魯塞尔的“国际报”識破。²⁹³

(10)如果总委员会现在还收不到那些已經断絕了关系的支部的报纸,那就必须随使用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去預訂。我們这里要花非常大的力气,繞好多弯才能把每一种报纸都弄到一份,而且并不总是如此:直到現在我們还没有最近三期“汝拉简报”,因此我們虽然十分願意但是不能把它們寄走。不过,只有“国际报”(布魯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桑維耳耶)和“联盟”(巴塞罗纳)情况才是这样。

(11)我曾經与勒穆修談及会費券²⁹⁴的事,他和去年一样,承担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紐約办不成这件事,毕竟是可笑的。

(12)麦克唐奈出了什么事?他早就應該到达那里了。关于他音信全无。

邮局就要关門了。

致衷心的問候

弗·恩格斯

1873年2月8日于倫敦

全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3年4月15日于倫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民們！

我已經收到了你們3月21日的來信以及托轉洛迪的8鎊6辨士的匯票。同時我還收到了比尼亞米的來信，他說，他又躲起來了，為的是逃避對他判處的監獄監禁，——他認為過一些時候等到他的健康恢復以後再去服刑比較好。因此，錢寄得再及時不過了。我已經把它兌成200法郎（法國的銀行券），隨即寄給了他。

勒穆修負責辦理會費券的事，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這件事，但是，據我所知，事情仍然很少有進展。

“工人報”²⁹⁵ 都能按時收到。

英文本和法文本的章程的印費大約各需15英鎊，印德文本要便宜得多，因為章程最初是在“人民國家報”社印的，不用再花排版費，只付紙張費、印刷費和裝訂費就行了。²⁹⁶ 現在要再這樣做當然不可能了。

關於同盟的報告^① 現在正在寫，拉法格和我天天都在忙這件

① 見本卷第365—515頁。——編者注

事，因为不能荒廢時間。圣诞节以前，在布魯塞爾的文件一直在呂肯手里，有些文件現在還在他那里。

德文版的章程这里还有几百份，都由委员会^①掌管。英文版的一份也沒有。法文版的已全部寄往巴黎，但是並沒有寄到。也許我們可以收到一些退回的。我們正在做这样的努力。

“同盟”一写完，我們就开始整理代表大会的記錄。

馬德里“解放报”即使不是已經死去，那也是临近死亡了。我們往那里寄去了15英鎊，但是由于收到該报的人几乎全部不交报費，所以要把該报維持下去已經不可能了。我正在和梅薩通信，商談創辦另一家报纸的問題，但是現在還不敢說結果如何。

里斯本的“社会思想报”，是一家非常好的报纸，該报最近一号就同盟問題对亚尔科的西班牙联合委员会作了很好的答复²⁹⁷，它現在也要暫時停刊，但是以后就将重新出版。

你們大概已經发现，“国际先驅报”也是气息奄奄了。我們也許可以設法使这家报纸維持到最近这次英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在圣灵降临节周）²⁹⁸，在此以后我們可能会出版另一种刊物。“先驅报”的价值不很大；它的意义只在于作为刊登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各种材料的机关报，但是作为这样一种机关报，它在目前几乎是不可代替的。

你們从各家法国报纸上大概已經知道，瓦尔特（赫德盖姆）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奸細。据说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他就当上了警探。斯瓦尔姆（丹特雷格）在土魯斯的表现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沒有看到报道的全文，所以沒有把握肯定这一点；無論如何，过去

① 指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編者注

他不是密探,但是,看来这是一个软弱的和不坚定的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至今我一直沒有收到过給总委员会的任何錢。除了关于“人民报”可能也已暂时停办的說法以外,从意大利同样沒有得到任何消息。在博洛尼亚和米朗多拉逮捕同盟分子不会是长时期的,他們很快就会获得自由;即使他們有人間或由于誤会而被捕,也永远不会真正吃到什么苦头。

第一次用原文摘要发表于“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的几篇文章

(摘自給阿·赫普納的信)²⁹⁹

鉴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并且为了您今后的报道起见，我请您——部分是再次地——注意如下几点：(a) 硬说什么巴枯宁反对搞阴谋活动，这是荒谬的，他在国际内部就策划了一个当然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普遍的阴谋——同盟。(b) 在法国，自从杜弗尔法颁布以后，国际“除非秘密地活动”，否则根本无法存在，但是秘密宣传团体和阴谋活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c) 海牙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反对了那些想把国际变成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的布朗基主义者，以致他们退出了国际，并且公开反对国际，因为，据他们说，国际缺乏“革命的毅力”。(d) 赫德盖姆(瓦尔特)——就是在海牙时有一位矮小的、身穿丧服、貌似抹大拉的馬利亚的所谓“妻子”陪同的那个文静的、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现在已被揭露是一个老牌的警探，——只是在他说总委员会委员、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可以为他作证，而朗维耶又承认他是无条件地值得信任的人以后，赛拉叶才建议前总委员会接受他和他的支部。(e) 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都持有本支部的合法的代表资格证，因此，在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之前，应该允许他们

参加代表大会，而少数派中沒有一个入曾想要提出指責。(f)“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再好不过地表明它是警察局的机关报，它为福格特之流警察当局和波拿巴的代理人所散布的誹謗帮腔，胡說什么馬克思力图成为“阴谋家的国际領袖”，他已經经历了“一打的共产党人案件”，但是海牙代表大会（人們认为其中的多数派和馬克思之間是可以划等号的）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事实却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而警察当局关于一个案件，即 1852 年共产党人案件的謊言早就被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³⁰⁰ 中揭穿了。(g)“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自己已經使大家注意到，警察当局的手法就是同样也判警察的罪，但是保证他們在獄中能够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这之后，如果現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什么人将被判处徒刑的話，大家就知道該怎样对待了。“工人們要随时提防！”

不过，丹特雷格原来不是一个奸細，而是一个蜕化墮落分子，只是在獄中他才成了告密者，此后不久便完全为警察当局效劳了。相反地，赫德盖姆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就已經是一个奸細，我們有他这个人，只应当感謝布朗基主义者。但是，“偉大的老自由战士”巴枯宁在他的队伍中經常都有一批警察当局的奸細，例如阿尔伯·里沙尔从 1868 年同盟成立时起就是他在法国的左右手。既然汝拉人硬說他們在法国也有一批秘密的支部（一些案件证明情况恰恰相反），那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杜撰出来的差別究竟在哪里呢？

至于談到第 45 号上的那篇文章³⁰¹，为了反駁該文提出的論点，还需要說明如下几点。表示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有：(1) 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它从来就不屬於国际，因为它不願意承认共同章

程，而不服从共同章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属于国际的。相反地，许多真正的意大利支部都承认章程并且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2）汝拉联合会，有 150 人，而仅在一个瑞士法语区反对他们的就有四五千；因此该联合会被暂时开除。（3）比利时人。（4）一部分西班牙人，可是另一部分西班牙人在瓦伦西亚成立了联合会委员会，并同纽约总委员会有经常的联系。（5）英国的整整十个人，他们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支部，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却有着许多支部的支持，其中很多支部的人数达 500 人或者更多，而且这些支部每星期都在壮大，该联合会委员会认为，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参加国际的基本条件。（6）在法国，“既然那里还存在着组织”，那它就是站在海牙和总委员会方面的，作为第 49 号上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写作原因的那些审判案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公社流亡者”全体还是其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坚决反对……等等”，因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派别。布朗基主义者，总共五个人，其中有四个是公社社员，因为国际不想成为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所以他们退出了。除此以外，绝对没有发生可以为这种谎言提供哪怕是最微小的借口的任何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73 年 4 月底

载于 1873 年 5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3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1873年5月2日于倫敦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发表了关于国际在法国的最近几次审判案的一篇騙人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得到了从爬虫报刊基金³⁰²中撥发的慷慨报酬，所以这篇文章特别卖力地大肆造謠。关于土魯斯审判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以布魯塞尔“国际报”的一篇文章为根据的，而“国际报”的这篇文章又是从“自由报”上轉載过来的，³⁰³文章是出自法国流亡者茹尔·盖得之手。这个人从他到达日内瓦的时候起，就和当地其他想做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人一起为巴枯宁大事吹嘘，并且出席了汝拉人在桑維耳耶举行的代表大会（1871年11月），在有名的汝拉联合会通告上签了字；在这个通告中，巴枯宁先生的秘密同盟向国际宣了战。我們现在就来看一看，盖得先生在国际在法国的活动中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文章竟把那个在这次案件中出卖同自己一起被控的国际会员的丹特雷格說成是馬克思的总全权代表，并想把这一叛卖行为和随后做出的有罪判决都归罪于馬克思以及总委员会和“从上到下都是权威主义的組織”。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丹特雷格先生，佩澤納斯（埃罗省）铁路局的繪图員，在1871

年12月24日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說有一个代表七个工会的激进民主主义委员会要求参加国际，他是该委员会主席。1月4日法国书记给佩泽纳斯的卡拉斯（现在被判处一年徒刑）写了一封信。卡拉斯由于有加入了国际的贝济埃（埃罗）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给他担保而取得了完全的信任；在伦敦的许多公社委员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也被判了罪）都是些值得信任的人。1月14日卡拉斯来信赞扬了丹特雷格，并且还說，已经和他商定，“他们将携手共事”。3月，丹特雷格迁居土鲁斯；因此，直到被捕，他在那里活动了整整九个月，而在土鲁斯的国际会员对他没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同他处得十分融洽，所有四个人数相当多的支部都在8月18日一致选举他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便证实了这一点。在只有委员会委员和小组领导人签名的四张代表资格证上就有67个人的签字。可見，总委员会委派这个人作为它驻土鲁斯和土鲁斯郊区的全权代表，只是反映了当地的国际会员自己的願望。

現在再談盖得先生。

1872年8月18日，蒙彼利埃支部来信告诉总委员会說，盖得先生的通信者和朋友保尔·布鲁斯先生企图在当地的支部制造分裂；他要求会员不要提前繳納規定的会費来解决土鲁斯代表的路費，并且要求他們在海牙代表大会沒有发表意見之前根本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因此，該支部把他开除了，并且要求总委员会把他开除出国际。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是卡拉斯和其他三个人。总委员会知道布鲁斯先生为了汝拉联合会中的分裂分子的利益而在那里进行阴谋活动，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会起什么特別作用——他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因此就沒有注意这件事情。盖得先生当时

正在羅馬，他在10月間給“自由報”寫了一篇通訊，把蒙彼利埃支部的完全可以理解的行動說成是“權威主義的”；同時對於自己的朋友布魯斯他只用姓名的縮寫來表示，而對“蒙彼利埃的卡拉斯”，却把他的全名登載出來。法國警察當局一下子就抓住了這個情況。當時總委員會書記給卡拉斯的一封信詳細談到丹特雷格情況的信在郵局被截去了。丹特雷格隨即被捕，接着卡拉斯也被捕了。

究竟誰是告密者——丹特雷格還是蓋得？

如果蓋得先生還要硬說，派出總委員會的 *missi dominici* [使者]，外來代表（警察當局對他們的特征知道得很清楚）的來往，是使法國國際被破獲的最好的辦法，那他就忘記了：

（1）總委員會駐法國的三個全權代表並不是從外地來的偶然的行善者，而是常住在他們擔任全權代表的那些地方並且受到當地支部信任的人。

（2）去年秋天和冬天在法國南部出現的仅有的幾個國際的“外來代表”，不是總委員會，而是汝拉聯合會中的分裂分子派去的。這些先生在被捕前不久在土魯斯等地的咖啡館里大肆喧囂，從而引起了警察當局對我們協會的注意；但是，無論何時何地，被捕的都是國際的真正會員，而那些無政府主義的吹牛家卻受到警察頭子的特別保護。

即使丹特雷格先生由於個人的動因和軟弱而做了某些揭露，那也有充分的事實可以證明他在被判罪前不是警察局的暗探，同盟的先生們沒有絲毫權利向別人扔石頭，它的創始人之一就是現在的波拿巴主義代理人、里昂的阿爾伯·里沙爾，“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更沒有這種權利，它過去和現在一直為警察當局效勞，這是德國工人運動的最大恥辱。

至于巴黎审判案³⁰⁴，現在已經查明，赫德盖姆是警察局的暗探。这个人由他所在的巴黎支部委派担任了書記的职务，他让公社委員和总委員會委員朗維耶为他說話，朗維耶对他的忠实可靠和活动給予了很好的評价；根据这种評价，赫德盖姆才被批准。可見，無論是前面那件事还是这一件事，总委員會都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

有一种新的說法：說什么巴枯宁在海牙被开除是因为他“想消除秘密阴謀活动的有害做法”。这个目的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国际的巴枯宁的秘密阴謀的規章已經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同盟事件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做出了完全另一种結論。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說法：說什么馬克思经历了“控訴他的追隨者的一打以上的共产党人案件”。历史上只有一个共产党人案件，即1852年的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但是要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之所以获得报酬，并不是由于它說出了真理。無論如何我們不会忘記它的最后警告：

“警察当局的手法就在于当它們挑起一桩別有用心的案件时，形式上也对自己的密探判罪，然后再在監獄里为他們安排舒适的生活条件。”

从馮·施韦澤先生生活中抽出来的这一段插曲，值得大家注意。

如果什么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們偶然“形式上被判罪”，那末“工人們要随时提防”！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5月2日
載于1873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3年6月14日于倫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公民們!

我該回你們4月11日和5月14日的两封来信了³⁰⁵。我以前已經告訴你們，托轉洛迪的錢(200法郎)我已于4月10日全部汇給比尼亚米了，我这里有他的收据。大約十天前“人民报”又重新出版，上面刊登了你們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而且还在非常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你們关于那些脫离了我們协会的支部自絕于組織的声明。³⁰⁶

有关文件已寄給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那份給前总委员会用的章程修改条文已經遺失，但是他們答应給我另寄一份来，我收到后将立即轉寄給你們。

由于“人民报”又复刊了，所以我在給該报的第一篇通訊中将写关于意大利流亡者、关于瓦斯厂工人罢工的情况等等。以前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同唯一与我保持通訊联系的比尼亚米接不上头，而他又沒有告訴我别的地址。

关于会費券的事，我已經提醒勒穆修。

4英鎊3辨士已經收到，只要在巴黎找到了可靠的地址，将立

刻寄出并按原来规定加以使用。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們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译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
国际工人协会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
公布的报告和文件³⁰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保·拉
法格的参与下写于 1873 年 4—7 月
1873 年 8 月以小册子在倫敦和
汉堡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L'ALLIANC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
A. DARSON, SUCESSEUR DE FOUCAULT,
46B, RATHBONE PLACE, OXFORD ST.

HAMBOURG :
EN VENTE CHEZ OTTO MEISSNER.

187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扉頁

一 引 言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者，因此，它必然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国际的创建者和新旧大陆各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协会的共同章程，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纲领的广泛本身有可能让游民钻进来，并且在它内部建立不是要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和各国现存政府，而是要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组织。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代表大会委托五个人（公民库诺、吕肯、斯普林加尔、维沙尔和瓦尔特，最后一人退出了）组成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9月7日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决定：

1. 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2. 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
3. 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委员会没有可能把它做报告所依据的那些文件公布出来，所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委员、公民维沙尔把文件交给了记录

委員會³⁰⁸，現在由記錄委員會自己負責把它們轉錄在后面的報告中。

同盟事件牽涉的範圍非常廣，在代表大會期間工作的調查委員會只來得及審閱為做出實際結論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文件，而大部分俄文文件未能加以研究；所以該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提出的報告，只包括了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報告現在已不能認為是很完全的了。因此，為了使讀者能夠了解這些文件的精神和意義，我們不得不敘述一下同盟的歷史。

我們所公布的文件有好幾類。其中有些已經單獨發表，主要是用法文發表的，但是要想正確地理解同盟的精神，就必須把它們同其他文件加以對比，因為這樣一對比，它們就會更加清楚。公開同盟的綱領就屬於這類文件。其他文件是國際的文件，都是第一次刊印；其中有一部分是秘密同盟西班牙支部的文件，這個支部的存在是1871年春天被同盟的一些盟員公開揭露出來的。凡是注意這個時期的西班牙運動的人，都只能把這些文件看做是關於現在或多或少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的更加確切的資料。這些文件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是第一次公布，而在於它們是第一次被互相比較，因而能揭示出決定這些文件出現的整個秘密活動，特別是在於我們能把它們同以下兩類文件加以對比。第一類是用俄文發表的文件，它們揭露出同盟的真實綱領和行動方法。這些文件由於用俄文寫成而難以看懂，所以迄今西方都不知道，這種情況就使得作者們可以在文件中尽情地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和表達方式。我們所引用的這些文件的準確譯文可以使讀者正確地評價同盟的頭目們的智力水平、道德水平、政治水平和政治經濟學水平。

第二類文件只有一個，就是同盟的秘密規章；這是在這個報

告中初次公布的唯一的一个篇幅較大的文件。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把策划阴谋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文件公諸于世对革命者来说是不是允許的？首先我們要指出，这些秘密規章直接标明属于同盟事件調查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公布的文件之列，没有一个代表投票反对这样做，甚至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那位委員也是这样。可見，代表大会坚决指示公布这些文件，而代表大会的指示我們必須貫徹执行。事实上，有必要做如下的說明：

我們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現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某一个资产階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階級国际組織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組織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計劃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組織。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綱領和自己的狹隘思想来偷換我們协会的广泛的綱領和偉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組織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統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願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話來說就是，在我們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場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謠、誣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慣用的伎倆。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名义的掩飾下犯刑事罪，进行詐騙、謀杀，政府的和资产階級的报刊却把責任加在我們协会身上。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国际都应该默不作声，因为对这一切应負罪責的团体是秘密的！国际手中握有自己的死敌——这个团体——的規章；在規章中它公开宣布

自己是当代的耶穌会，并且声称在實踐中使用耶穌会的一切办法是它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規章使这个团体对国际采取的一切敌对行动立即得到了說明；但是国际却不能够利用这些文件，因为这就意味着出卖秘密团体！

要对付这一切阴謀詭計，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謀詭計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們失去任何力量。用沉默的办法来遮盖这些阴謀，从我們这方面說来不仅是一种首先就会遭到同盟的首領們嘲笑的幼稚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虽然是秘密同盟的盟員，但当这个团体刚一采取公开与国际为敌的立場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及其行动方法的国际西班牙会員說来，这将是一种背叛行为。更何况这些秘密規章的内容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他們本人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都已經有了，而且表达的形式还更为明确。这些規章只不过是证实那些俄文文件罢了。

让同盟的首領們去喊什么背叛吧。我們將使他們受到工人們的蔑視，同时也將使他們得到各国政府的垂青，因为他們由于破坏工人运动而对各国政府有不可估量的劳績。苏黎世的“哨兵报”在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說：

“即使您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³⁰⁹

二

秘密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当米哈伊尔·巴枯宁突然想要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角色的时候，国际已经根深蒂固。国际给他提供的，只是同一切国际会员一样的活动场所。为了在国际内崭露头角，他就必须首先进行顽强的、忘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他认定，在和平同盟的资产阶级方面他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可以有一条更便捷的途径。

于是，1867年9月他设法当选上了和平同盟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郑重其事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了。甚至可以說，他同凡尔赛的现任议员巴尔尼一起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灵魂。为了要当和平同盟的理论家，巴枯宁曾经打算在该同盟的保护下出版一本名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著作^①。但是，不久他就看清了，和平同盟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因此，他便开始幻想使和平同盟加入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设

^① 这部各种主义的圣经只印到第三印张就由于没有续稿而停印了。310

法通过艾尔皮金的介紹于 1868 年 7 月被接受为日内瓦中央支部^①的成員；另一方面，他又在和平同盟的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决定，向国际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在两个团体之間締結攻守同盟的建議。为了使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能批准这个热情洋溢的倡議，巴枯宁起草了一个秘密通告，然后又說服委员会通过了这个通告并把它散发給和平同盟的“先生們”。³¹¹他在这个通告中坦率地承认，和平同盟直到現在始終是一出可怜的鬧剧，只有以“各国人民的联盟、工人的联盟”去对抗压迫者的联盟，才能使自己具有意义，

“……只有当我们希望成为千百万工人的誠摯的和真正的代表的时候，我們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个神圣同盟的天賦使命，就是賜給工人階級一个自封的資產階級議會，而工人階級就会把有关自己的政治領導的事务委托給这个議會去管理。

通告最后說：“为了成为一种有用的、现实的力量，本同盟应当成为偉大的經濟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現在为欧美偉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发展和傳播的那些原則的純粹的政治体现者。”

布魯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絕了和平同盟的建議。巴枯宁大失所望，憤怒万分。一方面，国际避开了他的监护。另一方面，和平同盟主席古斯达夫·福格特博士又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頓。

他写信給巴枯宁說：“或者你不相信我們的邀請会获得成功，那你就是敗坏了我們同盟的名譽；或者你知道你在国际中的朋友們給我們准备了什么样的意外礼物，那你就是以不体面的办法欺騙了我們。我問你，我們怎样向我們的代表大会交代……”

^① 国际的支部。——編者注

巴枯宁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他让所有愿意看的人都看过。

他写道：“我没有能够预见到，国际的代表大会竟会用如此粗暴和傲慢的侮辱人的态度来回答我们；但是，这是由于某一个仇视俄国人的德国人集团（他向别人口头解释说，指的是马克思的“集团”）的阴谋所引起的。你问我，我们将怎么办？我将争取能荣幸地在我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以委员会的名义来回答这种粗暴的侮辱人的态度。”

巴枯宁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改换了自己的装扮。他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的平等，希望以此来胜过这个同盟中目前只要求两性平等的那些太太们。可是他又失败了，于是他在一小撮少数派的陪同下离开了代表大会，前往日内瓦^①。

巴枯宁所幻想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不应该局限于公开的联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规章（见“文件”第一号^②）中已经指明，巴枯宁在这个同盟内部就已经奠定了必须领导这个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基础。不仅各个领导机关的名称同和平同盟各机关的名称相符（常设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民族委员会），而且在秘密规章中还宣称，“多数创建同盟的盟员”都是“过去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他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

① 在脱离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任波拿巴警探的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那不勒斯的律师甘布齐（见有关意大利的那一章）、后来任公开同盟书记的茹柯夫斯基，和一个现在属于最最反动的政党的日内瓦洋铁匠布特纳等人的名字。

② 见本卷第504—505页。——编者注

領導權抓到自己手里。為此目的，他在日內瓦創建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公開的）。表面看去，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開團體，它雖然完全溶化在國際中，同時卻應該有不屬於我們協會的特殊的國際組織、中央委員會、民族局和支部；在我們的年度代表大會召開的同時，同盟應該公開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但是，在這個公開同盟後面隱藏着另一個同盟，它又處於一個更加秘密的國際兄弟同盟——獨裁者巴枯寧的禁衛軍——的領導之下。

“國際兄弟同盟組織”的秘密章程指出，在這個同盟中有“三級：一、國際兄弟會；二、民族兄弟會；三、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開的組織”。

一、國際兄弟會的人數以“一百名”為限，組成神聖的紅衣主教會議，他們從屬於中央委員會和各民族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則組成執行局和監察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本身要對“憲法會議”，或者說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國際兄弟組成的全體大會負責。這些同盟兄弟

“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沒有別的祖國，除了反動以外沒有別的異邦和別的敵人。他們反對任何妥協和讓步的政策，並且認為，不把他們的原則的勝利當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是反動的”。

但是，由於這一條把“一百人”的政治行動推遲到希臘朔日^①，由於這些不妥協派又不願意放棄同社會職務有關的那些好處，所以第八條規定：

“任何一個兄弟，未經他所屬的委員會同意都不能擔任社會職位。”

我們談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同盟的头目們怎樣急急忙忙地把這一條規定付諸實踐。國際兄弟

^① 朔日是古羅馬人對每月第一天的稱呼。希臘日曆中沒有朔日這個名稱。推遲到希臘朔日是指永無實現、永無成功之日。——譯者注

“是兄弟……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涅恰也夫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可能范围是什么意思。

“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比埃特里和施梯伯之流只是用那些下贱的、堕落的人来当密探。而同盟为了使自己的伪兄弟能打入各个秘密团体，并叫他们刺探这些团体的秘密，竟不惜强迫那些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领导“世界革命”的人物去当密探的角色。——而且这个革命丑角是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

“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由国际兄弟根据同一个计划在每一个国家内组织成民族协会，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三、到处招募成员的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拥有常设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它召开的全体成员的会议，称为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这种大会每年在国际的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举行一次，或者在非常的情况下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召开。

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和“同盟

的执行委员会”；它分为中央局和监察委员会两部分。由三名至七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局是同盟的实际执行权力机关：

“它接受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

这个中央局异想天开地要成为亦驴亦马，成为既秘密又公开的东西；因为

“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

由此可见，早在同盟还没有产生以前，巴枯宁就事先建立了对自己的“亲爱的同盟”的这一整套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导了。而那些后来参加随便什么选举的盟员，只是在他表演的这出闹剧中跑龙套罢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毫不客气地宣布这一点；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任务是给中央局发布指示，但是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支部，因为它的决定，即使是经多数通过的决定，只是在中央局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反对这些决定的情况下，中央局才必须执行，如果提出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大会。

“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中央局为自己规定了应有的宪法保证。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设想，这个自治的中央局至少也是由日内瓦中央支部自由选举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临时中央局是

“作为創建同盟的全体盟員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組批准的。这些創建同盟的盟員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权力交給了公民 B 而各自回国去了（只有巴枯宁例外）”。

可見，創建同盟的盟員只不过是脱离了和平同盟的几个資产者。

因此，攫取了整个同盟的制宪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常設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任命自己的。这个常設中央委员会的常任执行代表团——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自封的而不是由这个委员会任命的。这个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中央执行局也不是由支部选举产生，而是由一致“把自己的权力交給了公民 B”的一小撮人强加于該支部的。

可見，“公民 B”就是同盟的根本台柱。为了使他能一直担任这个首要角色，同盟的秘密章程一字不差地作了如下規定：

“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

而在这个总统制还没有建立以前，已經有了总统——永恒的^①“公民 B”。

因为同盟是一个国际团体，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有民族委员会，它

“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

要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有三名委員就足够了。为了保证切实保持教阶制的联系，

“民族委员会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組織之間的唯一中間机关”。

① 原文是«permanent», 即“永恒的”, “經常有效的”。——編者注

各个民族委员会

“应当保证这样来組織本国的同盟：使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永远在同盟中占統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这就是在同盟分子的語言中的所謂自下而上的組織建設。这些地方組織除了一个权利以外別无其他权利，这就是把自己的綱領和章程呈送民族委员会，以便提交

“中央局批准，否則地方組織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一旦这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組織加入了国际以后，剩下的事就只是破坏国际了。为此，只要把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治的支部，并且把国际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简单的信箱，变成“通訊統計局”（后来他們真的打算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永恒的“公民B”的革命功勋簿并不怎么光荣，他还不能因此就指望在秘密同盟中特别是在公开同盟中，永远保持他所包攬的經常专政。所以，必須用民主的漂亮辞句加以掩飾。于是，秘密規章規定，临时中央局（应讀做：永恒的公民）在同盟的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举行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而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将任命新的常設中央局的委員。但是，

“由于中央局絕對有必要只由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所以常設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来組織和領導一切地方組織，使它們只派常設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或者絕對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領導的人（如果没有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設中央委员会能够經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組織”。

这些指示并不是波拿巴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在选举前夕发布的，而是超等的反权威主义者、毫无保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揚自

下而上的組織的傳道者、主張支部自治和各自治小組自由聯合的巴亞爾——聖者米哈伊爾·巴枯寧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永恒職位而發布的。

我們分析了旨在使“公民B”的專政得以永存的秘密組織；現在再看看他的綱領。

“國際兄弟聯盟致力於普遍革命——在社會、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同時進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個歐洲，然後在世界其他各地徹底鏟除以財產、剝削、服從和權威（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和資產階級學理主義的或者甚至是雅各賓式革命的權威）原則為基礎的現代秩序；我們提出的口號是：給勞動者以和平，給一切被壓迫者以自由，處死壓迫者、剝削者和各種保護者，我們致力於破壞一切國家和一切教會，以及它們的全部機構和法規（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財政的、警察的、大學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以便千百萬不幸的人，受欺騙的、受奴役的、受摧殘的、受剝削的人，最後擺脫他們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體的和個體的導師和恩人，而能大大地鬆一口氣。”

瞧，這就是革命的革命性！為了達到這個驚人的目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現存的國家和政府作鬥爭，而是相反，用虛夸的、說教的言詞去攻擊

“國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後果同時又是它的基礎的私有制”。

因此，問題在於，要推翻的並不是波拿巴的、普魯士的和俄羅斯的國家，而是抽象的國家、國家這個東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國家。但是，如果說這些國際兄弟在他們同這個虛無縹緲的國家進行的激烈鬥爭中善於避開實實在在的國家用來對付普通革命者的警察皮鞭、監獄和子彈的話，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他們保留着只有經教皇的允許才能得到的，利用這些實實在在的資產階級國家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條件的權利。意大利議員法奈利、薩瓦公爵亞馬多的政府官員索里阿諾，還有波拿巴警探阿爾伯·里沙爾和

加斯帕尔·勃朗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諒解精神……这就是“同盟，直截了当地說，就是”公民 B 反对国家这一抽象观念的“阴谋”絲毫也不会惊扰警察局的原因。

因此，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頒布关于廢除国家的命令，正如巴枯宁于 9 月 28 日在里昂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样廢除国家必不可免地是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因为对我们來說，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們把它們一律看做是剝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視和反对”。

因此他就声称，一切想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建立革命国家”的革命者，比一切現存政府还要危險得多，

“我們——国际兄弟——是这些革命者的天然敌人”，

因为破坏革命是国际兄弟的首要义务。

对这些关于立即廢除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大話，在总委员会 1872 年 3 月的内部通告“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的第 37 頁^①上已經作了回答。“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們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階級运动的目的——消灭階級——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剝削者对由生产者組成的社会絕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簡單的管理职能。同盟則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階級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剝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

^① 見本卷第 53—54 頁。——編者注

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組織。”

可是，我們彻底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福音书将导致什么样的結論；我們假定，可以用法令来廢除国家。根据第六条的規定^①，这一行动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債務的干預，停止繳納任何捐稅，解散軍隊、司法部門、官吏、警察和僧侶(!)，廢除官方司法制度，同时燒毀一切規定了財產权的文书契約以及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廢物，沒收一切生产資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并把这些协作社联合起来，“組成公社”。这个公社将給因此被剝夺了財產的个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讓他們自由地用他們自己的劳动掙得更多的东西。

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紙廢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諾言。但是，只用資產階級国民自卫軍的两个連，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創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追随者都那样愚蠢，以致看不到有必要給他們一个組織計劃，以保证实际实现他的命令。这計劃就是：

“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負責任并随时可以撤換——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同盟的这些街垒真奇怪，在这里不是打仗，而是填发委托书)。这样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門所特設的**执行委员会**。”

^① 見本卷第 510 頁。——編者注

用这种方法組成成为公社的起义首都，那时会向国内的其他公社宣布，它放棄管理这些公社的任何企图；它号召这些公社按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組，然后再派出自己的負責任的、可以撤換的并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前往約定的会晤地点，以便成立起义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組織起来。这个組織不局限于一个起义国家的各个公社；其他省或国家也可以参加这个組織，但是

“站在反动派方面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則将不准加入”。

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是廢除国界，另一方面是寬大无边地容忍那些将会迅速恢复內战的反动省份，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可見，在这个由街垒-讲坛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組織中，首先有一个公社委员会，然后有各个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管执行什么任务，肯定都要借助某种权力并且依靠社会强制力量；接着又有一个完整的联邦議會，其主要任务应当是組織这种社会强制力量。这个議会同公社委员会一样，应当把执行权力交給一个或几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仅仅由于这一个事实便具有权威的性质，这种权威性质在斗争过程中要愈来愈加强。这样一来，“权威主义国家”的一切因素又会逐漸恢复；而我們就是把这个机器称为“自下而上地組織起来的革命公社”，那也沒有多大意义。名称不能改变事实；自下而上的組織在任何资产階級共和国中都存在，而限权代表委托书則早在中世紀就已經为人所知了。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八条^①中)把自己的組織称为“新的革命国家”。

^① 見本卷第 511 頁。——編者注

这个革命计划的实际价值更是不值一提，因为根据这个计划，人们不去战斗，却进行争论。

现在我们就来揭开同盟的所有这些装有两层和三层夹底的箱子中的秘密吧。为了实现这个正統的綱領，使无政府状态沿正确的道路发展，

“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統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識的深处經過長時間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組織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傳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誕生，并且組織——不是組織革命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始終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參謀部，由忠誠的、坚毅的、聰明的，主要地是真誠的，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們壟斷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組成”。

“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組織有一百名紧密无間地團結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組織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欲”等等已經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动的統一。国际的會員們正力图通过宣傳、討論和无产阶级的公开組織来建立这种統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組成的秘密組織，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B”的統率下組成的，待用的总參謀部。思想和行动的統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

尸一样]①。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穌会。

說一百名国际兄弟应当“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就是說要在同盟分子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階級群众之間挖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沟，就是承认这一百名近卫軍士兵除了从特权階級中招募以外是不可能的。

① 这是洛約拉制定的規定耶穌会下級會員对上級會員要絕對服从的耶穌会會員的原則之一。——編者注

三 同盟在瑞士

同盟同福斯泰夫一样，它“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因此，“身上的魔胆”丝毫不妨碍国际兄弟在现存各国政权面前卑躬屈节，而同时又不断卖劲地反对抽象国家的制度；但是，这个“魔鬼”却使他們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們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沒有得逞的时候，他們便图謀破坏国际。現在我們就把他們在各个国际中的活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国际兄弟无非是一个待用的总参謀部；他們缺乏军队。他們认定，国际恰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为了能够統率这支军队，就必须使公开同盟打入国际。但是，他們担心向总委员会申請加入国际会使同盟丢臉，因为这样一来他們便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权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們曾数次徒劳无功地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請。由于屡次遭到拒絕，同盟才不得不于1868年12月15日向总委员会申請入会。同盟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綱領，其中公开地宣布了它的意图（“文件”第二号^②）。同盟一方面声明它“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又图謀在国际内部組成第二个国际性的組織。除了由历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际总委员会以外，还要有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設在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512—513頁。——編者注

日內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除了國際的各地方組織以外，還要有同盟的地方組織，后者將通過活動于國際的各個全國局之外的它們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請求加入國際”。這樣，同盟中央局就攫取了接納加入國際的權利。除了國際的代表大會以外，還要舉行同盟的代表大會，因為“出席每年召開的工人代表大會的同盟代表團”妄圖“在單獨的會場內”舉行“自己的公開會議”。

12月22日，總委員會（在發表在它的通告“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第7頁^①上的那封信中）聲明，這些奢求顯然是同國際的章程相抵觸的，並且堅決拒絕接受同盟入會。幾個月以後，同盟又寫信給總委員會，問它是否承認同盟的原則。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聲明它準備解散自己的組織，把自己改組為國際的普通支部。總委員會於1869年3月9日（見“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第8頁^②）回信說，對同盟的綱領做出判斷，對總委員會來說就是超越了自己的職權範圍，如果把“各階級的平等”改成“消滅階級”的話，要使同盟的支部成為國際的支部，將不會有什麼障礙。總委員會還補充說：“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國際的問題最後決定了，那末，根據我們的條例，必須把每一個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數通知總委員會。”

1869年6月22日，同盟日內瓦支部通知總委員會說，解散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已成為既成事實，說是已經建議同盟的所有支部“成為國際的支部”。被綱領上的幾個簽名所蒙騙的總委員會，以為同盟已被羅曼語區聯合會委員會所承認，所以在接到這樣堅決的聲明以後，總委員會便接受了同盟。這裡要補充一句，他們

① 見本卷第11—14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4—15頁。——編者注

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相反地，从此以后，隐藏在公开同盟后面的秘密组织便开始拼命进行活动。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罗纳、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后面，隐藏着同盟的秘密支部。这是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的普通会员及其领导中心甚至没有怀疑过会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而巴枯宁指望依靠这个组织能够在1869年9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秘密同盟利用它所耍的各种不正派手腕，至少派了10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臭名远扬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巴枯宁本人。同盟代表团带来了大批空白的、由于没有可靠人选而没有使用的代表资格证，虽然它曾建议把这些代表资格证让给国际的巴塞尔会员。可是，现有的同盟代表人数太少，甚至不足以迫使大会批准废除继承权——圣西门主义的旧破烂，而巴枯宁是想使废除继承权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的³¹²；巴枯宁所幻想的、企图强迫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驻在地由伦敦迁往日内瓦的做法，收效就更小了。

当时在日内瓦，在几乎得到日内瓦的全体国际会员支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同盟在这场战争中的同盟者是洛克尔的“进步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前者是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后者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同盟分子占了编辑部的多数，他们利用一切借口来攻击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平等报”编辑部紧紧抓住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日内瓦这个主要目标，展开了反对当时的总委员会的运动，并且号召巴黎的“劳动报”支持它。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通告中声明；它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报纸进行论战。³¹³同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把同盟的人从“平等报”编辑部中赶

了出去。

当时这一派人还没有穿上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们以为能够掌握总委员会，所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通过并且提出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授予总委员会以“权威主义的权力”，而两年以后他们却如此疯狂地攻击起这些权力来了。下面是从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洛克尔“进步报”（1869年12月4日）上摘引的一段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³¹⁴同“人民国家报”之间的冲突的文章，没有什么能比这段文章更好地说明他们当时对总委员会的权威作用的想法了。

“我们认为，我们协会总委员会必须干预并且开始调查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对施韦泽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争端做出决定，从而结束我们由于这种奇怪状况而陷入的暧昧不明的处境。”

能不能相信，同一个吉约姆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通告中又指责同一个过去不够权威的总委员会“想把权威主义原则带进国际中来”？

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也不会因这一点去责难它们），而且执拗地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预谋的混乱。凡是在同盟控制着一家报纸或为一家报纸撰稿的一切地方，——在西班牙，在瑞士，在意大利，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而这个体系在同盟的俄文出版物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派系在绍德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1870年4月4日）上进行了决战。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想强迫日内瓦各支部承认日内瓦公开同盟是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把联合会委员会及其机关报迁往秘密同盟主宰一切的汝拉的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同盟支部”的两个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日内瓦的代表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再谈，并且立即研究更加重要的事情——讨论纲领。他们声明说，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责成他们宁可离开代表大会也不允许这个支部参加自己的组织，

“因为同盟的人在策划阴谋，具有权力欲；投票赞成接受同盟就是投票赞成分裂罗曼语区联合会”。

但是，同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由于它的汝拉各小支部离得很近，这使它能够获得微弱的虚假的多数，因为日内瓦和国际各大中心的代表人数极少。在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的坚持下，支部以一两票的成问题的多数被接受了。日内瓦的代表们立即打电报请示自己的支部，他们都接到指示要离开代表大会。由于绍德封的国际会员都支持日内瓦人，所以同盟分子被迫退出了属于绍德封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大会会场。虽然按他们自己的机关报的说法（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他们只代表15个支部，可是单在日内瓦一个地方就有30个支部，他们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称，为瑞士罗曼语区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舍瓦累和科尼翁^①在委员会中红极一时），并且宣布吉约姆的“团结报”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位年轻小学教员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日内瓦的“工厂”³¹⁵工人——这些可憎的“资产者”，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扬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分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

^① 过了两个月，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7月9日“团结报”）宣布，这两个家伙都是小偷。他们把绍德封的一个裁缝合作社偷得精光，从而实际地证实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

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順便指出，紹德封代表大會的偶然的、虛假的多數妄圖代表羅曼語區聯合會，但是他們却明顯地違反了該聯合會的章程，而且應該指出，同盟的头目們都大力參加了這個章程的起草工作³¹⁶。根據第五十三條和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代表大會的任何重要決議都應該經參加聯合會的三分之二的支部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單是表示反對同盟的日內瓦支部和紹德封支部就構成了支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兩次全體會員大會上，日內瓦的國際會員不顧巴枯寧及其朋友們的反對，幾乎全體一致地表示擁護自己的代表們的做法，他們的代表們在全場鼓掌聲中建議同盟不要亂鑽，不要妄想參加羅曼語區聯合會；在這種條件下本來是可以達到和解的。後來，幾個失去幻想的同盟盟員建議解散同盟，但是巴枯寧和他的婁羅們全力反對這樣做。同盟不顧一切，繼續堅決要求參加羅曼語區聯合會；結果羅曼語區聯合會不得不通過決定，把巴枯寧和其他主要的同謀者從它的隊伍中開除出去。

這樣一來，在瑞士羅曼語區就出現了兩個聯合會委員會——一個在日內瓦，一個在紹德封。絕大多數支部都仍然忠實於日內瓦聯合會委員會，而追隨紹德封聯合會委員會的只有15個支部，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15個支部中有許多都一個個地不再存在了。

羅曼語區代表大會剛剛閉幕，紹德封的新委員會就寫信要求總委員會進行干預，在信上簽字的是書記弗·羅伯爾和主席昂利·舍瓦累（見前一頁的注）。總委員會研究了雙方所提出的文件，於1870年6月28日決定，保留日內瓦委員會原有的職權，並建議新的紹德封聯合會委員會用一個地方性的名稱。³¹⁷ 紹德封的

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大叫大嚷，忘记了是它首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1870年9月4日，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同盟认定，“在瑞士打开革命九头蛇的锁链”（吉约姆文体如此）的时刻已经来到。“团结报”发出了一个宣言，号召成立瑞士志愿部队来反对普鲁士人。这个宣言——如果相信教育家吉约姆的话——虽然“丝毫也不是匿名的”，但是终究“没有署名”。遗憾的是，当报纸和宣言被没收，同盟的全部好战热情便化为乌有了。但是我，——渴望“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热血沸腾的吉约姆高呼道，——“我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报纸的印刷所里”（1872年6月15日“汝拉简报”）。

里昂爆发了革命运动。巴枯宁急忙赶到他的中尉阿尔伯·里沙尔以及他的军士巴斯特利卡和加斯帕尔·勃朗那里去。9月28日，即他到达的那一天，人民占领了市政厅。巴枯宁便迁到市政厅去；于是，人们等待了这么多年的决定性时刻，巴枯宁有机会可以完成世界从未见过的最革命的行为的时刻来到了，——他下令废除国家。但是，国家以两连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形式走进了门口忘记派警卫站岗的市政厅，肃清了大厅，并且使得巴枯宁不得不匆忙溜到日内瓦去。

正当好战的吉约姆“在自己的岗位上”保卫九月共和国的时候，他的忠实的阿哈特——罗班却逃出这个共和国，躲藏到伦敦去了。虽然总委员会知道，罗班是同盟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虽然布勒斯特各支部

把罗班这种远不是英勇的行为告知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由于法国委员缺额，还是让他当了总委员会委员。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紹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議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預見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絕了这个建議。罗班一再提出这个問題，甚至建議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做出最后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問題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會議解决的問題之一。

同盟根本不願意让代表會議調查它的陰謀，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經解散。但是，它很快得到了几个法国流亡者的增援，于是又重新出現，以別的名称进行活动，例如：无神論社会主义者支部以及宣傳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項決議的規定³¹⁸，总委员会完全同意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拒絕承认这些支部——各种陰謀的新的策源地。

倫敦代表會議(1871年9月)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关于汝拉分裂分子的決議。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的信徒們便创办了有安得列·萊奥女士参加撰稿的“社会革命报”。恰好当費雷正在獄中等待被押往薩托里去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烏尔·里果和費雷是巴黎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們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誠然，始終沒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費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以及其他骯髒报纸站到一条綫上，轉載它們詆毀总委員

会的卑鄙言論。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經到了。用它的話來說，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

倫敦代表會議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項決議击中了同盟的心臟。³¹⁹ 其中的第一項決議直接譴責了紹德封的假罗曼語区委员会，并且贊同总委员会的行动。代表會議建議汝拉各支部加入罗曼語区联合会，而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會議則建議山区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代表會議声明，如果他們的委员会当着资产阶级公众继续在报纸上进行笔战，那末总委员会将拒絕承认这些报纸。——第二項決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彻底清除了巴枯宁想把关于绝对放棄政治的学說列入国际的綱領来在国际内部制造的混乱。——第三項決議，有关涅恰也夫的決議，是对巴枯宁的直接威胁。后面談到俄国的时候，我們就会看到，使同盟的卑鄙行徑瞞过西欧的耳目对巴枯宁本人有多么大的利害关系。

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軍事行动。支持假罗曼語区委员会的汝拉各支部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維耳耶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似乎代表9个支部的16名代表。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派出两名代表的庫尔特拉里支部“停止了活动”；洛克尔中央支部“最后瓦解了”，但是，后来为了派两名代表去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它又暂时恢复了；庫尔特拉里雕刻匠和花飾瓦工支部（2名代表）“組成了一个抵抗团体”，不参加国际；紹德封的宣傳支部（1名代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沒有好轉，反而在恶化”；紐沙特尔中央支部（2名代表，其中包括吉約姆）

“受到很大損失，如果不是它的個別成員的自我犧牲精神，它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桑維耳耶和庫爾特拉里區聖伊米耶的兩個社會問題研究小組（4名代表），根據報告所說，是由于解散了庫爾特拉里中央支部才成立起來的；這樣一來，這個區的幾個成員便以三重名義共派了6名代表！穆蒂埃支部（1名代表）看來只是一個委員會。可見，16名代表中有14名是代表已死的或垂死的支部。但是，為了清楚地了解無政府說教在這個聯合會中所造成的瓦解狀況，還應當把這篇報告稍微再往下讀一點。在22個支部中只有9個支部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會；有7個支部一次也沒有回答過委員會的呼喚，而4個已經宣布死亡。這就是自認為負有動搖國際的組織基礎的使命的那個聯合會的狀況！

不過，桑維耳耶代表大會一開始還是服從倫敦代表會議的，倫敦代表會議曾建議召開桑維耳耶代表大會的各組織定名為汝拉聯合會；但是同時，這個代表大會又顯示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宣布解散整個羅曼語區聯合會（羅曼語區聯合會則把汝拉人的自治權還給了他們，把他們從所有的支部中趕了出去）。後來代表大會便發表了一個大吹大擂的通告，其主要目的是對代表會議的合法性表示抗議，並且向他們要求立即召開的全協會代表大會提出申訴。

該通告指責國際背叛了自己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在於“對權威的極大抗議”。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以前，在這個最好的團體中，一切都進行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在巴塞爾，代表們昏了頭，他們充滿了“盲目的信任”，“違反了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而共同章程非常明確地宣布每一個支部和每幾個支部實行自治。總之，國際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了權威主義，而汝拉聯合會這個同盟的傀儡卻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了支部自治。我們已經看到，同盟打算用

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治。

但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罪过同伦敦代表会议的罪过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因为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力图把国际由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为完全由总委员会控制的、各个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組織，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写这个通告的那些同盟分子显然忘记了，他们的秘密章程就完全是为了巩固永恒的“公民 B”这位大人物所领导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組織”而制订的，其中包括各种指示：怎样使各个支部“服从纪律”，怎样使这些支部不是简单地让这位“公民”本人“掌握”，而且是“完全掌握”。

如果说代表会议的罪过已经是死罪的话，那末总委员会却犯下了一切罪中之罪——亵渎圣灵之罪。在总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他们把自己的

“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句话，他们想用“集中制和专政”的办法来保证国际的统一。而正是在这个通告中，同盟妄图“确保自己的特殊纲领在国际内的优势”，把自己的纲领称为“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并且宣称，通过工人自己的努力来解放工人的事业应当“没有任何权威主义的领导，即使这种领导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经工人批准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同盟有势力的一切地方，同盟所做的，正是它无中生有地指

責总委员会的那些事情，——它企图把自己那种类似理論的东西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論”强加于人^①。——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盟当众进行的公开的活动；至于它的秘密活动，那末秘密規章的“精神和文字”已經告訴我們，“正統思想”、“自己的学說”、“集中制”和“专政”在这个“自治小組的自由联合”中的統治到了何等程度。我們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撓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共同領導，因为巴枯宁有先見之明，在成立自己的同盟来作为革命的总參謀部的时候，就已經关心到这一点了。

总委员会不仅无意把任何正統思想强加于国际，相反地，它建議倫敦代表會議取消某些支部的宗派主义名称，而且这个建議被一致通过了^②。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內部通告（“所謂的分裂”第24頁^③）中談到各个宗派时，就这样写道：

“无产階級反对資產階級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

① 例如，馬志尼要整个国际对教皇巴枯宁的荒謬謾言負責。总委员会认为，它不得不在意大利報紙上公开声明，它“始終反对屡次地想以狹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綱領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通俗易懂的綱領（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綱領立刻就会使絕大多数国际會員被开除”³²⁰。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地主議會議員薩卡茲关于我們协会的報告、在西班牙国会中关于国际的辯論过程中发表的那些反动演說³²¹，以及对国际的一切公开攻击，都充滿了从巴枯宁陣营編造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空話中摘出的引文。

② 代表會議第二項決議第二條規定：“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組及其委員會，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組和委員會，冠以該地地名。”第三條規定：“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論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傳支部’以及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組織。”

③ 見本卷第35—36頁。——編者注

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他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同盟不想让国际成为战斗的组织；通告要求国际成为未来社会的精确的原型；

“所以我們必須設法使这个組織尽可能地接近我們的理想…… 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現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們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則，并且应当拋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則。”

如果汝拉联合会能够实现自己的計劃，把国际变成还不存在的社会的正确反映，为了使国际服从于同盟及其永恒的独裁者“公民B”的“权力和专政”这个秘密目的，而使国际失去一致行动的任何可能性的話，欧洲警察当局的願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对欧洲警察当局來說，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

同盟的先生們为了向和平同盟和激进資產階級中他們过去的同事們证明，他們发动的战役是針對国际的，而不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他們把自己的通告散发給一切激进的报纸。甘必大先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报”在一篇充滿对汝拉人的鼓励和对倫敦代表會議的攻击的文章中，赶忙承认了他們的功績。³²²“汝拉簡报”对資產階級报刊的这种支持十分高兴，在它的第3期上 *in extenso* [全文] 轉載了这篇文章，从而表明，最誠摯和睦的关系把超革命的同盟盟員和凡尔賽的甘必大分子联合起来了。为了在資產階級中更广泛地傳播关于国际內出現分裂的愉快消息，在許多法国城市特别是蒙彼利埃的街道上，在赶集日都出售桑維耳耶通告。大家知道，在法国，在街上出售印刷品是要經警察当局許可的^①。

在同盟指望为自己搜罗到朋友和对总委员会不滿的人的一切地方，到处大量散发这个通告。但是效果几乎等于零。同盟的西班牙盟員們反对召开通告所要求的代表大会，他們甚至敢于駁斥教皇。³²⁴ 在意大利只有特尔察吉一个人一度支持召开代表大会。

① 土魯斯审判案³²³；見1873年3月18日“改革报”（土魯斯报纸）。

在比利时沒有知名的同盟盟員，但是在这里国际的整个运动混杂在关于放棄政治、自治、自由、联盟、分权制等的资产阶级的髙談闊論中，并且陷于狹隘的地方利益而不能自拔，在这里通告有某些成就。虽然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沒有贊同召开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如果这样做，應該說是荒唐的，因为比利时曾經派出六位代表参加代表會議，——但是，該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共同章程草案，其中总委员会干脆被取消了。当比利时代表大会討論这个提議时，洛德兰薩尔的一位代表指出，对工人來說最好的标准是他們雇主的情緒。根据取消总委员会这一思想所引起的雇主們的那种高兴的勁头，就已經可以断言，不可能

“犯比下令取消这种东西更大的錯誤了”。

所以，提議遭到否决。在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对通告表示了有力的抗議³²⁵，而在其他一切国家中，它干脆遭到了蔑視的沉默。

总委员会以 1872 年 3 月 5 日的內部通告“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回答了桑維耳耶通告和同盟的层出不穷的阴謀詭計。前面已經簡述了这个通告的重要部分。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些阴謀和这些阴謀家进行了应有的懲罰。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辯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們那方面；他們对总委员会各个委員的誹謗，他們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們的支持。在英国¹，支持他們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謀已被总委员会所挫敗。在意大利，支持他們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建議在斯蒂凡諾尼的旗帜下建立一个以羅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論者总协会”，这个协会

是一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組織，无神論修士和修女等等的修道院，这个組織的章程規定，在會議厅里要給每一个捐助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最后，在德国他們受到了俾斯麦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魯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的角色，至于他們出版的警察的报纸“新社会民主党人报”³²⁶就更不用提了。

由于“社会革命报”已經不再存在，所以同盟便把“汝拉簡报”变成了它的正式机关报。該报借口保护各自治的支部免遭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和倫敦代表會議的篡夺者行动之害，竭力破坏国际。“簡报”在1872年3月20日那一期上，公开承认，

“它所理解的国际，并不是現在包含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組織。各种組織是次要的、轉瞬即逝的事情……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說，国际是在現代世界中占統治地位的被剝削者因結一致的感情”。

被归結为简单的“因結一致的感情”的国际，大概会比基督教的爱还更加虛幻呢。为了說明“簡报”采取了多么正派的手腕，我們把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文报纸“自由报”总編輯托卡热維奇的一封信摘引一段如下：

“‘汝拉簡报’第13期上刊登了苏黎世波兰社会主义协会的綱領，本协会再过几天就将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自由报’。我們全权委托您在接到这封信三天以后向国际总委员会声明，这个綱領是假的。”³²⁷

6月15日的“簡报”刊有同盟盟員（巴枯宁、馬隆、克拉里斯、吉約姆等）对总委员会內部通告的答复。这些答复对于总委员会对同盟及其首領們提出的指責一个也沒有回答。教皇由于理屈詞穷，罵这个通告是“一桶污水”，决定以此結束这场爭端。

他宣称：“但是，我永远保留向公意法庭告发一切誹謗者的权利，毫无疑

問，下次代表大会将不会拒絕給我成立这种法庭。只要这个法庭为我提供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我一定会向它叙述有关政治性质以及私人性质的一切事实的全部必要的细节，不怕由于不客气地公开这些事实而产生的不痛快事情和危险。”

当然，公民 B 像通常一样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干脆沒有到海牙去。

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而同盟知道，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要公布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代表会议把起草这个报告的工作委托给了公民吳亭。对于同盟来说，使这个报告不能在代表大会以前公布，使代表們无法得到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公民吳亭前往苏黎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那里刚刚住下，便成了受人謀害的牺牲品，我們毫不犹豫地在这次謀杀算到同盟的賬上。在苏黎世，吳亭除了巴枯宁“完全掌握”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族盟員以外，沒有别的仇敌。而且組織埋伏和暗杀是这个团体认可并經常使用的斗争手段之一；在西班牙和俄国，我們将会看到这一手段的其他例证。操同一种斯拉夫語的八个人在运河边的一个荒地上窥伺着吳亭，当他走近时，他們便从后面扑上去，用大石块猛击他的头部，使他的眼受重伤，如果不是当时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赶来，他們在毆打以后一定会把他弄死并扔到运河里去的。凶手看到大学生便逃散了。这次謀杀并没有妨碍公民吳亭完成自己的著作并把它寄給代表大会。

四

同盟在西班牙

1868年9月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創建人之一、意大利議會議員法奈利到馬德里去了。巴枯宁让他带了几封介紹信給議會議員加里多，加里多使他同資產階級的和工人的共和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此以后不久，即同年11月，从日內瓦給莫拉哥、科尔多瓦-伊-洛佩斯（梦想当議員的共和党人、資產階級報紙“战斗报”³²⁸的編輯）以及魯巴烏·多納德烏（落选的巴塞羅納候選人、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的創建人）寄来了同盟盟員证。寄来盟員证这个消息对国际年輕的馬德里支部起了破坏作用。支部主席哈尔沃退出了支部，因为他不願意屬於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資產者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內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領導。

早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國際的西班牙各組織就已經是由兩名同盟盟員——法爾加·佩利塞爾和散蒂尼昂——代表的，其中散蒂尼昂在正式的代表名單中被列為“同盟代表”。當國際的西班牙各組織在巴塞羅納召開了代表大會（1870年7月）以後，同盟便在帕耳馬、瓦倫西亞、馬拉加和加迪斯建立起來了。1871年在桑維耳耶和哥多瓦分別成立了支部。1871年初，同盟的巴塞羅納代表莫拉哥和維尼亞斯建議聯合會委員會的委員們（弗朗西斯科·莫拉、安赫爾·莫拉、安賽爾莫·羅倫佐、博爾雷耳等人）……在馬

德里成立同盟支部；但是这些委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声称，同盟如果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那是危险的，而如果公开存在，那是无益的。在这一次，单是提起这个名称就已经在联合会委员会内部撒下了纷争的种子。博尔雷耳甚至预言：

“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任何信任都完了。”

但是，当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葡萄牙的时候，莫拉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秘密团体的益处，于是根据他们的倡议在马德里成立了同盟支部。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几个葡萄牙人（国际会员）拉进了同盟。但是，他认为这些新手不够靠得住，所以他背着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由在共济会会员中招募来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分子组成的同盟小组。这个新的、有前神甫博南萨参加的小组，企图按每十个人一个支部的形式来组织国际，它们应当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下为皮尼希伯爵的计划服务，而这个政治阴谋家也的确成功地诱使它们从事以使他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的冒险事业。由于同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策划阴谋，国际的葡萄牙会员退出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把这个团体从国际中开除出去。

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

全体委員参加同盟的亲信組織。在此以前一直不敢回西班牙去的莫拉哥一得悉这个事实，便匆忙来到了馬德里，他指責莫拉“想使同盟从屬於国际”，說这一点違背了同盟的宗旨。为了使这个意見能得到重視，他在次年1月給梅薩看了巴枯宁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巴枯宁發揮了統治工人階級的馬基雅弗利式的計劃。这个計劃如下：

“同盟在外表上應該存在于国际之內，而实际上則應該稍微站在它旁边一点，以便更好地監督它和領導它。基于这种考虑，参加国际支部委員會的盟員在同盟支部中永远應該是少数。”（霍賽·梅薩1872年9月1日交給海牙代表大會的聲明）³²⁹

在同盟的一次會議上，莫拉哥指責梅薩出賣了巴枯宁的团体，因为梅薩让联合会委員會全体委員参加了这个亲信团体，从而使他們在同盟支部中取得了多数，并且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对同盟的优势。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优势，秘密指令規定，只应当有一名或两名同盟盟員钻进国际的各委員會，并且要根据同盟支部的指示，在同盟支部的支持下領導它們，凡是應該由国际接受的決定，事先都要在同盟支部中研究好。从这个时候起，莫拉哥就对联合会委員會宣了战，并且也像在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支部，那些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仍然不知道这个支部。同盟的亲信盟員們在西班牙各地支持他，并且开始指責联合会委員會忽視自己对同盟所应尽的責任；关于这件事情，由达蒙——蒙托罗在同盟中的化名——簽署的同盟瓦倫西亚支部通告（1872年1月30日）³³⁰可以作證。

西班牙的同盟接到了桑維耳耶通告以后，並沒有站到汝拉那一边去。甚至作为創始者的巴塞羅納支部在1871年11月14日的

正式信件中也十分激烈地以道地的異教徒的口吻評論了教皇米哈伊尔，这个支部怀疑他同卡尔·馬克思在进行个人竞争^①。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贊同这封信，这說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在此以后不久便可以看到，这些剛愎自用的人就幡然悔悟了。在討論桑維耳耶通告的国际馬德里联合会會議(1872年1月7日)上，由于莫拉哥領導的一个新的小組阻撓表決罗曼語区联合会的反通告，使討論陷于中斷。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馬德里支部报告說：

“必須鏟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傾向。”

目前只是在帕耳馬，在馬利奥尔卡島，同盟才使国际委員們公开贊同了汝拉通告。于是教会紀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

① 阿勒里尼“以〈同盟〉巴塞羅納小組的名义”寄給“我的亲爱的巴斯特利卡和亲爱的朋友們”的这封信的副本被散发給了同盟的所有西班牙支部。現在我們从中作一些摘引：

“本屆总委员会只存在到明年的代表大会为止，它的极其有害的活动只能是暫时的……相反地，公开的决裂会使我們的事业遭到很大的打击，即使我們的事业总的說来能够經得起这种打击，也难于恢复元气。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你們的分立主义的傾向……我們中有些人自己在想：在这一切事情中，或者与这一切事情同时，除了原則的問題以外，是否也有私人的問題，例如我們的朋友米哈伊尔同卡尔·馬克思之間、老同盟的盟員和总委员会委員之間竞争的問題呢……我們痛心地在‘社会革命报’上讀到了对总委员会和卡尔·馬克思的攻击……如果我們知道半島上那些影响着各地方委员会的我們的朋友的意見的話，那这个意見可能会使我們改变立場而轉向共同決定的方面，那时我們將在一方面适应这种共同決定，”云云。

老同盟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总委员会所摧毀了的公开同盟。我們摘引的这封信是阿勒里尼亲笔写的。

謬誤的最后嘗試。

面對着這種地下工作，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知道，必須立即擺脫同盟。政府的迫害使它有理由這樣做。它建議成立“國際的捍衛者”秘密小組，以防國際的解散，同盟的支部應當不知不覺地溶化在這些小組之中。大量盟員的參加必不可免地要改變這些支部的性質，只要迫害一停止，這些支部就會和這些小組一起消失。但是，同盟看出了這個計劃的秘密目的後便搞垮了這個計劃，然而，沒有這種組織，政府一旦實行威脅，國際在西班牙的存在就會受到威脅。為了與此相對抗，同盟提出了下列建議：

“假如把我們置于法律之外，使國際具有一種能夠為政府所容許的形式，將是合適的；各地方委員會最好應當成為秘密中心，它們在同盟的影響下，會使各支部具有完全革命的方針。”（1871年10月25日同盟桑維耳耶支部通告331）

行動上胆小怯懦，言語上勇敢無比——同盟在西班牙是如此，在一切地方也是如此。

倫敦代表會議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的決議使同盟不得不公開反對國際，而這個決議也使聯合會委員會有理由確證它同絕大多數國際會員是完全團結一致的。此外，決議也向它提出了在西班牙建立一個廣泛的工人政党的思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使工人階級完全脫離一切資產階級政党，特別是共和黨，因為它的大多數選民和擁護者都是在工人中網羅的。聯合會委員會建議拒絕參加一切君主制和共和制的議員選舉。為了驅散由於共和黨人的假社會主義的花言巧語在人民中滋長的幻想，兼任聯合會委員會委員的“解放報”編輯們給在馬德里召開代表大會的共和聯邦黨的代表們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採取實際的措施，並且

建議他們就国际的綱領发表意見。³³² 这意味着使共和党遭受可怕的打击；同盟却設法減輕这个打击，因为它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系。³³³ 它在馬德里創辦了“被判罪者”³³⁴ 周报，这家报纸提出同盟的三項美德：无神論、无政府状态、集体主义作为綱領，但是同时又建議工人們不要爭取縮短工作日。除了莫拉哥“兄弟”以外，为該报撰稿的还有埃斯太瓦內斯——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三个成員之一，不久前的馬德里总督和陆军大臣。在馬拉加有皮諾——假国际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在馬德里有菲力浦·馬丁——現任同盟的推銷員，曾充当共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代理人。而为了在西班牙議會中也有自己的法奈利，同盟打算提出莫拉哥作为候选人。

同盟仅仅因为两件事就不能饒恕联合会委员会：（1）联合会委员会在汝拉問題上棄权；（2）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損害它的不可侵犯性。当委员会对共和党采取的立場破坏了同盟的全部計劃以后，同盟便决定要惩办它。給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信被同盟理解为是一种宣战的行动。該党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平等报”³³⁵ 瘋狂地攻击“解放报”的編輯們，指責他們投靠了薩加斯塔。“被判罪者”周报頑固地保持沉默以支持这种卑鄙的指責。同盟还为共和党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由于这一封信，它設法把“解放报”的編輯們开除出了同盟的影响占优势的国际馬德里联合会。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會議以后的6个月活动中，在瓦倫西亚把地方联合会的数目由13个增加到70个；在其他100个地方，它也筹备建立新的联合会，把8个行业的工人組成全国規模的抵抗团体。此外，在它的支持下成立了規模巨大的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这些功績为委员会的委員們造成

了极大的精神影响，使得巴枯宁感到有必要使他們回到真理的道路上來，于是他在1872年4月5日給委员会总書記莫拉去了一篇很长的父亲式的訓示（見“文件”第三号^①）。虽然同盟至少派了12名代表出席并且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薩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4—11日）还是撤銷了开除这些委員的决定，并且把被开除的两个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尽管他們再三拒絕提他們为候选人。

与薩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同时，像往常一样，同盟也举行了秘密集会。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員們在会上提出了解散同盟的建議。为了不否决这个建議，他們狡猾地避开了它。两个月以后，在6月2日，仍然是这些公民以西班牙同盟領導人的身分并代表同盟的馬德里支部給其他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在通告中他們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并且做了如下的論证：

“同盟离开了在我們看来它在我国應該遵循的道路；它歪曲了使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思想，同盟沒有成为我們偉大协会的組成部分，沒有成为推动国际的各个組織前进、帮助它們并促进它們发展的积极因素，却完全脫离了协会的其他部分，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力图使一切都服从于它的仿佛是最高的組織；从而它就造成了我們內部的不信任、糾紛和分裂…… 在薩拉哥沙，同盟不仅沒有提出建議并帮助解决問題，相反地，只是为代表大会的重要工作制造障碍。”

在西班牙的所有同盟支部中，只有一个加迪斯支部答复了这个通告，它通知說它已經解散。可是就在第二天，同盟便再次設法把在6月2日通告上签名的那些人开除出了国际的馬德里联合

^① 見本卷第514—515頁。——編者注

会。开除的借口是“解放报”6月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求調查

“各大臣、將軍、行政官吏、公職人員、市長等人……以及一切沒有擔任國家職務但是在各屆政府的卵翼之下生活，在議會中支持政府并戴着虛假的反對派的假面具來掩護政府的違法行為的那些政治活動家的財富，是怎樣得來的……沒收這些人的財產應當是革命後第二天將要實行的第一個措施”³³⁶。

同盟認為這篇文章直接攻擊了它在共和黨中的朋友，於是就指責“解放報”的編輯們背叛了無產階級的事業，借口是他們要求沒收這些盜竊國家資財的人的財產就是承認私有制。為了證明同盟的革命詐騙術後面所隱藏的、它想灌輸給工人階級的那種反動性，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證據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於具有共產主義思想而被他們革除教籍的人當作私有制的維護者加以開除，為了證實同盟分子的詭詐性，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證據了。

再次開除這些委員這個行動是違反現行章程的，章程規定要成立公意法庭，參加這個法庭的7名陪審員中，可以由被告本人推薦兩名，對於法庭的決定他也可以在支部大會上提出申訴。可是同盟不願意在它的自治方面受到限制，它沒有這樣做，而是在提出控告的同一個會議上就下令開除這些人。在支部的全体130個成員中，只有15個串通好了的人出席了會議。被開除者向聯合會委員會提出了申訴。

由於同盟施展各種詭詐伎倆，這個委員會被遷往瓦倫西亞。在薩拉哥沙代表大會上重新當選的兩名前聯合會委員會委員中，莫拉不同意當選，而羅倫佐幾乎立即就提出辭職。從這個時候起，

联合会委员会便連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給同盟了。因此，在答复被开除者的申訴时，它声明自己并不主管这件事，虽然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第七条規定它有責任把違反章程的任何地方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去，让地方联合会保留有对这个决定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訴的权利。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絕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馬德里联合会便訴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組織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的規定³³⁷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這個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馬德里联合会代表^①的代表資格证是有效的。

同盟明白这第一次反抗运动的全部意义；它知道，如果不在萌芽状态就把它掐死，那末在此以前一直如此温順听话的西班牙国际就将从它手中溜走；于是它使出了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正派的和不正当的。它起初是进行誣蔑。被开除的人（安赫尔·莫拉、弗朗西斯科·莫拉、霍賽·梅薩、維克多·帕赫斯、伊格列西亚斯、薩恩斯、卡耳耶哈、鮑利和拉法格）的名字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刊登在报纸上，張貼在各支部的办公室里。莫拉为了履行总书记的職責而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一連好几个月都从他的兄弟那里得到接济，因为没有錢維持生活，但是他却被指責为似乎是靠国际供养过活。梅薩为了掙錢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譯了一篇文章，他們就說他投靠了資產階級。拉法格被指責为罪該万死，因为他利用卡岡都亚才配享受的午餐使新的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两名委員（馬丁涅斯和蒙托罗）的孱弱的肉

① 保·拉法格。——編者注

体受到了圣安东的诱惑，似乎他们的良心是藏在肚子里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出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诬蔑。由于这些办法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便转而进行恫吓。在瓦伦西亚，莫拉中了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所设下的埋伏，他们手执木棍在那里等他。地方联合会的成员们拯救了他，他们熟悉这些先生的手段，并且断言，罗伦佐是在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证据的影响下提出辞职的。不久以后，在马德里又发生了类似的企图谋害伊格列西亚斯的事件。同盟分子的主教会把“解放报”列入禁书目录，使这家报纸遭受了一切正统教徒的谴责；在加迪斯，为了使罪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种对死的恐惧，曾经宣布，每一个卖“解放报”的人都将被当做叛徒赶出国际。同盟分子的无政府状态在宗教裁判官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同盟按照它自己的惯例，开始设法使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团都由同盟盟员组成。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给各支部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新马德里联合会知道这个内部通告。在这个通告中，提出派一个由国际全体会员投票选出的总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并且由全体会员按人头每人派 25 生丁，以抵敷各种开支。由于各地方联合会没有时间就候选人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很明显，当选的将是同盟圈定的候选人，这些人都将用国际的钱去出席代表大会，而实际上结果也正是这样。这个通告到底还是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中，并且被转寄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知道联合会委员会受着同盟的操纵，断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說：

“公民们！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

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設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們偉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絕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們从塞維尔的‘理智’上知道，你們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組織和性质就已經同我們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違背，所以，它違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們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們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組織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責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須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隱瞞这个秘密組織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①

此外，总委员会責成他們提出一些材料来調查同盟（这方面的材料总委员会打算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并且說明为什么他們认为，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他們履行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不过，它在信中承认了同盟的存在。

由于我們談过的那些阴谋詭計都不足以保证在选举中获胜，同盟便决定在自己的各家报纸上提出法尔加、阿勒里尼、索里阿諾、馬尔塞劳、門德斯、莫拉哥为正式候选人。投票的結果，馬尔塞

^① 見本卷第 135—136 頁。——編者注

劳获得 3 568 票,莫拉哥 3 442 票,門德斯 2 850 票,索里阿諾 2 751 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洛斯塔烏在卡塔卢尼亚的 4 个城市中获得 2 430 票,虽然这些城市的紀律性还不够强;富斯特尔在卡塔卢尼亚的桑斯获得 1 053 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沒有一个人的票数超过了 250 票。为了保证使法尔加和阿勒里尼当选,联合会委员会授予同盟占統治地位的巴塞罗纳城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特权,这里的代表自然就是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了。同一个正式通告确认,提出洛斯塔烏和富斯特尔从而也就否决了同盟的正式候选人的卡塔卢尼亚的 4 个城市交了 2 654 雷阿耳(合 663 法郎 50 生丁)供代表团抵敷各种开支,而由于工人不习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同盟能够使自己的候选人获得通过的西班牙其他各城市,却只交付了 2 799 雷阿耳(合 699 法郎 75 生丁)。新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說,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錢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沒有繳納應該上繳給总委员会的会費。

这一切同盟还嫌不够。它想让它的代表們都有同盟分子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請看它是怎样把各种委托书弄到手的。在 7 月 7 日的通告中,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把各地方联合会提出的全部限权代表委托书合为一个共同的委托书,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个比波拿巴全民投票³³⁸更坏的手法使同盟有可能为自己的代表团拼凑一个它打算强加于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而如果国际的組織条例規定国际應該实行的投票方式不立即改变的話,同盟就禁止自己的代表参加投票。这不过是一种騙人的把戏,是卡斯特拉尔百般贊揚的、和平同盟在采用的投票方式。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西班牙的代表們不顾自己的委托书参加了按联合会进行的投票,这个

事实就证明这是騙人的把戏。①

① **散蒂尼昂**——巴塞罗納的医生，巴枯宁的私交，西班牙的同盟創建人之一，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他就建議国际會員不向总委员会繳納会費，因为总委员会用会費来购买武器。他企图阻撓西班牙的国际捍卫被战胜了的公社的事业；由于違反了出版法而被监禁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勇敢地同当时受迫害的国际断絕关系；因此，巴塞罗納的全体工人都拋棄了他，但是他仍然是同盟的秘密領袖之一；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1871年8月14日，即公社失敗后过了三个月，同盟盟員蒙托罗在給一个同盟盟員的信中把散蒂尼昂当做可以介紹他并证明他是同盟盟員的人。

維尼亚斯——医科大学的学生，散蒂尼昂在1872年1月26日的信中把他作为“国际在巴塞罗納的灵魂”介紹給李卜克內西，他在国际受到迫害的时期退出了国际，为的是不致損害自己家庭的声誉，虽然警察局并不准备費心把他关进監獄。

法尔加·佩利塞尔——也是同盟的头目之一，散蒂尼昂在同一封信中指責他在遭迫害时讓別人在法庭上替他的文章受过而自己却溜掉了。同盟分子的兔子般的勇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的自治。他們对资产階級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抗議的表現，就是一溜了事。

索里阿諾——另一名头目。秘密科学的教授……，在迫害加剧的时候退出了国际。在薩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曾經有可悲的勇气反对拉法格和其他代表提出的公开举行會議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触怒政权当局是不明智的。最近，就是說在亞馬多統治下，索里阿諾担任了政府中的职务。

莫拉哥——小鋪老板、小酒館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們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賭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員的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議把国际的文件拋入海中。当薩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員的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灣里躲避風暴去了。同盟沒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

克利門特·博韦——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 (las tres clases de vapor³³⁹) 主席，他由于对财务采取了过分自治的态度而被撤职并被撵走。

迪奥尼西奧·加尔西亚·弗賴列——1872年7月28日同盟机关报“联盟”发表了他的一封对新馬德里联合会极尽攻击之能事的长信，并尊称他为“我們亲爱的同人”，他曾在圣塞瓦斯田的警察局供职，并且把国际一个支部的出納处偷得精光。

五 同盟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同盟的建立先于国际。教皇米哈伊尔住在这里，并且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青年中间建立了很多联系。国际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从一成立起便处在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同盟分子的领导之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律师甘布齐^①让自己的“模范工人”卡普卢索当上了支部主席。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同他的忠实的卡普卢索一起代表了国际的那不勒斯会员，而法奈利^②——这个同盟的安东涅利、在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工人协作社的代表——因病滞留在途中。

① “律师卡洛·甘布齐是卡普卢索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卡普卢索是同盟支部的模范主席。他给了卡普卢索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当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卡普卢索的时候，甘布齐坚决反对在通报上公布这一事实，并且还劝说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坚持公布他的另一个可耻的私吞 300 法郎的事实。”（1871 年 7 月 12 日卡菲埃罗的信）³⁴⁰

② 法奈利早就当上了意大利议会议员。有人向甘布齐质问这件事，他说，当议员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你不受警察的侵犯，并且可以免费坐意大利一切火车。同盟禁止工人实行任何政治发动，因为要求某一个国家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就是承认国家并且对祸害的根源屈服；但是同盟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参加议会会议，享受资产阶级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却得到教皇的宽恕。法奈利在意大利议会所进行的无神论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到现在为止只有以《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为口号的权威主义者马志尼才为之备加颂扬。

同至圣的父亲的亲密关系冲昏了我們的好汉卡普卢索的头脑。回到那不勒斯以后，他自命高于其他一切同盟分子之上；在支部中他以主人自居。

“巴塞尔之行使卡普卢索完全变了样…… 他从代表大会帶回了許多与我們团体的原則截然对立的离奇思想和意图。他先是悄悄地，以后便大声地以专橫的口吻談起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权力；他断言总委员会只信任他一个人，如果支部不听从他的話，他有权解散它，成立一个新的支部。”（1871年7月那不勒斯支部給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由同盟的律师卡尔梅洛·帕拉迪諾起草并署名。）

卡普卢索的权力显然是来自同盟中央委员会，因为国际从来没有給他这种权力。在好汉卡普卢索看来，国际不过是个个人发财致富的源泉罢了，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女婿即前耶穌会教徒和卸任神甫

“为国际的教授，并且强迫不幸的工人听他关于尊重财产的冗长讲话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胡言乱語”（卡菲埃罗的信）^①。

在此以后，他就投靠了因国际在那不勒斯的成就而惊恐不安的资本家。他遵照这些资本家的命令誘使那不勒斯的毛皮工人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罢工。他和支部其他三个成员一起被关进监狱以后，竟私吞了支部寄給四名被囚者的300法郎生活费。由于这些

① 卡普卢索在那不勒斯遭到反击之后过了两年，又恬不知耻地硬要总委员会接受这个人物，他为这个人做了这样的广告：“国际主席公民！在巴塞尔工人代表大会上討論过并且目前仍然为一切阶级思想家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大問題，現在已經解决了。研究社会問題这个复杂題目的人是我的女婿，即我的女儿的丈夫；他研究了上述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且依靠科学的帮助，发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綫索，从而提供了按照工人家庭和资产阶级各自的权利确立它們二者之間的完全均勢的可能性”云云（署名：斯蒂凡諾·卡普卢索）³⁴¹。

光荣的功績，他被开除出了这个一直存在到被强力驅散（1871年8月20日）时为止的支部。但是，同盟躲过了警察当局的迫害以后，却利用这一点来搶占国际的地位。卡尔梅洛·帕拉迪諾一方面寄发了我們前面摘引过的那篇正式报告，另一方面又于1871年11月13日对倫敦代表會議表示抗議，使用的詞句和論据同我們在标明的日期早一天的桑維耳耶通告中看到的毫无二致。

1871年11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組成的支部³⁴²。除了工人，即除了主要是由庫諾吸收进来的机械工人以外，在这个支部中还有完全受同盟的影响的大学生、小报記者、小职员。庫諾由于是德国人，不知道同盟的秘密；但是，他有可能判定，在到洛迦諾这个同盟分子的羅馬朝圣以后，这些資產階級青年組成了秘密团体的一个支部。接着（1872年2月），庫諾就被意大利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驅逐出境；由于这种从上面来的帮助，同盟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且逐渐控制了国际的米兰支部。

1871年10月8日，在都灵成立了工人联合会³⁴³；它向总委员会請求加入国际。該联合会書記卡洛·特尔察吉这样一字不差地写道：«Attendiamo i vostri ordini»——我們等候你們的指示。为了证实国际在意大利从最初时期起就要經過同盟这个官僚的一級，他通知說，

“总委员会将从巴枯宁那里得到腊万納工人协会宣布它是国际支部的信”。

12月4日，卡洛·特尔察吉通知总委员会，說工人联合会分裂了，因为該联合会的多数派是馬志尼分子，而少数派則成立了名为“无产者解放社”的支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总委员会为自己的“无产者报”要錢。以金錢支持报刊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但是

在倫敦有一个募捐帮助国际的报刊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經打算寄出为数 150 法郎的补助金,就在这时候“玫瑰小报”报道說,都灵支部公开站到汝拉人方面去了,并且决定派一名代表出席汝拉联合会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两个月以后,特尔察吉在雷吉斯面前吹嘘說,他是在洛迦諾亲自从巴枯宁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才通过这个决定的。鉴于对国际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委员会沒有把钱寄去。

虽然特尔察吉是同盟在都灵的主要助手,但是教皇駐那里的真正使节是一个冒充为波兰医师的名叫雅科比的人。为了說明他对总委员会的所謂泛日耳曼主义的仇恨,这位同盟的医生指責总委员会

“在普法战争时期玩忽职守和毫无作为;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負罪責,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意志的傾向是极其触目的,因为当时在巴黎城下的德国军队中有 4 万名国际会员 <I>,而总委员会却不能或者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制止战争的继续<II>”(1872 年 3 月 1 日雷吉斯給总委员会的报告³⁴⁴)。

他把总委员会和支援报刊委员会混为一谈,指責总委员会拒絕把 150 法郎交給同盟分子特尔察吉是“遵循了受贿和賄买成性的各国政府的理論”。为了证明这个控訴是出自同盟的心灵深处,吉約姆认为他有責任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

正当特尔察吉在他的报纸上公开擂起了同盟反权威主义的战鼓的时候,他自己又偷偷写信給总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权威拒絕接受都灵工人联合会的会費,并且按照規定手續把根本就不是国际会员的記者貝盖利开除出去。就是这个特尔察吉,“都灵警察局长的好友 (amicone),在会晤时受到局长苦艾酒款待

的人”（1872年4月5日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却在公开会议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往都灵的流亡者雷吉斯到会的消息。得到这种提示后，警察局便马上跟踪雷吉斯，只是由于支部的帮助，雷吉斯才得以越过国境。

在都灵，特尔察吉是以下述方式完成自己的同盟分子的使命的。当对他提出严厉的谴责的时候，“他威胁说，如果不选他当书记，如果支部不服从他，不承认他的权威或者对他提出责难，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他威胁说不论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都要去当警察局的密探（questurino），以示报复”（前面引过的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特尔察吉利用种种理由企图吓倒支部。作为财务员和书记，他在出纳处大肆进行同盟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他不顾总委员会的坚决禁止，确定自己的薪金为90法郎；他把一些没有从出纳处支出然而却下落不明的款子记在账簿的已支项目内，他本人编制的会计收支表报写明库存现金56法郎，事实上这笔钱下落不明，而他又拒绝赔偿，同时他也不肯交出用从总委员会那里领到的200张会费券所收到的会费。大会一致把他逐出（scaccio）支部（前面引过的报告）。永远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批准了这个关于开除特尔察吉的决定，但又立即设法把他选为佛罗伦萨支部的名誉成员，不久以后又把他选为这个支部出席里米尼代表会议的代表。

几天以后，特尔察吉在3月10日的信中向总委员会这样解释他被开除的事：他不愿做这个由坏蛋和暗探（canaglia et mardocheria）组成的支部的成员和书记，因为这个支部“是由政府的走狗和馬志尼分子组成的”，因为有人企图对他提出责难，“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是由于我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他在支部的

出納处實現了这种战争)。他想用这封信来证明,在对于除了想做总委员会的馴服的僕人以外沒有任何别的希望的好汉特尔察吉的評价上,总委员会被人奇怪地引入了迷途。难道他“沒有經常声明,要做国际的会员,就必须向总委员会繳納会費”而不顾同盟的秘密指示嗎?

“如果說我們参加了汝拉代表大会,那不是要对你們宣战,亲爱的朋友們,我們不过是随波逐流;我們力图进行調解并解决冲突。至于談到对各支部实行集中制的問題,我认为,如果不損害它們所固有的一些自治,那末这种集中制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最高委员会将拒絕接受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你們可以相信,誰也不敢指責你們实行权威主义;我可以对这一点負全部責任……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得到卡尔·馬克思的准确的傳記;在我們意大利沒有他的确凿无誤的傳記,我想首先領受这份荣誉。”

这一切阿諛逢迎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事业,为了不把地方让給我的为数众多的敌人,为了向他們证明国际是团結的,我坚决請你們,如果还不迟的話,把最高委员会决定撥給我的 150 法郎的补助金寄給我。”

特尔察吉相信他可以不受处分,所以大概他又施展了新的詭譎伎俩,而使自己在佛罗倫薩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甚至 Fascio Operaio [工人联合会] 也被迫和他断絕关系。我們希望汝拉委员会将会更好地評价他的功績。

同盟把特尔察吉当做自己的真正代表,把罗马尼亚当做最合适的基地。同盟在那里建立了它的一批伪装成国际支部的支部;它們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服从共同章程,不报告它們成立的消息,不向总委员会繳納会費。这是真正自治的支部。他們起的名称是“工人联合会”,起着联合各种工人团体的中心的作用。

“是否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联合会’的充分自治而使它服从伦敦总委员会或者汝拉委员会的领导，还是应该保持充分的独立，同两个委员会都保持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872年3月17日他们在博洛尼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用下列决议做了回答：

“代表大会把伦敦总委员会和汝拉委员会都只看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大会责成它在博洛尼亚的地方代表机关同它们两者联系，并把结果通知各支部。”

“工人联合会”真疏忽极了，它竟向非亲信者泄漏了暗中存在一个同盟的秘密中心的事实。汝拉委员会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秘密活动。至于总委员会，博洛尼亚代表机关根本没有让它知道自己的一点情况。

同盟一得悉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就把它这个“工人联合会”推上前台，它为了自己自治的权威或权威的自治，攫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称号，并且于8月5日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在派代表到里米尼去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那不勒斯支部曾经加入国际，而真正积极活动的国际支部中没有一个派代表到那里去，甚至连米兰支部也没有派代表去。这个代表会议在下述决议中暴露了同盟所制定的运动计划：

“鉴于：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

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

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

总委员会在伦敦出版了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使它的不体面的

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該通告中，它繼續从事誣蔑和欺騙，暴露了它渴求权力的全部欲望，这在下面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暴露得尤其明显：

‘在没有其他的被自願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決議是很困难的’（“內部通告”第 27 頁^①）；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調查这个秘密組織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第 31 頁^②）；

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憤，以致有人建議撤銷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

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根据这一切理由，

代表會議向全世界工人庄严声明，从此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不再同倫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同时重申在經濟上同一切工人團結一致，并且建議一切不贊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則的支部于 1872 年 9 月 2 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紐沙特尔(瑞士)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全协会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代表會議的名义：主席卡洛·卡菲埃罗 書記安得列阿·科斯塔 1872 年 8 月 6 日于里米尼。”

想以“工人联合会”来取代总委员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甚至同盟的普通分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敢把里米尼通过的決議拿出来让国际的西班牙会员进行表决。于是，为了糾正自己的失策，同盟也派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不放棄在圣伊米耶召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意大利只是由于特殊的天惠才成了同盟的乐土。教皇米哈伊尔在他給莫拉的信(“文件”第三号)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

① 見本卷第 40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5 頁。——編者注

“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蓬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原来如此！〉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①

圣父是对的。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在意大利领导这一切伪国际支部的，都是那些没有委托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商业职员，而主要的是一些声誉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小报记者。唯有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国际的报刊，即自称的国际报刊才具有“费加罗报”所独有的那种性质。只要看一下这些伪支部的书记们的笔迹，就会深信，这些笔迹总是使这些办事员或者专耍笔杆的人露出马脚。同盟这样控制了各支部的正式职位以后，每当意大利的工人们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与国际的其他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它就能够迫使它们请求这些把国际看做是“升官发财之途”和“出路”的身为同盟盟员的游民来帮助。

① 关于这一点加里波第本人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您给我寄来‘社会未来报’，我将满怀兴趣地阅读它。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谎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西班牙和法国也吃了这一个祸害的苦头。祝‘未来报’获得成就，仍然忠于您的朱·加里波第。”

六 同盟在法国

同盟盟員在这里为数不多，但是十分热心卖力。在里昂领导同盟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在馬賽——是巴斯特利卡，三个人都是吉約姆主編的各家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同盟正是依靠了他們，才能够在 1870 年 9 月破坏里昂运动；在他們看来，这次运动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巴枯宁有可能頒布他那值得紀念的廢除国家的法令。——同盟在里昂起义失敗后的活动，在下面摘引的巴斯特利卡的一段信（1870 年 12 月 13 日于馬賽）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

“我們的实际力量在工人中間是巨大的；但是自从最近遭受迫害以来，我們的支部还没有重新組織起来。我們没有下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担心在缺乏領導人的情况下人們恐怕会被腐蝕。我們在等待时机。”

巴斯特利卡被編入了补充团，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調离馬賽。这个事实成了他不允許国际支部重新組織起来的充分理由，因为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亲自在場对于支部的自治是极为必要的。同盟活动的最明显的成績，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似乎都是由它代表的那个国际在里昂和馬賽的工人心目中丧失了威信。

里沙尔和勃朗的下場是众所周知的。1870 年秋天，他們到了倫敦，并且企图在法国侨民中为波拿巴复辟搜罗走卒。1872 年 1 月，他們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帝·国·和·新·的·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 1872年布魯塞尔版³⁴⁵。

他們以同盟的詐騙家所固有的謙虛精神宣告：

“我們是組成了法国无产階級大軍的人……我們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領袖……我們幸而沒有被枪杀，我們来到这里，是要在他們（徒驚虛名的議員們、腦滿腸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豎立起引導我們进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們將要遭到的誹謗、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的欧洲发出出自我們意識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鳴的呼声：**皇·帝·万·岁·！**”

我們不去研究，由于“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成了帝国拥护者的这两个同盟盟員，实际上是像他們过去的的朋友吉約姆在海牙所說的那樣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恶棍”呢，还是他們从同盟的教皇那里接受了專門的任务去参加波拿巴密探的队伍。俄国同盟的文件是与秘密章程相符合的，它揭穿了这个神秘团体的秘密的秘密，后面我們將要摘引这些文件的个别章节。文件直截了当地說，国际兄弟應該钻进一切地方，甚至可能受命到警察局去服务。而且，这两位兄弟对自己的农民的皇帝的崇拜並沒有超过巴枯宁在1862年对他的农民的沙皇的崇拜。

在同盟盟員沒有钻进去的那些法国城市中，国际自从公社复灭以来发展得很快。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法国書記^①曾經报告說，国际在三十多个省里都有自己的組織。同盟两个主要的法国通訊員——貝努瓦·馬隆和茹尔·盖得（后者曾經在桑維耳耶通告上签名）知道我們的协会获得了这样迅速的发展，便企图破坏我們的

① 奧·賽拉叶。——編者注

协会，以利于同盟。当他們的书信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时，便派去了密使，其中包括一个姓梅契尼柯夫的俄国人；但是他們的图謀毫无結果。这些人蛮不讲理地指責总委员会妨碍工人們

“在每个国家自由地、自发地、按照自己精神的特点和地方习惯組織起来”（1872年9月22日盖得的信）³⁴⁶，——

当工人們剛剛开始自由地、自发地……但是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地組織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对工人們說，坐在总委员会中的那些德国人正在压迫他們，而且为了得救，除了参加他們的正統的、反权威主义的教会以外，沒有其他方法。法国工人只感到受凡尔赛分子的压迫，所以就把这些信件轉寄給了总委员会，問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同盟在法国的这一活动最好地证明，它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做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誰不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对我們——这就是同盟在其俄文宣言中公开宣布的原則。如果一般的运动不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它的宗派主义压制，这个运动的成就对它說来就是不幸。所以正当法国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個組織而不問其形式如何的时候，同盟却出来給梯也尔和地主議會帮忙，对国际宣战。

現在我們看一看，誰是同盟在其拥护凡尔赛分子的运动中的走狗。

在蒙彼利埃，盖得先生的代理人是某个保尔·布魯斯，医学系的学生，他竭力在盖得从前主編“人权报”³⁴⁷的埃罗省到处进行同盟的宣傳。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当法国南部的国际会员商定集資派一位共同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时候，布魯斯就企图

劝说蒙彼利埃支部不要缴纳应缴的一份，并且在代表大会没有解决各种争论的问题以前不要发表意见。法国南部委员会——蒙彼利埃支部——决定要求代表大会把布鲁斯从国际中开除出去，因为“他的行为不老实，引起了支部的分裂”。他的朋友盖得在10月从罗马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一篇通讯³⁴⁸中竟大骂这是对布鲁斯的权威主义的谋害行为，并且在通讯中指名道姓地称蒙彼利埃的卡拉斯是挑拨离间分子，而对布鲁斯却只写出姓名的缩写。警察当局利用这个情报，便派人跟踪卡拉斯，并且在此以后立即在邮局截获赛拉叶给卡拉斯的信，信中多处谈到土鲁斯的丹特雷格。12月24日，丹特雷格被捕。

同盟在纳尔榜的几个最积极的爪牙是：被揭露为密探的贡德雷斯；在纳尔榜和佩皮尼扬担任过警探职务的巴卡夫；马隆的通讯员、律师德·圣马丁。德·圣马丁先生在1866年为了在皇室和艺术事务部内谋求差事而到处奔走。1869年，当他由于违犯出版法被判罚款800法郎的时候，共和党人联合集资替他缴付罚款；但是圣马丁没有用这些钱去缴付罚款，却用来到巴黎去稍微游览了一番，结果是工人们为了避免冲突不得不再次捐款。1871年的五月事件以后不久，这个圣马丁在凡尔赛政府中谋得了一个专区区长的职位。

同盟还有一个爪牙：1871年11月卡拉斯写信给赛拉叶说，

“您可以信赖公民阿伯尔·布斯凯对社会事业的绝对忠诚，他……是贝济埃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主席。”

过了两天，即11月13日，赛拉叶接到了下面这份声明：

“我们已经证实……我们共同的朋友公民卡拉斯受了骗，误信了贝济埃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斯凯先生，这个人完全不配受这种信任，因为他是贝济埃

首席警官的秘书……公民卡拉斯已經承認錯誤，他成了這一錯誤的犧牲品，經他同意，我們請求公民賽拉叶把公民卡拉斯不久前寄給他的最后一封信看做是无效的，此外，如果可能的話，請求他設法把布斯凱先生从国际开除出去。受貝济埃和佩澤納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委托。”(后面是签名)

根据这个声明，賽拉叶在土魯斯的“解放报”(1871年12月19日)上揭露了这个布斯凱先生是警察局的密探。在标明“1872年7月24日于納尔榜”的那封信中指出，布斯凱先生

“身兼警察局大队长和日内瓦分裂分子的旅外代办的双重职务”。

因此，1872年11月10日的“汝拉簡报”为他辯护完全是理所当然的。³⁴⁹

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大家知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这个少数派由下列代表组成：4个西班牙人、5个比利时人、2个汝拉人、2个荷兰人和1个美国人。

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

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定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

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同盟的人马全部到齐。除了西班牙人和汝拉人以外，到会的还有代表意大利的6名代表，其中包括科斯塔、卡菲埃罗、法奈利和巴枯宁本人。2名代表自命代表“几个法国支部”，1名代表自命代表两个美国支部。总共是15名同盟盟员。这个代表大会终于为巴枯宁提供了“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当然，会上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这些人足足有一半不属于国际，但是他们授予自己最高法庭的称号，妄图对我们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行动做出最后判决。他们宣

称，他們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決議，絕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們代表自己的各个联合会（虽然他們沒有任何权力能够这样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³⁵⁰，以反对总委员会和一切承认海牙決議的人。在下面这个直接譴責巴黎公社的決議中，他們給自己的棄权論的无政府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代表大会声明：（1）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是摧毁任何政权；（2）建立任何一种以实现摧毁政权为目的的政权，哪怕是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騙，都像所有現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

最后，他們决定号召其他自治論者的联合会参加这个新公约，并且在半年以后召开第二次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从此以后，汝拉委员会就公开地把分裂分子事务的领导工作抓到了自己手里。跟着它跑的那一部分国际，无非是重新恢复起来的、曾經是秘密同盟的掩蔽物和工具的前公开同盟罢了。

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滿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誹謗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頌揚的宣言。联合会委员会支持了这个詆譏书，并且遵照瑞士中心的指示于1872年12月25日在哥多瓦召开了本来只是到1873年4月才应该召开的西班牙代表大会。瑞士中心也赶忙向大家显示这个委员会对它所处的从屬地位：汝拉委员会越过西班牙委员会直接向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在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決議。

在101个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所引用的正式数字）中，派代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只有36个；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代表大会。不久前刚成立的那些联合会派去了許多

代表；亚尔科派去 6 名代表，而这个联合会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西班牙代表大会；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它还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向西班牙代表团投过一票，也没有缴过一个生丁。像格腊西阿（500 名会员）、巴达洛纳（500 名会员）、萨瓦德耳（125 名）、桑斯（1 061 名）这些规模巨大、活动积极的联合会却故意缺席。在 48 个代表的名单中，我们发现 14 个知名的同盟盟员：其中有 10 个人代表的那些联合会并没有他们这样的成员或者大概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同盟深信它所伪造的多数，所以在那里一意孤行。在瓦伦西亚制定并在萨拉哥沙批准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被否决了，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无政府主义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事先否决了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代之以新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防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方法来恢复国际的尊严和独立”。

在海牙，同盟想利用西班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把当时对它最有利的表决方式强加于代表大会；而在哥多瓦它在九个月以前就已规定，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什么决定。必须承认，在实行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牙代表大会把同盟及其首领们赶出了国际，就使西班牙的反同盟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由新马德里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得到了萨拉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格腊西阿、列里达、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托勒多、瓦伦西亚等地的联合会和

加迪斯的新联合会等的支持。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要求代表大会对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进行裁决。这不仅公然違反了共同章程，而且也違反了西班牙的地方章程，該章程第十三条規定：

“联合会委员会将贯彻执行并且发动其他人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新馬德里联合会向其他各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通告，对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它在通告中声明，联合会委员会由于自己的行动已經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因此它要求各地方联合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来代替联合会委员会，并且責成新的临时委员会严格遵守章程，而不是唯同盟之命是从。这一建議被接受了；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会址設在瓦倫西亚。这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在其第一个通告（1873年2月2日）中，宣布自己是“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和批准的国际的章程的忠实卫护者”，并且对这样一些人提出坚决抗議，这些人想“在国际的队伍中推行无政府状态，在革命以前推行无政府状态，在胜利以前廢除軍备！資产階級将多么高兴啊！”³⁵¹

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決了海牙決議。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決議^①对他們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总委员会在決議中声明，“凡是拒絕承认代表大会決議或故意逃避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規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會員”。5月30日，总委员会又以下列決議^②对这个声

① 見本卷第736—737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38—739頁。——編者注

明做了补充：

“鉴于：1872年12月25日和2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

从1872年12月25日到1873年1月2日在哥多瓦召开的部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

1873年1月26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同时，总委员会再次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合会，因为窃取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加入国际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履行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义务并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支部^①。

汝拉人也于4月27—28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新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瑞士10个支部和亚尔萨斯1个伪支部的19名代表；有2个瑞士支部和1个法国支部没有派代表出席。可

^① 見本卷第740頁。——編者注

見，汝拉聯合會在瑞士共有 12 個支部。但是，穆蒂埃的代表聲明：他出席只是為了表示贊成同國際和解，他帶有一個規定他不參加代表大會工作的限權代表委託書。事實上穆蒂埃支部從聖伊米耶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起就脫離了汝拉聯合會。剩下還有 11 個支部。委員會的報告竭力避而不談有關這些支部的內部情況和人數的任何材料，這一事實使我們有權利認為，這些支部不會比桑維耶代表大會以前具有更強的生命力。但是，報告卻把汝拉人的外部力量——同盟在海牙代表大會以後所羅致的同盟者們——排成了戰鬥隊形。用報告的原話來說，這几乎是國際的所有聯合會：

“意大利”——但是我們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大利聯合會。

“西班牙”——雖然西班牙的多數國際會員都倒向了分裂分子陣營，但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西班牙聯合會仍然存在並且同總委員會保持着經常的聯繫。

“法國——其中有已經真正組織起來的東西”，也就是由於沒有派代表出席紐沙特爾代表大會而向大會表示歉意的這個“法國支部”。我們決不是打算向汝拉人透露，在法國儘管有最近的迫害，但是仍然保存着“已經真正組織起來的東西”。最近的迫害十分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組織究竟在誰那邊，這些迫害也像往常那樣關懷備至地放過了在法國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同盟盟員。

“整個比利時”——都受同盟的愚弄，雖然它遠不是贊同同盟的原則的。

“荷蘭，除了一個支部以外”，——事實上兩個荷蘭支部贊成的不是聖伊米耶公約，而是海牙少數派的“反分立主義的”聲明。

“英國，除幾個分裂分子以外！”——“分裂分子”，即國際的絕大多數英國支部，於 6 月 1 日和 2 日在曼徹斯特召開了自己的代

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 23 个支部的 26 名代表³⁵²；而汝拉人的“英国”既没有支部，也没有联合会委员会，当然更不会有代表大会。

“美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国际的美国联合会存在着，并且在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着正常的活动。它有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汝拉委员会的“美国”——是一些在自由恋爱、纸币、社会职务和贿买等方面进行投机活动的资产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斯特先生非常出色地代表了他们，以致甚至连汝拉的代表们也不敢发言支持他和投票赞成他。

“斯拉夫人”，——即“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它像往常一样，总是妄图代表整个民族。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波兰族、俄罗斯族、斯拉夫族国际会员——分裂分子的一切公开的敌人——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同盟的同盟者。如果 11 个汝拉支部都像这些同盟者中的大多数一样现实地存在的话，那末，它们的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闭口不谈它们的情况。

在同盟的这个战斗队中，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瑞士。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一个月以后，即 6 月 1—2 日，在俄尔顿召开了瑞士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组织抵抗行动和罢工。³⁵³ 5 个汝拉人在会上宣扬支部绝对自治的福音；他们占去了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時間。最后还是进行表决；结果在 80 名代表中有 75 名投票反对 5 个汝拉人，于是他们别无他法，只好离开会场。

其实，同盟自己在其秘密集会上看来并不同意它想向群众灌输的关于它的实际力量的幻想。就在那次纽沙特尔代表大会上，

同盟設法通过了如下的決議：

“鑒于：根据共同章程所賦予的權利，每年召开一次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无需由总委员会专门召集，汝拉联合会建議国际的一切联合会于星期一，即9月1日在一个瑞士城市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代表大会不再重演“为害无穷的海牙的錯誤”，同盟的代表及其同盟者于8月28日召开了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根据对这个建議的討論得出如下結論：

“我們將认为，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只能是由各联合会直接召开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所謂的紐約总委员会可能企图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

这样一来，我們所面临的便是彻底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国际会员将参加由总委员会受上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它认为合适的一个瑞士城市召集的代表大会。而同盟分子和受他們愚弄的那一批人則将参加他們根据自己的自治自行召集的代表大会。祝他們一路平安。

八 同盟在俄国

1. 涅恰也夫案件

关于同盟在俄国的活动，我們是从1871年7月在彼得堡高等法庭审理的、以涅恰也夫案件著称的那个政治审判案中得知的。在俄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陪审法庭上公开审理政治案件。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从1869年11月至1871年7月，在审前羈押期間，他們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特別囚室里，結果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人精神失常。他們离开監獄，只不过是出来听取宣判，他們分別被判处15年、12年、10年、7年和2年的西伯利亚矿井劳动、苦役和監獄監禁。而那些被公开法庭宣判无罪的人，后来也“通过行政手續”被流放了出去。

他們的罪行在于他們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名义的秘密团体，拉他們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說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們进行了多次詐騙活动，强迫他們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到了秘密团体的綫索，但是，正像常見的那樣，密使本人已經隱蔽起来了。在偵查搜索的过程中，警察局对情况了解得那样清楚，可見，一定有人詳細告密。在整个案件中，密使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曖昧的。这个密使就是握有委托书的涅恰也夫，委托书的内容如下：

“茲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受委托为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代表之一。——№ 2771。”

在这个委托书上有：(1)法文的印章：“欧洲革命同盟。总委员会”；(2)日期：1869年5月12日；(3)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①

1861年，为了回答旨在不让貧苦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財政措施和力图使这些青年屈服于警察当局淫威之下的惩戒措施，大学生表示了坚决一致的抗議，先是集会抗議，以后就上了街，汇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圣彼得堡大学事后被封閉了一个时期，大学生被关进了監獄或者遭到流放。政府的这种做法促使青年参加各种秘密团体，結果，秘密团体的大批成員最后自然是被下獄、被驅逐、被流放西伯利亚。其他的人为了保证貧苦的大学生能够有錢繼續求学，成立了互助儲金会。其中最认真的人决定以后再也不让政府抓到任何把柄来查禁儲金会，因为这种組織可以举行小型會議来解决事务性問題。这种事务性會議順便也提供了討論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的机会。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貧苦人的子弟，他們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滿腔热忱，甚至幻想馬上就实现它。这个运动在学校中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向俄国社会輸送大批貧苦的、来自普通人民、有学識、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热忱的青年。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現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車尔尼雪夫斯基³⁵⁵。于是，涅恰也夫便利用国际的威望和这些青年的热情，企图使大学生相信，現在从事这些瑣碎小事已經不合时宜了，

^① 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³⁵⁴第180、181、187号和以后几号。

因为已經有了一个巨大的，参加了国际的秘密团体，它正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焰，并且准备立即在俄国采取行动。他騙上了几个青年人，拉他們从事刑事犯罪，这使警察当局有了口实来完全粉碎这个对于官方俄罗斯來說是如此危險的学生运动。

1869年3月，一个俄国青年来到了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大学生的代表，企图取信于全体俄国流亡者。他对別人作自我介绍时，用了各种不同的化名。有些流亡者确切地知道，彼得堡并没有派任何代表来；另一些人同这位假代表谈话之后认为他是个暗探。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姓是涅恰也夫。他說，1869年1月首都各学校发生風潮时，他作为这次風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被关进了圣彼得堡要塞，后来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些流亡者曾經在这个要塞中渡过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他們根据切身经历知道，从那里逃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曉得，涅恰也夫在这个問題上撒了谎；另一方面，因为他們收到的报纸和信件中談到了遭通緝的大学生的名字，而其中一次也沒有提及涅恰也夫，所以他們认为，涅恰也夫所談的关于他的所谓的革命活动的故事是一个神話。但是，巴枯宁大叫大嚷地站到了涅恰也夫那一边。他到处揚言，說这个人是在俄国存在的并且正在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秘密組織派来的特別使者”。于是，有人便去哀求巴枯宁不要把他們朋友的名字告訴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陷害他們。巴枯宁答应了；审判案的材料将会表明，他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諾言的。

涅恰也夫曾經得到了一个机会与一位流亡者谈话。在谈话中，他被迫承认他并不代表任何秘密組織，但是他声称他有一批同志和熟人，他打算把他們組織起来；他还說，必須把那些老流亡者抓在手里，以便利用他們的威信来影响青年并且利用他們的印刷

所和金錢。过了一些时候，出現了涅恰也夫和巴枯宁告大学生的“几句话”。³⁵⁶ 在这里，涅恰也夫复述了关于自己逃走的神話，并且号召青年們献身于革命斗争。巴枯宁在学潮中发现了“植根于人民生活最深处的反对国家的、破坏一切的精神……”^①；他祝賀“自己的青年兄弟具有革命志向…… 这就是說，这个卑鄙的全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快要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他用驴蹄去踢波兰人的借口，他指責波兰人只致力于

“复兴自己的历史国家（!!）。——可見，他們在幻想为自己的人民制造新的奴役”，如果他們这种幻想能够实现的話，那末“他們就会成为既是我們的敌人，又是他們本国人民的压迫者。为了社会革命和全民自由，我們將向他們开战”。

可見，巴枯宁完全贊同沙皇，认为无論如何必須阻撓波兰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处理他們的内部事务。每次爆发波兰起义的时候，俄国官方报刊总是指責起义的波兰人，說什么他們是“本国人民的压迫者”。在第三厅^②的各家机关报和洛迦諾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关系是多么动人的融洽一致啊！

巴枯宁接着說，俄国人民今天所处的状况，很像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期間使得人民不能不发动起义的那种状况。那时起来领导人民的是一个强盜头子，哥薩克人斯切尼卡·拉辛，他为人民指出了走向“自由”的“道路”。人民現在要起事，只等待一位新的斯切尼卡·拉辛出来；但是这一次他

“被現在已經和人民同甘共苦的、非阶层的青年大軍所代替了…… 这

① 必須指出，“几句话”这个傳单恰好是在迫害和宣判的时候公布的，当时青年們正尽力把自己运动的規模說小，而夸大运动規模則对警察当局十分有利。

② 皇帝办公厅第三厅是俄国秘密政治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

一次的斯切尼卡·拉辛，不是单枪匹马的而是集体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英雄，是他們的主宰。这种英雄就是所有这些非凡的青年，拉辛的精神已經降临到他們的身上”。

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的使命，青年們應該使自己变得愚昧无知：

“所以，你們赶快拋棄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吧。拋棄这些大学、学院以及其他学校吧……到民間去吧”，去做“人民自我解放的产婆，去做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的人。在現在这个时刻，你們不要在科学上煞費苦心了，人們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們束縛起来，使你們失去力量……这就是西方优秀人物的信念…… 欧美的工人世界正召唤你們結成兄弟同盟。”

同盟在其秘密章程中对第三級盟員指出，“这个組織的原則……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綱領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闡述”。在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履行这一諾言的开始。除了一般的无政府主义的花言巧語和公民B永远无法掩飾的对波兰人的沙文主义仇恨以外，他在这里第一次把俄国强盜当做真正革命者的典型来加以頌揚，并且借口說現代科学无非是官方科学（能否設想有官方数学、官方物理学或官方化学呢？），說西方优秀人物的看法都是这样，从而便向青年宣揚对愚昧无知的崇拜。在傳单的結尾，他暗示說，国际通过他建議这些甚至被他禁止研究无知兄弟会³⁵⁷的科学的青年联合起来。

作为福音书的“几句话”这个文件在涅恰也夫的阴謀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每一个新信徒献身以前，都对他神秘地宣讀这个文件。

与“几句话”这个文件（1869年）同时，也出版了一些俄文的匿名出版物：（1）“革命問題的提法”；（2）“革命原理”；（3）“‘人民裁判’协会会刊”（《Narodnaia rasprava》）第1期，莫斯科1869年

夏季出版。³⁵⁸ 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日内瓦刊印的；这一点从印刷铅字可以看出，它們和日内瓦出版的其他俄文书刊是用同一种印刷铅字刊印的，而且这个事实在所有俄国流亡者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們在第一頁加上这样的印記：“在俄国印行——Gedruckt in Russland”，以便使俄国大学生們相信，这个秘密团体有很好的条件在俄国本土进行活动。

“革命問題的提法”一下子就使它的作者露出了馬脚，这里的措詞用語同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他們的“几句话”中使用的毫无二致：

“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不言而喻，我們是拥护人民的。”

巴枯宁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同化規律，把自己和青年学生同化起来了。

“政府亲自給我們指出了我們为达到自己的即人民的目的所应走的道路。它把我們赶出了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感謝它使我們站在这样光荣而坚实的立足点上。現在我們有了立足点，我們可以进行活动了。我們將做些什么呢？去指教人民嗎？这是愚蠢的。人民自己比我們更清楚他們应该怎么办（請和秘密章程对照一下，秘密章程硬說群众具有“人民的本能”，而亲信者則具有“革命思想”）。我們不应该指教人民，而应该要人民起来暴动。”迄今“人民进行的暴动一直毫无結果，因为他們是分散地进行暴动的…… 我們能够給予他們非常重大的帮助：我們能够給他們以他們迄今还缺少的东西，而缺少这个东西是他們一切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是通过团结他們自己的力量使各地的运动达到一致。”

可見，同盟的学說——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紀律——在这里已和盘地托出了。首先是通过暴乱“放纵現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但是“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

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統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就是世界同盟的俄国支部——**人民裁判协会**。

但是巴枯宁觉得光有青年还不够。他号召一切强盗都站到他的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旗帜下来。

“搶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以及国家所确立的任何社会制度和公民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是同整个官吏貴族的文明和官方神甫的文明进行生死斗争的战士……誰不理解搶劫，誰也就不会理解俄国人民历史中的任何东西。誰不同情搶劫，誰也就不可能同情俄国人民生活，誰对人民世代代无比深重的苦难就不会有同情心。这种人是敌人陣营——国家拥护者陣营中的人……只有搶劫才能证明人民的生命力、热情和力量……在俄国，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不說空話、不說书本上的动听詞句的革命者，是在行动上不可調和的、不知疲倦的、不可馴服的革命者，是人民社会的革命者，而不是政治的，属于某个阶层的革命者……遍布全俄的，出沒在森林、城市和乡村的强盗和被囚于帝国的无数牢獄中的强盗，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俄国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很早以来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秘密活动。誰想在俄国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誰想进行人民革命，誰就应该加入这个世界……弟兄們，讓我們沿着把我們趕出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的政府現在給我們指出的道路，一齐投身到民間去，到人民运动中去，到强盗和农民的暴动中去，保持我們之間忠实而牢固的友誼，把一切零散的庄稼汉的〈农民的〉騷动团結成为統一的整体。讓我們把它們变成有理性的但是无情的人民革命。”^①

① 为了愚弄讀者，巴枯宁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各次人民起义的領袖同現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混为一談。至于談到現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那末只要讀一下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³⁵⁹，就連最富有浪漫精神的人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所抱的种种幻想也会頓然消失。而巴枯宁却打算利用这批人組成俄国革命的神圣队伍。目前在俄国还在被大規模采用的唯一的搶

第二个傳单“革命原理”对秘密規章中发布的力爭“彻底鏟除……”的命令做了进一步的發揮。必須破坏一切，以便达到“完全的无定形”，因为即使只保留“一种旧形式”，它也会成为其他一切旧社会形式所賴以复活的“萌芽”。傳单指責不看重这种无定形的政治革命者是欺騙人民。傳单指責他們建立了

“新的絞架和断头台，用它們处死了过去幸免于难的革命兄弟…… 如此看来，各国人民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 为了进行真正的革命，需要的不是那些站在群众前头并对他們发号施令的人物，而是不知不觉地隱身于群众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这一批群众和另一批群众联系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使运动具有同一个方向，具有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性质的人物。建立秘密的、从事准备工作的組織的意义仅在于此，它之所以必需也仅在于此”。

这样一来，便向俄国公众和俄国警察当局暴露了在西方严加掩盖的、存在国际兄弟的事实。接着，傳单宣揚有計劃有步驟地进行暗杀活动，并且声称，对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人來說，任何議論未来的行为都是

“犯罪的，因为它会妨碍純粹的破坏，会延緩开始革命的进程。我們只信任那些不怕拷打、不怕坐牢，用事实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誠的人，因此，我們否定一切不随即見諸行动的言論。不明确地提出实现革命目标的时间 and 地点的无目的的宣傳，我們則更加不需要了。不仅如此，这种宣傳还会妨碍我們，所以我們將尽一切力量来抵制这种宣傳…… 我們將用强力迫使一切不想懂得这一点的饒舌家沉默”。

这些威胁是針對那些沒有在巴枯宁的教皇宝座面前低头并被 他罵为教条主义者的俄国流亡者的。

劫形式——当然，如果不算各統治阶层的搶劫的話——就是被資本家們商业化了的盜馬活动，而“不說空話的革命者”不过是在資本家手中的簡單工具和牺牲品而已。

“我們要与一切不想返回祖国加入我們队伍的政治流亡者断絕联系；而在这个队伍还不明显的时候，我們要与一切不促使这个队伍在俄国生活的舞台上公开活动的人断絕联系。我們把那些已經声明自己是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員的流亡者作为例外。今后我們不会再重复这些話和不再发出号召了……有耳目的人会看到和听到实干家們的所作所为，如果这种人不参加他們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們的过錯了，正像如果藏在幕后的一切同遮盖它們的幕一起被冷靜地、无情地消灭不是我們的过錯一样。”

巴枯宁的面目在这里昭然若揭了。他命令流亡者冒着死亡的危險作为他的秘密团体的密探回到俄国去，——这方面他学习了俄国暗探的手法，俄国暗探曾給流亡者提供护照和金錢，要他們到俄国去完成密謀性目的，——但同时他却給自己发出了教皇許可证，允許他自己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員”太太平平地留在瑞士，在那里埋头写作各种宣言，来陷害那些被警察当局关在監獄中的不幸的大学生。

“除了从事消灭，我們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活动，但是我們同意这样一种意見，就是这一活动的表現形式应当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毒药、刀子、絞索等等，革命把这些一律看做是神圣的手段。可見，大有用武之地！……让一切健康的、年輕的人立即开始用火和劍根除禍害、清扫和开发俄罗斯大地的神圣事业，同那些将在全欧洲从事同样的事业的人亲密地联合起来吧。”

我們要补充一下，這張堂皇的傳单上所說的那种必然的强盜是以矯揉造作的卡尔·穆尔(席勒的“强盜”中的人物)的面貌出現的，“人民裁判”第2期³⁶⁰在援引这份傳单的一段时，直接称它为“巴枯宁的傳单”。

“‘人民裁判’^①协会会刊”第1期开宗明义就声称，俄国人的

^① 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总是把这个名詞譯为«justice populaire»[“人民司法”]，但是俄文的«расправа»这个詞的含义并不是司法，而是裁判，甚至可以說是报复、算总賬。

全民起义是必不可免的，它已为期不远了。

“我們，即無論如何总是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民青年，應該为全民起义扫清道路，即消除阻碍它前进的一切障碍并且創造一切有利条件…… 鉴于暴动必不可免而且为期不远这一点，我們认为必須把俄国一切分散的革命势力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决定以革命中心的名义印发傳单，遍布俄国的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我們的同志，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員，哪怕是我們不認識的人，随时将可以从这些傳单上看到，我們想做什么，我們朝哪个方向前进。”

接着，傳单上宣称：

“思想對我們之所以珍貴，是因为它能够服务于激进地、普遍地破坏一切的偉大事业。誰要是按照书本来学习革命事业，誰就只会成为革命的廢物…… 我們对言論已失去任何信心；言論只有当它随即見諸行动时，對我們才是有意义的。但是，現在称之为行动的东西，远不全都是行动。例如，縮手縮脚地、过分謹慎地組織秘密团体而沒有任何外在的实际表現，这在我們看来不过是既可笑又討厭的儿戏罢了。只有肯定是在破坏妨碍人民解放的某种东西(人、物、关系)的一系列行动，我們才称之为实际表現…… 我們不惜牺牲生命，不顾任何威胁、困难和危險等等，我們應該通过一系列大胆而果敢的嘗試冲入人民生活中去，并且使人民相信我們、相信自己、相信他們自己的威力，从而发动、团結和推动他們去胜利完成他們自己的事业。”

但是，“裁判”杂志的革命辞句突然变成了对在日内瓦出版的、維護国际的綱領和組織的一家俄文杂志——“人民事业”³⁶¹的攻击。很明显，对于巴枯宁在俄国以国际的名义所进行的同盟宣傳來說，强迫这家揭穿其騙局的杂志沉默是极端重要的。

“如果上述这家杂志在这条我們一定要对它表示和表明自己态度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的話…… 我們深信，真正的实干家們立即就会抛开一切理論，尤其是教条。对于虽然真摯但同我們的旗帜直接对立的各種著作，我們是能够用我們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来防止它們流傳的。”

在对自己这个危险的对手进行了这些威胁以后，“人民裁判”继续说道：

“在最近国外出版的传单中，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推荐巴枯宁的告非阶层的青年学生书…… 巴枯宁劝你们离开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校，到民间去，是正确的。”

可见，巴枯宁是永远不会放过自我吹嘘的机会的。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事业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是怎样威胁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俄国支部的机关刊物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攻击車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诚然，庄稼汉是从来不去臆想未来社会制度的形式的，然而，在消除了妨碍他们的一切以后（即在进行破坏一切的革命——这是第一件事情，因而对我们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事情——以后），他们对生活的安排，比之按照自命是人民的导师而主要是人民的指挥者的那些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写出来的一切理论和计划所进行的安排，将要有见识得多、好得多。对于没有被文明眼镜损害了视力的人民的眼睛来说，这些不受欢迎的导师想在科学、艺术等的掩盖下把肥缺留给自己及其同流的意图是太明显了。即使这些意图像受现代文明熏陶出来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属性那样真诚，那样天真，人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受些。在斯切尼卡·拉辛离开阿斯特拉罕以后由瓦西里·烏斯在那里建立的哥薩克會議中，社会平等的理想目的的实现比在傅立叶的法倫斯泰尔中，比在卡貝、路易·勃朗和其他博学的社会主义者的制度下，比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协作社中，要彻底得无比。”

接着有整整一页都是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谩骂。

車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营得的肥缺就是俄国政府让他在西伯利亚坐牢，可是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而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巴枯宁却只是从国外表现表现而已。而且正好在政府甚至严禁在报

刊上提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却对他进行攻击。

我們这些“无定形的”革命者繼續写道：

“我們承担着摧毀腐朽的社会大厦的責任…… 我們来自人民，被現代制度啃嚼得遍体鱗伤，因此对一切非人民的东西滿怀仇恨，对于我們所憎恨的、除了禍害以外不能期望給我們任何东西的那个世界，我們不知道有什么道德义务和尊敬可言。我們只有一个否定的、始終不渝的計劃——无情破坏的計劃。我們直接拒絕规划未来的生活条件，因为这和我們的活动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們认为任何純粹理論上的智力工作都是毫无好处的……我們只負責破坏現存社会制度。”

这两位喜欢从国外表現表現的人暗示說，1866年那次謀杀沙皇的活动是他們的秘密团体所計劃的“一系列破坏一切的行动”之一：

“1866年4月4日卡拉科左夫开創了我們的神圣事业。从此以后青年們便开始意識到自己的革命力量…… 这是榜样，这是事实！按其日益增长的意义來說，是任何宣傳都不能相比的！”

随后，他們开列了一长串应由委员会立即处死的“坏蛋”名单。許多人“将被拔掉舌头”……但是，

“我們將不触动沙皇…… 我們將让沙皇活到人民的、庄稼汉的审判到来的日子；这个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让我们的劊子手活到人民的雷雨大作的时刻吧”……

誰也不敢怀疑这些俄文的抨击性文章、秘密規章和巴枯宁从1869年以来用法文发表的全部著作都出于同一个来源。相反地，所有这三类著作是互相补充的。它們在某种程度上同臭名远揚的破坏一切的組織中划分亲信程度的三个等級相适应。公民B的法文小册子是为同盟普通盟員写的，这里考虑到了他們的成見。对

他們只談純粹的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以及諸如此类于事无损的东西；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話。秘密規章是給西方的国际兄弟制定的；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完全放纵人民生活……的恶欲”，但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有一种秘密的指导因素——就是这些兄弟；对他們只做一些关于从洛約拉那里剽窃来的同盟道德的很不明确的暗示；关于彻底鏟除的必要性只是稍带地提到，因为这些西欧人是在庸人成見中教养出来的，对待他們須要略加小心一点。对他們的說法是，使那些还不熟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感到过于眩目的真理，将在俄国支部綱領中彻底加以闡明。这位先知只是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上帝的选民，同自己神圣俄罗斯的青年才敢于坦率地讲话。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經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經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規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頌揚备至的耶穌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盜。在这里，坚决禁止青年进行思考和学习科学，因为这都是能够使他們怀疑破坏一切的正統思想的世俗事务。誰要是坚持理論上的異端邪說或者妄想对普遍的无定形性的教条进行庸俗的批判，誰就有受神圣的宗教裁判的危險。在俄国青年面前，教皇無論在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用不着讲客气。他可以暢所欲言。思想的极度貧乏寓于无限夸張的无稽之談之中，以致无法用法語把它的滑稽可笑之处全部表达出来，而不使它减色。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說的，巴枯宁的語言甚至不是俄語，而是韃靼語。这些沒有头脑的侏儒談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們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和韃牛的寓言。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們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

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們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絞索、枪彈对付他們要加害的对象；他們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們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的确，沙皇、官吏、貴族、資產階級可以高枕无忧。同盟并不是同現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輕重的配角。給宮廷和平，对茅屋宣战！他們誣蔑車尔尼雪夫斯基；警告“人民事业”的編輯們說，要用“我們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迫使他們沉默；同盟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这就是破坏一切的綱領中唯一已經开始执行的部分。我們現在談一談他們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功績。

从1869年4月起，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便着手为俄国革命准备基础。他們从日内瓦紛紛把信件、呼吁书和电报寄往圣彼得堡、基輔和其他城市。其实，他們知道，要把信件、呼吁书，特别是电报寄往俄国，“第三厅”（秘密警察）不可能不进行检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陷害人。在平安无事的日内瓦不冒任何風險的人物所使用的这些卑鄙手段，使得俄国有无数的人遭到逮捕。而且有人預先就警告过他們，說他們是在制造危險。我們掌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从俄国寄来的一封信的下面一段話已經告訴了巴枯宁。

“看在上帝的面，請轉告巴枯宁，如果革命对他說来还有哪怕是一点神圣的东西，就叫他停止散发他那些荒誕的傳单，由于这些傳单，許多城市都发生搜查和逮捕事件，任何重要工作都陷于瘫痪。”

巴枯宁回答說，这一切都是捏造，涅恰也夫已經到美洲去了。但是，下面我們将会看到，巴枯宁的秘密法典規定，必須“使……沽名釣譽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譽彻底扫地，使他們无法

脫身，然后再利用他們”（“革命問答”第十九条）。

还有一个证据。1869年4月7日，涅恰也夫写信給托米洛娃女士（一位上校的妻子，这位上校后来由于妻子被捕忧伤而死），說“在日內瓦事情多得很”，并且催促她派一位可靠的人到那里去同他商洽。“要商談的事情不仅牵涉到我們的买卖，而且牵涉到全欧洲的买卖。这里事如鼎沸。正在煮一鍋全欧洲都喝不完的菜湯。您赶快进行吧。”后面注明了日內瓦的地址。这封信沒有寄到收信人的手里；它被秘密警察当局在邮局截去了，結果托米洛娃女士被逮捕，她只是在法院偵訊过程中才看到这封信（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載于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①）。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說明巴枯宁在策划阴謀时是經過周密考虑的。基輔学院学生馬夫里茨基收到了从日內瓦寄給他的傳单。他馬上把傳单交給上級，上級赶忙派一位代理人即密探到日內瓦去。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与这位来自俄国南部的代表过从甚密，交給他傳单，告訴他据他說是涅恰也夫在俄国認識的人的地址，并且給了他一封信，这封信只能看做是委托书和介紹信（“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

1869年9月3日（新历9月15日），涅恰也夫在莫斯科以日內瓦世界革命委员会密使身分去見他在出国以前就認識的一位青年人——烏斯宾斯基，对他出示了前面讲到过的委托书。涅恰也夫告訴他說，持有同样委托书的該欧洲委员会的密使們将到达莫斯科，至于涅恰也夫本人，他个人是受委托“在青年学生中組織秘密团体……以便在俄国发动人民起义”。經烏斯宾斯基介紹，涅恰

^① 有关涅恰也夫阴謀的一切事实，我們都是从“圣彼得堡消息报”发表的关于該案件的报道中引来的。我們將指明这些事实引自該报的第几号。

也夫为了找寻安全的避难所到离城相当远的农学院去了，在那里同伊万諾夫——以忠于青年和人民的利益而最出名的大学生之一——建立了联系。从这个时候起，农学院便成了涅恰也夫的活动中心。起初他用的是假姓名，他說他曾游历过俄国的許多地方，人民到处都准备起义，如果不是革命者說服他們在把俄国的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广泛而强大的組織尚未建立以前应当忍耐的話，他們早就已經起义了。涅恰也夫催促伊万諾夫和其他大学生赶快加入这个受万能的委员会领导的秘密团体，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秘密团体的成員不應該知道委员会的成員和所在地。这个委员会和这个組織就是**世界联合会、革命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分部**！^①

涅恰也夫首先在大学生中散发前面提到的傳单“几句话”，以便让他们知道，从西伯利亚逃走的1848年著名革命家巴枯宁在欧洲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是工人的总全权代表，他签署世界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书，就是这位英雄劝他们拋棄学业等等。为了给他们提出一个忠誠至死不渝的鮮明榜样，他曾向他们朗讀巴枯宁的朋友、赫尔岑的“钟声”报的撰稿人奥格辽夫所写的，以“大学生”为题的献給“青年朋友涅恰也夫”的一首诗³⁶²。在这首诗中，涅恰也夫被描繪成一个理想的大学生，“从童年起就不知疲倦的战士”。奥格辽夫在他的詩中歌頌涅恰也夫从少年时代起为了积极从事科学

① 应当指出，association, union, alliance (obchtchestvo, soiouz, tovarichtchestvo) 这几个詞在俄語中或多或少是同义詞，在使用时常常沒有区别。同样地，“国际的”这个詞在大多数場合也可以譯为“世界的”(«vsemirnyi»)。因此，在俄文报刊中“国际协会”这几个詞譯出来以后，用法文再譯回来常常是“世界同盟”这几个詞。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就是利用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現象，才得以利用我們协会的名称并戕害了大約一百名青年人。

研究而經受的苦难；他怎样培养对人民的忠誠；沙皇的报复和貴族的恐惧怎样迫使他漂泊流浪(skitanie, 流落他乡)；他怎样去游历，向四面八方的全体农民发出号召：联合起来吧，勇敢地挺起身来吧，等等，等等；他怎样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結束了苦役生活；但是他一生从不虛伪，他始終忠于斗争，他怎样在停止呼吸以前仍然反复地說：要为全体人民捍卫住他們的土地和自由！——这首同盟的詩发表于1869年春天，当时涅恰也夫正在日内瓦寻欢作乐。这首詩和其他呼吁书一起，被成包成包地寄往俄国。简单地轉抄这一首詩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使新信徒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涅恰也夫根据委员会的命令叫該团体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員都轉抄这首詩并加以傳播(某些被告的供詞)。

各地进行的破坏一切的活动要使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成为无定形的东西，大概只有音乐得天独厚，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涅恰也夫代表委员会指示要用革命的音乐支援宣傳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設法为这首詩歌杰作配上曲子，以便青年們高声歌唱(“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0号)。

关于他已經死去的神秘傳說并不妨碍他暗示說，涅恰也夫可能还活着，甚至并不妨碍他秘密地告訴別人，說涅恰也夫現在以工人的身分住在烏拉尔，并且在那里組織了一些工人团体(“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02号)。他主要是对那些“毫无出息”的人，即那些幻想建立工人协会的人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想使他們佩服这个神話般的英雄。当关于虛构的他从彼得一保罗要塞逃走一事的傳說以及关于他死在西伯利亚的富有詩意的傳說已經使人們深信不疑的时候，当据他估計革命問答已經灌进了亲信者的头脑的时候，他終於实现了福音书上所說的复活，并且声称，涅恰也夫就是“他”这

位要人！但是，現在已經不是证人和被告所說的曾經为彼得堡大学生所嘲笑和鄙視的那个涅恰也夫了。現在的涅恰也夫是世界革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巴枯宁完成了使他改变面貌的奇迹。涅恰也夫符合他自己所宣傳的那个組織的規章的一切要求；他“做了几件为委员会所知道和重視的事情，因而受到賞識”；在布魯塞尔，他組織并領導了一次国际會員大罢工；比利时委员会派他为代表去和国际的日內瓦組織接头，在那里他会見了巴枯宁，但是，据他說他“不安于小成”，于是回到俄国，以便开始“革命活动”。他还断言，由 16 名俄国流亡者組成的參謀部全体人員都同他一道到了俄国。^①

烏斯宾斯基、伊万諾夫，还有 4 名或 6 名青年，大概是莫斯科仅有的几个受这些狡猾手段愚弄的人。这些亲信者中有 4 个人受命招募新的拥护者并建立小組或小支部。在涅恰也夫案件的文件中有这种組織計劃；这个計劃同秘密同盟的計劃几乎完全相同。在法庭上宣讀了“共同組織原則”，主要亲信者沒有一個人否定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而且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主編的“人民裁判”第 2 期上已經承认了下列几条的真实性：

“本組織是以对个人的信任为基础的。——任何一个成員都不知道他屬於哪一級，就是說不知道他离中心远还是近。——无条件服从委员会的命令。——放棄自己的財產，把它交給委员会掌管。——凡是使我們的事業得到一定数量的新信徒，并用事实表明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的成員，都可以看到这些指示，以后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本团体的章程。力量和才能的大小由委员会确定。”

^① 俄国流亡者誰也沒有回俄国去，而且在全欧洲也招募不到 16 名俄国政治流亡者。

为了欺騙莫斯科的成員，涅恰也夫對他們說，在聖彼得堡已經有了一個龐大的組織，而事實上那里連一個小組、一個支部都沒有。有一次，他糊塗了，當着一個親信者的面高聲喊道：“在彼得堡他們像女人一樣背棄了我，像奴隸一樣出賣了我。”在彼得堡他又反過來說，在莫斯科，這個組織的發展快得驚人。

由於莫斯科有人表示希望見到委員會的一位委員，他邀請了一位關心學生運動的彼得堡青年軍官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看看這些小組。這位青年人同意了，在路上涅恰也夫封他為“國際協會日內瓦委員會特命全權代表”。

對他說：“如果您不是我們團體的成員，您就不能參加我們的會議，這是給您的委託書，它可以證明您是國際協會會員；作為協會會員，他們會讓您參加。”

委託書蓋有法文印章，內稱：“茲證明持委託書者系國際協會的受托人。”據其他幾位被告說，涅恰也夫向他們保證，這位陌生人“確實是日內瓦革命委員會的受托人”（“聖彼得堡消息報”第 225、226 號）。

伊萬諾夫的朋友多爾哥夫供認，“涅恰也夫曾談到秘密團體，這個團體的目的是在人民提出抗議的時候支持他們，引導他們，以便取得好的結果，當時涅恰也夫提到國際協會，並且說，巴枯寧負責與該協會聯繫”（第 198 號）。——里普曼證明，涅恰也夫“為了使他放棄關於勞動組合的思想，就對他說，國外有一個國際工人協會；要想達到該協會所追求的目的，只要加入這個團體就夠了，在莫斯科有該團體的分部”（第 198 號）。從後來的一些供詞可以看出，涅恰也夫把國際說成是一個秘密團體，把他自己的團體冒充為國際的支部。於是，他便向親信者們保證，他們的莫斯科支部和國

际一样，将大規模地举行罢工并且建立联合会。当被告里普曼向他索取該团体的綱領时，涅恰也夫拿出一張法文傳单給他念了几段，上面談到該团体的目的；被告认为，这張傳单就是国际的綱領；他还补充說：“因为报刊上对这个团体談得很多，所以我根本沒有发现涅恰也夫的建議有什么犯罪的东西。”主要被告之一庫茲涅佐夫声称，涅恰也夫曾經对他們宣讀国际协会的綱領(第 181 号)；庫茲涅佐夫的兄弟供认，“他曾看見有人在他兄弟那里把一張法文傳单譯成俄文；他以为这張傳单是某团体的綱領或章程”(第 202 号)。——被告克利敏說，向他宣讀的是“巴枯宁加有附語的国际协会綱領，我記得，綱領用的是非常一般的措辞，甚至沒有談到达到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說的是普遍平等”(第 199 号)。被告加夫里舍夫解釋說，“可以认为，那份法文傳单包含有对曾經在日內瓦举行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代表們的意見的闡述”。最后，被告斯維亞茨基使我們彻底弄清楚了这張神秘的法文傳单究竟是什么东西，搜查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張用法文写的傳单，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綱領”。斯維亞茨基說：“在报纸上关于国际协会談得很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很想純粹从理論上来了解它的綱領。”(“圣彼得堡消息报”第 230 号)这些供詞证明，同盟的秘密綱領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充国际的綱領而散发出去的。主要被告烏斯宾斯基的供詞证明，世界革命委员会(涅恰也夫自称是它的密使)和同盟中央局(公民 B)是一回事。烏斯宾斯基声称，他收集小組的全部會議記錄，“以便把关于各次會議的报告寄給日內瓦的巴枯宁”。主要被告之一普累若夫声称，涅恰也夫吩咐他到日內瓦去，把报告送給巴枯宁。

限于篇幅，我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审讯中揭露的这位巴

枯宁的走狗所搞的一切騙局、蠢事、欺詐活动和暴力行为。我們只指出几件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在这个組織中一切都是秘密的。多尔哥夫叙述說：“在加入这个团体以前，他想知道这个团体的組織机构和活动手段；涅恰也夫說，这是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以后会对他公开的”（“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8号）。当該团体的成員敢于提出問題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堵住他們的嘴，說什么根据章程規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做出卓越的成績以前都无权知道任何情况（第199号）。有一名被告說：“在我們同意加入这个团体以后不久，涅恰也夫就开始用委员会的权力和力量来恫吓我們，据他說，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它在領導我們；他說，委员会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如果有誰背棄了自己的諾言，違犯那些居于我們小組之上的人的命令，委员会就要进行报复。”有一位被告承认，“当他发现了涅恰也夫的詐騙勾当以后，他曾經告訴涅恰也夫，他想洗手不干而到高加索去休养。涅恰也夫对他声称，这样不行，如果他竟敢退出这个团体，委员会可能要把他处死；当时涅恰也夫就命令他去参加一个會議，在会上談論秘密团体，以便罗致新信徒，并且朗讀悼涅恰也夫之死的那首詩。当被告拒絕服从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开始威胁他，說：你无须爭辯，你應該无条件地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第198号）。——如果这只是个别情况，那还可以对它表示怀疑，但是許多被告都供认了完全相同的事实，而他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另一位被告供认，該小組的成員发现他們受人欺騙以后，他們都想退出，但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害怕委员会报复（第198号）。

一位证人談到他的朋友——被告之一時說，被告弗洛林斯基已經不知道該怎样摆脱不让他工作的涅恰也夫了；证人劝他离开

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是弗洛林斯基回答說，涅恰也夫会在彼得堡找到他，就像在莫斯科找到了他一样；涅恰也夫强奸了許多青年的信念，恫吓他們，弗洛林斯基显然是害怕涅恰也夫告密。利胡亭供认：“我亲耳听見有人說，涅恰也夫从国外把各种內容激烈的信件寄給他認識的人，想借此来陷害他們，使他們遭到逮捕。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第 186 号）叶尼舍尔洛夫甚至說，他已开始把涅恰也夫看做是一个政府密探了。

有一次有一个不認識的人以委员会密使的身分列席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組的會議，并且表示不滿意該小組的活动，小組成員之一克利敏回答他說，“他們也感到不滿；起初对被招募加入該团体的人說，每个支部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并不要求支部的成員一味服从；但是，后来的表現却完全不是这样，委员会使它們处于奴隶地位”（第 199 号）。——涅恰也夫用盖有“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公用箋”鈐記的公文紙发布命令，用的是下面这一套措辞：“本委员会命令你做……”，完成某項任务，到某个地方去等等。

一个青年軍官由于絕望了，决定退出这个团体。涅恰也夫表面上同意，但是要求他繳贖金。叫他必須弄到一張有科拉切夫斯基签字的 6 000 卢布（約合 2 万法郎）的票据。在 1866 年卡拉科左夫謀杀事件以后，科拉切夫斯基同他的两个姊妹一起才服滿了长期監獄監禁的刑期。在我們現在談論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時候，他的一个姊妹又由于政治案件的牽連再次坐牢。全家都受到警察当局极其严密的監視，科拉切夫斯基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涅恰也夫就利用了这一点；上述那位青年軍官遵照他的命令，捏造了一个借口請科拉切夫斯基到他家去，开始和他交談，并把一些傳单交給他，科拉切夫斯基出于好奇心收起了傳单。科拉切夫斯基还没

有走到街上，就有一位軍官走来命令科拉切夫斯基跟着他走，并且說，他是第三厅（秘密警察）的官員，他知道科拉切夫斯基身上藏有策动暴乱的傳单。必須指出，仅仅保藏这些傳单，就已足以使一个人不仅是受多年的审前羈押了，如果这个人已經不幸和什么政治案件有牽連，那就得被流放去服苦役。第三厅的假密探叫科拉切夫斯基坐上一辆馬車，随即便提出要他賄买，叫他立即在一張6 000 卢布的票据上签字。科拉切夫斯基被迫两者擇一：或者接受这一建議，或者到西伯利亚去，于是只好在票据上签了字。第二天，另一个青年人涅格烈斯庫耳得知此事后怀疑有涅恰也夫在从中搞鬼，立即找那位第三厅的假密探，要求他說明这个騙局的真相。假密探矢口否认；票据被藏起来了，只是到后来进行搜查的时候才被发现。由于阴谋暴露和涅恰也夫逃走，他没有取得这笔錢。涅格烈斯庫耳早就知道涅恰也夫的底細。在日内瓦，他成了涅恰也夫策划的一次詐騙勾当的受害者；后来巴枯宁企图招募他。不久，他就被騙走了100 卢布（第230号）。虽然他对涅恰也夫恨之入骨并且认为涅恰也夫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但是終不免遭到涅恰也夫的陷害。他被捕了并且死在监牢里。

我們前面談到，伊万諾夫是涅恰也夫所招募的第一批人員之一。这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愛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全心全意地为改善自己同学的生活状况而操勞，組織互助儲金会，办食堂，貧苦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免費用膳，同时这里又可以作为討論社会問題的方便的会场。他把全部空闲時間都用来教育住在农学院附近的农家子弟。同学们一致确认，他无限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几个銅板，而經常吃的是冷飯。

伊万諾夫对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荒謬透頂的恐怖主义傳单感

到驚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委員會要命令他去散发“几句话”、奥格辽夫的“死亡之歌”、“人民裁判”，最后还有巴枯宁那份純粹是貴族的傳单：“告俄国貴族书”^①。他已經开始忍耐不住了，便去打听：委員會在哪里，它在干什么事情，这个在一切事情上都同意涅恰也夫意見而譴責其他成員的委員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表示希望和委員會的一个成員見見面；他有权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涅恰也夫本人把他提拔到了相当于秘密同盟民族委員會委員級別的那一級。于是，涅恰也夫便演出了前面描写过的来自日内瓦的国际密使的那出喜剧，才摆脱了窘境。

有一次，涅恰也夫命令把預定供大学生互助儲金会使用的一笔錢上交給委員會。伊万諾夫表示反对，于是在他們之間发生了一场爭吵。其他同志劝伊万諾夫服从委員會的决定，因為他們都

① 下面是引自巴枯宁的鉛印傳单“告俄国貴族书”中的一段：“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年当中，我們曾經是从根本上动摇的皇座的支柱；1848年，在欧洲到处爆发人民的瘋狂行为的風暴时期，我們用自己的英勇功勋拯救俄罗斯国家，使之免遭各种社会空想的冲击，为此我們得到了什么特权呢？…… 我們拯救了国家，使之免于支离破碎，并且扑灭了有席卷整个俄国之势的波兰大火；我們不惜自己的力量，以无比的大无畏精神直到現在仍然为在俄国根除革命分子而努力，为此我們得到了什么奖賞呢？——甚至被昏庸无能的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称为祖国拯救者的、以其英勇行为名揚于世的米哈伊尔·穆拉維約夫，难道不是出身于我們之中嗎？——为了这一切，我們得到了什么呢？为了这一切无可估价的功績，我們被剥夺了过去所有的一切…… 我們現在这个公开的号召是早就准备好了和組織好了的絕大多数真心的俄国貴族的声明…… 我們觉得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正确，我們大胆地向暴君、德国的公爵亚历山大二世·薩尔梯柯夫-罗曼諾夫发出挑战，要他在1870年将要在柳里克的后代和俄国独立貴族党之間爆发的那場崇高的騎士战斗中和我們决一勝負。”

“以其英勇行为名揚于世的穆拉維約夫”不是別人，就是扼杀波兰的那个劊子手。

承认了章程，而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伊万诺夫让了步，勉强地服从了这个决定。从此以后，涅恰也夫就开始想方设法甩掉这个人，大概他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处死的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吧。他开始和乌斯宾斯基从理论上商谈，如何惩治和消灭由于不服从命令可能会为害和毁掉整个规模庞大的秘密组织的那些不可靠的成员。

涅恰也夫这样处理他的秘密团体的事务，结果自然会使人对这个组织是否郑重的問題发生怀疑。各支部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以审查学院的全体学生名单，确定应该吸收的人，并且寻求弄钱的方法。这种方法之一就是以帮助“受难的大学生”即被行政上开除的学生的名义来募捐；这样募集来的钱直接落入了委员会——涅恰也夫的腰包。还要求各支部弄到各种服装，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供涅恰也夫逃走时化装之用。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抄写“死亡之歌”和前面引用过的那些传单。这个阴谋的参加者应该把他们会议上谈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为了使他们什么也不敢隐瞒，涅恰也夫还威胁他们说委员会到处都有自己的暗探。每个人都要向小组提交关于他在会下所做的一切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来起草寄给巴枯宁的总结报告。

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使伊万诺夫怀疑到委员会本身是否存在和这个组织是否具有被那样大加宣扬的威力这些问题。他开始猜测，这一切都要归结为荒谬的对人的剥削，这一切都是一场大骗局；他坦白地对他的好朋友们说，如果事情毫无进展并且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些荒谬事情的话，那他就要和涅恰也夫决裂，自己建立一个郑重的组织。

于是，涅恰也夫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命令把自己的传单贴

到大学生食堂里去。伊万諾夫知道，貼傳单的結果，必然招致封閉食堂、禁止集会和赶走优秀的学生。因此，他反对这样做（事实上果真如此：大学生食堂被查封了，管理食堂的全体代表都被开除）。由于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场爭执，但是涅恰也夫还是照例重复他那句老話：“这是委员会的命令！”

伊万諾夫完全陷于悲观失望。1869年11月20日，他到支部成員之一普累若夫那里去，对他說要退出这个团体。普累若夫把这話轉告給烏斯宾斯基，烏斯宾斯基又赶忙把这事告訴涅恰也夫，过了几个小时，他們三个人在庫茲涅佐夫那里集合，那里还住着尼古拉也夫。在那里涅恰也夫說，应该惩罚这个起来反对委员会命令的伊万諾夫，必須摆脱他，使他以后无法为害。大概是因为伊万諾夫的好朋友庫茲涅佐夫沒有明白涅恰也夫的意图，所以涅恰也夫点明說，必須把伊万諾夫杀死。普累若夫对着庫茲涅佐夫高声說：涅恰也夫发疯了，他想杀死伊万諾夫，必須制止他那样做。涅恰也夫用自己常說的一句話制止了他們的动搖，他說：“你們也想起起来反对委员会的命令嗎？如果不能用別的办法把他杀死的話，那末我和尼古拉也夫今天夜間到他房間里去把他勒死。”后来，他建議夜間把伊万諾夫騙到学院校园中的一个岩洞里去，說是要把在那里隱藏了很久的印刷机掘出来，就在那里把他弄死。

可見，甚至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涅恰也夫本人也給了伊万諾夫的忠誠以应有的評价。他深信，虽然伊万諾夫要退出这个团体，但是他一定会来帮忙掘印刷机的，他不会出卖他的，因为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那他在退出以前或者退出后立即就会做了。如果伊万諾夫想把涅恰也夫出卖給警察当局的话，那末現在就是他把这个罪犯當場抓住的机会。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伊万諾夫感到很幸

福，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说明存在这个组织的肯定的证据，说明这个组织拥有某种现实手段（哪怕是一些印刷铅字）的明显标志。他忘记了涅恰也夫对变节者的一切威胁，当时他和一位朋友正在喝茶，尼古拉也夫奉涅恰也夫之命到这位朋友那里去找他，他匆忙告别了朋友，去见召唤他的涅恰也夫。

在漆黑的夜里，伊万诺夫毫不怀疑地走到岩洞附近。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从后面向他扑去。一场可怕的战斗展开了；只听见涅恰也夫的咆哮声和被他用双手卡住脖子的受害者的呻吟声；接着一声枪响，伊万诺夫应声倒下死去。涅恰也夫的手枪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快拿绳子、石头”，——涅恰也夫一边喊，一边搜死者的口袋，掏他的文件和钱。然后就把他扔进水池。

凶手们回到库兹涅佐夫家后，便采取措施掩盖罪迹。他们烧掉了涅恰也夫的血衣。同谋犯们都面色阴沉，精神沮丧。突然又一声枪响，子弹正好从普累若夫耳边飞过。涅恰也夫道歉说：“他想向尼古拉也夫解释手枪的构造。”证人们一致声称，这是一次新的谋杀行为。涅恰也夫想杀掉普累若夫，因为普累若夫那天早晨竟敢反对暗杀伊万诺夫。

在此以后，涅恰也夫立即匆忙地离开了莫斯科，和库兹涅佐夫一道到彼得堡去了，而让乌斯宾斯基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在彼得堡，他装做在继续从事他那个组织的工作，但是，库兹涅佐夫感到非常惊异，他发现，比起莫斯科来，这里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存在。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涅恰也夫：“委员会究竟在哪里？你就是委员会吗？”——涅恰也夫还是否认这一点，他肯定地向库兹涅佐夫说，委员会是存在的。涅恰也夫回到莫斯科对尼古拉也夫坦白地承认，既然乌斯宾斯基已经被捕，那末其他的人也将全部被捕，因此他

“不知道該怎么办”。那时，他的最忠誠的信徒尼古拉也夫也只好断然問他，那个神奇的委员会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委员会只由涅恰也夫一个人組成。——“他沒有肯定地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为了吸引人們从事这种事情，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許的，在国外也有这种規矩，巴枯宁也和其他人一样按这种規矩办事，既然这些人都遵循这种規矩，那末很明显，他涅恰也夫也可以这样行事。”（第181号）后来，他命令尼古拉也夫和普累若夫一起到土拉去騙取一个工人（尼古拉也夫的老朋友）的护照。不久他本人也到土拉去了，在那里他請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婭女士陪他去日內瓦，对他說来这是絕對必要的。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婭女士在1861—1862年暴动期間声名狼籍；她甚至坐过牢，她在獄中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由于决心自首，她向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写了自白书，这份自白书牵累了許多人。在干完了这一切以后，她迁居到一个省城去住，在警察当局的監視之下过日子。因为她担心不发給她护照，所以涅恰也夫用某种方法給她弄到了一張。有人会問，为什么涅恰也夫需要有这样一个只要与之同行就会使他在国境上被捕的女旅伴呢？但是，涅恰也夫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婭女士的陪同下順利地到达了日內瓦，而且当那些被他愚弄的不幸的人被投进監獄的时候，他却和巴枯宁一道着手編輯“人民裁判”第2期。“日內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³⁶³报道了涅恰也夫的陰謀，并且认为巴枯宁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巴枯宁可能对此引以为荣，因此竟忘記了他的“人民裁判”是冒充在莫斯科出版的，而把“日內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上用法文写的文章連篇累牘地排进“人民裁判”中去。杂志剛一印好，就責成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婭女士把它和其他傳单一道帶到俄国去。在

国境上专门等候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第三厅密探没收了她的印刷包裹。她在被捕以后把一份只有巴枯宁可能知道的人的名单交给了那个密探。涅恰也夫案件的被告之一，也是涅恰也夫最亲近的人之一在法庭上供认，“他以前以为巴枯宁是个正派人，他不明白巴枯宁和其他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卑鄙地使这个女人遭受被逮捕的危险”。

巴枯宁借口要亲自领导他所预言的必然爆发的伟大革命，摆脱了自己到俄国去的责任，而他在欧洲却大肆活动，真像“身有魔胆”一样。洛克尔的“进步报”，即同盟在瑞士的机关报刊登了“人民裁判”上文章的长篇摘录。吉约姆在该报上大肆赞扬伟大俄国社会主义者们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并且说，他的弃权论的纲领和他们的纲领是相同的^①。

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吴亭曾经企图揭穿涅恰也夫的卑鄙勾当，但是吉约姆打断了他，对他谈说，谈论这些人就是从事密探活动。至于巴枯宁，他在“马赛曲报”上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他“到自由报刊无法到达的各遥远国家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³⁶⁵，刚刚回来；他想通过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俄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革命转变，以致他认为非亲自莅临不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同盟的悲喜剧是如何收场的。1859年赫尔岑根据俄国一位青年人的遗嘱得到了25 000法郎，作为在俄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³⁶⁶ 赫尔岑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

^① 1868年，即同盟分子设法使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理论获得承认的那一次绍德封代表大会前两年，巴枯宁在沙散的“民主”³⁶⁴报上为法国工人放弃政治而痛哭流涕，当时他写道：“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

人，但是他受了巴枯寧的騙，巴枯寧使他相信了涅恰也夫是一個規模宏大、力量雄厚的秘密組織的代表，於是便從他那里得到了這筆錢。因此，涅恰也夫認為自己有权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結果，這兩位暗殺伊萬諾夫的活動也不能把他們分開的國際兄弟却因為金錢而爭吵起來了。巴枯寧拒絕把錢交給他，涅恰也夫離開了日內瓦，1870年春天他在倫敦出版了一家俄文報紙“公社”（«Общчина»）³⁶⁷，公開要求巴枯寧把從已故的赫爾岑那里得來的資本的餘額交給他。這就是國際兄弟“永遠不彼此攻擊，不公開算帳”的實際例證。

“人民裁判”第2期的社論還包含一首用散文詩寫成的追悼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的英雄——涅恰也夫的葬歌。這一次英雄是被押送他到西伯利亞去的憲兵們勒死的。他化裝成工人，在唐波夫的一個酒吧間里被捕。他這次被捕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極大的不安。只聽到一些不成句的話：“涅恰也夫，化了裝的……告密……秘密團體……巴枯寧分子……革命。”皮爾姆省省長就涅恰也夫之死給彼得堡發去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被全文引用了。另一封也被全文引用的電報，是發給第三廳的，“人民裁判”知道，“憲兵頭子接到這種電報後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整整奸笑了一個晚上”。涅恰也夫就這樣第二次死去。

社論中承認了暗殺伊萬諾夫的事實。這一行動被說成是

“本團體對於任何背棄義務的成員的報復。事業的真正工作者的嚴酷邏輯不應該在任何導致事業成功的事實面前，尤其是在能夠拯救事業和使它不致滅亡的事實面前却步”。

18名青年的被捕對於巴枯寧說來就是“事業的成功”。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誰不贊成我們，誰就是反对我們”，这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辯护詞。他們为一切不加入同盟的革命者安排了伊万諾夫(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那样的命运。

“緊張的时刻到来了……两个敌对陣营已經开始了軍事行动……今后再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了：站在中庸立場現在已經沒有可能；这就是說：在两軍对垒的时候站在彼此射击的两个敌对力量的中間；这就是說：无謂地牺牲，被双方的霰彈击中而倒下，无法进行任何抵抗；这就是說：不是身受第三厅的鞭笞和拷打，就是被我們的手枪子彈打死。”

接着向俄国政府表示(大概是諷刺地表示)謝意，感謝“它促使急切奔向理想目标的我們的事業向前发展和迅速前进”。正当这两位英雄感謝政府加速了“理想目标”的到来的时刻，这个所謂秘密組織的全体成員都已經被捕了。——然后，这篇文章发出了新的号召。他們“敞开怀抱”接納“一切正直的新生力量”，同时預先警告这些力量，它們一旦投入了这个怀抱，就應該服从这个团体的一切要求。“任何背离团体的行为，任何由于不相信著名原理的真实性和正义性而有意識地背叛团体的行为，都将导致被从活人名单中除名。”接着，我們这两位英雄又奚落那些被捕者，說什么这不过是一些軟心腸的自由派，秘密团体对于它的組織的真正成員是加以保护的，是不允許別人把他們抓去的。

第三篇文章叫做“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这篇文章說明，如果普通人由于犯罪、由于仅仅考虑一下未来的社会組織就受到惩罚，那是因为头目們早就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实现摆脱現存的社会秩序，根据新的原理来革新生活的方法，只能是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們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須从事体力劳动。

在推翻了現存基础以后，本委员会立即宣布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并且建

議建立工人团体 (artels), 同时出版由內行人編写的統計汇编, 指出在哪个地区最需要哪几种劳动部門, 哪些情况可能妨碍从事哪种工作。

在規定实行变革的一定日期內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 每个人都應該自己选择加入某个劳动組合…… 其余单干的和沒有加入工人小組的人, 沒有正当理由都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寢室以及其他任何为了滿足工作者兄弟的不同需要而建筑的房屋, 或者儲藏供已經建立的工人团体的全体成員使用的成品和物資、食品和工具的房屋; 总之, 誰沒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組合, 誰就沒有生存手段。对他說来, 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 一切交通工具都剝夺了, 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 或者从事劳动, 或者死亡。”

每一个劳动組合都选一个評判員 («otzienchtchik»), 以調节工作的进程, 填写生产和消費以及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登記簿, 作为中介同当地的总办事处联系。由当地所有組合推选出来的成員組成的办事处主持这些組合之間的交換, 管理一切公共設施 (寢室、食堂、学校、医院), 并且領導一切公共事务: “一切共同的事务都由办事处負責管理, 而一切需要特別的手艺和技巧的个人事务則由各組合单独处理”。接着还对教育、劳动時間、儿童撫养、免除发明家的劳动等問題做了詳細規定。

“在一切都彻底公开、无所隱諱和每个人都参加活动的情况下, 現在人們所理解的任何功名心和任何謊言都将消失得无踪无影……那时, 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費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意願; 那时的活动家的全部驕傲、全部功名心就在于意識到自己对社会的貢獻。”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 在这里一切齐全: 公共食堂和公共寢室, 評判員和为教育、生产、消費, 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規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領導者来統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誰也不知道的“我們的委員會”。毫無疑問, 这是道地的反权威主义。

为了使这个荒誕的实际組織計劃具有一种理論基础的外观，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安了一个小注：

“有志者可以在我們发表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看到對我們的基本原理的詳尽的理論闡述。”

的确，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³⁶⁸上，在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軍官”和两期“人民裁判”的出版广告旁边，可以看到定价一法郎的、1847年的共产党(德国)宣言的俄譯本的出版广告。巴枯宁一方面利用这个“宣言”在俄国使人相信他的鞭鞑人的幻想，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在西方各国的同盟宣布这个“宣言”是一部宣揚极其有害的德国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說、充滿了異端邪說的著作(見里米尼代表會議的決議，吉約姆在海牙的发言，載于“汝拉簡报”第10—11期、巴塞罗纳“联盟”周报等)。

現在，当平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委员会”預定要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竞争者对于国家和对于把工人力量集中起来的任何做法是这样地仇恨。事实上，在工人階級还没有自己的各种代表机构以前，在“我們的委员会”的伪装下活动的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不可能成为公共財富的占有者，也不可能得到他們如此热心地授意別人應該具有的“多劳动少消費”的崇高而充滿功名心的意願的果实！

2. 革命問答

涅恰也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碼写的名为“革命問答”的小册子³⁶⁹，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詞和律師們提供的无可辯駁的证据說明，这本革命問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从来也不敢否认

他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的秘密規章、“几句话”、傳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們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領域內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讀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这种道德的純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埃斯科巴尔派³⁷⁰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穌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羅馬的教会罢了。革命問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規約，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系統的、毫不隱諱的闡述。我們根据 1871 年 7 月 8 日在法庭上宣讀的文本把它們 in extenso [全文] 引在这里。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 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論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慣例和道德断絕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繼續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破坏它。

第三条 革命者鄙視任何学理主义，拒絕世俗科学，而让后輩去研究它。他只知曉一門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許还有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地研究一門活的科学——人，現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по-*

ganyib)制度。

第四条 他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第五条 革命者是自己献身的人，他对国家和整个等级制的文明社会是无情的；他不应该期待对自己有任何宽恕。在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或秘密或公开的、但是不间断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应该学会经得起拷打。

第六条 他对自己是严酷的，对别人也应该严酷。一切亲属、友谊、爱情、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他只有一种柔情，一种安慰，一种褒奖和满足——革命的成功。他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第七条 真正革命者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浪漫主义，任何伤感、欢乐和嗜好；甚至也不能容许有私仇和进行个人报复。革命激情应该成为他经常的、每时每刻的内心状态，并且要与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应该受私欲驱使，而应该为共同革命利益的要求所支配。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八条 对革命者来说，只有在行动上表明是与这个革命者自己从事同一种革命事业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和亲爱的人。这种同志在破坏一切的 (verserouchitelnoi) 实际革命事业中的有用程度，是确定对他的友谊、忠诚和其他义务的唯一尺度。

第九条 革命者的团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革命事业的全部力量所在。在革命认识和革命激情方面处于同等程度的革命同志，应该尽可能共同讨论并且一致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因此，在实现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每个人应该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完成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只有在为事业的成功所必需的时候，才向同志们求教并取得他们的帮助。

第十条 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做共同的革命资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他

應該節省地使用自己这部分資本，經常努力从中取得最大的利益。他應該把自己看做用于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資本，而且只應該看做是这种資本，未經完全亲信者的整个协会同意，他本人决不能单独加以支配。

第十一条 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問題时，革命者不應該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應該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應該估計这位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應該估計由于搭救这位同志需要損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一下孰輕孰重，再行决定。

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

第十二条 吸收不是言論上而是行动上表現良好的新成員加入协会，应經全体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只有抱着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級制的、所謂文明的世界的信念，革命者才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應該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他應該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中有亲屬关系、朋友关系和爱情关系，那就更糟糕；如果他的手能被他們拦住，他就不是革命者。

第十四条 为了达到无情地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常常應該假装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社会上。革命者應該潛入一切地方，一切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小店鋪、教会、貴族家庭、官僚界、軍界、文艺界、第三厅〈秘密警察机关〉，甚至潛入皇宫。

第十五条 應該把这整个丑恶社会分成几类人：第一类應該立即判处死刑。本协会将以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

第十六条 在拟定这种名单和确定上述次序时，决不應該以一个人的个人恶行，甚至不應該以他在本协会或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憤为标准。这种恶行和这种公憤甚至可能有部分的好处，它們有利于激起人民的暴动。應該以处死某一个人能够給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應該消灭对革命組織特別有害的人，以及突然横死会引起政府的最大恐惧的人，使政府失去聪明而有毅力的活动家，从而动摇它的力量。

第十七条 第二类應該包括那些只是暫時〈！〉讓他們活着，以便讓他們

用一系列兽行迫使人民必然发起暴动的人。

第十八条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身居高位的畜牲，或者虽然既没有特别智慧又没有毅力，但是由于所处地位而拥有财富、联系、威望和力量的人。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他们；把他们制服，把他们弄糊涂，并且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威望、联系、财富和力量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帮助。

第十九条 第四类是国家中的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按照他们的纲领同他们一起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假装是盲目地跟着他们走，实际上则要完全支配他们，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用他们的手去扰乱国家。

第二十条 第五类是总爱在小团体内和在纸面上大发空论的教条主义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必须不断地推着他们、拉着他们前进，使他们去进行实际的、复杂困难的活动，结果多数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少数人将受到真正的革命锻炼。

第二十一条 第六类，也是重要的一类，是妇女。她们又应该分为主要的三种人：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像第三类和第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她们可以像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她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二条 除了人民即无知大众(tchernorabotchii lioud)的彻底解放和幸福以外，本协会没有其他目的。但是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民革命才可能实现这种解放和达到这种幸福，所以本协会将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促进那些最终必然使人民无法容忍并迫使他们实行普遍起义的不幸和灾祸发展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 本协会所理解的人民革命不是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运动，这种运动总是不敢触动财产以及所谓文明和道德的社会秩序的传统，它迄今到处都只限于为了推翻一种政治形式而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并且力求建

立所謂的革命國家。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滅一切國家並且根除俄國秩序的一切國家傳統和階級的革命。

第二十四條 因此，本協會不打算自上而下地把任何組織強加於人民。毫無疑問，未來的組織一定要從人民運動和生活中產生出來。但是，這是後輩的事業。我們的事業是可怕地、徹底地、普遍地、無情地破壞。

第二十五條 因此，我們接近人民首先就應該同人民生活中的這樣一些分子聯合起來，他們從莫斯科公國成立以來不是在言論上而是在行動上不斷對直接或間接同該公國有聯繫的一切，對貴族，對官吏，對神甫，對商界^①和小商人，人民的剝削者^②提出抗議。我們要同慍悍的強盜界——俄國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聯合起來。

第二十六條 把這個強盜界團結成一個不可戰勝的、摧毀一切的力量——就是我們的全部組織、秘密活動和任務。”

批評這種傑作就是掩飾它的滑稽性質。這樣也就是過分地看重這個異想天開地要把魯道夫、基度山、卡爾·穆爾和羅伯爾·馬凱爾的形象都集於一身的無定形的破壞一切的人。我們只想借助於一些對比來說明這本革命問答的精神實質甚至連它的措辭都是同秘密規章以及同盟的其他俄文著作相同的，如果不算其中許多艱澀誇大之處的話。

同盟秘密規章中的三級親信者在革命問答第十條中得到了再現，第十條談到“第二級和第三級的革命者……非完全親信者”。國際兄弟會章程第六條規定的國際兄弟的義務同革命問答第一條和第十三條提出的義務是相同的。章程第八條所指出的兄弟可以擔任政府職務的條件，在革命問答第十四條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闡明”，第十四條告訴他們，如果有命令，他們可以去當警察。向兄弟提出的（章程第九條）要他們彼此商量行事的勸告，在革命問答

① 在巴枯寧的俄文本中用的是：“商人等級”。——編者注

② 在俄文本中用的是：“富農惡霸”。——編者注

第九条中得到了重申。国际兄弟会綱領第二、三、六各条对革命性质的表述，同革命問答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表述完全一样。在綱領第四條中提到的雅各宾派，在革命問答第二十條中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第五类人”，两个文件都規定要把他們处死。綱領第五條和第八條中論述真正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进程时所表述的思想，同革命問答第二十四條所表述的思想毫无二致。

在革命問答第三條中包含的对科学的譴責，在一切俄文著作中都得到了重申。把强盜作为模範的革命者而加以理想化，在“几句话”中只是露出了一些苗头，而在其余一切著作中就已公开承认并加以宣揚了。革命問答第二十條所說的“第五类”，在“革命問題的提法”中称为“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在那里，也同革命問答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一样，断言革命者的首要义务就是当强盜。在“革命原理”和“人民裁判”中只是开始宣揚破坏一切，革命問答第六、八和二十六各條則已把破坏一切規定为义务，而有計劃有步驟的暗杀在第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各條也都談到了。

3. 巴枯宁致俄国軍官的呼吁书

但是，巴枯宁认为，必須使別人对他参与了所謂涅恰也夫陰謀一事无法提出任何怀疑。他出版了标明“1870年1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軍官”。关于这个“定价一法郎”的呼吁书，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都登了广告，指明是巴枯宁的著作。現在我們从这个呼吁书中摘引几段。

和涅恰也夫在俄国所做的一样，这个呼吁书一开头就声明說：

“在罗曼諾夫—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和俄国人民之間，在韃靼—德意

志族的桎梏和广泛的斯拉夫族的自由之間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刻必将来临。我們这里春天快要到来，而战斗将在早春时节开始……革命力量已經准备好了，像目前全俄国人民这样存在着深刻、普遍的不滿的条件下，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組織領導这个必不可免的革命，因为“秘密組織就像是革命軍队的司令部，而革命軍队就是全体人民”。

“在‘告俄国的青年兄弟’这个呼吁书中，我曾經說过，在未来的、如此明显地日益临近的粉碎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中，領導人民群众的斯切尼卡·拉辛，將不是单枪匹馬的勇士，而是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任何人，只要不是傻瓜，自然都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秘密的、現在已經存在并且进行活动的組織，这个組織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紀律，它的成員都无限忠实于它并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們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

这个委员会的成員都完全放棄了自我；这就使得他們有权要求这个組織的一切成員都无条件地放棄自我。他們彻底拋棄了他个人的，构成一切沽名釣譽、貪权慕勢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的一切，因此，由于永远放棄了个人的財產、官方的或公众的权力和力量以及社会上的任何名譽地位，他們就必然使得自己永远默默无聞，他們把事业的榮譽、表面的豪华和喧囂让給別人，而只把事业的实质留給自己，同样地也不是留給自己个人，而是集体。

他們像耶穌会教徒一样，每个人甚至放棄了个人的自由，不过目的不是要奴役別人，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委员会中，以及在整个組織中，考虑問題、表示願望、从事活动的不是个人，只是集体。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这样置之度外，在許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憤怒的。这确实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才开始这样做和剛剛加入組織而还没有拋棄喜欢讲空話、瞎吹牛的恶习的人來說，对于那些玩弄名譽、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总是以想像中的人性的可怜特征（在我們俄国社会中，在这些特征后面显露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个个都最彻底地向最齷齪、最卑鄙的現实的条件屈服）来安慰自己的人來說，这就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想在事业中求得自己虛荣心的滿足，求得讲空話的借口，喜欢使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在事

业中得到反映而不是热爱事业本身的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任何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都是自由的，他们知道，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他就属于它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加入组织是自由的，但是不能退出组织，因为任何成员退出都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遭到危险，而这个组织不应该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轻率行为、一意孤行或者他们的谦逊、诚实和力量的程度大小……因此，每个人加入组织时都应该知道，他把自己、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资金、才能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了组织……这在它所公布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会以外的组织的其他一切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纲领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确……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革命的〉激情，那末组织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他来说都是容易办到的。大家知道，对于激情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激情不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障碍越是难于克服，为激情所鼓舞的人的意志、才能和力量就越显得顽强。谁有这种激情，谁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存在的余地；他甚至不是放弃这些嗜好，因为在他身上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本团体的严肃的成员清除了自己本身的任何猎奇心理，并且无情地追击其他一切人的猎奇心理。虽然他也认为自己值得得到任何信任，但是正因为值得信任，即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除了他为更好地完成他所担负的事情所必需的东西以外，他不企求也不希望知道任何东西。关于事业，他只是根据命令叫他跟谁谈就跟谁谈，叫他谈什么就谈什么；总之，他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循他从上面得到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询问，甚至也不设法打听他本人在组织中是哪一级；自然他只希望尽可能让他承担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耐心地等待把事情委托给他。

这种铁的、无条件的纪律可能会使新参加者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屈辱；但是，任何正派的成员，任何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只要他具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那种融汇一切的人民胜利的激情，这种纪律就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和屈辱，而且相反地会使他高兴，同时会使他安心。严肃的成员会认识到，正是这种纪律才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sine qua non* [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依靠自发的人民的威力，将能够战胜和破坏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

别人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信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员会的独裁领导呢？但是，这个委员会你们是知道的，因为第一，根据这个委员会公布的纲领你们

可以知道它，这个綱領非常明确而清楚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組織的人还做了更加詳細的解釋；第二，通过你們知道和尊敬的那些人对它所抱有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个委员会已經对你們作了自我介紹，这种信任使你們只会加入这个組織，而不是别的組織。通过始終符合本組織的綱領和目的的、不倦的、坚决的和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很快就会使得本組織的真正成員更加了解它。大家都将自願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一方面他們在實踐中愈来愈确信委员会的确实令人惊異的預見性、警惕性、理智的毅力和它的命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确信这种紀律的化險为夷的作用和必要性。

有人可能問我：如果委员会的成員对一切人說来都是无法探知的秘密，那末，你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有关該委员会的消息，并且确信它是有根据的呢？——我坦白地回答这个問題。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員、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它的所在地，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委员会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外的革命委员会对俄国來說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情，这也許只有流亡者中那些沽名釣譽的糊塗虫和夸夸其談的饒舌家才能想出来，他們用‘人民事业’^①这个响亮的名称来掩飾自己徒驚虛名和恶毒陰謀的懶散行为。

在十二月党人的貴族陰謀(1825)以后，伊舒亭和他的同志們做了成立郑重組織的第一次嘗試。本組織是第一个彻底成功的、整个俄国的革命力量的組織。它利用了一切准备和試驗。任何反动派都不能迫使它解散，它的寿命将比一切政府都长。只要它的全部綱領还没有成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成为全世界的生活，它就不会停止活动。

大約一年以前，委员会认为把关于它存在的事实告訴我是有益的，于是給我寄来了它的綱領，同时还說明了俄国革命行动的总計劃。我贊同了綱領和計劃，确信这一事业以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严肃的，因此我做了我确信是在国外的任何一个正直的流亡者都应该做的事；无条件地服从了作为俄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代表和領導者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我現在对你們講話，也只是服从委员会本身的要求。此外我什么也不能对你們說。关于这个組織，我只补充一句話。我很了解整个組織的計劃，所以我完全确信，現在任

^① 讀者記得，由几位俄国青年在日內瓦出版的國際的俄文報紙用的是这个名称，这些青年非常清楚，这个所謂的委员会和巴枯寧的組織的真正价值。

何力量也不能破坏这个組織。即使在行将来临的斗争中人民党遭到新的失败——我們誰也不害怕这种失败，我們相信人民事业即将胜利，——即使我們的希望沒有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在人民起义的最悲惨的毁灭中，在最野蛮的反动中，这个組織仍将完整无损……

这个綱領的基础是最广泛的、最人道的，这就是以社会财产和一切人都同样必須从事的共同劳动为基础的，一切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平等，当然，應該把那些宁願餓死也不肯工作的人除外。

世界各国的无知大众的綱領目前就是这样，这个綱領完全符合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的要求和本能…… 我們組織的成員向下层人民^①提出这个綱領的时候，感到惊佩不已的是，他們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地理解了它，并且如此热切地接受了它。就是說，綱領已經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誰贊同它，誰就应当跟着我們走。誰反对我們，誰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就是沙皇的宪兵、沙皇的劊子手——我們的敌人……

我对你們說过，我們的組織建立得十分巩固，現在我再补充說一句，它在人民之中已經扎下了深远的根，即使我們現在遭到了失败，我們的反动派也无法破坏它……

一些奴僕成性的报纸和杂志遵从第三厅的主使，竭力要公众相信，政府已經把阴谋一网打尽了。政府什么也沒有抓着，这个委员会和組織現在和将来都完整无损，政府本身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大爆发已經迫近。人民大爆发已經如此迫近，每个人現在就應該决定，他是想做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呢，还是做我們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于一切朋友，不管他屬於哪一个阶层，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我們的队伍都是欢迎的。但是你們会問：怎样找到你們呢？誰抱着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真誠願望和坚定意志去寻找这个組織，在你們周圍到处存在、在你們的同志中已經有了許多成員的这个組織本身就会去寻找他。誰不贊成我們，誰就是反对我們。任您選擇吧。”

巴枯宁在由他署名的这本小册子中，假装成似乎他不知道被他托名來說話和被涅恰也夫托名在俄国活动的那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和成員。但是，授权涅恰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的唯一的文

^① 在巴枯宁呼吁书的俄文本中用的是：“无知大众”。——編者注

件是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签署的，得到关于各支部的工作的报告唯一的一个人，也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此，当米哈伊尔·巴枯宁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时候，就是宣誓服从米哈伊尔·巴枯宁本人。

我們认为，无需乎再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篇由巴枯宁署名的著作，不仅在方針上而且在措辞上都和其他匿名出版的俄文文件完全相同。我們只想指出，巴枯宁在这里怎样运用革命問答的道德。他首先向俄国軍官們宣揚这种道德。他向他們宣称，他和其他亲信者以革命的耶穌会教徒的身分进行活动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填补了既有的空白点；他說，对于委员会，他們放棄了个人自由，他們的个人自由不会比有名的耶穌会“死尸”的个人自由更多些。为了使暗杀伊万諾夫一事不致于把軍官們吓跑，他企图叫他們相信把任何想退出秘密团体的人杀掉是必要的。然后，他就用这种道德来对待他的讀者，最无耻地欺騙他們。巴枯宁知道，政府不仅逮捕了俄国的全部亲信者，而且逮捕了十倍以上的被涅恰也夫陷害的人，因为他們屬於革命問答中規定的所謂的“第五类”人，他知道，在俄国連組織的影子也不存在了，那里不仅現在沒有，而且从来就沒有过任何委员会，如果不算当时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的涅恰也夫的話；此外，他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拥护者，它只能成为政府采取新的迫害措施的借口；可是他仍然声称，政府根本誰也沒有抓到，委员会在俄国繼續存在，并且在那里开展着不倦的、坚决的、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广泛表现出真正令人惊異的預見性、警惕性、有理智的毅力和令人惊叹不已的灵活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供詞成了这一切的证明），他的秘密組織，即 1825 年以后在俄国存在的唯一严肃的組織，是不可損害

的，这个組織在热烈欢迎它的綱領的人民的下层中扎下了根，它在軍官們周圍到处存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再过几个月，即在1870年春天，革命就要爆发。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伪国际兄弟面前对鏡观赏“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声称“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置之度外”，声称自己比“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具有喜欢讲空話、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更高尙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是这样向俄国人撒謊的，就是这样吹牛的。

在1870年，这个人向俄国人宣揚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穌会的紀律是胜利的 *sine qua non* [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紀律才能战胜国家（不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一般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更加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在1871年也正是这个人却以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权威主义和集中制为借口，以在建立自治支部和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并且使国际变成所謂它应该成为的东西即未来社会的原型为借口，图謀在国际内部掀起分裂和破坏运动。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穌教徒的圣父圣祖們的巴拉圭³⁷¹。

九 結 語

国际一方面让各国工人階級的运动和意願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它又能够把工人階級团結成一个統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統治階級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階級的国际威力。統治階級及其政府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們全协会的执行机关——总委员会。自从巴黎公社复灭以来，这种攻击日益变本加厉。同盟分子正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对总委员会公开宣战！他們断言，国际手中的强有力的武器——总委员会的威望——无非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武器而已。他們說，这种威望不是在反对国际的敌人的斗争中赢得的，而是在反对国际本身的斗争中赢得的。用他們的話說，总委员会的权力欲战胜了各支部和各国联合会的自治。为了拯救自治，除了使国际失去领导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办法。

实际上，同盟的活动家們知道，他們若不利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巴枯宁的一百名国际兄弟就只有永远放棄秘密领导无产階級运动的幻想。他們的粗暴的攻击得到了世界各国警察当局的报刊的贊揚。

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詞句，一句話，他們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們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

和独裁的統治。

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在国际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屈服于秘密的专政并把巴枯宁先生的綱領强加于它！

剥去这个綱領的破烂的奇装異服，可以把它归結如下：

1. 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齷齪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

2. 把必須腐蝕极少数細心挑选出来的工人奉为原则，迎合他們的心理，用神秘的引为亲信的办法使他們脱离群众，强迫他們参加秘密领导机关所策划的阴谋和詐騙勾当，鼓励他們放纵自己的“恶欲”——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

3. 主要的宣傳方法是：瞎吹秘密团体的規模如何龐大、力量如何雄厚，預言秘密团体所准备的革命必不可免等等，以此来吸引青年；在各国政府面前陷害那些出身于各富裕阶级的最进步的人，以便以后在金錢方面剝削他們。

4. 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們的破坏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爭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总之，他們建議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个由奸細密探組成的受过严格訓練的匪帮。

在同盟的理論戏法和实际图謀中，究竟笑料多还是劣迹多，这很难說。不过同盟毕竟是在国际内部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两年中使我們协会的活动遭到了困难，結果有一部分支

部和联合会脱离出去了。因此，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各项决定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代表大会不能让国际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至于那些想剥夺总委员会的职能的人，我们不能采取别的态度，只能把他们看做是叛徒或者傻瓜，因为失去这些职能国际就将变成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

委员会：

欧·杜邦	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	A. 勒穆修
卡尔·馬克思	奥·赛拉叶

1873年7月21日于倫敦

十 补 充

1. 巴枯宁的逃亡

1857年，巴枯宁被解往西伯利亚，但是不是像人们根据他的叙述可能认为的那样去服苦役，而只是流放。当时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他是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亲戚和巴枯宁的亲戚。巴枯宁由于这种亲属关系和他对政府的效劳，在那里处于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优待。

当时1849年阴谋的首脑和组织者彼得拉舍夫斯基³⁷²也在西伯利亚。巴枯宁对他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陷害他；作为总督的亲戚，他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巴枯宁这样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成了他受上司赏识的又一个原因。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桩暧昧的事件结束了两个被流放者之间的这场斗争。对一位玩弄自由主义的高级官吏的行为的批评，在总督的周围引起了一场风波，结果导致了决斗和死亡。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同个人阴谋和诈骗伎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激怒了全体居民，他们指责高级官吏们是蓄意谋害这次决斗的牺牲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民愤非常大，政府甚至担心会发生人民暴动。巴枯宁坚决地站在包括穆拉维约夫在内的高级官吏那边。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设法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并且还在他以目击者的身分写给赫尔岑的一封信

长信中为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那批人辯护。赫尔岑把这封信登在“钟声”上的时候，删去了其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切攻击，但是在轉寄圣彼得堡时这封信的抄本使当地的公众知道了这封信的原文。

一般說来比其俄国的同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西伯利亚商人，想在西伯利亚创办一所大学，这样就无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国很远的学校去上学，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文化中心。这需要經過皇帝的恩准。穆拉維約夫在巴枯宁的影响和劝說之下，表示反对这个方案。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是有久远的根源的。这个事实在西伯利亚广泛地为人們所知道。俄国人多次向巴枯宁质問这件事情，巴枯宁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只好这样来解釋自己的行为，說是当时他正准备逃走，因此力求博得自己的亲戚——总督的好感。

巴枯宁不仅自己享受和濫用了上司的优待，而且由于受到了少量的賄賂还为資本家、承包人和包稅人爭取这种优待。在涅恰也夫的那些牺牲者身上搜获并由政府在1869—1870年間加以公布的巴枯宁的傳单中，包含有公敌名单；列入名单的人之中有名噪一时的“莫斯科新聞”³⁷³总編輯卡特柯夫。为了报复，卡特柯夫在自己的报纸上作了如下的揭露：說是他那里有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到达倫敦以后写出的一批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巴枯宁要卡特柯夫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借給他几千卢布。巴枯宁承认，他在西伯利亚期間每年都从一个燒酒包銷者那里得到一定数量的款子，这位包銷者給他这笔錢，是想让他帮忙保证自己能得到总督的照顾。这笔不清白的外快（他在逃走以后就不再領取了）使他的良心受到責备，他想把自己用了的这笔錢还給那个包銷者；为了实现这种善

行，他便要求自己的朋友卡特柯夫資助他。卡特柯夫拒絕了。

当巴枯宁向自己的老朋友卡特柯夫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卡特柯夫早就在第三厅的职务上声馳名赫，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来对俄国革命者特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波兰革命进行告密。可见，1862年巴枯宁是向这样一个人要錢，这个人他知道是由俄国政府豢养的告密者和文化界的匪徒。巴枯宁連一次也不敢反駁这个沉重的指責。

巴枯宁用上述办法弄到了許多錢，同时又有官高势大的总督的庇护，要逃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不仅領到了一張写着自己名字的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通行的护照，而且还接受官方的委托，巡視直到东部国境的边陲地区。到了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口以后，他便立即不費周折地轉赴日本，在这里他安然地坐上了开往美洲的船只，于1861年抵达倫敦。这位新的穆罕默德就这样实现了一次神奇的逃亡。

2. 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宣言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欧洲全体自由派的响亮的掌声中宣布廢除农奴制。車尔尼雪夫斯基和革命派爭取保持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努力虽然获得了結果，但是結果是如此不能令人滿意，早在关于廢除农奴制的宣言尙未公布以前，車尔尼雪夫斯基就痛心地承认道：

“如果我知道，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会得到这样的解决，我宁願遭到失敗也不願获得这样的胜利。我宁願讓他們按他們自己的意願行事而完全不考虑我們的要求。”

事实上，关于廢除农奴制的法令无非是一种詐騙伎俩。相当

大一部分土地被从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夺走，而宣布了实行农民贖买土地的制度。沙皇这个背信棄义的法令成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那一派人反对皇帝的各項改革的新的、无可辯駁的論据。而自由派却站到赫尔岑的旗帜下面，大声高呼：“加利利人，你胜利啦！”加利利人这个詞在他們嘴里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从此以后，以赫尔岑的“钟声”为主要机关报的自由派，就不断吹捧解放者沙皇，为了轉移社会上对这个反人民的法令所引起的怨恨和抗議的注意力，他們竟呼吁沙皇繼續进行他的解放事业，并且为解放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为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开始一次十字軍征討。

1861年夏天，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Sovremennik》）杂志³⁷⁴上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陰謀，并且向各斯拉夫民族說明了关于俄国的真正局勢和他們的虛伪朋友——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張自私自利的蒙昧主义的真相。当时，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巴枯宁认为发表意見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写了以“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为題的长篇宣言的第一部分，作为附录刊載在1862年2月15日的“钟声”上。宣言的第二部分一直沒有出現。

宣言一开始就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实于朋友們，忠实于偉大的共同事业和我自己…… 久經考驗的老朋友以及与我們同思想共意志的年輕朋友，現在我来到你們这里，請求你們：再次接受我加入你們的队伍，允許我在你們中間，和你們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貢獻給爭取俄国的自由、爭取波兰的自由、爭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爭。”

巴枯宁之所以向他的老朋友和年輕朋友提出这种毕恭毕敬的

請求，是因为

“在異邦做一个活动家是不愉快的。我在革命的年代里对这一点深有所感：無論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我都不能扎根。因此，由于我还保持着当年对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全部热烈同情，而且为了不白白地浪費我的余年，我現在應該把自己的直接活动局限在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人的范围之內。在我的爱情和信仰中，这三个单独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1862年，即十一年以前，当时年滿51岁的偉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声明崇拜国家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爱国主义。

“直到現在，大俄罗斯民族可以說只是过着外部的国家生活。無論他們在国内的状况多么艰难，尽管他們陷于极度的破产和遭受奴役，他們仍然珍重俄国的統一、力量和偉大，并且甘願为这些做出一切牺牲。这样就在大俄罗斯民族当中形成了国家观念和不讲空話而务实际的爱国主义。可見，在斯拉夫各部族之中只有这个民族保全下来了，只有这个民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并且使一切都感觉到它是一种力量…… 別担心这个民族会丧失它的合法的感召力，以及它用三百年来为了自己国家的完整而以难以忍受的自我牺牲精神建树的功績在自己内部培植的政治力量…… 我們將把我国的韃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我国的德国人发送到德国去，我們將是自由的純粹俄罗斯民族……”

为了使这篇以要求进行一場反对韃靼人和德国人的十字軍征討为結尾的泛斯拉夫主义宣傳更有分量，巴枯宁指点讀者去找尼古拉皇帝：

“甚至有人說，尼古拉皇帝本人在临死以前不久准备对奥地利宣战，他想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一切斯拉夫人、馬扎尔人、意大利人发动总起义。他自己制造了一場反对自己的东方風暴，而为了躲过這場風暴，他曾想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說，致斯拉夫人的各篇呼吁书上已經由他签了字，而且其中还有一篇致波兰的呼吁书。不管他怎样仇恨波兰，他还是知道，没有波兰要发动斯拉夫人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已經彻底战胜了自我，以致准备承认波兰的独立存在，但是……只是在維斯拉河的西岸。”

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揚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內閣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向居住在奥地利、普魯士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直截了当地宣布，他們将要被溶化在大俄罗斯帝国之中，所以他們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繪成一个能够把他們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們联合成偉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們彼此之間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剛才引用的那段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們現在即将談到的一篇宣言，将毫无疑问地确证这一点。

3. 巴枯宁和沙皇

我們已經談到，由于廢除农奴制，俄国自由派和革命派之間的斗争加剧了。在革命派的領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周圍，团結了一个政論家的队伍、人数众多的一批軍官和青年学生。自由派的代表是赫尔岑、几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相当数量的和平改革派分子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拜者。政府支持了自由派。1861年3月，俄国的青年大学生們表示坚决拥护解放波兰；1861年秋天，他們曾试图反对“国家改革”，結果当局采取了惩戒措施和經濟措施，剝夺了貧苦的大学生（他們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宣布他們的抗議是暴乱；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有数百名青年被关进監獄，經過三个月的監禁以后便从大学里被驅逐或开除。由于担心这批青年会加剧农民的不滿，国家参議

院特別決定禁止原來的大學生在農村中擔任任何社會職務。但是，迫害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們把教授們例如巴甫洛夫驅逐出校，由被開除的大學生組織的公共補習班被封閉了；利用毫無根據的借口來採取新的迫害措施；剛剛被批准成立的“青年學生互助儲金會”突然被查封；停止出版各種報紙。這一切激起了激進派的極大憤怒和忿恨，使他們不得不出版地下刊物。於是出現了這一派的宣言，題目是“年輕的俄羅斯”，還加上了引自“羅伯特·歐文”的題辭。³⁷⁵ 這個宣言對本國國內狀況、各個黨派的情況和出版界的處境作了清楚而明確的說明，它宣傳共產主義，做出了必須進行社會革命的結論。宣言號召一切鄭重的人在激進的旗幟周圍團結起來。

這個地下印刷的宣言剛一出現，由於命定的巧合（如果警察當局沒有插手其中的話）在彼得堡便發生了許多起火災。政府和反動報刊幸災樂禍地利用這個口實指控青年和一切激進派在縱火。各個監獄又有了人滿之患，在通往流放地的各條道路上又一次出現了成群結隊的受難者。車爾尼雪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關進了聖彼得堡要塞，在那里經受了漫長的兩年折磨以後，他又被押到西伯利亞去服苦役。

早在这场災禍發生以前，赫爾岑和格羅美卡（他後來作為波蘭一個省的總督曾協助鎮壓波蘭）就一個在倫敦一個在波蘭惡毒地攻擊激進派，並且誣蔑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什麼他得了勳章可能就會罷休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措詞極其委婉的文章中呼吁赫爾岑考慮一下“鐘聲”在對俄國革命派採取了公開的敵對立場以後打算扮演的角色會有什麼後果。³⁷⁶ 赫爾岑鄭重地聲明，他準備當着他稱為國際民主派的那些人的面，即當着馬志尼、維克

多·雨果、賴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的面，举起他那优美的酒杯祝賀偉大的解放者沙皇的健康；他还补充說，不管彼得堡革命的但以理們說些什么，我知道，和他們的願望和哀号相反，这种祝賀一定会在冬宮（沙皇的府邸）得到良好的反应。革命的但以理們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

巴枯宁超过了赫尔岑。正当革命派被完全击潰的时候，正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坐牢的时候，当时已經 51 岁的巴枯宁出版了他給农民沙皇的那本有名的小册子“罗曼諾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集”1862 年版。

“許多人还在猜測，俄国会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却逐步地开始了，它支配着一切地方、一切东西、一切聪明人的头脑。它依靠政府的手来进行甚至比依靠革命信徒的努力来进行还要順利。它在沒有使俄罗斯世界得到新生以前，在沒有建立和創造出一个新的斯拉夫世界以前，不会平靜，不会停息。

王朝显然是在毁灭自己。它认为它想得救就要窒息而不是激发觉醒了的人民生活。这种生活如果被理解了的話，它会把沙皇王朝提高到前所未見的强大和光荣的高度…… 真遺憾！这样庄严而美好的角色却很少落在沙皇王朝的身上。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受人民膜拜的偶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农民沙皇^①，他的强大并不在于本国人民惧怕他，而在于本国人民爱戴他，人民享有自由和过幸福的生活。依靠这种人民，他可能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腦……

为此只需要有一个在寬容精神和坚持真理方面開闊而坚强的俄罗斯的心胸。整个俄罗斯的、而且整个斯拉夫族的生气勃勃的活动都要求他来駕馭，决心做他的历史威名的柱脚。”

接着，巴枯宁要求消灭彼得大帝的国家、德意志国家，并且建立“新的俄罗斯”。把这项事业的完成寄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身上。

^① 把农民沙皇（Zemsky Tzar）的封号贈与亚历山大二世是巴枯宁和“钟声”的一项发明。

“他的开头做得十分出色：他宣布給人民以自由，給經受了千年奴役的人民以自由和新生活。看来他是想建立农民的俄罗斯〈zemskoujou Rossiou〉，因为在彼得的国家中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思議的。1861年2月19日，尽管关于解放农民的命令有一切失策之处和荒謬的矛盾，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曾經統治过俄国的一位最偉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但是，“自由是違背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切本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而“德国人将永远不会理解和爱护农民的俄罗斯……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巩固彼得国家的大厦……他想出了招致灭亡的、不可能实现的主意，他正在毁灭自己和他的王朝，并且准备使俄国陷于流血的革命”。

“关于解放的命令”的一切矛盾、一切枪杀农民的事件、大学生的学潮，总之，一切恐怖手段，在巴枯宁看来，

“完全是由于沙皇缺乏俄罗斯精神和热爱人民的胸襟，由于他如痴如狂地力图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的国家……可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本来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偉大、最有益的革命。就是現在他还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現在对和平的办法感到絕望的話，那并不是因为为时已晚，而是因为我們终于对亚历山大二世認識他能够挽救自己和俄国的唯一道路的能力感到絕望了。經過千年沉睡以后觉醒起来了的人民的运动是无法阻擋的。但是，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这个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

为此，他只需要給农民以土地、自由和 *self-government*〔自治〕。

“也不要害怕由于实行区域的 *self-government* 各个省份之間的联系就会断絕，俄罗斯大地上的統一就会遭到破坏；要知道各省的自治将只是行政方面、内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自治，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自治。没有一个国家，也許除法国以外，能够像俄国这样，在人民当中有这种意义的制度的統一、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尊严。”

当时在俄国有有人要求召开国民議會^①。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議

^① 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这里和后面用的術語是：“全民性国民代表會議”。——編者注

会来解决財政困难，另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議會来推翻君主政体。巴枯宁希望用这种議會来显示俄国的統一，来巩固沙皇的权力和威严。

“迄今只体现于沙皇一身的俄国的統一，現在再要求另一个代表机关：国民議會…… 問題并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革命，而在于革命的办法究竟是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如果沙皇把人民的运动领导起来，同国民議會一起广泛而坚决地根据自由的精神来着手改造俄国的話，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和平的、美滿的。但是，如果沙皇想要倒退或者只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那末革命就将是可怕的。那时，由于爆发全民起义，革命就将具有无情杀戮的性质…… 亚历山大二世能够挽救俄国免于彻底破产，免于流血。”

可見，在 1862 年，革命对巴枯宁說来意味着俄国的彻底破产，于是他央求沙皇預防国内发生革命。对于許多俄国革命者說来，召开国民議會就是意味着推翻沙皇王朝，但是，巴枯宁却使他們的期望落空，他向他們宣布，

“国民議會将反对他們而拥护沙皇。可是，如果国民議會要和沙皇作对呢？——这难道可能嗎？要知道，是人民将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議會，而人民直到現在都无限信仰沙皇，期望从沙皇那里得到一切。哪里会有作对的事呢？…… 毫无疑问，如果沙皇現在〈在 1862 年 2 月〉召开国民議會，他就会第一次看到那些真正忠实于他的人都团結在他的周圍。如果让无政府状态^①再繼續几年，民心就可能改变。我們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但是，現在人民拥护沙皇，反对貴族，反对官僚，反对穿着德国〈即欧洲〉衣服的一切人。对于人民說来，在这个官方俄国陣营中的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切人都是，只有沙皇除外。誰敢叫人民反对沙皇呢？即使有人敢，难道人民会相信他嗎？不是沙皇不顾貴族的意志，不顾官僚們的共同願望，解放了农民嗎？”

“俄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第一次将要直接会見自己的沙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关紧要的时刻！他們彼此将怎样感到滿意呢？这次会

① 巴枯宁用的是：“混乱状态”。——編者注

見將關係着沙皇和俄國的整個未來。人民使者們對沙皇的信任和忠誠是無限的。如果沙皇依靠他們，對他們表示同樣的信任和熱愛，他就能够把自己的寶座豎立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高，更穩固。但是，如果人民使者們見到的不是救命恩人沙皇、人民的^①沙皇，而是穿着普魯士制服的彼得堡皇帝、心胸狹窄的德國人，那會怎麼樣呢？如果沙皇不是給人民以他們所期望的自由，而是什麼也不給或者幾乎什麼也不給，那會怎麼樣呢？……如果那樣，沙皇制度就要遭殃。至少彼得堡的帝位，即德國人的、霍尔施坦—哥托爾普的帝位將要完蛋。

如果在決定整個俄國是生是死、是和平還是流血的問題的那個危急關頭，在國民議會面前出現一個人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義的沙皇，他熱愛俄國，決心按照人民的意志來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有了這樣的人民還有什麼事做不到呢！誰敢起來反對他？和平、信仰，都將奇跡般地得到恢復，款項也有辦法籌措，一切事情安排起來都會簡單、自然，誰都不感到吃虧，誰都不感到拘束。這樣的沙皇所領導的國民議會將會建立一個新的俄羅斯。任何惡毒的圖謀和任何敵對的力量都無力反對沙皇和人民聯合起來的威力……有沒有希望組成這樣的同盟呢？我們直截了當地說，沒有。”

不管巴枯寧在那裡說些什麼，他仍然沒有放棄誘導自己的沙皇的希望，為了影響沙皇，他用革命青年吓唬他，如果沙皇遲疑不決，這些革命青年就將完成自己的事業，為自己打開一條通向人民的道路。

“為什麼青年不擁護您，而全體青年都反對您呢？要知道這對您說來是一個很大的不幸……青年首先需要自由和真理。但是，為什麼他們離開了沙皇，為什麼他們宣布反對第一個宣布給人民自由的那個人呢？……是不是他們迷戀於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共和國’這個響亮的字眼呢？部分地說也許是這樣，但是這是非常表面的、次要的原因。我們的大多數先進青年非常清楚，西方的抽象概念，無論是保守派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或者甚至是民主派

① 巴枯寧用的是：“庶民的”。——編者注

的，都不适用于俄国的运动…… 俄国人民不是根据抽象原則来进行活动的……西方的理想对他们說来是格格不入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甚至革命派的教条主义想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方針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 他们将为历史提出新的原則，建立另一种文明，就是說要建立新的信仰、新的权利、新的生活。

在这个偉大、严肃、甚至严峻的人民面前，是不能輕率行事的。青年們将拋棄自荐的小学教师这个可笑的、令人討厭的角色…… 我們能教些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和数学撇在一边，我們的全部聪明睿智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西方学說中的那些所謂确定不移的真理的否定、对西方的彻底否定。”

接着，巴枯宁大罵“年輕的俄罗斯”一文的作者們，指責他們死搬教条、想充当人民的导师和糟蹋事业；他把他們称为什么也不懂、只会从他們讀过的几本西方书籍中吸取思想的毛孩子。当政府把这些青年当做纵火犯关进監獄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指責同这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自己的沙皇安心，巴枯宁声称：

“人民并不拥护这个革命派……我国青年絕大多数属于人民派，属于把人民事业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的那一派；这一派沒有成見，既不拥护沙皇，也不反对沙皇，如果沙皇本人开始了偉大的事业，以后又不背叛人民，这一派就永远不会离开沙皇；現在还不晚，只要他自己去领导人民，这批青年会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任何西方革命的成見都阻擋不了这批青年。而德国人該回德国去了。如果沙皇認識到他今后不應該成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脑，而應該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那末，依靠坚实的、复兴的力量，与波兰和乌克兰結成同盟，割断一切可恨的德国人的同盟，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他就会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实在說，討伐德国人是一件斯拉夫族的很好的，而主要是必要的事业，無論如何总比为了討好德国人而扼杀波兰人要好。积极行动起来，把斯拉夫人从土耳其和德国的枷鎖下解放出来，这将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是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号召革命派在人民事业的旗帜下团结起

来。下面就是这个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綱領的几个要点：

“第一条 我們〈巴枯宁及其同伙〉希望人民的——即公社的、省的①、区域的以及国家的 *self-government*〔自治〕，有沙皇还是没有沙皇，反正一样，看人民希望怎么样。——第二条……我們准备并且必須帮助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反对任何暴力和反对一切外来的敌人，特别是反对德国人。——第四条我們同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一起，希望向目前在普魯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压迫下受折磨的我們的斯拉夫兄弟伸出援助的手，只要还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处在德国人、土耳其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奴役之下，我們就必须不让利劍入鞘。”——

第六条規定与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亚和希腊結成同盟；这恰好就是当时俄国政府所寻求的同盟。

“第七条 我們將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偉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

这就是斯拉夫族事业的广泛的綱領，这就是人民俄罗斯事业的最高成就。就是为这个事业，我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現在我們將同誰在一起走，走到哪里去，跟着誰走呢？走到哪里去？——这我們已經談过了。同誰在一起走呢？——这我們也談过了：显然，不是同別人而是同人民在一起走。但是，跟着誰走呢？跟着罗曼諾夫走，跟着普加乔夫走，还是跟着彼斯节里走，如果发现了新的彼斯节里的話？②

說实話：如果罗曼諾夫能够并且想从彼得堡的皇帝变成农民的沙皇，我們最乐意跟着罗曼諾夫走。我們乐意站到他的旗帜下面，因为俄国人民还承认他，因为他的力量已經建立，可以立即用于事业，只要他对它进行人民的洗礼，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們乐意跟着他走，还因为他曾經

① 巴枯宁用的是：“乡的、县的”。——編者注

② 罗曼諾夫是沙皇的姓；普加乔夫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期一次偉大的哥薩克人起义的領袖；彼斯节里是反对尼古拉一世的1825年陰謀的首腦，他被絞死了。

一个人进行并完成了一场偉大的和平革命，沒有流一滴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血。由于人們的愚蠢，流血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禍害、大禍害和很大的不幸，不仅对于革命的牺牲者說来是这样，而且对于干净而彻底地达到革命所追求的目的說来也是这样。在法国革命中，我們看到了这种例子。

可見，我們对罗曼諾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們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也不是他的朋友。我們是人民俄罗斯的、斯拉夫的事业的朋友。如果沙皇领导这个事业，我們就拥护他。但是，当他要反对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們就将是他的敌人。因此，全部問題就在于：他是想做俄国的沙皇、农民的沙皇罗曼諾夫还是想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彼得堡皇帝？他是想为俄国、为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想为德国人服务？这个問題很快就会解决，那时我們將知道我們該做什么。”

遺憾的是，沙皇认为无需乎召开国民議會，而从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出，巴枯宁已經提出自己作为这个議会的議員候选人了。他的竞选宣言和对罗曼諾夫的屈膝下跪算是白費功夫了。他的幼稚的輕信态度可耻地受了欺騙，于是他沒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

这位对自己的农民沙皇五体投地的导师做出了这些无聊的杜撰，他的学生和朋友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就有充分的权利高呼：农民皇帝拿破侖第三万岁！

十一 文 件

1. 同盟的秘密規章

我們現在所掌握的这一份規章，有一部分是巴枯宁亲手写的。他把这些規章的副本不仅分发給了亲信者，而且也分发给了他期望用自己这个輝煌的綱領的启示录去加以誘騙的許多人。想当著作家的虛荣心压倒了拐騙者阴郁隱諱的习性。

国际兄弟同盟組織

三級：

- 一、国际兄弟会。
- 二、民族兄弟会。
- 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組織。

一、国际兄弟会章程

1. 国际兄弟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沒有別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沒有別的異邦和别的敌人。

2. 他們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們的原則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3. 他們是兄弟，他們永远不互相攻击，既不公开地，也不在法庭上解决自己的爭端。由双方从兄弟中推选出来的仲裁法庭，就是他們唯一的裁判机关。

4. 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來說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範圍內的帮助和保护。

5. 只有真誠地接受整个綱領以及由这个綱領而产生的一切理論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誠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結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我們既不把义务，也不把牺牲强加于人。但是，具有这种热情的人一定会成就許多事业，甚至根本不意識到他是在做出牺牲。

6. 对兄弟來說，不应当有比为革命服务和为我們的、以为革命服务为己任的秘密組織服务更重大、更神圣的事业、利益或义务。

7. 兄弟永远有权拒絕完成中央委员会或他所屬的民族委员会对他的委托，但是，如果連續多次拒絕，他就表明自己是敷衍塞責的人或懶惰的人，并且可能被所屬的民族委员会暂时开除，而根据民族委员会的提請則可能被中央委员会暂时除名，直到宪法會議做出最后决定为止。

8. 任何一个兄弟，未經他所屬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他們任何一个人，未向所屬的委员会請示都不能进行同該委员会所确定的行为規范相矛盾或者甚至相抵触的公开行动或发表这类的言論。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在一起时，他們对一切重大社会事务应当进行磋商。

9. 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們之間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們任何一个人，未經所屬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屬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須經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們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間接使它們感到兴趣的条件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10. 国际兄弟組織分为：A. 总委员会或宪法會議。B. 中央委员会。C. 民族委员会。

A. 总委员会

这是或者按确定的期限定期召集的，或者由中央委员会多数作为非常會議召集的，全体或者至少是三分之二国际兄弟的會議。它是我們整个組織的最高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权力机关，它可以修改我們組織的綱領、章程和組織規章。

B. 中央委员会

由(a)中央局和(b)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凡是不担任中央局委员的一切国际兄弟,只要离中央局相当近,可以在两天以内召集起来,——当然还有因过路而在当地的一切兄弟——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在其他方面,它们在一切相互关系中,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见第二条至第四条)。

C. 民族委员会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由当时在全国性组织中心或其附近的一切国际兄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又分为:(a)民族执行局和(b)民族监察委员会。民族监察委员会应当包括当时在当地的、没有参加执行局的一切国际兄弟。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

11. 吸收新的兄弟须由民族委员会全体当时在当地的委员(不得少于三人)做出一致决定,并经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自己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直接吸收新的兄弟。

12.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应当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以便监督和活跃该委员会执行局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它是自己的每一个成员在有关他们革命品质或者有关他们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行为的当然裁判员。它的决定应当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它指导自己全体成员的活动和公开的言论。它通过自己的执行局或者由它所指派的兄弟同中央局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至少每两星期一次。

13. 民族委员会组织本国的民族兄弟的秘密联盟。

二、民族兄弟会

14. 民族兄弟在每一个国家内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使他们永远不能脱离国际兄弟共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纲领和章程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以后才能最后生效。

15.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都有权规定两类民族兄弟:(a)一类是在全国内彼此了解的民族兄弟;(b)一类是只是在不大的小组范围内彼此了解的兄弟。民族兄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

組織的存在。

16. 在全国的一切重要地点建立省中心，省中心由国际兄弟或第一类民族兄弟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組成，任务是尽可能深入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秘密組織和宣傳它的原則，它們不限于在城市中进行活动，而且也要在乡村中和在农民中傳播这些原則。

17. 民族委员会应当尽快地筹到不仅是它自己的組織順利地进行活动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整个协会的共同需要所必需的經費。因此，它們将把經費的一部分——一半？——上繳中央局。

18. 民族局应当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記住只有当在那些应当实现原則、綱領和章程的人身有魔胆的时候，这些原則、綱領和章程才有价值。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組織

1. 同盟常設中央委员会由各常設民族委员会的全体委員和日內瓦中央支部的成員組成。

这一切成員召开的全体會議就构成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秘密全体大会是同盟的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它每年最少在工人代表大会期間召开一次，其参加者以同盟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組織的代表的資格出席；大会也可以由中央局或日內瓦中央支部在任何时候召开。

2. 日內瓦中央支部是常設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它由中央局全体委員和那些硬性規定必須永远兼任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的監察委员会委員組成。中央支部在宪法和行为規范的範圍內是同盟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但是，宪法和行为規范只有全体大会才能制定和修改。中央支部根据普通多数票决定一切实际問題(但不是宪法問題和一般政治問題)；只要中央局的多数委員不願意向全体大会申訴，这样通过的決議中央局就必須执行，如果申訴，中央局必須在三个星期以內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員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3. 中央局——执行权力机关——設委員三名至五名或者甚至七名，他們必須同时是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中央局作为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組織。作为这种組織，它接受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組織。作

为这种組織，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同一切民族局保持或多或少、或秘密或公开的联系，同时每月也从各个民族局得到报告。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中央局**作为同盟的既秘密又公开的执行权力机关，将使本团体的秘密宣傳和公开宣傳活跃起来，并且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同盟在一切国家中发展。它掌管根据公开章程（b）条的規定由一切国家上繳供共同需要用的那一部分經費。它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派自己的旅外代办到还没有同盟組織的国家中去建立組織。它在为了同盟的利益而必須实行的一切措施中，都应当服从秘密中央支部多数的决定，中央局全体委員都参加秘密中央支部。**中央局**是一个同时既公开又秘密的組織，而且它完全由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所以它始終将是这个委员会的直接代表机关。临时中央局将作为創建同盟的全体盟員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組批准。这些創建同盟的盟員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权力交給了公民 B^①而各自回国去了。临时中央局在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召开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根据公开章程第七条規定，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在最近这次工人代表大会期間召开。不言而喻，这次大会将任命新中央局委員。但是，由于中央局絕对有必要只由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所以常設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來組織和領導一切地方組織，使它們只派常設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或者絕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領導的人（如果没有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設中央委员会能够經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組織。

4. **監察委员会**对中央局的全部活动实行监督。它由住在中央局所在地或其附近的所有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以及临时住在或者路过当地或附近的所有委員組成，但是組成中央局的委員除外。根据監察委员会两名委員的要求，監察委员会全体委員应当在三天以內到齐，同中央局委員一起召集最高执行委员会中央支部大会，其权利在第二条中已經作了規定。

5. **民族委员会**由所有屬於同一民族的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一个民族有了三名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則由中央局或者必要时由中央支部建議他們成立本国的民族委员会。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可以任命本国中央委員

① 米·巴枯宁。——編者注

会的新委員，但是任命必須根据該委员会全体委員的一致决定。民族委员会在任命新委員时应当立即通知中央局，中央局給新委員注册，从而授予他以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的一切权利。日内瓦中央支部同样也有权根据支部全体成員的一致决定来任命新委員。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有在本国建立和組織同盟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民族組織的專門任务。它通过應該由它建立的、完全由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組成的民族局，对民族組織实现最高领导并成为这个組織的首脑。各个民族委员会对相应的民族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将同中央支部对中央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一样。由相应的民族局和监察委员会联合組成的民族委员会，除了中央局以外不承认别的领导机关，民族局無論在宣傳和行政方面还是在征收和上繳会費方面，都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組織之間的唯一中間机关。民族委员会通过相应的民族局应当保证这样来組織本国的同盟：使常設中央委员会委員永远在同盟中占統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随着各个民族局建成了地方組織以后，民族局就应当把它們的章程和綱領提交中央局批准，否則地方組織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綱領

1. 国际同盟建立的宗旨，是要在我們綱領所宣布的那些原則的基础上組織和加速世界革命。

2. 根据这些原則，革命的目的只能是：(a) 在欧洲破坏任何統治和一切权力（宗教的、君主的、貴族的、資產階級的），从而也就是破坏現存的一切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財政机构。(b) 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3. 我們所了解的革命，确切地說是事物的力量現在必不可免地要提出来的革命，实质上帶有国际性或者普遍性。面对着拥有諳练的組織所提供的一切威懾手段的欧洲一切特权利益和一切反动力量的帶有威胁性的联合，面对着現在在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到处呈現的深刻分裂，任何民族革命，如果它不立即擴展到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本身不包含普遍性的一切因素，就是說如果它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来締造

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远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遍性；因为除了在站在世襲土地占有制和資本方面的一切机构的廢墟上彻底解放劳动的口号以外，現在什么也不能把偉大的、唯一眞正的时代力量——工人联合、发动和調动起来。

4. 由于即将爆发的革命只能是普遍的革命，所以同盟，直截了当地說就是应当准备、組織和加速革命到来的阴謀，也应当是这样的。

5. 同盟追求双重目的：(a) 它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傳播对政治、社会經濟和一切哲学問題的正确观点。它将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并且通过建立公开团体的办法，积极进行宣傳；(b) 它将努力把一切人：聰明的、精力充沛的、坚定的、有善良意志的、矢忠于我們思想的人，都吸引过来，以便在整个欧洲，并且尽可能也在美洲建立一个正是由于这样联合起来而变得更加有力的忠誠的革命者的无形的网。

国际兄弟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的

1. 这个組織的原則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綱領的原則相同。这些原則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綱領有关妇女問題、从宗教观点看家庭、法律和國家的那一部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闡述。

中央局保留有在不久以后对这些原則提出更加詳尽的理論闡述和实际闡述的权利。

2. 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經濟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個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鏟除以财产、剝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資产階級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則为基础的現代秩序；我們提出的口号是：給劳动者以和平，給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剝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們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們的全部机构和法規（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財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經濟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騙的、受奴役的、受摧殘的、受剝削的人，最后摆脱他們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3. 我們确信，个人和社会的禍害的根源与其說在单个的个人之中，不如說在事物組織和社会地位之中，所以不管是从正义感出发，还是出于利害的考虑，我們都将是人道的，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地位和事物本身，以便

能够在对革命没有任何損害的情况下寬恕人們，我們否認社會有意志自由和進行懲罰的虛構的權利。正義本身，按照這個詞的最合乎人性、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无非是所謂否定的和過渡性的思想；它提出各種社會問題，但是並不去周密地考慮它們，而只是指出一條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通過自由和平等使社會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會組織中才可能提供積極的解決辦法。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決辦法，是我們的共同理想……這是通過普遍團結所達到的每一個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類的博愛。

每一個單個的人都是他在其中誕生、發展並繼續受其影響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以意志為轉移的產物。人的全部不道德行為的三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平等，作為不平等的自然結果的愚昧無知，以及這兩者的必然後果——奴役。

由於社會組織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們所犯的罪行的唯一原因，所以懲罰罪犯是社會方面的偽善行為或者顯然的荒謬論調，因為任何懲罰都是以罪行為前提的，而罪犯們永遠都是無罪的。犯罪和懲罰的理論是神學的產物，即荒謬論調和宗教偽善行為相結合的產物。

可以承認社會在其目前過渡狀態中所具有的唯一權利，就是為了自衛而殺死它自己製造出來的罪犯的自然權利，而不是審判和懲治這些罪犯的權利。這種權利甚至也不是按這個詞的確切含義來說的；不如說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事實，是現社會的無力和愚鈍的標志和結果；社會愈少地使用這種權利，它就愈接近於它本身的真正解放。一切革命者，一切被壓迫者，一切受苦受難者，都是現代社會組織的自然滿懷憎恨和復仇情緒的犧牲品。他們應當記住，各種各樣的國王、壓迫者和剝削者同人民群眾中出現的罪犯一樣，也是有罪的。他們都是惡棍，但不是罪人，因為他們和普通的罪犯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組織的不以意志為轉移的產物。起義的人民在初期要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殺死是毫不足怪的；這將是一種不幸，也許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也像暴風雨所造成的破壞一樣，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個自然事實將既不是道德的，甚至也不是有益的。在這方面，歷史上充滿了富有教益的例證。例如 1793 年可怕的斷頭台，雖然不能指責它毫無作為和拖延誤事，但是它並沒有把法國的貴族階級消滅。使貴族即使沒有被徹底消滅，無論如何也是受到了深深的震驚的，並不是斷頭台，而是沒收和拍賣貴族的土地。而且一般地可以說，政治屠殺從來沒有使一個黨派遭到

过致命的打击，政治屠杀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尤其显得无力，因为力量的根源与其說是在人們之中，不如說是在事物的秩序即**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使特权者所处的那种地位之中。

所以，要实现激进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地位和事物，摧毁财产和国家；这样并不需要消灭人們，使自己注定走向真正的和必不可免的反动，而反动在每一个社会中过去和将来永远都只会导致屠杀人們。

但是，要想有权以人道对人而又不損害革命，就必须对地位和事物毫不留情；就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成为社会主义者与其說出于信念，不如說出于必要性，对于他們說来，社会主义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因为他們想实行专政，就是說想实行国家中央集权，而国家由于必不可免的和邏輯的必要性，必定会使他們走向恢复财产，因此，我們說，他們不希望实行反对事物的激进革命，而策划反对人們的流血革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以建立高度集中的革命国家为基础的流血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軍事专政的出現，导致新統治者的出現，这一点我們在下面将更加詳尽地論证。所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4. 我們是那些作为未来的专制者、立法者和革命保护者的革命者的天然敌人，他們在現代的君主国家、貴族国家和資產阶级国家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就已經幻想要建立同現存国家一样集中并且比現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的新的革命国家，他們是如此习惯于由某种权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秩序，并且如此害怕在他們看来是无秩序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表現的东西，以致在革命还没有制造出这种光荣的和能拯救一切的无秩序以前，他們就已經幻想要結束革命并且用行动来控制某种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革命只有名存实亡，而这种权力事实上只能是新的反动，因为它将注定使受法令支配的人民群众重新遭受服从、停滞和死亡的厄运，即遭受新的、假革命的貴族的奴役和剝削。

5. 我們心目中的革命，其意思就是放纵現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并且破坏在同一种語言中称为“社会秩序”的那种东西。

我們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我們坚信，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即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充分表現中，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反动

勢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誕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則为根据，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地以任何权威为榜样，——因为对我们來說，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資产階級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們把它們一律看做是剝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視和反对。

6. 我們心目中的革命从第一天起就应当根本、彻底地破坏国家和一切国家机构。这种破坏的自然和必然的后果是：(a) 国家的破产；(b) 授权每一个債務人自行償付(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話)債務，以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債務的干預；(c) 停止征繳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捐稅；(d) 解散軍隊、司法部門、官吏、警察和僧侶；(e) 廢除官方司法制度，廢除一切法律上称为权利的东西，并停止实现这些权利。这样，也就廢除和燒毀一切規定了所有权和依法继承权的文书契約(买得的和贈予的)、一切訴訟案件，总而言之，廢除和燒毀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廢物。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所創立并加以保障的权利；(f) 沒收一切生产資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由它們集体使用；(g) 沒收一切教会和国家的财产以及屬于个人的貴重金屬，归組成公社的一切工人协作社的联合同盟所有。公社將給这样被剝夺了财产的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以补偿被沒收的财产，往后只要他們願意和有本領，他們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劳动掙得更多的东西。(h) 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負責任并随时可以撤換——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这样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內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門所特設的执行委员会。(i) 发表組成了公社的起义首都的宣言，声明首都在消灭了权威主义的和执行监护任务的国家(它有权这样做，因为它像其他地方一样被国家所奴役)以后放棄自己的权利，确切地說，放棄管理和强制各个省份的任何野心，(k) 号召一切省份、公社和协作社拋棄一切，效法首都的榜样，首先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組，然后再派自己的代表(同样地一律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是負責任的和可以撤換的)到規定的集合地点去，以便成立为了同样的原則而举行起义的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組織起来。派遣不是肩披某种綬帶的

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傳員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別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則，也不是某种专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廢除民族国家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为了同样的原則而举行起义的任何別的国家、省份、公社、协作社，或者甚至个人，不問各国的現存国界及其屬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系統或民族系統，都将被吸收到革命联邦中来；而站在反动派方面的本国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則将不准加入这个联邦。因此，由于为了使起义的各国能够互相卫护而扩展革命和組織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廢除国家和破坏国家为基础的革命的普遍性就将获得胜利。

7. 如果政治革命不变成社会革命，如果民族革命正是由于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国家的破坏不变成普遍的革命，那現在要进行胜利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8. 因为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由人民来进行，并且革命的最高領導权应当經常归于組成了各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的自由联邦的人民，所以，通过革命代表团自下而上地組織起来的、不分旧的国界和民族差異而包括为了同样的原則而举行起义的一切国家的、新的、革命的国家的任务，将是管理各个社会机关，而不是管理各国人民。它将建立一个**新的祖国**——反对一切反动势力同盟的**普遍革命同盟**。

9. 这个組織排除任何专制和执行监护任务的統治权力的思想。但是，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同盟，为了革命战胜反动，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統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10. 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識的深处經過長時間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表面上常常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原因所引起。組織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傳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誕生，并且組織——不是組織革命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始終应当是人民——革命的总參謀部，由忠誠的、堅毅的、聰明的，主要是真誠的，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組成。

11. 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組織有一百名紧密无間地团結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組織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2. 公开同盟的綱領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結果便脱离了同盟，从而也就贊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魯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議我們組織一个加入偉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偉大原则研究政治問題和哲学問題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們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議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給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現在必須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們认为和这些朋友們共同倡議建立这个新組織是自己的責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們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現在把中央支部的綱領和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綱領

(1) 同盟奉行无神論；致力于廢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2) 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廢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決議，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資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3) 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得到撫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阶段上学习的同等条件，

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經濟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偉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組織的历史产物。

(4)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結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資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同盟认为，現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縮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簡單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6)鉴于社会問題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謂的爱國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7)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 程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創建同盟的盟員临时在日内瓦組成中央局。

(3)属于一个国家的創建同盟的盟員成立本国的民族局。

(4)民族局負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組織的任务，各地方組織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提出請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5)一切地方組織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6)凡是同盟的盟員都有义务每月繳納 10 生丁的会費，其中一半留給各民族組織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會計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額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7)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內举行自己的公开會議。

3. 巴枯宁給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

(原信为法文)

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諾

亲爱的同盟盟員和同志：我們巴塞羅納的朋友們建議我把情况写信告訴您，而我也非常高兴做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們，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們，無論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倫敦的总委员会誹謗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組成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統一战綫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現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謠撒謊、制造分裂，我說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为了使您能正确地理解我們的意願，我只向您說一点就够了。我們的綱領就是你們的綱領，就是您在你們去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个綱領，如果您仍然忠实于这个綱領，那就是說您是我們的同道者，原因很简单，因為我們是您的同道者。我們仇視專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則，正如您仇視这个原則一样；我們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轄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轄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統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統治都表現为剝削。我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現，因此我們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們认为倫敦代表會議和它所通过的各项決議是一个沽名釣譽的陰謀，是一場政变，因此我們表示抗議，并且抗議到底。我不涉及私人問題，唉，如果最近这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开成了的話，他們在会上占据的位置是太大了，我很怀疑这次代表大会是否能开成，因为如果事情像現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話，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沒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們集会进行自由討論的地方了。此刻一切視綫都縈注于西班牙，关注着你們的代表大会的結局。大会的結果将怎样呢？如果您能收到这封信的話，那也在代表大会以后。信寄到您手里的时候是逢上革命的最高潮呢还是逢上反动的最高潮？我們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所有朋友們都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来自你們国家的信息。

您一定知道，最近在意大利，国际和我們亲爱的同盟都获得了广泛的傳

播。無論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于完全革命的即經濟上絕望的境况中，群众开始最认真地組織起来，他們的利益开始变成思想。在此以前，意大利所不足的，不是本能，而是組織和思想。現在这两者都在形成，这样一来，意大利在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一起，也許是現在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蓬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們完全脫离了常軌，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資產階級，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資產階級青年那样的程度。現在他們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們的全部綱領，即同盟的綱領。我們的天才而强大的敌手馬志尼死去了，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則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說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我給巴塞羅納的朋友們寄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地址。不久将把其他地址給他們寄去。同盟的西班牙盟員同意大利盟員正在建立直接的接触，很好，这是必要的。您能收到意大利的各家社会主义报纸嗎？我特別向您推荐：西西里島吉尔真提的“平等”周报（《Eguaglianza》）；那不勒斯的“钟声报”（《Campana》）；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报”（《Fascio Operaio》）；米兰的“玫瑰小报”，特别是“铁錘报”（《Martello》）。不幸的是“铁錘报”被封閉了，該报的編輯全被監禁起来。

在瑞士我向您推荐两名同盟盟員：詹姆士·吉約姆（瑞士紐沙特尔校場街5号）和阿德馬尔·施維茨格貝耳，雕刻匠（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和通訊書記），瑞士伯尔尼汝拉山脉桑維耳耶，雕刻匠阿德馬尔·施維茨格貝耳先生收。（接着写的是巴枯宁的地址。）

同盟和兄弟情誼

米·巴枯宁

請代我向莫拉哥兄弟轉致敬意，并請他把自己的报纸寄給我。

你們能收到汝拉联合会的簡报嗎？

此信讀后請燒毀，因为其中提到一些人的姓名。

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不仅因为他是同盟的創建者，而且也由于他品行不良³⁷⁷。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还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我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暫不公布。

完

弗·恩格斯 在国际中

除了紐約总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以外，“人民国家报”早就不刊载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情况的任何消息了。它在这方面的行动同国际的所有其他报纸和国际的大多数会员是一样的。海牙少数派的机关刊物则在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指挥下，拚命地把自己描绘成国际真正多数派的代表，对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前总委员会，特别是对马克思极尽诽谤和诬蔑之能事，并且竭力把各民族的那些以天才人物自命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受这种攻击的人认为只要彻底弄清楚涉及海牙代表大会的所有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而只是对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最卑鄙的诽谤加以回击，而且仍然是用摆事实的方法。总之，他们相信工人的健全思想和总委员会的行动，总委员会表明自己是完全能担负起自己的任务的。

下面所列举的资料表明，各地没有经过事先协商而自行采取的这种行动方式已经产生了效果。

在英国，前总委员会的一些英国委员——马克思在海牙根据确凿的证据和他们自己的供认谴责了他们的叛卖行为^①，对这种

^① 見本卷第 724 頁。——編者注

譴責他們一点也不敢反駁——在去年 12 月挑起了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分裂^①。他們退出了这个委員會，单独召开了整整 11 个人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些人，甚至誰都不敢說他們是不是支部的代表，究竟是哪些支部的代表。这 11 个人憤慨地表示反对海牙的決議并站到了分裂分子的旗帜下；他們的首領是两个外国人——埃卡留斯和荣克。从这时起，就存在着两个聯合會委員會，但是有以下的区别：一个屬於国际，得到几乎所有支部的拥护，第二个是分裂分子的，它除了自己的成員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第二个委員會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演这出滑稽剧，最后終於寿終正寢了。同經過了五十年运动鍛煉的英国工人开这种玩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与此相反，6 月 1 日和 2 日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国际不列顛組織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无疑将为英国工人运动开辟一个时代。出席會議的有 26 位代表，他們代表英国主要工业中心以及一些不大的城市。聯合會委員會的报告和以前所有这种类文件的区别就在于，它——在这个有守法傳統的国家內——承认工人階級有用暴力捍卫自己要求的权利。

代表大会贊同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紅旗是国际不列顛組織的旗帜；工人階級不仅要求把全部地产归还給劳动人民，而且也要求把一切劳动資料归还給劳动人民；提出实行法律所規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制要求作为一項初步措施；代表大会向西班牙工人祝賀共和国的建立和十个工人被选进国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釋放至今被关在監獄中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員。——任何一个了解英国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承认，从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工人代表大会提

^① 見本卷第 220—231 頁。——編者注

出过这样深远的要求。无论如何，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分裂分子的冒充的联合会委员会的可悲结局，国际在英国的障地确定了。

在瑞士，分裂分子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知道，汝拉联合会早就是国际中各种各样的分裂活动的主脑机关。它的代表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称，他们代表国际中的真正多数，在不久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证明这一点。智与时增，这对于最爱吹牛的人来说也是适用的。4月27日和28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从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联合会共轄有11个瑞士支部，其中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有9个支部，这11个支部的情况如何，他们的人数有多少等等，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可是，你们瞧，报告却声称，整个国际都归附于他们的分立的联合会了。既然如此，那末这个巨大的多数不是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推翻海牙大会的决议吗？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正是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当然立即就被这些“自治的”代表们接受了，这项建议就是：为了使新的代表大会不再踏上海牙代表大会的有害而错误的道路，分裂分子的联合会应该在瑞士的某个城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而不承认纽约总委员会可能召开的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地委托总委员会指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瑞士城市^①。因此，汝拉联合会的决议意味着响亮词句掩盖下的一种新的退却。

实在说，该是这些先生们考虑掩护自己后方的时候了。6月1

^① 見本卷第177頁。——編者注

日和2日——对分裂分子說来是些不祥的日子——在俄尔頓召开了瑞士工人代表大会。80个代表中有整整五个汝拉人。会上曾提出了建立集中制的瑞士工人联合会的建議。

为了与此相对抗，这五个汝拉人提出了一种用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巧妙裝飾起来的，会使整个組織丧失活动能力的联邦制度。他們看到自己处于无望的少数地位；便像在海牙一样，玩弄浪費別人时间的把戏。代表大会把整个星期日都花在討論这个所謂的“原則問題”上。最后，像在海牙一模一样，多数派不得不迫使这些饒舌者沉默，以便終于能轉过来研究工作。星期一断然决定建立集中制的联合会，五个說教者对这点的答复就是在宣讀了空洞无物的声明以后，便离开會議厅各自回家去了。而这些在本国内本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人，多年来曾一直发誓說，他們的使命就是要改組国际！

可是从来禍不单行。在意大利，分裂分子陣营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現在声嘶力竭地在叫囂，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即皮阿琴察的克雷希奥，把自己的新报纸“社会未来报”寄給了加里波第，这些先生一直指望把加里波第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报纸中充滿了憤怒的叫喊，反对他們所謂的“权威主义原則”，在他們看来，这个原則是一切禍害的根源。加里波第回答說：

“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謝您……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謊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計劃。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則作斗争是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錯誤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那里根本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这位爭取自由的老战士在1860年这一年中所做的工作比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在一起在自己一生中曾經想要做的工作还要

多；他知道紀律的价值，何况，他总是不得不亲自来加强自己战斗部队的紀律，而且不是像官方軍閥那样，采用机械訓練的办法，經常用枪决来威胁，而是直接以敌为鵠来进行教育。

可惜的是，我們还不能一一列举分裂分子所遭到的一切厄运。他們过去只有一点还感不足，这点他們現在也有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家报纸的警察嗅觉早已从这些历来破坏国际的人那里聞到了熟悉的气味）現在完全站到这些破坏分子方面去了。該报的第68号发现比利时人——他們实际上已脱离国际，——拟定的章程草案完全符合該报的观点，而且答应参加分裂分子一伙，这再好不过了。当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維尔在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上出現时，分裂分子的組織就会获得自己的真正性质。右面是巴枯宁，左面是哈森克莱維尔，而中間則是让別人用他們自己的蒲魯东主义詞句来愚弄的不幸的比利时人！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6月19—20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73年7月2日“人民国家报”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第53号

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員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們走。当1873年2月間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談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經過各种預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許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內走过这些預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預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們到处力求参預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場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議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場呢？巴枯宁派的首領們完全張皇失措了。繼續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經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們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傳，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該判死刑的罪过。他們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們从上面提到的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棄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踐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內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顏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們描繪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統治之名而行自己爭夺权力之实的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論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們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們厌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勁帮助一个由冒險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組成的并自称

为不妥协派(unversöhn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 bene [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而出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旦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³⁸⁰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³⁸¹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而不愿参加竞选³⁸²。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

例放棄參加選舉；參加選舉的只有分裂為兩派的聯邦共和主義者和工人羣眾。由於國際的名稱當時在西班牙工人中間還有巨大的吸引力，由於當時在西班牙至少在實際上還存在着國際支部的良好組織，因此毫無疑問，在卡塔盧尼亞工廠區，在瓦倫西亞，在安達魯西亞各個城市等地，由國際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選人都會取得光輝的勝利，並且必定能夠在議會中組成一個強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決時左右兩派共和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結局的少數派。工人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感覺到，發揮他們的當時還有雄厚力量的組織的作用的時候已經到了。但是，巴枯寧學派的首領先生們長期以來一直宣傳無條件放棄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變方針；於是他們就想出了一條可憐的出路：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不參加選舉，但是國際會員每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投票。這個政治破產的聲明的後果是：工人像在這種情形下所常見的那樣，投票選舉了偽裝為最激進的人——不妥協派，從而對自己選出來的人以後所採取的步驟擔負了一定的責任，并被卷入他們的行動。

二

同盟分子無論如何不能在他們的狡黠的選舉政策使他們所處的可笑地位上堅持下去，否則他們至今所保持的對西班牙國際的統治就會完結。他們必須有所行動，即使僅僅為了裝裝樣子。總罷工便是他們的出路。

在巴枯寧主義的綱領中，總罷工是實現社會革命的杠桿。有朝一日，某個國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業部門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這樣最多經過一個月，就可以迫使有產階級或者低頭認罪，或者向工人進攻，那時工人就獲得自衛的權利，乘機推翻整

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 1848 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闖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 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 1839 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279 页³⁸³），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 1842 年 7 月竟试图实现它。在 1873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³⁸⁴，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基金。这就是癥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基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領們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們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們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闊論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們想像的运动所吓倒；他們不得不把政权让給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協議的皮-伊-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馬上付诸实行

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綱領，这些措施不仅会給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結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給社会革命以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絕，他們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間最狂妄的騙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談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漸漸表現不耐煩，他們中間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魯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領們如果不願做不妥协派資產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納張貼了这样一張布告：

“工人們！政府利用軍隊来鎮压我們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視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們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們的无比憤怒，”云云。

巴塞罗納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記載比世界上任何別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領們却号召巴塞罗納的工人們不要用他們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資產者，但不触及他們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納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維尼亚斯这类馴順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經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維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們的著名的选举綱領，继而竭力宣傳保持安靜，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們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視他們。最軟弱的不妥协派終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現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們宣布实行总罢工，說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們干

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斯（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①）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³⁸⁵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像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

7月7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宣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24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

^① 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

要求交給他們。市長阿耳博爾斯是個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他扣留工人，從阿利康特調來軍隊，並建議工廠主不要讓步，叫他們深居簡出。他本人將忠於職守。在同工廠主商談之後，——這裡我們根據同盟分子聯合會委員會 1873 年 7 月 14 日的正式報告³⁸⁶，——這位最初向工人答應保持中立的人，這時發表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他“侮辱和誣蔑工人，站到工廠主方面，從而取消了罷工者的權利和自由，激起他們進行鬥爭”。一個市長的虔誠祝願怎麼能夠取消罷工者的權利和自由，這點無論如何是沒有交代清楚的。不管怎麼樣，受同盟領導的工人當時通過一個委員會向市政當局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罷工期間保持中立的諾言，那末為了避免衝突起見，它最好卸職。委員會的代表們未被接見，而當他們離開市政廳時，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廣場上的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如同盟的報告所說，鬥爭就此開始了。民眾武裝起來，進行了據說是長達“20 小時”的戰鬥。一邊是工人，據“革命團結報”說有 5 000 人，另一邊是市政廳里的 32 個憲兵和市場上四五幢房屋中的幾個武裝人員；這幾幢房屋——按照普魯士的先例——被人民燒毀了。最後，憲兵彈盡，被迫投降。

同盟分子委員會的報告上說：“市長阿耳博爾斯偽裝投降，然後又胆怯地命令殺死那些輕信他的諾言而進入市政廳的人們，如果他不是這樣欺騙人民，我們也不會為這樣多的死難者而哀悼；如果這位市長自己不用手槍抵近射擊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叉憤的居民打死的。”

這次鬥爭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

“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切計算出傷亡的人數（人民方面），但我們可以說，傷亡不下 10 人。攻擊者的傷亡則不下 15 人。”

這是同盟經受的第一次巷戰。5 000 人對 32 名憲兵和幾個武

装的资产者进行了 20 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们，自己总共损失了 10 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斯泰夫的箴言：“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标地烧毁工厂、关于大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

总之，取得了胜利。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 5 000 人成了局势的支配者。”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 1872 年 9 月 15 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和革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7月12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迪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所”。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

浪費在空洞辯論和紙面決議上；而帕維亞將軍在攻下了塞維爾和加迪斯之后，于8月5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連队前往桑卢卡尔，遇到的是——毫无抵抗。

这就是同盟在沒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績。

三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魯西亚实行起义。皮-伊-馬尔加耳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領們进行談判，期望由他們来組閣；既然談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妥协派先生們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設立的許多政府职位。馬德里議會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須自己动手，到处宣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枯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妥协派厮混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剛剛用暴力占領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嗎？况且，巴枯宁主义者許多年来一直宣傳說，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組織和进行。而現在有了一个机会，至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則了！其結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妥协派去火中取栗，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賞照例是脚踢和枪彈。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會員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場呢？他們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們尽可能地实现

了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瓦还宣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騙，現在他們却参加了安达魯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軍事领导，而用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和毫无意义的所謂社会改革的紙上空洞計劃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領們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遭到輕蔑的拒絕。領導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報紙記者的問題时首先声明，他們同这些所謂的“国际會員”毫无共同之点，他們对这些人不負任何責任，并且声称他們把国际會員的首領們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監視之下。最后，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在塞維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軍隊作战时，还向他們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①

結果，几天之內整个安达魯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中。塞維尔、馬拉加、格拉納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們占領。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員會（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納、瓦倫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薩拉芒卡也做了类似的嘗試，但性质比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羅納是例外。如果巴塞羅納行动起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給运动中的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羅納力量很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會員却以总

^① “人民国家报”（1873年11月2日第106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誤排在第三节末尾。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时，将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編者注

罢工为借口来迴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guardias 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作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沒有的。

但是沒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僕从们的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宣布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³⁸⁷，——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1870年9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³⁸⁸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每一个

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塔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像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干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3000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的全部兵力。

帕维亚将军在7月20日前后进军。24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29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30日或31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在8月4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

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纳达。马拉加在8月3日，格拉纳达在8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8月10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

7月26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勃起时，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府军。瓦伦西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师的进攻从7月26日一直抵抗到8月8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

圍牆和突出的堡壘做壁障。3 000 政府軍沒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己的輕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壘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包圍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納人利用从港內夺得的海軍舰队控制海面时，这种包圍是意义不大的。当瓦倫西亚与安达魯西亚在进行斗争时，卡塔黑納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在他們自己的金錢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們才开始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們才做了一次向馬德里推进的尝试，而馬德里距他們至少有 60 德里，比瓦倫西亚和格拉納达离他們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納不远的地方就遭到悲慘的結局。包圍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他們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納的軍艦在剛剛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談不到的。所以，卡塔黑納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恫吓从瓦倫西亚到馬拉加一帶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納人的理論來說也是独立的）沿海城市，揚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幣軍款送上船，就对它們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納所持的原則是：“人各为己”。当它們失敗以后，則宣布了另一个原則：“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納！”卡塔黑納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謀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自治州的联邦主义的。

为了加强爭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納政府釋放了 1 800 名被囚在該城監獄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盜和杀人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給卡塔黑納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說明，巴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盜奉为一切真正革

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黑納政府放纵了1800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納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策。

四

现在我們来看一看，新馬德里联合会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是怎样說的。

“預定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倫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討論其他問題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2月1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場。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descabel-lada 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仇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糟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組成时，那些曾經激烈反对政治权力，指責我們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爭先恐后地参加这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維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納达及瓦倫西亚等大城市，許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的洪达，他們除了主張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沒有任何别的綱領。这一点已經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署有这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

理論与实践之間、宣傳与行动之間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如果能对我們的协会稍有裨益，能使我們在組織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們向主要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沒有多大关系。可是結果情

况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接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这个同盟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天然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几乎毫无抵抗就被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复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维尔，当战斗进行的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枯宁派的〉会员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猾地利用了我们的愚蠢，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诬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

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报〈巴枯宁派的主要机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丽亚港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哈（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一些住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巴枯宁派的〉联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来不及逃走国际会员被迫隐藏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历史概述毫无出入。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

立許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們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則拋棄了，他們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純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們踐踏了他們自己剛剛宣布的原則：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騙和新的背叛，——他們破坏了这个原則，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會議，同时他們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們駕馭、在政治上被他們利用的軟弱无力的少数派。

2. 但是，这种背棄以前宣傳的原則的行为，是最怯懦、最虛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無論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們領導的群众，都是在沒有任何綱領或者根本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結果是什么呢？結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沒有計劃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領導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見，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撫，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沒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3. 所謂的^①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組的自由联合等原則的唯一結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沒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4. 这一切不仅使組織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現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謂的”，而是“大吹大擂的”。——編者注

人們把許多虛構的暴行归咎于它，沒有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簡直是無法想像工人起義的。因此，要在西班牙無產階級中間建立起新的國際組織，在若干年內也許是不可能的。

5. 總而言之，巴枯寧主義者在西班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應當如何進行革命的絕好的例子。

弗·恩格斯寫于 1873 年 9—10 月

載于 1873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和 5 日“人民國家報”第 105、106 和 107 號。1874 年以單行本在萊比錫出版。轉載于弗·恩格斯“‘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
1894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 1894 年版本譯的，
并根據“人民國家報”校對過

弗·恩格斯 英国的选举

1874年2月22日于倫敦

英国議会的选举已經結束。才能出众的格萊斯頓不能再靠 66 票的多数統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議會，在 8—14 天之內进行了一次选举，而結果……反对他的却多了五十多票。这个 1867 年选举改革后的第二屆議會，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第一屆議會，使保守派获得了穩固的多数。³⁸⁹ 可是，把保守党分子派到議會中去的，正是那些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区，而那里占居民多数的无疑是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格萊斯頓企图通过选举来实行政变的結果。选举是在議會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內进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来考虑的时间只不过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爱尔兰、苏格兰和农村选区最多也不过十四天。格萊斯頓企图愚弄选民，但是英国的政变并没有成功，而企图愚弄別人的人却反而害了自己。結果，大批原来是袖手旁观和动摇不定的群众也都投票反对格萊斯頓了。

其次，格萊斯頓的統治方法粗暴地破坏了約翰牛的固有习惯。約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淺，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統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僕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預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解雇的唯一的僕人。某一个执政的政党，有时可以由于純粹

实际的原因允许它的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现出一些突然的温和姿态，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类似的许可却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莱斯頓却把玩弄这些立法把戏当做家常便饭。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党像他的政敌一样感到突然；这些措施对于自由党是一种正式的从上面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党如果不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他们马上就会使敌对政党掌握政权。这些措施中有许多（例如爱尔兰教会法案和爱尔兰土地法案³⁹⁰）虽然内容贫乏，但曾使得许多稳健保守的老辉格党人感到惊恐，而迫使自由党接受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却引起了整个党的反感。但是，格莱斯頓并不因此罢休。他还廢除了出售軍职的制度，这件事他毫无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議會求救³⁹¹，这也使他自己的党丢了臉。此外他还和一帮令人厌恶的庸人混在一起，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內政大臣普魯斯和倫敦市政府实际上的头子艾尔頓。普魯斯以对待工人議員粗暴和态度傲慢出名；而艾尔頓完全是按普魯士的方式管理倫敦，——例如他企图禁止人民在公园集会——，然而，因为这套方式在这里行不通（爱尔兰人确实不顾禁令，当着艾尔頓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①），所以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败，并且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许多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人能够无顾虑地投票反对他们的剝削者，反对他们正当地认为是代表工业巨头的政党——自由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大工业巨头为了赶时

① 見本卷第 210—212 頁。——編者注

鬚而轉到保守党营壘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党不是代表大工业的利益来与大地产和上层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国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届議會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員一方面是乡紳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銀行家、铁路公司經理、啤酒商人、工厂主和其他暴发戶；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教授。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因而这一届議會与上一届議會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专门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錢人的議會。然而它比上一届議會多了两个新的因素：即議會里有了两个工人^①和将近五十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

至于說到工人，首先必須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潰以来，英国再也沒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漲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場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統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項滿足宪章派綱領（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人民宪章六点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議員候选人的財產資格限制两点已經成为法律；第三点即普选权也差不多实现了；完全沒有实现的是后面三点：每年改选一次，发給議員薪金和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居民人数相等的选区。

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組織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的，所以近来他們几乎是专门作为“偉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

^① 亞·麦克唐納和托·伯特。——編者注

在活动，既然他們扮演的是这种角色，偉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选举中愚弄他們。但是选举改革法案³⁹²一通过，工人的政治地位就馬上改变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們現在都成了选民的多数，而在英国，無論是政府或議員候选人都喜欢向选民討好。从此，工联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書記們，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响的著名工人演說家們，轉瞬之間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議會議員、貴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訪他們，对工人階級的願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并同“工人領袖們”討論他們过去曾高傲地嘲笑过，认为提法本身就是可耻的那些問題；这些人甚至还出錢和組織募捐来救济工人。因此，“工人領袖們”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自己應該进入議會；他們的貴族朋友对这一点一般表示同情，但是自然，这只是为了在每一个別場合下尽可能地阻碍工人的选举。这样，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当然，誰也不会因为“工人領袖們”想进入議會而責备他們。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簡捷的途徑，就是馬上着手組織一个具有明确綱領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對他們來說，人民宪章就是他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綱領。但是，“宪章派”——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产階級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資产階級厌恶，于是“工人領袖們”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傳統，而宁願和他們的貴族朋友們进行談判，并且显出一副“紳士气派”，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資产階級方式行事。旧的选举法曾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随激进的資产階級，如果当改革法案已經使工人至少可以选出 60 个議會議員候选人时，再强迫他們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不可饒恕的了。

这是一个轉折点。“工人領袖們”为了进入議會，首先要求助于資产階級的选票和金錢，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

一来，他們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們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偉大的自由党”。他們組織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人代表同盟³⁹³，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經費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但是还不限于此。激进资产者十分机灵，他們了解到工人被选入議會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們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推迟他們真正当选的时刻。他們让倫敦的一位百万富翁賽米尔·摩里先生来办这件事，他不惜花費几千英鎊，以便一方面在这个伪工人总參謀部中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友的名声，使別人因为他欺騙了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約一年以前，当解散議會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时候，摩里曾在倫敦的一家小酒店里召集他的忠实奴僕們开会。他的忠实奴僕如波特尔之流、豪威耳之流、奥哲尔之流、黑尔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这帮人中没有一个不在上一次議會选举中拿资产阶级的薪俸，替“偉大的自由党”宣傳，或者至少为此出力效劳。在摩里的主持下，这一帮人拟訂了一个連任何资产者都会在下面签名的“工人綱領”，这个綱領被当做了强大运动的基础，它应该使工人更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像这些先生們所梦想的那样，应该把这个綱領的“締造者們”选进議會。在这些締造者們貪婪的幻想中，还閃現着摩里的許多五英鎊的鈔票，这些鈔票在宣傳过程中必定会落到他們的口袋里去。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惨遭失敗。摩里鎖上了他的保險柜，締造者們也就重新退出了舞台。

四个星期以前，格萊斯頓突然解散了議會。常任的“工人領袖

們”松了一口气；或者他們当选，或者他們又将成为报酬优厚的“偉大的自由党”的巡迴宣傳員了。但是，事与願違：选举的日期是如此之近，以致他們在这两方面都受了欺騙。不錯，他們当中有些人是以候选人的身分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得被选举权就得繳納200英鎊（合1240塔勒）的选举費，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經为这个目的組織起来，因而他們之中只有那些从資產階級那里拿到这笔錢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也就是說，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資產階級上級的同意的。而資產階級使所有的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慘敗，就算尽了他們的責任。

只有两个工人被选入議會，两个都是煤矿工人。这个工业部門被很好地組織在三个工联之中，它們拥有相当多的經費，在某些选区里可以希望得到选民中的絕对的多数，而且自选举改革以来，它們就有計劃地爭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議會。这三个工联的書記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提为候选人；一个是哈利戴，他在威尔士沒有得到什么成功；另外两个是斯泰福的麦克唐納和莫尔珀思的伯特，他們当选为議員。伯特在他那个选区以外名声不大；麦克唐納在上次討論矿业法³⁹⁴时是煤矿工人的代表，他出卖了他的委托者，贊同在这个法案上再加上一节，这一节是如此明显地有利于資本家，以致連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辯論俱乐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紳士的人們当中，出現了两个工人。

和他們坐在一起的至少还有50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1867年芬尼亚起义失敗，芬尼亚社（爱尔兰共和派）的軍事领导人一个个地不是被捕入獄，就是逃往美洲，从那时起，剩下的芬尼亚

社密謀参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义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当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倫敦英国議会把一切純粹有关爱尔兰問題的立法权轉交給都柏林的專門的爱尔兰議会；至于純粹爱尔兰問題应该如何理解，則始終狡黠地不加說明。这个起初为英国报刊所嘲笑的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爱尔兰各个不同色彩的党派的議員：保守党和自由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运动領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徒）都被迫参加了这个运动，甚至一个代表高尔威的道地英国人也参加了。在1848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奥康奈尔所領導的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³⁹⁵差不多是和宪章运动同时停止的（奥康奈尔本人死于1847年）；自奥康奈尔开始活动以来，議会中又一次重新出現了一个团結的爱尔兰政党，这个政党出現时的环境使它难以再像奥康奈尔那样不断地和自由党妥协，也使它难以恢复奥康奈尔死后个别成員把自己零售給自由党政府的那种时髦風气。

可見，現在有两种推动英国政治发展的力量加入了議会：一种是工人，另一种是以一个团結的民族政党出現的爱尔兰人。虽然这两种力量不一定会在这个議会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会的），但1874年的选举仍然无疑是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22日

載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国家报”
第2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帝国军事法³⁹⁶

看一看帝国国会中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³⁹⁷对待军事法第一条的态度，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军事法第一条规定：

“陆军部队士官和列兵平时实有人数在没有颁布其他法令以前定为401 659人。”

他们叫嚷说，这一条不能接受，因为这就取消了帝国国会的预算法，使批准军事预算成了一出纯粹的闹剧！

先生们，说得对极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一条文不能接受，所以你们一定会基本上接受它。过去你们经常婀娜下跪，现在要求你们再跪一次，又何必那样忸怩呢？

普鲁士军队的改组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次改组引起了一场著名的冲突。³⁹⁸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贯彻了曼托伊费尔的原则：“强者勇于退让”³⁹⁹。丹麦战争以后，退让的勇气愈来愈大了。1866年俾斯麦从萨多瓦凯旋归来，要求奖赏在此以前一直非法支出经费的行为，这时候退让就再没有任何止境了。军事预算立刻获得批准，而任何东西一旦在普鲁士获得批准，那就永远被批准了，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规定，“现行的〈一旦获得批准的〉各种赋税仍将继续征收！”⁴⁰⁰

接着，召开了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討論了联邦宪法。⁴⁰¹ 紛紛議論預算法，宣布政府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缺少財政監督。翻来复去，最后还是吞下了苦药丸，規定普魯士宪法中有关軍事預算的所有重要条款都适用于北德意志联邦。这已經使軍队的平时編制从 20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

现在又来了光荣的 1870 年战争以及靠它帮助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又是一个制宪的（！）帝国国会和新帝国宪法。⁴⁰² 又是些冠冕堂皇的演說，数不清的关于預算法的保留意見。而这些先生們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帝国宪法第六十条規定：

“德国軍隊平时实有人数在 187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定为 1867 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并且在联邦各邦之間 pro [按] 人口 rata [比例] 加以分配。今后軍隊平时实有人数都通过帝国立法程序加以确定。”

1867 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就是 401 000 人。不久，帝国国会又决定把这个決議的有效期限延长到 1874 年 12 月 31 日。

第六十二条：“为了支付德国軍隊全軍及其所屬机构的費用，在 187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應該根据第六十条所規定的平时軍隊人数按一个士兵每年 225 塔勒計算把錢交給皇帝支配。在 1871 年 12 月 31 日以后，联邦各邦應該把这笔款項繳納給帝国国庫。为了計算这笔款項，第六十条关于軍隊平时实有人数的临时規定在未經帝国特別的法律予以变更以前仍然有效。”

这是我們的民族自由党人对不可侵犯的軍事預算的第三次下跪。如果現在俾斯麦出来要求把方便的临时規定变成更方便的經常規定，这些先生們就会叫嚷說，有人一連三次破坏那个已經被他們当做祭品的預算法。

民族自由党的先生們！請你們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吧！“請

你們斟酌当前情况采取行动吧”！拋棄“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在“現有事实的基础上”勇敢地繼續从事你們的工作吧。你們不仅干了第一次，而且已經干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那就不要怕干第四次！暴跳如雷、捶胸跺脚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你們終究是要再作一次臭名远揚的“妥协”的，而政府也一定会实现它所希望的一切，如果不挨揍就了結了事情，那就算你們走运啦。把預算法让給醉心于实利主义的英国人、堕落的法国人、落后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去享受，用不着效法“外国的榜样”，从事“真正德国的事业”吧！如果你們一定希望要有預算法，这就只有一个办法：請你們下一次只选举社会民主党人！

二

民族自由党人是愚蠢的——虽然小拉斯克尔精明能干——这一点我們早就知道，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們还是不认为他們会像毛奇所說的那样愚蠢，这位沉默大师在帝国国会里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他仍然是沉默大师，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几乎隱瞞了他自己所想的一切。只有两点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第一，不幸的第一条是完全必要的；第二，他說了一段出名的話：

“我們花了半年時間用武器夺得的东西，應該手执武器保卫它半个世紀，使別人不能再从我們手里把它夺走。我們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視，但是哪里也沒有受到爱戴。”⁴⁰³

Habemus confitentem reum [在我們面前是一个已經招了供的罪犯]^①。这里我們已經使罪犯认罪了。当普魯士在色当会

^① 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說”。——編者注

战⁴⁰⁴以后提出了割地的要求的时候，有人就說：新的疆界完全是由于战略必要性所决定的；我們所要的只是为我們的防御所絕對必需的东西；在这条新疆界以內，在我們的工事构筑好以后，我們就能够抵抗任何侵犯。如果談的是問題的純粹战略方面，的确是如此。

拥有科倫、科布倫茨和美因茲这三个大型的主要要塞的莱茵河筑垒綫只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可以通过斯特拉斯堡来加以迂迴；第二，它缺少由能够使整个战略基地具有纵深的筑垒据点組成的突出綫，吞并亚尔薩斯—洛林补救了这两个缺点。斯特拉斯堡和麦茨現在构成第一綫，科倫、科布倫茨、美因茲构成了第二綫。这些全都是头等的要塞，它們拥有远远向前突出的堡垒，能够抵抗現代的綫膛炮。此外，这些要塞之間相隔的距离，对現代龐大军队的自由运动都极为有利，而且它們都配置在非常便于防守的地方。只要比利时的中立沒有遭到破坏，法国的进犯就可以輕而易举地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間的狹窄地带上被遏止；只要願意，从一开始就可以退到莱茵河东岸，迫使法国分兵进攻麦茨、斯特拉斯堡、科布倫茨和美因茲，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大会战以前就削弱自己的力量。按威力來說，这是全欧洲的其他任何障地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威尼斯四边形象要塞区⁴⁰⁵同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障地相比簡直就是一件儿童玩具。

恰好是为了保持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障地，德国才被迫——用毛奇的話來說——要手执武器把夺得的东西保卫整整半个世紀！最强大的障地本身并不能保卫自己，它要求有人来保卫它。为了保卫它，就需要兵士；就是說，障地越强大，需要的兵士就越多，这样繼續下去，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要补充一点，重

新回到祖国怀抱的亚尔萨斯—洛林的“被夺去了的同胞們”，却絲毫也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德意志母亲的情况，而法国人則無論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有恰当的机会，就会設法从德国的怀抱中把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解放出来。德国一方面得到了强大的障地，另一方面也迫使法国人支持任何想进攻德国的人，这样一来，两者就相互抵消了。換句話說，强大的障地**本身包含着欧洲結成同盟反对德意志帝国的萌芽**。在出現这个事实的情况下，無論是两三个皇帝举行会見还是举杯祝賀，都絲毫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沒有誰比毛奇和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了。毛奇用下面那句忧郁的話謹慎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們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視，但是哪里也沒有受到爱戴！”

这就是毛奇的**真話**。現在我們再談談他的假話^①。

这位偉大的战略家发出陣陣感伤的叹息，表示自己对于軍隊遺憾地必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耗費这样多的錢感到难过，在这陣陣叹息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装扮成除了热切希望从元帅变为园丁以外別无他求的普魯士的辛辛納图斯，我們不准备去談这些感伤的叹息。还有一种不算新穎的理論，說什么由于中小学教师对民族进行不良的教育，每一个德国人都應該被送进由士官担任教授的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三年，我們更不准备去談这种理論。在这里我們并不是对民族自由党人說話，像可怜的毛奇不得不做的那樣。我們直接就来談談他向自己惊奇的听众編造的駭人听闻的軍事謊言，这些謊言曾引起了总參謀部的普遍活跃。

^① 原文《Dichtung》这个字同时有“詩”和“假話”的意思；这里暗指歌德自傳性作品“我的生平。詩与真”的标题。——編者注

事情又牽涉到借口法国人似乎拥有更大量的軍备来为德国的大量軍备辯护的問題。請听，毛奇通知帝国国会說，法国政府現在已經有权征召 120 万人参加基干部队，征召 100 万以上的人参加地方部队。他說什么法国人为了能够动員这样多的人，“哪怕是一部分”，已經增加了他們的正規軍基干人員的数目。說什么他們現在就有 152 个步兵团（战前是 116 个），9 个新的猎兵营，14 个新的騎兵团，323 个炮兵連（从前是 164 个）。而且，“这种扩軍工作还没有結束”。軍隊实有人員的人数在平时定为 471 170 人，比 1871 年多 48 000 人。将来，法国派来打我們的将不是战争开始时的 8 个軍，而是 18 个軍，还有第十九个軍将用来对付阿尔及利亚。国民議會直接强迫政府接受用于軍备的錢，各市政厅紛紛捐獻演习場和軍官俱乐部，用自己的經費建造兵营，表現了在德国曾經只能是梦想的几乎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精神，簡言之，正在为一次大規模的复仇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即使法国政府做完了毛奇硬說它在做的一切，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經過了像 1870 年的那些失敗后，政府首先有責任大力发展国防力量，以便消除重演这类不幸事件的可能性。1806 年普魯士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們的旧式軍隊全部都被免費送到法国去做俘虏了。战后，普魯士政府竭尽一切努力要把全民武装起来。人們只受了六个月的訓練，虽然毛奇看不起民团，但是有布呂歇爾可以作証，他說，这些“后备軍的营”在经历了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并不亚于基干营。如果法国政府也这么办，如果它也努力在五六年內把全民武装起来，——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情况恰好相反。除了重新編制的那些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現在剛剛达到德国基干軍編制的水平以外，其余一切都

只是一紙空文，在軍事方面，法国現在比任何时候都弱。

毛奇說：“法国完全抄襲了我們的整套軍事制度……首先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时却以 20 年的服役期作为基础，而我們只是 12 年。”

即使情况确实如此，20 年和 12 年又有什么差別？哪里有一个德国人在后备軍⁴⁰⁶里待了 12 年以后就真的不再服兵役了？难道不是有人到处在說：只有当我们人員足够的时候，12 年的兵役期才能生效，而在目前你們應該在后备軍里待 14 年、15 年、16 年。如果不是为了使每一个穿过軍装的德国人都服役到死的話，那我們把早已被人們忘記了的民軍⁴⁰⁷重新搬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在法国实行的情况却是非常特殊的。法国沒有像普魯士半封建的东部各省那样的省份。而普魯士的东部各省是普魯士邦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真正基础，它們提供能够无条件服从的新兵，而且以后当了民兵也不会变得聪明多少。在西部各省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結果在 1849 年就已經证明，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全部适用的。⁴⁰⁸現在在整个德国推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多經過毛奇所看中的 12 年——如果这家小店真能維持这么久的話——就将培育出一批会使用武器的人来，他們将夺去一切毛奇們和俾斯麦們的飯碗。

可見，在法国甚至沒有可以使普遍义务兵役制能够为反动派培育出一批听話的兵士的基础。在法国，普魯士的士官制早在大革命以前就已經过时了。陸軍大臣圣热尔門 1776 年采用了普魯士的杖笞；受过笞刑的兵士紛紛举枪自杀，于是当年就只好廢除杖笞。如果法国真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教会人民群众使用武器，那梯也尔和麦克馬洪的結局会怎样呢？可是，梯也尔和麦克馬洪虽然根本不是天才，但毕竟不是毛奇所描繪的那样的小学生。的

确，他們在紙面上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际上他們却极其固执地坚持五年服役期。⁴⁰⁹ 但是，誰都知道，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同普魯士的三年服役期也是完全不相容的：因为这样一来不是德国平时的军队人数至少将达到 60 万人，就是像现在那样只得让人们有可能免服兵役。如果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五年服役期会使它平时的军队人数达到多少呢？几乎 100 万；但是，甚至毛奇本人也无法把哪怕是这个数字的一半硬加到法国人头上。

就在毛奇使自己的听众感到惊讶的那一天，“科倫日报”⁴¹⁰ 刊登了一则有关法国军队的“軍事消息”。“科倫日报”的这些軍事消息都是来自非常可靠的半官方人士，可想而知，这个軍界的“倒霉鬼”由于犯了这个非常不合时宜的錯誤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問題在于这个人确实說了真話。据他說，法国官方的最新数字表明，

“法国即使做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完成它在新的兵役法中提出的軍事任务”。

他认为，“今年军队的人员定为 442 014 人”。这里首先应该减去計有 27 500 人的共和国宪兵自卫軍；“根据預算中各兵种的数字来看，军队的实有人数实际上只有 389 965 人”。这里須要减去

“招募来的部队（外籍軍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后勤部队、士官和超期服役的人员，根据法国以前的可靠資料，他們的总数定为 12 万人。即使假定这些現役人员的真正实有人数总共只有 8 万人，那末剩下还要征集的军队实有人員也只有 309 000 人，这些人員由第一类的五种役齡的适龄人員和第二类（預备部队）的一种役齡的适龄人員組成。第二类的一种役齡的适龄人員共有 3 万人，根据这一点第一类的一种役齡的适龄人員和每年为它征召的人数共計为 55 800 人。这里要加上第二类的 3 万人，因此法国军队每年征召的最高数字共計只有 99 714 人”。

可見，法国每年大約征集 6 万人，服役 5 年。20 年共計 120 万人，而如果我們按照普魯士后备軍里实际出現的比例来計算法軍減員的数量，那末充其量也不过 80 万人。其次，应征服役一年的 3 万人——在毛奇看来，这是不合格的民团——20 年将是 60 万人，除去減員数量最多不过 40 万人。因此，如果法国人在 20 年中将毫无阻碍地表现出被毛奇大加称頌的爱国主义，那末，到那时他們能够用来同德国人对抗的，归根到底最多不过是 80 万受过训练的兵士和 40 万民兵，而不是毛奇所說的 220 万人，但是毛奇現在就已經可以随便动員 150 万受过全面训练的德国兵士了。这就是震惊帝国国会的毛奇那篇演說在总參謀部里引起一片活跃的原因。

必須給毛奇以应有的評价：在他同貝奈德克和路易-拿破侖那类愚蠢的敌人打交道以前，他一直都竭力完全正直地进行战争。他准确地、一絲不苟地、认真地恪守了拿破侖第一所采用的战略原則。任何一个敌人都不能責备他曾經利用突然襲击、伏击或者其他任何庸俗的軍事計謀。因此，过去可以怀疑毛奇是否真的是一位天才。自从毛奇被迫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帝国国会的天才們进行斗争以后，这个怀疑便消失了。在对待他們的关系上，他证实了，如果需要，他也能够比他的对手更机智。再也不必怀疑了：毛奇是一位天才！

毛奇对于法国的武装力量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在这方面，我們也有一些綫索可寻。1866 年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法国官方人士中引起了为薩多瓦复仇的呼声，1870 年的胜利也将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促使官方俄国去“为色当复仇”，这对毛奇和俾斯麦來說并不是什么秘密。直到現在仍旧是俄国的順从奴僕的普魯士，突然成

了欧洲的头等軍事强国。在欧洲局势中这种剧烈的和不利于俄国的进展，无异是俄国政策的失败。复仇的呼声在俄国叫得相当响亮。在柏林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尽快地拿定主意，不让俄国人有时間备战。至于当时普魯士方面为了准备对俄战争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只能留到下一次再谈。这里只要說一点就够了，在1872年夏天就几乎全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作战计划，不过这一次计划沒有规定任何“打击心臟”的行动。当时俄国皇帝亚历山大未經邀請就到柏林来訪問德皇，并在一个“权威的地方”提交了某种文件，从而打消了这个得意的计划。重新恢复的神圣同盟把矛头首先指向土耳其，暂时推迟了最終仍然不可避免的对俄战争。

这个小计划当然也預先考虑到了法国同俄国結盟来反对普魯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想只采取防御办法来对付法国。那末他們认为需要多少人才足以击退法国的进攻呢？

要有一支 25 万人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 1874 年 2 月底—
3 月初

作为社論載于 1874 年 3 月 8 日和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28 和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饒舌家毛奇
和一位不久前从萊比錫
給他写信的人⁴¹¹

3月13日于倫敦

一个被喂肥了的萊比錫市民的铁血爱国主义，看来被一件不痛快的事情挫伤了；据法国人断言，在麦茨投降⁴¹²以前，他們沒有損失任何火炮，相反地，德軍在这方面却受到了損失。这位得了火炮狂热病的市民請求著名的半神人毛奇加以澄清，于是毛奇就在“萊比錫日报”⁴¹³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可笑的先知箴言，以示答复。这篇箴言的意思是說，虽然在审理巴贊案件⁴¹⁴时某些法国將軍曾說出了一些关于双方繳获火炮的不准确材料，但是終究應該承认，德軍在8月16日总共繳获了法軍的一門火炮，而法軍則在18日夺走了德軍的两門火炮。說这些就已經够了。但是，沉默寡言的毛奇还要做一篇演讲，否則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于是，他就向那些虔誠的糊塗虫們說，根据“現代战术”，炮兵應該在最前列作战；因此，德軍才損失了两門火炮。从他这些話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法軍也遵照他的这种“現代战术”行动，他們損失的火炮会多得多，因而会得到他的称贊；因为，据他說，奧軍炮兵在战斗的最前綫支援了步兵。他們“极其光荣地”損失了160門火炮。他郑重地說，奧軍

炮兵所以做这种机动，是因为奥軍的步兵在装备上不如普軍。这样說来，既然法国沙斯波式步枪比德国的針发枪高明，德軍炮兵也就有理由必須去做奥軍炮兵在凱尼格列茨⁴¹⁵做过的好事。但是，法軍炮兵並沒有必要毫无目的地让敌人的在膛綫結構和机动性方面比自己强的炮兵来轰击自己。自然，对毛奇說来，在1870年8月14、16和18日这三天中就有4万名德軍被打死打伤，这是很不体面的，虽然法軍炮兵的管理方法在他看来是极不明智的，以致直到現在他还說：

“在这种条件下沒有任何損失或者只損失一門火炮这个事实，是否能特別证明法軍炮兵在战斗中的灵巧和頑强，——这还是一个問題。”

但是，你們可不要认为，法軍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不太合乎規矩，或者至少同德軍炮兵相比不太合乎規矩，尽管毛奇的这封字数不多的信会使你們这样想。毛奇勇敢地断言，說什么法軍炮兵“大部分都是很容易消灭的敌人”，我們要用毛奇自己的說法說，这种断語是“不太合乎实际的”。誰想更詳細地了解这一点，就請他看看东普魯士第一炮兵团的一个炮兵連連长、炮兵工程兵混合学校教官霍夫鮑威尔上尉的“麦茨各次战役中的德軍炮兵”（1872年柏林米特列尔父子出版社版）一书⁴¹⁶。显然这是一本半官方的书！毛奇知道，像我們这位萊比錫市民那样提出这种愚蠢問題的人，是不会看这种书或者是看不懂这种书的，于是他就指望，那些能看懂这种书的人将“閉口不言”。

毛奇关于使用炮兵的“新”方法的高談闊論，連花儿張紙来写它也不值得。那样使用炮兵不仅炮手和馬匹要遭到大量損失，而且彈药耗費巨大，以致在短期內不能得到补充。加之，由于采用毛奇的“新战术”的結果，德軍炮兵为了使科学增光而杀伤自己同胞

的机会，比原来設想的要多得多。1870年8月14、16和18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新战术”使得炮兵射击被科学地弄混乱了，結果不得不撤銷前令，并要求停止向德国军队开火这种背叛性的瘋狂行为（見霍夫鮑威尔的著作）。

但是，正如一級铁十字勳章获得者和自己上司的絕對崇拜者霍夫鮑威尔上尉自己所說的，德軍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带有“临陣决策的性质”。毛奇赶忙把这称做是实现了“現代战术的要求”，这种战术“規定，炮兵不敢害怕〈毛奇文風如此〉加入作战部队的最前綫，或者，在反击敌人冲鋒的时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并掩护其他兵种”。但是，这些要求早在毛奇提出之前很久就已經向炮兵提出了。关于炮兵的“現代战术”的内容根本无法确定。在1815年以前，在这方面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成文的东西，从1815年起，普魯士炮兵由于无所事事而逐漸瓦解，它的軍官們就知道互相爭吵。从1866年起，普魯士人相信，他們掌握了火炮的奥秘，因为他們偶然地拥有了比他們一些邻国更好的火炮。在法国战争期間，他們才开始为自己的炮兵摸索战术，因为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炮兵战术必須随着火炮的每一个重大的改进而改变。

毛奇及其娄罗們在书籍、报纸、演說和书信中大肆宣揚他們的既十分幼稚又极其老朽自負的先知箴言，而普通的人道則要求对这种箴言加以嘲笑和斥責。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3月13日

載于1874年3月25日“人民国家报”
第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
年版序言的补充⁴¹⁷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薩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魯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⁴¹⁸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見，所謂偉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們自己心願的成果，但不管願意与否，他們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經震撼了旧普魯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騷动的工业成分——無論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紀律，已經費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統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魯士管轄。至于普魯士的天賦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賦王权⁴¹⁹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損失，就更不用說了，——現在帝国的重心已經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經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

来又有 600 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間接兼并归附进来。⁴²⁰而在 1870 年，又增添了 800 万西南部德意志人⁴²¹，結果在“新帝国”中，同 1 450 万旧普魯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 200 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魯士容克封建制度的 2 500 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魯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魯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統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經把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 1840 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維持的。但是，从問題已經不在于保护貴族免受資產階級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階級免受工人階級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轉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魯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轉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論住宅問題”第 2 篇第 26 頁及以下各頁^①）已經做了研討。但是在那里沒有必要去談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轉变是普魯士在 1848 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見，普魯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現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則無論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現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魯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殘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階級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調下进行的。

^① 見本卷第 289—291 頁。——編者注

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廢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領地範圍內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話翻譯成資產階級的行話而已。旧普魯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別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見，普魯士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紀末，以愜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 1808 年至 1813 年間開始了的，并在 1848 年前进了一步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一切將很順利，世界將安靜地等待着，而我們自己又能長壽的話，那末也許我們活到 1900 年時會親身看到，普魯士政府確實消滅了一切封建機構，而普魯士也終於達到了法國在 1792 年時所處的狀況。

消滅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來表示，就是確立資產階級制度。隨着貴族特权的廢除，立法也資產階級化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資產階級對待政府的態度的基本點。我們已經知道，政府是被迫實行這些緩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資產階級面前把每一個這樣的小讓步都描繪成對它所做的犧牲，描繪成費很大力氣從國王那裡爭得的恩惠，為此資產者自己也應當對政府做某些讓步。於是，資產者雖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卻甘心去受這種欺騙。由此就產生了在柏林暗中成為國會和普魯士議院各次討論基礎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烏龜爬一樣慢慢地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種封建的和由於劃分為小邦而造成的阻撓工業發展的障礙，確立統一的幣制和度量衡，確定營業和其他的自由，准許遷徙自由而使德國的勞動力受資本的無限支配，保護貿易和投機事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使政府保留全部實際政

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⁴²²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⁴²³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結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

煌地經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驗。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員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經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編輯同时关在監獄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說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沒收、解散會議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會議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會議召开起来；橫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給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組織。工人不論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別在与所謂“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們現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則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們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們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別現象⁴²⁴，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国家工人比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們属于欧洲最有理論修养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謂“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別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現在这样深入他們的血

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組織，但是前进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魯东主义的傳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魯东主义的傳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論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記，它是依靠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們終究是屬于一切时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論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記，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沒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們現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須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計劃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說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島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鎮压，所以現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階級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許他

們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預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們还占据这个地位,他們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給他們的种种責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須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領袖們有責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論問題,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傳統詞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們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須日益加强团结党組織和工会組織。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爭得的选民就已經是一支相当龐大的軍隊,但是他們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傳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須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須維護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許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說他們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驗或者偉大的事变要求他們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們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倫敦

載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萊比錫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国农民战争”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⁴²⁵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
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
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
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
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
37、43、44和45号。第五部分于1875
年以单行本: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
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二和五
部分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
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
年柏林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第一、二和五部分曾根据
1894年版本校对过

波兰宣言⁴²⁶

当俄国皇帝到达倫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 5 英镑，督察员每人 2 英镑（合 100 马克和 40 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杨·克林斯基。⁴²⁷ 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諾新聞”⁴²⁸ 外，倫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

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它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

公爵管轄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們將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說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們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們联合起来。現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們將成为一个处于統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們来吧，来同我們較量較量吧！”⁴²⁹

遺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計劃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誘惑：如果一般說来我将活着的話，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異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計劃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闡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經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 1791 年 5 月 3 日的宪法在維斯拉河两岸豎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經過几十年平稳的、沒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萊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結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爭得了普魯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軍队在法国所沒有爭得的东西。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⁴³⁰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45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

他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陰謀，背信的襲擊，以及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這幾段話已足以表明這個呼喚書了，我們現在暫且把這個呼喚書放一放，以便談幾點關於波蘭問題對德國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見。

不管俄國從彼得大帝以來如何地發展，不管它在歐洲的勢力如何地增長（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是在占領波蘭之前，它實質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樣是一個歐洲之外的大國。1772年波蘭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國已經根據帖欣和約要求並得到了^①干涉德國事務的正式權利⁴³¹。這對於德國各邦君主應當是一個教訓；但是，儘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這個唯一認真反抗俄國政策的霍亨索倫和弗蘭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滅波蘭。拿破侖戰爭之後俄國更攫取了前普魯士所屬和奧地利所屬波蘭各省的極大部分，現在它公然以歐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現了；這個角色它連續不斷地扮演到1853年。普魯士對自己在俄國面前搖尾乞憐頗感自豪；奧地利則是違背己願跟着俄國走的，但是在決定關頭它總是由於對革命的恐懼而讓步，因為沙皇始終是反對革命的最後支柱。於是俄國便成了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同時也不放棄準備利用泛斯拉夫主義的煽動在奧地利和土耳其實行進一步的掠奪。在革命年代俄國軍隊對匈牙利的鎮壓，對東歐和中歐說來，就像巴黎六月戰鬥之於西歐一樣，是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其後，當尼古拉皇帝在華沙充當普魯士國王和奧地利皇帝之間的仲裁者的時候，反動派對歐洲

^① “並得到了”這幾個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的統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統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視；普魯士和德国各小邦則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順从而懲罰了他們，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們辯护，而在1866年普魯士則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懲罰。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俄国軍隊充当了整个欧洲軍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軍，——誠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侖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軍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軍隊。只是因为俄国軍隊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魯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魯士德意志軍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們都看到了俄国軍隊。虽然毫無疑問，只要俄国的內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轉入革命軌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間的战争，就像普魯士在薩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①，——但是，俄国軍隊将始終帮助普魯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現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勢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軍隊則仍然是一切鎮压欧洲工人階級的軍隊的后备軍。

这支龐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軍的矛头首先針對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謂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縛住。所以，我們比別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勢力和俄国的軍隊。

① 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⁴³²中已經談到。

在这方面我們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貴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談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見到不少帶有貴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們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們在 1846 年和 1863 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轉归农民所有。1871 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貴族的行为嗎？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經完全站在現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嗎？自从俾斯麦在波茲南^①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褻瀆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語⁴³³，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貴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統治下重新統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則是：建議同德国工人政党結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 1863 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現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爭辯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來說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

① 在 1894 年版上不是“波茲南”，而是“波兰”。——編者注

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⁴³⁴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后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是闹到普遍的内訌。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

法掩盖他們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創始人之一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倫敦的所謂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許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們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組的状态中，而且連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Communeux》〔“公社社員”〕的宣言，把自己的綱領公諸于世。⁴³⁵

他們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們屬於布朗基本人所創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綱領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會同布朗基談过話），而是因为他們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傳統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沒有社会主义的理論，也沒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組織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嘗試，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結社的形式才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謀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諾言感到厌倦的人，終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鬧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謀，或者在沒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鎮压下去。順便說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沒有被警察局偵查出来的密謀；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靂。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

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做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

是很不恰当的。他們的會議是不公开的，決議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們当做閑談的資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們卷入了一場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論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籍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間出版了“度申爸爸”，这是对1793年阿貝尔的報紙可憐的模仿。⁴³⁶为了回答他們的道義的譴責，这位高貴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諷刺文章中把他們全体称为“无賴或无賴的帮凶”，用罕見的一大堆下流話来罵他們：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①

我們的三十三位布魯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同这样的对手吵鬧！

事实上无可怀疑，經過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饉，特别是經過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階級需要一个长久的宁靜，以便养精蓄銳，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敗。但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見解。

在他們看来，凡尔賽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賽的崩潰，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經到来。因为我們正接近一个偉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灾难深重而陷入絕境并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軍”。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願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們所說的

^① 海涅“宗教辯論”。——編者注

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干家”的人說来，是必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經干起来了，他們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應該明确自己立場的时刻来到了”。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們声明：他們是（1）无神論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們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順便提一下，尽管他們的目的根本对立，他們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說，他們要在无神論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們时代，当个无神論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論已經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論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說：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馳的，但信奉童貞馬利亚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應該信奉她。至于德国絕大多数^①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則甚至可以說，无神論在他們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純粹否定性的術語對他們已經不适用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只是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們干脆把神打倒，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們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設法在工人中广泛傳播上一世紀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獻。这些文獻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內容來說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

^① “絕大多数”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而这个要求——*par ordre du mufti* [遵照穆夫梯的吩咐]①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⁴³⁷ 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

① 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编者注

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話：

“資產階級撕下了以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剝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現形式的神秘面紗；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資本家和僱傭工人間簡單对立的社會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現在的各种設施最終表現为压迫工具，資產階級用它們来維護自己的統治，并鎮压无产者。”

請把这一段話同“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比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僱傭劳动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紗，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純粹的金錢关系”等等。⁴³⁸

但是，只要我們从理論的高度降到實踐的領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們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們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們通过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終不懈地追求^①最后目的：消灭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資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們以为，只要他們願意跳过各个中間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們确信如此——日內“干起来”，政权落到他們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

^① “并始終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最后,我们这三十个人是“革命家”。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 en bloc [全部] 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己的一分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分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

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①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綱領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贊同現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們还是屬於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們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揚不容爭辯的功績，他在綱領上同別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們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現在他們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論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預兆。

① “（或爱德华？）”是影射爱德华·瓦揚。这几个字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删去了。——編者注

三

在倫敦有一種不定期的俄文評論性雜誌，名叫“前進”(«Vpered»)。⁴³⁹ 它是由一位極可敬的俄國學者主編的。在俄國流亡者文獻中盛行的一種嚴格的禮節禁止我們說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裝做是真正的革命的吃人生番、並宣布對任何東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國人，在自己的論戰中也恪守不提名道姓的虛套，而且絲毫不苟，這種精神只有在英國資產階級報刊上才能見到；他們始終遵守這種虛套，即使這已經顯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場合就是這樣，因為所有俄國流亡者和俄國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我們當然根本不想無緣無故地洩漏這個保守得這樣嚴格的秘密；但是，因為每一個兒童都應當有個名字，所以，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為了行文方便起見用俄國人喜愛的名字彼得來稱呼“前進”的這位編輯，希望他不要見怪。

朋友彼得按哲學觀點來說是一個折衷主義者，他力圖從各種千差萬別的體系和理論中選擇最好的東西；把一切都試一試，把最好的留下來！他知道，一切東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應當吸收，而壞的一面則應拋棄。但是由於每件事物，每個人，每種理論都有這種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每件事物，每個人，每種理論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壞的，就像任何別的東西一樣，因而從這個觀點看來，為肯定或否定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發急是愚蠢的。從這個觀點看來，革命者和社会主義者之

間的一切鬥爭和一切爭論，都應當看做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只能使他們的敵人稱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個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總企圖使所有這些互相鬥爭的人們調和起來，認真地勸他們不要再在反動派面前演出這出丑劇，而應該只是攻擊共同的敵人。如果他是剛剛從俄國來的，那末這就更加自然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俄國工人運動達到了極其高度的發展。

因此，“前進”千方百計地勸導所有社會主義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開的糾紛。當巴枯寧主義者企圖通過種種陰謀詭計、欺騙和謊言使國際受他們的統治，從而在这个協會中引起了盡人皆知的分裂的時候，“前進”却在呼喚團結。當然要達到這種團結只有一個辦法，即立即讓巴枯寧主義者為所欲為，並把國際手脚捆綁起來聽憑他們的秘密陰謀去處置。人們並沒有喪盡天良，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接受了挑戰；海牙代表大會做出了自己的決定，趕走了巴枯寧主義者並決定公布文件，證明開除是正當的。

“前進”編輯部大發牢騷，抱怨沒有把整個工人運動當做犧牲品供獻於心愛的“團結”之前。但是，當使巴枯寧主義者聲譽掃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員會的報告（見“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①不倫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現了以後，驚恐的情緒就更加嚴重了。我們听听“前進”自己是怎么說的。

“這個出版物……帶有充滿火氣的論戰性質以反對站在聯邦主義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內容充滿了私事，這些私事都只是道聽途說收集來的，因而它們的可靠性對於起草人來說不是不可爭辯的。”⁴⁴⁰

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會決定的人證明，他們犯了多大的

^① 見本卷第 365—515 頁。——編者注

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載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⁴⁴¹，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内部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像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

政治爭論中加以公開。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規則，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編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們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貞洁的伊薩伯拉嫁給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烏尔利希）作证說，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貞洁的伊薩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輕的軍官，名叫塞拉諾；如果这个塞拉諾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內閣首相，后来被其他寵臣所排挤和貶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國內撵出去，最后，在經過种种惊險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薩伯拉和塞拉諾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誰想写現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讀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騙者外，还有大量騙子、冒險家、欺詐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們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隱瞞呢？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們还远沒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說成主要是用私事編成的胡言，那末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場，也就很难說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沒有讀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見識太少或成見過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謊。讀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謀”

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評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損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組織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該书所談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內容都是私事，——說得輕一点，这是不負責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骯髒的，毫无疑问非常骯髒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說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誰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骯髒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騙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誰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把自己的功績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要专门来圍攻他們。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們竟想在我們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止他們。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經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車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騙子和一些好吹牛皮、像癩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間，我們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論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們靠自己的語言知識，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則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

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們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詐行徑的責任，是对他們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結束自己的評論：

“我們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們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結果。我們的大部分讀者想必会像我們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們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閱讀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職責而在我們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現象的。”

我們的敘述的第一部分就談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載的下面这段話开始：

“我們用另一則这类消息来使我們的讀者高兴。我們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現在也同我們在一起，加入我們的队伍了；經過四年監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們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們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傳的任务”⁴⁴²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訴我們說，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編輯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責任保护“前进”杂志，順便說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異地发现，編輯，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終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憤慨；他写了一封詳尽的信，信中說，“为了正义，为了純粹理論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順便說一句，后者根本沒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經濟方面的一切問題上，都有平等的（同編輯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誠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

到寬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負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資金在国外創辦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剛剛获得成功，未經任何邀請，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輕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錢的一切問題上都同刊物創辦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像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純粹理論方面的考虑”竭力說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錯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曲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煩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詞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人民进行革命，使他們“明确了解和意識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誰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誰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們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說，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們应当等待，——“但是我們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們西欧，只要用一个簡單的回答就可以終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們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們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們已經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們干嗎还用廢話来煩扰我們，鬼知道你們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們的俄國人看來事情並不這樣簡單。朋友彼得認為，特卡喬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轉的議論，能夠對俄國青年產生一種像陰阜那樣的誘惑力，於是他這個俄國青年的忠實的埃卡爾特，就出版了一本長達 60 頁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語連篇的書翰⁴⁴³。他在这里陳述了他本人對革命實質的看法，一本正經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經準備好進行革命，革命家們是否有权並且是在什麼條件下，號召人民起來革命，以及其他諸如此類自作聰明的議論。這些東西整個看起來和經院哲學家關於童貞馬利亞的研究大約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種像童貞馬利亞之類的東西，理論成了信仰，參加運動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動都不是在我們這個罪孽深重的塵世展開的，而是在一般辭句的九霄雲外進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雖然鼓吹團結，反對革命黨內部的任何論戰、任何“互相指責的抨擊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樣參加論戰，當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爾特的責任，如果不同樣揭露自己的敵人，當然就不能回答敵人的揭露。這種“悲慘現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發生的呢，——朋友彼得將親自告訴我們。他的小冊子一開頭這樣寫道：

“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國流亡者文獻包括的都是互相指責的小冊子，關於誰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誰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誰是真誠的誰不是真誠的、誰才是俄國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實的革命政黨的真正代表的論戰，——這全部純係俄國流亡者私人之間的爭吵的文獻，使讀者也感到厭煩了，它對革命鬥爭事業沒有任何意義，最多不過是只能使我們的敵人稱快……我知道這個，但我仍然認為，我應當寫這些篇章，應當用自己的手為這可悲的文獻增加一點數量，使讀者煩惱，敵人稱快……之所以應當，因為

两害相权取其輕。”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揚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們容忍被我們揭穿了的騙子——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他和我們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騙子——，那末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們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問問自己，他們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輕。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釘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較尖銳的論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論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們对朋友彼得还是寬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經够严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識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責备我們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給“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問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們的宣傳鼓动大概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們的組織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二人委员会嗎？我們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騙，他們的信任被濫用了，弄得他們已經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組織已經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讀者不需要別人說明，这“二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說，他們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們的活动中却帶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虛伪和不真誠性质……他們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們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憤慨，提出了一条原則：一切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們把欺騙同志，欺騙那个似乎是他們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們只要能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

所有的人，好像組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革命的政黨可以沒有黨員的真實團結似的！他們準備在人民中燃起貪婪和不勞而享乐的旧欲望…… 他們準備剝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們變成自己計劃的工具來使用；他們在口頭上準備捍衛個人和小組的最充分的獨立和自治，但同時却在建立最堅決的秘密獨裁制度，使他們的信徒養成最馴服的、盲目聽從的習慣，好像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聯合，一個由那些在事實上經常否定他們口頭上宣揚的東西的人組成的團體就能完成社會革命似的！”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實：這段話簡直像是從“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中摘引來的，而寫這段話的人正好是幾個月前把這本書當做是反對共同事業的犯罪行為來譴責的那個人，理由是它進行了攻擊，而這種攻擊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話一模一樣，所反對的也同樣是那些人。現在我們可以滿足了。

如果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看胸懷壯志但却一事無成的特卡喬夫先生，以及我們這位朋友彼得在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點不幸，那就該輪到我們來說：

“我們不知道，這本書的作者們如何看待所獲得的結果。我們的大部分讀者想必會像我們一樣感到‘愉快’，我們就是在一種心情之下閱讀這本書和為了履行史家的職責而在我們的刊物上披露這些‘特殊’現象的。”

但是，還是把玩笑擱在一邊。俄國運動中之所以發生許多奇怪現象，是由於長期以來任何一部俄國著作對於西方說來都是百思不解的東西，因此巴枯寧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們所干的勾當向西方隱瞞起來，而這些勾當在俄國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們大力散布這樣一種意見：說什麼為了運動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國運動中最骯髒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隱瞞起來；誰把關於俄國的事情——因為它們見不得人——告訴歐洲，誰就是叛徒。現在這種

情况已經結束。懂得俄語，現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已經不是那樣稀有的現象了；俄語是活的語言中最有力量和最豐富的語言之一，所以無論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运的支配，就是說他們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并在它們監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沒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樣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絕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絕状态，他們是不会有在許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樣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評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最后，从正在實現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⁴⁴⁴

“人民国家报”的讀者不走运。他們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記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 117 和 118 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話，以及它的編輯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順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編輯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創作的形式和内容，說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編輯表示遺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論战。他发表了一封“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⁴⁴⁵。这封信把我从来没有說过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各种瑣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等閑視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辯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駁。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給……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說服他們和我(!)結成同盟”；同时，說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們的意向和他們的著作。他說道：“您向

我們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視，因为在您看来，我們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賜予我們的称呼”，——而結尾自然是下面這張王牌：“您嘲笑我們，就是為我們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說什么我“用尽一切罵人話”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沒有一句是真話。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負責，而沒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妄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說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維話从自己身上轉嫁給他們，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說来——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圍环境中的重大差别估計在內——俄国青年現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們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們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誰也沒有給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經說过的“一些好吹牛皮、像癩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們，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倫敦土利街三个裁縫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縫曾发表一个宣言：“我們，英国人民，声明”等等^①。因此，必須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像以前一样

^① 我敢打賭，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說，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階級，因为我把裁縫“形容得滑稽可笑”。

与此毫不相干，我們应当把特卡喬夫的“我們”到處都讀做“我”。

據說，我曾給他“出過主意”！對於這點我一無所知。拳腳，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許順便給過，但是主意？^① 勞駕請提出證據。

據說，我曾說服他或者像他這一類的人和我結成同盟，而且還指出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談到的。如果特卡喬夫先生能證明這點，我就給他 10 馬克俾斯麥時代的帝國硬幣。

據說，我曾斷言他“愚蠢”——他給這兩個字加上了引號。雖然我不想否認，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還可以說他有才能的話——在這兩本著作中並沒有放射出來，但是每個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這兩個字一次也沒有出現過。但是，巴枯寧主義者先生們在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總是求助於偽造的引文。

此外，還據說，我“譏諷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喬夫先生想硬要我認真看待他的小冊子，這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德國人素來被認為是沒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確實也就是這樣。但是這並沒有給我們加上一層義務，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像巴枯寧主義者那樣沒有趣味和一本正經。德國工人運動由於同警察、檢察員和監獄看守進行游擊戰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幽默性質；我為什麼要改變它呢？誰也沒有禁止特卡喬夫先生也盡自己的力量來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謊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後接着便是一個無可比擬的指責：我如實地介紹了特卡喬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為我們的共同敵人即俄羅斯國家很好地效勞”。在另一個地方也以同樣的精神說道，像我那樣描繪他，我就

^① 俏皮話：《Schläge》——“打擊”，“拳腳”；《Rathschläge》——“主意”。——編者注

是違反“国际工人协会綱領的基本原則”！这里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們，对我們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們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談論他們，试图揭露他們的阴谋詭計，批評他們和他們的空話，——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則。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別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損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終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經驗的年輕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輕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說，我“用尽一切罵人話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謂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說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貝特則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贊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罵”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罵了人，那末这个情况本身也絕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辯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罵他。我們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說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識。至于說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轉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負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資金在

国外創辦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剛剛获得成功，未經任何邀請，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輕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錢的一切問題上都同刊物創辦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話，将能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談到知識，那末“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間的爭論，大部分是圍繞着下述問題进行的：“前进”杂志編輯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識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絕了这类劝告：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們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憤慨…… 学习吧！求得知識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們說話。等待！学习，改造！我們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們是否有权把時間浪費在教育上？”（第 14 頁）“知識——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說来它們根本是不必要的。”（第 17 頁）⁴⁴⁶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單純的学习号召都表示憤慨，既然他宣布一切知識对革命者說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点点任何知識的痕迹，那末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給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給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們看来頂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能达到了这种最高的程度，絕不是罵他，而是給了他甚至可以說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說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議論是幼稚的（本文中摘录

的話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編輯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轉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談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罵人的話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而这个人 在 德国 是最討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說不上是罵人話。不过,別忙!我不是說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嗎?問題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詩:

“他自己获得了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①,——

当做自己的座右銘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說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軍士或土耳其非正規軍队的士兵,因而我罵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沒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說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傳說中的非常偉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切时代最宏偉的英雄史詩——伊利亚特——的題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說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

^① 海涅“科貝斯第一”。——編者注

的…… 你們會指出，如果可以這樣容易地引起革命，那末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談論它呢？——在你們看來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為…… 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國實現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困難，任何時候都可以喚起俄國人民實行總的革命反抗（！）。誠然，這個信念使我們有責任進行一定的實踐活動，但是這個信念同進行文字宣傳的益處和必要性絲毫不矛盾。我們深信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別的人也贊同我們的這種信念。我們的志同道合的人愈多，我們就愈會感到自己有力，我們就愈容易實際解決這個任務。”⁴⁴⁷

這簡直太好了！這聽起來多么親切，多么通情達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這聽起來完全好像說，特卡喬夫先生寫自己的小冊子僅僅是為了證明文字宣傳的益處，而我這個沒有耐性的黃口孺子卻回答他說：文字宣傳去它的吧，起義的時候已經到了！——那末，實際情況究竟怎樣呢？

特卡喬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冊子中一開始就干脆對雜誌宣傳（而這正是文字宣傳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聲稱，不應把“過多的革命力量浪費”在雜誌宣傳上，因為“它在運用得不恰當的時候所帶來的害處，要比運用得恰當的時候可能帶來的好處大得無可比擬”。我們這位特卡喬夫先生對一般文字宣傳的評價就是這樣高。然而，特別是當你想從事這種宣傳時，當你想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時，僅僅發表宣言是不夠的，必須加以論證，因而，必須從理論上來考慮問題，也就是說歸根到底必須科學地來對待問題。關於這一點特卡喬夫先生向“前進”雜誌編輯聲稱道：

“您的哲學戰爭，您的雜誌熱心進行的那種純理論的、純科學的宣傳……從革命政黨利益的角度來看，不僅是無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⁴⁴⁸

你們看，我們愈深入地研究特卡喬夫先生對文字宣傳的觀點，我們就愈加陷入絕境，愈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麼。事實上他究竟

想要什么呢？我們接着听下去。

“难道你們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終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革命（第 10 頁）…… 誰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誰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 11 頁）…… 正因这样，所以我們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們断定說，俄国革命絕對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絕對必要；我們不允許有任何耽誤，任何延宕。不是現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也許就是永远不干（第 16 頁）…… 任何受尽专橫暴虐和剝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 17 頁）…… 但是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 34 頁）…… 現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訓，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問題我們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誰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誰会怎么干就怎么干。”（第 39 頁）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議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經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經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無論如何不願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問題是这样摆着的：不是現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絕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話，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災禍！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嗎？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嗎？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釘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嗎？——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許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嗎？

他連想都沒有想這一點。小卡爾·米斯尼克滿臉流着無辜受辱的辛酸淚向德國工人訴說：你們看，壞蛋恩格斯在誣賴我；他寫道，我說過要立即起義；但是要知道，說的根本不是這回事，而是進行文字宣傳，而這個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傳的恩格斯，却恬不知恥地假裝不了解“文字宣傳的好處”。

等待！搞文字宣傳！我們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時間浪費在文字宣傳上？要知道，把我們和革命分開來的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萬的犧牲！（第14頁）現在不是進行文字宣傳的時候，現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現在就干，也許就是永遠不干……我們不允許有任何耽誤，任何延宕。而我們還要去搞文字宣傳！呵，上帝，難道這是一個活人在向活人們說話，而這個人就叫做彼得·特卡喬夫！

我說這些關於立即起義的、現在他羞於承認的大話是“幼稚的”，難道說得對嗎？這些大話幼稚到這種程度，可想而知，說這種大話的人在這方面大概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他居然還是超過了自己。“前進”雜誌編輯摘錄了特卡喬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國農民宣言中的一個地方。特卡喬夫先生在宣言中對社會革命完成後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繪：

“莊稼漢也就會過起快活日子來，整天都是樂呵呵的……他的錢包裝得滿滿的，並且裝的是金幣而不是銅子。家裡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數也數不清。他的飯桌上擺着各式各樣的肉食，還有出名的糕點，還有各種甜酒，整天整夜地放在那裏吃。他一個勁兒地吃呀喝呀——肚子能裝下多少就裝多少，而干活多少是隨他的便，誰也不敢強迫他去干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⁴⁴⁹

一個編得出這類宣言的人，對於我僅僅把他叫做年輕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居然還要憤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說：

“你們到底为什么要指責我們的秘密活动？如果放棄秘密的、隱蔽的地下活动，我們也就勢必要放棄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們同样也懲罰我們，因為我們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願意放棄我們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而妨碍了……偉大的国际工人运动。”⁴⁵⁰

第一，說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謀之外沒有別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剛剛还在強調从西方傳入俄国的文字宣傳的重要性嗎？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傳的道路是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問題上說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規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謀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許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談到反对国际的密謀，即同盟而外还談到别的密謀，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給他作紀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們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們这些自夸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瞞哄和欺騙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謀，不去搞像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說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謀，如果他們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謀，不去搞像被順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謀，而做一番真正的事業，来证明他們是真正有組織的，证明他們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組以外还在干点別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們沒有

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們在进行秘密活动，我們在进行秘密活动！——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謀家一样，他們用各种不同的声調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广泛进行的阴謀的騙人鬼話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盖对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虛荣而搞的阴謀詭計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我們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謀”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騙伎俩^①，这班先生們才这样暴跳如雷。他們說，这是“冒失行为”。他們說，我們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們生活着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偉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他还被描繪得太清白了。我們仅仅摘录了“革命問答”第十八条，这一条規定必須如何对待俄国貴族和資產階級，必須如何“掌握他們的齷齪的秘密，使他們变成我們的奴隶，这样一来，他們的財富等等就会成为創辦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庫和寶貴的支持”。到現在为止我們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見諸实践的。而在这方面确实有許多东西可以讲，我們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責，都是以这样一些論断为根据的，这些論断他不仅知道是虛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們就談到这里为止。

^① 見本卷第 365—515 頁。——編者注

五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⁴⁵¹

特卡乔夫先生順便告訴德国工人說，我对于俄国沒有“絲毫知識”，相反地，只表現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們說明真实情况，特別是說明，为什么正是現在在俄国可能輕而易舉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實現社会革命。

“我們这里沒有城市无产階級，这是事实；然而我們这里也沒有資產階級……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資本的权力在我們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閣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⁴⁵²

現代社会主义力图實現的变革，簡言之就是无产階級战胜資產階級，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階級差別来建立新的社会組織。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實現这个变革的无产階級，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个民族都經歷了这种状况。我們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階級差別。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們現代条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达到

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見，就是从这一方面說来，资产階級正如无产階級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誰竟然肯定說在一个虽然沒有无产階級然而也沒有资产階級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識。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話說，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較为容易的，因为他們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資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經濟生活里沒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們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虛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資本上面；它本身体現着〈！〉一定的經濟利益……我們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賴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說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現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現在”。

我們既不去談論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經濟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而需要有它們本身創造的国家，也不去談論那个大胆的断語，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內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賴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談論那个矛盾的断語，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創造的現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們最好是馬上来看看这个絕對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 10 500 万俄亩土地，貴族（为了簡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貴族）占有 1 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屬於 15 000 个貴族，所以他們每人平均占有 3 300 俄亩。可見，

农民的土地只比貴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們看，貴族同保证他們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繳納19 500万卢布的土地稅，而貴族則只繳納1 300万！貴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贖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給貴族的，不仅有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貴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①。而俄国貴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贖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貧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們不仅被夺去了他們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饒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說——都小得不能賴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錢，这笔錢是先由国家替他們墊出的，現在他們必須連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償。他們不仅肩負着几乎全部土地稅的重担，而貴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項土地稅就抵銷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須繳付的其他一切捐稅——关于这些，我們下面要談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資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繳納土地稅，繳付贖金和国家墊付贖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稅。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給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稅負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轉嫁給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

① 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視它的貴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1875年和1894年版中都刪掉了。）

便征收新的捐稅，而俄国的慣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納稅，农民几乎繳納全部捐稅。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貸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級形式的貿易，利用有利情勢和玩弄与此紧密相連的欺騙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領，所以在俄国高利貸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說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稅的时候，高利貸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現錢放債。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錢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貸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現錢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錢，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謠言，只出很低的价錢，但是甚至連这很低的价錢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見，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飢餓为基础的。——另一种剝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賃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貧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給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說上面我們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們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 middlemen [中間人]。簡言之，沒有一个別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資產階級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經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纏繞。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們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薩那里近十年来特別由于铁路建設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資產階級，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貧困上面的經營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賴国家恩賜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沒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盜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說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們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經濟生活里沒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們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說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說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屬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經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繼續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見的事情。問題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結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說，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純粹是一种贅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階級占居統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說，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們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論无产階級或資產階級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見并且都还处在低級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說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說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們在这里要多談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許多俄国人就硬說它具

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韃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庫特族等中間可以見到，另一方面在薩阿米族、聶聶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見到。^① 所以劳动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韃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資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組合成員們彼此負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責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代日耳曼人中間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說說，劳动組合这个名詞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②

在工人劳动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a 意即长者）来执行財務員、會計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經理的职务，并且領取一笔特別薪俸。这类劳动組合：

- (1) 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 (2) 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間，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間建立的；
- (3) 是为了經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們是根据全体成員簽訂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員自己

① 关于劳动組合，还可以参看“俄国劳动組合材料汇编”（《Sbornik materialow ob Arteljach v Rossiji》）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

② 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組合”。——編者注

不能湊足必要的資本，如像在於酪業和捕魚業（為了買漁網、漁船等等）中所常見的那樣，那末勞動組合便落在高利貸者手中，他以高額利息貸出組合欠缺的款子，從此就把大部分的勞動收入裝進自己的腰包。但是，作為僱傭工人完全受企業主僱用的那些勞動組合，則受到更加卑鄙的剝削。他們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業活動，這樣就為資本家節省了監督費用。資本家把茅舍租給他們住，借錢給他們糊口，而且又極卑鄙地發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煉工人中間，在西伯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行業中間，情況就是如此（參看弗列羅夫斯基“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Flerovsky. «Položenie rabočago klassa v Rossiji» 1869年聖彼得堡版）。⁴⁵³）。可見，勞動組合在這裡是使資本家便於剝削僱傭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種自己僱用該團體以外的人做僱傭工人的勞動組合。

總之，勞動組合是一種自發產生的，因而還很不發達的合作社形式，並且也不是純俄羅斯或純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這種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業中，在英國的捕魚業中，合作社的種類甚至是非常紛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國鐵路的西里西亞的挖土工人（是德國人，而決不是波蘭人）就曾組織在真正的勞動組合裡面。這種形式在俄國占有優勢當然證明俄國人民有着強烈的聯合願望，但這還完全不能證明他們靠這種願望就能夠從勞動組合直接跳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要實現這種過渡，首先要勞動組合本身能夠向前發展，拋棄本身那種自發的，如我們所看到的替資本家服務比替工人服務還要多的形式，並且它還必須至少提高到西歐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這一次要相信特卡喬夫先生（從上面說過的一切看來這樣做自然是過于

冒險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⁴⁵⁴ 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很清楚，我

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們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級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馬來人中間，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見。早在1608年，在剛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說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許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經是普遍現象；現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殘余；特別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遺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說明及其詳細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許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論述这个問題的經典作品。⁴⁵⁵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內，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漸漸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預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 一詞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語言中就是公社社員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說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 *мир* 一詞譯錯了。各个公社相互間这种完全隔絕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絕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

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連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邏輯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說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繼續发展，即使沒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漸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現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間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員間在財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現象也确实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員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們放高利貸，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誰也沒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說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傳統的共产主义者放棄“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 15 頁上說道：

“一个高利貸者〈kulakov〉階級，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階級，即农民貴族正在农民中間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們上面說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給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贖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給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維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維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轉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現在他也必須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沒有錢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

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稅和高利貸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拋棄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謀生。^①

由此可見,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轉变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別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②;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經過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級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給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見,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沒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說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經濟革命一样輕易。他說,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稅……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額手称

① 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W Zacholusti i w Stolice» 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②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諾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現在往往购买或租賃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沒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們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說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終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騰着的……积憤和不满情緒……”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結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間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能想像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輕易，那为什么沒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簡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經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貴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領并要夺回王位的場合以外，从来沒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規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連·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說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廢黜和关进牢獄，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間的上帝：Bog vysok, Car daljok, 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們絕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贖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話，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說給別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請問：一个早已滿了 12 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像我們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絕頂幼稚的見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 1873 年在西班牙惨敗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間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結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談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維亞只率領了 3 000 个兵士，在 14 天內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見我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①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詳細。）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財政已經混乱到了极点。捐稅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債的利息用新公債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債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錢！行政机构早已腐敗透頂，官吏們主要是靠貪污、受賄和敲詐来維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 1861 年的贖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沒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沒有足够的土地，他們遭到捐稅压榨，受到高利貸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橫，我們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階級的見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首都资产階級的見解发生愈来愈劇烈的矛盾，

^① 見本卷第 521—540 頁。——編者注

而且連它現在的體現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間愈来愈意識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經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納入安靜的立宪的軌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結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階級，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繼續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偉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錢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嘗試把有产階級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卡·馬克思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一书第二版跋⁴⁵⁶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最初出版于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和巴塞尔，“人民国家报”认为現在把它再版是适时的。它的最近一版大部分在德国边境上被沒收。这本小册子在科倫案件結束以后几个星期就出現了。那时最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因此，在个别細节上出現一些錯誤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在科倫陪审員的名字当中有的就不确切。例如，紅色問答书的作者看来并不是莫·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維的人。⁴⁵⁷再例如，威·希尔施在自己的“辯护书”⁴⁵⁸中斷言，舍尔瓦尔逃出巴黎監獄是格萊夫、法国警察当局和舍尔瓦尔本人之間暗中商定的結果，以便在审讯过程中把舍尔瓦尔当做倫敦間諜来利用。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普魯士伪造期票的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被引渡給普魯士当局的危險可以使这位克列美尔^①（这是舍尔瓦尔的真姓）俯首听命。我对事件的叙述是以舍尔瓦尔本人向我的一位朋友作的“自供”为根据的。希尔施的供詞使人对施梯伯的伪证、倫敦和巴黎的普魯士大使館的秘密阴谋以及辛凱尔迪的无耻陷害看得更清楚了。

① 双关語：«Krämer»（克列美尔）也有“小商販”的意思。——編者注

当“人民国家报”开始刊登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把第六节（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删去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更仔细地想了一想，觉得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件。

对革命的暴力镇压给革命的参加者，尤其是给那些被迫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的人的震动是那样的大，甚至使那些坚强的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都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不想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这就使他们去玩弄秘密阴谋和革命，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都同样声誉扫地；这就是促成了沙佩尔和維利希失策的原因。維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而毕生都是工人运动的先锋战士的沙佩尔，在科倫案件结束后不久就懂得并且承认了自己一时的迷误。过了许多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向我谈到了这个“流亡中的疯狂举动”的时期。——另一方面，写“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时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在危急关头，轻举妄动会成为一种要求公开贖罪的反党罪行。

“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这是科倫案件进行期间辛凯尔迪在写给倫敦大使館的信中所說的話（見拙著“福格特先生”第27頁⁴⁵⁹），这句话揭穿了共产党人案件的秘密。“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这不仅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直接受命干这件事的人并且在进行活动，而且还意味着整个政府机器包括法院（例如1851年5月7日頒布的普魯士司法官員紀律法）和报刊（例如爬虫报刊基金）在内都受这个机构的支配，正如过去在威尼斯整个国家組織都从属于国家宗教裁判所一样。在普魯

士革命風暴期間陷于癱瘓的政治警察，需要加以改造，而這種改造的榜樣過去和現在都是法蘭西第二帝國。

1848年革命失敗以後，德國工人運動只是以理論宣傳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而且這種宣傳還局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因此，對於它在實踐上不足為害這一點普魯士政府是絲毫也沒有懷疑過。迫害共產黨人對它說來只不過是對自由資產階級實行反動十字軍征討的序幕，而資產階級却譴責工人的代表並替辛凱爾迪—施梯伯開脫罪責，結果就自己為這個反動派的主要武器——政治警察——助長了聲勢。於是，施梯伯便在科倫陪審法庭上理所當然地贏得了騎士的聲譽。那時，施梯伯是一個瘋狂追逐高官厚祿的小警官的名字；而現在，施梯伯的意思就是政治警察在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的無限統治。他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道德法律的化身，但這只是從比喻的意義上講，就像帝國國會是道德法律的體現一樣。這一次政治警察不是為了命中資產者而打擊工人。相反地，正是德國自由資產階級的獨裁者俾斯麥自以為他非常強大，足以消滅^①工人政黨。因此，施梯伯的威嚴性的增長是衡量自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以來德國無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所獲得的成就的尺度。

教皇永無謬誤同政治警察永無謬誤比較起來不過是兒戲。以前，政治警察在整整數十年中在普魯士把那些幻想德意志的統一、德意志國家、德意志帝國的热情澎湃的青年投入監牢，現在它甚至把那些拒絕幻想這種上天恩賜的東西的禿頂老头兒也關進了監獄。現在它正像當初徒勞無益地力圖消滅帝國的朋友一樣，在徒

^① 俏皮話：Stieber（施梯伯）——姓，stiebern——含有探出踪跡，驅散，攆走，消滅等意思。——編者注

劳无益地力图鏟除帝国的敌人。这多么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并未担負創造历史的使命，哪怕这只是关于皇帝的胡子的爭論的历史！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本身揭示出，国家权力在其反对社会发展的斗爭中是軟弱无力的。普魯士王国国家檢察官用来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归根到底不过是，他們秘密地傳播了危害国家的“共产主义宣言”的原則。尽管如此，难道这些原則不是过了20年以后又在德国的大街上被公开地宣布嗎？难道这些原則不是甚至被从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向外傳播嗎？难道这些原則不是違背一切国家的政府的禁令而以国际工人协会綱領的形式傳遍全世界嗎？只要社会还没有圍繞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轉，它就絕不可能达到均衡。

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末尾中說道：“耶拿……这就是給需要这类手段来維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結論。这就是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結論——耶拿！”⁴⁶⁰

这个預言真是灵驗啊——一位叫特賴奇克的人会驕傲地指着普魯士武器不久以前所获得的胜利和毛瑟枪嘿嘿窃笑着这样說。但是我們要提醒一下，不仅有內部的杜佩尔⁴⁶¹，而且也有內部的耶拿。

卡尔·馬克思

1875年1月8日于倫敦

載于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并載于卡尔·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萊比錫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国家报”，并根据“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第2版校对过

弗·恩格斯 支持波兰⁴⁶²

今年在倫敦隆重庆祝了 1863 年 1 月 22 日波兰起义紀念日。参加紀念会的有我們德国党的許多同志；其中有些人，包括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內，在会上发表了演說。

恩格斯說：“在这里大家已經談到了使各国革命者同情和捍卫波兰事业的那些原因了。只有一点忘記提到，这就是：波兰所处的政治形势已經彻底革命化了，波兰不是革命就是灭亡，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抉擇。这一点早在第一次瓜分以后就显露出来了。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貴族力图保存已經失去存在权利的宪法和特权而引起的；那部宪法和那些特权不仅沒有維持安宁和保证进步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公共秩序，給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第一次瓜分以后，有一部分波兰貴族承认了这个錯誤，并且确信波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恢复；十年之后，我們看見了，波兰人是怎样在美国为自由而斗争的。1789 年的法国革命立刻在波兰引起了回响。宣布人权和公民权的 1791 年宪法成了維斯拉河两岸的一面革命旗帜，使波兰成了革命法国的前卫，并且这恰好是在一度掠夺过波兰的三个大国联合起来，以便扑向巴黎，扼杀革命的时候发生的。难道这三个大国会允許革命在这个同盟的中心扎根生长嗎？——絕對不会。它們再次向波兰扑去，打算在这一次彻底消灭波兰民族。波兰打起了革命旗帜，是它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由于革

命而被宰割得支离破碎并被从各民族的名册上勾销了的国家，除了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挽救危亡的办法了。因此，在一切革命战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波兰人。1863年波兰人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我們今天所纪念的那次起义中宣布了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綱領中最激进的革命綱領。根据波兰存在一个貴族党，就认为波兰的革命者是希望恢复1772年的貴族波兰的貴族分子，是可笑的。1772年的波兰已经永远灭亡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棺材里拉起来。由于革命而站立起来的新波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将和1772年的波兰根本不同，就像我們尽力追求的新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一样。

再說几句话。誰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曾經消灭了波兰的三个大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請看一下我自己的祖国——普魯士德国吧。在民族统一的幌子下，我們把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并入我国，——現在我們有三个威尼斯⁴⁶³；我們到处都有敌人，为了供养那些同时也被用来镇压德国工人的无数士兵，我們肩負着沉重的債務和賦稅。奥地利，甚至奥地利的官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它为自己占領的那一小块波兰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克里木战争期間，奥地利曾經以占領和解放俄屬波兰作为反对俄国的条件。但是，这并不在路易-拿破侖的計劃之內，更不在帕麦斯顿的計劃之內。至于俄国，我們可以看到：1861年在那里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特別危險，是因为当时解放农奴的結果使人民到处都处在群情极其激憤的状态中。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看見了这种危險性，可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它在波兰引起了1863年起义；因为已经得到证实，这次起义是由它一手造成的。一当問題牵涉到維持俄国在波兰的統治

时，学生运动、人民中的深刻的激愤情绪便立刻平息了，并让位给了俄国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淹没了波兰。由于对波兰进行极其有害的斗争，俄国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波兰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今天晚上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意见同俄国革命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在这次纪念大会上说出了这种看法⁴⁶⁴）

马克思的讲话大致如下：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⁴⁶⁵ 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呢？

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联结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但是，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下了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帜下战斗过；1830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当时已经决定的对法国的入侵；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1848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最后，在1871年，它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

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的那些短暂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波兰的囚犯——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难友——并宣布恢复波兰；1848年5月布朗基在巴黎领导工人反对反动的国民议会，迫使它出兵干预以保卫波兰；最后，在1871年，当巴黎工人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表示了对波兰的尊敬，委派波兰的子弟担任军事指挥，统率他们的武装力量。

就在现在，德国工人政党也绝不会由于波兰议员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发表反动演说而分不清是非；德国工人政党知道，这些先生的行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德国工人政党知道，波兰的农民、工人，一句话，每一个没有被本阶层的利益弄瞎眼睛的波兰人，一定了解：**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⁴⁶⁶——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起草

载于1875年3月24日

“人民国家报”第3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半官方的战争叫嚣⁴⁶⁷

德意志帝国的爬虫报刊又受命鼓吹战争了。不敬神的、堕落的法国，无论如何不想让敬神的，由于盛行交易所投机活动、大批投机企业纷纷开业和不断倒闭而繁荣昌盛的德国过安静日子。法国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扩充军备，它扩充军备的飞快速度最好地证明，它打算尽可能在明年就进攻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俾斯麦帝国；大家知道，俾斯麦帝国从来没有惹过一点是非，它一直在裁减军备，只有敌视这个帝国的报刊才散布谣言，说什么帝国通过实行民军法刚刚把 200 万居民变成了后备兵⁴⁶⁸。

爬虫报刊的处境真是困难。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它应该把帝国描绘成温驯得罕见的羔羊，而陆军部却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使德国资产者了解：向他们征收重税不是没有用的；原定的扩充军备的计划事实上正在实现；要塞正在构筑；基于人员正在培训，动员大批“归休兵”的计划正在拟订；军队的战备状态正一天天加强。既然这方面的有关消息确实可靠，并且是来自权威人士，那末，我们就完全可以对报界的那些癞蛤蟆所发出的战争叫嚣做出判断了。

这一切喧嚣的借口是法国关于基于人员的新法令⁴⁶⁹。我们现在就把根据这个法令在法国建立的目前还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的编制同在德国已经实际存在的编制作一比较，为了简明扼要起见，

主要只談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步兵。

显而易见，法国的新法令大体上是普魯士法令的非常拙劣的翻版。

法国基干步兵應該包括 144 个基干团，4 个朱阿夫团和 3 个四营制的土尔科团，30 个猎兵营，4 个外籍营和 5 个惩戒营，总共是 643 个营，而德国基干部队全部只有 468 个营。但是，法国基干部队的这一优势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首先，虽然法国的营同普魯士的营一样，都是由 4 个連組成的。可是，法軍的每个連不是有 5 名軍官，而是只有 4 名，并且其中有一名是后备軍官，这种軍官目前在法国还根本不存在。在法国，直到现在都是 35—40 名兵士配备一名軍官，根据过了时的内容龐杂的法国操典，这确实是必要的，而在普魯士，50 名兵士配备一名軍官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比例已經是最大限度的了，国民議會中討論这个法令的委员会一致得出結論，认为一个連的人数最多可以定为 200 人。可見，法国一个連的人数比普魯士一个連少 25%，而且因为在法国的連里实际上沒有后备軍官，并且在許多年內大概也不会有，所以，在編制上法国連就大大小于普魯士連。但是，現在由于后装枪的使用而使連成了战术作战单位，以致由于連纵队战斗和散兵战中連是主力单位因而要求增强連的人数，所以，在这方面国民議會尽其所能地使法国軍队遭到了最大的損失。

現在，法軍处于战备状态的計有

606 个基干营，每营 800 人	484 800 人
朱阿夫兵、土尔科兵、外籍	
軍团兵士、惩戒营兵士	46 000 人
共 計	530 800 人

但是，必須从这一数目中扣除駐在阿尔及利亚的至少 4 万人，这 4 万人只有在有了替换他們的新編部队以后才能使用。因此，軍事行动开始时便剩下 490 800 名步兵。德国步兵有 468 个营，按战时編制每营 1 050 人，根据官方材料共有 490 480 人，和法軍步兵的人数几乎相等。

因此，我們看到双方暂时人数相等，而德国方面的編制更好、实力更强。現在，我們再看看双方的差别。

在法国方面，上述 643 个实力薄弱的营就是战时能够动用的全部步兵。当然，还有 318 个基于后备連和猎兵連（其中每連配备 50 或 40 名軍官和士官），組成 249 480 名兵士的后备部队，但是，直到現在，这个后备部队只有列兵，并且大部分是完全沒有受过訓練的，而受过訓練的大多数也只是服役过 6 个月。現有的軍官和士官至多只有編制人数的四分之一。当这 318 个后备連变成 318 个适于作战的营的时候，战局的整个結局可能已經决定了，而其中开上火綫的在质量上也不会超过 1870 年的流动自卫軍。还有地方部队，它包括年龄在 30 岁到 40 岁的人，这支部队将整編为 144 个三营制的团，也就是 432 个营。所有这一切現在都只是紙面上的东西。要真正把这套編制建立起来，必須有 1 万名軍官和 2 万名士官，可是目前几乎連一个人也沒有。从哪里能找到这些軍官呢？在普魯士，要从服役一年的志願兵中培养出合适的預备軍官和后备軍官来，几乎需要两代人的時間；早在四十年代，差不多在所有的团里都把他們看成禍害，并且用对待禍害的态度来对待他們。而在法国，这种制度是与革命平等的一切傳統相矛盾的，軍官們看不起服役一年的人，兵士們也憎恨他們，因而从他們身上的确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要培养后备軍官又沒有别的来源。

至于士官和列兵，众所周知，1866年薩多瓦的胜利者吹嘘說，由于普魯士早已存在后备軍制度，所以他們比其他任何一个将要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都有領先 20 年的优势；这样的国家只有当本国年龄最大的应征者都是由作过战的人組成的时候，才能同普魯士相比。現在看来，有人是把这一点忘記了，而且他們还忘記了在法国真正服滿役的只占每年入伍人員的一半，还有一半在服役 6 个月（按照現代的迂腐操典，这个期限是完全不够的）以后就退伍了，所以法国和普魯士不同，它的后备兵和民团大部分是由新兵組成的。他們在忘了这些以后，現在装出一副害怕目前法国地方部队的样子，其实这些部队也同 1870 年和 1871 年在卢瓦尔河和勒芒附近抵擋不住人数比它少一半、但是軍紀严明的德軍的那个軍团一样，只是些沒有受过訓練的炮灰！⁴⁷⁰

但是，还不仅如此。有了慘痛的經驗教訓以后，在普魯士，人們終于学会进行动員了。經過 11 天，全軍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步兵还要更快。为此必須把一切都以最簡便的方式組織起来，特别是使每一个归休兵都事先在他應該歸屬的那个部队里注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团都有自己固定的招兵区，后备軍每一个团首先在自己的招兵区内得到补充。相反，法国的新法令却規定新兵和后备兵到动員时期駐扎在該区的团去注册。这是对从拿破侖时期起就根深蒂固的傳統的迁就。根据这个傳統，各团作为卫戍部队輪流防守法国一切地方，并且必須尽可能从全法国招募新兵。如果說他們不得已放棄了后者，那末他們就会更坚决地坚持前者，这样一来就使各团指揮部和各区后备軍指揮部之間的固定的有机联系无法保持，而这正是使普魯士能迅速动員的保证。这种毫无意义的变动給各特种兵造成的困难比步兵更大，步兵的动

員工作即使因此仅仅拖延三天，在积极行动的敌人面前，这三天就会成为整个战局中最重要的日子。

那末，这整个龐大的法国武装到底是什么呢？——是一支基干步兵，它的人数同德軍相等，但是編制不如德軍。此外，为了进入战备状态，还必须吸收一定数量只服役过6个月的列兵；是第一类后备部队，其中占优势的是只服役过6个月的列兵，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軍官和士官也只有必需人数的四分之一；是第二类后备部队，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服过役，也沒有任何軍官；当然，这两类后备部队都完全没有固定的基干人員。况且，前景已定：軍官的缺額在現存的編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补充；因此，一旦发生战争，这两类后备部队的战斗力不会比1870年秋天和冬天仓卒建立的那些营更强。

現在我們来看看温馴得像羔羊一样，似乎完全没有牙齿，因而无论如何不会呲牙的德意志帝国。我們已經提到，它有基干步兵468个营，战时共有490480人。但是，这里还要加上下列一些新編部队。

从1872年初开始，規定每营补充新兵36人，用整数計算一年是17000人。其次，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列兵在两年服役期滿以后归休了，因此要招募相应数量的新兵来頂替他們，用整数計算是28000人。因此，現在每年招募和訓練的新兵总共比过去多45000人；到1875年底这三年内累計就是135000人，此外还要加上服役一年的志願兵12000人（每年4000人）；合計147000人，也就是說，恰好足够为148个团各建一个第四营。为此，从那个时候起，在所有基干团所屬的各編外的后备連都已經“在編制上准备就緒了”，也就是說，已經配备了應該編入这些营的現役和預备役軍

官和士官。因此，这些第四营至迟在前三营之后两三天就可以参加战斗，为全軍增加兵力 148 个营，每营 1 050 人，合計 155 400 人。但是，这个数字还远远沒有反映出作战軍队因此获得的实力的增长。见过 1866 年的普魯士第四营的人都知道，这些营主要是由身强力壮、年龄在 24 岁到 27 岁的人組成的，它們是全軍的核心。

除了建立第四营以外，建立 148 个預备营的工作也在照常进行，更不用說那些猎兵預备連了。这些預备营是由編外退役預备兵和补充兵⁴⁷¹ 中沒有服役过的列兵組成的。根据官方材料，这些預备兵和列兵的人数在 1871 年是 188 690 人。但是，这一点应当这样理解：平时就已确定的基于軍官和士官的人数就能够訓練出这么多的列兵，因为現在每年大約有 45 000 人編入第一类补充兵，所以仅仅补充兵提供的七种役龄的适龄人員就比上述人数多得多。預备营恰好是一个儲存器，参加战斗、在战斗中被削弱，而更多的是由于战争的艰苦被削弱的营，可以从这里得到必需的多少受过訓練的增援部队，而增援部队以后又可以从补充兵得到补充。

后备軍同現役部队和預备部队同时动员。同样也是在平时就已经确定的后备軍人員共有 287 个营（这一数目應該达到 301 个）。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后备軍各营的人数只达到 800 人；即使我們以这个最低的总数为基础，那末，德意志帝国所能提供的后备軍步兵也将是一支拥有 229 600 人的有組織的部队，并且每年还有数目不断增加的編外人員供以后使用。

但是，不止这些；民軍制度又实行起来了。根据官方材料，在 1874 年底德国步兵的兵力就已经增加了民軍 234 个营（每营 800 人，合計 187 200 人），猎兵連还没有計算在內；而这只能說明，这

些营的基于人员，至少是这些营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基于人员，已经确定了。但是，民军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一些，因为据福伊格茨-雷茨在帝国国会的郑重声明，民军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即200万人”。⁴⁷²

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呢？

法国拥有的基于步兵，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部队，共计530 800人，而这就是法国已经组织起来的全部步兵。如果我们再加上就算已经具有某种编制外观的全部第一类后备部队254 600人(288个后备连，每连800人，30个后备猎兵连，每连540人，以及惩戒部队的8 000名编外兵士)，那末，总共也只是785 400人。

德意志帝国在动员令下达11天

以后，就有基于步兵.....	490 480 人
过两三天，接着又有148个营.....	155 400 人
再过14天又有后备军287个营，	
每营800人，共计.....	229 600 人
再过14天，又有民军234个营，	
每营800人，共计.....	187 200 人

单是步兵总共就有.....1 062 680人，

他们在平时就已经完全编制好了，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事先就安排好了，并且在后方还有148个预备营，人数(见前面)为188 690人，被用来补充战斗中所遭受的损失。总而言之，已经编制起来的步兵总数为1 251 370人。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夸大了。绝对没有。我们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全部摆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提到各种细小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下面就是证明。

在 1874 年 12 月 27 日的“科倫日报”上有一篇来自陆軍部的“軍事消息”，从中我們获知了如下情况。在 1873 年底，德国軍隊在战时的人数为 1 361 400 人，其中

步兵共計.....	994 900 人。
1874 年，加上了第四营.....	155 400 人
和民軍 234 个营.....	187 200 人

全部步兵共有..... 1 337 500 人，

可見，比我們計算的几乎多 10 万人。这篇文章确认各兵种部队的总人数为 1 723 148 人，其中軍官 39 948 人；相反地，法国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事先編制起来的部队 95 万人，其中步兵 785 000 人！

至于这些部队的素质，那末，假定这两个民族平均的軍事才能是相等的，法国軍隊的素质从最近这次战争以来肯定沒有提高。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来使部队士气涣散，特别是因为它让部队都住在营棚里，在那里一到冬天兵士既不能訓練，也不能做別的事，可以說专门是让他们們痛飲苦艾酒。缺少士官，各連人数不足，各騎兵团早就沒有配备到足够数量的战馬。早在 1 月 14 日，“北德总汇报”就強調指出了这一点；当时这家报纸还在鼓吹和平呢！

但是，新的軍事立法让法国陆軍部长統率：常备兵 704 714 人，后备部队 510 294 人，地方部队 582 523 人和地方部队的后备部队 625 633 人，总共 2 423 164 人，必要时可以达到 260 万人！誠然，勒瓦尔將軍在仔細研究了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以后宣称，應該把这个数字压縮到 2 377 000 人。但是，就是这个数目也已經完全足以使一个即使是最优秀的陆軍部长大伤脑筋了。請問他拿这一大批几乎有三分之二沒有受过訓練的人員怎么办呢？哪里能找到軍官

和士官呢？而沒有軍官和士官，他就無法訓練這些兵士，更不用說把他們組織起來了。

德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僅僅根據帝國軍事法的規定，戰時的軍隊人數就已經有 150 萬人。但是，由於實行這個法令的結果，這裡還要加上兵役期限延長到 27 歲至 31 周歲的補充兵的各種役齡的適齡人員，——每年 45 000 人，總共就有 20 萬人左右。除了被列入戰時人員的人以外，至少有 20 萬編外人員已經事先被登上名冊了。這裡還要加上整整 200 萬民軍，因此歸德國陸軍大臣統率的就有 390 萬人，甚至是 400 萬人，而且據上述那家半官方報紙聲稱，這支軍隊，

“即使再征召 180 萬人或更多的人，並且不算列入預備軍的新兵，也將完全由服役過的並且在軍事方面深有素養的兵士組成，而在法國，包括地方部隊的後備部隊在內，只有 20 年以後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軍國主義的真正代表並不是法國，而是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400 萬兵士，居民的百分之十！只須指出一點：如果這整個制度達到了最大限度，那可能對我們有利。這個制度不是從外部，不是依靠某一個別的戰無不勝的軍事強國，而是只有從內部，通過它自身的必然後果，才能徹底摧毀。越是毫無邊際地吹噓這個制度，這個制度就必然垮台得越快。400 萬兵士！如果俾斯麥把這個數目擴大到 500 萬或者 600 萬，然後一有機會就開始征召少女的話，社會民主黨人也會感激他的。

弗·恩格斯寫於 1875 年 4 月

載於 1875 年 4 月 23 日“人民
國家報”第 46 號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國家報”

弗·恩格斯

“論俄国的社会問題”^①一书导言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迫同一位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先生进行論战时写的。在一篇評論倫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的文章(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第118号)中,我曾經附带提到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但是,这一提却惹起了他对我的可敬的愤怒。特卡乔夫先生立即发表了一封“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于苏黎世),在这封信中,他給我胡謔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針对着我的极端无知,談出了他自己对俄国实际状况和社会革命前途的看法。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內容都帶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該信是用德文发表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它做一个答复(見“流亡者文獻”第4篇和第5篇,1875年“人民国家报”第36号和以后几号)。我的答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文字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一大堆簡直是胡說八道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对这个主要是个人方面的部分已經談得很够了。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略去,而在根据出版社的意見出版的单行本中只留下了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

① 見本卷第610—623頁。——編者注

探討 1861 年以來，即所謂農奴解放以來俄國的社会狀況。

俄國事態的發展，對德國工人階級有極大的意義。現在的俄羅斯帝國是西歐整個反動勢力的最後一根有力支柱。這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已經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來了。由於德國不肯支持波蘭起義並同沙皇作戰（像“新萊茵報”一開始就要求的那樣），以致這個沙皇能夠在 1849 年鎮壓了已經迫近維也納大門的匈牙利革命，而在 1850 年又在華沙裁判了奧地利、普魯士和德意志各小邦並恢復了舊聯邦議會。就在不久以前，即 1875 年 5 月初，俄國沙皇正像二十五年前一樣，接受了他的柏林藩臣們的效忠宣誓，從而證明了在今天他也還是歐洲的仲裁人。西歐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還存在着現代俄羅斯國家，就不能獲得徹底勝利。而德國却是同俄國最近的鄰國，因此俄國反動派軍隊的第一個衝擊便會落到德國身上。因而，俄羅斯沙皇制度的復滅，俄羅斯帝國的滅亡便成了德國無產階級取得最終勝利的首要條件之一。

但是，它的復滅絕不能從外部引起，而外部戰爭只可能大大加速它的復滅。沙皇帝國內部具有在大力促使它滅亡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波蘭人。他們經過百年來的壓迫，已處於這樣的境地：或者起來革命，支持西歐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義，作為解放波蘭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滅亡。現在他們恰好處於這種境況，即只有在無產階級陣營里他們才能為自己找到西歐盟友。近一百年來，他們經常被西歐的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出賣。在德國，資產階級一般地只是從 1848 年起才算數的，但是從那時以來它始終敵視波蘭人。在法國，1812 年拿破侖出賣了波蘭人，而由於這次背叛，他的遠征失敗了，皇冠和帝國都丟掉了；資產階級王國在 1830 年和 1846 年，資產階級共和國在 1848 年，第二帝國在克里

木戰爭期間和在 1863 年都效法了他的榜樣。它們都同樣卑鄙地背叛了波蘭人。就是現在，法国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共和派還仍然匍匐于沙皇面前，希望用一次對波蘭利益的新出賣來換得一個反普魯士的復仇的同盟，正好像德意志帝國的資產者把這同一個沙皇當做歐洲和平的保護者，也就是說把他當做德普持久合并的庇護者來崇拜一樣。除了革命工人而外，波蘭人不論在哪里也找不到公開的和真誠的支持，因為共同敵人的復滅對他們兩者都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因為波蘭的解放就意味着這個敵人的復滅。

然而，波蘭人的活動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這種活動只限于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俄羅斯帝國的真正核心——大俄羅斯——幾乎完全處于這個活動之外。4 000 萬大俄羅斯人是一個非常大的民族，而且經過了非常特殊的发展，所以不能從外面把任何一種運動強加給他們。而這樣做也完全沒有必要。的確，俄国的人民大眾，農民，千百年來世世代代地在脫離历史发展的泥坑中愚昧地過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使得這種單調的沮喪狀況中斷的唯一變動，便是零星的毫無結果的起義，以及貴族和政府的新壓迫。這種脫離历史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過廢除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農奴制度以及實行徭役贖買——這個辦法實行得非常狡猾，它使大多數農民以及貴族遭到了必不可免的破產，——把它結束了（1861 年）。由此可見，俄国農民現在所處的環境本身，正推動他們投身到運動中去，這個運動誠然在目前還剛剛產生，但是，隨着農民群眾的狀況日益惡化，它將不可遏止地不斷朝前發展。農民的憤恨不滿，現在已經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滿意的人和反對黨都不得不予以重視的事實了。

因此，下文中說到的俄国，不是指整個俄羅斯帝國，而是專門

指大俄罗斯,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南的省份是庫尔斯克和沃龙涅什。

弗·恩格斯写于 1875 年 5 月

載于弗·恩格斯“論俄国的社会問題”1875年萊比錫版和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論俄国的社会問題”譯的,并根据 1894 年版本校对过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弗·恩格斯 关于德国的札記⁴⁷³

1. 导言。1500—1789年

1. 到十五世紀末德国愈来愈分裂了，它的中央愈来愈衰落，而这时法国和英国已經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形成了民族。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迟于那些經過征服的国家；（2）德国包括有一些法兰西人和斯拉夫人的地区，而且它把意大利視为自己的财产，把羅馬視为自己的中心，因而它不是一个民族綜合体；（3）因为，——这是主要的，——各个省以及一部分省和另一部分省之間是完全隔絕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往来等等（参看“农民战争”）。汉撒同盟、萊茵城市同盟和士瓦本城市同盟就是自然形成的、但彼此分散的集团的代表。

关于第一点。西班牙、法国、英国在十五世紀末都已結合为形成了的民族国家。这种統一对于十五世紀說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西班牙——卡塔卢尼亚族和加斯梯里亚族的統一，葡萄牙——伊比利安的荷兰——由于航海业的发达为自己爭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法国——由于王室的王朝权力，逐渐把民族納入自己的軌道。英国由于蔷薇战争消灭了上层貴族而統一起来了；英国之所以能实现統一，只是因为它被迫放棄了像德国人远征羅馬那

种对法国的唐·吉訶德式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会使它一蹶不振,就像远征罗马使德国一蹶不振一样。)德国内部虽然缺乏经济联系,但本来还是会实现而且甚至还可能更早实现(例如,在奥托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其所以没有能实现,是因为:第一,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得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其后果在奥地利一直到1866年仍然在起作用!),——况且德国的利益总是被出卖而遭到破坏;第二,皇帝要由选举决定,这就绝对不容许一个王朝的权力成为民族的体现,相反地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尤其是在有决定意义的十五世纪——王朝的更替。——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存在过经济上的分散状态,但被用暴力克服了。

在中世纪,皇帝为反对教皇而进行了“文化斗争”,结果既造成了德国的分裂,也造成了意大利的分裂(在意大利,教皇权力是民族统一的障碍,但它总是经常装成民族统一的代表,然而尽管如此,但丁却仍然认为意大利的救星是外国皇帝);从1500年起,当教皇还是一个势力不太大的诸侯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领地把意大利分割开来,使得它的统一事实上无法实现。

2. 但是不管怎样,由于贸易的自然发展,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以及法兰西人地区和意大利的丧失,德国本来是能够合而为一的,因为世界贸易的道路通过德国境内,但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1)德国市民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由于时代精神的缘故,这个革命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宗教改革。但是真糟糕!如果没有帝国骑士等级和农民,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但

是，所有三个等級的互相矛盾的利益起了阻碍作用：騎士——城市的經常掠夺者（見蒙果德·馮·艾伯施坦的著作）和农民的压迫者；城市也狠狠地剝削农民（烏尔姆市委員会和农民！）。最先起义的是帝国騎士，但是，由于資产者背棄了他們，所以遭到了彻底失敗。继他們之后农民也起义了，然而市民們却直接反对他們。与此同时市民們的宗教革命在极大程度上被閹割了，于是不得不迎合諸侯的胃口，而领导作用也就轉到諸侯手中去了。——十六世紀德国革命的特殊的神学-理論的性质。主要是注意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摆脱貧穷不堪的現实，这就是后来德国人在理論方面（从萊布尼茨到黑格尔）占优势的基础。

（2）世界貿易的道路从德国移开了，于是德国好像被排挤到了穷乡僻壤；这样一来資产者 *dito* [以及] 宗教改革的力量被破坏了。

（3）結果是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誰的領土就信仰誰的宗教] 和德国实际上的分裂，主要是分裂为信仰新教的北部和形形色色的信仰都有、但主要信仰天主教的西南部以及純粹信仰天主教的东南部。这里已經留下了 1740—1870 年的恶性发展（普魯士，北部和南部的分裂，最后，小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根源。法国的相反的过程。对胡格諾教徒的镇压（見“札記”第 2 頁）^①。

3. 德国既然注定了要陷于消极和退步，因此政局的变动对它的工业方面的影响必然比对工业方面积极的和先进的国家的影响大。（这一点应当用一般形式予以發揮。）分裂成两个陣营这一事实把內战提上了日程。列举 1648 年以前的历次战争——純粹是內战。法国人利用局势，吸引信仰新教的諸侯和德国雇佣軍加入同盟

^① 見本卷第 653—654 頁。——編者注

并給它們以報酬。頂点——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期間德国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的德国人——在1693年和1806年。对浩劫的評述。經濟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向法国的让步;瑞典和丹麦之闖入德国;做保证者的强国进行干涉的权利;中央政权的彻底衰落;欧洲向德国諸侯們保证的反抗皇帝、进行內战和背叛祖国的权利。

4. 1648—1789年。

a. 德国的政治状况。德国諸侯們靠威斯特伐里亚和約大发橫財,爭先恐后地把自己出賣給外国。而外国——法国以及諸侯們——則利用德国的軟弱逐漸把所有德屬法国領地攫为己有并整化亚尔薩斯的疆界。法国的历史权利和条頓人就“掠夺”所掀起的叫囂。語言疆界仍未改变,大約从1000年起,只是佛日山脉以西地区除外(見門克修訂的地图)。这是一般情况。尤其是在北部一个与奥地利和帝国竞争的国家——普魯士的兴起。分裂为北部和南部的迹象开始表現出来。对普魯士历史的批評。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兴起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对俄国政策的依賴。內战——現在这是竞争对手: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战争。

b. 經濟状况。由于这一切,慢慢地摆脱三十年战争的后果和市民阶级企图重新向上爬。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靠寡廉鮮耻的善行才能重新兴起。現在經濟进步只有通过政治干涉,通过諸侯的可耻行徑和他們从国外得到的賞錢才能实现。这一切证明,德国在經濟上經歷着多么严重的衰落。这一时期——宗法制度的由来。1648年以后国家真正負起了履行社会职能的使命,它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財政方面的困难。凡是沒有这样做的地方——停滞不前(威斯特伐里亚的主教管区)。奇耻大辱!这种国家帮助多么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場的关系純粹是消极的。只有作为中立的一方才

能在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中牟利（1801年前的美国戰爭和历次革命戰爭）——然而在強盜國家面前完全軟弱無力（由于法國革命，德國在歐洲的這種可耻地位才告結束）。

c. 文學和語言完全衰落了；神學僵死的說教；在其他科學領域內德國也退化了，但是有時也發出些閃光；雅科布·伯麥（未來哲學家的先驅者），刻卜勒，萊布尼茨。重新從現存的、實在的事物中進行抽象。巴赫。

d. 1789年德國的狀況。（a）農業——農民的狀況。農奴的依附地位，體罰，租稅。（b）工業——簡直處在極端貧乏的狀態，手工勞動占優勢，而在英國，大工業早已開始發展，德國工業則還沒有來得及充分發展就註定要滅亡。（c）在貿易方面——逆差。（d）市民在對貴族和政府的关系上所處的社会地位。（e）對發展的政治上的障礙——分裂狀態；門克的描述。關稅，內河航行的障礙。由于分裂狀態而被限制在內部疆界範圍內的 free trade [自由貿易]。賦稅——這主要是城市的消費品稅。

德國諸侯中即使是像舒巴爾特的保護者們和卡爾-奧古斯特這樣開明的人，也做不出什麼好事情來，他們所有的人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寧願參加萊茵同盟，而不敢進行戰爭。1806年的入侵就是證明，那時刀子已經對准他們的咽喉。並且這一千諸侯中每一個都是專制君主，粗暴、野蠻的惡漢，從他們那里根本不能期待什麼共同行動，然而荒誕的想法却層出不窮（施略策爾）。美國戰爭期間買賣新兵的交易。——但他們的最可耻的行徑是他們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而與他們并存的，在東部疆界有北方的普魯士，南方的奧地利，它們向新的領土伸出貪婪的手。假如這兩個國家中只有一個存在，那就是還能夠拯救局勢的唯一的國家。但它們之

間的不可避免的競爭排斥了任何出路。真正的絕境：幫助只能來自外部——法國革命帶來了幫助。只有兩個方面還有生命的迹象：一方面是軍事學術，另一方面是文學、哲學和嚴肅認真的客觀的科學研究。法國在十八世紀時，政治作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已經占多數，——而德國却是一味逃避現實，躲進理想的領域。“人”的觀念和語言的發展；在 1700 年——野蠻狀態，1750 年——萊辛和康德，其後不久——歌德、席勒、維蘭特、海德；亨德爾、格呂克、莫扎特。

1789—1815 年

1. 德國在亞爾薩斯—洛林等領土上的、已經有一半被法國控制的 enclaves^① 附和了法國革命——由此產生了戰爭的借口。普魯士和奧地利現在突然一致起來了。瓦爾米。綫式戰術由於大量使用炮兵而破產。弗略留斯和熱馬普。奧地利的警戒綫戰術的破產？萊茵河左岸的占領。農民和愛好自由的城市的狂喜；即使是某些敲詐勒索事件和拿破侖的血稅也都不能打消這種狂喜。——亞眠和約和帝國代表團。主要結果：德意志帝國的取消；萊茵同盟。拿破侖掃除了許多德意志小邦，但這一清掃，可惜還遠遠不夠。他對於諸侯們總是扮演革命的角色，而且如果小邦諸侯不是向他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他還會走得更遠。1806 年。——拿破侖的錯誤在於，他沒有徹底消滅普魯士。大陸封鎖時期德國的經濟狀況。——這個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時期，正好是文學和哲學的光輝燦爛的發展時期，是以貝多芬為代表的音樂的繁榮昌盛的時期。

^① 嵌入別國領土中的屬地。——編者注

“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个手稿摘要

在胡格諾教徒战争期間，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受到那样大的尊重，以致只有国王同外国訂立的同盟和关于軍事援助的条約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为輿論所承认。其他人在社会輿論看来总是叛乱者和叛徒。亨利三世逝世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那时亨利四世只是靠了国王称号的影响才获得了最后胜利。

在法国彻底镇压新教对它說来不是坏事——teste〔見证人〕有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然而在德国镇压新教則不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如果这样，德国就会被强迫接受罗曼語各国的天主教发展形式；既然英国的发展形式也带有半天主教和中世紀的性质（大学和諸如此类的学院，公立学校——所有这些都是新教寺院），那末完全带有新教性质的德国教育形式（家庭教育、私人寄宿学校、大学生旁听制）也都会被廢除，而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調；法国和英国实际上消除了成見，德国摆脱了这些成見的形式，摆脱了陈規旧套，这种情况是使得德国的一切在現在看来具有更大缺点的东西（如分裂为許多小邦）沒有固定形状的部分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說来有巨大的好处；只有在将来，当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被克服之后，它才会結出丰硕的果实。

此外德国新教——这是基督教的唯一的值得加以批判的現代形式。天主教在十八世紀已經絲毫不值得批判了，它簡直成了論

战的对象(可見老天主教徒們多么愚蠢啊!);分裂为无数教派的英国新教沒有神学的发展,即使有,那也只是每一阶段都以創立一个新教派为形式的一种发展。只有德国人掌握着神学,并且由于这个緣故而拥有批判——历史学的、語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如果沒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說从历史上來說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連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底—1874年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年版第10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

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
狀態”一書摘要⁴⁷⁴

卡·馬克思寫於 1874 年—1875 年初

第一次發表於 1926 年“馬克思主義
年鑑”雜誌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导言。第一部。1873年”^①

(在这个标题后第1頁上写着：国际工人协会內的斗争(Борьба)。)

“序”

“在意大利也像在俄国一样，这样的青年人数量相当多，比任何別的国家都多得无比。”(第7頁)

“是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临近。”(第8頁)

“在意大利，赤貧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德国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赤貧无产阶级都抱着极端蔑視的态度，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那种工人群众的资产阶层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第8頁)

但是，在德国人那里却相反：在他们那里，政府

一方面可以依靠精良的和具有其他素质的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忠君的爱国主义、民族的无限的虛荣心以及古老的、历史的、同样是无限制的、对政权俯首听命和敬之若神的心理，这都是德国貴族、德国小市民(bourgeoi-

① 在这部摘要中，凡是馬克思从巴枯宁的著作中直接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普通引号(“ ”)；凡是馬克思在摘录时，翻譯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 》)。——編者注

sie)、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的特点,而在他們的共同影响下——真可叹啊!——往往連德国人民本身也具有这一切特点”(第11頁)。

“原来普魯士鯨吞了德国。这就是說,只要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所謂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普魯士都必然是欧洲各种各样的专制制度的头等的和主要的代表与經常的根源。”(第11頁)

从十六世紀中叶起到1815年,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根源是奥地利(id est [即]德国的代表);从1815年到1848年,奥地利和普魯士分立,其中前者(梅特涅)占居优势(第12頁);“从1815年起,我們的韃靼-德意志的、全俄罗斯皇帝的鞭子,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狩猎者而不是以生意人的身分,参加了这个純粹德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第13頁)。

为了推卸責任,德国人竭力使自己和別人相信,神圣同盟的主謀者是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領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国家。和他們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首先完全破坏我們的〈俄罗斯〉国家》等等(第13頁)。

为了真理,“而不是希望为彼得堡內閣的政策做辯护”(第13頁),巴枯宁給德国人做了如下的答复。这位偉人甚至沒有提到叶卡特林娜在位时期結盟的事和从革命时期起包括路易-菲力浦时期在內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对法国的影响,更不用說从彼得一世时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普魯士的事了。他也沒有提到从十八世紀以来俄国同英国一起为了奴役欧洲而策划的阴谋。他从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开始,对他們的活動做了如下的描述:

“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異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額、盛气凌人。但是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他們一事无成……因为他們无能为力,由于他們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德国人不允許他們有所作为;他們只能起稻草人〈bange machen〉的光荣作用,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魯士和”《在它們领导下并得到它們允許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第13、14頁)。

俄国只有一次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在1849年，为的是把奥地利从匈牙利革命中拯救出来。此外，在本世纪，它曾经在普鲁士的帮助下两次扼杀了波兰革命，因为普鲁士同俄国一样与此是有利害关系的。当然，“没有波兰的独立和自由，人民的俄国是难以想像的”（第14页）。

俄国无论在智力、实力或财力方面在欧洲都不占有能用呼声来“解决问题”的优势地位（第14页）。

只有当某个西方大国叫俄国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俄国才能有所作为。（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叫叶卡特林娜去瓜分波兰，几乎还瓜分了瑞典。）

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俄国在普鲁士政治家们手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往往还起着帷幕的作用，他们利用这种帷幕巧妙地把自已侵略和反动的行径掩盖起来。他们在不久前获得了那些胜利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了，也就不再这样做了（第16页）。

住着俾斯麦的柏林是现在欧洲反动派的有目共睹的首脑和首都（第16页）。反动派（罗马天主教的反动派）在罗马有，在凡尔赛有，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也有一部分；在俄国有鞭子反动派；但是有生气的、“聪明的”、真正“强有力的”反动派却集中在柏林，并且从新的德意志帝国向欧洲的所有国家扩张等等（第16页）。

“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它们^①的本质相对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第17页）

可是，代议制民主（*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结合了它们成功的两个条件：“国家集中制，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第17页）

“我们的鞭子—德意志帝国的实质。”（第14页）

新的德意志帝国是好战的：它一定要征服别国或者被征服（第17—18页）：

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成为全球国家的意图”（第18页）。领导权只是这种意图的委婉的表现；这种意图的条件，是至少它周围的一切国家都软弱无力和表示服从。起这种作用的，过去是法兰西帝国，而现在则是

①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银行投机活动。——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我們确信，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唯一真正的国家”（第19頁）。

国家 (Empire, Royaume [帝国、王国]); **統治者** (souverain, monarque, empereur, roi [元首、君主、皇帝、国王]); 进行統治 (régner, dominer [主宰、統治]); 統治者 (souverain, empereur, monarque, roi)。(相反地, 在德語中 *Reich* [国家] 最初无非是以所屬的民族、居民的名称命名的, 有一定界限的一个地区 (大的或小的)。例如: 菲希特莱希就是从上普法尔茨的雷根河至菲希塔赫那块地区, 阿赫納萊希, 弗兰克里克 (尼德兰境内), 尼姆韦根萊希, 麦根萊希, 摩塞尔河畔的特拉尔巴赫区至今还称为格勒維萊希, 摩塞尔河畔的另一个地区称为威斯特里希。)

法兰西的“国祚”已尽了; 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人, 都会像我們 (巴枯宁) 一样清楚, 既然法国过去长期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 那末現在它絕不会甘居次等的、甚至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法国将准备新的战争, 报仇雪耻, 恢复丧失了的 *первенство* (首位) (第19頁)。但是它能否如願以偿呢? 絕对不能。最近的事件证明, 爱国主义这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 (*эта высш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在法国已經不复存在了 (第19頁)。各上等階級^①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虛荣心, 但是, 正如最近这次战争所表明的, 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些階級可以牺牲这种虛荣心。法国农村居民同样也很少表现出爱国主义来。农民一旦成为私有者, 就不再是爱国者了。只有在亚尔薩斯和洛林, 好像是为了嘲笑德国人, 法国的爱国主义才表现出来。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階級身上保存了下来。正因为如此, 所以各有产階級都对它恨之入骨。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爱国者, 因为他們以社会主义态度待人 (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 并且已經开始武装起来, 但不是要反对德国人民, 而是要反对德国的軍事专制制度 (第20—22頁)。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 战争便开始了, 国际的宣傳“特別”在“拉丁部族”的工人中間激起了新的反爱国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 “各上等阶层”。——編者注

主义世界观（第 22 頁）。1868 年在維也納群众大会上，为了回答《南德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的和爱国主义的“建議”，也表現出了这种新的世界观。《工人们回答说，这些人剝削他們、永远欺騙和压迫他們，全世界的所有工人都是他們的兄弟。国际工人陣营是他們唯一的祖国；国际剝削者世界是他們唯一的敌人。》（第 22、23 頁）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們曾給作为“全世界工人解放”先鋒的巴黎兄弟們拍了一封电报（第 23 頁）。这个答复在德国引起了許多喧囂；吓坏了所有市民民主派，包括約翰·雅科比，它《不仅侮辱了他們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侮辱了拉薩尔和馬克思学派的国家信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ера）。現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脑之一，但当时还是市民民主党（寿終正寢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內西先生，大概是遵照馬克思的意見，立即从萊比錫前往維也納，以便就为这次爭吵造成口实的**政治上的冒失行为**同維也納工人进行談判（переговор）。應該为他說句公道話，他的活动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即在 1868 年 8 月，在德国工人紐倫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全体代表都毫无異議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狹隘的爱国主义綱領上签了字》（第 23、24 頁）。这就暴露了《这个党的多少有点学問的、资产阶级的領導人的政治方向同德国的**或者至少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之間存在的深刻的差別**》。誠然，从 1868 年以来，这种本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很少得到发展，可是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特別是在法国，却有了了不起的发展（第 24 頁）。法国工人意識到，他們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是在为全世界而工作（第 25 頁），《而且更主要地是为世界而不是为自己》（第 25 頁）。这种梦想（эта мечта）《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且把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从它的想像和心灵中驅逐出去了》（第 26 頁）。法国无产阶级号召拿起武器来，它确信，它既是为德国无产者的也是为他們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第 26 頁）。《他們不是为了尊严和荣誉，而是为了战胜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奴役他們的工具的可恨的“軍事力量”而斗争。他們所以憎恨德国軍隊，并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是軍隊。》（第 26 頁）反对凡尔赛国民議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充分表現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热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等等說来，只有社会革命战争还存在（第 27 頁）。在社会革命热情的促使下，《他們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廢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的国家統一**。德国人仅仅縮小了他們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сила），而他們却想使

它彻底 *убить* (丧命), 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 他們把作为法国荣誉的雄偉紀念碑旺多姆圓柱毀为廢墟》(第 27 頁)。

“于是, 一方面是国家, 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第 29 頁) 在法国, 这个斗争最为坚决; 在农民中間, 至少在法国南部也已如此(第 30 頁)。《正是两个目前不可調和的世界的敌对对立, 是使法国不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第 30 頁) 当梯也尔宣布普魯士軍隊撤退时, 凡尔賽交易所、資产階級等都完全不知所措了(第 31 頁)。“可見, 法国資产階級的奇怪的爱国主义认为挽救自己的办法是让祖国可耻地屈服。”(第 31 頁)

《法国工人对西班牙革命的同情現在表現得非常明显, 特別是在法国南部, 那里表現了无产階級力图 and 西班牙无产階級进行兄弟般的联合, 甚至和他們結成以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联邦的明显意願。》

Народ, 人民, 民族(*natio, nasci* [生育、誕生]), 某种天生的东西, 誕生。

——《我說, 尽管有民族差別和国界的限制, 这些同情和意願证明, 无论对于法国无产階級本身, 还是对于特权階級說来都是一样, 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第 32 頁)

像法国“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肓的国家, 哪里能够同年輕的、至今仍然强壮的德国相抗衡呢?”(第 33 頁) 任何一种国家形式, 即使是社会民主共和国, 都不能給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 《即沒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預、监护、暴力的, 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снизу вверх*)、自由的(*вольный*——任意的, 而且也是毫无拘束的)組織, 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制度(*государство*), 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 甚至“馬克思先生想出来的所謂的人民国家”(*мнимо-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識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第 34、35 頁)。

因此, 由于有产階級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滿足, 人民便只有一种手段, 即国家暴力(*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силие*), 一句話, 就是“国家”, 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violence, véhémence, force* [暴力, 暴虐行为, 强力]), 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是肆无忌憚的暴力的統治”等等(第 35 頁)。

在这里甘必大也是无能为力的;(法国)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殊死斗争《要求使用国家的(政府的)全部措施和力量,可是法兰西国家已沒有任何措施和力量来維持它在欧洲各国間的表面上的优势》。“它哪里能够同俾斯麦的帝国爭雄!”(第 37 頁) 法国應該服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領導,接受友好保护的影響,正如意大利国家曾經服从法兰西国家的政策一样(第 37、38 頁)。

英国: 影响大大縮小了。下面的話是有代表性的,

“在三十年以前,它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容忍德国人占領萊茵河各省、俄国在黑海恢复优势、俄国人出征希瓦。”(第 39 頁) 作出这种让步等等的原因是:工人世界同剝削的、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世界的斗争(第 39 頁)。在那里社会革命正日益临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什么可說的,它們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它们沒有物資,而是因为“人民精神”把它們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第 39 頁)。

順便指出: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侖的人民战争时期重新觉醒了,这场战争本身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的。在 1812 年和 1813 年,在德国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只是当拿破侖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后,才有人发动起义。只有提罗耳是例外(第 40、41 頁)。

同时:

“我們看見,拥有財產就已經足以使法国农民腐化墮落,并且扑灭他們心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第 42 頁) 在德国(1812—1813 年),年輕的公民們,或者更确切地說,被哲学家和詩人們策动起来的臣民們(верноподданные),曾經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在德国产生了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然而,西班牙人民却个个(поголовно)奋起,再一次捍卫(отстоять)“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生活”的独立,抵抗殘暴强大的奴役者(第 43 頁)。从此以后,一切形式的政府——专制的、立宪的、保守共和主义的等等,甚至类似瑞士的那种小資產階級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在西班牙都遍試无效(第 43 頁)。

《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真正地掌握(控制)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勒馬杜腊的农民既沒有向任何人請示,也沒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取了以前地主的土地。卡塔卢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使革命服从制宪議會未来的命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控制的北方,也发生了显然的社会革命:宣布实行 *fueros* [自治特权] (*фуэросы*), 宣布各省、市鎮独立,燒毀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契約;軍隊在西班牙全国各地都与人民握手言欢,把自己的軍官赶走。社会經濟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普遍的,公众的和私人的破产开始了。》(第 44 頁)《再也沒有財政、軍隊、法庭、警察;沒有国家势力,沒有“国家”;只有目前仅仅被社会革命热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蓬勃的 (*свежий*) 人民。在国际和社会革命者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团結和組織自己的力量等等。》(第 44 頁)

在意大利人民中間只保存着一种活傳統,即不仅 *области* (省、行政区、郡) 而且市鎮 (*общины*) 也实行絕對自治。在“人民”中存在的“唯一的政治概念”中,还包含有历史人种学方面的“省的非同类性”,因为各省操不同的方言,甚至一个 *область* (*en passant* [順便說一下]), 也意味着权力、力量) 的人都难于互通語言,有时根本不懂其他“地区”的人說的話;但是意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并不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有一种“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至南方部族的人区别开来(第 45 頁)。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結果必然会出现“自由社会的联合”(第 46 頁)。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

相反地,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剝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現在正在日益发展。这个阶级現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軍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銀行家,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議會(第 46 頁)。

然而甚至最可怕的貧困(貧穷),甚至伤害到“数以百万計的”无产阶级的貧困,也还不是革命的充分的保证 (*залог*)…… 当人(一群人)被弄得陷于絕望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起来暴动…… 在絕望中甚至德国人也将不再是滔

滔不絕的說教者了，但是要使他陷于絕望，要求有非常多的因素…… 無論“貧困”还是“絕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騷动”，而并不足以席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必須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从“人民的本能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还有对自己权利的信仰（вера），“可以說，对这种权利的宗教的信仰”。

后者同貧困和絕望一起就是社会革命的良方（第 47、48 頁）。

《意大利人民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第 48 頁）

正是国际（即同盟！）特別在最近两年（1872 年和 1873 年）中，以这一理想的产婆的身分在意大利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活动。

“它^①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們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組織人民力量的途徑和手段。”（第 48 頁）

《絕妙的是，“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綱領”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順利），相反地，在那里人們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пресловутый）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統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綱領。》（第 49 頁）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根据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絲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第 49 頁）

因此，既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认同盟的綱領，那末，它們就离社会革命不远了，也用不着担心来自它們方面的侵略政策了（第 49 頁）。

《各个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可見，正是由于他們接受了同盟的綱領！），

《但主要地》，由于他們《在政治上无足輕重》，不威胁任何人（第 49 頁），相反地，却有許多理由要《担心受新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第 50 頁）。

① 国际的宣傳。——編者注

奥地利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夫。它分为两个国家：馬扎尔—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斯拉夫国家（第 50 頁）。德国人想統治后一个国家。

《德国人是“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們可以說是生来就是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一方面以自己所謂的文化优势作为他們高傲自大的依据。》（第 52 頁）近年来德国人被迫承认馬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居住在奥地利帝国境內的“一切部族当中”，除德国人以外，馬扎尔人是“最具有国家观念的人民”（第 52 頁）；他們声明他們享有統治那些和他們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境內的其他各部族的历史权利，虽然他們自己只占該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馬扎尔人 550 万，斯拉夫人 500 万，羅馬尼亚人 270 万，犹太人和德意志人 180 万，其他“部族”約 50 万人，共計 1 550 万人）（同上）。于是，奥匈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有 2 050 万人口（德意志人和犹太人 720 万，斯拉夫人 1 150 万，意大利人与其他“部族”約 180 万）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息斯萊达尼亚部分；和馬扎尔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部分（第 53 頁）。

在匈牙利，

《受馬扎尔人統治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喜欢馬扎尔人，这些居民違反心意地忍受着他們的压迫，因此便經常不断地产生斗争》（第 53 頁）。馬扎尔人害怕羅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就同俾斯麦結成秘密同盟，俾斯麦《預見到反对注定要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必不可免，便“奉承討好”馬扎尔人》（第 54 頁）。

在息斯萊达尼亚帝国，事情并不見得好些。

在那里德意志人想統治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憎恨斯拉夫人，就像老爷通常憎恨自己的奴隶一样》（第 54 頁），害怕他們获得解放等等。《像一切侵占別国領土、征服別国人民的人一样，德意志人在同一个时期里完全“不公正地”既憎恨又鄙視斯拉夫人。》（同上）普魯士的德意志人指責奥地利政府，主要是說它不能把斯拉夫人德意志化。《他們相信，这是反对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利益、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滔天罪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第 55 頁）（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为了和这个泛日耳曼主义相抗衡，奥

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兰人以外都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同样《令人讨厌的荒谬东西》、这种《反对自由、残害人民的理想》(第 55 页)。

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注中巴枯宁先生威胁说,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只是号召俄国的革命青年反对这一点:他承认,有俄国密探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要斯拉夫人相信,沙皇打算把他们的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这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把莫拉维亚和整个波希米亚出卖给俾斯麦,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援助俄国的许诺的时候》。

在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竟然有由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组成的整个阶级期待俄国人来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国沙皇的大国下面建立伟大的斯拉夫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第 57 页)

这只是表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恶的德国文明侵蚀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完全成了德意志人,虽然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们希望,他们想通过德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德国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用成立几个斯拉夫国家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的方法,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解放。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集中制的、官僚的、警察-士兵的“最新式国家”乃是纯粹德国的“产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第 57 页)。

《斯拉夫人按其全部本性,按其全部实质说来,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部族。捷克人提到(поминают)自己的大莫拉维亚王国,塞尔维亚人提到自己的杜善王国,都是徒然的。这一切都是曇花一现的现象或者古代的神话。真实可靠的是,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本身都没有建立过“国家”。》(第 57 页)

波兰君主共和国:

是斯拉夫人民(холоп——农奴、奴僕)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以后在日耳

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許多波兰的历史学家，例如“米茨凱維奇”认为，波兰貴族并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第 58 頁)。

波希米亚(捷克)国家:

是按照德国的模型和样式，在德国人的公开影响下粘合而成的，因此它很早就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部分。

俄罗斯帝国:

韃靼人的鞭子、拜占庭的祝福(благовословение)、德国式的官僚軍事和警察的教育(第 58 頁)。

《可見，毫無疑問，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們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使自已获利而損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理(управлять，也有統治的意思)的，沒有貴族，沒有特殊的祭司等級，大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各公社之間沒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抵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沒有任何斯拉夫“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一切斯拉夫部族之間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第 58、59 頁)。《在这种組織中，他們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大自己的統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是无力自卫的。》(第 59 頁)《斯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則被土耳其人、韃靼人、馬扎尔人、而主要的是德意志人征服了。》(第 59 頁)《从十世紀下半叶起便开始了他們痛苦的，但是也是英勇的受奴役的历史。》(第 59 頁)

《对于波兰說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руководящие партии)——至今主要是貴族分子的政党——还没有放棄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綱領，它們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謀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却固执古老的成見，忽而通过什么拿破侖的保护，忽而又同耶穌会教徒和奥地利封建主結成同盟，来謀求这种解放和复兴。》(第 61 頁)

在本世紀，西方的和南方的斯拉夫人也觉醒起来了；西方斯拉夫人的集

中点是波希米亚，南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塞尔维亚(第 61、62 頁)。

“国家”的最新表现是泛日耳曼帝国：《它的寿命屈指可数了，各国人民都期待着它垮台从而使自己能够彻底得救…… 德国人遭到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憎恨，难道斯拉夫人对此竟感到羡慕！》(第 63 頁)

英国对这个人物、这个咖啡馆里的政客说来是不存在的，——英国，这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顶峰。

或者不要任何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吞没一切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第 64、65 頁)。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对抗(第 66 頁)。北美联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大洲大陆上，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相毗邻的，没有一个像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因此，为了抵抗正在“国家主义的”或政治的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泛斯拉夫“国家”。

“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遍的斯拉夫人的奴役制(第 67 頁)。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斯拉夫人在数量上几乎比德国人多三分之一。然而，泛斯拉夫国家在实力和真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从来都无法和泛日耳曼帝国相抗衡。为什么？《因为在德国人的血液中，在德国人的本能中，在德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热情；而斯拉夫人则相反：《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会信服地(с убеждением)、自愿地忍受棍棒。他的自由正在于，他“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甘愿拜倒”在任何上司的脚下。而且，德国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们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的组织也达到了任何别的民族永远不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否想像在“国家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呢？》(第 68、69 頁)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

的。》(第 69 頁)《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 69 頁)

反国家的本性至今都是他們^①的弱点,現在却相反,对于目前的人民运动說来,这反而是他們的力量了(第 69 頁)。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們不受任何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执政的、政府的)干預,依靠自由經濟的、народные(属于人民的、公开的)союзы(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組織》的时刻即将来临(第 70 頁)。

《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性的事实,它和一切“现有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小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格、自己的風习,这种性格和風习正好(именно)构成民族性的实质、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結果和民族生活的一切条件的实质。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由此就产生了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第 70 頁)。

但是,由此不應該得出結論說,这个民族要提出自己的民族性作为“特殊的”原则,那个民族則要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們考虑自己越少,“包含”全人类的“内容”越多,那末,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越具有意义。》(第 71 頁)同样地,斯拉夫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和各民族的自由和睦的家庭中爭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第 71 頁)。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統的、有学問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願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創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却是“资产阶级經濟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 72 頁)

① 斯拉夫人。——編者注

这一段話很能說明巴枯宁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資本主义国家是反对政府的；其次，他认为德国同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中的差别不是由于世界貿易的条件改变所致，而是等等。

宗教改革(他只是 sub[从]宗教的 specie [观点] 来研究文艺复兴, 这也不坏)

《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經濟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向(特别是英国, 其次是美国)与专制“国家的”、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 (bürgerlich 这个詞对他說来既指資本主义, 也指德国中世紀的小市民) 和新教的方向, 虽然这种方向是同貴族天主教分子, 同完全服从“国家”的分子混合而成的。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初是奥地利德国, 后来是普魯士德国。》(第 73 頁) 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由理想奠定了基础, 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 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謊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到剝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剝削人民的基础上, 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 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第 73 頁)。

反对这一切意图的是一个新的方向, 它《直接通往》……巴枯宁(第 74 頁)。

因此, 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 75 頁)。《我們已經有机会提到, 1868 年維也納工人庄严声明国际友爱》(第 75 頁), 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綱領。但是奥地利工人沒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步驟, 《因为在第一步就被李卜克內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傳阻擋住了(拦住了), 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內西一起大概在 1868 年 7 月到了維也納, 其目的正是要引誘(誘使) 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 并把它导向政治宣傳, 以利于建立他們所謂的 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人民国家), 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話, 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 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謂合法的“人民宣傳”来实现罢了》(第 76 頁)。

《对于斯拉夫人說来，这就意味着甘願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違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願的（第 77 頁）。因此，我們不仅不打算劝說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們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內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領導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們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階級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結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來說，它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殘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 77 頁）

斯拉夫无产階級不仅不應該与这个政党結成同盟，而且應該疏远它，从而更紧密地靠攏国际工人协会。决不應該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談（第 77 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綱領同国际的綱領几乎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議，結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以外，誰也不要德国的綱領（第 78 頁）。

斯拉夫无产階級應該大批加入国际，成立支部，如有必要，也可以成立“全斯拉夫联合会”（第 78 頁）。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公國”：塞爾維亞人在从土耳其人統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压迫比土耳其的压迫更加沉重（第 79 頁）。它成了官僚“掠夺”和专制的牺牲品（同上）。在土耳其統治的塞爾維亞，沒有貴族，沒有很大的地主，沒有工业家，沒有非常闊綽的商人；形成了新的官僚貴族，他們大部分都是靠官費在敖德薩、莫斯科、彼得堡、維也納、德国、瑞士、巴黎受过教育的（第 79 頁）。

正如“克罗地亚人”、“門的內哥罗人”和波斯尼亚的塞爾維亞人一样，保加利亚人根本不願知道任何有关塞爾維亞的“杜善王国”的事情。所有这些国家只有一条挽救危亡和联合的道路——这就是社会革命，但是“决不是国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只能导致它們被俄国或奥地利之一或者被两国共同征服（第 86 頁）。

在捷克的波希米亞，幸而文采斯拉夫的王國和皇冠還沒有恢复；維也納的上司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省来看待，认为它甚至不能享受像加里西亞所享

有的那种特权，然而波希米亚的政党却和可爱的①斯拉夫“国家”的政党一样多。《的确，这种可恶的德意志的政客手腕和“国家制度”的精神严重地侵蚀了捷克青年的教育工作，致使他们终于“丧失”“了解本国人民”的可能性的严重危险。》（第86页）《在一切有斯拉夫居民和德意志居民杂居的奥地利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最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那些工人团体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因此，迷恋于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的斯拉夫工人，事实上被招募参加了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大规模的德意志“监狱”为自己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第88页）

他们应该承认巴枯宁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89页）。（属于汝拉联合会的苏黎世斯拉夫支部被推荐为专门的招募局（第89页注）。）

奥地利（结论）。

帝国仍然存在，只是由于普鲁士和俄国审慎忍耐，它们暂时还不愿着手瓜分奥地利帝国，因为它们都希望能在有利时机夺得更大的一块。

俄国：

《对人民有利的宪法只能有一个——就是破坏（俄罗斯）帝国。》（第96页）

它是否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同新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呢？这就是当前俄国的唯一的政治问题（同上）。《这个问题……是由于德国在一夜之间（за одну ночь）便“成长为庞大的、具有无限威力的国家”这种新形势而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提出来的。但是全部历史都说明，而且理性逻辑也证实，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并存。其中一国必然要征服另一国。》（第97页）这对德国说来是必要的。《在长期经受了在政治上的屈辱之后，德国突然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大国。它能够容忍有一个完全不依靠它而独立的、还没有被它战胜并且敢于同它较量的大国站在它的旁边，甚至在它的鼻子跟前吗？况且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任何的”。——编者注

这个大国还是“最可恨的”俄国!》(第97頁)

《我們认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一切德国人、主要的是德国资产者,而——可悲啊!——在他們的影响下連德国人民本身都极端仇恨俄国。》(第97頁)这种仇恨是德国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第98頁)。

最初是德国文明对韃靼人的野蛮行为的令人尊敬的仇恨(第98頁)。在二十年代是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議(同上)。他們认为俄国对神圣同盟应負全部責任(同上)。在三十年代初,是对波兰人的同情,对鎮压波兰起义的俄国人的仇恨(同上)。他們又忘記了,普魯士曾經帮助鎮压波兰;普魯士进行了帮助,因为如果波兰人胜利了,整个普屬波兰就会起义,而这《会从根本上葬送普魯士君主国的“已經产生的威力”》(同上)。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現了仇恨俄国的新的原因,它使这种仇恨具有政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問題:在奥地利和土耳其成立了希望和期待从俄国得到援助的斯拉夫政党。泛斯拉夫主义共和联邦——十二月党人(彼斯节里、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尔等人)力求实现这个目的。尼古拉接受了这个思想,不过他把这理解为在他的铁拳統治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統一的、独裁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期,俄国代理人从彼得堡和莫斯科被派往各斯拉夫国家,有的是官方派遣的,有的是无报酬地自願效劳的;后者屬於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协会。在南方斯拉夫人和西方斯拉夫人中間展开了泛斯拉夫主义宣傳。出了許多小册子,一部分是用德語写的,一部分是翻譯的。泛日耳曼主义派的人士惊恐万状。**波希米亚是俄国的!**这使他們食不甘味,寐不成眠(第99頁)。从此以后,就对俄国怀下深仇大恨;俄国人也不喜欢德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全俄罗斯帝国”和泛日耳曼帝国这两个国家能否相安为邻呢?(第100頁)不过,維持和平的理由对双方說来过去存在过而且現在也仍然存在。**第一,波兰**(同上)。奥地利不贊成瓜分等等。对于奥地利說来,波兰是防御俄国和普魯士的屏障。**第二,奥地利**,它們希望瓜分它。瓜分奥地利将使它們分手,但在瓜分之前什么也不会发生(第100—102頁)。**第三,新德意志帝国**,它遭到了大家的仇視,除了俄国,也許还有**合众国**之外,它沒有任何盟友。为了实现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还需要做許多事情:要从法国人手里夺取整个洛林,吞并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斯堪的那維亚半島、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才能独霸波罗的海。它把匈牙利留給馬扎尔人,把加里西亚和奧屬布柯維納留給俄国人,自己則占領直至的里

雅斯特（包括它在內）的整个奥地利和俄国内閣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提出異議的波希米亞……《我們〈巴枯宁〉肯定地知道，关于稍微早一点还是稍微晚一点瓜分奥地利帝国的問題，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宫廷之間早已在进行秘密談判了》，自然他們都力图欺騙对方。普魯士德意志帝国不能单独实现这些广泛的計劃：《因此同俄国結盟現在是而在很久的将来也还是“迫切必要的”》。对于俄国說来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要向四面八方进行侵略，是俄罗斯帝国的正常生活条件。》但是究竟向哪个方向进攻呢？是西討还是东征呢？西討的道路就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并与法国結成同盟反对普魯士和奥地利的联合軍事力量，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另一条（东征的）道路是进攻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走这条道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英国，大概法国也会和它們一道；而盟友将是德国和美国（第 102—104 頁）。

第一条道路（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道路）。法国的帮助毫无用处；法国的統一已永远被破坏等等；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它使各国人民，特别是斯拉夫人民起来反抗他們的合法“君主”，奥地利的和普魯士德意志的“君主”。尼古拉出于本能，根据原則抛棄了这条道路等等（！）。

此外，“不能不承认，对于全俄罗斯的国家來說，波兰的解放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两种“国家”形式之間的斗争已經延續了几个世紀：“波兰貴族的意志”还是《沙皇的鞭子》。波兰人常常好像是胜利在望了。但是一旦人民于 1612 年在莫斯科发动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在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領導的小俄罗斯和立陶宛“农奴”的起义，一切都告吹了。《俄罗斯鞭子由于人民而获得了胜利。》

这个自供写在第 110 頁上。

在貴族的波兰“国家”的廢墟上，建立了鞭子的“全俄罗斯”帝国。《如果使它失去这个基础，夺走 1772 年以前屬於波兰“国家”版图的那些省份，全俄罗斯帝国也就消逝了。》（第 110 頁）这些都是最富饒、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它們一旦脫离出去，俄罗斯帝国的财富和威力就将减少一半。失去这个地方，接着就会失去“波罗的海沿岸边区”，如果波兰国家真的复兴起来，它就会从俄国手中夺走整个小俄罗斯，使之成为波兰的一个省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黑海边境也将丧失，結果俄国同欧洲的联系就会从各个方面被割断，并被赶入亚洲。

有人以为，俄罗斯帝国至少可以把立陶宛让給波兰。“不”。“莫斯科”和波兰为邻必然会促使波兰的爱国主义去占領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只要使現在的波兰王国获得解放，华沙立即就会同維尔諾、格罗德諾、“明斯克”、基輔联合起来，更不要說波多利亚和沃倫了。波兰人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不能給他們留下一小块自由的地方；否則这个地方馬上就会成为一切革命反抗的中心。俄罗斯帝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繼續存在下去，即采取穆拉維約夫的那套办法来“扼杀”波兰……俄国人民同俄罗斯帝国毫无共同之处，他們的利益是对立的。

在这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从他自己的体系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論点：《只要俄罗斯帝国迅速崩潰，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各族人民都将恢复自由，对于他們來說，波兰“国家的”爱国者追求虛荣的图謀是并不“可怕的”〈comment donc [当然啦]！〉；这种图謀只有对于帝国說来才是可怕的。》（第111頁）因此，沙皇是永远不会自願同意让波兰的任何一小块土地获得自由的。《而如果不解放波兰人，他能号召斯拉夫人举行暴动嗎？》（第104—111頁）

而在尼古拉时代，泛斯拉夫主义的道路可能带来的好处比現在还多。那时还可以指望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現在，意大利大約会保持中立，因为現在（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会把它还占領着的一些面积不大的意大利土地自願地交还意大利。馬扎尔人考虑到他們自己对斯拉夫人的“国家的”^①关系，会满腔热情地站到德国人方面来反对俄国。俄皇只能指望得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或多或少的协助；如果他想把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也发动起来，那就会多加一个敌人——英国。但是，在奥地利帝国只有1700万斯拉夫人；除去加里西亚（在那里波兰人会使卢西人失去活动能力）的500万人，剩下的有1200万人，其中还应当减去被招募参加了奥地利軍隊并按照一切軍隊的慣例会向长官指定的敌人作战的那些人。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統治的”。——編者注

在巴枯宁看来，这 1 200 万人全部毫无例外地都是男人，而且都是成年人。

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而是散居在奥地利帝国全境，操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同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杂居在一起。《为了使奥地利政府和全体德意志人经常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这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为了使俄国军队得到一个强大的支柱来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联合力量的强大的支持，这就远远不够了。》俄国政府懂得这一点，并且也不想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来反对奥地利，因为这种战争必然会变成反对整个德国的战争。可是，俄国政府正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进行真正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在奥地利的一切地区都有这样一些盲目的信徒，对俄国政府是有好处的。《这正在麻痹、束缚、惊扰奥地利政府，并且不仅加强俄国对奥地利的的影响，而且加强俄国对整个德国的影响。帝制的俄国在煽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去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时非常清楚，归根到底总是要把它们交给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去处理的。》（第 112—113 页）

走泛斯拉夫主义的西讨的道路，俄国就要同全体德国人，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德国人，同马扎尔人以及同波兰人作战。俄国在这一场为了所谓解放斯拉夫人而必须进行的进攻战中能否战胜哪怕只是一个普鲁士德国呢？俄国人民对战争丝毫不感兴趣，正如世界各国人民对纯粹政治性的政府之间的战争不感兴趣一样；在现代史上只有拿破仑第一是一个例外，但是他被认为是革命的继承人；从实质上说，只有最近这次普鲁士反对第二帝国的战争是唯一的例外。当时在所有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泛日耳曼主义的利益毫无例外地压倒了任何别的利益，这在目前构成了德国的特殊力量……

俄国人甚至在《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克里木战争时期对本国政府都不感兴趣。

这在第 117 页上；相反地，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战争显然是纯粹进攻性的？

俄国农民甚至不知道他是斯拉夫人……对于各斯拉夫民族说来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起初就是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因为拉丁民族也和斯拉夫人一样受着德国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而与德国人结盟，却只是在

德国人也成为反“国家主义者”的时候……但是，在此以前斯拉夫人与各拉丁民族結成同盟以反对德国的侵略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德意志部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們用惹得（促使）大家都害怕他們、仇恨他們的办法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說来，俄国人民也是道地的斯拉夫民族。》但是，这种敌对情緒还没有扩展得很远，以致俄国人民会首先发起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有当德国人自己来到了俄国并且妄想在我国称王称霸的时候，这种敌对情緒才会表露出来。但决不会参加反对德国人的进攻性战争……但是反对德国的政府經費、財政經費和軍事經費是否足够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进攻），德国人就不得不在本国領土上作战，“在这一次”就可能发生德国一切階級和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普遍的”起义（第114—120頁）。

俄国的軍官是比德国的……文明野兽要好的人……德国人，特别是軍官和官吏，兼有文质彬彬和野蛮成性、学者風度和卑躬屈节这两种品格……但是，对于正規軍說来，再沒有比德国軍官更完美的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服从和指揮……德国士兵無論按其本性还是按其所受的奴化訓練說来，ditto [也是]正規軍的标准的士兵……首先是馴服士兵的肉体，从而也就馴服他的精神……紀律等等……德国軍官优于其他各国軍官的长处是：他們有知識，通曉軍事理論和實踐，狂热地而且是完全学究式地忠于軍职，行动准确，办事認真，“沉着鎮定”，善于忍耐（терпение），此外还比較誠实（честность）。德国軍隊的編制和装备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不像拿破侖第三那样和我們将要做的那样，只是一紙空文。况且还有行政的、民政的、特别是軍事的監督，使得長時間的欺騙成为不可能。

《相反地，在我們这里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大家都狼狽为奸，結果要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第121—128頁）

最后一句話在第128頁上。

即使俄国能够拿得出一百万士兵，也要把一半留駐国内看管被寵爱的人民。单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就需要多少士兵！（第128頁）

德国将有一支真正的“百万”大軍，按編制、“訓練”、士气、科学、装备來說，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在这支軍隊的后面是全体武装的人民。《如果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普魯士的弗里茨，而是拿破侖第三，德国人

大概是不会起来反对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俄国的“入侵”，他们却会一致奋起反对》…… 而俄国的百万大军在哪里呢？在纸面上…… 军官和装备在哪里呢？…… 没有经费…… 在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50亿中，至少有20亿用在军备上。《的确，整个德国现在已经变成可怕的、威胁四方的军火库。》只要你们向德国跨进一步，你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你们的进攻性战争马上就会转变为防御性战争；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全俄罗斯帝国内。那时，是否会爆发俄国人民的普遍起义呢？《是的，如果德国人开进俄国“领土”，譬如直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这种蠢事，而是向北挺进，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攻打彼得堡，在这些省份他们不仅将会在小市民、新教牧师、犹太佬、心怀不满的贵族及其子弟、大学生中间，而且还会在充满彼得堡和遍布整个俄国的无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族将军、军官、高级的和下级的官吏中间，找到许多朋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鼓动波兰和小俄罗斯起来反对俄罗斯帝国。》（第128—131页）

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看来，他已把从地球上消灭(стереть)波兰人当做自己的终身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波兰人仇恨他和普鲁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波兰人“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并不比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少些，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第133页）

《在德国和普鲁士本土，很久以来早就已经存在拥有大量党员的、严肃的政党，甚至有三个党：即自由进步党、纯粹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合在一起，在德国议会和普鲁士议会中占有显然的多数，而在社会上则占有更具决定意义的多数；这些政党预见到、多少也希望，而且好像还是在挑起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它们知道，波兰的起义和恢复“在一定范围内”^①将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第133页）无论俾斯麦还是这些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打算把普鲁士从波兰手中夺去的全部领土（无论是科尼斯堡还是但泽，甚至是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土地）归还给波兰；而从波兹南公国划归波兰的那一块土地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将把包括“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的整个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因为这些地方现在都属于奥地利，并把波兰人自己有能力夺

①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

取的一切俄国領土都交給波兰人。此外，經費、武器和軍事援助，当然，都是德国作保，以波兰貸款的形式交給他們的。波兰人将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些东西……除了少数場合以外，波兰人絲毫也不关心斯拉夫問題；对于他們說来，“馬扎尔人倒是更容易理解和接近得多”……波兰人有許多政党；但是它們始終都以恢复 1772 年波兰“国家”的版图为基本原則。各个政党的差別只在于，一些政党认为这条道路，另一些政党則认为那条道路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俾斯麦要求它們正式放棄大部分現在已經屬於普魯士的原来的波兰領土……誠然，在俾斯麦伯爵保护下恢复起来的是一個 *étrange Pologne* [奇怪的波兰]。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波兰总比沒有好；此外，波兰人认为，以后还可以摆脱俾斯麦的保护……波兰将站起来，立陶宛 ditto [亦然]，接着是一場不大的風暴，小俄罗斯也将站起来……波兰爱国者都是可怜的社会主义者，他們就是在本国也不从事社会革命的宣傳；即使他們想宣傳，俾斯麦也不会允許——“离德国太近了”；但是在俄国来反对俄国，这是可以的。俄国的农民“暴动”对德国人和波兰人是有利的，这对他們說来并不困难；在俄国散居着大量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們都是俾斯麦和波兰的盟友：《設想一下我們的处境吧：我們的潰敗了的軍隊四散逃竄；德国人跟踪而来，正在进逼彼得堡，而在南方和西方，波兰正在向“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进军，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宣傳的鼓动，在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爆发了节节胜利的农民总暴动》（这句话在第 138 頁上）……德意志“国家”用这种办法会使俄罗斯国家和欧洲完全隔絕。

《当然，我們讲的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俄罗斯人民，如有必要，俄罗斯人民 *всюду*（到处，处处）都能找到或者为自己打通（*пробиться*，打开，开辟，*percer*，*se faire jour*）*дорогу*（一条道路）》（这段话在第 138—139 頁上）。

可見，正当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并且为自己打通道路，以便防止別人把它和欧洲隔絕开来的时候，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进行政治战争。巴枯宁希望什么呢？德国人和波兰人正在破坏俄罗斯帝国，但是同时也引起俄国所向无敌的农民总起义。

俾斯麦和波兰人无论如何决不会阻碍这些农民“按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行动。相反：他们正在农民中间进行着比“举世闻名的”同盟更有效的宣传；只有在这种无政府状态扩展到相当广阔的范围以后，火苗才会蔓延到拉丁族和斯拉夫族的兄弟身上去。不管这将是俄国对德国战争的结果还是 vice versa [相反]，问题的实质丝毫也不会改变。顺便说说，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在塞尔维亚除了人民之外只有一个《官吏阶级》，那末塞尔维亚的社会革命除了消除单独在那里构成“国家”的官吏阶级以外，还能有什么任务呢？（第 138—139 页）

可见，对于全俄罗斯帝国说来，到欧洲去的道路现在是堵塞着的；俾斯麦伯爵保存着欧洲大门的钥匙，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但是，如果西北方的道路走不通，还有南方的和东南方的道路，即布哈拉、波斯、阿富汗、东印度、最后是君士坦丁堡。俄国的政治家们早就已经在讨论是否把帝国的首都和重心从彼得堡迁往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了。诚然，这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是希望二者得兼，既要波罗的海，又要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直接由于这个原因而变成了北方海上强国》，特别使他们睁开了眼睛（第 139 页）。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长的海岸线，以保证它能够和全世界直接联系，并且使它能够直接参加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即政治和道德方面的（политически-нравственный）世界运动，它就不能够置身于头等强国之列》……缺少这一点很快就会发生停滞……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条件，使关闭（замкнутый）在“国家”里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属于（принадлежит）这些条件之列的有“天生智慧和天赋毅力”、教育程度、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设想的最广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交通，按其运价的相对低廉、速度和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说，比其他一切交通……包括铁路在内都要优越。可能，航

空在各方面会更加便利，并且将会特别重要，因为它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均等化(уравняет)。》

对于巴枯宁说来，主要的是“均等化”，例如要把整个欧洲均等到斯洛伐克的卖捕鼠器的人的水平……《但目前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主要手段。》这是巴枯宁先生谈到经济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创造了各国人民之间不以“国家”为转移的条件和差别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а)，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言、属于一切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合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попечения(保护、照顾、照料)、“横征暴敛”(l'action de prendre)、关税、限制、挑剔、禁止、准许和干涉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使本来就不平衡的关系大为发展；然而，缺少这些优越性的内陆居民，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这就是航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但是，在那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贵族。》

例如，布列塔尼！

而平原和山区的差别、沿河流域、气候、土壤、煤、铁、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等呢？傅立叶在这里比较英勇地克服了均等化(第139—142页)。

巴枯宁顺带作了一个发现，就是德国(作为一个不靠海的国家)在商业方面不及荷兰，而在工业方面则不及比利时(第143页)。

普魯士——今天德国的化身、头脑和双手——已經牢牢地屹立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上了(第 145 頁)。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梅克倫堡、奧登堡、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整个普魯士用法国的錢建設了两支大舰队：一支在波罗的海，另一支在北海，由于現在正在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通航运河，这两支舰队很快将合而为一。这支舰队很快将比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强大得多。那时里加、列維里、芬兰、彼得堡、喀琅施塔得都要完蛋！彼得堡的任何影响都要完蛋！

本来在联邦普魯士肆无忌惮地而且似乎是在我們的同意之下掠夺了我們的盟友丹麦的那一天，哥尔查科夫就應該向自己这样說。

波兰起义，巴枯宁“先生”！

《他應該懂得，自从普魯士，它現在依靠着整个德国并且由于同德国不可分割地統一起来而成了大陆上的最强盛的国家；总之，从那时以来以普魯士为霸主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波罗的海上占居了它目前的、严重威胁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各国的地位以来，彼得堡俄国在这个海上的优势就最后完蛋了，彼得的偉大政治勋业也就被消灭了，而“全俄罗斯国家”的威力也随之被消灭了，如果它在南方不能开辟一条新的海路以弥补它在北方所丧失的那一条自由的海路的話。》(第 145—147 頁)

但是 *s'il vous plait* [請你說說]，这条海路在什么界限內是自由的呢？对于英国人說来，它一直《自由》到喀琅施塔得的城下。

通路还在丹麦手中，但是丹麦起初将自願組成联邦，然后将被泛日耳曼帝国完全吞沒。这样一来，波罗的海很快就將完全成为德国的領海，而彼得堡的政治意义就会丧失。当哥尔查科夫同意瓜分丹麦并让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并入普魯士的时候，他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要不就是背叛了俄国，要不就是得到了俾斯麦答应协助俄国在东南方壮大新实力的正式保证。

在巴枯宁看来毫無疑問，普魯士和俄国在巴黎和約以后，至少是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間訂立了攻守同盟。

因此，俾斯麦才无所顾忌地敢于冒法国干涉的危險，发动了对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且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在这个时候，

特別是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間，俄国在边境上进行一次規模极小的佯攻，也能制止普魯士軍隊繼續胜利进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北部根本没有駐軍；奥地利只是在俄国的威胁之下才按兵不动；意大利和英国沒有出面干涉，只是因为俄国不希望这样。如果俄国不表明它是普魯士的坚定的盟友，德国人就永远也拿不下巴黎。但是，看来俾斯麦确信俄国不会背棄他。有什么根据能这样确信呢？俾斯麦知道，除了波兰問題以外，俄国和普魯士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国家之間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能有理由拖延时日，而且双方都希望在危机到来之前尽量利用这个并非出自本意的同盟。德意志帝国無論在國內还是在國外都还远远沒有巩固起来。國內还有許許多多的公国，國外有奥地利和法国。迫于內部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正在策划新的投机冒險、新的战争。依靠支配了整个德国社会的爱国的泛日耳曼主义以恢复中世紀帝国的原来版图；把整个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的里雅斯特和波希米亚）、整个瑞士德語区、比利时的一部分、整个荷兰和丹麦这些为建立帝国海上威力所必要的国家統一起来，——这些計劃促使西欧和南欧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起来反对德国，結果沒有俄国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这些計劃。可見，对于新德意志帝国說来，同俄国結盟还是必要的（第148—151頁）。

全俄罗斯帝国方面不同普魯士德国結盟也是不行的。它必須向东南方找出路，代替波罗的海只有黑海；否則它就会和欧洲隔絕，为此就需要君士坦丁堡；否則随时都可以把它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切断，正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間发生的情形那样。可見，最終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是違反整个南欧包括法国在內的利益的，是違反英国甚至德国的利益的，因为俄国为所欲为地称霸黑海，将使整个多瑙河“沿岸地区”直接从屬於俄国。但是，普魯士正式保证帮助俄国实行其东南政策；同样可靠的是，一有机会普魯士就要背棄自己的諾言。但是，現在在刚刚开始履行条約的时候，还不致于发生这种破坏条約的行为。普魯士曾經帮助俄国廢除巴黎和約的条款；同样它也将支持俄国对待希瓦的态度。此外，俄国向东走得愈远，对德国人是有利的。俄国对希瓦作战的目的何在呢？…… 印度？沒有这种考虑，如果是中国，事情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滿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們会听到俄国軍隊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消息…… 中国人在他們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內住得太拥挤了；于是便向澳大利

亚、加利福尼亚移民；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西伯利亚、从韃靼海峡到烏拉尔山脉和到里海的整个边区轉眼之間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在这块比法国面积(528 600 平方公里)大 20 倍以上的 1 22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上，现在只有居民 600 万，其中俄罗斯人只有 260 万人，其余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韃靼人或芬兰人，而军队人数更是微不足道…… 中国人还会越过烏拉尔，前进到伏尔加河边；人口的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都是一些坚毅好战的人，他们在連續不断的内战中成长，在这种混战中一次就要牺牲几万或几十万人…… 近年来，他们熟悉了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纪律，简言之，就是熟悉了欧洲的“国家的”文明。同时非常野蛮；没有任何爱好自由的或人道的本能。自从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1860 年)以后，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军事冒险家找到了插足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现在已经逐渐联合成为各种匪帮；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天真得像小孩一样的我们的俄国政府却拿这种危险当儿戏…… 希望扩大疆土；而俄国至今还不能够——而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上居民，在这 210 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土地上，連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 65 000 名居民，而且俄国人民又非常贫穷，这促使它到处起来“暴动”…… 俄国政府希望把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亚洲东部。俄国政府本来就應該彻底拋棄欧洲，——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把全部军队开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細亚，并像塔梅尔兰一样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本国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没有…… 至于印度，只要英国人反对，俄国人是无法占领它的…… 《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征服印度，我们也能够破坏它，至少能够大大动摇英国在那里的統治，办法是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用武装干涉。》《这将耗費我們的大量金錢和人力……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毫无益处地惊扰英国人嗎？“不”，因为英国人妨碍我們。他們在哪里妨碍我們呢？在君士坦丁堡^①；只要英国人保存着自己的力量，無論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給他們，他們也永远不会同意让君士坦丁堡在我們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而且也是斯拉夫帝国和东方帝国的首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政府便在希瓦进行战争，以便然后按照

①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自己的宿願接近印度。《俄国政府正在寻找,在哪一个地方能够加害于英国,如果找不到别的地方,它就会在印度威胁英国。因此它希望使英国能够容忍这样一种思想,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市》……波罗的海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以刺刀和鞭子为基础的,受到所有人民群众,包括从大俄罗斯人民起的各斯拉夫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萎靡不振、懈怠涣散等等……它无力对抗重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放棄波罗的海,坐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說来就是死亡,我国政府是不会在这里寻找拯救自己的道路的。》

最后一句話在第 160 頁上。

对于它說来,除了同德国結盟而外,沒有别的活路。它被迫放棄波罗的海以后,应当設法在黑海求得补偿,即使是为了它的政治生命也要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德国人答应过給予这种帮助。我們相信,在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之間已簽訂了一項正式条約。》誠然,德国人根本不想履行这个条約。他們不能把多瑙河口和自己的多瑙河貿易交給俄国随便处置;在欧洲南部建立大泛斯拉夫帝国,会成为泛日耳曼帝国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軍队开进中亚細亚和希瓦,借口說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捷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俾斯麦像以前欺騙拿破侖第三那样欺騙了哥尔查科夫和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事情已經做了,要改也不可能了。而且,俄国的薄弱力量(дряблые силы)也推翻不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只有革命才能做到这点,当革命在俄国或者欧洲获得胜利以前,“国家主义的”德国将会获胜并且号令一切,而俄国政府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一样,今后将仰仗它的准許和“恩賜”才能生存……《德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們的老爷了,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兴高采烈、熱鬧異常地庆祝德軍在法国的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帝。》《現在,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德国……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本能”,它构成了德国人民的特征。一方面,盲目服从强者、无情压制弱者的本能。》(第 151—163 頁)

接着概述了德国的現代(特别是从 1815 年以来)历史,以证明

德国人具有奴隶性和压制异族的意图……

后者使斯拉夫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因为《历史使命》(德国人的)，至少在北方和东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是屠杀、奴役各斯拉夫部族并使他们《强行德意志化》。《这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一切斯拉夫人的心上，如果社会革命不先使他们言归于好的话，这段历史无疑会在斯拉夫人反对德国人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反响。》(第 164 页)

接着谈到自 1815 年以来德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材料引自弥勒教授的论 1816 年至 1865 年历史一书。)

《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存在(1807 年)。》(第 168、169 页)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但是，现代的德国人保留了自己这位爱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放弃了他的人道精神……对于他们，俾斯麦公爵或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接受。”(第 171 页)

当拿破仑从俄国溃逃以后，用巴枯宁的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流着“激动和感谢”的眼泪在柏林拥抱了自己的恩人——全俄罗斯皇帝。》(同上)

《因此，奥地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放弃它原来想带着自己的全部领地加入德意志联邦以扼杀德国的打算，《不去扼杀德国，但是同时也不要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联邦的首领。奉行这种政策，奥地利就能够指望得到法国和俄国的积极支援。直到最近时期，即直到克里木战争之前，俄国的政策正是经常不断地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去相互争雄，使它们谁都赢不了谁，同时在德国各中小公国煽起不信任和恐惧，庇护它们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第 183 页)。普鲁士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多期望(在 1815 年以后)。因此，对于梅特涅说来重要的是不让普鲁士颁布任何宪法(已经许诺了的)，而同奥地利一起成为反动派的首脑。《他的这些意图得到了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和受“阿拉克切也夫”挟持的俄皇亚历山大的最热烈的“支持”。》(第 184 页)

《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們說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說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們的”铁腕,生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这种铁腕越有力,他們就越感到自豪,他們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192頁)

1830—1840年。盲目摹仿法国人。《德国人不再吞噬高卢人了,但是把自己的全部仇恨轉向俄国。》(第196頁)《一切都取决于波兰革命的結局。如果波兰革命胜利了,脫离了自己在东北部的支柱并且被迫放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波兰領地的《普魯士君主国,就不得不在德国本土寻找新的支点,而由于它当时还不能……用征服的办法……所以就采取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办法》(第199頁)。波兰人失敗之后,为自己的女婿尼古拉皇帝大力效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撕下了假面具,变本加厉地迫害泛日耳曼主义的爱国者》(第200頁)。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識和无意識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組織的一切因素,所以我們》是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理想》(社会組織);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說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們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結構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со-единение),“沒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沒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自己創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和自由的(第213頁)。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們称我們为无政府主义者》(第213頁)。《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們虽然各有不同的論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жар)捍卫(отстаивают)“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們說来,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①。完全合乎邏輯^①,这是因为既然他們作为根据的“原理”是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論先于社会实践,而社会科学也就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那末他們就必然会得出結論:由于思想、理論、科学至少現在只

^①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末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即使他们是由“全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第 214 页）

因此，《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 215 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 216 页）。在法国，他们站在“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方面，反对革命的Ligue du Midi〔南方同盟〕。但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更加危险的、目前正在得势的教权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做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第 216、217 页）

（费尔巴哈还是形而上学者：《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马克思先生等人》，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的支配》（第 207 页）。）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нервный）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

無論誰，只要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樣），他什麼謊言和誣蔑都能夠製造出來對付這個人。他不惜採取最“卑鄙”的陰謀，只要他認為，而且多半是錯誤地認為，這種陰謀能夠用來加強他的地位、他的影響或者擴大他的力量。就這方面說來，他完全是一個政治“人物”。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質。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質也很多。他很“聰明”，非常“博學”。早在1840年左右在科倫的時候，他就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那時可以說他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先進黑格爾派團體的靈魂和中心了，他和先進黑格爾派一起開始出版一家反政府的雜誌，這家雜誌不久被內閣下令封閉了。參加這個團體的有布魯諾·鮑威爾和埃德加爾·鮑威爾兩兄弟、馬克思、施蒂納以及後來柏林的第一個德國虛無主義者小組。這些虛無主義者以其昔尼克派的徹底性而遠遠超過了俄國最狂熱的虛無主義者。1843年或1844年，馬克思先生遷居巴黎。他在这里初次接觸了法國和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團體，以及他的同胞、德籍猶太人莫里斯·赫斯先生。赫斯在馬克思之前已經是博學的經濟學家和社会主義者了，這時他對馬克思先生在科學上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像馬克思先生這樣“見多識廣”、博覽群書而且“這樣聰明地”讀書的人，是很少見的。這時經濟科學已經是他專門研究的對象了。他特別細心地研究了許多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這些英國經濟學家比其他一切經濟學家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知識”是有用的，他們依靠英國經濟事實培養出來的才智具有實際性，他們敢於進行嚴厲的批評，能夠做出認真而大膽的結論。但是，除了這一切以外，馬克思先生還增加了兩個新的因素：一個是他從黑格爾學派那里得到的，並常常被他“弄到荒唐可笑甚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異微妙”的辯證法；一個是共產主義派的觀點。顯然，馬克思先生讀遍了包括從聖西門到蒲魯東在內的所有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痛恨蒲魯東，他對蒲魯東所做的無情批判無疑有許多正確的東西：蒲魯東雖然盡力想站到現實的基礎上來，但仍然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和形而上學者。他的出發點是抽象的法權觀念；他從法權出發去考察經濟事實，馬克思先生則和他相反，說出了並且論證了為人類社會、各民族和國家過去和現在的全部歷史所証實了的無容置疑的真理，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經濟事實過去和現在都先於法律的和政治的法權。“闡述”和證明這個真理正是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學功績之一。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而且馬克思從來不願承認的是，馬克思先生在政治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親授的學生。和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和政治

家相比馬克思先生要无比“聪明”、无比淵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而就学于这个侏儒似的法国人。不过，产生这种奇怪現象的原因很简单：他們，一个是能言善辯的法国人、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身兼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种品质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是頑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揚“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論据，而是满足于高談闊論，另一个却以一个有學問、有身分的德国人所應該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辯证法的种种詭計和自己的全部多方面的淵博知識来論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則。在1845年前后，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領，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неизменный)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學問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誣蔑、造謠和陰謀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創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1846年他們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們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魯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848年。不过，在这一年以前，他們的宣傳虽然在整個德国傳播得比較广泛，但仍然是秘密的，“因此还没有暴露出来”。》(第221—225頁)

当时(1848年革命期間)，德国的城市无产階級、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受到馬克思宣傳的影响，还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組織。这个組織主要散布在萊茵普魯士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倫；它的分支散布在柏林、布勒斯劳，“最后”还有維也納，但是都很薄弱。当然，德国无产階級具有本能的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决不自觉地要求进行1848—1849年的社会变革，虽然“共产主义宣言”早在1848年3月就已經問世。“共产主义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階級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至少也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第230頁)。当时在德国还有一种現在在那里已經沒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至少是能够加以革命化的农民……他們当时准备冒一切危險，甚至准备举行“全体騷动”。《在1848年，也像在1830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騷动”；馬克思學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騷动”。斐迪南·拉薩尔自己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領袖亲授的学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位老师在拉薩尔死后对卓越的学生表示嫉妒的和艳美的(завистливое)不滿，因为学生在实际方面使导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拉薩尔好几次談到过一個思想，十六世紀农民起

义的失敗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在德国的加强和昌盛，是革命的真正胜利。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請大家不要以为我們是誣蔑他們。为了证明他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們可以指出他們的演說、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們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介紹) 給俄国公众。而且，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別的想法；無論如何他們是“国家主义者”，他們必然要咒罵一切人民革命，特別是农民的，按本性來說是农民的^①，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們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純粹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 230—232 頁)

《不仅在 1848 年，而且在現在，德国工人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領袖，可是德国社会民主^②党的領袖們、組織者們不是把他們引向自由和国际友爱，而是直接使他們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羈絆。》(第 254 頁)

巴枯宁談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如何害怕尼古拉（1848 年 3 月对波兰代表团的答复和 1850 年 11 月，**奧里繆茨**）(第 254—257 頁)。

在 1849—1858 年，德意志联邦甚至《不为其他各大国所注意》。《普魯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了俄国的奴隶…… 对彼得堡宮廷利益的忠誠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連普魯士陸軍大臣和普魯士駐英国宮廷的公使、国王的朋友，这两个人都由于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被撤換。》尼古拉因为施瓦尔岑堡和奥地利的忘恩負义而大发雷霆。《奥地利由于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是俄国的天然敌人，它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那边反对俄国。普魯士甘冒整个德国的大不韙“矢忠到底”。》(第 259 頁) 《曼托伊費尔于 1850 年 11 月就任首相，以便在奧里繆茨會議所規定的使普魯士大受屈辱的一切条款上签字，并使普魯士和整个德国最終屈从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尼古拉的意願…… 这也正好就是絕大多数普魯士容克地主或貴族的願望，他們連听也不想听到普魯士和德国合并，他們对奥地利的〈？〉和全俄罗斯的皇帝的忠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无政府主义的”。——編者注

②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誠甚至超过了对本国国王的忠誠。》(第 261 頁)

《这时(1866 年前后)成立了所謂的人民党。中心在斯图加特。願意与共和制的瑞士結盟的那一批人是 *Ligue de la Paix et de la Liberté*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要創始人。》(第 271 頁)

拉薩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組織了这个党,使之服从严格的紀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話,他完成了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內想做的事情。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敗,拉薩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第 275 頁)。

《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在拉薩尔看来)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工人消費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貸款,只有这样,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级的資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時間內战胜它和吞沒它。当吞沒的过程完成的时候,激进地改造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这就是拉薩尔的綱領,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其实,这个綱領并不屬於拉薩尔,而是屬於馬克思的。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发表的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論述”了这个綱領。在馬克思于 1864 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中对这个綱領也有明显的暗示,这种暗示包含在这样一些話中: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等等,或者像“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說的,革命的第一步等等,最后是把一切生产資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上升为統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中。(第 275—276 頁)但是,拉薩尔的綱領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馬克思的綱領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嗎?拉薩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册子中……在闡明了自己关于現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以后,直截了当地說,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屬於他,而屬於馬克思先生……馬克思先生在拉薩尔逝世后^①在关于資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議,更是“令人奇怪”。馬克思痛心地说,拉薩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攬为已有。这种抗議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宣揚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經发表就不再成为个人的财产了。如果拉薩尔是抄襲“一頁或者好几頁……”(第 276 頁),《那是另一回事》《馬克思在理論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都是能手,相反地,在公开的場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与自己的导师馬克思相反,拉薩尔天生就是要在实际方

① 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第 277 頁)《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对拉薩尔都深恶痛絕;“志同道合的同志們”、社会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和馬克思本人集中了自己居心不良的嫉妒(зависть)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他們对他的痛恨像资产阶级那样深刻;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們不敢表示痛恨,因为他对于他們說来是太强了。》(第 277、278 頁)

《我們已經表示深深厌恶拉薩尔和馬克思的理論,因为这种理論建議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終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們的解釋,“人民国家”不是別的,而是“上升为統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請問,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統治阶层,它将統治誰呢?就是說(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統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这就是說,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們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組織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經濟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經濟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賤农是不被馬克思主义者賞識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們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这就是說,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沒有消失,沒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現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屬於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們的状况来看他們已屬於无产阶级的时候,他們也认为自

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 *mutatis mutandis* [变通地] 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 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 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上

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間的差別。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別！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条件。

《如果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統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隱蔽的奴役的統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們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頁)

《“上升为統治阶层的”无产階級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說，无产階級不再在个别的場合同經濟特权階級作斗争，它已經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組織性，能够在同这些階級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經濟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階級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統治也就結束了，因为它的階級性质已經消失了。

《难道整个无产階級都将成为統治者嗎？》

举例來說，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員會是由整个工会組成的嗎？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嗎？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結構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嗎？如果那样，岂不就沒有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員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嗎？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間也就沒有任何差別了。

《德国人大約有4 000万。难道4 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員嗎？》

Certainly〔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沒有了。》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第279页)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Asine〔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在哪里说的？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們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

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員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他們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們将代表的，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他們自己和他們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誰怀疑这一点，誰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 279 頁)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統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問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願意这样称呼它的話)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第 279 頁)。《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会主义者。》

《在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經常使用的这些名詞》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詞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囈語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認識領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魯东的那本书——

《本身就证明》，所謂的人民国家不是別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貴族階級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眾。人民是没有学問的，这就是說，他們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做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 279—280 頁)

《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識到：学者的管理〈quelle rêverie [簡直是胡說]！〉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們便想这

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Non, mon cher [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們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階級統治必須延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們說，他們唯一的心願和目的是从經濟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咖啡館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統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經濟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組織。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們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廢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須廢除国家，那末他們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 280 頁)

撇开想在李卜克內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說)这个問題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談，这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階級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階級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終的組織，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結論說，无产階級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們的論战〈这场論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魯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問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門以前，就已經进行了：好一个 *ὑστερον πρότερον* [逆序法]①！〉我們使他們認識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魯东和施蒂納的无政府状态翻譯成野蛮的韃靼方言罢了)，即

① 这是一种錯誤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hysteron)当做最初的、前面的(proteron)，把实际的順序顛倒过来。——編者注

《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胡說八道!),

《是社会发展的最終目的,任何“国家”,他們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羈絆,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 280 頁)。

《他們說,这种国家羈絆、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見,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須奴役他們。我們的論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他們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們自己的专政,才能創造人民的自由;我們回答說: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別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永恒的 citoyen [公民]巴枯宁的〉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来創造。》(第 281 頁)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論,則“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們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除了空洞詞句以外,沒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而相反的理論,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論,則在政治策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牽連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政党的不断“勾結”中去,也就是把他們直接推向反动》(第 281 頁)。《拉薩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誰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談判?自由派和民主派……利用这一点指責他卖身投靠。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各种^①信徒也在相互間“交头接耳地說着”同样的話,虽然說得不那么明显。》(第 282 頁)

拉薩尔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說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說像是医生对待病人。《無論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給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同上)拉薩尔曾經对自由派、民主派公开作战,他痛恨他們,鄙視他們。俾斯麦对他們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場。《这是他們两人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們“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薩尔的政治社会綱領,在于馬克思先生創立的共产主义理論。》(第 283 頁)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私人的”。——編者注

《这个綱領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虛假的)解放…… 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勇的手段……按照馬克思先生的理論……人民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給他和他的朋友們……《他們将建立一个統一的国家銀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将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軍队：工业軍和农业軍,由国家工程師們直接指揮,这些工程師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第283—284頁)

可是,干革命——德国人本身并不相信这一点：《需要別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者“推动”他們。》因此,必須寻找別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須贏得正在領導或者能够領導国家的人們的同情。在拉薩尔时代,同現在完全一样,領導国家的是俾斯麦…… 拉薩尔的天才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馬克思先生及其追隨者所沒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正如一切理論家那样,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終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有瘋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馬克思先生在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敗,但是失敗未必《能使他摆脱(избавит)沽名釣誉的幻想》(第284—285頁)。《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馬克思过去和現在都經常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結。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想。》(第284、285頁)《这种近年来在馬克思身上暴露得特別厉害的、想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結(сделка)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政权,就可能“願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謀利益,第二,激进资产阶级将能够对抗暗藏在它本身的反动势力。》(第285頁)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薩尔懂得这一点》(即激进资产阶级既不願意,也不能够解放人民,它只希望剝削人民);而且,他还痛恨德国资产阶级;《拉薩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對他們的革命首創精神不抱希望》。对他說来只剩下了俾斯麦一个人。《联合点是馬克思的理論本身提供給他的,这就是統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薩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經做到了。他們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俾斯麦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貴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 《他

的主要目的，同拉薩尔和馬克思的一樣，是國家。因此，拉薩尔不知要比馬克思合乎邏輯和實際多少，因為馬克思一方面承認俾斯麥是革命者，“當然是按他自己觀點”，同時卻又幻想推翻俾斯麥，大概是因為俾斯麥在國家中占據着在馬克思先生看來應當屬於他本人的首位。》《拉薩尔沒有這種高度的自尊心，因而不嫌棄同俾斯麥結盟。》《拉薩尔完全是遵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闡明的政治綱領，只是向俾斯麥提出了一個要求：對工人生產合作社發放國家貸款。但是同時……根據這個綱領，他在工人中間發動了擁護實施選舉權的和平合法的宣傳。》（第288、289頁）

在拉薩尔死後，《在馬克思先生的朋友們和追隨者的直接影響下》，成立了同工人教育協會和拉薩尔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并立的《第三個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這個黨的是只能算 полуработник（半個工人）的倍倍爾和一個十足的學者^①、馬克思先生的代理人李卜克內西》（第289頁）。

我們已經談過了李卜克內西1868年在維也納的活動。這次活動的結果是紐倫堡代表大會^②（1868年8月），在這次大會上社會民主黨最終組成了。《按照在馬克思的直接領導下活動的這個黨的創始人的決定（意圖），這個黨應當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泛日耳曼分支。》但是這種聯合違反德國的法律、特別是普魯士的法律。因此，問題只是被間接地涉及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只是在德國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同國際工人協會發生聯繫。》《毫無疑問，在德國建立這個新的政黨，有一個秘密的希望，有一個隱蔽的企圖，就是通過它把被第一次日內瓦代表大會（1866年）所擯棄了的馬克思的全部綱領搬到國際中去。》《馬克思的綱領成了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奪取”《政權》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並補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話：《奪取政治權力^③（普選權、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經濟解放的必要的先決（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條件。》《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在進行社會革命以前，工人應當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說得更合乎德國人的本性，就是通過和平宣傳奪取，或者更簡單地說取得政治權利。由於在社會運動以前，或者在社會運動之外^④——

① 巴枯寧的原文是：“親授的學生”。——編者注

② 着重號是巴枯寧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③ 巴枯寧的原文是：“政治權利”。——編者注

④ 着重號是巴枯寧的原文就有的。——編者注

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 289—291 页)

《根据这个纲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了动人的和解。》根据《纽伦堡代表大会，大会为此目的而委派的代表们到斯图加特去了，在那里受骗的工人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头子们订立了正式的攻守同盟。由于这种同盟，这些代表和头子一起出席了 9 月间在伯尔尼开幕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在那个大会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同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党的社会革命者发生了分裂》(第 291、292 页)。《在这方面(即在口头上说自己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人民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方面)，马克思学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而且德国的独裁者在必须对他毕恭毕敬的条件下竟是如此殷勤好客，以致现在他就已经用自己的旗帜把很大一批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掩盖起来了，只要和平和自由同盟愿意承认他是第一号人物(человек)，也可以在这面旗帜下找到栖身之所。如果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事的话，同盟盟员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无比地困难；现在在他们与马克思之间进行着的斗争同样也会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与他们之间发生。但是，和平和自由同盟比马克思主义者愚蠢，不过也比他们老实；它否定了经济方面的平等(胡说八道!)。它脱离了无产阶级；灭亡了；只留下了阿曼特·戈克和圣西门主义者百万富翁勒莫尼埃这两个到处徘徊、抱屈喊冤的幽灵…… 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事实是：来自纽伦堡和斯图加特的代表们，即由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资产阶级士瓦本人的人民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去的工人们，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一起一致投票反对平等…… 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前几天闭幕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在任何方面与伯尔尼代表大会团结一致，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意旨说话和投票的。和前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活动的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同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多数达到如此动人的一致呢？这一切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整个 1868 年，甚至还有 1869 年，在“人民

国家报”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矛盾……在“人民国家报”上有时也刊登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相当有力量的文章；可是接着又出现无可置疑的温情脉脉的“声明”，有时是友好的责备。这家机关报似乎在恳求和平和自由同盟“抑制一下”它的过分露骨的资产阶级本能的声明，因为这种声明使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维护者在工人面前名声扫地。马克思先生的党的这种动摇不定的状况一直继续到1869年9月，即继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第293—296页）

德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露了面，而且是以一个与其说是根据人民民族纲领^①，不如说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成的党的身分露了面。他们在李卜克内西的监视之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不言而喻，从他的纲领出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德国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德国人通过把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增加进去的办法来歪曲这个纲领；于是在国际内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是德国人造成的。他们想以强力把他们的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强加于这个主要是国际的协会。《他们被彻底击溃了。社会革命者同盟，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切齿痛恨。在1869年年底和1870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卑鄙的造谣中伤。》（第296页）

拿破仑第三的胜利都不会像德国人的胜利那样带来如此长期而有害的后果（第297页）。

全体德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胜利标志着军国主义因素的得势；《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怕，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所热衷的是统治和奴役（第298页）。《而德国工人呢？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个声援和同情法国工人的有力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讲了几句话，在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敛。但除了讲话以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够

^① 巴枯宁的原文是：“人民社会纲领”。——编者注

开始并且做出一些事情来的。誠然，大多数工人都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按照长官的命令大肆屠杀等等，甚至还进行掠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报”写了許多悲惨的信件，生动地描写了德军在法国干下的野蛮罪行。」(第 298、299 頁) 可是，也有几个比較大胆地进行反对的例子：这就是雅科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抗議；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見的例子。

《我們忘不了 1870 年 9 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显地表露出泛日耳曼主义的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由于德军获得的胜利，历史主动性已从法国彻底轉到了德国；我們德国人等等。》(第 299 頁)

《一句話，可以毫无例外地說，对本民族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現在一直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泛日耳曼帝国和它的大首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第 299 頁)

《你們知不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識或本能的是什么意图？是“辽闊地”、“遙远地”扩張(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ь)德意志帝国的意图。》(第 303 頁)这种热情《現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你們不要以为，俾斯麦真像他假装(прикидывается)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明”，不会看不見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傳播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当先鋒。傳播这种德国思想現在也是馬克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們已經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возобновить)俾斯麦公爵的功績和胜利。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把它們交給馬克思先生》(第 304 頁)。

《这个〈泛日耳曼〉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給他撑腰的 4 000 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这个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們在下一部分将詳細地闡述这一切。》(第 307、308 頁) 《目前它〈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集結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們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下来。》(第 308 頁)

补 充

俄国人民的《理想的主要特点》是：(1)《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属于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它、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它变肥沃的人民；(2)深信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3)仿佛绝对的自治，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的态度》(第10页)。

《三个阴暗面是：(1)宗法制度；(2)“村社”吞没个人；(3)信仰沙皇。这里还可以加上一点，(4)信奉基督教，包括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第10页)，但这一点在俄国不像在西欧那样重要。》(同上)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第一点的《自然结果》，“宗法制度”——父亲、“村社”、沙皇(第15页)。《“公社”是他的世界。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扩展。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同一种宗法制的原则、同一种丑恶的专制和同一种普遍的顺从态度，因而也是同一种 коренная (根本的)不公正状态，同一种对于任何个人的权利的彻底否定。“村社”的决定就是法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决定。“谁敢去反对村社呢？”——俄国的农夫“惊奇地”感叹道……在“村社”中，只有“长者”、家长才有发言权……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第15页)《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的联系，而且也不感觉有这种必要。它们只有通过“父亲沙皇”，只有在沙皇的最高的、父亲的权力内彼此联合起来。》(第15、16页)

附 录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⁴⁷⁵

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对抗，在英国至今还是横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一切运动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因而也是英国和爱尔兰的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国际在爱尔兰的发展和各爱尔兰支部在英国本土的建立，有结束这种情况的危险。因此，不列颠政府使用警察迫害的一切手段，企图把爱尔兰的国际扼死在襁褓之中，是非常自然的。由于那些高压法和国内事实上在不断实行戒严，政府就能任意使用这些警察迫害手段。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爱尔兰是怎样在所谓自由的不列颠宪法的庇护下遭到纯粹普鲁士方式的统治的：

在都柏林，警察局穿着整齐的制服的一名中士和一名普通警察站在国际支部开会的房子的门口。房东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由当局派来的，中士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这是因为国际的名称引起了恐惧。

在科克也在干这种勾当。地方支部书记的家门口对面，白天站着“爱尔兰王国警察局”的两个警察，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四个警察，他们把每一个到书记家去的人的名字都登记下来。不久以前，督察员助手访问了某些人，并且要他们说出在他们那里工作的科克支部成员的地址；许多人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如果发现了他们

和書記談話，就把他們的名字通知“城堡”——這是一個使愛爾蘭工人階級感到恐懼的地方⁴⁷⁶。正如一封來信中所說的，在這個城市里，

“地方當局舉行了幾次專門的會議，調來了幾個加強的警察分隊，在復活日，所有警察都荷槍實彈，整裝待發，各帶十發子彈。他們估計我們一定會在公園里舉行群眾集會。地方當局企圖利用一切可能來挑起混亂”。

如果不列顛政府今後仍按這種辦法行事，那末，它可以確信：它所戴的自由主義假面具將最終被徹底撕掉。全世界的國際的報紙都將天天把格萊斯頓先生的名字和薩加斯塔、朗扎、俾斯麥和梯也爾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受總委員會的委托：

羅·阿普耳加思	馬·巴里
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E. 德拉埃
歐仁·杜邦	威·黑爾斯
喬·哈里斯	胡利曼
茹爾·若昂納爾	查·基恩
哈里埃特·羅	弗·列斯納
羅赫納	沙·龍格
孔·馬丁	捷維·莫里斯
亨·梅歐	喬·米爾納
查·默里	普芬德
約·羅奇	呂耳
薩德勒	考威爾·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揚
賈罗

約·韦斯頓

通訊書記:

列奧·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賽拉叶——法国

卡尔·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J. 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約·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書記 約·黑尔斯

起草于 1872 年 4 月初

1872 年 4 月在倫敦印成傳單，并
載于 1872 年 5 月 18 日“解放报”
第 4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傳單譯的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2 年 3 月 12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声明說，已发表的关于上周一次会议的报道对他关于意大利情况的发言做了完全不正确的介绍⁴⁷⁷。在对这篇报道提出更正的同时，他对他关于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的发言顺便也做了补充。迄今从这个国家，从给总委员会的信件以及从国际意大利各支部的报纸中得到的一切消息都这样讲：似乎这些支部一致支持关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理论，反对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但是不应该忘记，同总委员会通信的工作和各家报纸直到现在也不是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即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的手里。的确，对总委员会说来，主要的困难在于同意大利工人本身建立直接联系。有两三个地方已经这样做了，现在查明，这些工人绝对不是放弃政治的热烈拥护者，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高兴地知道，领导国际会员基本群众的总委员会根本不奉行这种理论。因此，可以相信，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工人也一定会同欧洲其他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工人取得一致意见。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还是那样。政府不给国际会员召集公开会议的权利，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干预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坚决要求他们参加反对政府和王朝的起义，

但是国际会员们决心为他们自己的纲领而斗争，如果完全需要他们这样做的话。

载于 1872 年 3 月 17 日
“东邮报”第 18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 情况的发言记录⁴⁷⁸

摘自 1872 年 3 月 26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通知說，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任期届满的前夕給总委员会寄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发展及其目前情况的完整报告。1869 年在西班牙筹建的协会已經于 1870 年 7 月在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了。当时协会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巴黎公社革命和已經开始的政府的迫害迅速地扩大了它的力量；参加 1871 年 9 月瓦倫西亚代表会议的已經有 13 个地方联合会的代表，而現在，在 4 月 7 日将要在薩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国际代表大会的前夕，該协会已經組織起来的地方联合会共有 70 个以上；同时在一百多个地方都各有一个或几个地方支部，正在巩固自己的組織。在 8 个工业部門中都有工会，它的組織遍布整个西班牙，并且都加入了国际。現在正就一个很大的拥有四五万会员的工厂工人联合会参加我們协会的問題进行談判。宣傳工作十分活跃，联合会委员会的文告全国都可以看到。自西班牙議会对国际的問題进行辯論以来，资产阶級报刊紛紛轉載协会出版的每一个文件，这給屬于国际并且捍卫国际原則的那七八家西班牙报纸帮了很大的忙。这就是西班牙政府在迫害我們协会会员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現在，当迫害和种种限制已經成为常规的时候，西班牙的国际会员

們却不顧政府的反對，打算在薩拉哥沙舉行自己的第二次公開代表大會。

他們自己不知道需要多少會費券，因為會費是每月繳納的。他們擔心使用會費券有困難；如果按月印發會費券，對他們說來會方便一些。

聯合會委員會隨信附來了向各聯合會委員會的呼籲書，它希望這些委員會以及總委員會在西班牙國際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能夠向他們致電祝賀，以表示協會所提倡的團結一致。

載于 1872 年 3 月 31 日
“東郵報”第 183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總委員會記錄簿，
並根據“東郵報”校對過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关于薩拉哥沙 代表大会的发言記錄⁴⁷⁹

摘自 1872 年 5 月 7 日总委员会會議記錄

国际西班牙組織的代表大会是 4 月初在薩拉哥沙召开的，但是會議記錄只是現在才发表；代表大会的結果是，在巴枯宁领导下在最近四年中无时无刻不企图在我們协会的队伍里制造糾紛的那个人数不多，但是非常活跃的派別遭到了彻底的失敗。这个派別組成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国际性团体，当它被允許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时，它曾經庄严地保证一定解散自己的特殊組織，并且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是，尽管有这个庄严的保证，同盟却繼續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于国际内部，这是目的不在于反对各国統治階級及其政府，而是要反对它允諾溶化在其中的那个无产阶级組織本身的秘密团体的第一个例子。在西班牙，这个秘密团体一度控制了国际，但是在瓦倫西亚代表會議(1871 年 9 月)召开前不久，在它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見分歧。把国际的利益确实看得比一个渺小的宗派集团的利益珍貴的那部分盟員遭到了这个宗派的狂热分子和陰謀分子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由薩拉哥沙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个冲突。在这里，同盟的忠实信徒提出了章程修改草案。他們在草案中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同他們的朋友、瑞士汝拉山区的宗派主义分子在他們的通告中向总委员会提出的

要求一樣。這兩個委員會以及所有的委員會都應該被剝奪一切權力，並且被貶為簡單的通訊統計局；應該授權各支部和地方聯合會通過任何它們認為合適的地方性章程而不受聯合會委員會的任何監督；只是它們必須把這些章程提交應屆代表大會批准。應該讓一切支部完全自治，它們有權做一切它們認為應當做的事情而不考慮任何章程；實際上就是整個協會應該解散，它的組織作為一個政黨應該完全取消，它的活動應該停止；而且這正好是在這樣的時刻提出的：政府力圖扼殺西班牙的國際，國際的集會被禁止，就是這次代表大會的公開會議也被用武力驅散，而卡洛斯派的宣傳家們則手持武器，伺機利用國際來在薩拉哥沙發動一次歸根到底必然為他們的目的服務的起義！不僅如此，在提出這些建議的時候，瓦倫西亞代表會議所貫徹的、確實非常良好的組織措施已經產生了完全出乎意外的效果，已經整頓好組織的地方聯合會已經從 15 個增加到 55 個，還不算正在整頓組織的 19 個聯合會和雖然有了支部但是還沒有把地方聯合會完全組織起來的 94 個地區。這些結果證明，情況有利於瓦倫西亞通過的章程，有利於貫徹這個章程的聯合會委員會，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卻主張實行一種體制，以便恢復徹底的混亂狀態，斷送已經獲得的一切成就，並且向任何政府的或者警察局的密探和任何數量的資產階級叛徒敞開協會的大門，試問這些人究竟有什麼成功的希望呢？代表大會在只有兩三個人棄權的情況下一致地聲明，在瓦倫西亞通過的章程仍然完全有效，因此，想借口建立國際的更完全的組織來消滅西班牙的國際的企圖顯然已經破產。這個結果對於我們整個協會具有很大意義。它再一次證明，在西班牙也像在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只要訴諸工人階級堅定不移的健全理智，就可以粉碎虛偽的改組派和冒牌

預言家的騙局和宗派主义的阴謀詭計。巴枯宁及其追隨者把西班牙看成是他們的堡壘，因為他們在好幾年內一直控制着在這個國家里的全部宣傳工作。但是，一當無產階級運動在整個西班牙開展起來，西班牙工人就再不允許狹隘的宗派主義教條來束縛自己了；他們拒絕為了一小撮陰謀家的個人目的而犧牲由他們自己建立和完善起來的組織；這些陰謀家不止一次地企圖把國際變成自己的工具，但是都遭到了失敗，現在他們又千方百計地要在實際上搞垮國際。大家很清楚，總共只有 9 個支部而且其中大多數已經徹底垮台的瑞士汝拉聯合會在去年 12 月建議立即召開全協會非常代表大會，其目的就是要在現在向薩拉哥沙代表大會提出的並且取得了如此輝煌的結果的那些原則上徹底改組國際。在西班牙的所有地方聯合會中，只有馬利奧爾卡島上的帕耳馬市的一個聯合會曾表示贊成召開這次非常代表大會。可是現在在薩拉哥沙，就是這個帕耳馬地方聯合會的一個代表也聲明說，選舉他的人給了他一個正式指示，要他投票反對這一套所謂的改組和贊成原封不動地保留現有的章程！可見，薩拉哥沙代表大會的表決一方面確認了授予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權力，同時也間接確認了巴塞爾代表大會授予協會總委員會的與此相同的權力，而汝拉通告不久前却攻擊這些權力是獨裁的和專制的權力。

在意大利，貴族和資產階級仍然厚顏無耻地企圖繼續冒充工人階級的真正代表。在 4 月的最後幾天，在羅馬城一個最好的劇院里，舉行了一次所謂的工人代表大會。⁴⁸⁰ 泰阿諾公爵擔任主席。代表都是王公、公爵、侯爵、伯爵和諸如此類的“高貴”人物，以及銀行家、工廠主、議員和幾個小店主。真正的工人只有八個。這并不妨礙這次受政府領導和特別庇護的“代表大會”打着意大利工人的

招牌来高談闊論并且通过一大堆決議，声称工人对于“大人先生們”慈悲地俯允为他們效劳表示非常滿意和感激；只要他們能得到更多的貸款和建立更多的合作社，他們的宿願就会得到充分滿足。使他們失望的是，羅馬的真正工人自己决定举行集会，討論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有权代表意大利工人階級的問題。虽然政府不准在牆上張貼关于举行这次集会的通告，但是仍有大批工人前来开会。他們对这次騙人的代表大会所做的決議提出抗議，并且声明，只有意大利工人自己在与全世界工人結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一切和他們有关的社会問題。

恩格斯还通知說，他剛剛收到了一封米兰来信，信中更詳細地叙述了在上星期报告过的那个事件；来信說，該支部被迫停止出版自己的报纸，因为支部的一些成員被捕了。恩格斯研究了費拉拉协会的章程并审查了同章程一起寄来的关于它无条件参加国际的申請书以后，建議批准这个章程，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和切实可行的章程。

載于 1872 年 5 月 12 日
“东邮报”第 189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
记录簿和“东邮报”

卡·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 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2 年 6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馬克思說，組織問題无疑会成为代表大会討論的主要問題。已經展开的斗争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点。最好把关于总委员会的問題和关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問題分开來討論。巴枯宁的建議不过是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統計局，而为了这一目的是不值得要一个总委员会的。报纸可以刊载能够收到的一切消息。但是，应当記住，虽然总委员会曾屡次提醒各个支部，在收集統計資料方面必須进行一些工作，但是直到現在还没有收集到任何統計資料。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建議是合乎邏輯的，因为它贊成把总委员会作为一种已經不需要的机构而加以取消，它认为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可以由联合会委员会来做，认为只要联合会委员会已經在各国建立起来或者目前正在建立，它們就会把領導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西班牙的“解放报”批評了这个建議，它宣称，这个建議意味着协会的死亡，并且其中也缺乏彻底性，因为，从邏輯上推論同时也應該取消各个联合会委员会。尽管如此，发言人将不反对把这个建議作为一种选言推理，作为一种試行办法，虽然他相信，这只会证明恢复总委员会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政策被否决，他准备贊同这个建議。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

都不同意巴枯宁的一面保存总委员会而同时又使它失去意义的建議。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总委员会
记录簿

卡·馬克思关于巴里的 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⁴⁸¹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3日會議記錄

馬克思說，某个支部选举什么人，这誰也管不着。不过，如果巴里不是所謂的英国工人領袖之一，这是他的荣幸，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資產階級和政府收买了。巴里遭到攻击，只是因为他不願意充当黑尔斯的工具。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記錄”1958年馬迪遜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庫諾抄写的
記錄的副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 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⁴⁸²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3日會議記錄

馬克思說，同盟之所以被接受，其原因在于起初并不知道它的秘密性质。总委员会清楚地了解到，同盟違背它在1871年8月6日发表的关于解散自己的正式声明而繼續存在；但是倫敦代表會議除了通过众所周知那几項決議外，不能采取别的措施。它并不反对秘密团体本身——要知道它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团体——而是反对敌視国际工人协会并給它带来損害的秘密团体。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曾激烈反对接受这里所提到的那个支部，因此，总委员会根据章程的規定拒絕接受它。在布魯塞尔情况就不同了。当地的法国人支部曾写信給总委员会說，按照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法国人支部加入比利时組織会把后者泄漏給警察局。因此总委员会不能不承认这个支部是独立的，并且对于也是在布魯塞尔的第二个法国人支部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記錄”1958年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庫諾抄写的
記錄的副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 代表資格证的发言記錄⁴⁸³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4日會議記錄

馬克思代表委员会提議取消威斯特的代表資格证，因为他：（1）是被暂时开除的第十二支部的成員；（2）是費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3）是亲王街委员会的成員。此外，威斯特的代表資格证是由維多利亞·伍德赫尔签发的，这个女人为了当合众国总统，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阴谋活动，她是降神派的主席，鼓吹自由恋爱，并且拥有一个銀行企业等等。維·伍德赫尔創建的第十二支部几乎全由資产者組成，主要进行爭取妇女选举权的宣傳，它发表过一个臭名远揚的告合众国操英語的公民的呼吁书，硬把一切胡說八道的东西加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头上，根据这个呼吁书在美国国内成立了許多与它类似的支部。另外，呼吁书还談到个人自由、社会自由（自由恋爱）、服式規格、妇女选举权、全能語言等等。10月28日，他們宣称，“工人階級自己解放工人階級”只是意味着，实现工人階級的解放不應該違背工人自己的意志。他們把妇女問題放在工人問題的前面，并且不願意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組織。第一支部对第十二支部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議，要求每个支部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組成，因为直到現在美

国的一切工人运动都受资产阶级利用。第十二支部反对关于三分之二雇佣工人的要求，并譏諷地問道：难道不做雇佣奴隶而做自由民就是犯罪嗎？当时双方都向总委员会申訴，总委员会于3月5日和12日决定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

基于这一切理由，威斯特不可能被批准参加会议。但是，第十二支部不承认总委员会的决定。^①威斯特也参加了費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都拒絕承认总委员会，而同汝拉联合会保持联系，而且，根据报纸报道，汝拉联合会号召它們不要向总委员会繳納会費，用这种办法来使总委员会陷于絕境。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記錄”1958年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庫諾抄写的記錄的副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收藏在威斯康星图书馆（美国）并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有关文件記錄”一书中发表过的那份記錄的副本中，这句话是这样記的：“虽然它們自己要求总委员会做出决定，但是第十二支部及其信徒們却不承认这个决定”。——編者注

卡·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 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6日会议记录

我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来的总委员会要求这种权力的。我們宁肯同意取消总委员会，也不願像布里斯美所提議的那样，把它变成某种信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領導就会落到新聞記者手里，就是說不是落到工人手里。

发言人困惑莫解，汝拉联合会和其他棄权論者怎么能支持第十二支部；要知道正是这个支部想把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贯彻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来利用。

告訴那些在提到警察局建立的支部时就发出怀疑的冷笑的人吧，这样的支部已經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了。总委员会收到了从奥地利寄来的請求不要承认不是由总委员会代表或地方組織建立的支部的信件。

不久前被法国流亡者从自己中間驅逐出去的韦济尼埃及其同伙，自然是拥护汝拉联合会的。总委员会收到了对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专断、濫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等等行为的直接控告，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都沒有受到过这样的控告，而且控告是由比利时工人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信为证。像韦济尼埃、朗德克等这类人，

根据我的观察,是首先組織联合会委员会,然后才組織联合会和支部的;俾斯麦的走狗同样可以干出这种事情来。正因为如此,总委员会才应该具有解散和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的权力,然后应向各支部发出呼吁书;为了由民意决定,某个联合会委员会是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呼吁书有时是非常适当的。在奥地利,空談家、教皇至上主义者、激进派和奸細們正在建立支部,以便敗坏国际工人协会的名誉;在法国,有一个支部是警官建立的;虽然如此,在国际遭到禁止的地方的組織是最好的組織,因为迫害总是导致这样的后果。

总委员会现在就有可能用一个接一个地暂时开除支部的方法来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在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时,总委员会可能立即受到譴責或指摘,因此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使用这种暂时开除的权力。但是,只要总委员会不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多数人的代表者,那末即使我們承认总委员会有黑人酋长或者俄国沙皇的权力,这种权力反正也会是虛幻的;总委员会沒有军队,沒有預算,它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得不到全协会的贊同,它将永远是軟弱无力的。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馬迪遜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庫諾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 駐在地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6日会议记录

恩格斯发言论述他关于把总委员会駐在地迁往紐約的建議。总委员会至今一直設在倫敦，因为只有有在倫敦它才具有国际性，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委員的安全才有保障。在紐約我們的文件将同在倫敦一样安全，而在大陆上無論哪里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布魯塞尔和日内瓦也不例外，那里发生的一些警察事件就可以使人相信这点。但是，在倫敦，党内分歧已經非常尖銳，所以必須改变总委员会的駐在地。

此外，对总委员会的指責变得如此尖銳和經常，这使得它过去的委員大多数都感到厌恶了，他們决定不再参加总委员会。他可以非常肯定地用馬克思和他自己的名义声明这一点。此外在过去的总委员会中也远不是始終团結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它的全体委員都可以作证。总委员会八年来都留在一个地方，也終究需要換一換地方，以免出現我們不希望出現的僵化現象。根据这一理由，馬克思还在1870年就建議把总委员会迁到布魯塞尔去，但是，当时各联合会都主張总委员会留在倫敦。現在究竟應該把总委员会迁到哪里去呢？迁到布魯塞尔去嗎？比利时人自己声明說，这不

合适，因为人员和文件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迁到日内瓦去嗎？日内瓦人坚决表示反对，他們的理由多少同比利时人的理由一样，并且还援引吳亭的文件被沒收的事实。

因此，除紐約而外，再沒有其他的地方了。在紐約我們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們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組織，在那里我們的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只要看一看紐約联合会委员会就够了，它是由爱尔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德国人(不久还会有美国人)組成的。那种认为紐約太远的反对意見是經不住批評的，因为这将对那些极力維護自己內部事务而不让总委员会干預的欧洲联合会有一定的好处；要知道正是由于距离远，才使它难于进行这种干預，才会阻撓个别联合会在总委员会中获得过大的影响。不过，总委员会已經有权，甚至有責任在一定情况下为一定的国家委派駐欧洲的全权代表，正如它至今所經常做的那樣。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庫諾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紐約总委員會發給 卡·馬克思的委托書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會

茲授權卡尔·馬克思(現住英国倫敦梅特兰公園路 1 号)負責收集和保管国际工人协会前总委員會的各种財物, 听候总委員會的指示。

責成并建議倫敦和其他各地的国际工人协会前总委員會原来的全体委員和職員重視这个指示, 把一切書籍、文件等現在屬於总委員會或者过去在总委員會駐在倫敦期間屬於总委員會的全部財物交給卡尔·馬克思。

根据总委員會的指示并代表总委員會

总書記 弗·阿·左尔格

1872 年 12 月 30 日于紐約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紐約總委員會發給 弗·恩格斯的委託書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

委託書

茲委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現住倫敦瑞琴特公園路 122 號)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負責意大利事務的臨時代表。授權並責成他根據隨時接到的指示代表總委員會進行活動。

根據總委員會的指示並代表總委員會

總書記 弗·阿·左爾格

1873 年 1 月 5 日於紐約

第一次發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給总委员会駐倫敦負責 意大利事務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指示

1. 总委员会負責意大利事務的代表將全力促進在意大利按照共同章程、條例和总委员会的指示組織國際。

2. 他應該注意意大利運動的工人性質。

3. 在緊急情況下，他將對有關在意大利組織和領導我們協會的有爭論的問題做出臨時決定，而有關方面有權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訴，同時，他應該立即用適當方式通知总委员会。

4. 他也有權暫時開除意大利的個別會員或整個組織，聽候总委员会做出決定，同時，他應該立即向总委员会報告所採取的措施，提出證明文件；如果沒有請示和沒有得到总委员会有關的特別指示，他沒有權利開除由总委员会直接委派的任何代表。

5. 他有权在意大利發給一些人以一定期限的臨時委託書，但是這些人的權力無論如何不應該超過由总委员会直接委派的代表的權力；當然，一切委託書和權力都應該由总委员会做出決定加以批准，也可以隨時被撤銷和廢除。

6. 他應該注意按時收齊會費并上繳总委员会。

7. 他應該与总委员会保持經常联系，让它了解各種事件，并且

每月給总委员会寄一份詳細的报告。

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書記 弗·阿·左尔格

1873年1月5日于紐約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总委员会 1873 年 1 月 26 日的决议⁴⁸⁴

鉴于章程第三条规定：

“全协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①；

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规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各团体的地方章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鉴于任何团体或个人都不能参加它（他）反对其规章的组织，也就是说不能同时既在组织之内，又在组织之外；

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团体或个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可能有的损失，有权在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抗议；

其次，鉴于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规定“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每一个团体或个人有参与通过决议的权利，同时也有执行已被通过的决议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总委员会声明：

^① 见本卷第 166 页。——编者注

凡是拒絕承认代表大会決議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組織条例所規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总委员会：

F. J. 倍尔特兰	弗·波尔特
康·卡尔	西·德雷尔
福尔納契耶利	S. 卡瓦納
C. F. 劳雷耳	E. 勒維埃耳
弗·阿·左尔格	卡·施佩耶尔
E. P. 圣克莱尔	

总書記 弗·阿·左尔格

1873年1月26日于紐約

載于1873年3月15日“工人报”
第6号，1873年3月22日“解放
报”第90号，1873年3月29日
“人民国家报”第26号，1873年
3月29日“国际先驅报”第5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

总委员会 1873 年 5 月 30 日的决议

鉴于：1872 年 12 月 25 日和 26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①；

鉴于从 1872 年 12 月 25 日到 1873 年 1 月 2 日在哥多瓦召开的部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海牙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②；

鉴于 1873 年 1 月 26 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海牙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 1873 年 1 月 26 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① 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而是“否决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编者注

② 指圣伊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编者注

总委员会:

F. J. 倍尔特兰	弗·波尔特
康·卡尔	S. 卡瓦纳
西·德雷尔	C. F. 劳雷耳
弗·阿·左尔格	卡·施佩耶尔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3年5月30日于纽约

載于1873年6月7日“工人报”
第18号和1873年6月25日
“人民国家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工人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关于国际各意大利支部的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合会，因为追求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根据章程和条例规定在支部被接受和承认以前必须履行的任何一个条件。

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合乎规定并且与总委员会有联系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1873年5月30日于纽约

載于1873年6月7日“工人报”
第18号和1873年6月25日
“人民国家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們⁴⁸⁵

1873年9月3日于倫敦

公民們!

为了力求保证代表大会能够完全自由地討論总委员会在1872—1873年这一段时间的活动,紐約总委员会及时做出决定,不派总委员会委員作为代表,而在欧洲选出一位全权代表,委托他把章程所規定的正式报告和內部报告提交代表大会审查,并提出关于會議議程中各个問題的決議案。我在看完了总委员会寄給我的文件以后,更加乐意地同意接受它的委托书,因为我完全贊同它的組織活动和各項正式决定。但是,由于最近收到各国寄来的报告,我认为有責任拒絕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們的會員們在这些国家的困难处境使我不能更詳細地談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况就足以說明問題:在法国——从那里給我寄来几份委托书——形勢不允許直接选派代表;西班牙目前正处于危急关头,如果我們西班牙的會員們这时离开本国,就会被劳动群众看做一种怯懦的表现;由于西班牙事件的結果,我們在葡萄牙的朋友們的財務負擔大大加重了,以致他們除了間接选派代表以外,再也沒有別的选择;最后,在意大利,警察当局对国际會員橫加迫害,在德国,接二連三地进行逮捕,在哥本哈根,中央支部被强迫解散,在奥匈帝国,对一切

工人运动的镇压日益变本加厉，——这一切使得工人无法选派真正的国际代表。在这种对于协会说来甚至比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立即出现的情况还要艰难得多的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就会使代表大会由于代表成分的关系而或多或少带有局部的性质。

另一方面，就政治情况来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在选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这件事上所处的条件要有利得多，它本来已经委派了自己的代表——阿尔弗勒德·戴伊斯、弗·列斯纳、奥·赛拉叶；但是，看了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书记的文件以后，该委员会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决定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即使上述的一般考虑并不要求我放弃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那末促使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做出决定的那些事实已足以使我无法参加代表大会，虽然我收到了从法国、美国和葡萄牙等国寄来的委托书。

顺便把总委员会寄给我的文件寄给你们⁴⁸⁶。

致兄弟般的敬礼

奥·赛拉叶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9月3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恩格斯的手稿译的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1月中至3月初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篇內部通告。3月5日，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闡述了通告的基本論点，并指出了这个描繪出了“协会的研究得非常透彻的原則和政策的歷史发展图景”的文件的意义。“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这篇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內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它完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一定阶段。在倫敦代表會議（1871年9月）以后，巴枯宁分子的敌对活动特別加强了。代表會議做出了关于必須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決議，从而給了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反对国际，首先是反对总委员会和馬克思的瘋狂运动。在1871年11月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桑維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通告（見恩格斯“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6—522頁），这个通告是国际內部和外部各种敌視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总委员会的信号。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开活动，尤其是它的秘密活动使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成就——国际——受到威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揭露了他們同工人阶级的異己分子的联系以及巴枯宁所领导的同盟这个敌視工人运动的宗派的活动。

“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这篇通告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員署名于1872年5月底第一次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并分发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的俄譯文于1928年第一次发表在維·波朗斯基所著“米·巴枯宁的傳記材料”一书（第3卷第466—490頁）中，但有很大删节。第一篇完整的俄譯文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8年

发表在“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9期上。——第3頁。

- 2 卡·馬克思“法兰西內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頁）。——第7頁。
- 3 为回答資产階級报刊因“法兰西內战”这个宣言的出版而对国际进行的誹謗，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总委員會的名义写信給“泰晤士报”、“旗帜报”、“每日新聞”等英国报纸，捍卫了巴黎公社并闡述了国际的立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5—404、407頁）。——第8頁。
- 4 由于为逃避凡尔賽政府的迫害而逃往英国的公社社員来到倫敦，总委員會从1871年6月起就开始为公社流亡者募捐，分配救济物資以及为他們安排工作。总委員會的所有这些活动的組織者是馬克思。在7月間总委員會成立了一个專門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員會，参加这个委員會的有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員會委員；后来由于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緊張筹备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遂于1871年9月5日退出了該委員會，他們的工作由其他总委員會委員接替。尽管設有專門的委員會，总委員會在1871—1872年間对組織公社社員的救济工作仍繼續予以极大的重視。——第8頁。
- 5 从五十年代末以来，英国工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确定九小时工作日。1871年5月，新堡的建筑和机器制造工人实行了大罢工，罢工是由爭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領導的。在新堡的斗争具有特別尖銳的性质，因为同盟第一次把沒有参加工联的工人也吸引到斗争中来了。同盟主席巴尔奈特請求国际总委員會阻止已在进行的把罢工破坏者运入英国的行动。由于这个緣故，总委員會便派遣它的两名委員埃卡留斯和柯恩到大陆去向工人們解釋新堡发生的斗争的意义。由于国际总委員會的积极支持，运入罢工破坏者的計劃被粉碎了。1871年10月，新堡的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終；为工人确定了五十四小时工作周。——第8頁。
- 6 1871年7月25日总委員會通过了恩格斯所提出的于1871年9月在倫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會議的建議。从这时起，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这次會議在組織上和理論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們草拟了會議議

程和決議草案，議程和草案都在總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了討論，然後提交倫敦代表會議。標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重要階段的國際倫敦代表會議，於1871年9月17—23日舉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9頁。

- 7 國際總委員會關於不在巴黎而在美因茲召開代表大會的決議於1870年5月17日通過。1870年7月12日根據馬克思的建議通過了美因茲代表大會的議程草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頁）。——第9頁。
- 8 在1870年6月28日的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建議在各支部討論關於改變總委員會駐在地的問題，理由是必須不要為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工人造成優越條件；經過總委員會多次會議討論之後，這個建議被通過了，馬克思便於1870年7月14日寫了“給各支部的機密通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頁）。各支部反對改變總委員會的駐在地，認為倫敦是國際工人協會領導機關進行活動的最適宜的地方。——第9頁。
- 9 1865年9月25—29日在倫敦召開了預備性代表會議，以代替原擬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關於推遲代表大會和召開代表會議的決議是由於馬克思的堅持而為總委員會所通過的，馬克思認為，國際的地方性組織在思想方面和組織方面還不夠鞏固。——第9頁。
- 10 法國外交部長茹·法夫爾在1871年5月26日給法國駐各國外交代表的緊急通告中建議他們力爭讓歐洲各國政府逮捕公社流亡者並把他們作為普通刑事犯加以引渡。

杜弗爾提出了一項由法國國民議會的一個專門委員會起草的法案，按照這項法案國際會員要受到監獄監禁的處罰。該法案於1872年3月14日通過。——第9頁。
- 11 1871年夏，俾斯麥和奧匈帝國首相博伊斯特採取了對工人運動進行共同鬥爭的步驟。1871年6月7日，俾斯麥向德國駐維也納大使施魏尼茨發出一個緊急指示，建議他就採取共同行動來反對工人組織一事同

奥地利政府进行磋商；1871年6月17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件备忘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1871年8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1871年9月又在薩尔茨堡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討論了关于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辦法的問題。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1871年8月摧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庫諾的迫害上（見本卷第84—85頁）。

1871年春天和夏天，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組織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压措施；由于这个緣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莫拉、莫拉哥和罗倫佐被迫流亡里斯本。——第9頁。

- 12 在奥匈帝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奥伯温德、安·肖伊、莫斯特和帕普斯特因被控叛国而于1870年7月被捕并被法庭判罪；遭到迫害的还有一些工人团体。

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員白拉克、博倫霍斯特、施皮尔等人因印发反对普魯士政府的軍国主义計劃的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870年9月5日）而于1870年9月9日被捕并被提交法庭审判。1870年1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侵略战争而被捕，他們被控的罪名是“图謀叛国”；1872年3月，他們被判处两年要塞監禁。——第10頁。

- 13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1871年8月12日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倫敦代表會議，而将現有經費用来帮助公社流亡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受托起草向倫敦代表會議的报告；8月20日，中央委员会委員一致通过該委员会的一件备忘录，然后将它交给了总委员会。备忘录分析了美国工人階級的經濟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馬克思在1871年9月22日代表會議的會議上簡單闡述了这个文件。——第10頁。

- 14 倫敦代表會議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1871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都是由总

委员会代行的。1871年10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工联的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中就产生了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集团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見注93）。黑尔斯等人在自己的斗争中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等等勾结起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但他们遭到了不列颠委员会中另一部分人（維克里、賴利、米尔納、列斯納等人）的反对，这些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与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1874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了。——第10頁。

- 15 指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九項決議，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表述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4—456頁）。——第10頁。
- 16 指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第二項決議，即“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的决议，这项决议堵塞了各种宗派主义组织钻入国际的道路（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52頁）。——第10頁。
- 17 指巴枯宁的宣言“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发表在1862年2月15日“钟声”第122—123号附刊上。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

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 1857 年至 1867 年用俄文出版；1868 年至 1869 年該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 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 11 頁。

18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組織。——第 11 頁。

19 指 1868 年 9 月 23 日米·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討論該同盟的綱領草案时提出的決議案。为了捍卫自己的建議，巴枯宁两次发言，他的发言发表在 1868 年 12 月 1 日“钟声”第 14—15 号上。——第 11 頁。

20 下面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告信是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會議对关于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問題的討論于 1868 年 12 月 22 日写成的。

1868 年 11 月 29 日，同盟临时委员会委員約·菲·貝克尔把这个团体的綱領和章程寄給了总委员会。在 1868 年 12 月 15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这两个文件。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轉寄給恩格斯，請他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恩格斯于 12 月 18 日滿足了这个要求；12 月 22 日，馬克思考慮了恩格斯的意見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并在稍加修改之后被通过。这件以机密通知的形式寄发的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2—384 頁）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中第一次发表。——第 12 頁。

21 下面引用的总委员会的通告信是馬克思为回答同盟中央局 1869 年 2 月 27 日写給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而写的。同盟中央局在信中声明說，如果总委员会贊同它的綱領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准备解散国际同盟。馬克思會同恩格斯磋商过回信的措詞；回信在 1869 年 3 月 9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获得一致通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93—394 頁）。这个文件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发表。——第 14 頁。

- 22 涅恰也夫案件——1871年7月至8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該案的詳情見本卷第439—471頁）。有关該案的材料公布于“圣彼得堡消息报”上。
- 倫敦代表會議委托吳亭起草一个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簡短报告，报告在公布前应提交总委员会。吳亭于1872年8月底寄給馬克思一个詳尽的关于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敌視国际的活动的机密报告供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参考，以代替上述报告。——第16頁。
- 23 “进步报”（《*Le 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該报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編是吉約姆。——第16頁。
- 24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語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該报編輯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該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改变了編輯部成員，撤銷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該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綫。——第16頁。
- 25 指馬克思所写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月1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頁）。——第16頁。
- 26 “劳动报”（《*Le Travail*》）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該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裝訂工人欧·瓦尔兰。——第17頁。
- 27 公共福利同盟——1464年年底在法国出現的封建貴族联盟，它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統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17頁。
- 28 “团结报”（《*La So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用法文在紐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

- 18 頁。
- 29 “工厂”(«La Fabrique»)——当时人們对日内瓦及其郊区的钟表和珠宝首饰物的生产的称呼,这种生产在工場手工业类型的大小作坊里进行,同时也由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第 18 頁。
- 30 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通过的关于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0 頁。——第 19 頁。
- 31 指由馬克思起草并經国际总委员会在 1870 年 9 月 9 日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5—294 頁)。——第 19 頁。
- 32 指巴枯宁主义者詹·吉約姆和加·勃朗起草的、标有 1870 年 9 月 5 日的日期的“告国际各支部”呼吁书,它作为“团结报”第 22 号的附刊发表于紐沙特尔。——第 19 頁。
- 33 里昂起义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傳來而于 1870 年 9 月 4 日爆发的。巴枯宁于 9 月 15 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領導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綱領。9 月 28 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奇襲。由于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同工人缺乏联系,由于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 19 頁。
- 34 1871 年 8 月 10 日,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日内瓦巴枯宁主义者支部的書記尼·茹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給瑞士通訊書記荣克,信中附有一份 1871 年 8 月 6 日通过的关于該支部自行解散的決議。——第 20 頁。
- 35 見“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 年布魯塞尔版第 172 頁 («Compte 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p. 172)。決議的俄譯文見“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年 9 月 6—11 日”1934 年莫斯科版第 87 頁。——第 20 頁。

- 36 1870年4月，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建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在紹德封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为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并在“馬賽曲报”上声明，只有它的拥护者才是国际的真正会员。在总委员会向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們說明了瑞士所发生的分裂的意义之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它无权过問这件应由总委员会审查的事情。——第21頁。
- 37 指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第十七項決議，即“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的決議。
在印成单行本的代表會議決議中发表了这个決議的摘要。決議全文載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頁）。——第21頁。
- 38 貝·馬隆“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敗”1871年紐沙特尔版（B. Malon. «La troisième défaite du prolétariat français». Neuchâtel, 1871）。——第21頁。
- 39 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产生于1871年9月6日，以代替8月間解散的日內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它的組織的除了这一支部的过去的成員茹柯夫斯基、佩龙等人以外，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其中有茹·盖得和貝·馬隆。——第22頁。
- 40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用法文在日內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22頁。
- 41 安·萊奧“社会战争。在1871年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說”1871年紐沙特尔版第7頁（A. Leo. «La guerre sociale. Discours prononcé au Congrès de la Paix à Lausanne 1871». Neuchâtel, 1871, p. 7）。——第22頁。
- 42 “費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該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

“高卢人报”（«*Le 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

貴族階級的喉舌，1867 年至 1929 年在巴黎出版。

“巴黎報”（*Paris-Journal*）是和警察當局有聯繫的反動日報；1868 年至 1874 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國的政策，第二帝國崩潰後支持國防政府和梯也爾政府；對國際和巴黎公社進行卑鄙的誹謗。——第 22 頁。

- 43 指 1868 年 7 月 7 日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建議通過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52 頁）。所以有必要做出這個決議，是因為費·皮阿在 1868 年 6 月 29 日舉行的 1848 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他在演說中直接號召採取恐怖行動反對拿破侖第三。布魯塞爾的一家報紙“蟋蟀報”（*La Cigale*）在關於那次會議的報道中把費·皮阿說成是國際的領導人之一。這種說法還被其他報紙所一再重複。

決議在報刊出現之後，在倫敦的法國人支部（費·皮阿是它的一個成員）發生了分裂。無產階級分子的代表（歐·杜邦、海·萊克、保·拉法格等人）離開了該支部，表示不贊同皮阿的冒險性和挑釁性策略。皮阿的一小夥人與國際失去聯繫，但他們繼續自稱為“在倫敦的法國人支部”，並以國際工人協會的名義出版文件，而且一再支持反對總委員會中的馬克思路綫的各個反無產階級的小集團。——第 24 頁。

- 44 1869 年間在總委員會里不止一次地提出與在倫敦的一小夥法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費·皮阿（見注 43）的追隨者正式劃清界限的問題。1870 年春，劃清界限更顯得特別必要了，因為這時在法國正準備對被控謀刺拿破侖第三的國際會員進行第三次審判；而這個所謂在倫敦的法國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來作為起訴的材料，其中包括 1868 年 10 月 20 日的會議上通過的呼喚書，這個呼喚書把國際同費·皮阿所領導的秘密共和團體“革命公社”混為一談。由於這個緣故，馬克思便起草了一個決議案，它在 1870 年 5 月 10 日為總委員會通過。決議指出國際和這個集團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5 頁）。逮捕國際法國會員的真正原因是，巴黎聯合會委員會於 1870 年 4 月 24 日印發了一個宣言，揭露了正在籌備中的全民投票的用意（見注 159 和注 160）。

“馬賽曲報”(《*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國日報，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該報經常刊載有關國際的活動和工人運動的材料。

“覺醒報”(《*Le Réveil*》)是法國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原為周刊，從1869年5月起改為日報，從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呂茲主編。該報公布了國際的文件和關於工人運動的材料。——第24頁。

- 45 1871年10月7日總委員會的非常會議審查了替法國警察機關效勞、並以1871年法國人支部領導者之一的身分混進國際的杜朗進行間諜活動的問題。杜朗同警方官員的來往信件曾被提交總委員會。按照警察機關的指示，杜朗應該打入倫敦代表會議充當密探，並且鑽進總委員會。關於開除杜朗的決議是由恩格斯起草並在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9頁）。——第25頁。
- 46 1871年10月17日關於1871年法國人支部章程的決議是馬克思寫的，並經總委員會一致批准。總委員會指出，支部章程與共同章程的抵觸使支部加入國際發生了困難。決議本文以法國通訊書記奧·賽拉叶的手抄稿的形式保存下來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1—474頁）。——第25頁。
- 47 1871年11月7日總委員會討論了1871年法國人支部的回答，該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聲明不同意總委員會1871年10月17日的決議（見注46）並對總委員會進行了攻擊。奧·賽拉叶做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他提出了由馬克思寫的決議案，決議案得到總委員會的一致批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9—504頁）。該決議第一次發表（不全）在“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這一著作中。——第26頁。
- 48 “在倫敦的1871年法國聯邦主義者支部宣言”1871年倫敦版(《*Déclaration de la Section française fédéraliste de 1871, siégeant à Londres*》. Londres, 1871)。該支部在這本小冊子的標題前面加

上了“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字，尽管总委员会拒絕接受它加入国际。——第28頁。

49 指“代表會議的特別決議”的第二个決議，这个決議指出德国工人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決議是以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况的演說中所包含的結論为基础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7頁）。——第28頁。

50 指法国通訊書記奧·賽拉叶1871年11月11日給“誰来了！”报編輯韦梅希的一封信，发表在1871年11月16日該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上。

“誰来了！”（《*Qui Vive!*》）是1871年在倫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28頁。

51 指总委员会受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委托而出版的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的正式版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先后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和12月在倫敦出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fficial edition revis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和《*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dition officielle, révisée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德文的正式文本刊登在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上，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标题是：《*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Amtliche deutsche Ausgabe, revidiert durch den Generalrath*》。Leipzig,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Volksstaat*》。1872。

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的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頁。——第29頁。

52 《*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Genève, 1866, p. 27, note. ——第29頁。

53 《*Troisième proc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

- vailleurs à Paris». Paris, 1870, p. 4. — 第 30 頁。
- 54 指倫敦代表會議的第十七項決議，即“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的決議，它建議从罗曼語区联合会分裂出去的各无政府主义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9—460 頁）。——第 30 頁。
- 55 指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在 1871 年 12 月 2 日日內瓦各支部會議上提出的，旨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倫敦代表會議决定并以伪造的国际的文件为基础的決議。联合会會議否決了无政府主义的決議草案，通过了贊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和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的決議。馬隆的无政府主义的決議草案发表在 1871 年 12 月 7 日“社会革命报”第 7 号上。——第 32 頁。
- 5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60 頁。——第 32 頁。
- 57 指 1871 年 6 月 6 日法国外交部长給法国駐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茹尔·法夫尔在通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92—394 頁。同时也指薩卡茲在 1872 年 2 月 5 日代表杜弗尔法案（見注 10）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第 37 頁。
- 58 在这里和下面馬克思引用的是經日內瓦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倫敦用英文出版的国际的章程（«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7）。——第 39 頁。
- 59 这里有笔誤。共同章程第六条是在 1866 年国际日內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見“1866 年 9 月 3 日至 8 日在日內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 年日內瓦版第 13—14 頁（«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 pp. 13—14）。——第 41 頁。
- 60 工人联合会于 1871 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馬志尼分子的影响。1872

年1月联合会中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分子，他們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該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領導。

“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該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第41頁。

- 61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9月布魯塞尔版。“比利时人民报”附刊第50頁（《*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septembre 1868. Supplément au journal 《*Le Peuple Belge*》, p. 50）。——第42頁。
- 62 指米·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綱領，1868年在日內瓦用法文和德文印成傳单出版。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引用了綱領的全文。——第45頁。
- 63 指无政府主义年刊“1872年人民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国际的組織”。——第46頁。
- 64 1871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諾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論者总协会”的計劃，它的綱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問題等等）。斯蒂凡諾尼本人承认，該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諾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該协会綱領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論战中，斯蒂凡諾尼发表了一系列誹謗总委员会、誹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是从拉薩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諾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給“玫瑰小报”編輯部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6—528頁，馬克思的文章“再論斯蒂凡諾尼和国际”，見本卷第93—96頁），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許多活动家也起

来反对斯蒂凡諾尼的計劃，結果斯蒂凡諾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資产階級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該报在1871年至1872年維護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50頁。

65 “白衫党”或“白罩衫党”是对第二帝国警察当局所組織的匪帮的称呼，这些由游民組成的匪帮冒充工人，举行挑衅性的示威游行和发动，为迫害真正的工人組織制造借口。——第50頁。

66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該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薩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結德国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該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場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們所进行的仇視总委员会的活动。——第50頁。

67 1871年12月24—25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討論桑維耳耶通告时，沒有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立即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却通过了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协会新章程的決議。这个从无政府主义立場制定的，并在1872年7月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討論过的章程草案規定取消总委员会。——第50頁。

68 A. Richard et G. Blanc. «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 Appel du peuple et de la jeunesse à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Bruxelles, 1872. ——第51頁。

69 关于国际美国联合会的分裂的这几項決議是由馬克思起草，并根据他的建議在1872年3月5日和12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的。

1870年12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紐約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以資产階級女权主义者維·伍德赫尔和

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1871年7月加入了这些支部，它們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爭取资产階級改良的宣傳。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們把自己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別是和弗·阿·左尔格所领导的紐約德国人第一支部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际的組織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871年9月27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紐約中央委員會向总委員會提出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該組織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支部。总委員會在1871年11月5日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頁）中，拒絕了第十二支部的要求，并确认了紐約中央委員會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仍繼續进行自己的活动，这就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組織中的小资产階級成分，并在1871年12月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和小资产階級支部的分裂。在紐約成立了一个有左尔格和波尔特等人参加的临时联合会委員會和以伍德赫尔以及第十二支部的其他资产階級改革派为首的第二委員會。总委員會坚决支持了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阶级派；第十二支部被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屆代表大会为止。1872年5月28日，总委員會承认临时联合会委員會是国际在美国的唯一领导机关。1872年7月，在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常設性的联合会委員會，临时联合会委員會的委員差不多全都加入了这个机构。关于美国联合会分裂的原因，弗·恩格斯在“国际在美国”（見本卷第106—113頁）一文中作了詳細的闡述。

总委員會的決議发表在各国国际的刊物上，包括“人民国家报”在內。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該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論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被逮捕，該报編輯部成員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該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該报編輯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該报經常刊載

他們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国家报”的活动有很大意义，他們密切注視它的工作，批評它的个别缺点和錯誤，糾正報紙的路綫；因此这家報紙成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56頁。

70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六項关于組織問題的決議，即“关于将支部开除出协会的程序”。決議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暫時开除国际的个别支部，听候屆代表大会裁決。——第58頁。

71 大概是指一小群在苏黎世学习的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大學生，他們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影响下組織了一个同盟小組，名称叫做“斯拉夫人之幕”。这个小組在1872年春几度企图正式組成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絕后，于1872年6—7月間加入了汝拉联合会（它的綱領是巴枯寧起草的）；1873年夏，这个小組瓦解了。——第58頁。

72 “自由报”（*«La 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報紙，1865年至1873年在布魯塞爾出版；1872年至1873年改为周刊；从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60頁。

73 古·勒弗朗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1871年紐沙特尔版第92頁（G. Lefrançais. *«Étude sur le mouvement communaliste à Paris, en 1871»*. Neuchâtel, 1871, p. 92）。——第60頁。

74 馬克思揭露“巴黎报”发表假信的声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1、314—317頁。

根据馬克思的建議，总委员会法国通訊書記奧·賽拉叶也于1871年3月16日写信給一些報紙进行揭露。

“欧洲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Europe»*）是奥尔良派報紙，1840年至1889年用法文在倫敦出版。

“未来报”（*«Die Zukunft»*）是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馬克思揭露“巴黎报”伪造信件的信发表在1871年3月26日該报第73号上。——第60頁。

75 在1872年2月20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通过了荣克提出的一項建議：于3月18日在倫敦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来紀念巴黎公社一周年。为了进行筹备工作，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的人有荣克、麦克唐奈、米尔納等人。在3月12日总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被指定为演讲人之一。在这以后，荣克随即写信給恩格斯請他准备決議草案。但是，群众大会沒有开成，因为房主在最后时刻拒絕出借大厅。然而，3月18日，国际會員和前公社社員还是聚集在公社社員团体的狹窄的屋子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来紀念第一个无产階級革命一周年。会上根据公社活动家泰斯和卡梅利納以及总委员会委員米尔納的建議，通过了三个簡短的決議；決議的全文和保存下來的用法文写的、由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眷抄并經卡尔·馬克思校对过的手稿完全一致。“东邮报”、“国际先驅报”和“自由报”分別在1872年3月23日、3月30日和3月24日关于大会的报道中发表了決議的全文，但沒有指明作者。

“国际先驅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倫敦出版。在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这段期間实际上是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該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會議和不列顛委员会會議的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72年底和1873年初，該报在反对脫离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由于該报的发行人和編輯威·賴利脫离了工人运动，从1873年6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替該报撰稿了，国际不列顛联合会的文件也停止在該报上发表。——第61頁。

76 費雷支部（因紀念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泰奧菲尔·費雷而取此名）是公社失敗后在巴黎成立的法国最早的国际支部之一。这个支部于1872年4月最終形成；它是总委员会同法国各个起义工人組織进行联系的据点。1872年7月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在总委员会特設章程审查委员会审查了該支部的章程以后，国际接受了这个支部加入自己的队伍。——第62頁。

77 馬克思的手稿“論土地国有化”是在1872年3—4月間写的，起因是由于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討論了土地国有化的問題。杜邦在3月3日写了

一封信給恩格斯，告訴他这个支部的成員在土地問題上有混乱的观点并且讲述了自己未来的发言中的五个要点。他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他能在支部會議召开之前考虑他們的意見。馬克思广泛地論证了他对土地国有化問題的观点。18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宣讀了一个报告(和保存下来的馬克思的手稿完全相符)；这个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讀的一个报告”为題于1872年6月15日发表在“国际先驅报”上。沒有指明作者和报告人。——第64頁。

78 这段話引自塞扎尔·德·巴普于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魯塞尔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第66頁。

79 这封信是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写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曾請求总委员会向西班牙联合会应屆代表大会致賀詞。1872年4月7日，在代表大会上宣讀了这封信并在“解放报”上予以发表。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2年4月4—11日在薩拉哥沙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31个地方性联合会的45个代表。警察当局根据政府的指示，破坏了代表大会的公开會議。

“解放报”(«*La Emancipacion*»)是国际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期間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會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該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貧困”的和“資本論”第1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許多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专为該报写的。——第68頁。

80 由于議員亞·貝·柯克倫在下院发表了一篇誹謗性的演說，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4月16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根据总委员会的決議，声明印成了傳单，同时在“东邮报”上发表。——第71頁。

81 馬克思在这里是指“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1864年在国际成立时，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这一部分里制定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群众組織的基本綱領性原理。这个引言部分原封不动地載入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共同章程中。这个文件的第三段闡明

了无产階級政治斗争的任务。这就是：“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偉大目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頁）。馬克思在他和“临时章程”同时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論证这个原理說，“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并号召无产階級“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頁和第14頁）。——第72頁。

- 82 指巴枯宁的小册子“一个国际會員对朱澤培·馬志尼的回答”1871年米兰版(«Risposta d'un Internazionale a Giuseppe Mazzini», Milano, 1871); 这本小册子是作为1871年8月16日“玫瑰小报”第227号附刊而发表的。——第72頁。
- 83 “人民呼声报”(«Die Volksstimme»)是奥地利的工人报纸, 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总委员会; 1869年4月至12月在維也納出版, 每月出两次。——第73頁。
- 84 “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ên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 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 发行人是韦梅希。該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74頁。
- 85 这段引文和以下的引文都是馬克思从1872年4月12日福塞特在下院发表的演說中摘录下来的。这篇演說发表在1872年4月13日“泰晤士报”上。——第75頁。
- 86 关于成立联邦劳动統計处的法案曾經在美国国会众議院中得到通过, 但是后来被参議院否决了。——第76頁。
- 87 致費拉拉工人协会的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关于該协会宣告成立并希望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通知而写的。恩格斯的信以及寄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性文件, 帮助該协会的會員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影响。5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議, 批准費拉拉协会为国际的一个支部。——第79頁。
- 88 恩格斯从这篇文章开始就經常为意大利“人民报”撰稿, 一直繼續到

1872 年底。在这以前，在 1871 年，該报发表了恩格斯若干来信的摘录和他寄到意大利去的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文件。根据該报主編恩·比尼亚米的請求，恩格斯为該报写了許多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以“倫敦来信”为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加上了这样一句編者按語：“今后我們將以这个标题陸續发表一位可敬的公民不辞辛勞地从倫敦写給我們的信”。由于政府的迫害使該报无法定期出版，以及由于工人运动普遍低落，恩格斯为“人民报”撰稿的工作从 1873 年初起中断了，直到 1877 年才恢复。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由姜尼·博西奥收入“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文集”1955 年米兰—羅馬版(《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Scritti italiani》. Milano—Roma, 1955)。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其他大部分文章一样，和博西奥所編的文集中的标题相同。

“人民报”(《La Plebe》) 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編。1868 年至 1875 年在洛迪出版，1875 年至 1883 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該报持资产階級民主主义方針，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报纸，1871 年至 1873 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在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支持总委员会，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第 81 頁。

- 89 1830—1831 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爆发了农业工人的自发起义，起义是由于农业工人的处境极端貧困而引起的。农业机械的使用使大批雇农失业，他們为了表示抗議，焚燒了谷堆，搗毀了机器。被派到起义地区去的軍隊对起义者进行了殘酷的鎮压。——第 82 頁。
- 90 1872 年 3 月底，在瓦瑞克郡成立了一个領導罢工的农业工人联合会，罢工很快就波及英国中部和东部的一些相邻的郡。它得到了城市工人的工联組織的支持。城市工人的經濟援助，以及随着工业高漲而来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农业工人斗争的胜利。1872 年 5 月，由工人約瑟夫·阿尔奇任主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了，到 1873 年底，联合会团結了大約 10 万人。爭取縮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資的斗争，一直繼續到 1874 年，結果，罢工者在許多郡都取得了胜利。——第 82 頁。

- 91 恩格斯是指內务大臣普魯斯 1872 年 4 月 12 日在上院會議上对阿·貝·柯克倫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說的回答。——第 83 頁。
- 92 关于警察当局迫害国际米兰支部领导人之一，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庫諾的消息，是恩格斯在 1872 年 4 月 23 日总委员会會議上讲的。而恩格斯则是从意大利报纸上以及他在 4 月 22 日收到的庫諾的信中获悉这些迫害情形的。鉴于对庫諾的迫害是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反对国际的阴谋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认为，揭露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1872 年 4 月 27 日“东邮报”和 1872 年 5 月 7 日“玫瑰小报”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中刊载了恩格斯所写的这則消息。——第 84 頁。
- 93 5 月 14 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討論了关于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成立的各爱尔兰支部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見注 14)。恩格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揭露了黑尔斯以及总委员会和不列顛委员会的某些委員的沙文主义观点，他們反对在国际內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組織，以及这个組織为爱尔兰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會議上展开的討論中，委员会的多数委員都支持恩格斯。
- 恩格斯的发言以他本人写的供报纸发表的发言稿形式保存下来，同时也載入总委员会記錄簿中(不全)。由于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决定不把关于爱尔兰問題的討論情况写进要在报上发表报道中，所以这篇发言没有发表。这是因为考虑到，发表包括黑尔斯的发言在內的某些发言，会使国际遭受損失。——第 86 頁。
- 94 指 1842 年 3 月 8 日宪章派和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对英国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宪章派运动持敌視态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全爱尔兰合并取消派(主張取消 1801 年合并的人)协会的领导人挑起的。奥康瑞尔和一些宪章派被合并取消派逐出了科学厅；奥康瑞尔本来要在那里做报告的。——第 87 頁。
- 95 1872 年 4 月出現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和所屬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 1872 年倫敦版(«Conseil fédéraliste universe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sociétés républicaines socialistes adhérentes». Lon-

don, 1872)(小冊子用法文、英文和德文出版)。由于这个緣故，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1872年5月21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是在1872年初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所包括的成員有：1871年法国人支部(見本卷第29—30頁)的殘余，各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組織，被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薩尔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力图钻进国际的領導机构的分子。他們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倫敦代表會議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和关于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两項決議。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這項決議列入共同章程以及关于开除巴枯寧的決議，給了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1872年9月底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在倫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企图把它說成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联邦主义委员会往后的活动变成了妄图窃据对“运动”的領導的各种叫喊的斗争。

总委员会的这篇声明几乎发表在国际的一切报刊上；“解放报”編輯部在声明的末尾加上了下面这段結束語：“这一重要文件向我們揭露了資產階級政党的陰謀，戳穿了它們想使协会內部发生分裂并使国际的活动陷于癱瘓的企图。在英国和德国，在比利时和瑞士，在美国和意大利，在所有国家中資產階級都企图歪曲工人的團結一致的原則，以便使我們的协会土崩瓦解。让这个事实成为我們的教訓吧。”——第89頁。

- 96 共和大同盟是1871年成立的小資產階級組織，在这个組織中扮演領導角色的有：奧哲尔、布萊德洛、韦济尼埃、勒·呂貝等人。同盟宣布自己的目的是，用联合世界各国的共和主义者并由他們傳播各种著作和小冊子的办法，以及用在群众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和发表演說以實現全面交流知識的办法来达到人类智力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幸福。同盟的綱領除了要求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廢除封号，取消僧侶和貴族的特权，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實現联邦原則。同盟产生的基础是，在1870年9月4日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影响下在英国日益发展的共和运动。参加同盟的有在英国許多城市中成立的共和派俱乐部，它們联合了小資產階級分子，有时也联合了一些无產階級分子。

——第 89 頁。

97 土地和劳动同盟 是 1869 年 10 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倫敦成立的。在同盟的綱領中,除了若干資產階級激进要求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縮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57—663 頁)。但是,到 1870 年秋天,資產階級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到 1872 年同盟同国际失去了一切联系。——第 89 頁。

98 这里是指 1871 年底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这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开除誣蔑总委员会的拉薩尔分子集团一事。

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 1840 年 2 月建立的。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維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險主义集团一边,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便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該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就成为国际协会在倫敦的德国人支部。自 1871 年底起,該协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不列顛联合会。倫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被英国政府禁止时为止。——第 89 頁。

99 1868 年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由于收到好几份关于韦济尼埃誣蔑国际法国会员的声明,委托布魯塞尔支部要求韦济尼埃为自己所做的責难提供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

1868 年 10 月 26 日,布魯塞尔支部通过決議,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第 89 頁。

100 見注 53。——第 90 頁。

101 由于 1872 年 4 月 18 日“自由思想”上出現了斯蒂凡諾尼的一篇誹謗国际和馬克思个人的文章:“馬克思——福格特——赫尔岑”,卡·馬克思就写了“再論斯蒂凡諾尼和国际”一文。在此以前,恩格斯曾著文揭露过斯蒂凡諾尼(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26—528 頁)。

斯蒂凡諾尼的繼續不断的攻击和他与同盟以及拉薩尔派的直接勾結，迫使馬克思也出来反对他。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意大利會員进行的揭露使斯蒂凡諾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資產階級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了失敗。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是意大利的一家杂志，資產階級唯理論共和派的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倫薩出版。——第93頁。

- 102 斯蒂凡諾尼由于計劃建立“唯理論者总协会”(見注64)，企图取得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許多著名活动家的支持。为此目的，他写了一封信給威·李卜克內西；李卜克內西沒有弄清楚斯蒂凡諾尼的建議，同时也不知道他跟同盟和拉薩尔派有勾結，因此便在1871年12月18日回信表示欢迎。回信于1872年1月18日发表。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內西告訴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72年2月15日的回信中使李卜克內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这以后，李卜克內西于1872年2月29日用德文写了一封措詞尖銳的信給斯蒂凡諾尼，拒絕同他进行任何合作，并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声明完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封信由恩格斯譯成意大利文并通过卡菲埃罗发表在1872年4月20日“玫瑰小报”上。——第93頁。
- 10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3—447頁。——第93頁。
- 104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的日报，1848年至1915年以該名称在柏林出版。——第93頁。
- 105 指卡·福格特“欧洲現狀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94頁。
- 10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第94頁。
- 107 在第二帝国崩潰后出版的一本官方汇编“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頁(«*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 II, Paris, 1871, p. 161)上載有1859年付給福

- 格特 4 万法郎的記事。——第 95 頁。
- 108 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和第 6 卷。——第 95 頁。
- 10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74—575 頁，第 12 卷第 450—455 頁。——第 95 頁。
- 110 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95 頁。
- 111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是由馬志尼主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 年至 1859 年在倫敦出版，1860 年在罗迦諾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馬志尼的宣言“战争”发表在 1859 年 5 月“思想和行动”第 17 期上，由馬克思譯成英文并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06—412 頁)。——第 95 頁。
- 11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32—735 頁。——第 95 頁。
- 113 指“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赫尔岑遺著集”1870 年日内瓦版。文集中第一次发表了“往事与回忆”一书的若干片断，其中包括“流亡中的德国人”一章。——第 96 頁。
- 114 亞·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我們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 3 卷第 233 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 年斐維版。——第 96 頁。
- 115 1872 年 3 月 7 日出版的“协和”杂志第 10 期上登了一篇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路·布倫坦諾写的誹謗文章，为此，馬克思写了这封信給“人民国家报”編輯部。布倫坦諾匿名发表上述文章，企图玷污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指責他在科学上不誠实，伪造使用的材料。馬克思的回答于 1872 年 6 月 1 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协和”上又发表了布倫坦諾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馬克思再次作了回答，載于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見本卷第 118—127 頁)。馬克思逝世后，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泰勒繼續了布倫坦諾所掀起的誹謗运

动，恩格斯在1890年6月間写的“資本論”德文第四版序言，以及在1891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布倫坦諾 contra [反对]馬克思”（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中彻底揭穿了他。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一节中轉載了馬克思給“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的两封信。馬克思这两封信的俄譯文是作为恩格斯的小册子的組成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2(7)卷上的。

“协和。工人問題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876年。——第97頁。

- 116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頁。

馬克思引用的格萊斯頓的這句話几乎在1863年4月17日倫敦各报（“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訊”等）关于这次議會會議的所有报道中都登載了；由汉薩德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議會議事录中，演說原文都經发言者本人做了修改，馬克思引用的那句話也被刪掉了。——第97頁。

- 117 指爱·斯·比斯利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載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評論”第47期。

“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問題杂志，1865年由一群資产階級激进派創刊；后来奉行資产階級自由主义方針；該杂志用这一名称在倫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98頁。

- 118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London, 1864, T. Cautley Newby, 30, Welbeck street, 該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是亨利·罗伊。——第98頁。

- 119 參看“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21—824頁。——第99頁。

- 120 “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較”1833年倫敦版第1—2卷（《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Vol. I—II, London, 1833)。威克菲尔德的书沒有指明作者。——第 100 頁。

121 馬克思在談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 1871 年 11 月 8 日帝国国会會議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資產階級議員、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辯論中声明說，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員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們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們”。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話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記記錄中“用棍棒来打死他們”已被改为“使他們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諷刺性的諱名“小拉斯克尔”。——第 100 頁。

122 1872 年 6 月 11 日，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建議，通过了关于 1872 年 9 月 2 日在海牙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決議，并且确定了議事日程中的主要問題。在总委员会下一次會議，即 6 月 18 日的會議上，选出了一个專門委员会(恩格斯、瓦揚、麦克唐奈)来起草关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恩格斯所写的这份通知的全文寄給了“国际先驅报”，并于 1872 年 6 月 29 日发表。

恩格斯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都保存下来了。——第 102 頁。

123 “共产党宣言”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綱領而写成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頁)，最初于 1848 年 2 月在倫敦用单行本发表。1848 年 3 月至 7 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倫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上連載。德文原本也是 1848 年在倫敦以单行本再版的，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錯的字。这一原本后来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为以后各个經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1848 年“宣言”同时又被翻譯成許多种欧洲文字。

1872 年的德文版“宣言”是“人民国家报”編輯部倡議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里做了某些不大的修改。1872 年版本以及后来在 1883 年和 1890 年出版的德文版本，都是用的“共产主义宣言”这个标题。——第 104 頁。

- 124 “紅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s*》）是1850年6—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該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題登載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英譯文。——第104頁。
- 125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紐約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資产階級分子和小資产階級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絕了关系。
1872年1—2月該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104頁。
- 126 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譯本，是由巴枯宁翻譯的，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他在許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內容。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普列汉諾夫的譯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第104頁。
- 12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頁。——第105頁。
- 128 “国际在美国”一文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恩格斯利用了馬克思在1872年2—5月期間从报纸上以及国际會員的来信中摘录下来的有关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資料。这些資料闡明了1871年10月至1872年5月期間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所进行的內部斗争。恩格斯也利用了1872年6月22日馬德里“解放报”第54号上的一篇文章“美利坚合众国的資产階級和国际”。——第106頁。
- 129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是資产階級女权主义者維·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于1870年至1876年在紐約出版的一家美国报纸。——第107頁。
- 130 第十二支部1871年8月30日的宣言发表在1871年9月23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71期上。——第107頁。
- 131 震教徒（震动者）是美国的一个教派的名称。——第108頁。
- 132 临时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12月4日的通告，发表在1871年12月9日“紐約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krat*》）上。馬克思为了向总委员会做关于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报告而收集准备材料时从該

- 报上摘录了通告中的一些話。——第 109 頁。
- 133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第十七項決議“关于瑞士罗曼語区的分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9—460 頁。——第 110 頁。
- 134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 年至 1924 年在紐約出版。——第 110 頁。
- 135 指总委员会 1872 年 5 月 28 日的決議。決議全文保存在馬克思所做的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問題的摘录中。——第 113 頁。
- 136 恩格斯的这封信只有草稿保存下来了,草稿写在帕尔馬工人階級解放委员会的来信的頁边上;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恩格斯写的注明“7 月 16 日收到,7 月 18 日回复”的字样。——第 114 頁。
- 137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第 115 頁。
- 138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117 頁。
- 139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 1828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117 頁。
- 140 由于在 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杂志第 27 期上刊登了布倫坦諾的第二篇匿名文章,馬克思遂于同年 7 月 28 日写了这封信。布倫坦諾的文章是赫普納通过恩格斯寄給馬克思的,赫普納要求馬克思尽快予以回答,并強調指出当前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的重要性。——第 118 頁。
- 141 亞·斯密“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都柏林版第 3 卷第 136 頁(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 III, Dublin, 1776, p. 136)。——第 119 頁。
- 142 这一段和下一段中的話是馬克思从“資本論”第 1 卷上引下来的(參看

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21—824頁)。——第120頁。

143 1870年11月1日“双周評論”第47期第529—530頁。——第121頁。

144 指1870年11月12日“星期六評論”第785期上发表的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的簡称,1855年至1938年在倫敦出版。——第121頁。

145 《England and America》, London, 1833 v. I, p. 185. ——第122頁。

146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第126頁。

147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倫敦創刊;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激进派資產階級的机关报。——第126頁。

148 由于筹备海牙代表大会,揭穿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破坏活动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1872年夏,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掌握了拉法格、梅薩、吳亭等人在“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已經出版以后寄来的大量文件,证实在国际內部,首先是在西班牙,存在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团体。

执行委员会(見注152)在1872年7月5日的會議上研究了从西班牙得到的关于同盟的秘密活动的文件,决定提請总委员会向应屆代表大会建議把巴枯宁和同盟盟員开除出国际。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綜合會議上发表的意見,并把它提交給总委员会。1872年8月5日恩格斯写信給約·菲·貝克尔說:“明天晚上我們將要投出一枚炸彈,它在巴枯宁主义者中定会引起相当大的惊慌…… 我們終于从西班牙获得了所需要的材料和揭发性的文件。”8月6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

提出了他以执行委员会名义起草的这个告国际全体会员书草案。草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许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查清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恩格斯所提出的草案发给大家参考。

文件以恩格斯的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是用法文和英文写的。
——第 128 頁。

- 149 指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下恩格斯阐述卡·馬克思于 1869 年 3 月 9 日写的一封信“国际工人协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見本卷第 12—14 和 14—15 頁）。——第 129 頁。
- 150 新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編輯部的那些因該报揭露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們于 1872 年 7 月 8 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組織新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絕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請，总委员会于 1872 年 8 月 15 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見本卷第 139 頁）。新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傳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爭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 131 頁。
- 151 这个文件是在执行委员会（見注 152）1872 年 8 月 8 日的會議上通过的。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上可以看出，第一段是馬克思写的。——第 135 頁。
- 152 执行委员会是从 1872 年 7 月起对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的称呼，常务委员会是由早在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訂协会的綱領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訊書記、总委员会总書記和财务委員。这个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規定下来的委员会，起了工人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閱的文件。1872 年 6 月 18 日，为了加紧筹备应屆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決議，把一切組織工作移交給执行委员会；1872 年夏执行委

員会在揭露巴枯宁主义者和一切敌視馬克思主义的分子的陰謀方面，在海牙代表大会前夕把真正的无产阶级力量团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圍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35 頁。

153 “理智”(«*La Razon*»)是一家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1 年至 1872 年在塞維尔出版。——第 135 頁。

154 新馬德里联合会在 1872 年 8 月 24 日“解放报”第 63 号上发表声明，宣布它已为总委员会所承认，在声明中刊登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所写的这封信。——第 139 頁。

155 这是恩格斯給总委员会正式承认并同它經常保持联系的意大利米兰、都灵、費拉拉和羅馬各支部的呼吁书。

国际都灵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平民”周报(1872 年 4—10 月出版)編輯部在发表这个呼吁书时加了下面这段按語：“我們在刊載下面这封信时，必須向大家說明，我們之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刊載它，是因为‘无产者解放报’(«*Emancipazione del proletario*»)(这封信就是寄給它的)理事会的理事們由于罢工而被监禁起来了；和他們中斷了的联系直到最近才恢复。”

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用意大利文写的呼吁书草稿上有“羅馬、費拉拉、米兰、都灵”等字样。——第 140 頁。

156 意大利各无政府主义組織的代表會議于 1872 年 8 月 4—6 日在里米尼举行。由巴枯宁直接参加筹备的这次代表會議，通过了关于成立擅自称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組織以及同总委员会断絕一切关系的決議。——第 140 頁。

157 海牙代表大会是在 1872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代表大会面临的刻不容緩的任务，是以自己的決議把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反对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決議肯定下来。倫敦代表會議各項決議的通过，标志着馬克思主义在爭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的极为重大的胜利，并且給了一切敌視工人阶级的分子，首先是巴枯宁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从 1871 年秋天开始，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即 1872 年夏天，巴枯宁主义者和参加他們一伙的其

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反对这些決議和力爭实现这些決議的总委员会。

在筹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团结无产階級的革命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在总委员会的許多次會議上，在他們的积极参加下，討論并通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章程和条例的各项建議，首先是把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決議补入章程的建議。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 15 个全国性組織的 65 名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們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資產階級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結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領們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階級政党奠定了基础。——第 141 頁。

- 158 在执行委员会 1872 年 7 月 19 日會議上，馬克思受托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作为报告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馬克思提出的报告于 1872 年 8 月底經总委员会會議批准。9 月 5 日，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會議上用德文宣讀了这个报告；在宣讀之前，馬克思告訴与会者說，因为报告决定要在报刊上发表，所以他不得不只是概略地談到国际的工作。接着，总委员会的报告由代表大会的一些書記分別用法文、英文和荷兰文宣讀，并經全体代表通过，只有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員們在表决时棄权。报告发表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国际的报刊上，并用德文印成傳单。总委员会报告的俄譯文最早发表在 1933 年“共产国际”杂志第 7—8 期上。——第 143 頁。

- 159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联合总会反对全民投票的宣言”1870 年巴黎版(«Manifeste antiplébiscitaire des sections parisiennes fédérées de l'Internationale et de la chambre fédérale des sociétés ouvrières». Paris, 1870)。——第 143 頁。

- 160 1870 年 4 月 23 日，法国政府頒布了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法令，目的在于巩固拿破侖第三政府已經搖搖欲墜的地位。問題是被这样提出的：

- 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贊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全民投票于1870年5月8日举行。——第143頁。
- 161 指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頁）。——第143頁。
- 162 馬克思指的是1870年底至1871年在巴黎发表的两卷集“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該书第一卷中載有大臣奧利維耶下令逮捕国际会员的那些紧急文件。——第144頁。
- 163 指1870年6月22日至7月8日进行的对国际巴黎組織成员的第三次审判。被傳訊的有38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尔、若昂納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分別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罰款。——第144頁。
- 16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頁。——第144頁。
- 165 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7月12日法国报纸“觉醒报”第409号上，在呼吁书上签字的有150名国际会员。国际的許多报纸也轉載了这个呼吁书。——第145頁。
- 166 設在不倫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1870年9月5日发表了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宣言发表在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但是，在宣言发表以前，在9月9日，不倫瑞克委员会全体委员即遭逮捕。——第146頁。
- 167 威廉堡（加塞尔附近）是普魯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侖第三被普魯士人俘擄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146頁。
- 168 1870年11月26日在德意志国会討論关于增加反法战争撥款問題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要求拒絕增加战争撥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簽訂和約，不准兼并。1870年12月17日倍倍尔被捕，随后不久李

卜克內西也被捕。

虽然如此，在 1871 年 3 月的普选中，倍倍尔又被选为国會議員。
——第 147 頁。

169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这个給法国駐各国外交代表的、要求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的紧急通告标明的日期是 1871 年 5 月 26 日。
——第 147 頁。

170 工人总联合会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組織；該联合会的活动遍及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行了社会主义宣傳，領導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法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維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馬克思有联系。1871 年 6 月 11 日，联合会組織了声援巴黎公社的游行示威。因此，政府解散了該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維也納的奥地利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有任何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輿論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 148 頁。

171 芬尼亚社社員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組織的参加者，这个組織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間，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現。芬尼亚社社員为爭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員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說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階級和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1867 年芬尼亚社社員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監獄，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对他們施用毒刑并把他們活活餓死。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評了芬尼亚社社員的密謀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階級民族主义的錯誤，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評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員會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議对他們的野兽般的虐待行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和言論中系統

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6—247、664—669頁)。——第149頁。

172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一家保守派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150頁。

173 指意大利內务大臣朗扎1871年8月14日勒令解散国际各支部的通告。根据这个通告,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的——那不勒斯支部被摧毁了。

1872年1月,西班牙內务大臣薩加斯塔也发布了一个勒令解散国际的組織的通告。朗扎和薩加斯塔的这两个通告似乎是意大利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对茹·法夫尔呼吁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号召的答复。——第150頁。

174 搜查吳亭的住宅以及审查他个人的文件和国际的文件的事是在1872年1月26—28日发生的。日内瓦各支部的州委员会对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阴谋的这种表现,提出了强烈的抗議,并且在2月6日的集会上为此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決議。国际总委员会也在2月20日通过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9—530頁),这个声明发表在国际的报刊上。——第151頁。

175 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在他們所討論的問題中也包括关于共同对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問題。——第152頁。

176 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是由他在1872年9月5日向海牙代表大会調查同盟秘密活动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在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文件也由恩格斯交给了委员会。保存下来的有报告草稿和所附的文件的目录;恩格斯所編的目录中的文件编号和报告中的文件编号是一致的。——第153頁。

177 指維·帕赫斯代表新馬德里联合会写的給国际西班牙各联合会成員的

通告。該通告发表在 1872 年 8 月 10 日“解放报”第 61 号上。——第 155 頁。

178 1872 年 6 月 2 日的通告是由“解放报”編委同时也是同盟盟員梅薩、帕赫斯、弗·莫拉、伊格列西亚斯等人起草的。在給西班牙同盟全体盟員发出的这个通告中，宣布解散同盟的馬德里組織，并建議同盟在西班牙的一切組織都效法它的榜样。这个通告发表在 1872 年 7 月 27 日“解放报”第 59 号上。——第 155 頁。

179 西班牙联合会瓦倫西亚代表會議是在 1871 年 9 月 9—17 日秘密举行的。代表會議最后制定并通过了巴塞罗納代表大会（1870 年）就已基本上拟訂好了的西班牙联合会的章程以及各地方联合会和各支部的示范章程，从而也就确定了国际在西班牙的組織結構。

代表會議通过的章程規定，每个地方同一行业的全体工人联合組成一个支部；若干支部成立一个地方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选出地方联合会委员会。所有地方联合会組成全国联合会，全国联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选出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瓦倫西亚代表會議扩大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員，設立了五个地区的通訊書記的职位，并且通过决定，个人可以直接加入联合会。——第 161 頁。

180 指 1872 年 3 月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无政府主义多数派把“解放报”編輯部委員弗·莫拉、梅薩、伊格列西亚斯、帕赫斯、卡耳耶哈、鮑利开除出該联合会的事。这些被开除者都是瓦倫西亚代表會議选出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开除他們的理由是，該报編輯委员会 1872 年 2 月 25 日发表了一封“致在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邦党代表們”的公开信。——第 161 頁。

181 关于 薩拉哥沙代表大会，見注 79。——第 161 頁。

182 巴塞罗納代表大会是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870 年 6 月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 150 个工人团体的 90 名代表。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并选出了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致总委员会书，声明联合会承认国际的共同

章程；大体上拟訂了西班牙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和支部的章程（章程在1871年瓦倫西亚代表會議上最后制定）。同时在没有政府主义者即同盟在西班牙的秘密組織的成員的影响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項反对参加政治斗争的決議。——第161頁。

- 183 “1872年4月4—11日在薩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摘录。由本屆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根据所收到的文件和意見編輯”第109—110頁（«Extracto de las actas del segundo congreso obrero de la Federacion regional Española, celebrado en Zaragoza en los dias 4 al 11 de Abril de 1872, segun las actas y las notes tomadas por la comision nombrada al efecto en el mismo», p. 109—110）。

保存下来的有一份恩格斯交給海牙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加有他的批注的小册子。——第162頁。

- 184 指无政府主义者企图通过由各个小的、而且常常是不存在的支部派出代表的办法来制造虚假的多数并夺取国际（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和罗曼語区联合会（在1870年4月4—6日于紹德封召开的該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领导权一事（見本卷第15、18頁）。——第163頁。

- 185 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的正式文本是由参加了決議出版委员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审定的。大多数決議都是以1872年夏天总委员会在預先討論代表大会的議程时通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項建議为基础的。其中包括：第七条a項、关于章程的決議、关于条例的決議、关于开除美国第十二支部的決議等等。关于总委员会駐在地的決議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共同提出的，恩格斯的发言（見本卷第730—731頁）說明了提出这一決議的理由。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間的国际联系的決議是根据拉法格的建議通过的。保存下来的有恩格斯用法文写的准备送去出版的決議全文。——第165頁。

- 186 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应荷兰联合会委员会的邀請到阿姆斯特丹同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会晤。在阿姆斯特丹9月8日的群众大会上，馬克思、左尔格、拉法格和其他代表都

发表了演說。馬克思用德語和法語发表了演說。这篇演說曾刊載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报刊上。比利时和法国报纸刊載的演說最完整，而且文字也完全一样。“人民国家报”是从“自由报”轉載了馬克思的这篇演說，但稍微做了一些改动。1872年9月26日赫普納写信給馬克思說，他們不能一字不易地照登他的演說，因为在德国的条件下，提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就会立刻造成对报纸进行审判的借口。在荷兰报纸“商业总汇报”（《Algemeen Handelsblad》）上，只发表了这篇演說的非常簡短的記要。記者写道：“公民馬克思轉过話題来分析已結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說成果是重大的。把权力有力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里是对付柏林會議的极其必要的措施。演讲人认为，柏林會議預示着向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鎮压。只要国际还没有成为一个巩固地团结在一起的組織，它就不能把运动变成共同的、在各处同时发生的运动，而它的努力也不会产生重大的結果。演讲人援引了巴黎公社的例子。为什么它遭到了失敗呢？因为它孤立无援。如果在巴黎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維也納和其他的首都也爆发了革命，那末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得多。”——第178頁。

- 187 “海盜报”（《Le Corsaire》）是法国資產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81頁。
- 188 “夜晚报”（《Le Soir》）是法国資產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67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81頁。
- 189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担任了大会記錄和決議审訂委员会的委員，着手整理这些文件以便予以公布。1872年10月底，代表大会決議的正式文本以法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2月14日在“国际先驅报”上也用英文发表了決議的正式文本。整理和公布代表大会記錄的工作沒有完成。——第183頁。
- 190 这些关于代表大会組成的材料同左尔格所作記錄中的材料略有出入。左尔格記錄的数字是：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有65名，其中有18名法国代表、15名德国代表、7名比利时代表、5名英国代表、5名西班牙代表、4名荷兰代表、4名瑞士代表、2名奥地利代表、1名丹麦代

表、1名匈牙利代表、1名澳大利亚代表、1名爱尔兰代表和1名波兰代表。——第184頁。

- 191 “火花报”(《*La Favilla*》)是一家意大利报纸,1866年至1894年在曼都亚出版;1871年至1872年每日出版;最初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七十年代前半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恩格斯引用的話是从1872年9月3日該报第184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都灵通訊”中摘录下来的。——第189頁。

- 192 “解放报”編輯部在发表恩格斯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这篇文章时,力求使它看起来像是在西班牙写的,因此,文章刊登时没有署名。——第191頁。

- 193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簡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72年至1878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1873年7月起改为周刊。主編是詹·吉約姆。

恩格斯引用的話是从1872年9月15日和10月1日“汝拉联合会簡报”第17、18两期上摘录下来的。——第192頁。

- 194 汝拉联合会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委托书发表在1872年8月15日至9月1日“汝拉联合会簡报”第15—16期上。——第193頁。

- 195 “联盟”(《*La Federacion*》)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195頁。

- 196 “1872年9月2日至7日在海牙(荷兰)举行的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名册”1872年阿姆斯特丹版(《*Liste nominale des délégués composant le 5-me Congrès universel, tenu à la Haye (Hollande), du 2 au 7 Septembre 1872*》 Amsterdam, 1872)。——第198頁。

- 197 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通过恩格斯轉給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封信,請求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把罢工破坏者从英国运入葡萄牙的行动。

- 这个威胁是由于里斯本所有翻砂企业的翻砂工人于 1872 年 9 月 19 日开始实行的罢工引起的。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者要求縮短工作日。里斯本翻砂工人的罢工得到了国际葡萄牙联合会的支持。这封信曾在 9 月 26 日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讀过，并发表在 1872 年 10 月 5 日“国际先驅报”第 27 号上。——第 200 頁。
- 198 “人民国家报”編輯部发表馬克思的这封信时，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很遺憾，这里錯誤地漏排了‘同盟’一詞。由于这一刊誤，的确可以使人认为，馬克思建議开除施維茨格貝耳，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提出这个建議”。——第 201 頁。
- 199 从恩格斯 1872 年 10 月 5 日致紐約总委员会書記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起初想把关于国际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的报告一起寄去。但是，1872 年 11 月 2 日他又写信說，他只把关于西班牙的报告寄去，而关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报告以后再寄。这两个报告是否寄去了，没有材料证实。——第 203 頁。
- 200 关于 1872 年 6 月 2 日的通告，見注 178。——第 206 頁。
- 201 “下倫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洛迪支部)是 1872 年 10 月在比尼亚米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1872 年 10 月 28 日比尼亚米把这件事通知了恩格斯。洛迪支部通过的章程是同国际的章程相符合的。恩格斯于 1872 年 11 月 25 日写信把洛迪支部成立的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書記左尔格。由于警察的迫害，这个支部于 1873 年初停止活动。——第 209 頁。
- 202 指格萊斯頓的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1851 年倫敦版(《Two Letters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on the State Persecutions of the Napolitan Government》. London, 1851)。——第 210 頁。
- 203 指根据女王的命令从 1872 年 6 月 27 日开始实行的倫敦各公园游覽規則。——第 211 頁。
- 204 恩格斯指的是 1872 年 11 月 24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許多荷兰支部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荷兰联合会委员会鉴于无政府主义

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活动而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总委员会的決議。——第 214 頁。

205 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純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 1872 年 12 月 25—30 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以及整个国际工人协会完全决裂。——第 214 頁。

206 1872 年 9 月 15—16 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同盟在各国的秘密組織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否认海牙代表大会決議以及同总委员会决裂的決議，这意味着国际的实际分裂（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見本卷第 431—432 頁）。——第 214 頁。

207 1872 年 11 月 1 日由維·帕赫斯署名的“新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會員”的呼吁书，发表在 1872 年 11 月 9 日“解放报”第 73 号上。呼吁书揭露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破坏和分裂国际的行为。鉴于联合会委员会違反西班牙联合会章程和薩拉哥沙代表大会決議，宣布提前召开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及擅自修改議程，提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決議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決議之間进行抉擇的問題，新馬德里联合会建議，选举一个能够根据国际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进行活动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第 215 頁。

208 格腊西阿联合会于 1872 年 11 月 4—6 日举行會議；會議在听取了同盟领导人之一阿勒里尼关于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后，譴責了西班牙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否決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支持圣伊米耶代表大会決議的建議，并以多数票贊同了海牙代表大会決議。

瓦倫西亚联合会會議是在 1872 年 11 月 9 日举行的。在这次會議上否決了同盟分子提出的建議，即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写明要求贊成圣伊米耶代表大会決議。——第 215 頁。

209 1872 年 11 月 10 日“汝拉联合会簡报”第 20—21 期上发表了茹尔·蒙特尔的一封抗議把布斯凱开除出国际的信。——第 215 頁。

210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派（見注 14）和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义分子其中包括瑞士的同盟盟員，勾結起来了。英国改良主义者

和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猛烈攻击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決議，尤其是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和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決議。在12月1日“汝拉联合会簡报”第23期上发表了約·黑尔斯11月6日的来信和由同盟盟員施維尔茨格貝耳署名的回信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公开駁斥黑尔斯。1872年12月21日，馬克思写了一封信給左尔格說：“今天我寄給你一份[报纸]，在这份报纸上恩格斯和我同黑尔斯及其同伙展开了論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发表在1872年12月21日“国际先驅报”第38号和12月28日西班牙“解放报”第80号上。“解放报”編輯部加上了下面这段按語：“下面我们公布我們的同志和朋友馬克思和恩格斯寄給倫敦出版的‘国际先驅报’的一封对約翰·黑尔斯先生的无耻譏言表示抗議的信。这些无耻譏言在我們这里被那些随时准备傳播流言蜚語的同盟分子的刊物津津乐道地重复着。”——第216頁。

- 211** 关于总委员会書記黑尔斯超越职权的問題，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曾一再被提出。从1872年春天起，黑尔斯就开始同总委員里支持馬克思的多数派鬧对立。在协会不列顛联合会于1872年7月21—22日在諾定昂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黑尔斯企图强行通过关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自治”的決議。由于这个緣故，并鉴于他支持在美国被开除出国际的改革派分子，总委员会于1872年7月23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在調查結束之前暂时解除黑尔斯的职务的建議。書記职务暂时委托乔·米尔納担任。——第218頁。
- 212** 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1872年8月建立的，它的成員基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會員的流亡工人。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为反对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項決議的改良主义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支部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不列顛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所发表的呼吁书是恩格斯应曼彻斯特支部的請求而写的，經支部批准后印成傳单分发给国际在英国的全体會員。——第220頁。
- 213** 指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被清除的那部分人于1872年12月10日发出的通告：“致国际工人协会各不列顛支部”。在通告里分裂分子号召

- 不要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并于 1873 年 1 月在倫敦召开联合会紧急代表大会。——第 220 頁。
- 214 指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1872 年 12 月 5 日的會議，这次會議本应解决撤銷黑尔斯所担任的委员会总書記的职务問題和任命委员会的通訊書記、負責记录的書記、财务委員以及其他負責人的問題。委员会的馬克思主义核心打算撤銷改良派首領們对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的这一意图，成了此后不久就在委员会里发生的分裂的直接导因。——第 220 頁。
- 21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76 頁。——第 221 頁。
- 216 即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第九項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4—456 頁。——第 222 頁。
- 217 关于荷兰联合会代表大会，見注 204。——第 224 頁。
- 218 这篇由馬克思起草的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以及由恩格斯执笔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呼吁书，都是对不列顛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分裂行动的回答。呼吁书是由委员会委員密契尔在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12 月 23 日的會議上宣讀的，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篇呼吁书并将它分送給各支部。——第 226 頁。
- 219 为了准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事先討論共同章程和組織条例的条文。在討論过程中，瓦揚于 1872 年 7 月 23 日提議把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決議列入章程。这个提議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第 228 頁。
- 220 指 1872 年 7 月 21—22 日在諾定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顛各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行动”的決議。決議认为工人階級为了获得社会解放必須进行政治斗争，以及为此必須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第 229 頁。
- 221 这个決議的全文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总委员会 1872 年 6 月 25 日會議上通过。——第 229 頁。

- 222 指組織條例第二節(“總委員會”)第六、七條(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81頁),這些條文是根據1869年巴塞爾代表大會“關於將支部開除出協會的程序”和“關於解決協會各支部間糾紛的程序”的決議擬就的。——第229頁。
- 223 弗·恩格斯的著作“論住宅問題”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尖銳論戰過程中產生的。

第一篇是對“人民國家報”(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號)上轉載的幾篇標題為“住宅問題”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復,這幾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奧地利工人報紙“人民意志報”上。以後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醫學博士、蒲魯東主義者阿·米爾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只要一有時間,我就立即給你寫一篇關於住宅缺乏現象的文章,來反駁‘人民國家報’上一系列文章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陳述的蒲魯東主義者的荒謬的臆想。”這一著作的標題為“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第一篇到1872年5月22日就寫成了,並且發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和53號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寫完了他的著作的第二篇,標題是“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其中批判了解決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方法,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冊子“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徹底的表述。這一篇登載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國家報”第103和104號和1873年1月4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2和3號上。

恩格斯著作的第三篇的出現是作為對米爾柏格的再次答復,因為“人民國家報”編輯部使他有機會在該報上發表了反駁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從事這一部分的寫作,這一篇以“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為題發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12、13、15和16號上。

恩格斯的這三篇著作全部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以後,就由“人民國家報”出版社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前兩篇——“論住宅問題”

(«Zur Wohnungsfrage»)和“論住宅問題。第二冊：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Zur Wohnungsfrage. Zweites Heft: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于1872年出版，最后一篇——“論住宅問題。第三冊：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Zur Wohnungsfrage. Drittes Heft: 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于1873年出版。恩格斯著作的第二篇也會轉載在“人民意志報”1873年1月份的几号(第3—9号)上。

1887年恩格斯的著作再版了，標題是：“論住宅問題”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校訂第2版(«Zur Wohnungsfrage». Zwei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7)。這部著作再版時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並寫了一篇序言。

恩格斯的著作“論住宅問題”的完整的俄譯本于1907年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第233頁。

- 22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頁。——第237頁。
- 225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238頁。
- 226 參看卡·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頁。——第243頁。
- 22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244頁。
- 228 恩格斯在這裡諷刺性地引用聖經上的“埃及的肉鍋”的用語。據聖經故事，當被埃及人俘擄的猶太人逃跑時，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於道路艱難和飢餓，開始惋惜被囚禁時的日子，因為那時他們至少還可以吃飽肚子。——第245頁。
- 229 *Labour Exchange Bazaar* 或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是英國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所創立的。第一個這樣的交換市場是1832年9月羅伯特·歐文在倫敦創立的，它一直存在到1834年年中。在這些交換市場上，勞動產品是用以一小時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勞動券來進行交換的。這些企圖

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建立不用貨幣的交換的烏托邦做法，很快就失敗了。——第 250 頁。

230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75—215頁。
——第 255 頁。

231 在 1872 年 7 月 3 日“人民國家報”第 53 號上，上面兩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租價 *vulgo* [即] 所說的租金的構成部分是：

(1) 地租；(2) 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築資本的利潤；(3) 修繕費、維修費和保險費。資本的利息只是房屋抵押債務很重時才包括在租金內。

現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將第一個力求賣出房屋，因為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會根本沒有好處了’。當然，如果廢除了借貸資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沒有一個房主能靠自己的房屋收得一文租錢了，這只是因為租錢也可以叫做租金。土就是土。”

在 1872 年“人民國家報”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論住宅問題”第一篇的單行本中，對“資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債務很重時才包括在租金內”這句話加了下面的注釋：

“對於一個購買現成房屋的資本家來說，租價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項費用構成的那份可以表現為資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而且對事情本身來說，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還是他為了同樣的目的把房屋賣給另外一個資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樣的。”

1887 年恩格斯在準備出版這部著作的第二版時，重新校閱了這兩段，並做了若干訂正（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弗·恩格斯“論住宅問題”序言”）。

本卷中這兩段話的文字是以 1887 年版為準的。——第 256 頁。

232 指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258 頁。

233 E. Sax. «Die Wohnungs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ihre Reform». Wien, 1869. ——第 261 頁。

234 “倫敦新聞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是每周出版的一种英国画报,从 1842 年起出版。

“海陆漫游”(«*Ueber Land und Meer*»)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报,从 1858 年起到 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凉亭”(«*Gartenlaube*»)是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的简称,1853 年至 1903 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 年至 1943 年在柏林出版。

“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諷刺性的周刊,从 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特赫耳夫·霍夫曼的笔名。——第 262 頁。

23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98 頁。——第 263 頁。

236 引自汉澤曼在第一屆联合議會 1847 年 6 月 8 日會議上的演說。“第一屆普魯士国会”1847 年柏林版第 7 部分第 55 頁(«*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 S. 55)。——第 265 頁。

237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 1885 年在巴黎創办的。1902 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 年至 1905 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 1905 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弗·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諾夫曾为該报撰稿。

关于吉茲移民区的文章載于 1886 年 7 月 3 日和 24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45 号和第 48 号上。——第 273 頁。

238 «*Harmony Hall*» (“协和”)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9 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

- 一直存在到 1845 年。——第 273 頁。
- 239 見維·艾·胡貝爾“社會問題。四、無形組合” 1866 年諾特豪森版 (V. A. Huber. «Sociale Fragen. IV. Die Latente Association». Nordhausen, 1866)。——第 273 頁。
- 24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68—470、473—474 頁。——第 274 頁。
- 24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73—474 頁。——第 276 頁。
- 242 指的是根據 1871 年 5 月 10 日法蘭克福和約第七條法國償付給德國的 50 億法郎的賠款。——第 291 頁。
- 243 恩格斯指的是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在他的許多著作和演說中說的話，瓦格納聲稱，在普法戰爭以後，尤其是由於獲得 50 億賠款，德國市場情況欣欣向榮，這大大地改善了勞動群眾的狀況。——第 291 頁。
- 244 指德國和奧地利兩國皇帝和首相 1871 年 8 月在加施坦和 1871 年 9 月在薩爾茨堡進行的談判，在談判過程中也討論了同國際鬥爭的問題。恩格斯用普魯士政治警察首腦施梯伯的名字把這些會議叫做施梯伯會議，以強調會議的警察的反動的性質。——第 291 頁。
- 24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41—343 頁和以下各頁。——第 292 頁。
- 246 “國際和革命。前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公社流亡者為海牙代表大會而作” 1872 年倫敦版 («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Londres, 1872)。——第 297 頁。
- 247 見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第 1 部第 2 冊；“黑格爾全集” 1834 年柏林版第 4 卷第 15、75、145 頁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I, Abt. 2; Werke, Bd. IV, Berlin, 1834, S.

- 15, 75, 145)。——第 298 頁。
- 248 1872 年 2 月和 3 月初“人民国家报”上登載的米尔柏格的文章，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阿·米尔柏格“住宅問題。社会概論”。“人民国家报”出版的单行本。1872 年萊比錫版第 25 頁(A. Mülberger. «Die Wohnungsfrage. Eine sociale Skizz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 S. 25)。——第 300 頁。
- 24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6—477、493—494 頁。——第 301 頁。
- 250 比·約·蒲魯东“十九世紀革命的总观念”1868 年巴黎版(P.-J.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 Paris, 1868)。——第 306 頁。
- 251 見注 232。——第 306 頁。
- 252 P.-J. Proudhon. «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 T. 1—3, Paris, 1858. ——第 306 頁。
- 253 P.-J. Proudhon. «La guerre et la paix». T. 1—2, Paris, 1869. ——第 308 頁。
- 254 斐·拉薩尔“既得权体系。成文法和法哲学的調和”1861 年萊比錫版第 1 部分(F. Lassalle.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Eine Versö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philosophie». Th. I, Leipzig, 1861)。——第 308 頁。
- 255 恩格斯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場(“魔女之厨”)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話。——第 315 頁。
- 256 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易·皮奥的通信中，执行丹麦通訊書記职务的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傳国际关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 1872 年 4 月底給路易·皮奥的信里，恩格斯对一篇論述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这篇文章发表在哥本哈根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几乎国际所有的报刊都轉載了。恩格斯強調指出，“在关于把小农和无地农民吸引到

- 无产階級运动中來这个极为重要的問題上，丹麦人由于自己国内的條件和自己的巨大政治才能，現在站在所有國家的前面”。——第 318 頁。
- 25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78—280 頁。——第 318 頁。
- 258 指 1872 年 12 月 1 日“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德國國際工人協會各聯合會、各支部、各委員會和全體會員的呼喚書”，發表在 1872 年 12 月 25 日“人民國家報”第 103 號上。——第 322 頁。
- 259 指根據 1872 年 12 月 13 日普魯士政府通過的“普魯士、勃蘭登堡、波美拉尼亞、波茲南、西里西亞和薩克森諸省專區法”在普魯士實行的行政改革。——第 324 頁。
- 260 恩格斯指的是 1808 年 10 月 24 日普魯士國王頒布的關於廢除行會限制和壟斷的敕令以及 1808 年 12 月 26 日的命令，命令以宣言的形式宣布可以自由經營工商業。
- 1849 年 2 月 9 日普魯士政府頒布了兩項關於修改舊工商業條例的命令，規定成立工商業諮詢委員會(Gewerberäte)和工商業仲裁法庭(Gewerbegerichte)從而恢復了半中世紀性質的工商業立法。——第 325 頁。
- 261 指普魯士警察司司長辛凱爾迪，1856 年他在一次決鬥中被反動的施塔爾—格爾拉赫派(見注 268)的一個著名代表羅霍夫男爵所殺害，決鬥是由於警察當局封閉涉及這一集團的利益的賭場而引起的。——第 325 頁。
- 262 指的是普魯士親王威廉(從 1861 年即位為國王)在 1858 年 10 月開始攝政時宣布的“自由主義的”方針。1858 年攝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費爾的內閣，讓溫和的自由派執掌政權，其中也包括接近資產階級的自由派貴族的代表，1848—1849 年革命時期的國家活動家如奧爾斯瓦特、帕托夫、施韋林等。資產階級報刊高呼這個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實際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為了加強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容克地主的障地；大失所望的資產者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軍事改革草案。由此而發生的 1862 年憲制衝突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麥的執掌政權結束了“新紀元”。

——第 325 頁。

- 263 指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从 1859 年 4 月 29 日开始到 7 月 8 日结束。——第 326 頁。
- 264 丹麦战争是 1864 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 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 327 頁。
- 265 薩多瓦会战于 1866 年 7 月 3 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薩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终的 1866 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凱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第 327 頁。
- 266 指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和“铁血”政策“从上面”来统一德国的完成阶段。——第 327 頁。
- 267 由于普鲁士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普鲁士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部分领土。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它和德意志北部的 17 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过了不久薩克森和其它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这些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第 327 頁。
- 268 施塔尔—格尔拉赫派,或“十字报”派(“十字报”是对“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称呼),是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成立的,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封建容克地主的一个集团;它坚决主张贵族特权不可侵犯和恢复普鲁士等级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极右的容

克地主的党派，它反对俾斯麦从 1866 年起实行的政策，认为这是对他们们的封建特权的一种威胁。——第 327 頁。

269 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魯士在普奧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 1867 年建立的以普魯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 19 个德意志邦和 3 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魯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魯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騰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在 1870 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 年 1 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 327 頁。

270 1845—1846 年，普魯士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提高了，因为它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0 年即位后的自由主义改革时代所抱的希望已经破灭。1845 年所有的省议会（有两个除外）都要求实施宪法。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汉澤曼在 1846 年的报告书中充分反映了普魯士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报告书中要求建立等级代表机关，巩固和扩大关税同盟，废除地主的世袭领地的司法权和贵族的其它一系列特权，要求出版自由、公开的诉讼程序、法官终身任职、陪审法庭等等。——第 329 頁。

271 对 1873 年 1 月初发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第二个通告的答复是馬克思写的，并同不列颠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一起发表在 1873 年 1 月 25 日“国际先驱报”第 43 号上。不列颠委员会的通知说：“由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前通讯书记和其他人署名的通告宣布，擅自在本月 26 日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声明，上述企图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在召开的时间和目的上都是非法的，因此凡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协会会员和授权自己的成员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各支部将使自已置身于我们协会的队伍之外。”——第 331 頁。

272 指 1872 年 12 月 14 日在“国际先驱报”第 37 号上发表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一事。——第 332 頁。

273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333頁。

274 “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是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2年2月至1873年4月在里斯本出版,国际支部的机关报。該报經常刊登国际的文件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1873年2—4月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是丹麦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7月至1874年5月在哥本哈根出版,自1872年4月起改为日报。

“工人报”(«*De Werkman*»)是荷兰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从1869年起成为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的机关报。

“哨兵报”(«*Die Tagwacht*»)是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1869年至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333頁。

275 这篇文章是馬克思应“人民报”編輯恩·比尼亚米的請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这本文集而写的。

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論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馬克思的这篇論文和恩格斯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論文“論权威”一样,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圍的社会主义者的組織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論基础。馬克思的著作于1873年12月发表。——第334頁。

276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第336頁。

27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1—198頁。——第337頁。

278 P.-J. Proudhon. «*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Paris, 1868. ——第338頁。

- 际海牙代表大会”。——第 346 頁。
- 288 恩格斯显然是指格腊西阿和加迪斯联合会的成員参加 1872 年 11 月共和联邦主义者在安达魯西亚举行的武装起义和新馬德里联合会的會員参加 1872 年 11 月底—12 月初在馬德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事件。——第 346 頁。
- 289 指 1873 年 1 月 18 日霍·梅薩写給恩格斯的一封信，梅薩在信中請恩格斯通过国际的机关报把西班牙罢工的事告訴英国和比利时工人，以阻止把罢工破坏者运到西班牙去。——第 347 頁。
- 290 “給紐約总委员会的便函”保存下来的手稿是恩格斯用德文写的，手稿上标明的日期是 1873 年 2 月 8 日。这个手稿和 1906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Stuttgart, 1906) 一书所載的“便函”并不完全相符。——第 350 頁。
- 291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里米尼代表會議上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見注 156)以后，于 1873 年 3 月 15—17 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350 頁。
- 292 指 1873 年 1 月 5 日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把汝拉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协会队伍，直到应屆代表大会为止的決議。——第 351 頁。
- 293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庫諾侨居美国；为了参加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化名卡佩斯特罗在 1873 年 1 月 10 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十九支部致新馬德里联合会的呼吁书上签了字。1873 年 2 月 2 日的布魯塞尔“国际报”第 212 号报道了这件事，并且指出卡佩斯特罗和庫諾是一个人。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 年至 1873 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魯塞尔出版。1873 年时該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場。——第 352 頁。
- 294 指的是根据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印发的，用来貼在會員证上表

示已經繳納全年會費的會員會費券。——第 352 頁。

- 295 “工人報”(《*Arbeiter-Zeitung*》)是一家工人週報，國際美國第一支部的機關報，從 1873 年 2 月至 1875 年 3 月用德文在紐約出版。該報會發表關於總委員會各次會議的報道和國際的文件，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時期的一些極為重要的著作。在 1874 年秋天以前，弗·阿·左爾格對該報的方針有一定的影響。——第 353 頁。
- 296 見注 51。——第 353 頁。
- 297 指 1873 年 4 月 5 日“社會思想報”第 54 號為了答復當時領導西班牙各無政府主義支部的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給該報編輯部的一封信而發表的一篇編輯部文章。——第 354 頁。
- 298 指的是定於 1873 年 6 月 1 日和 2 日召開的國際不列顛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見注 352)。——第 354 頁。
- 299 由於 1873 年 4 月 27 日“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第 49 號上發表了一篇誹謗國際工人協會的文章，因此恩格斯於 1873 年 4 月底給“人民國家報”編輯赫普納寫了一封信，這篇短文就是該信的一部分。這封信本來是不準備發表的，但是該報編輯部在 1873 年 5 月 7 日“人民國家報”第 37 號上不加署名發表了這封信的一部分。5 月 2 日，恩格斯專門為“人民國家報”寫了“國際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一文，該文發表在 1873 年 5 月 10 日該報第 38 號上(見本卷第 359—362 頁)。——第 356 頁。
- 30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頁。——第 357 頁。
- 301 指刊載在 1873 年 4 月 18 日“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第 45 號上的標題為“國際工人協會”的一篇短文。——第 357 頁。
- 302 爬蟲報刊基金是人們對俾斯麥掌握的用來收買報刊的特別經費的稱呼。1869 年 1 月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上發表演說時罵那些賣身投靠的密探是“爬蟲”。在此以後，左派報刊便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買的報刊稱為爬蟲報刊。爬蟲報刊基金因此而得名。——第 359 頁。
- 303 指刊載在 1873 年 4 月 21 日布魯塞爾“國際報”第 223 號和 1873 年 4

月 13 日布魯塞爾“自由報”第 15 号上的关于 1873 年 3 月土魯斯国际法国會員案件的文章。后面提到的是刊載在 1872 年 10 月 20 日“自由報”第 42 号上的盖得的一篇通訊。——第 359 頁。

304 指 1873 年 3 月在巴黎进行的对国际法国支部成員的审判。——第 362 頁。

305 恩格斯提到的这两封信是左尔格写給他的。——第 363 頁。

306 指总委员会 1873 年 1 月 26 日的決議(見本卷第 736 頁)。該決議发表在 1873 年 6 月 1 日“人民報”第 14 号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发表在 1873 年 5 月 26 日“人民報”第 13 号上。——第 363 頁。

307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 1873 年 4—7 月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成的。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著作中，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詭計和各种詐騙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論上和組織上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这个著作是依据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調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大量文件写成的。其中包括拉法格、梅薩等人从西班牙寄来的材料，約·菲·貝克尔从瑞士寄来的材料，丹尼尔逊和柳巴文从俄国寄来的材料，以及吳亭受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委托而写的长篇报告（見注 2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第八章“同盟在俄国”时利用了这个报告。有一部分文件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才交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盟的有几个說明它的目的和任务的文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十一章里引用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編写的他們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件的目录保存下来了。根据这个目录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有吳亭寄来的許多俄文书刊的法譯本；因此，巴枯宁的文件的許多引文都是根据法

譯文摘录下来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于1873年8月用法文印成单行本；1874年，它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为題在不倫瑞克用德文出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譯本的审訂工作。紐約“工人报”刊載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俄譯本最先摘要刊印在1928年維·波朗斯基編的“米·巴枯宁的傳記材料”一書第3卷中。——第365頁。

- 308 指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7日會議上选出的記錄和決議出版委员会，其成員有卡·馬克思、弗·恩格斯、欧·杜邦、列·弗兰克尔和奧·賽拉叶。后来，海牙代表大会法文书記勒穆修也参加了該委员会。实际上，海牙代表大会文件的全部出版工作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370頁。
- 309 引的是1872年10月5日“哨兵报”第40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再談談巴枯宁”。文章連續刊載在10月12、19和26日該报第41、42和43号上。——第372頁。
- 310 米·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向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說明理由的建議”（M. Bakounine. «Fédéralisme, Socialisme et Antithéologisme. Proposition motivée au Comité Central de la Ligue de la Paix et de la Liberté»），是巴枯宁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1867—1868年間在伯尔尼以单行本出版。——第373頁。
- 311 指由和平和自由同盟常設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古·福格特簽署的該执行局1868年9月22日的机密呼吁书。馬克思和恩格斯握有一份寄給艾尔皮金的呼吁书。——第374頁。
- 312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隨者之間由于廢除继承权問題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冲突。由于米·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那个支部的坚决要求，这个問題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議程。这个支部叫做“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中央支部”，实际上是秘密同盟的领导机关。巴枯宁把关于继承权問題的討論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是破坏性地轉移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大会不去解决欧洲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关于綱領和策略的迫切問題。馬克思起草了一个报告，闡明了总委员会对继承权的看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4—416頁）。在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因为没有有一个建議得到了必要的絕對多数票的贊成。但是，巴枯宁的这个事先策划好的、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389頁。

313 指卡·馬克思所写的、經总委员会1870年1月1日會議批准的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36頁）。——第389頁。

314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是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該名称在柏林出版。从1871年至1876年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見注66）为名出版。——第390頁。

315 見注29。——第391頁。

316 “罗曼語区支部联合会章程，經1869年1月2、3和4日在日内瓦国际四季小組的处所內召开的罗曼語区代表大会通过”第15—16頁（《*Statuts pour la Fédération des sections romandes adoptés par le congrès Romand, tenu a Genève au Cercle international des Quatre-Saisons, les 2, 3 et 4 janvier 1869*》，p. 15—16）。

章程草案是在巴枯宁的参与下拟定的。——第392頁。

317 指馬克思于1870年6月29日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頁）。——第392頁。

318 指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決議“关于接受新的支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程序”；这项決議授予总委员会以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权利。在設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的問題时應該考虑

到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見。——第 394 頁。

319 指的是倫敦代表會議的兩項決議：“關於瑞士羅曼語區的分裂”和“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以及卡·馬克思受總委員會的委託所寫的關於涅恰也夫盜用國際名義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9—460、454—456、470 頁）。——第 395 頁。

320 引的是恩格斯於 1871 年 12 月 6 日所寫並在許多報紙上發表的“總委員會就馬志尼關於國際的若干文章給意大利幾家報紙編輯部的聲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11—513 頁）。——第 398 頁。

321 茹·法夫爾的通告和薩卡茲的報告，見注 57。

1871 年 10 月在西班牙議會下院發生了由於保守派資產階級政府打算通過立法手續來解散國際在西班牙的組織而引起的辯論。在辯論過程中發言的那些反動派的代表利用了同盟的文件和警察當局偽造的文件來誣蔑國際。雖然左派共和黨人卡斯特拉爾、加里多、索里耳亞等人反對這樣做，他們揭穿了对國際的誣蔑，並且指出建議採取的措施是同憲法相抵觸的，但是政府還是得到了支持。1872 年 1 月，內務大臣薩加斯塔頒布了解散西班牙的國際的通告。——第 398 頁。

322 “法蘭西共和國報”（*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是一家法國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日報，由萊·甘必大創辦，從 1871 年起在巴黎出版。

3 月 11 日，該報刊載了一篇關於國際的匿名文章，1872 年 3 月 15 日“汝拉聯合會簡報”第 3 期轉載了這篇文章。——第 400 頁。

323 對法國南部的國際各支部成員的土魯斯案件是在 1873 年 3 月 10—26 日進行的。根據杜弗爾法（見注 10）被捕的人被判處了不同期限的監禁和罰款。關於土魯斯案件以前的各次逮捕事件，見恩格斯“國際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一文（見本卷第 359—362 頁）。——第 400 頁。

324 指同盟盟員阿勒里尼 1871 年 11 月 14 日給巴斯特利卡的信。為了讓國際的所有西班牙支部都知道該信的內容，巴塞羅納支部把它寄發給了

- 西班牙各支部。該信的副本由恩格斯列入有关同盟事件的文件中，一起交給了海牙代表大会。——第 400 頁。
- 325** 1871 年 12 月 2 日，在日內瓦召开了国际各支部的會議，会上通过了一项反对桑維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的決議；1871 年 12 月 20 日，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为此通过了一个專門的文件：“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发表在 1871 年 12 月 24 日“平等报”第 24 号上；“平等报”本身也提出了抗議。——第 401 頁。
- 326** 見注 65 和注 66。——第 402 頁。
- 327** 引的是托卡热維奇 1872 年 8 月 2 日給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信，后者把这封信交給了恩格斯。这里所說的“苏黎世社会主义革命波兰协会綱領”是巴枯宁写的，并且于 1872 年 7 月 27 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簡报”第 13 期的附刊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下产生的波兰社会民主协会起初接受了巴枯宁的这个綱領，但是不久便在波兰社会主义者托卡热維奇的影响下攢棄了它。
- “自由报”(«Wolność»)的出版沒有实现。——第 402 頁。
- 328** “战斗报”(«El Combate»)是一家西班牙資产階級共和派的日报，联邦主义者的机关报，在馬德里出版。——第 404 頁。
- 329** 梅薩致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这个声明，包含有揭露在西班牙存在着秘密同盟的事实，它由梅薩寄給了恩格斯，而恩格斯則把它轉交給了同盟活动調查委员会。——第 406 頁。
- 330** 指手写的国际瓦倫西亚支部給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机密通告，通告中提出，如果爆发革命就要为爭取实现充分的分权制和成立“无政府公社”而斗争。——第 406 頁。
- 331** 由馬尔塞劳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塞維尔支部的通告，于 1871 年 10 月 25 日寄給国际馬德里支部；通告陈述了該支部由于政府的迫害而通过的决定。——第 408 頁。
- 332** 指 1872 年 2 月 25 日“解放报”編輯委员会“致在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

- 邦党代表們”的公开信，該信发表在 1872 年 3 月 3 日“解放报”第 38 号上。国际馬德里委员会中的无政府派的委員們要求編輯部收回这封信；但是作为“解放报”編輯同时又兼任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書記职务的梅薩，断然拒絕实现这个要求。1872 年 3 月 9 日，他在和委员会其他委員进行协商后发出了一封类似的信，但已經用的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了。——第 409 頁。
- 333** 1872 年 3 月 7 日，无政府主义者的馬德里委员会向共和联邦党代表會議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完全不贊成“解放报”編輯部的信（見注 332），并宣称編輯部的信“是同国际的原則相抵触的”。——第 409 頁。
- 334** “被判罪者”（《*El Condenado*》）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家周报，从 1872 年至 1874 年由托·莫拉哥在馬德里出版。——第 409 頁。
- 335** “平等报”（《*La Igualdad*》）是西班牙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 1868 年至 1870 年在馬德里出版；它是最激进的資產階級報紙之一，有許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該报撰稿；1868 年至 1869 年間一部分馬德里的工人聚集在該报周圍。——第 409 頁。
- 336** 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是 1872 年 6 月 1 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編輯部文章“革命的消息”。——第 411 頁。
- 337** 指組織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第二节第七条規定，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屬于一个全国性組織的团体或支部之間，或各全国性組織之間可能发生的糾紛；第四节第四条規定，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們的国际組織的名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81、482 頁）。——第 412 頁。
- 338** 指 1870 年 5 月 8 日在法国举行的全民投票。——第 415 頁。
- 339** *Union de las tres clases de vapor*（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是卡塔卢尼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紡織工厂的織布工人、紡紗工人和短工。該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會員。——第 416 頁。
- 340** 引的是卡菲埃罗于 1871 年 7 月 12—16 日写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談到了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状况。——第 417 頁。

- 341 引的是卡普卢索 1872 年 1 月 21 日給奥哲尔的一封信。——第 418 頁。
- 342 国际米兰支部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由泰·庫諾組成的。1871 年 12 月，在庫諾的影响下，馬志尼派的工人道义互助和教育协会的一部分会员退出了該协会，成立了无产者解放工人小組，这个小組于 1872 年 1 月 7 日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該团体通过了一个符合国际共同章程的章程。1872 年 1 月 30 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支部成立的情况，并且声明說它的章程符合国际的原則；于是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庫諾在該支部内部进行了反对参加了該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該支部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没有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 419 頁。
- 343 見注 60。——第 419 頁。
- 344 雷吉斯关于受总委员会委托巡視意大利的报告是以給恩格斯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1872 年 2 月的下半月，雷吉斯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在那两个地方了解了各支部的情况，宣傳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決議。雷吉斯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向各支部的成員說明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国际的原則和任务是根本对立的。——第 420 頁。
- 345 A. Richard et G. Blanc. «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 Appel du peuple et de la jeunesse à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Bruxelles, 1872. ——第 427 頁。
- 346 引的是茹·盖得給蒙彼利埃国际各支部成員的信，該信是在 1872 年 9 月 22 日写給支部领导人之一日罗尼的。1872 年 11 月 20 日，日罗尼把盖得的这封信轉寄給了总委员会。——第 428 頁。
- 347 “人权报” («Les Droits de l'Homme») 是法国共和党左派的一家日报，1870 年至 1871 年由茹·盖得在蒙彼利埃出版。——第 428 頁。
- 348 这篇通訊发表在 1872 年 10 月 20 日“自由报”第 42 号上。——第 429 頁。
- 349 見注 209。——第 430 頁。

- 350 «Pacte d'amitié de solidarité et de défense mutuelle»是1872年9月15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432頁。
- 351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2月2日的通告发表在1873年2月8日“解放报”第85号上。——第434頁。
- 352 1873年6月1—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顛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顛联合会条例、关于宣傳、关于必須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紅旗为不列顛联合会会旗等決議。“关于政治行动”的決議具有特別的意义，在这个決議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顛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現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437頁。
- 353 1873年6月1—3日在俄尔頓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組織、工会組織、合作社組織和其他組織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議召开的。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1880年，它根据国际的原則把各种工人組織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437頁。
- 354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的一家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年至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年至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第440頁。
- 355 車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1864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終身流放在那里。——第440頁。
- 356 指巴枯宁于1869年5月在日内瓦印发的傳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和涅恰也夫于1869年在日内瓦印发的傳单“告彼得堡大学、研究院和工学院的学生們”。——第442頁。
- 357 “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在兰斯成立的一个教团的綽号，該教团的成員必須献身于教育穷人子弟的事业；在該教团的学校中，学生接受的主要

- 是宗教教育,在其他方面却只能得到非常貧乏的知識。——第 443 頁。
- 358 1869 年 5 月印发的傳单“革命問題的提法”和 1869 年夏天印发的傳单“革命原理”都是巴枯宁写的。——第 444 頁。
- 359 Н. 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 年圣彼得堡版。——第 445 頁。
- 360 “‘人民裁判’协会会刊”第 2 期,1870 年冬圣彼得堡版,第 9 頁。第 2 期和第 1 期一样都是在日内瓦出版的。——第 447 頁。
- 361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 1868 年至 1870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 1870 年 4 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 1868 年 10 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吳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 1870 年 4 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登載国际的文件。——第 448 頁。
- 362 尼·奥格辽夫的“大学生”这首诗原先是献給奥格辽夫和赫尔岑的朋友、1866 年去世的 С. И. 阿斯特拉柯夫的。巴枯宁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首诗的手稿以后,写信給他說,如果把这首诗献給涅恰也夫的話,“对于事业会更有益处”。这首诗便改換上了献給涅恰也夫的字样于 1869 年在日内瓦印成了許多单頁,并且被涅恰也夫当成一种证明他是奥格辽夫的全权代表的标志。——第 454 頁。
- 363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是保守派报纸,1826 年出版。——第 466 頁。
- 364 “民主”(«La Démocratie»)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 1868 年 11 月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

从 1868 年 3 月开始,該报編輯沙散出版了一种丛书,在这些丛书中被該报邀請的撰稿人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巴枯宁 1868 年 4 月給沙散的信就是为这种丛书而写的。巴枯宁的信于 1868 年 4 月底发表在丛书第 6 輯上。——第 467 頁。

- 365 引的是巴枯宁发表在 1870 年 3 月 2 日“馬賽曲报”第 72 号上的“赫尔岑”一文。——第 467 頁。
- 366 指的是俄国地主 П. А. 巴赫美提耶夫于 1858 年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傳費(所謂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 年, 赫尔岑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 同意把这项基金分为两份, 其中一份由奥格辽夫交给了涅恰也夫。1870 年, 赫尔岑逝世以后, 涅恰也夫又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项基金的另一半。——第 467 頁。
- 367 “公社”(«Община») 是由謝·涅恰也夫和弗·謝列布廉尼科夫主編的一家報紙的名称, 該报的創刊号于 1870 年 9 月在倫敦出版; 1871 年出版的第 2 号由出版者們自己銷毀了。——第 468 頁。
- 368 “钟声。亞·伊·赫尔岑創办的俄国解放机关报”(«Колокол. Орган рус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основанный А. И. Герценом») 是涅恰也夫和謝列布廉尼科夫 1870 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報紙的名称, 該报只出版了几号。——第 471 頁。
- 369 指“革命者問答”, 它是巴枯宁在 1869 年夏用密碼写的, 并且印了几本。在 1869 年进行搜查时, 在彼·加·烏斯宾斯基那里发现了一本, 这本問答的全文轉載在 1871 年“政府通报”第 162 号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就是这个文本。——第 471 頁。
- 370 埃斯科巴尔派 是西班牙耶穌会教徒埃斯科巴尔-伊-門多薩(1589—1669)的追随者。埃斯科巴尔-伊-門多薩公开宣揚, 善良的意願可以证明受道德和法律譴責的行動无罪(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第 472 頁。
- 371 指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中叶在南美洲主要是在現在的巴拉圭的領土上出現的耶穌会教徒的神权政体国家。——第 483 頁。
- 372 指 1845 年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圍形成的、由小貴族以及平民知識分子所組成的青年小組; 該小組成員贊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观点, 有許多成員宣傳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小組的會議上曾經討論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 也討論过建立积极的革命組織的計劃。但是, 彼得拉

- 舍夫斯基分子沒有來得及制定這種計劃和建立真正廣泛的革命組織；1849年4月，該小組的參加者被逮捕并被流放。——第487頁。
- 373 “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一家古老的俄國報紙，從1756年至1917年出版；從1859年開始每日出版；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該報具有了反動性質。——第488頁。
- 374 “同時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是俄國的一家文學和社會政治性雜誌，從1836年至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從1843年起每月出版）；它由亞·謝·普希金創辦，從1847年起，該雜誌的編輯是涅克拉索夫和帕納也夫。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為該雜誌撰稿；在六十年代，該雜誌實際上是俄國革命民主派的機關報。——第490頁。
- 375 革命傳單“年輕的俄羅斯”是俄國革命者彼·格·扎伊奇涅符斯基寫的，在1862年5月中印發；該傳單反映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中最左的、革命的观点。
該傳單的題詞引自赫爾岑的“羅伯特·歐文”一文。——第493頁。
- 376 指的是赫爾岑同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之間發生的衝突，這次衝突是由於赫爾岑在評價由沙皇政府一手包辦的廢除農奴制一事上向自由主義方面動搖而引起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們在“同時代人”雜誌上以及在致“鐘聲”的信件中尖銳地批判了赫爾岑的這種動搖。在六十年代，赫爾岑在與自由主義決裂以後便徹底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來了。——第493頁。
- 377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海牙代表大會秘密同盟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文件中，有涅恰也夫受巴枯寧的委託以不存在的俄國革命組織的名義於1870年2月寫給柳巴文的一封信，當時柳巴文正準備在俄國出版“資本論”第1卷。在這封信中，他們威脅柳巴文說，如果柳巴文不免除巴枯寧所承擔的把“資本論”第1卷譯成俄文的責任，就要制裁他。柳巴文通過丹尼爾遜於1872年8月把這封信轉寄給了馬克思。——第515頁。

378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西班牙1873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1868年至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向1873年9月8—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1894年被收进“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75）》），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经弗·伊·列宁校订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在日内瓦和1906年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的。——第521页。

379 1873年9月19、21、24和26日“人民国家报”第87、88、89和90号上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述。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1874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下来的。——第521页。

380 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傀儡亚马多国王。——第523页。

381 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大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追求者，这个王位追求者于1874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丰斯十二世。——第523页。

- 382 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世紀上半叶支持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軍閥和天主教僧侶，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年至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1855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1872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1876年才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523頁。
- 38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頁。
在1894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1892年出版的第二版，即德文版。——第525頁。
- 384 指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第525頁。
- 385 “革命团结报”(«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3年6—9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和公社流亡者中间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527頁。
- 386 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1873年8月24日“国际报”上。——第528頁。
- 387 見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127—235頁)。——第533頁。
- 388 恩格斯指的是1870年在紐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枯宁的小册子：“就真正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Lettres à un français sur la crise actuelle»)。——第533頁。
- 389 格萊斯頓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便在1874年2月17日宣布他的內閣辞职，并解散了議會。下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350

名保守党人，244 名自由党人和 58 名爱尔兰議員当选。2 月 21 日組成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

秘密投票法 (Ballot Act) 是 1872 年 7 月 18 日由議會通过的。
——第 541 頁。

390 爱尔兰土地法案 (Land Bill) 是格萊斯頓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并在 1870 年 8 月被通过。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的土地法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們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規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給予一定的补偿并規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大地主們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場經濟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

爱尔兰教会法案 (Irish Church Bill) 也是格萊斯頓提出并在 1869 年 7 月通过的。根据这个法律，英国教会在爱尔兰与国家分离，并同天主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剝削爱尔兰农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 542 頁。

391 指 1871 年通过的軍隊改組法，該法案的条款之一是禁止出售軍官官銜证书。这一条在議會內引起了哄鬧，事后格萊斯頓靠了国王的敕令才廢除了出售軍官官銜证书的制度。——第 542 頁。

392 指的是 1867 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这次改革使工人階級中有一部分人得到选举权。——第 544 頁。

393 工人代表同盟 (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 創立于 1869 年。工联領袖們也加入了同盟，他們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党勾結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 1880 年以后就停止了。——第 545 頁。

394 指 1872 年的“矿业管理法”(«The Mines Regulation Act»)。——第 546 頁。

395 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爱合并的口号下出現的合并取消派的

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傳播。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鎮压 1798 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剝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使得英国殖民統治更加巩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领导协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及其他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让步的一种手段。四十年代末，由于 1848 年爱尔兰革命起义的失敗和随着反动派在英国和爱尔兰得势，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了。——第 547 頁。

- 396** “帝国軍事法”一文是恩格斯由于帝国国会正討論关于增加平时軍隊人数的法律而专门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这个法律經批准后被称为七年預算，它使整个德国都采用普魯士的軍事制度。这个法律反映了德国軍国主义的壮大和德国統治集团的侵略意图。

这篇文章曾載于 1874 年 3 月 8 日和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28 和 29 号，俄譯文第一次发表。——第 548 頁。

- 397**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魯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1866 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滿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棄了这个阶级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于普魯士的领导之下；他們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統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最終成了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日益具有了效忠皇帝的性质，同时民族自由党事实上放棄了他們过去提出的那些自由主义要求，其中包括 1866 年綱領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預算法”的要求。

进步党人是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魯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召开全德議會，建立对众議院負責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內閣。和民族自由党不同，1871 年德国統一以后进步党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純粹是一紙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視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魯士容克地主的統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搖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 548 頁。

- 398 指的是 1862 年至 1866 年普魯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魯士議會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絕批准用于改組和进一步武装軍队的撥款而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絕，竟在許多年內不經議會批准就开支軍費。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勢的表現之一。只是到 1866 年，当普魯士在薩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資產階級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 548 頁。
- 399 引自 1850 年 12 月 3 日曼托伊費尔在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就与奥地利达成的奥里繆茨协定所作的演讲，根据这一协定普魯士被迫暂时放棄了它想取得德国霸权的要求。——第 548 頁。
- 400 恩格斯引的是 1850 年普魯士宪法第一〇九条。——第 548 頁。
- 401 从 1867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17 日召开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同意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 549 頁。
- 402 指 1871 年 3 月 21 日开幕并于 1871 年 4 月 16 日批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帝国国会。——第 549 頁。
- 403 这里和下面引用的都是 1874 年 2 月 16 日毛奇在帝国国会的演說。——第 550 頁。
- 404 1870 年 9 月 2 日的色当会战是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決定性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馬洪統率的法国軍队被普魯士軍队所击潰，拿破侖第三当了俘虏。色当惨敗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导致法国宣告成立共和国。从这时起，这次战争便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对德国所具有的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普魯士軍閥、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掠夺野心。——第 551 頁。
- 405 威尼斯四边型要塞区(又称意大利四边型要塞区)是由意大利北部的四个要塞——維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組成的非常坚强的筑垒陣地。四边型要塞区在十九世紀的历次战争中作为軍队行动的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第 551 頁。
- 406 后备軍 是普魯士陸軍的一个組成部分。根据 1814—1815 年的法律建

- 立的普魯士陸軍包括常備軍(基干團)及其在戰時動員時用來補充軍隊的預備隊, 還包括第一類和第二類後備軍。早在 1813 年在反對拿破侖軍隊的鬥爭中作為民團產生的普魯士後備軍, 包括年齡較大的應征人員, 他們在常備軍及其預備隊中服役期滿。在平時, 後備軍部隊只是進行一些集訓。在戰時, 第一類後備軍(年齡從 26 歲到 32 歲的應征人員) 則被用來補充作戰部隊; 第二類後備軍(年齡從 32 到 39 歲的應征人員) 則被用來擔任警備勤務。根據 1867 年 11 月 9 日北德意志聯邦關於普遍義務兵役制的法律, 第二類後備軍被取消了, 後備軍的全體人員只限於 27 歲到 32 歲的應征人員。——第 554 頁。
- 407 民軍是 1813—1814 年在普魯士出現的一種民團。根據 1867 年法律, 民軍應由不在陸軍或海軍中服役的、從 17 歲到 42 歲的應征人員組成, 並且只是在受到敵人入侵的威脅時才征召。——第 554 頁。
- 408 1849 年 5 月, 德國西部和南部在維護帝國憲法的口號下爆發了一次起義。普魯士政府企圖把普魯士西部各省的後備軍動員起來鎮壓這次起義。這裡指的是普魯士政府的這一企圖遭到了失敗。按照 1814 年 9 月 3 日和 1815 年 11 月 21 日法律的規定, 只有在受到外敵入侵的情況下才能征召後備軍。根據這一點, 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里亞的後備軍不僅拒絕服從命令, 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常常有組織地帶著武器轉到了起義人民方面。——第 554 頁。
- 409 指的是 1872 年 7 月 27 日的軍隊編制法, 這項法律宣布在法國實行服役期限為 5 年的普遍義務兵役制; 但是在實施這項法律的時候, 允許應受征召的人有很多可以例外。——第 555 頁。
- 410 “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 是德國的一家日報, 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倫出版; 萊茵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自由黨的機關報; 七十年代被認為是俾斯麥的喉舌。——第 555 頁。
- 411 這篇文章載於 1874 年 3 月 25 日“人民國家報”第 35 號“政治評論”欄, 沒有署名。——第 558 頁。
- 412 1870—1871 年普法戰爭開始時, 巴贊元帥的軍隊被圍困在法國麥茨要

- 塞；1870年10月27日要塞就投降了。——第558頁。
- 413 “萊比錫日報”（*«Leipziger Tageblatt»*）是德國的一家日報“萊比錫日報和公報”（*«Leipziger Tageblatt und Anzeiger»*）的簡稱，從1807年起出版；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是大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第558頁。
- 414 放棄麥茨要塞的法國元帥巴贊因被控叛國而交付法庭審判。審判從1873年10月6日至12月10日在巴黎進行。——第558頁。
- 415 指薩多瓦會戰，見注265。——第559頁。
- 416 Hoffbauer. *«Die deutsche Artillerie in den Schlachten bei Metz»*. Berlin, 1872. ——第559頁。
- 417 恩格斯在他於1850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的第三版準備付印時，對他在1870年2月給該書第二版寫的序言做了補充。經過補充的序言載於1875年在萊比錫出版的“德國農民戰爭”（F. Engels. *«Der deutschen Bauernkrieg»*. Leipzig, 1875）第3版上。本卷發表了序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註明寫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序言的第一部分，按照它寫作的日期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頁。——第561頁。
- 418 恩格斯說普魯士民族的神聖德意志帝國時，是套用了中世紀的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稱呼，以此強調指出，德國的統一是在普魯士的霸權下實現的，同時還引起了德國土地的普魯士化。——第561頁。
- 419 指的是漢諾威王國、黑森—加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1866年普奧戰爭的結果普魯士把它們併入了自己的版圖。——第561頁。
- 420 見注267和注269。——第562頁。
- 421 由於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德國西南的四個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亞和維爾騰堡）併入了北德意志聯邦，這一點由1870年11月簽訂的正式條約肯定下來了。從1870年11月15日起，隨着德國西南各邦根據條約逐漸併入北德意志聯邦，德意志各邦的聯盟才在正式文

- 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Deutsches Bund)。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562頁。
- 42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50頁。——第564頁。
- 423** 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魯士軍隊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
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維昂維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結果,德軍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萊茵軍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
关于色当,見注404。——第564頁。
- 424** 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9个席位,支持他們的选票有35万多張,即占全部选票的6%,当选的人中有剛被监禁期滿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第565頁。
- 425** “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趨勢的文章,是恩格斯在1874—1875年間断断續續地写成的。这些文章每写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本来也就是专为該报而写的。
1894年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
“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的全部俄譯文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上。——第569頁。
- 426** “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1874年5月至6月初写的,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問題論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譯文最早发表在“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4—41頁。——第571頁。

- 427 «Address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 London, May 3, 1874. 下面援引这一文件的第2—5頁。——第571頁。
- 428 “雷諾新聞周报” («*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 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諾創办的，从1850年起在倫敦出版；现在是合作运动的机关报。——第571頁。
- 429 米·彼·波果丁“波兰問題。議論、筆記和意見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頁。——第573頁。
- 430 1836年12月4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廢除封建义务和等級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
-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廢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給农民。
-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綱領。——第574頁。
- 431 帖欣和約是普奧之間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个和約的发起人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調停人，而在和約締結时則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約所規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575頁。
- 43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頁。——第576頁。
- 433 恩格斯譏諷地把使波茲南的波兰居民普魯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茲南进行的文化斗争。
-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給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577頁。

- 434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41—48页。——第579页。
- 435 指的是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Aux Communeux»)的小册子。——第580页。
- 436 “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esne»)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年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
关于韦梅希的报纸,见注第84。——第582页。
- 437 指的是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246)。——第584页。
- 4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8—469页。——第585页。
- 439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1874年7月底至9月间写的,并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上。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甫罗夫谈论国际的文章。
“前进!不定期评论”(«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彼·拉·拉甫罗夫于1873年至1877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1875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了一种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也叫“前进!”。——第588页。
- 440 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第589页。
- 441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

- 1939年在維也納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載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報”第3284和3285號。——第590頁。
- 442 彼·特卡喬夫的小冊子“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致‘前進！’雜誌編輯的信”于1874年4月在倫敦用俄文出版。——第593頁。
- 443 指的是彼·拉·拉甫羅夫的匿名出版的論戰性著作，標題是“致俄國社會革命青年。關於小冊子：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1874年倫敦版。往下恩格斯引用該書第3、17和44—45頁。——第595頁。
- 444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獻”這一組文章中的第四篇發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國家報”第36和37號上。這篇文章是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寫的。馬克思讀過特卡喬夫的小冊子（見注445）之後，把它轉交給了恩格斯，並在書皮上寫了這樣一段話：“你寫點東西出來，不過要用譏諷的筆調。這愚蠢透了，甚至連巴枯寧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喬夫首先想向讀者表明，你對待他就像對待自己的敵人一樣，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樣不存在的爭論點來。”——第599頁。
- 445 彼·特卡喬夫“致1874年度‘人民國家報’第117和118號所載‘流亡者文獻’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1874年蘇黎世“哨兵報”印刷所出版（P. Tkatschhoff. «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 Jahrgang 1874. Zürich, Typographie der Tagwacht. 1874）。這封信的俄譯文載于彼·特卡喬夫“社會經濟問題論文選”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頁。——第599頁。
- 446 恩格斯在這裡引用了特卡喬夫的小冊子“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第603頁。
- 447 彼·特卡喬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第9—10頁（P. Tkatschhoff. «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S. 9—10）。——第605頁。

- 448 恩格斯在这里和以下几处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傳的任务”。——第 605 頁。
- 449 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 年倫敦版第 47 頁。——第 607 頁。
- 450 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 7 頁。——第 608 頁。
- 451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在 1875 年 4 月 16、18 和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3、44 和 45 号上，并以“論俄国的社会問題”(«Soziales aus Rußland»)为題于 1875 年在萊比錫出版了单行本。1875 年 5 月恩格斯給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見本卷第 641—644 頁)。
- 恩格斯的小册子“論俄国的社会問題”最早是由維·查苏利奇譯成俄文的，名称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俄国”1894 年日內瓦版；此后，这一著作便以各种名称在俄国再版。——第 610 頁。
- 452 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 610 頁。
- 453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 1869 年出版后不久馬克思就讀完了。馬克思在 1870 年 3 月 24 日致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員們的信中对这本书給予了很高的評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63—464 頁)。稍后恩格斯也讀了这本书。——第 616 頁。
- 454 恩格斯是指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內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設施的考察”(«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1847 年至 1852 年在汉諾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第 617 頁。
- 455 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馬尔克制度史”1856 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 “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戶制度史”1862—1863 年厄兰根

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1—4, Erlangen, 1862—1863), “德国乡村制度史” 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第618頁。

456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是卡·馬克思在1852年10月底至11月初写成的一本战斗的、抨击性小册子(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 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痛斥了普魯士警察国家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无耻的伎俩。該书第1版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瑞士)出版問世, 但是在企图把它运进德国去的时候, 几乎全部(共2000册)被警察沒收了。在美国, 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頓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England Zeitung》)上陸續发表, 1853年4月底該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但是美国这一版本也未能在德国流傳。1874年“人民国家报”在从10月28日至12月18日的总共十三号报纸上全文轉載了“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和1853年版不同的是, 那时沒有指出作者的姓名, 而現在則指出它的作者是馬克思。李卜克內西同时也准备发行单行本, 为此他在1874年10月29日写信給馬克思, 請他給单行本写一篇序言, 1875年1月8日馬克思写好了这篇“跋”, 它最初发表在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上, 后来又收入1875年在萊比錫出版的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K. Marx.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Leipzig, 1875)一书第2版中。——第624頁。

457 据后来查明, 馬克思当时是弄錯了。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文件, 特别是赫斯本人在1850年7月21日写給約·魏德迈的信, 都证实了“紅色問答书”的作者是莫·赫斯。——第624頁。

458 关于希尔施的文章見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和“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頁和第14卷第715頁及其他各頁)。——第624頁。

- 45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0頁。——第625頁。
- 46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6頁。——第627頁。
- 461 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貝尔）是在什列斯維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魯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間，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魯士軍隊攻陷。
“內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詞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評論中用来表示“內部敌人”的用語，后来被广泛引用。——第627頁。
- 462 这篇轉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5年1月23日在倫敦举行的1863—1864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紀念会上的講話的文章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紀念会由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波兰、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們出席了紀念会，并在会上讲了話。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参加者列·弗兰克尔、利沙加勒等人。关于紀念会的报道1875年1月30日发表在于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杂志“征召义勇軍”（«Wici»）上，接着又发表在于里沃夫出版的波兰自由主义报纸“波兰报”（«Dziennik Polski»）上。2月15日俄文报纸“前进！”也发表了一篇报道。“前进！”在报道中說，恩格斯在馬克思之后，用英語发表了演說。——第628頁。
- 463 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間先后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是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經常策源地。——第629頁。
- 464 从“前进！”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前进！”編輯部的秘书弗·斯米尔諾夫曾經在1月23日的紀念会上讲过話，他強調指出俄国工人階級和波兰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代表俄国革命者宣布，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已准备好，“当革命的钟声一敲响，就投入波兰人的队伍，去为波兰人民爭得社会自由”。俄国流亡者索洛維約夫也讲了話，他指出要提防波兰地主自由派和沙皇政府可能勾結起来。——第630頁。
- 46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4頁。——第630頁。
- 466 弗·斯米尔諾夫1875年2月給馬克思的信保存下来了。斯米尔諾夫

在信中說，他在給“前進！”写一篇有关波兰紀念会的报道。斯米尔諾夫出席这次紀念会时，曾听到馬克思讲过下面这句话：“因此，必須在波兰人民中間宣傳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由于波兰报刊的报道中没有这句话，斯米尔諾夫便請馬克思证实他是否讲过。馬克思的答复我們沒有見到，但是，“前進！”的报道中轉述了这句话。——第 631 頁。

467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俾斯麦德国为了重新蹂躪法国而于 1875 年挑起的战争危險达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写的。大家知道，由于俄国外交方面的坚决干預，防止了当时在欧洲爆发战争。恩格斯这篇文章，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出发，抨击了德国軍国主义。“人民国家报”編輯部认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具有重大意义，准备把它印成单行本，但是，这一意图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載于 1875 年 4 月 23 日“人民国家报”第 46 号上。——第 632 頁。

468 恩格斯在这里揭露 1875 年 2 月 12 日頒布的民軍法的本质，这个法律是 1867 年 11 月 9 日法律(見注 407)的条款的进一步发展，它規定在必要时可以用应征参加民軍的預备兵来补充后备軍。——第 632 頁。

469 1875 年 3 月 12 日法国国民議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作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基于人員和实有人員編制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一个团从三个营扩充到四个营，而全部軍队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了 144 000 人。——第 632 頁。

470 指的是法国政府于 1870 年秋基本上用新兵組成的卢瓦尔軍团。——第 635 頁。

471 根据 1874 年 5 月 2 日的法律，在普魯士軍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緩服現役的适龄人員組成的那一部分預备兵員，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規定为 12 年)在动员时作补充軍队之用。——第 637 頁。

472 这个声明是福伊格茨-雷茨少将于 1875 年 1 月 11 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說中发表的。——第 638 頁。

473 “关于德国的札記”(«Varia über Deutschland»)的手稿反映了恩格

斯由于想写一本德国史而对德国人民的已往历史所进行的深刻研究。恩格斯一再談到德国史的問題，在 1873—1874 年他又对这些問題做了努力的探討。关于自己的这些工作他在 1874 年 1 月 27 日写信給威·李卜克内西說：“我想給‘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因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經濟和統計資料，結果也許能写成一本小书，甚至是一大本。”这一意图没有实现；从他所准备的材料来看，恩格斯是想闡明包括他当时經歷过的 1873 年的各种事件在內的德国史的进程，其中着重叙述自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史。从中世紀末到 1789 年这一时期預計在一篇分量較重的导言中加以闡述。本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是这一导言的大綱和包括 1789 年至 1815 年这一时期的第一篇的梗概。

本卷中还发表了就其內容而言和导言的大綱有关的由个别段落組成的“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个手稿的片断。

比較完整的“关于德国的札記”和恩格斯关于德国史的其他一些准备性稿件一起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 年版第 10 卷上。——第 647 頁。

- 474 馬克思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和組織上粉碎了巴枯宁主义者以后，这一斗争仍在繼續进行。

卡·馬克思做的这一摘要是一部独特的批判性和論战性著作，这一著作在揭露当时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观点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学說并且发展了与之相对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許多极其重要的原理：即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馬克思在摘要的手稿上所加的一系列插語中闡述了这些原理。巴枯宁的这本书是 1873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它被許多巴枯宁主义团体奉为綱領性的著作。在該书問世以后不久，馬克思就做了这篇摘要。

巴枯宁一书摘要包括在馬克思的一本很厚的筆記本里，筆記本上写着«Russica II, 1875»〔“俄国，第二册，1875”〕，其中有許多俄国作者

的著作的摘要。巴枯宁一书摘要的手稿共計大开本 24 頁。巴枯宁这本书的內容，馬克思有时直接用俄文摘录下来，有时用德文比較扼要地加以轉述。在轉述巴枯宁一书的內容和直接摘录其中的个别地方时，中間都交插着馬克思的簡短批語和較长的插語。

本篇中凡是逐字轉述或大意轉述巴枯宁一书內容的地方，都用小五号字。馬克思本人的批語則用老五号字排印。在把引文由德文譯回俄文时，都用了巴枯宁原书的文字，同时也保留了馬克思在譯成德文时所作的一些改动。凡是馬克思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普通引号“ ”，凡是馬克思在摘录时翻譯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 》。——第 655 頁。

- 475**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2 年 4 月 2 日的會議上，爱尔兰通訊書記麥克唐奈报告了警察当局对各爱尔兰支部的迫害。根据馬克思的提議选出一个委员会負責就这件事情起草一个專門的呼吁书，委员会的成員有馬克思、麥克唐奈和米尔納。4 月 9 日，麥克唐奈代表該委员会把一項关于爱尔兰的警察恐怖的声明提交总委员会，在对这个声明是否适于公布的問題进行討論以后，这个声明被通过了，并根据恩格斯的提議，决定把它印成 1 000 份傳单在爱尔兰散发。

声明的全文也在西班牙的“解放报”上刊登过，刊登时加有編輯部按語，按語中还援引了麥克唐奈 1872 年 4 月 2 日的报告。——第 711 頁。

- 476** 指十三世紀由英国征服者作为同爱尔兰人民斗争的据点而建筑的都柏林堡。它是在爱尔兰的英国当局的官署，它代表着英国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和暴力。——第 712 頁。

- 477** 在 1872 年 3 月 12 日的总委员会會議上，恩格斯提出抗議，反对黑尔斯坦以書記的身分署名在“东邮报”上发表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的时候“按自己的口味”介紹总委员会委員們的发言。其中涉及到 1872 年 3 月 9 日“东邮报”上发表的恩格斯 3 月 5 日的发言。

恩格斯关于国际意大利各支部情况的报告是以 1872 年 3 月 1 日維·雷吉斯給他的信里所叙述的事实为根据的。——第 714 頁。

- 478 恩格斯在他向总委员会所做的这个报告中向总委员会介绍了3月15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筹备该联合会应屆代表大会而写的一封信的内容。3月27日恩格斯对这封信作了回答，回信的草稿載于本卷第62—63頁。由于来信要求向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祝賀，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份賀詞(見本卷第68—70頁)，并且让費雷支部代表法国的所有支部发出了賀信。——第716頁。
- 479 恩格斯这个关于薩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4—11日)召开之前国际各西班牙支部状况的报告，是以拉法格寄給他的材料为根据的，当时拉法格正在馬德里为反对西班牙联合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进行緊張的斗争。但是，恩格斯在1872年5月22日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他从拉法格那里得来的关于已經战胜西班牙联合会中的同盟分子的消息“无论如何是有些夸大之处”，因此要求不发表这个报告。——第718頁。
- 480 各工人协会(主要是处于自由资产阶级集团即所謂“温和派”影响下的互助协会)代表大会是于1872年4月17日在羅馬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組織者——政府官員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企图利用代表大会来加强他們的影响并且阻撓国际的思想在工人中的傳播。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妄想代表全意大利工人，这个企图引起了羅馬許多工人組織的反对，因为这些組織打算召开自己的、真正的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它們只能在1872年4月21日举行了一次表示抗議的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根据国际會員卢恰尼的提議通过了一项決議，坚决抗議资产阶级假冒工人阶级名义的企图。——第720頁。
- 481 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一次會議上发言为不列顛联合会委員馬耳特曼·巴里的代表資格证辯护，是因为一些英国代表、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者以巴里“不是公认的工人領袖”为理由否认他的代表資格证的合法性。这场圍繞巴里代表資格证的斗争客观上反映了整个英国工人运动中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代表和力求使这个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代表之間发生的斗争。馬克思这篇很有影响的发言引起了

所有改良主义分子和工联主义領袖的瘋狂攻击。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保存在由代表大会書記之一弗·阿·左尔格用德文所做的代表大会記錄里。左尔格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回紐約时，隨身带走了會議記錄的原稿；1872年10月初，他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請求，把泰·庫諾所抄并經庫諾和左尔格核对过的全部記錄副本寄給了他們。这份副本从前收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庫里，副本的照片現在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保管。1958年威斯康星大学（美国馬迪逊市）的学报发表了不知由誰轉抄并且未經核对的这份記錄的另一种副本的真迹复制品和英譯文。这第二个副本是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尔曼·施留特爾的文件中發現的。記錄的原稿現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收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发言是根据核对过的因而是更为可靠的記錄副本翻譯的。——第724頁。

- 482 这是馬克思在討論未被总委员会接受加入国际的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見本卷第171頁）派遣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尼·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資格证是否有效的問題时的发言。

馬克思发言的結尾部分是对比利时代表布里斯美发言的回答，后者反对法国流亡者成立（尤其是在布魯塞尔）不加入地方联合会的独立支部。——第725頁。

- 483 馬克思在关于威斯特所持的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資格证是否有效这个問題的发言中，彻底揭穿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派想利用国际的名义和組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篡夺工人运动的領導权的企图（見本卷第170頁）。——第726頁。

- 484 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決議以及下面发表的1873年5月30日的两篇決議，都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总委员会委員們的信以及恩格斯給总委员会的一封正式信件（見本卷第350—352頁）中所提出的建議为基础的。这些決議的最重要的論点与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建議完全一致。——第736頁。

- 485 这封給国际工人协会日內瓦代表大会代表公民們的信是恩格斯在与馬

克思和賽拉叶磋商以后于 1873 年 9 月 3 日写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各地方联合会和支部的报告，早在 8 月底之前就已經看到，根据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应该在瑞士召开的国际下次代表大会将不再具有国际性了。鉴于当时的形势，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总委员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并說服了赫普納和賽拉叶不去日内瓦。

这封信以恩格斯亲笔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第 741 頁。

- 486** 指总委员会的报告和为代表大会准备的其他材料。列入代表大会議程的有下列問題：关于修改章程的問題、关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問題、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問題、关于对工人的普遍統計的問題。代表大会于 1873 年 9 月 8 日在日内瓦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左右的代表都是代表瑞士各支部而主要是日内瓦各支部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約·菲·貝克尔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和各地方的报告。1873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 742 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2年3月—1875年3月)

1872

3—8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小資产階級分子的斗争中捍卫国际的綱領原則和組織原則，同时进行国际应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国际的支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个人通信。恩格斯特別注意西班牙，因为当时西班牙是同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組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斗争的基本据点。恩格斯經常同留居馬德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法格通信，从他那里知道有关西班牙各支部活动的詳細情况，通过他领导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恩格斯經常向总委员会报告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

馬克思緊張地审閱“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校样，同时大力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版。在德文第二版中，馬克思对第一版全卷的結構作了重大的更改；把书中某些篇名改得更加确切；对价值和各种价值形态作了更加詳尽而严密的科学分析；进一步闡明和發揮了其他各章中的許多原理。

3月初—5月初

馬克思应国际曼彻斯特支部领导人欧·杜邦的請求，就該支部正在爭論的土地国有化問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写出了对这个問題的非常詳尽的意見。馬克思寄去的手稿由杜邦在5月8日支部會議上宣讀，并且于

- 6月15日发表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机关报“国际先驱报”上，没有指明作者。
- 3月5日** 馬克思把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通告“所謂国际内部的分裂”提交总委员会，通告揭穿了巴枯宁主义这种同工人运动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实质；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公布这个通告。馬克思报告了由于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夺取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权以致北美联合会发生分裂一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馬克思为这个问题而写的一部分决议。
- 3月7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麦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路·皮奥，阐明了在国际中进行的同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的意义；要求他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各项决议提请联合会委员会赞同。
- 3月10—19日** 恩格斯以总委员会通讯书记的身分同国际葡萄牙联合会建立了联系；此后，不断收到关于葡萄牙各支部活动情况的详细报道。
- 3月12日** 由于前公社活动家古·勒弗朗塞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一书中提到了警察当局伪造文件来反对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事，馬克思给比利时支部机关报“自由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信在3月17日发表。
- 根据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北美联合会中的分裂的决议的第二部分。决议指出必须把资产阶级改革派分子从国际中清洗出去，因此决定开除纽约第十二支部，决议由馬克思寄给纽约临时联合会委员会领导人弗·阿·左尔格；决议发表在4月6日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和5月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他收到的新西兰的回信，信中谈到在坎特伯雷成立支部的事。馬克思被确定为3

月 18 日在倫敦舉行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會上演講人之一。恩格斯報告了國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狀況，報告發表在 3 月 17 日“東郵報”關於總委員會會議的報道中。

3月13日和18日之間 馬克思起草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會的決議，把公社稱為“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決議在 3 月 18 日倫敦的國際會員和流亡公社社員大會上一致通過，並發表在 3 月 23 日“東郵報”和 3 月 30 日“國際先驅報”關於大會的報道中，沒有指明作者。

3月下半月—5月初 恩格斯從愛爾蘭通訊書記 J. 帕·麥克唐奈那里得到有關在都柏林、科克、布萊得弗德及其他城市建立愛爾蘭支部和科克罷工運動的消息；他經常同麥克唐奈會面，討論有關愛爾蘭各支部活動的問題。

馬克思拒絕德國資產階級“現代”(«Die Gegenwart») 雜誌編輯保·林達烏多次提出請他為該雜誌撰稿的建議。

3月17日 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請他把載有“共產黨宣言”英譯文和法譯文的“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和“社會主義者報”寄來；雖然發現兩種譯文質量都不高，但是恩格斯指出，為了反對巴枯寧主義和蒲魯東主義的宣傳，還是必須利用它們。

3月18日 馬克思寫信給“資本論”第一卷法文本的出版者莫·拉沙特爾，同意把“資本論”法譯本定期分冊出版，因為這可以使工人們更容易買得起“資本論”。

3月19日 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布勒斯勞(弗羅茨拉夫)警察當局迫害國際會員的情況。恩格斯傳達了里斯本支部來信的內容，信中談到支部的成就和在里斯本出版宣傳國際原則的“社會思想報”一事。

3月26日

恩格斯主持总委员会會議；向总委员会介紹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自 1870 年以来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的报告的内容。由于西班牙联合会将在 4 月間召开屆代表大会，會議委托恩格斯起草一封賀电。这封賀电发表在 4 月 13 日“解放报”上。

3月27日

“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第一版在俄国出版，这是該书的第一个外文譯本；在一个半月里(到 5 月 15 日)总印数 3 000 册中已售出 900 册。

恩格斯写信給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說，总委员会、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和以已牺牲的公社活动家費雷命名的法国支部，都将向西班牙联合会即将在薩拉哥沙举行的代表大会致賀。恩格斯建議將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各項決議提請該代表大会贊同。

4—5月

由于北美联合会內部斗争尖銳化，該联合会的領導权有被资产阶级分子夺去的危險，馬克思密切注視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状况，他領導无产階級一派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革派作斗争，同左尔格通信，从他那里知道詳細的情况。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发言，闡明了在該联合会中所进行的斗争的实质，揭露了美国各支部通訊書記格·埃卡留斯实际上支持被总委员会从国际中开除出去的紐約第十二支部的騎牆立場。

4月初

馬克思收到“資本論”第一卷俄文譯者尼·弗·丹尼尔逊寄来的一本“資本論”俄文本和有关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总委员会前委員格·亚·洛帕廷消息的一封信，馬克思非常关心这两个人的命运。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的 42 頁手稿寄給德国出版者奧·迈斯納，当时正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

馬克思指示迁居比利时的国际會員沙·罗沙如何

在比利时各支部进行工作；以后不断同他通信，从他那里知道国际在比利时活动的詳細情况。

恩格斯把威·李卜克内西写的一封信譯成意大利文，这封信是李卜克内西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为反对意大利“自由思想”杂志編輯、资产阶级民主派魯·斯蒂凡諾尼对总委员会的誣蔑而写的；該信寄給了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卡菲埃罗，于4月20日发表在民主派的“玫瑰小报”上。

- 4月2日** 馬克思根据李卜克内西3月19、28和30日的来信，向总委员会报告指控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阿·赫普納叛国的萊比錫案件的結果；他还参加討論麦克唐奈所做的关于国际各支部在爱尔兰受到迫害的报告。
- 4月3日**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給西班牙薩拉哥沙代表大会写賀信。該信发表在4月13日“解放报”和5月4日“人民国家报”上。
- 4月9日** 馬克思因病未能出席总委员会的會議。麦克唐奈宣讀有馬克思参加起草的声明“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声明經总委员会通过，并印成傳单公布。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出版“法兰西内战”法譯本的决定。
- 根据恩格斯的提議，在倫敦的波兰人支部成員、波兰革命者約·罗茲瓦多夫斯基被批准为总委员会委員。
- 4月13日** 馬克思所著“哲学的貧困”的一部分以“阶级斗争論”为題，发表在西班牙“解放报”上。
- 4月13—16日** 由于議員貝·柯克倫和亨·福塞特发表誣蔑国际的言論，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声明在总委员会4月16日會議上一致通过，印成傳单公布，

- 并发表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各国的各家机关报上。
- 4月中** 馬克思获悉他的信件在法国和英国受到暗中檢查。
- 4月下半月—5月** 馬克思审阅并修改自己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的法譯文，同时和国际的比利时会员 E. 格拉澤-德-維耳布罗尔通信，商談在比利时出版該书的工作的組織安排和程序問題。“法兰西内战”于6月在布魯塞尔出版，印数为2 000册。
- 4月下半月—8月** 恩格斯研究拉法格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霍·梅薩寄給他的关于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活动的材料。
- 4月16日** 恩格斯写信給加入国际的費拉拉工人协会，闡明国际工人协会的組織原則。
- 4月20日** 恩格斯为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撰写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罢工的文章，从此以后，他就經常为該报撰稿。这篇文章以“倫敦来信”为題在4月24日发表。
- 4月23日** 恩格斯祝賀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法庭上做了坚强不屈的发言。
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意大利米兰当局非法逮捕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庫諾并将他逐往巴伐利亚的事；他认为这一事实是各国反动政府勾結起来反对国际的表现。
- 4月底** 恩格斯写信給皮奧，強調指出吸引小农和无地农民参加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
- 4月底—5月** 馬克思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校訂“資本論”第一卷的法譯文，同时审阅德文第二版的校样。
- 5月上半月** 恩格斯打算写一本著作来反对在德国工人階級中散布

蒲魯东思想的企图,因此他研讀蒲魯东的“十九世紀革命的总观念”一书。

5月7日

馬克思因病没有出席总委员会會議。恩格斯做了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薩拉哥沙代表大会总结的报告,报告发表在5月12日“东邮报”上;他还談到意大利的費拉拉协会已承认国际的章程;根据他的提議,該协会被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恩格斯把拉法格刊登在“解放报”上的一篇关于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搞秘密陰謀的文章寄給李卜克內西,交“人民国家报”发表,同时建議发表拉法格刊登在“自由报”上的一篇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薩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訊。

5月7—8日

恩格斯写信給在塞兰(比利时)的庫諾,把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搞陰謀的事告訴了他,建議他积极进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宣傳;同时把与国际会员們联系的地址寄給了他,并且給了他金錢上的帮助。

5月14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关于英国的爱尔兰支部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問題;他发言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并揭露总委员会中某些英国委員的沙文主义观点。

5月中

由于德国大工业家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发表了资产阶级經濟学家路·布倫坦諾指責馬克思蓄意歪曲所引用的材料的一篇匿名文章,馬克思写信給“人民国家报”編輯部駁斥对他的誣蔑。該信发表在6月1日該报上。

**1872年5月下半
月—1873年1月**

恩格斯写“論住宅問題”这一組文章,这組文章从1872年6月至1873年2月陸續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在这些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章中,恩格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毁灭性的批判,闡

明了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規律性，只有在无产階級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階級的一切社会經濟要求才可能得到滿足。

5月17、20日

馬克思接到邀請，請他參加由流亡公社社員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組的會議，馬克思是小組的成員。

5月21日

馬克思在总委員會會議上宣讀由他起草的一个声明，揭露倫敦的英国小資產階級分子和流亡小資產階級分子（其中包括被国际开除后組成所謂世界联邦主义委員會的那批人）想盜用总委員會名称的企图。声明經一致通过后以总委員會的名义发表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的国际的各家机关报上。

5月22日和6月5日之間

恩格斯为了筹备国际应屆代表大会，写了几封信給李卜克內西，請他澄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总委員會之間的組織关系，并保证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5月23日

馬克思給“玫瑰小报”編輯部写了一封信“再論斯蒂凡諾尼和国际”，駁斥了斯蒂凡諾尼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对总委員會及其領導者进行的誣蔑。該信发表在5月28日該报上。

5月28日

馬克思写信感謝丹尼尔逊寄給他一本“資本論”第一卷俄譯本，并請他告知关于米·亞·巴枯宁同无政府主义者謝·格·涅恰也夫之間的联系的材料；同时也談到由于必須完成“資本論”以后各卷的写作工作，他想拒絕再次被选入总委員會。

在总委員會的會議上，馬克思提議下次會議專門討論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問題。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和恩格斯的支持，总委員會通过決議，承认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員會是国际北美联合会的唯一領導机关。

5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委員會內部通告“所謂国际內

- 部的分裂”在日内瓦出版,并分发给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和联合会。
- 6—8月** 馬克思在大力筹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同时,继续为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法文本而紧张工作。
- 6月4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否决了倫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
- 6月11日** 根据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在荷兰召开应屆代表大会。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組織問題,特别是总委员会的权力問題,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問題之一。
- 6月18日** 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总委员会应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筹备代表大会的共同問題上,所以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把代表大会的日常事务和組織筹备工作交给常务委员会主持,从此以后,常务委员会就定名为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恩格斯被选入起草关于应屆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和議事日程的决议的委员会。恩格斯起草的决议发表在6月29日“国际先驱报”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上。
- 6月18日—9月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执行委员会筹备应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特别注意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組織在西班牙的活动;力争把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团结在执行委员会周围。
- 6月21日** 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应屆代表大会在9月2日召开,强调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对国际今后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請他保证北美联合会派代表出席。
- 6月2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7月間将在萊比錫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序言。在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

- 指出，巴黎公社經驗的意義在於證明工人階級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
- 6月25日** 根據恩格斯的提議，總委員會為了籌備代表大會而着手討論對共同章程和條例提出的修改意見。馬克思由於力求保證無產階級組織隊伍的純潔性，表示同意授予總委員會將支部暫時開除出國際直到應屆代表大會為止的權力。
- 7—8月** 馬克思同葡萄牙聯合會委員會書記弗朗薩商談用葡萄牙文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問題；通過恩格斯給他寄去了“資本論”第一卷並請他收集關於葡萄牙土地所有制的資料。
- 7月2、9和1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總委員會關於章程和條例的條文的討論。總委員會通過恩格斯提出的條例中關於擴大總委員會權力的條文。
- 7月3日** “人民國家報”發表了馬克思以德國通訊書記身分簽署的，總委員會關於在荷蘭召開應屆代表大會和議事日程的決議。
- 7月5日** 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恩格斯宣讀了葡萄牙聯合會委員會的一份函件。該委員會聲明完全擁護總委員會。由於發現了關於同盟在西班牙進行秘密活動的材料，執行委員會委託恩格斯查詢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與同盟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起草執行委員會關於應屆代表大會開除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提案，並提交總委員會。
- 恩格斯收到都靈支部的來信，該支部的會員表示完全擁護總委員會。
- 7月9日左右** 恩格斯為“人民國家報”撰寫“國際在美國”一文，文章中利用了馬克思從美國報紙上抄錄下來的許多資料和

- 国际北美联合会會員們的来信。文章在7月17日发表。
- 7月9日和15日之間**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兰茲格特休息。
- 7月10日** 恩格斯被选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出席英国联合会諾定昂代表大会的代表。
- 7月中**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册（共5印張）出版。
- 7月18日** 恩格斯以意大利通訊書記的身分通过“人民报”編輯恩·比尼亚米給伊莫拉城工人运动的四个参加者寄去了加入国际的证明书；把加入国际的条件通知帕尔馬的一个团体“工人階級解放委员会”和佛罗倫薩支部。
- 7月19日** 执行委员会委托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并委托恩格斯起草财务报告。
- 7月21日** 馬克思写“致魯尔罢工的矿工”，向工人說明，德国矿主揚言要从英国輸入煤炭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英国煤炭工业处境困难。号召书发表在7月27日“人民国家报”上。
- 7月21—22日** 恩格斯接到了杜邦关于不列顛联合会諾定昂代表大会經過的詳細报道，大会支持总委员会进行反对改良派的斗争。杜邦是根据恩格斯的提議被指派为总委员会出席該代表大会的代表的。
- 7月23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會議上支持瓦揚提出的把倫敦代表會議关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的決議列入共同章程的建議。为了防止資产階級分子钻进国际中来，馬克思提議对章程第九条作一点补充：凡是新接受的支部，其成員中雇佣工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建議被通过了。

- 7月24日** 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給瓦倫西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信中要求报告秘密的巴枯宁同盟在西班牙活动的資料。
- 7月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有关召开应屆代表大会的問題。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作关于以費雷命名的法国支部和瑞士德国人支部的章程的报告。
- 7月28日** 由于“协和”杂志上发表了布倫坦諾的一篇新的匿名文章，馬克思給“人民国家报”写第二封信，这封信发表在8月7日該报上。
- 7月29日** 馬克思写信給他的朋友、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庫格曼，指出即将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对国际的命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派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是重要的。
- 7月底—8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杜邦的倡議，帮助他在曼彻斯特建立一个把工人流亡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外国人支部。
- 8月4日** 在执行委员会會議上，馬克思报告国际在荷兰、意大利、美国的状况。恩格斯分別宣讀庫諾、梅薩和約·菲·貝克尔以及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比利时、西班牙、瑞士、葡萄牙同巴枯宁主义者斗争的情况的信件。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把新馬德里联合会7月22日的呼吁书譯成法文、德文和英文。
- 8月4—6日** 恩格斯受执行委员会委托写告国际全体会员书，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組織的活动。經過热烈的爭論后，呼吁书于8月6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以4票的多数通过。
- 8月8日** 在执行委员会會議上通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給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信，信中談到秘密的社会主义民

- 主同盟在西班牙的破坏活动。这封信发表在8月17日“解放报”上。
- 8月15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了丹尼尔逊寄来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稿“沒有收信人的信”和发表在俄国报刊上的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的书評；他把“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一部分寄給丹尼尔逊。
- 8月15日** 恩格斯代表执行委员会通知新馬德里联合会，承认它为国际的一个联合会。这一通知发表在8月24日“解放报”上。
- 8月15日和12月12日之間** 馬克思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沒有收信人的信”；他把第一封信全部譯成德文，其余的信仔細地做了摘要，抄录了許多原文；采取步驟准备出版手稿。
- 8月下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馬克思代表萊比錫支部，恩格斯代表布勒斯劳支部。
- 8月2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与总委员会其他委員一起会見了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左尔格，向他叙述了总委员会的状况和各个国家內国际組織的状况。
- 8月22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羅馬支部書記奧·尼約基-維亞尼关于羅馬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和羅馬支部的通信地址。
- 8月23日** 恩格斯給意大利各支部写了一封通告信，揭露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想在他們的里米尼代表會議(8月4—6日)上盜用国际名称的企图；通告信分發給都灵、米兰、羅馬和費拉拉各支部。
- 8月24日** 恩格斯謝絕李卜克內西关于提名他为帝国国会議員候选人的建議；恩格斯把巴枯宁主义者准备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情况告訴李卜克內西。
- 8月27日** 馬克思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参加討論应繳納多少会費的

- 問題；他在批評了英国工联主义者活动的时候，提出了工会組織的任务在于成为劳資斗争中的組織核心的思想。
- 8月28日** 馬克思主持执行委员会會議。
- 8月底** 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应屆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最后一次會議一致批准了这个报告。
恩格斯受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以便提交代表大会討論；准备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 8月底—9月初** 馬克思收到国际俄国支部成員尼·吳亭为海牙代表大会写的关于所謂涅恰也夫案件以及涅恰也夫在俄国的活动的报告；馬克思把这些材料轉交給海牙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調查委员会。
- 8月底—10月初** 馬克思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拉·塞西利亚通信，因为后者想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意大利文。由于出版社拒絕簽訂合同，翻譯沒有进行。
- 9月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馬克思夫人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一起）到海牙参加国际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的預备會議，会上通过了馬克思提出的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秘密會議来选举代表資格审查委员会的建議。
- 9月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大会上他們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則，反对小資产阶级宗派主义，力爭把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关于必須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以爭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決議列入国际章程，同时还力求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
- 9月2日** 在代表大会的下午會議上馬克思被选为代表資格审查

委員會委員并參加該委員會工作。在晚間會議上馬克思發言談該委員會的任務問題。

9月3日

在代表大會的下午會議上馬克思參加討論美國代表的資格問題。馬克思提議把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從國際中開除出去，并要求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有關的文件。恩格斯參加討論代表大會進行的程序問題。

在討論英國代表的代表資格證問題時，馬克思在晚間會議上發言替總委員會委員馬·巴里的代表資格證辯護，公開譴責英國工聯領袖們已經被資產階級收買。在討論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員）的代表資格證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巴枯寧主義者敵視國際的活動。馬克思通知代表大會，收到了毛里西奧港（利古里亞）支部的賀信，該支部選舉馬克思為自己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

9月4日

在代表大會的上午會議上，馬克思代表委員會提議宣布紐約第十二支部頒發的威斯特的代表資格證無效，并揭露了這個支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性質。在晚間會議上討論同盟代表提出的關於改變表決原則的建議時，恩格斯發言堅決駁斥了按派有代表出席大會的組織的人數計票的辦法。

9月5日

馬克思在代表大會的上午會議上參加討論成立一個調查秘密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活動的委員會的問題。

馬克思用德語宣讀總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一致通過，于9月至10月間發表在各國國際機關報上。

9月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下午會議上參加共同章程的討論。馬克思發言談必須擴大總委員會權力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投票贊成把倫敦代表會議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列入章程的建議。恩格斯發言，闡明了他和馬克思提出把總委員會駐在地遷往紐約的理由；

- 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調查委员会會議上发言揭露西班牙和其他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謀。
- 9月7日** 恩格斯在代表大会晚間會議上做关于总委员会的财务状况的报告；报告一致通过。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入代表大会記錄审訂和出版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秘密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討論同盟活动調查委员会的报告，并投票贊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領巴枯宁和詹·吉約姆。
- 9月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一起参加国际阿姆斯特丹地方支部在当地召开的群众大会。馬克思发表了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總結的演說，揭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決議对工人运动的意义，代表大会已經把这一決議列入国际共同章程。演說发表在9月15日“自由报”和10月2日“人民国家报”上。
- 9月10日左右** 馬克思会見要到美国去的庫諾，同他交談了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組織的問題。
- 9月12日左右** 恩格斯从荷兰回到倫敦；会見了即将前往美国的左尔格。
- 9月12日** 馬克思写了一封給“海盜报”編輯的公开信，駁斥反动报刊对国际的造謠誹謗。該信发表在9月15日“海盜报”和9月21日“解放报”上。
- 約9月17日** 馬克思从荷兰回到倫敦。
- 9月17日** “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第一輯(共五分册)出版。第一天就售出了234套。
- 9月下半月—1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給各国的国际会员，說明海牙代

- 表大会关于号召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决议的意义。
- 9月21日** 恩格斯把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国际各个组织的通讯地址寄给左尔格。
- 9月底—10月中** 马克思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几分册寄给国际会员和自己的通讯员。
- 马克思和恩格斯审订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并准备付印；决议在10月底以单行本出版，并发表在12月14日“国际先驱报”上。
- 恩格斯接到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里斯本举行罢工的消息后，写信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许多英国工联组织，建议它们立即反对把罢工破坏者从英国运往里斯本。
- 10月** 恩格斯写“论权威”一文，并把它寄给比尼亚米。
- 10—11月** 恩格斯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曼彻斯特各支部成员同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不列颠委员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作斗争。
- 1872年10月—1873年8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驻纽约的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通信，把国际在欧洲各国的联合会和支部的活动情况告诉他，帮助他解决那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继续同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的活动家通信，说明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 10月1日和5日** 恩格斯把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总结的几篇文章寄给比尼亚米。文章以“海牙代表大会”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为题，分别发表在10月5日和8日“人民报”上。
- 10月初** 恩格斯为“解放报”撰写“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一文，揭露了同盟盟员在代表大会上的破坏活动。文章发表在10月13日该报上。

- 10月5日** 恩格斯会见国际的爱尔兰活动家麦克唐奈和德·摩尔根,同他们交谈了有关爱尔兰各支部状况的问题;给委派他作为代表的纽约第六支部寄去了一份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收到庫諾寄来的一封信和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副本。
- 10月26日** 西班牙“解放报”以“馬克思的‘資本論’”为总标题发表了馬克思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和他3月18日給拉沙特尔的一封信。該报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关于“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連續几分册开始出售的消息。
- 10月31日** 恩格斯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状况的报告,并于11月2日寄給了左尔格。
- 11—12月** 馬克思审阅“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文的校样。
应比尼亚米的請求,馬克思写“政治冷淡主义”一文,向意大利工人揭露了放棄政治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学說的含义,論证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規律性。文章于1873年12月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 11月2日** 恩格斯通知左尔格在洛迪和阿魁拉成立了新的国际意大利支部,并把同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联系的地址轉寄給他。
- 11月3日和17日** 恩格斯收到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請他担任該支部駐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代表的建議。
- 11月7—13日** 恩格斯写信給国际的阿魁拉支部和洛迪支部。給国际洛迪支部的信发表在11月17日“人民报”上。
- 11月14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撰写一篇关于爱尔兰的国际会员在

- 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要求釋放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文章；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认为这是总委员会为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而斗争的結果。文章于11月17日发表。
- 11月15日左右** 恩格斯从比尼亚米那里得知，他已被列入计划要出版的“社会主义丛书”的作者名单。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 11月15日和18日之間** 馬克思在牛津燕妮和沙尔·龙格家中作客，他在那里审阅“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文的校样。
- 11月16日左右** 恩格斯把总委员会关于它已經在紐約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的通告寄給許多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他还校訂通告的英文文本，并把它寄給“国际先驅报”发表。
- 11月16日** 恩格斯写信給左尔格，建議总委员会通过一項決議，指出汝拉联合会由于拒絕承认海牙代表大会決議和国际的章程和条例而置身于国际之外。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決議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个建議，該決議发表在国际的报刊上。
- 11月25日** 馬克思請丹尼尔逊把可靠地址寄給他，以便今后和他通信。
- 1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們那里得知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的詳細情况，这次分裂是那些拒絕承认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改良派制造出来的。
- 12月5日左右** 馬克思从荷兰社会主义者布魯諾·李貝尔斯那里知道了国际荷兰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詳細情况，这次代表大会拒絕支持无政府主义者。
- 12月7日** 恩格斯把国际在荷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状况詳細

- 地告訴了左尔格。
- 12月11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撰写一篇关于国际各联合会状况的文章。文章以“倫敦来信”为題，发表在12月14日該报上。
- 12月12日** 馬克思从丹尼尔逊那里得知洛帕廷从流放地逃跑失敗后，告訴丹尼尔逊，他准备帮助洛帕廷获得自由；馬克思請他把关于“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版的評論和有关車尔尼雪夫斯基生平事业的資料寄来，因为馬克思打算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在这封信中馬克思表示，为了更完备地制定地租理論，他打算专门研究有关俄国土地关系的俄文資料。
- 12月14日** 恩格斯把載有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12月14日“国际先驅报”寄給左尔格，并通知他比尼亚米已被逮捕，載有总委员会材料的那一号“人民报”已被警察沒收。
- 12月20日** 馬克思会見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应他們的請求起草告不列顛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屬团体和會員书，揭露了那些退出不列顛委员会的改良派实际上是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員勾結在一起的。呼吁书于12月31日印成傳单发表。
- 恩格斯应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成員的請求，起草該支部对分裂出去的那部分改良派的通告的答复；在答复中着重指出，这些分裂分子由于拒絕服从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已經置身于国际队伍之外了。答复于12月23日印成傳单发表。
- 12月21日** “国际先驅报”上发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揭露了黑尔斯对前总委员会及其領導人的誹謗。
- 12月30日** 总委员会指派馬克思保管前总委员会的档案，其中包括总委员会的記錄。

1873

1月—2月中

恩格斯写关于国际在大陆上的活动的消息，这些消息发表在1月11日、2月1、8和15日“国际先驅报”上关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會議的报道中；他主持为七个在洛迪被捕的“人民报”編輯募捐的事宜，为此他同国际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組織，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通信，并安排从英国汇款。

1—5月

恩格斯领导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的活动，从他們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各支部状况的消息，帮助他們起草各种文件和报纸通訊，向他們介绍国际在各个国家中的状况；他继续同梅薩通信，把总委员会的文件轉寄給他，并給予“解放报”金錢上的帮助。

1月初

由于普魯士通过了新的行政改革法，恩格斯写一篇文章，分析德国各个阶级力量的配置状况。文章以“普魯士‘危机’”为题发表在1月15日“人民国家报”上。

1月2日

由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誹謗性的短文，馬克思給該报編輯部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于1月3日发表。

1月4日

恩格斯写信給左尔格把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的事詳細告訴了他，給他寄去了該委员会告不列顛联合会全体會員书，而且还談到了国际在比利时、葡萄牙、丹麦、法国和意大利的状况。

1月5日

总委员会委任恩格斯为总委员会負責意大利事务的全权代表，并授予他解决有爭論的問題以及在經总委员会审查以前把个别會員和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的权力；恩格斯收到的有关委托书和指示发表在5月10日“人民报”上。

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从德国得知，尙在獄中的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

- 补选中获胜，“人民国家报”的訂戶不断增加。
- 1月23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給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請求支援日內瓦罢工的钟表工人；該委员会在1月23日會議上宣讀了这封信。
- 1月24日** 馬克思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跋。
- 1月25日左右** 馬克思写对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出去的改良派的新通告的答复，揭露改良派歪曲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企图。答复发表在1月25日“国际先驅报”的不列顛委员会正式通告栏內。
- 2月** 馬克思閱讀丹尼尔逊寄来的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的諷刺作品“外省人旅京記”和“塔什干的老爷們”。
- 約2—3月** 馬克思閱讀阿·阿·戈洛瓦乔夫的“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一书，并着手研究亚·斯克列比茨基的五卷本著作“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
- 2—6月** 由于拉薩尔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构中和“人民国家报”編輯部中积极活动起来，恩格斯分別写信給李卜克內西和赫普納，严厉批評了編輯部的某些成員和李卜克內西本人对拉薩尔分子和巴枯宁分子所采取的調和主义立場；恩格斯警告說，如果繼續实行这种政策，他和馬克思要同該报断絕关系。
- 2月上半月** 恩格斯应德·摩尔根的請求，把朱·加里波第写給摩尔根的談及共和主义者反对教权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争的信譯成英文。这封信发表在2月15日“国际先驅报”上。
- 2月12日** 馬克思写信給总委员会委員弗·波尔特，指出海牙代表大会的偉大成績在于把“腐烂分子”从国际中清除出去了；馬克思在这封信中說明，有必要做出一个决定，

- 明确指出凡是拒絕承认海牙代表大会決議的联合会和支部就是違反国际的章程并置身于国际的队伍之外。
- 2月23—25日** 恩格斯写信給梅薩，闡述了自己对西班牙发生的革命的性质的看法，确定了无产階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及其具体要求；指出建立独立的政党是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 3月** 恩格斯再次把“論权威”一文寄給比尼亚米，因为比尼亚米在被捕时把这篇文章遺失了。文章于1873年12月发表在“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 3—4月** 馬克思和比尼亚米通信，商談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意大利文并在意大利出版；由于政府的迫害，这个想法沒有实现。
- 3月1日和22日、4月12日** 西班牙“解放报”发表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关于貨幣轉化为資本的那一篇。
- 3月11日** 恩格斯写信給李卜克內西的妻子，探詢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獄中的生活条件，以及能否改善他們的处境。
- 3月20日左右** 馬克思和女儿爱琳娜一起在布萊頓休息了几天。
- 3月20日** 恩格斯写信給左尔格，建議根据总委员会1月26日的決議对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有关組織以及汝拉联合会做出适当的决定。上述決議規定，凡是拒絕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的联合会都必須退出国际。总委员会于5月30日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决定发表在国际的各家机关报上。
- 3月22日** 馬克思写信給丹尼尔逊，請求告訴他有关俄罗斯法史学家波·尼·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发展的看法，并让他了解契切林和亲斯拉夫派历史学家伊·德·別利亚耶夫就这一問題所进行的辯論。

- 3月2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应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的邀請，出席倫敦的国际會員和流亡公社社員举行的巴黎公社两周年紀念大会；大会通过了由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一书的个别篇章构成的宣言。
- 3月底** 馬克思繼續校訂“資本論”第一卷的法譯文，就譯文中的一些問題和拉法格磋商。
- 4月** 馬克思为了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閱讀“同时代人”杂志发表的有关这个問題的文章，其中包括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贖买土地困难嗎？”一文和阿·謝韦尔策夫写的有关契切林的著作“俄国的农村公社”的书評。
- 4—7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写一本关于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內的秘密活动的小册子，对总委员会五年来所进行的反对巴枯宁的組織——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斗争作了总结。小册子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标题于8月底用法文出版，并分发给国际的所有組織和一些會員。
- 4月初** 馬克思收到丹尼尔逊应他的請求寄来的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簡短的傳記材料。
- 4月5日**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最后一批校样寄給迈斯納。
- 約4月12日—5月24日** 恩格斯应“国际先驅报”編輯部的請求，寄去几篇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評論，这些評論的材料发表在4月12日和16日、5月3日和24日該报“工会运动新聞”栏內。
- 4月下半月—5月** 恩格斯經常帮助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書記賽·維克里和其他委員筹备在曼彻斯特召开不列顛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決議草案和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支部的名单，以及其他文件。

- 恩格斯整理海牙代表大會的記錄，以使用法文發表。這一工作沒有完成。
- 4月15日** 恩格斯向總委員會報告國際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的報刊的狀況。
- 4月底** 恩格斯寫信給赫普納，揭穿了拉薩爾派報紙“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的那些關於國際的文章的誹謗性質。這封信的主要部分發表在5月7日“人民國家報”上。
- 5—6月** 馬克思不顧自己健康的嚴重惡化，繼續準備“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事宜，實際上他是在重新翻譯該書的一部分。
- 5月初** 馬克思同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杜邦和賽拉葉討論不列顛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議程。
- 5月2日** 恩格斯為“人民國家報”撰寫“國際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一文，駁斥了“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對總委員會提出的誹謗性指責。文章發表在5月10日“人民國家報”上。
- 5月22日—6月3日左右** 馬克思住在曼徹斯特請龔佩爾特醫生診病，他會見了自己的朋友賽·穆爾和卡·肖萊馬，拜訪了住在南港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恩·德朗克。
- 5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來往的書信中討論法國加緊反動和波拿巴分子加強活動的問題。
- 馬克思收到丹尼爾遜應他的請求寄來的關於俄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狀況的大批資料匯編和傳記材料。
- 5月30日** 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闡述了他的著作“自然辯證法”的構思，他打算在這部著作中對理論自然科學的成就作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並且批判自然科學領域中的

- 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着手收集資料并在一年中写出了这部未来著作的許多片断。
- 6月初**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在汉堡出版。
- 6月10日和14日之間**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把总委员会揭露无政府主义者对国际的誹謗的5月23日声明譯成英文和法文，并分別寄給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意大利的“人民报”。
- 6月19—20日** 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在国际中”一文，評述了国际各国支部的状况；文章于7月2日发表。
- 6月20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爭取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中的策略的基本方針，批判了該党个别领导人对于拉薩尔派所采取的調和主义立場，警告不要在同全德工人联合会联合的問題上急于求成；指出了把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分子从国际中清除出去的海牙代表大会的意义。
- 7月** 馬克思不顾医生的禁止，繼續在英国博物館的閱覽室中进行工作。
- 恩格斯帮助由于在法国遭到迫害而流亡西班牙的法国国际会员拉罗克同西班牙国际会员建立了联系；并从拉罗克那里得到了有关西班牙状况和波尔多工人运动的消息。
- 7—10月** 馬克思研究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閱讀瓦·伊·謝尔盖也維奇的“市民會議和公爵”、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康·阿·涅沃林的“俄罗斯民法史”、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組合”等书籍。
- 7月25—26日** 恩格斯在給左尔格的电报和信中表示同意提名賽拉叶作为总委员会出席日内瓦国际应屆代表大会代表的候

- 选人，并請求发出指令和材料以便大家能預先看到。
- 8月初—9月初** 恩格斯在兰茲格特疗养，为了安排已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分发工作，到倫敦去了一天。
- 8月12日**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最后一个分册寄給丹尼尔逊。
- 8月底** 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的信，丹尼尔逊对于未能把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詳尽的傳記材料寄給馬克思一事表示遺憾；同时还談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們认为馬克思在报刊上发表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論是不合时宜的。
- 8月底—9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討論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否恰当的問題；他們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举行国际的全权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劝賽拉叶和赫普納不要到日内瓦去。恩格斯用賽拉叶的名义起草“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們”的信，說明他拒絕参加代表大会的理由。
- 9—10月** 恩格斯写“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以巴枯宁主义者在1873年夏天西班牙起义期間的活动作为例证，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則和策略是毫无根据的。文章发表在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上，1873年12月底以单行本出版。
- 9月上半月** 恩格斯用德文为“人民国家报”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概要，这篇概要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題发表在9月19、21、24和26日該报上。
- 9月25日和30日之間**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寄給查·达尔文和赫·斯宾塞。

- 9月27日** 馬克思写信給左尔格,分析了国际当前的状况,并且表示确信,国际作为工人运动的組織形式在历史上已經过时了;他請求左尔格把美洲各家报纸評論美国經濟危机的剪报寄給他。
- 約1873年10月—
1874年2月** 恩格斯由于打算写有关德国史的著作,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經濟和統計資料,閱讀有关普魯士和德国的农业統計、貿易和行政机构的书籍。同时恩格斯还对古·居利希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和克·朗格塔耳的“德国农业史”两书做了詳細摘要。
在此期間,恩格斯为自己的未来著作写草稿,这些草稿題为“关于德国的札記”,其中揭示了德国經濟落后的原因,对于籠罩着德国的反动势力、沙文主义和普魯士主义做了明确的評述。
- 10月1日** 馬克思接到达尔文的信,达尔文对他寄去的“資本論”第一卷表示感謝。
- 約10月28日—11月
20日** 恩格斯由于母亲去世而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在德国)。
- 11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回来以后)常常会見当时正在倫敦的吳亭,吳亭告訴他們許多关于巴枯宁的活动的
新事实。
- 11月15日左右**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法文本的連續几分册贈送給英国博物館的图书馆。
- 11月24日—12月
15日** 馬克思和他的女儿愛琳娜一起在哈罗格特疗养;为了請龔佩尔特医生治病,他到曼彻斯特去了一天,医生要求他暫時停止一切工作。
- 11月25日和28日
之間** 恩格斯和洛帕廷会見,洛帕廷是專門为了会見馬克思从巴黎到倫敦来住几天的。
- 11月底** 恩格斯修改“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寄給他的“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德譯文；德文版以“一个反对国际的陰謀”为題于1874年在不倫瑞克出版。

11月底—12月初

恩格斯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文的手稿。

12月初

馬克思閱讀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塞·德·巴普的著作“关于十九世紀社会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并写信給恩格斯对这一著作提出批評意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交換对罗·貝奈狄克斯論莎士比亚的那本著作的看法。

12月24日左右

馬克思告訴拉沙特尔說，他打算加快“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文的审閱工作。

12月28日左右

馬克思从庫格曼那里得到答复他的請求的通知，通知說只有在他放棄革命活动的条件下才能回德国。

1874

1874年—1875年初

恩格斯繼續写作“自然辯证法”。在这段时期中他写了50篇以上的札記和片断。

馬克思閱讀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做了摘要，加了許多批注，其中論证了关于无产阶级專政的历史必然性的原理和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的原理。

1—4月

馬克思为了完成“資本論”以后各卷而收集和 research 各种資料；研究土地所有制問題，把古代作家关于这个問題的資料同最新的有关著述加以对比。

1月27日

恩格斯写信給李卜克內西說明1874年1月10日德国帝国国会的选举結果，是以独立政党身分参加选举活动的德国工人的巨大胜利；他告訴李卜克內西說，他打算写一本有关德国史的书。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 1月底 恩格斯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举办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基金捐款。
- 2月—3月初 馬克思为了繼續写作“資本論”其他各卷而研究土地問題，因此钻研植物生理学和关于土壤的人工施肥的理論，閱讀 J. 奥的“李比希的土壤貧瘠化学說和經濟人口論”一书和其他有关农业化学的著述。
- 2月—4月中 馬克思的健康再度恶化。
- 2月21—22日 恩格斯写“英国的选举”一文，闡明了英国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并揭示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文章作为社論发表在3月4日“人民国家报”上。
- 2月底—3月初 恩格斯写“帝国軍事法”一文，揭露了准备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俾斯麦政府的軍国主义。这篇由两节組成的文章发表在3月8日和11日“人民国家报”上。
- 3月 俄国民粹主义者、“前进！”杂志編輯彼·拉·拉甫罗夫拜訪了馬克思。拉甫罗夫是在此以前不久从苏黎世来到倫敦，以便繼續出版杂志的。
- 3—4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同洛帕廷会見；馬克思把丹尼尔逊写給洛帕廷的信件轉交給他，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发表在“知識”杂志1874年第1期上的尼·季別尔的文章“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 3月13日 恩格斯写“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饒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萊比錫給他写信的人”一文，繼續批判德国的軍国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文章发表在3月25日“人民国家报”上。
- 4月中—5月5日 馬克思在兰茲格特疗养。

- 5月4—5日** 恩格斯应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請求讀他和波兰革命家揚·克林斯基一起写的“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
- 5月5日和12日之間** 馬克思因病中断一段時間以后重新开始审閱“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文,并且在5月12日把审閱好的一部分稿子寄往巴黎。
- 約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中** 恩格斯写由五篇文章組成的以“流亡者文献”为題的一組文章,考察了欧洲民主运动和无产階級运动发展中的新趋向。
- 在第一篇文章“波兰宣言”中,恩格斯指出,波兰的社会問題和民族問題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徑才能获得解决,并再次強調指出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意义。文章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上。
- 5月下半月—6月中** 馬克思审閱“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的最后三个分册。
- 6月** 恩格斯写“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的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文章发表在6月26日“人民国家报”上。
- 恩格斯写信給白拉克,就1873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旨在修改該党綱領的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該党綱領的意見。
- 6—7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給李卜克內西、威·布洛斯和赫普納,警告他們要提防小資产階級政論家欧·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的危險,并对杜林的“国民經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表示了坚决否定的意見。
- 6月15日左右** 恩格斯从李卜克內西那里得到了关于德国政府迫害“人民国家报”編輯的消息。
- 6月24日** 恩格斯写回信給流亡里約热內卢的德国国际会員 A. 韦格曼,告訴他关于协会的情况。

- 7月1日** 由于准备付印“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恩格斯对他在1870年为该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作了补充；在补充中他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作用，指出了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提出掌握革命理论并在群众中加以传播是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刻不容缓的义务。
- 7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赖德休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来往的书信中讨论了有关国际形势和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国内政治状况的问题。
- 约7月底—9月** 恩格斯写“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批判了“前进！”杂志编辑拉甫罗夫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调和主义立场。文章发表在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上。
- 7月28日左右** 恩格斯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关于1874年7月18—21日在科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工作顺利的消息。
- 8月初** 马克思试图取得英国国籍，并向内务部提出了相应的申请书；申请被拒绝了，借口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忠顺。
- 8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阐明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势。
- 8月6—7日** 马克思在他的女儿燕妮的陪同下往访住在伊斯特勃恩的恩格斯。
- 8月中** 恩格斯接到左尔格通知说他退出总委员会的信。
- 8月15日** 根据医生的决定，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一起离开伦敦前往卡尔斯巴德。
- 约8月15—20日** 恩格斯赞同布洛斯的建议，认为在科伦出版以“新莱茵

- 報”為名的工人日報是適宜的；布洛斯的想法沒有實現。
- 8月19日—9月21日** 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療養；經常和庫格曼一家會見。
- 9月5日** 恩格斯在澤稷島休息後返回倫敦。
- 9月12—17日** 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闡明了第一國際的歷史意義，表示確信將來必然會出現以馬克思主義原則為依據的共產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
- 9月22日和10月初之間** 馬克思從卡爾斯巴德回來時在德勒斯頓、萊比錫、柏林和漢堡作了逗留；在萊比錫會見了李卜克內西和剛剛出獄的布洛斯以及萊比錫黨組織的代表，同他們交談了黨內狀況和同拉薩爾主義作鬥爭的必要性。
- 10月3日左右** 馬克思返抵倫敦。
- 10月20日左右** 恩格斯應住在巴黎的洛帕廷的請求，把“流亡者文獻”這一組文章的第三篇寄給他，洛帕廷便馬上把文章轉寄給他的在彼得堡進行革命鬥爭的同志。
- 10月20日和30日之間** 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接到李卜克內西和“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的領導人之一海·朗姆的通知，說全德工人聯合會建議同社會民主工黨合併；李卜克內西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指出，對這一建議已經採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
- 10月28日—12月18日** 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第一次在德國的“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並指出了作者的姓名。
- 1874年底** 馬克思閱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卡芬雅克”，並重新仔細地研究1874年在蘇黎世出版的“沒有收信人的信”。
- 1 8 7 5**
- 1月8日** 馬克思為“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一書的第二版寫

- 跋, 跋发表在 1 月 27 日“人民国家报”上; 該书于 1875 年以单行本出版。
- 1月23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紀念会上发表演說; 演說經恩格斯整理后以“支持波兰”为題作为一篇文章发表在 3 月 24 日“人民国家报”上。
- 1月底** 馬克思完成“資本論”第一卷法譯本最后三个分册的审閱工作并将它們寄往巴黎。
- 2月初** 馬克思閱讀从拉甫罗夫那里得到的已出版的俄国流亡者文献, 并且在給拉甫罗夫的信中特別指出“前进!”杂志的“祖国情况”一栏, 是最有趣味的材料, 尤其指出洛帕廷的評論俄国教派的札記“寄自伊尔庫茨克”, 这个札記把俄国教派看做是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形式之一。
- 2月—3月初** 馬克思閱讀俄国民粹主义者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 并加上自己的意見把它寄給恩格斯, 建議給予回答。恩格斯写了“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作为答复, 文中探討了俄国的社会关系和在改革以后的时期中資本主义的发展, 尖銳地批判了民粹派在这些問題上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发表在 3 月 28 日、4 月 2、16、18 和 21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第五篇文章和恩格斯专门為它写的导言以“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为題于 1875 年以单行本在萊比錫出版。
- 2—4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法德关系的尖銳化, 并写了“半官方的战争叫囂”一文, 揭穿了俾斯麦政府在 1875 年战争恐慌时期采取的侵略方針; 文章发表在 4 月 23 日“人民国家报”上。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卫, 爱德华(David, Edward)——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法国人, 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选入总委员会, 但拒绝当选。——第 176 页。

万-赫德盖姆 (Van-Heddeghem 约生于 1847 年) (假名瓦尔特 Walter)——警察, 曾钻进国际巴黎支部,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3 年被揭露。——第 166—168、170、171、173—176、354—357、362、369 页。

四 画

扎克斯, 艾米尔(Sax, Emil 1845—1927)——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61—281、285—288 页。

丹特雷格, 艾米尔 (Dentraygues, Émile 约生于 1837 年) (假名斯瓦尔姆 Swarm)——法国铁路职员, 国际土鲁斯支部成员,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在国际会员土鲁斯案件 (1873) 中出卖过自己的同志。——第 166—168、170、171、174—176、354—357、359—361、429 页。

毛勒,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研究者。——

第 618 页。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元帅, 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参谋长 (1871—1881);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 146、534、550—556、558—560 页。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六十年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德意志总汇报”编辑 (1863—1879)。——第 202 页。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伦敦大学教授; 1870—1871 年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第 98、99、120、121 页。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共和党人, 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国际洛迪支部的组织者, “人民报”编辑 (1868—1882), 1871 年起经常与恩格斯通信, 曾反对无政府主义, 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过斗争。——第 184、345、

- 352、353、363 頁。
- 比埃特里, 約瑟夫·瑪麗(Pietri, Joseph-Marie 1820—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1866—1870)。——第 29、377 頁。
- 韦梅希, 欧仁(Vermersch, Eugène 1845—1878)——法国小资产阶级新聞工作者, 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时期曾出版“度申爸爸”周报,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在英国出版报纸“誰来了!”, 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委员会进行誣蔑。——第 74、582 頁。
- 韦斯顿, 約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木匠, 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2), 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第 54、77、89、92、713 頁。
- 韦拉德, 霍賽·瑪麗(Velarde, José Maria)——西班牙將軍, 1873 年 4—9 月为卡塔卢尼亚鎮守司令。——第 530 頁。
- 韦济尼埃, 比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因誹謗总委员会于 1866 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 1868 年被开除出国际;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書記和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委員, 这两个組織都反对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29、89、728 頁。
- 巴特, 伊薩克(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Home-Rule)的組織者之一。——第 547 頁。
- 巴里, 馬耳特曼(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聞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国际會員,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总委员会委員(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1873), 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 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繼續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 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謂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第 76、91、168、170、175、712、724 頁。
- 巴赫, 約翰·塞巴斯提安(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偉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651 頁。
- 巴贊, 弗朗斯瓦·阿希尔(Bazaine, François-Achille 1811—1888)——法国元帅, 保皇派, 1863—1867 年率領法軍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軍軍长, 后任萊茵軍团司令,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558 頁。
- 巴卡夫(Bacave)——法国警探, 曾钻进国际納尔榜支部, 支持无政府主义者, 1873 年被揭露。——第 429 頁。
- 巴特里(Buttery, G. H.)——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第 54、76、91、712 頁。
- 巴尔尼, 茹尔(Barni, Jules 1818—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組織者之一, 1872 年起为議會議員。——第 373 頁。
- 巴亚尔, 比埃尔(Bayard, Pierre 1475 左右—1524)——法国騎士, 同代人称頌他是勇敢和高貴的榜样, 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責难的騎士”。——第 381 頁。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11、12、15—19、24、34、36、42、45、46、52、53、72、73、128—130、132、153、155—157、164、173、181、188、198、203、205、296、348、356、357、359、362、369、372—376、378—385、389、392—395、397、398、400—407、410、416、417、420、424—427、431、440—458、461—463、466—468、471、477、481—485、487—492、494—501、514—516、520、521、533、534、536、537、566、592、596—598、604、609、617、657、658、666、667、671、673、676、677、680—683、687、692、695、700—702、718、720、722、723 頁。

巴甫洛夫, 普拉东·瓦西里也維奇(Павлов, Плат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3—1895) ——俄国历史学家, 是基輔和彼得堡第一批主日学的組織者; 1862 年因与革命組織有联系被行政当局驅逐出彼得堡。——第 493 頁。

巴斯特利卡, 安得列(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 ——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會員,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 18、19、25、30—31、391、393、407、426 頁。

五 画

龙格, 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3—1903)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

是新聞工作者, 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67、1871—1872), 比利时通訊書記(1866),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 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 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会主义派別——可能派。——第 55、77、91、166—168、174—176、712 頁。

白拉克, 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不倫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 1869 年起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1877—1879)。——第 589 頁。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 ——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的积极會員之一, 美国各支部的組織者,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紐約总委员会委員和总委员会总書記(1872—1874), 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傳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66—168、170、171、174—176、207、732、733、735、737—740 頁。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1825—1855)。——第 491、492、499、575、576、642、658、692 頁。

尼古拉也夫,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Никола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約生于 1850 年) ——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 曾参加杀害大学生伊万諾夫, 1871 年被判七年零四个月徒刑, 流放西伯利亚。——第 464—466 頁。

- 甘必大, 萊昂 (Gambetta, Léon 1838—1882) —— 法国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员 (1870—1871), 1871 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 内閣总理兼外交部长 (1881—1882)。——第 400 頁。
- 甘布齐, 卡洛 (Gambuzzi, Carlo 1837—1902) —— 意大利律师, 革命者, 六十年代初是馬志尼主义者, 后为无政府主义者, 意大利秘密同盟和无政府主义組織的领导人之一。——第 375、417 頁。
- 汉澤曼, 大卫 (Hanseman, David 1790—1864) —— 德国大資本家, 萊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領袖之一; 1848 年 3—9 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265 頁。
- 汉薩德, 托馬斯·寇松 (Hansard, Thomas Curson 1776—1833) —— 英国出版者, 曾发表議会會議工作报告; 他死后出版物繼續以他的名义出版。——第 97—101、125—127 頁。
- 加里波第, 朱澤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 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 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全国統一的斗争; 七十年代声援巴黎公社, 拥护建立国际意大利支部。——第 425、519 頁。
- 加里多-伊-托尔托薩, 費南多 (Garrido y Tortosa, Fernando 1821—1883) —— 西班牙资产阶级联邦共和主义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議會議員 (1869—1873)。——第 404 頁。
- 加夫里舍夫, 格奧爾基·雅柯夫列維奇 (Гавришев, Георгий Яковлевич 約生于 1846 年) —— 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 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 1871 年被判四个月徒刑。——第 458 頁。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499、621、658 頁。
- 叶列涅夫, 費多尔·巴甫洛維奇 (Еленев, 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 1828—1902) (笔名斯卡尔金 Скалдин) —— 俄国作家, 政論家, 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 曾为“祖国紀事”杂志撰稿, 聞名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作者; 后来成为反动分子。——第 620 頁。
- 叶尼舍尔洛夫, 格奧爾基·彼得罗維奇 (Енишерлов,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約生于 1849 年) —— 彼得堡工学院学生; 1868—1869 年学潮的参加者, 曾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审讯, 由于证据不足被釋放。——第 460 頁。
- 圣馬丁, 德 (Saint-Martin, de) —— 法国律师, 巴枯宁主义者。——第 429 頁。
- 圣西門,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 —— 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36、566、701 頁。
- 圣克萊尔 (Saint-Clair) ——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爱尔兰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第 176、737 頁。
- 圣热尔門, 克勞德·路易 (Saint-Germain, Claude-Louis 1707—1778) —— 伯爵, 法国將軍, 陸軍大臣 (1775—1777)。——第 554 頁。
- 瓦揚, 愛德華 (Vaillant, Édouard 1840—1915) —— 法国社会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洛桑代表大会 (1867)、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

- 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紐約而退出国际;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法国社会党(1901)創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場。——第 54、77、92、166—170、171、175、176、587、713 頁。
- 瓦格納,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中所謂的社会法律學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 291 頁。
- 瓦尔特——見万-赫德盖姆。
-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卓越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裝訂工人;左派蒲魯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委員,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賽分子枪杀。——第 29 頁。
- 皮尔(Pihl, S. F.)——哥本哈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 166—168、170、172、174—176 頁。
- 皮奥,路易(Pio, Louis 1841—1894)——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馬克思主义的宣傳者;国际丹麦支部(1871)創建人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編輯;丹麦社会民主党(1876)創建人之一;1877年侨居美洲。——第 149 頁。
- 皮諾,米格尔(Pino, Miguel)——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为机械工人,同盟馬拉加小組的創建人。——第 409 頁。
- 皮阿,費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論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参加过 1848 年革命,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許多年利用在倫敦的法国人支部誹謗馬克思和国际,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第 24 頁。
- 皮-伊-馬尔加耳,弗朗西斯科(Pi y Margall, Francisco 1824—190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的領袖;职业是律师和文学家;資產階級革命(1854—1856 和 1868—1874)的参加者,曾任內务部长(1873 年 2 月 13 日—6 月 11 日),共和国政府的临时总統(1873 年 6 月 11 日—7 月 18 日)。——第 525、526、531、534 頁。
- 卡尔,康拉德(Carl, Conrad 死于 1890 年)——德国裁縫,五十年代初侨居美国,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員,曾参加“工人报”編輯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1874 年由于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176、737、739 頁。
- 卡尔-奧古斯特(Karl August 1757—1828)——薩克森-魏瑪大公。——第 651 頁。
- 卡拉斯(Callas)——法国棧糊工,蒙彼利埃支部書記,执行总委员会路綫,1873 年被捕并被判处一年徒刑。——第 360、361、429 頁。
- 卡拉科左夫,德米特利·弗拉基米罗維奇(Каракоз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40—1866)——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秘密革命协会“組織”的會員,1866

- 年4月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处絞刑。
——第460頁。
- 卡瓦納 (Kavanagh) ——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176、737、739頁。
- 卡菲埃罗，卡洛 (Cafiero, Carlo 1846—1892) ——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1871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綫；1872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組織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拋棄无政府主义，1879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节写本。——第189、194、198、417、418、431頁。
- 卡梅利納，澤菲蘭 (Camélinat, Zéphirin 1840—1932) —— 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职业是青銅匠，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起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第29頁。
- 卡耳耶哈，英諾森特 (Calleja, Inocente) —— 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首飾匠，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1—1872)，“解放报”編委 (1871—1873)，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员 (1872—1873)；曾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第412頁。
- 卡普卢索，斯蒂凡諾 (Caporusso, Stefano) ——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縫，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創建人之一，并任該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1870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开除出支部。——第417、418頁。
-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維奇 (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 —— 俄国反动政論家，“莫斯科新聞”的編輯 (1850—1855、1863—1887)。——第488、489頁。
- 卡利奧斯特罗，亚历山大罗 (Cagliostro, Alessandro 1743—1795) (真名朱澤培·巴尔扎莫 Giuseppe Balsamo) —— 意大利冒險主义者。——第16、521頁。
- 卡斯特拉尔-伊-里波耳，埃米利奧 (Castelar y Ripoll, Emilio 1832—1899) ——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右翼共和党人領袖，1873年9月—1874年1月是政府首腦，該政府为西班牙君主制复辟扫清了道路。——第415、525頁。
- 弗朗薩——見諾布雷-弗朗薩，霍賽。
- 弗留茲，比埃爾 (Fluse, Pierre) —— 比利时蒲魯东主义者，职业是織工，国际会员，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支持巴枯宁派。——第166—168、170、174、175、176頁。
- 弗賴列，迪奧尼西奧·加尔西亚 (Fraile, Dionisio Garcia) ——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416頁。
- 弗洛林斯基，伊万·伊万諾維奇 (Флори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約生于1845年) —— 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旁听生，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1871年被判六个月徒刑。——第459、460頁。
- 弗列罗夫斯基——見別尔維，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
- 弗兰茨二世 (Franz II 1768—1835) ——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792—1806)，奧地利皇帝，称弗兰茨一世 (1804—1835)。——第575頁。
- 弗兰克尔，列奧 (Frankel, Leo 1844—

- 1896)——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飾匠;巴黎公社委員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55、77、92、137、166—170、174—177、199、486、713 頁。
- 弗里德兰德,胡果(Friedlander, Hugo)——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苏黎世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 166—168、170、174—176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国王(1740—1786)。——第 325、575、650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魯士国王(1786—1797)。——第 575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 68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1840—1861)。——第 325、692 頁。
- 布恩,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宪章主义者布朗特尔·奥勃萊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1872),土地和劳动同盟書記,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第 54、76、91、712 頁。
- 布雷,約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經濟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論。——第 336 頁。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聞工作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为倫敦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时期及其后是凶恶的沙文主义者。——第 95 頁。
- 布特納,胡果(Buttner, Hugo)——瑞士洋铁匠,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参加者,同盟盟員。——第 375 頁。
- 布莱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历任自由党内閣大臣。——第 75 頁。
- 布斯凱,阿伯尔(Bousquet, Abel)——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雇員被开除出国际支部。——第 173、215、348、430 頁。
- 布朗基,奧古斯特(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許多秘密社团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无产階級运动最著名的領導者。——第 580、581、631 頁。
- 布倫坦諾,路約(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国庸俗的資产階級經濟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97、118 頁。
- 布呂歇爾,格布哈尔德·勒勃萊希特(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魯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 553 頁。
- 布列德尼克,弗雷德里克(Bradnick, Frederik)——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2),1871年为倫敦代表会

議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加入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4、76、91、222、228、229、712頁。

布里克斯，哈罗德(Brix, Harold 1841—1881)——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新聞工作者，国际哥本哈根支部創始人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編輯，丹麦社会民主党(1876)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第149頁。

布里斯美，德吉烈(Brismée, Désiré 1823—1888)——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魯东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1865)創始人之一，1869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委員，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拋棄无政府主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員。——第166、168、170、172、174—176頁。

布魯斯，保尔(Brousse, Paul 1854—191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者；1879年加入法国工人党，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領和思想家之一。——第360、361、428、429、527頁。

布魯土斯(魯齊烏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Lucius Junius Brutus 約死于公元前509年)——据傳說是羅馬共和国的創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們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陰謀。——第338頁。

布魯土斯(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左右—42)——羅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派陰謀的发起人之一。——第581、582頁。

六 画

达夫，維克多(Dave, Victor 1845—1922)——荷兰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新聞工作者，秘密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員，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屬于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1873年西班牙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是和平主义者。——第166—168、170、172、174—176頁。

华德，奧斯本(Ward, Osborne)——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影响的国际勃魯克林支部的成員，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員，但拒絕当选。——第177頁。

休謨，罗伯特·威廉(Hume, Robert William)——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112頁。

亞馬多(Amadeus 1845—1890)——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子，西班牙国王(1870—1873)。——第381、416、523頁。

吉約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會員，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組織者之一，“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簡报”的編輯；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

- 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18、19、30、42、166—168、170、171、173—176、181、188、195、198、201、202、369、389—393、395、402、420、426、427、431、467、471 頁。
- 列斯納,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倫敦,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1月—1872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魯塞爾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在国际里为馬克思路綫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4、77、91、167、168、170、175、176、211、231、712、742 頁。
- 伏尔泰,弗朗斯瓦·瑪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眞姓为阿魯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諷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紀資产階級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329、653 頁。
- 毕克列尔,約翰(Bückler, Johann 1777—1803)——德国强盜,綽号屠夫汉斯。——第 621 頁。
- 安东涅利,扎科莫(Antonelli, Giacomo 1806—1876)——意大利紅衣主教,教皇庇护九世最亲近的樞密官,1850—1870年实际上操纵了教皇国。——第 417 頁。
- 伍德赫尔,維多利亞(Woodhull, Victoria 1838—1927)——美国資产階級女权主义者,1871—1872年她企图夺取国际北美联合会的領導权,組織了一批由資产階級分子和小資产階級分子組成的支部,曾領導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第 107—110、112、113、726 頁。
- 多耳富斯,让(Dollfus, Jean 1800—1887)——亚尔薩斯大厂主,資产階級慈善家,牟罗茲市长。——第 312 頁。
- 多尔哥夫,尼古拉·斯切潘諾維奇(Долгов,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 1844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69年学潮的参加者,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在七十年代与“土地和自由”社有联系。——第 457、459 頁。
- 西塞罗(馬可·土利烏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杰出的羅馬雄辯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550 頁。
- 西里耳,維克多(Cyrille, Victor)——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店員;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鎮压后侨居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为警探。——第 168、174—176 頁。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 658 頁。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 450、489、490、492、494—500、557、571、642 頁。
-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瓦尔瓦拉·弗拉基

- 米罗夫娜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Варва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約生于 1833 年) ——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 1871 年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第 466、467 頁。
- 托倫,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 ——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賽分子, 被开除出国际。——第 73 頁。
- 托馬斯, 弗朗西斯科 (Tomas, Francisco 1850 左右—1903)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泥水匠,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組織的领导人之一,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31、529 頁。
- 托米洛娃, 伊丽沙白·赫利斯塔安諾夫娜 (Томил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Христиановна 約生于 1839 年) ——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审讯, 1871 年被宣告无罪; 八十年代参加薩拉托夫民意党小组。——第 453 頁。
- 托卡熱維奇, 約瑟夫 (Tokarzewicz, Józef 1841—1910) ——波兰革命家, 記者和作家, 1863 年起侨居法国和瑞士, 在苏黎世的国际波兰人支部成員, 反对巴枯宁想影响波兰流亡者的企图。——第 402 頁。
- 米耳克 (Milke)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印刷工人, 柏林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第 167、168、170、175、176 頁。
- 米洛特或米洛 (Millot, T.) ——法国流亡者, 职业是装訂工人, 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員, 采取資产階級激进主义立場。——第 112 頁。
- 米尔納, 乔治 (Milner, George)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爱尔兰人, 布朗特爾·奧勃萊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8—1872),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 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 54、77、91、218、231、712 頁。
- 米尔柏格, 阿尔都尔 (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 ——德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 蒲魯东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第 240—244、247—250、252、253、255—258、295—307、310—312、314—321 頁。
- 伊薩伯拉二世 (Isabella II 1830—1904) ——西班牙女王 (1833—1868)。——第 591 頁。
- 伊万諾夫, 伊万·伊万諾維奇 (Ива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死于 1869 年) ——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 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和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 被涅恰也夫杀害。——第 454、456、457、461—465、468、469、482 頁。
- 伊岑普利茨,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 (Itzenplitz, Heinrich Friedrich August 1799—1883) ——伯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貿易大臣 (1862 年 12 月—1873 年 5 月)。——第 329 頁。
- 伊斯特威克, 爱德华·巴克豪斯 (Eastwick, Edward Backhouse 1814—1883) ——英国外交家和东方学家, 保守党人, 議會議員 (1868—1874)。——第 74 頁。

伊格列西亚斯, 帕布洛 (Iglesias, Pablo 1850—1925)——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无产阶级政論家,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解放报”編委 (1871—1873), 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 (1872—1873), 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1879) 創建人之一; 后来成为該党改良派領袖之一。——第 412 頁。

艾倫, 乔治 (Allen, George)——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 112 頁。

艾尔頓, 埃克頓·斯米 (Ayrton, Acton Smea 1816—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1857—1874), 1869—1873 年为公共工程部长官。——第 542 頁。

艾伯哈特 (Eberhard)——比利时裁縫,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曾参加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66—168、170、175、176 頁。

艾釋华特, 艾德蒙 (Ashwort, Edmund)——英国厂主, 自由党人。——第 276、279 頁。

艾尔皮金,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諾維奇 (Элп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后侨居瑞士; 后来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第 374 頁。

艾克罗伊德, 爱德华 (Ackroyd, Edward)——英国厂主,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第 276、277 頁。

七 画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

馬教皇 (1846—1878)。——第 150 頁。
孚赫, 茹尔 (尤利烏斯) (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貿易自由的拥护者, 1850—1861 年侨居英国, 写有住宅問題的著作; 进步党人。——第 261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74、648 頁。

吳亭, 尼古拉·伊薩柯維奇 (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土地和自由”社社員, 1863 年起流亡英国, 后迁瑞士; 国际俄国支部的組織者之一, “人民事业”編輯部委員 (1868—1870), “平等报”編輯之一 (1870—1871), 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 1871 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七十年代中脱离了革命运动。——第 28、151、403、467、731 頁。

苏希尔 (Zürcher, P.)——国际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成員 (1872), 反对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 225 頁。

劳雷耳 (Laurel)——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瑞典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第 176、737、739 頁。

利胡亭, 伊万·尼基提奇 (Лихутин,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約生于 1848 年)——1869 年学潮的参加者, 在彼得堡建立了与涅恰也夫有联系的小組, 1871 年被判一年零四个月徒刑。——第 460 頁。

别尔維, 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 (Бер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 (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 Н. Флеровский)——俄国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 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第445、616页。
- 車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440、449—452、489、490、492—494、592页。
- 呂耳(Rühl, J.)——德国工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第54、77、91、712页。
- 呂肯(Lucain)——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一位法国代表的假名(真名不詳)，曾参加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第166—168、170、173—176、354、369页。
- 伯特，托馬斯(Burt, Thomas 1837—1922)——英国工联主义者，矿工，諾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議會議員(1874—1918)，奉行自由党政策。——第543、546页。
-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学家，他闡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第651页。
- 希爾施，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624页。
- 希爾斯，艾德蒙(Hills, Edmund)——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231页。
- 辛凯尔迪，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魯士官員，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325、624—626页。
- 辛辛納图斯(魯齐烏斯·昆克提烏斯·辛辛納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貴族，执政官(公元前460)，独裁者(公元前458和439)，据傳說，他生活儉朴，亲自耕种。——第552页。
- 里沙尔，阿尔伯(Richard, Albert 1846—1925)——法国記者，国际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員，1870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鎮压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別——阿列曼派。——第18、19、23、24、51—53、215、357、361、375、381、389、392、393、426、500页。
- 里普曼，費多尔·費多罗維奇(Рипма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約生于1842年)——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1871年被判一年徒刑。——第457、458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38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創始人之一。——第313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国际会员，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薩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則的积极战士，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67年起为

- 国会議員，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編輯（1869—1876）；在个别問題上采取調和主义的立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反对普魯士容克和資產階級的掠夺計劃；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2、93、147、149、416、701 頁。
- 亨利三世 (Henri II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第 653 頁。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 653 頁。
-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偉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652 頁。
- 肖，罗伯特 (Shaw, Robert 死于 1869 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画匠，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9），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工联基层組織中宣傳国际的思想；总委员会财务委員（1867—1868），美国通訊書記（1867—1869），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参加者。——第 14 頁。
- 肖伊，亨利希 (Scheu, Heinrich 1845—192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5 年侨居英国。——第 167、170 頁。
- 肖塔尔 (Chautard)——法国奸細，曾钻进工人組織，倫敦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員，后被揭露并开除出支部。——第 25 頁。
- 狄更斯，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偉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126 頁。
-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无神論者，法国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領袖。——第 653 頁。
- 狄慈根，約瑟夫 (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辯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 170 頁。
- 沙兰，路易·德尼 (Chalain, Louis-Denis 生于 1845 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巴黎公社委員，公社公安委员会、劳动和交換委员会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曾一度加入反对总委员会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 29 頁。
- 沙散，沙尔·路易 (Chassin, Charles-Louis 1831—1901)——法国政論家和历史学家，資產階級共和党人，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参加者，“民主”周报的創办人和編輯（1868—1870）。——第 467 頁。
- 沙佩尔，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1856 年起重新同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5 年倫敦代表會議的参加者。——第 625 頁。
- 麦克法林，艾琳 (Macfarlane, Helen)——革命宪章派領袖乔·哈尼出版的“民主評論”（1849—1850）和“紅色共和

- 党人”(1850)的积极撰稿人,她曾把“共产党宣言”譯成英文。——第104頁。
- 麦克唐納, 亚历山大 (Macdonald, Alexander 1821—1881)——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全国煤矿工人联合会書記, 1874年起为議員, 奉行自由党的政策。——第543、546頁。
- 麦克唐奈, 帕特里克 (MacDonnel, J. Patrick 約生于1845年)——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爱尔兰通訊書記(1871—1872),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 1872年侨居美国, 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55、77、92、137、166—170、174—176、199、210、352、713頁。
- 麦克馬洪, 瑪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軍事和政治活动家, 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軍軍长, 后任夏龙軍团司令, 在色当被俘,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凡尔賽軍队总司令, 第三共和国总統(1873—1879)。——第554頁。
- 克楠, 菲力浦 (Coenen, Philippe)——比利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安特卫普“工人报”編輯部秘书, 国际布魯塞爾代表大会(1868)、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 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組織者之一。——第166—168、170、174、176頁。
- 克虜伯, 阿尔弗勒德 (Krupp, 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 供应欧洲大多数国家軍火的冶金工厂厂主。——第117、277頁。
- 克里默, 威廉·朗达耳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木工和細木工联合协会的創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工联倫敦理事會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总書記(1864—1866),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反对革命策略, 在爭取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結; 后为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1885—1895和1900—1908)。——第545頁。
- 克利敏, 印諾肯齐·費多罗維奇 (Климин, Иннокентий Федорович 生于1847年)——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学院学生, 涅恰也夫組織的参加者, 1871年被判一年徒刑。——第458、460頁。
- 克雷希奧 (Crescio)——意大利新聞工作者, 皮阿琴察“社会未来报”的編輯。——第519頁。
- 克林斯基, 揚 (Kryński, Jan 1811—1890)——波兰革命家, 侨居倫敦, 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7), 波兰人协会書記, 波兰社会主义杂志“征召义勇軍”(1875)編輯之一。——第571頁。
- 克拉里斯 (Clariss, A.)——法国政論家, 无政府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瑞士, 在那里加入了宣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无政府主义支部, “社会革命报”(1871—1872)編輯。——第402頁。
- 克拉夫林, 田納西 (Claflin, Tennessee 1845—1923)——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

- 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的組織为自己利益服务，曾和自己的姊姊維·伍德赫尔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07頁。
- 貝盖利，朱澤培 (Beghelli, Giuseppe 1847—1877) ——意大利新聞工作者，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進軍的参加者，好几家共和派报纸的編輯。——第420頁。
- 貝多芬，路德維希·万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偉大的德国作曲家。——第652頁。
- 貝列尔或貝列拉，伊薩克 (Pérelle, Isaac 1806—1880) ——法国銀行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議員，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貝列尔一起創辦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第290頁。
- 貝雷左夫斯基，安东尼 (Berezowski, Antoni 1847—約1916) ——波兰革命家，1863—1864年起义的参加者，起义被鎮压后流亡国外，1867年6月在巴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法国陪審法庭判处二十年苦役。——第571頁。
- 貝奈特，喬治 (Bennett, George) ——代表哈里法克斯支部的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第350頁。
- 貝奈德克，路德維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 ——奥地利將軍，1866年普奧战争时期任奧軍总司令。——第556頁。
- 貝克尔，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 ——德国政論家，拉薩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1872年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第166—168、175、176頁。
- 貝克尔，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組織者，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驅”杂志 (1866—1871) 的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93、166—168、170—176頁。
- 杜蒙——見法伊埃，欧仁·路易。
- 杜朗，古斯塔夫 (Durand, Gustave 生于1835年) ——法国首飾匠，警探，巴黎公社被鎮压后在倫敦冒充流亡者；1871年法国人支部書記，同年10月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第25、31頁。
- 杜邦，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訊書記 (1865—1871)，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的主席，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馬克思的路綫；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組織了国际支部，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1874年迁居美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54、65、72、73、76、91、166—168、170、173—177、186、199、200、231、486、712頁。
- 杜邦，昂提姆·让·馬西阿耳 (Dupont, Anthime-Jean-Marcial 生于1842年) ——法国革命家，追随布朗基派，职业是銀行職員，巴黎公社委員，参加公社

公安委员会。——第 73 頁。

杜瓦尔, 德奥多 (Duval, Théodore)——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細木工, 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創建同盟的盟員之一, 1870 年初脫离巴枯宁派; 国际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曾与巴枯宁派的影响进行斗争,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 166—168、170—176 頁。

杜芭丽, 瑪丽·让娜 (Du Barry, Marie-Jeanne 1743—1793)——伯爵夫人, 法王路易十五的寵姬。——第 591 頁。

杜弗尔, 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 (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 四十年代曾任各部部长; 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 司法部长 (1871—1873、1875—1876 和 1877—1879), 內閣总理 (1876、1877—1879)。——第 9、37、54、62、148、149、356 頁。

杜克佩西奥, 爱德华 (Ducpétiaux, Edouard 1804—1868)——比利时政論家和統計学家, 资产階級慈善家; 監獄和慈善設施視察員。——第 261 頁。

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維奇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文学批評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杰出的先驅者之一。——第 592 頁。

八 画

雨果, 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偉大的法国作家。——第 493、494 頁。

味吉尔 (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100 頁。

刻卜勒, 約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 在哥白尼学說的基础上, 发现行星运动的規律。——第 651 頁。

舍瓦累, 昂利 (Chevalley, Henri)——瑞士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裁縫。——第 19、391、392 頁。

舍尔瓦尔, 茹利安 (Cherval, Julien) (真名約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Krämer)——普魯士警探和奸細, 曾鑽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 同盟分裂后曾領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 1852 年 2 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之一, 在警察局帮助下越獄逃跑。——第 93、624 頁。

門克, 亨利希·泰奥多尔 (Menke, Heinrich Theodor 1819—1892)——德国地理学家, 曾修改施普魯奈尔的“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第 650、651 頁。

門德斯, 璜 (Mendez, Juan)——西班牙农业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第 414、415 頁。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領導人之一, “蜂房报”的創辦人和发行人, 在報紙上一貫实行同自由资产階級妥协的政策。——第 545 頁。

波尔特, 弗里德里希 (Bolte, Friedrich)——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德国人, 国际北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書記 (1872), “工人报”編委, 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 (1872

- 1874), 1874 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
——第 176、737、739 頁。
- 波果丁, 米哈伊尔·彼得罗維奇 (Погодин,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00—1875)
——俄国历史学家, 作家和政論家。
——第 572 頁。
- 佩普, 弗莱彻 (Pape, Fletcher)——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 追隨改良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331 頁。
- 佩恩, 昂利·德 (Pène, Henri de 1830—1888) ——法国新聞工作者, 保皇派, “巴黎报”的创办人和主編 (1868—1888)。——第 60 頁。
- 佩龙, 沙尔·欧仁 (Perron, Charles Eugène 1837—1919)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珠琅彩繪工, 后为制图家;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員, “平等报”編輯(1869), “团结报”編輯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 154 頁。
- 帕赫斯, 維克多 (Pagés, Victor 約生于 1850 年) ——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解放报”編委 (1871—1873), 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 (1872—1873), 曾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第 206、412 頁。
- 帕維亞-伊-罗德里格斯, 曼努埃尔 (Pavia y Rodriguez, Manuel 1827—1895)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1873 年率領共和国部队反对卡洛斯派, 鎮压安达魯西亚自治州派的起义; 新加斯梯里亚鎮守司令(1873—1874), 曾实行君主政变 (1874 年 1 月 2—3 日) 使塞拉諾掌握政权, 1880 年起为参議員。——第 531、534、535、622 頁。
- 帕拉迪諾, 卡尔梅洛 (Palladino, Carmelo 1842—1896)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成員。——第 418、419 頁。
- 帕麦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輝格党領袖之一, 依靠該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629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 年起为全俄皇帝。——第 442、494、575、613、658 頁。
- 彼得三世 (Петр III 1728—1762) ——俄国皇帝 (1761—1762)。——第 621 頁。
- 彼得拉舍夫斯基 (布塔舍維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維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Буташевич-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1821—1866) ——俄国革命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先进的俄国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小組 (1845) 的組織者, 1849 年被捕并被判處終身苦役。——第 487、488 頁。
- 彼斯节里, 巴維尔·伊万諾維奇 (Пестель,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793—1826)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之一, 南方协会的創始人和领导人。——第 499 頁。

法夫尔, 茹尔 (Favre, Jules 1809—1880)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从五十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领袖之一; 1870—1871年任外交部长,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和领导反对国际的斗争的鼓舞者之一。——第9、37、94、147—149、398页。

法奈利, 朱泽培 (Fanelli, Giuseppe 1826—1877) ——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动家;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和1860年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马志尼主义者, 从六十年代中起是巴枯宁的近友, 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 在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支部和同盟小组 (1868) 的组织者,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65年起为意大利议会成员。——第203、381、404、409、417、431页。

法伊埃, 欧仁·路易 (Faillat, Eugène-Louis 生于1840年) (笔名杜蒙 Dumont)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巴黎和卢昂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后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166—168、170—176页。

法尔加·佩利塞尔, 拉斐尔 (Farga Pellicer, Rafael 1840—1890)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 同盟和在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 “联盟”周报的编辑 (1869—1873);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167、168、170、171、173—176、404、407、415、416、526页。

法尔卡什, 卡罗耳 (Farkas, Károly 1843

—1907) ——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职业是五金工人; 国际匈牙利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匈牙利全国工人党 (1880) 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1890) 的组织者之一。——第166—168、170—176页。

拉辛, 斯切潘·季莫费也维奇 (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死于1871年) ——十七世纪俄国最大一次农民和哥萨克反农奴制起义的领袖。——第442、443页。

拉罗克, 让 (Larocque, Jean) (假名拉特腊克 Latraque)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国际波尔多支部领导人之一, 1873年受法庭审讯, 逃到西班牙, 他以国际总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分从那里继续领导国际波尔多支部的活动。——第351页。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西班牙通讯书记 (1866—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162、166—168、170、172、174—176、184、202、205、353、412、416页。

拉萨勒,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律师, 1848—1849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3) 创建人之

- 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 75、308、309 頁。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維奇 (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 ——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論家，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哲学上是实证論者；国际會員，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前进！”杂志(1873—1876)和“前进报”(1875—1876)編輯。——第 588—599、603—605、607 頁。
-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 Eduard 1829—1884) ——德国政治活动家，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1867 年起为国会議員。——第 100、550 頁。
- 阿尔諾，安都昂(Arnaud, Antoine 1831—1885)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和巴黎公社社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紐約而退出国际。——第 54、76、91、166—170、175、176 頁。
- 阿伯勒，昂利·万·登(Abeele, Henri van den) ——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商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66、167、168、170、171、174—176 頁。
- 阿貝尔，雅克·勒奈(Hébert, Jacques-René 1757—1794)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領袖。——第 582 頁。
- 阿勒里尼，沙尔(Alerini, Charles 生于 1842 年)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原籍是科西嘉人，国际馬賽支部成員，馬賽的公社(1871 年 4 月)組織者之一，公社被鎮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西班牙，并在那里宣傳无政府主义，“革命團結报”(巴塞罗纳出版)的編輯；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67、168、170—176、407、414、415、526、527 頁。
-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維奇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629—1676) ——俄国沙皇(1645—1676)。——第 442 頁。
-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領袖之一，职业是紅木工，木工和細木工联合协会总書記(1862—1871)，工联倫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5、1868—1872)，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的領袖人之一；1871 年拒絕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54、76、91、712 頁。
- 阿夫里阿耳，奧古斯丹(Avrial, Augustin 1840—1904)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左派蒲魯东主义者；机械工人工会的組織者，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委員，公社的劳动和交換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軍事委员会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在那里曾一度加入反对总委员会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第 29 頁。
- 阿耳巴腊辛，薩韦里諾(Albarracin, Severino)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教师，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1873)，1873 年亚尔科起义的領袖者之一；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

- 第 131、529 頁。
- 罗, 哈里埃特 (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論运动女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員(1872)。——第 54、77、91、712 頁。
- 罗沙, 沙尔 (Rochat, Charles)——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荷兰通訊書記 (1871—1872), 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 55、77、92、713 頁。
- 罗班, 保尔 (Robin, Paul 生于 1837 年)——法国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 总委员会委員 (1870—1871),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倫敦代表會議 (1871) 代表。——第 20、30、393、394 頁。
- 罗奇, 約翰 (Roach,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通訊書記 (1872), 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54、77、91、167—170、175、176、222、227—229、712 頁。
- 罗昂, 阿尔勃萊希特 (Roon, Albrecht 1803—1879)——德国国家活动家和軍事活动家, 1873 年起为元帅, 普魯士軍閥代表人物之一, 陸軍大臣 (1859—1873) 和海軍大臣 (1861—1871), 曾改編普魯士軍隊, 普魯士首相 (1873 年 1—11 月)。——第 329 頁。
- 罗塞耳, 維散特 (Rossell, Vicente)——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織工,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31 頁。
- 罗倫佐, 安賽尔莫 (Lorenzo, Anselmo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組織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0—1872),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71) 代表。——第 130、160—162、204、206、218、404、411、413 頁。
- 罗赫納, 格奧尔格 (Lochner, Georg 約生于 1824 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細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1865 年和 1871 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4、77、91、712 頁。
- 罗曼諾夫王朝 (Романовы)——俄国皇朝 (1613—1917)。——第 499、500 頁。
- 罗茲瓦多夫斯基, 約瑟夫 (Rozwadowski, Joséf 生于 1846 年)——波兰革命家, 波兰 1863—1864 年解放起义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巴黎公社符卢勃列夫斯基將軍的參謀长,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2)。——第 54、77、91 頁。
- 罗伯茨, 亨利 (Roberts, Henry 死于 1876 年)——英国建筑师, 資产階級慈善家, 曾研究各国的居住条件。——第 261 頁。
- 罗伯尔, 弗里茨 (Robert, Fritz)——瑞士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布魯塞爾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曾参加“团結报”編輯部。——第 19、42、392 頁。
- 罗伯斯比尔, 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的杰出活

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腦(1793—1794)。——第 586 頁。

九 画

炮彈国王——見斐迪南二世。

荣克，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瑞士通訊書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总委员会財務委員 (1871—1872)；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以及倫敦代表會議 (1871) 主席，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馬克思的路綫，1872 年秋加入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 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 55、63、77、90、92、137、217—219、222、228、229、331、517、713 頁。

若昂納尔，茹尔 (Johannard, Jules 1843—1888)——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石印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8—1869、1871—1872) 和意大利通訊書記 (1868—1869)，1870 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員，追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倫敦，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54、77、91、166—168、170、174—176、712 頁。

柯克倫-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夏尔特 (Cochrane-Baillie, Alexander Dundas Ross Wishart 1816—189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保守党人，議會議員。——第 71—74、76、83 頁。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場，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是在倫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反对巴黎公社。——第 494 頁。

勃朗，加斯帕尔 (Blanc, Gaspard)——法国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养路領工員，里昂 1870 年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鎮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18、19、23、51—53、215、382、392、393、426、500 頁。

胡利曼 (Hurliman)——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倫敦瑞士协会的代表。——第 54、77、91、712 頁。

胡貝尔，維克多 (Huber, Victor 1800—1869)——德国政論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第 261、272、273 頁。

洛約拉，伊格納修斯 (Loyola, Ignatius 1491—1556)——西班牙貴族，最反动的天主教組織——耶穌会的創建人。——第 386、451 頁。

洛斯塔烏，巴尔多梅罗 (Lostau, Baldomero 約生于 1845 年)——西班牙机械工人，联邦共和主义者，1868—1874 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會員，1871 年被选入議會。——第 415 頁。

欧文，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72、273、336、493、566 頁。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 (Hausmann, Georges-Eugène 1809—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塞納省省长 (1853—1870)，曾領導改建巴黎的工

- 作。——第 239、291、292 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國王(1861—1888)，德國皇帝(1871—1888)。——第 61、147 頁。
- 威斯特，威廉(West, William)——美國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國際北美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二支部(紐約)書記，在海牙代表大會(1872)上被開除出國際。——第 107、108、112、437、726、727 頁。
- 威克菲爾德，愛德華·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國國家活動家，經濟學家，曾提出資產階級的殖民化理論。——第 100、122 頁。
- 科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為英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進行鬥爭，1802 年起出版“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報”。——第 602 頁。
- 科尼翁，艾米爾(Cognon, Émile)——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職業是雕刻工，住在瑞士，羅曼語區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0 年被開除出國際。——第 391 頁。
- 科斯塔，安得列阿(Costa, Andrea 1851—1910)——意大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七十年代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組織的領導人之一；1879 年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後進一步為爭取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而鬥爭，1892 年起是意大利社會黨黨員，在黨內追隨改良派；1882 年起是議會議員。——第 431 頁。
- 科爾多瓦-伊-洛佩斯，弗朗西斯科(Cordova y Lopez, Francisco)——西班牙新聞記者，資產階級共和黨人，1868 年起是馬德里的同盟盟員。——第 404 頁。
- 科拉切夫斯基，安得列依·尼古拉也維奇(Колаче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8—1888)——俄國貴族，1866 年起遭警察秘密監視，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審訊，被宣告無罪。——第 460、461 頁。
- 哈里(Hurry)——國際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2—1873)，反對聯合會委員會里的改良派。——第 231 頁。
- 哈里斯，喬治(Harris, George)——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後為先章主義者布朗特爾·奧勃萊恩的社會改良主義觀點的信徒，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9—1872)，總委員會財務書記(1870—1871)。——第 712 頁。
- 哈爾沃，瓊(Jalvo, Juan)——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西班牙同盟小組的創建人之一，國際馬德里支部主席。——第 404 頁。
- 哈爾科特，埃德威耳(Harcourt, Edwell)——礦工，澳洲出席國際海牙代表大會(1872)的代表。——第 170、171、175 頁。
- 哈利戴，托馬斯(Halliday, Thomas 生于 1835 年)——英國工聯領袖之一，煤礦工人聯合會書記。——第 546 頁。
- 哈登堡，卡爾·奧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 1750—1822)——公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4—1806 和 1807)；為巩固普魯士國家實施了一系列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1810—1813)；維也納會議後成為神聖同盟的反動政策的擁護者。——第 325 頁。
- 哈賽爾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 生于1844年)——拉薩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71—1875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875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78年为无政府主义小组领导人之一,1880年被开除出党。——第520頁。
- 哈森克萊維爾,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薩尔分子,1871—1875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520頁。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魯士官员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617頁。
- 施泰因,卡尔(Stein, Karl 1757—1831)——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1804—1808年期间担任过許多高級职务,曾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倡議在普魯士进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級改革。——第325頁。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警官,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倫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普法战争时期为軍事警察局局长和在法国境内的德国間諜活动和反間諜組織的领导人。——第94、150、291、377、624、626頁。
- 施蒂納,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特·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級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701頁。
- 施韦澤,約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薩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麥所奉行的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阻撓德国工人加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1872年他同普魯士当局的勾結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109、112、362頁。
- 施塔爾,弗里德里希·尤利烏斯(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德国法学家和极端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普魯士保守党的創始人之一。——第327頁。
- 施佩耶尔,卡尔(Speyer, Karl 生于1845年)——細木工,六十年代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書記,1872年起为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后为美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177、737、739頁。
- 施奈德爾,欧仁(Schneider, Eugène 1805—1875)——法国大工业家,克利索冶金工厂厂主。——第277頁。
- 施略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維希(Schlözer, August Ludwig 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和統計学家。——第651頁。
- 施特魯斯堡,貝特耳·亨利(Stroußberg, Bethel Henry 1823—1884)——德国大铁路承包商;1873年破产。——第290頁。
- 施維茨格貝耳,阿德馬爾(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會員,无政府主义者,秘密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1872)代表; 1873年1月5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作为汝拉联合会成员开除出国际。——第42、166—168、170—176、188、195、201、202、391頁。

十 画

唐森, 威廉 (Townshend, William)——

英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54、77、91、712頁。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偉大的德国作家。

——第101、447、652頁。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

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 普鲁士首相(1862—1871), 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第9、23、47、50、94、147、150、276、286、291、326—329、347、395、402、548、549、552、554、556、577、584、591、626、632、640、667、680、712、729頁。

班克斯, 西奥多 (Banks, Theodor)——

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1871), 职业是彩画匠, 采取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立场。——第112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55、62、63、66—70、77—79、86、87、92、104、105、114、135、137—140、166—168、171—177、186、190、198—200、208—209、212、218、219、239、241、247、252、267、268、273、284、288、290、292、295、296、

301、316、317、352—355、363、364、486、525、532、567、575、583、585、587、599、602、607、628、630、713、714、716、718、721、730、733—734頁。

貢德雷斯, 欧仁 (Gondrès, Eugène)——

法国的警探, 曾钻进国际纳尔榜支部, 1873年被揭露。——第429頁。

茹柯夫斯基,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 (Жу-

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1862年起流亡瑞士, 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22、173、375、725頁。

烏斯宾斯基, 彼得·加甫利洛維奇

(Успенский, Петр Гаврилович 1847左右—1881)——涅恰也夫組織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曾参加杀害伊万諾夫, 1871年被法院判十五年苦役, 流放西伯利亚。——第453、456、458、463—465頁。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

—1913)——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会员,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曾进行反拉萨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支持巴黎公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 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62、100、147、149、347頁。

倍尔特兰 (Bertrand, F.)——美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德国人, 在紐約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记, 国际北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和“工人

报”編委，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第 176、737、739 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62、556、642、652、687 頁。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19、24、37、52、89、94、143、144、146、215、275、279、287、291、326、354、357、375、380、381、415、500、556、576、629、677 頁。

涅恰也夫，謝尔盖·格納迪也維奇 (Нечая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俄国密謀革命家，1868—1869 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1871 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創建了秘密組織“人民裁判” (1869)，1872 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給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第 16、372、377、395、403、439—444、447—450、452—468、471、477、481、482、488、592、594、596、608 頁。

涅格烈斯庫耳，米哈伊尔·費多罗維奇 (Негрескул,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1843 左右—1871) ——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869 年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而被捕，1870 年因病获釋。——第 461 頁。

泰斯，阿尔伯 (Theisz, Albert 1839—1880)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金屬切割工，蒲魯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2) 和财务委員。——

第 25、29 頁。

泰勒，阿尔弗勒德 (Taylor, Alfred) ——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第 54、77、91、712 頁。

索瓦，阿尔森 (Sauva, Arsène) ——法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裁縫，卡貝的追随者，美国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美国；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七十年代参加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第 166—168、170、174、175、194 頁。

索里阿·桑塔-克魯斯，弗雷德里科 (Soria Santa-Cruz, Frederico 1815—1891) ——西班牙將軍，1872 年参加对卡洛斯派的战争，1873 年鎮压安达魯西亚的自治州起义；加迪斯的軍事总督 (1874—1875)。——第 531 頁。

索里阿諾，特里尼达德 (Soriano, Trinidad)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 381、414—416 頁。

海姆 (Heim) ——奥地利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第 166—168、170、174—176 頁。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582、604 頁。

海德，約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論家，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进步的“狂飈”文学思潮的奠基人之一。——第 652 頁。

特尔察吉，卡洛 (Terzaghi, Carlo 約生于 1845 年) ——意大利律师，都灵无产

- 階級解放工人协会書記，1872年成为警探。——第41、42、189、400、419—422頁。
- 特賴奇克，亨利希·馮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 ——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1886年起为普魯士国家历史編纂家。——第627頁。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 (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 ——俄国革命家，政論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593—605、607—611、614、616—621、641頁。
- 埃士頓，托馬斯 (Ashton, Thomas) ——英国厂主，自由党人。——第276、279頁。
-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 (Hermann, Alfred) ——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組織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員和比利时通訊書記 (1871—1872)，国际布魯塞爾代表大会 (1868)、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第55、77、92、166—168、170、174—176、713頁。
- 埃卡留斯，約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人政論家，职业是裁縫；侨居倫敦，正义者同盟盟員，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領導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4—1872)，总委员会总書記 (1867—1871年5月16日)，美国通訊書記 (1870—1872)，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馬克思，1872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領袖。——第55、78、91、166、168、170、171、517、545、713頁。
- 埃斯太瓦內斯-伊-穆尔菲，尼古拉斯 (Estévez y Murphy, Nicolás 1838—1914)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共和党人，1868—1874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馬德里总督 (1873)，革命失敗后流亡葡萄牙，后迁法国。——第409頁。
- 庫諾，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1871—1872年和恩格斯經常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国际米兰支部的組織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会后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为美国工人組織“劳动騎士团”的領導人之一，为社会主义刊物撰稿。——第84、85、166—168、170—176、352、369、419頁。
- 庫佩尔 (Kupper, F.) ——国际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德国書記 (1872)，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第225頁。
- 庫格曼，路德維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 ——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會員，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166—168、170、174—176頁。
- 庫尔奈，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納 (Cournet, Frédéric-Étienne 1839—1885)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

- 員會遷往紐約而退出國際；八十年代法國布朗基主義組織領導人之一。——第 54、76、92、138、166—170、175、176 頁。
- 庫茲涅佐夫，阿列克塞·基利洛維奇 (Кузнецов, Алексей Кириллович 1845—1928) ——俄國民粹派革命者，涅恰也夫組織的參加者，1871 年被判十年苦役；後來加入社會革命黨，曾在赤塔參加 1905 年革命。——第 458、464、465 頁。
- 格呂克，克利斯托夫·維利巴爾德 (Glück, Christoph Willibald 1714—1787) ——偉大的德國作曲家。——第 652 頁。
- 格羅塞，愛德華 (Große, Eduard) ——在美國的德僑，拉薩爾分子，國際會員。——第 112 頁。
- 格羅美卡，斯切潘·斯切潘諾維奇 (Громека, Степ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823—1877) ——俄國溫和自由派政論家，1863—1864 年波蘭解放起義時是波蘭農民事務委員會主席，後為希特里茲總督。——第 493 頁。
- 格爾哈特，亨德里克 (Gerhardt, Hendrik 1829 左右—1886) ——荷蘭工人運動的參加者，職業是裁縫，荷蘭聯合會委員會委員，海牙代表大會 (1872) 代表，追隨巴枯寧派。——第 166—170、176 頁。
- 格爾拉赫，恩斯特·路德維希 (Gerlach, Ernst Ludwig 1795—1877) ——普魯士極端反動的政治活動家，普魯士保守黨及其機關報“新普魯士報” (1848) 的創始人之一。——第 327 頁。
- 格萊夫 (Greif) ——普魯士警官，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在倫敦的諜報機關領導人之一。——第 624 頁。
- 格萊格，羅伯特·海德 (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 ——英國大廠主，自由黨人。——第 276、279 頁。
- 格萊斯頓，羅伯特 (Gladstone, Robert 1811—1872) ——英國商業家，資產階級慈善家，威廉·格萊斯頓的堂弟。——第 76 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爾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後為皮爾分子，十九世紀下半葉為自由黨領袖之一，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97—100、118—127、151、199、210、211、541、542、545、712 頁。
- 馬魯，茹爾 (Malou, Jules 1810—1886) ——比利時國家活動家，屬於天主教黨，財政大臣 (1844—1847、1870—1878)，內閣首相 (1871—1878)。——第 9、149 頁。
- 馬隆，貝努瓦 (Malon, Benoit 1841—1893) ——法國社會主義者，國際會員，1866 年日內瓦代表大會代表，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後辭職；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公社委員，公社被鎮壓後流亡意大利，後遷居瑞士，追隨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流派——可能派領袖和思想家之一。——第 21、22、29、32、33、47、50、173、188、402、427、429、580 頁。
- 馬多斯 (Maddoss, G. W.) ——美國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第 112 頁。
- 馬志尼，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

- 之一，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64 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72、95、398、417、493 頁。
- 馬格里特 (Margueritte) ——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第 54、77、91 頁。
- 馬基雅弗利，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資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406 頁。
- 馬夫里茨基，瓦西里·阿布拉莫維奇 (Мавриц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брамович 1850 左右—1910) ——基輔正教中学学生，因涅恰也夫分子案件受法庭审讯，由于证据不足停止法院偵查，后为神甫和教会著作家。——第 453 頁。
- 馬尔尚，路易 (Marchand, Louis) ——法国巴枯宁主义者，曾被巴黎公社派赴波尔多，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流亡者协会的書記并为“社会革命报”撰稿，根据波尔多支部的要求被开除出国际。——第 173 頁。
- 馬尔塞劳，尼古洛·阿隆索 (Marcelau, Nicolás Alonso)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同盟西班牙組織的领导人之一，塞維尔“理智”周报的編輯 (1871—1872)；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66—168、170、171、173—176、414 頁。
- 馬克思，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31、55、60、77、92—101、104、105、117—127、138、166—170、174—177、180—183、186、199、201、202、219、237、238、243、255、258、297、320、322、323、337、357、359、362、486、516、624、625、627、628、630、657、713、722—726、728、730、732 頁。
- 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 ——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卡·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第 252 頁。
- 馬丁，菲利浦 (Martin, Felipe)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 409 頁。
- 馬丁，孔斯坦 (Martin, Constant) ——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 54、77、91、712 頁。
- 馬丁涅斯，弗朗科 (Martinez, Franco)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染色工人，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第 131、412 頁。
- 馬丁涅斯·德·康波斯，阿尔塞尼奥 (Martinez de Campos, Arsenio 1831—1900) ——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73 年曾镇压卡塔卢尼亚和瓦倫西亚的自治州起义，新加斯梯里亚鎮守司令 (1874)，曾领导君主政变，使阿尔丰斯十二掌握政权 (1874 年 12 月 24 日)；陸軍大臣 (1881—1883)。——第 535 頁。

十一画

基恩，查理 (Keen, Charles) ——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2)。——第 77、91、712 頁。

培尔,比埃尔(Bayle, Pierre 1647—1706)
——法国怀疑論哲学家,宗教独断論的批評者。——第 653 頁。

密契尔(Mitchell)——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1873),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 231 頁。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內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共和国总統(1871—1873),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 25、51、53、61、148、151、215、348、428、554、712 頁。

屠夫汉斯——見毕克列尔,約翰。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 387、529 頁。

曼托伊費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內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 325—327、548 頁。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 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將軍,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波兰通訊書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 55、77、92、138、166—168、170、171、174—176、186、199、571、713 頁。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創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資產階級思想家。——第 652 頁。

康波斯——見馬丁涅斯·德·康波斯,阿尔塞尼奥。

盖得,茹尔(巴集耳,馬蒂約)(Guesde, Jules (Basile, Mathieu) 1845—1922)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資產階級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1879)創始人之一和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傳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359—361、427、428 頁。

盖列夫,保尔·約翰森(Gejeff, Paul Johansen 1842—1921)——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国际丹麦支部(1871)的組織者之一,丹麦社会主义民主党(1876)的創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77 年侨居美洲,后脱离工人运动。——第 149 頁。

朗扎,卓万尼(Lanza, Giovanni 1815—1882)——意大利国家活动家,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財政大臣(1858—1859),內务大臣(1864—1865),1869—1873 年任首相兼內务大臣。——第 150、712 頁。

朗德克,貝尔納(Landeck, Bernard 生于 1832 年)——法国首飾匠,国际會員和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成員。——第 29、89、728 頁。

朗維耶,加布里埃尔(Ranvier, Gabriel 1828—1879)——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員,軍事委员会和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員,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委员会迁往紐約而退出国际。

- 第 54、77、91、166—170、175、356、362 頁。
- 勒穆修 (Le Moussu, A.)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 55、78、92、137、166—168、170、174—177、352、353、363、486、713 頁。
- 勒瓦尔, 茹尔·路易 (Lewal, Jules-Louis 1823—1908) ——法国将军和军事理论家。——第 639 頁。
- 勒维埃耳 (Levièle)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法国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 176、737 頁。
- 勒弗朗塞, 古斯塔夫 (Lefrançais, Gustave 1826—1901) ——法国革命家,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职业是教员,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末起为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在那里加入无政府主义派。——第 32、33、50、60 頁。
- 梅欧, 亨利 (Mayo, Henry) ——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 在联合会委员会里加入改良派, 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54、77、91、222、228、229、712 頁。
-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霍赛 (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 ——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解放报”编委 (1871—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1872—1873), 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1879) 创始人之一, 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 206、207、354、406、412 頁。
- 梅契尼柯夫, 列甫·伊里奇 (Мечников, Лев Ильич 1838—1888) ——俄国地理学家, 社会学家和政论家; 1860 年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曾为“钟声”和“同时代人”撰稿; 六十年代后半期接近巴枯宁。——第 428 頁。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 ——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参加 1846 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848 年三月革命使他出狱; 曾领导 1848 年波兹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 曾指挥革命军; 在五十年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 波兰 1863—1864 年起义期间, 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 起义失败后, 流亡法国。——第 631 頁。
- 莫扎特, 沃尔弗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 652 頁。
- 莫特斯赫德, 托马斯 (Mottershead, Thomas J.) ——英国织布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丹麦通讯书记 (1871—1872), 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

員會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總委員會通過決議把他開除出國際。——第55、77、91、166、168、170、171、222、226、228、229、545、713頁。

莫里斯，捷維 (Maurice, Zévy)——國際總委員會委員(1866—1872)，匈牙利通訊書記(1870—1871)。——第54、77、91、712頁。

莫里哀，讓·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真姓為浦克林 Poquelin)——偉大的法國劇作家。——第120頁。

莫拉，安赫爾 (Mora, Angel)——西班牙工人運動活動家，職業是木匠，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0—1872)，“解放報”編委(1871—1873)，新馬德里聯合會委員(1872—1873)，曾與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鬥爭，1879年起為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第404、412頁。

莫拉，弗朗西斯科 (Mora, Francisco 1842—1924)——著名的西班牙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職業是鞋匠，國際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組織者之一，國際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委員(1870—1872)，“解放報”編委(1871—1873)，新馬德里聯合會委員(1872—1873)，曾與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積極鬥爭，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1879)的組織者之一。——第161、162、206、404—406、410—412、424、514頁。

莫拉哥-岡薩雷斯，托馬斯 (Morago Gonzales, Tomás)——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職業是雕刻工，西班牙的同盟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領導成員，國際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委員

(1870—1871)，國際海牙代表大會(1872)代表，1873年5月30日總委員會通過決議把他開除出國際。——第161、167、168、170、171、173—176、202、204、205、404—409、414—416頁。

十二 画

費雷，泰奧菲爾·沙爾 (Ferré, Théophile-Charles 1845—1871)——法國布朗基派革命家，六十年代法國共和主義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巴黎公社委員，公安委員會委員，後為委員會領導人和公社副檢察長，被凡爾賽分子槍殺。——第62、394頁。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國王(1830—1859)，由於1848年炮擊墨西拿而得到“炮彈國王”的諱號。——第210頁。

傅立葉，沙爾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272、336、566、682頁。

雅科比，巴維爾·伊萬諾維奇 (Якоби,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俄國革命家，政治流亡者，職業是醫生，巴枯寧的密友，七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宣傳無政府主義觀點。——第420頁。

富斯泰爾，路易斯 (Fuster, Louis)——西班牙箍桶工人，國際桑城支部成員。——第415頁。

散蒂尼昂，加斯帕爾 (Sentiñon, Gaspard 死于1903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職業是醫生，西班牙同盟的創始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領導成員；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代表；1873年5月30日總委員會通過決議把他開除出國際。——第404、416頁。

彭帕杜爾侯爵夫人，讓娜·安東尼達·普

- 瓦松(Pompadour, Jeanne-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1721—1764)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寵姬。 ——第 591 頁。
- 黑尔斯, 威廉(Hales, William)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9—1872)。 ——第 54、76、91、712 頁。
- 黑尔斯, 約翰(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織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6—1872)和書記(1871 年 5 月—1872 年 7 月); 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劳动同盟,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从 1872 年起反对馬克思, 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組織的領導权, 曾領導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 55、78、86、92、216—219、222、226、228、229、333、350、351、545、713、724 頁。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辯证法, 德国資产階級思想家。 ——第 298、327、565、649 頁。
- 舒馬赫, 格奥尔格(Schumacher, Georg 生于 1844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制革工人, 后为企业主, 佐林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国会議員(1884—1898), 屬於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 ——第 167、168、170、175、176 頁。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資产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主張在普魯士的霸权下統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創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領袖之一, 他企图用組織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脫离革命斗争。 ——第 282、313 頁。
- 舒巴尔特, 約翰·克利斯提安(Schubart, Johann Christian 1734—1787) ——德国学者, 农学家。 ——第 651 頁。
- 普芬德, 卡尔(Pfänder, Karl 1818—1876)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画家, 1845 年起侨居倫敦, 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7 和 1870—187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 54、77、91、712 頁。
- 普魯斯, 亨利·奧斯丁(Bruce, Henry Austin 1815—1895)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內务大臣(1868—1873)。 ——第 542 頁。
- 普累若夫, 伊万·加甫利洛維奇(Прыжов,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9—1885) ——俄国政論家, 涅恰也夫小組的积极参加者, 1871 年被法庭判处十二年苦役, 終身流放西伯利亚。 ——第 458、464—466 頁。
- 普加乔夫, 叶梅連·伊万諾維奇(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 左右—1775) ——十八世紀俄国最大一次农民和哥薩克反农奴制起义的領袖。 ——第 499、621 頁。
- 萊奧, 安得列(Leo, André 1829—1900) (眞名萊昂尼·尚普塞 Léonile Champseix) ——法国女作家和政論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瑞士, 支持巴枯宁派。 ——第 22、394 頁。
- 萊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

偉大的德国作家，批評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紀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592、652 頁。

萊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偉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649、651 頁。

博韦，克利門特 (Bové, Clemente)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織工，卡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工会主席。——第 416 頁。

博南薩 (Bonanca) ——葡萄牙无政府主义者，被免去教銜的教士。——第 405 頁。

博尔雷耳，恩利科 (Borrel, Enrico)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縫，国际西班牙第一批支部的創建人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0—1871)。——第 404 頁。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1809—1886) ——伯爵，薩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家活动家，反对在普魯士霸权下統一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1849—1866 年历任薩克森政府各部大臣；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866—1871) 和首相 (1867—1871)，奥匈帝国駐倫敦 (1871—1878) 和巴黎 (1878—1882) 大使。——第 9、148、150 頁。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 119 頁。

斯瓦尔姆——見丹特雷格，艾米尔。

斯卡尔金——見叶列涅夫，費多尔·巴甫洛維奇。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 (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

rick 1820—1872) ——英国社会主义者，改革同盟盟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72) 和财务委員 (1868—1870)；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倫敦代表會議 (1871) 代表，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第 54、77、91、712 頁。

斯普林加尔，罗什 (Springard, Roche) ——比利时一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決議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67、168、170、171、173—176、370 頁。

斯蒂凡諾尼，魯伊治 (Stefanoni, Luigi 1842—1905) ——意大利作家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唯理論者，参加过加里波第的进军，“自由思想”杂志的創辦人和編輯，支持巴枯宁派。——第 50、93—96、401 頁。

斯維亞茨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諾維奇 (Свят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約生于 1847 年) ——彼得堡涅恰也夫小組的参加者，1871 年被宣告无罪。——第 458 頁。

十三画

賈罗 (Jarrow)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紅木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6—1868 和 1872)。——第 54、77、92、713 頁。

蒙托罗，佩雷格林 (Montoro, Peregrin) (假名达蒙 Damon)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織工，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第 131、406、412、416 頁。

蒙德拉，安东尼·約翰 (Mundella, Anthony John 1825—1897) ——英国国

- 家活动家和厂主, 1868年起为議會議員, 历任各部大臣。——第 101 頁。
- 雷吉斯, 維塔勒(Regis, Vitale)(假名埃蒂耶納·佩沙尔 Étienne Pechard)——意大利革命家, 在倫敦的国际意大利人支部成員,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 西班牙 1873 年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 54、77、91、420、421 頁。
- 雷紹埃尔, 亨利希(Reschauer, Heinrich 生于 1838 年)——奥地利資產階級作家和記者, 自由党人。——第 312 頁。
- 塞拉維腊, 拉斐尔(Cervera, Rafael 1828—1908)——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联邦共和主义者, 制宪議會議員(1873)。——第 530 頁。
- 塞拉諾-伊-多敏格斯, 弗朗西斯科(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1885)——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 陸軍大臣(1843), 1856 年国家政变的参加者, 临时政府首腦(1868—1869), 王国摄政(1869—1871), 內閣首相(1871、1874)。——第 591 頁。
- 路德維希(Ludwig)——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美因茲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 163、175、176 頁。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22 頁。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 591 頁。
- 路易·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 580、658 頁。
- 福塞特, 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 約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 1865 年起为議會議員, 自由党人。——第 74—76 頁。
- 福尔納契耶利(Fornaccieri)——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意大利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第 176、737 頁。
- 福伊格茨-雷茨, 尤利烏斯(Voigts-Rhetz, Julius 1823—1904)——普魯士將軍, 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1873 年起为軍事司司长, 后为炮兵总监。——第 638 頁。
- 福格特, 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 6 月为帝国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產階級革命家进行誣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93—95、357 頁。
- 福格特, 古斯塔夫(Vogt, Gustav 1829—1901)——瑞士經濟學家, 德国人, 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組織者之一, 卡·福格特的弟弟。——第 11、374 頁。
- 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 爱德华(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德国將軍, 普法战争时期任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 145—147 頁。
- 奧托王朝(Ottonen)——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962—1002、1209—1218)。——第 648 頁。
- 奧哲尔, 乔治(Odger, George 1820—

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倫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書記，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倫敦代表會議(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爭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間与资产阶级有勾結；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譴責，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繼續大肆誹謗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7、14、545頁。

奧利維耶，艾米尔(Ollivier, Émile 1825—1913)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腦(1870年1—8月)。——第144、337頁。

奧伯温德，亨利希(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 ——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記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薩尔分子，后成为爱森納赫派，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工人报纸“人民呼声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編輯，七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第352頁。

奧格辽夫，尼古拉·普拉东諾維奇(Огарев,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1813—1877) ——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詩人和政論家，亞·伊·赫尔岑的朋友和战友。——第454、462頁。

奧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547頁。

奧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 ——宪章运动的領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創辦人和編輯；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87頁。

十四画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315、552、652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論家，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237、240—242、245、246、249—251、253、254、257、258、264、266、295—301、304—310、313、314、316—318、320、321、336—339、700、701頁。

豪特，万·德尔(Hout, van der) ——阿姆斯特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166—168、170、171、175、176頁。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 ——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倫敦理事会書記(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年10月—1869年)，国际倫敦代表會議(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顛代表大会委员会書記(1871—1875)。——第545頁。

赫斯，莫澤斯(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六十年代是拉薩尔分子；国际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

- 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624頁。
- 赫普納,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編輯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場。——第166—168、170、174—176、356頁。
- 赫德盖姆——見万-赫德盖姆。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論家和作家。——第11、95、96、454、467、468、487、488、490、492—494、614、617頁。
- 赫尔岑,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羅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9—1906)——俄国生理学家,亚·伊·赫尔岑之子。——第96頁。
- 維斯(Wyss, O.)——国际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法国書記,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后流亡美国。——第225頁。
- 維沙尔,保尔(Vichard, Paul)——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倫敦法国人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166—168、170、171、173—176、369頁。
- 維利希,奧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美国內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625頁。
- 維兰特,克利斯托夫·馬丁(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作家。——第652頁。
- 維尼亚斯,加尔西亚·霍賽(Viñas, García José)——西班牙医学院学生,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同盟(1868)的組織者之一,1873年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404、416、526頁。
- 維耳莫——見維耳馬尔,雷蒙。
- 維耳馬尔,雷蒙(Wilmart, Raimond) (假名維耳莫 Wilmot)——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73年流亡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里宣傳国际的原則。——第166、168、170、171、174—176頁。
- 維克里,賽米爾(Vickery, Samuel)——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書記(1872—1873),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派进行积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顛联合会代表大会(1873)主席。——第220、226、231頁。
-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c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9頁。

十五画

- 摩里,賽米爾(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1865、1868—1885)。——第347、545頁。
- 魯巴烏·多納德烏,霍賽(Rubau Donadeu, José)——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石印工,西班牙同盟的創始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領導成員。——第404頁。

魯克拉夫特, 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領袖之一, 职业是木器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員, 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譴責, 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7頁。

德·沃尔弗斯(De Wolfers)——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第77、92頁。

德雷尔, 西蒙(Dereure, Simon 1838—1900)——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動家, 职业是鞋匠, 布朗基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成員, 曾参加“馬賽曲报”編輯部;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美国,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員; 1882年起为法国工人党黨員。——第166—170、173—176、737、739頁。

德拉埃, 比埃尔·路易(Delahaye, Pierre-Louis 生于1820年)——法国机械工人, 1864年起为国际會員,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代表。——第54、76、91、712頁。

十六画

鮑利, 伊波利托(Pauly, Hipolito)——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活動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1—1872), “解放报”編委(1871—1873), 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1872—

1873), 曾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第206、412頁。

默里或墨萊, 查理(Murray, Charles)——英国工人运动活動家, 职业是鞋匠, 宪章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0—1872)和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1873),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八十年代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第54、77、92、210、231、712頁。

諾布雷·弗朗薩, 霍賽(Nobre-Franca, José)——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的組織者之一, 1872—1873年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第349頁。

澤耳霍夫(Selchov)——普魯士国家活動家, 农业大臣(1862年12月—1873年1月)。——第329頁。

賴利, 威廉·哈里逊(Riley, William Harrison 生于1835年)——英国記者, 共和党人, 社会主义者, “国际先驅报”的編輯和发行人, 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2—1873), 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231頁。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員, 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494頁。

穆勒, 約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和实证論哲学家, 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75、76頁。

穆拉維約夫,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維奇

- (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6—1866)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农奴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捍卫者; 1863年波兰起义时被任命为駐波兰特命全权总督, 由于残酷地镇压起义而获得“絞吏”的外号。——第462、487頁。
- 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 (旧譯木哩斐岳幅),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09—1881)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1847—1861)。——第487、488頁。
- 霍耳, 詹姆斯 (Hole, James) ——英国资产阶级政論家, 工人阶级居住条件一书的作者。——第261頁。
- 霍夫曼, 哥特赫耳夫 (Hoffmann, Gott-helf 1844—1924) (笔名“射手奧古斯特·庫奇克” «Füselier August Kutschke») ——德国詩人。——第262頁。
- 霍夫鮑威尔, 恩斯特 (Hoffbauer, Ernst 1836—1905) ——普魯士炮兵軍官, 写有許多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559、560頁。

十七画

- 戴伊斯, 阿尔弗勒德 (Days, Alfred)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3), 曼彻斯特不列顛联合会代表大會的参加者。——第742頁。
- 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維奇 (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8—1869) ——俄国民主义革命家,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 曾参加六十年代初俄国的革命运动, 后侨居日内瓦, 国际会員, 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第96頁。

- 賽拉叶, 奥古斯特 (Serrailier, Auguste 生于1840年)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9—1872), 比利时通訊書記 (1870) 和法国通訊書記 (1871—1872), 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潰后, 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 巴黎公社委員,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71) 和海牙代表大會 (1872) 的代表, 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3); 馬克思的战友。——第28、55、60、77、92、137、166—168、170、174—177、186、199、351、356、427—430、486、713、742頁。
- 賽克斯頓, 乔治 (Sexton, George) ——英国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2年5—8月), 海牙代表大會 (1872) 代表; 在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 (1872—1873) 里反对改良派分子。——第91、167、168、170、171、175、176頁。

十八画

- 魏勒尔, 亚当 (Weiler, Adam) ——德国流亡者, 国际不列顛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2—1873), 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 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員。——第231頁。
- 薩德勒 (Sadler) ——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第54、77、91、712頁。
- 薩恩斯, 瓦倫亭 (Saenz, Valentin) ——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店員,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解放报”編委 (1871—1873), 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 (1872—1873), 曾与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第 412 頁。

薩卡茲·弗朗斯瓦(Sacase, François 1808—1884)——法国法官,保皇派,从1871年起为国民議會議員。——第 37、54、74、398 頁。

薩加斯塔,普腊克塞德斯·馬提奧(Sa-

gasta, Práxedes Mateo 1825—1903)——西班牙国家活动家,自由派的領袖,內务大臣(1871—1872),外交大臣(1874),內閣首相(1881—1883、1885—1890、1892—1895、1897—1899、1901—1902)。——第 150、204、409、416、712 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三 画

小卡尔·米斯尼克——德国幽默作家戴維·卡利施創造的一个淺学之徒、纨绔子弟的典型。——第 593、599、604、606、607 頁。

五 画

卡尔·穆尔——席勒的戏剧“强盜”中的主角。——第 447、476 頁。

卡岡都亚——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中的人物。——第 412 頁。

布雷济希大叔——罗伊特的短篇幽默小說中的人物。——第 308 頁。

六 画

安东——基督教圣徒,相傳他是努比亚沙漠的一个隱修士。——第 413 頁。

艾蒙之子——早期中世紀敘事詩“艾蒙四子或蒙托榜的勒諾”中的主人公,即阿拉尔、里沙尔、吉沙尔和勒諾四兄弟。——第 432 頁。

七 画

但以理——聖經中的先知。——第 494 頁。

利維坦——据聖經傳說,是大海怪。——第 33 頁。

麦罗斯——席勒“保证”一詩中的人物。——第 581 頁。

八 画

彼得——据聖經傳說,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第 416 頁。

罗伯尔·馬凱尔——著名的法国演員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奧諾萊·多米耶画笔下流傳后世的一个狡詐奸商的典型。——第 476 頁。

抹大拉的馬利亚——据聖經傳說,她是一个悔过的罪人。——第 356 頁。

阿哈特——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主人公,亚尼雅士的忠誠友伴;他的名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別名。——第 74、393 頁。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594、604 頁。

九 画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資產階級

代表人物的代名詞；1712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品“約翰牛傳”問世后这个名詞就流傳开了。——第541頁。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劇中的主要人物。——第581頁。

十 画

涅墨西斯——古希臘神話中的报复女神。——第596頁。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595頁。

唐·吉訶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第148、648頁。

十一 画

基度山——大仲馬的小說“基度山恩仇

記”中的主人公。——第476頁。

十三 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劇“无事煩惱”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身。——第74頁。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劇作（“温莎的風流娘儿們”、“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諧謔者，酒徒。——第387、529頁。

十五 画

魯道夫——欧仁·苏的小說“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第476頁。

十六 画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創始人。——第36、489頁。

期 刊 索 引

一 画

“1874年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 per l'anno 1874*》)——洛迪出版。——第340、344頁。

二 画

“人权报”(《*Les Droits de l'Homme*》)——蒙彼利埃出版。——第428頁。

“人民报”(《*La Plebe*》)——洛迪、米兰出版。——第83、140、190、199、209、212、215、333、345、350、355、363頁。

“人民年鉴”(《*L'Almanch du Peuple*》)——日内瓦出版。——第46頁。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日内瓦出版。——第448頁。

“人民呼声报”(《*Die Volksstimme*》)——維也納出版。——第73頁。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維也納出版。——第333頁。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萊比錫出版。——第59、69、92、101、103、110、113、117、119、122、123、127、143、144、147、151、152、179、180、201、202、233、237、244、257、270、277、286、295、303、306、322、330、333、353、358、362、390、516、520、521、532、539、540、547、557、560、565、569、599、612、624、627、631、640、641、737—740頁。

三 画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紐約出版。——第225、353、737—740頁。

“工人报”(《*Der Werkman*》)——阿姆斯特丹出版。——第333頁。

四 画

“公社”(《*Община*》)——倫敦出版。——第468頁。

“火花报”(《*La Favilla*》)——曼都亚出版。——第189頁。

“巴黎报”(《*Paris-Journal*》)——第22、60、394頁。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倫敦出版。——第98、120頁。

“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都灵出版。——第41、419頁。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第33、466頁。

五 画

“民主”(《*La Démocratie*》)——巴黎出版。——第467頁。

“未来报”(《*Die Zukunft*》)——科尼斯堡、柏林出版。——第60頁。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倫敦出版。——第78、85、92、350、715、717、

721 頁。

-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 440、453—455、457—459 頁。
- “北德报”(«Северогерманская газета»)——見“北德总汇报”。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150、639 頁。
- “平民”(«Il Popolino»)——都灵出版。——第 140 頁。
- “平等报”(«L'Égalité»)——日内瓦出版。——第 16—18、20、21、32、33、51、92、103、151、333、389、391、393 頁。
- “平等报”(«La Igualdad»)——馬德里出版。——第 409 頁。

六 画

- “自由报”(«La Liberté»)——布魯塞尔出版。——第 60、61、69、92、103、143、152、180、359、361、429 頁。
-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佛罗伦萨出版。——第 93、96 頁。
- “团结报”(«La Solidarité»)——紐沙特尔、日内瓦出版。——第 18、19、22、32、52、391—394 頁。
- “先驅报”(«Herald»)——見“紐約先驅报”。
- “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圣彼得堡出版。——第 490 頁。
- “协和。工人問題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柏林出版。——第 97、98、118—123、127 頁。
-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紐約出版。——第 57—59、107、108、111 頁。

七 画

- “劳动报”(«Le Travail»)——巴黎出版。——第 17、389 頁。
- “改革报”(«La Réforme»)——土魯斯出版。——第 400 頁。
- “进步报”(«Le Progrès»)——洛克尔出版。——第 16、17、32、389、390、467 頁。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115—117、183、274 頁。
- “里昂进步报”(«Le Progrès de Lyon»)——第 33 頁。
- “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里斯本出版。——第 78、92、333、346、354 頁。
-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日内瓦出版。——第 22、23、46、50、53、394、402 頁。
- “社会未来报”(«L'Avenir Sociale»)——皮阿琴察出版。——第 425、519 頁。
-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 390 頁。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紐約出版。——第 104 頁。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巴黎出版。——第 273 頁。
-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哥本哈根出版。——第 333 頁。

八 画

- “夜晚报”(«Le Soir»)——巴黎出版。——第 181 頁。
-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米兰出版。——第 85、93、96、420 頁。
- “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巴黎出版。——第 400 頁。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

- 出版。——第 93 頁。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s》）——布魯塞爾出版。——第 143、152、352、359 頁。
- “国际先驅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倫敦出版。——第 61、67、92、103、152、177、200、216、219、221—223、226、231、333、345、349、350、354、737 頁。
-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簡報”（《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桑維耳耶、洛克尔、紹德封出版。——第 192、202、215、216、348、352、393、400、402、430、471 頁。

九 画

- “战斗报”（《El Combates》）——馬德里出版。——第 404 頁。
- “觉醒报”（《Le Réveil》）——巴黎出版。——第 24 頁。
- “宪法报”（《La Constitution》）——巴黎出版。——第 28 頁。
- “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êne》）——巴黎出版。——第 74、582 頁。
- “度申爸爸”（《Le Père Duchesne》）——巴黎出版。——第 582 頁。
-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555、639 頁。
-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倫敦、罗迦諾、热那亚出版。——第 95 頁。
- “革命团结报”（《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巴塞罗纳出版。——第 527—530 頁。
- “欧洲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Europe》）——倫敦出版。——第 60 頁。

- “紅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倫敦出版。——第 104 頁。
- “前进！不定期評論”（《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苏黎世、倫敦出版。——第 588—593、596、599、603—605、607、641 頁。
-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倫敦出版。——第 121 頁。
- “钟声”（《Колокол》）——倫敦、日內瓦出版。——第 11、454、488、490、493、494 頁。
- “钟声。亚·伊·赫尔岑創办的俄国解放机关报”（《Колокол. Орган Рус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основанный А. И. Герценом》）——日內瓦出版。——第 471 頁。

十 画

- “哨兵报”（《Die Tagwacht》）——苏黎世出版。——第 333、372、599 頁。
-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 117 頁。
- “馬賽曲报”（《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 24、467 頁。
- “高卢人报”（《Le Gaulois》）——巴黎出版。——第 22、394 頁。
- “被判罪者”（《Il Condannato》）——馬德里出版。——第 409 頁。
- “倫敦新聞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第 261 頁。
-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柏林出版。——第 262 頁。
- “海盜报”（《Le Corsaire》）——巴黎出版。——第 181、182 頁。

“海陆漫游”(«Über Land und Meer»)——
斯图加特出版。——第 261 頁。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
版。——第 10、33、60、71、74、99、100、
122—126、322、323、337 頁。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曼彻
斯特出版。——第 293 頁。

“紐約先驅报”(«The New-York Herald»)——
——第 110 頁。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95 頁。

十 一 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
敦出版。——第 126 頁。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倫
敦出版。——第 126 頁。

“理智”(«La Razon»)——塞維尔出版。
——第 135、162、414 頁。

“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
ости»)——第 488 頁。

十 二 画

“喧声”(«Kladderadatsch»)——柏林出
版。——第 262 頁。

“联盟”(«La Federacion»)——巴塞罗纳
出版。——第 155、162、163、195、348、
352、416、471 頁。

“費加罗报”(«Le Figaro»)——巴黎出版。
——第 22、181、394、425 頁。

“莱比錫日报和公报”(«Leipziger Tage-
blatt und Anzeiger»)——第 558 頁。

十 三 画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倫敦
出版。——第 117 頁。

“雷諾新聞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倫敦出版。——第
571 頁。

“解放报”(«La Emancipation»)——土魯
斯出版。——第 28、430 頁。

“解放报”(«La Emancipation»)——馬德
里出版。——第 59、69、70、78、92、103、
106、113、138、139、152、155、162、163、
177、182、197、205、207、208、219、251、
333、345、349—351、354、408—413、
713、722、737 頁。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維
也納出版。——第 590、596 頁。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
Demokrat»)——柏林出版。——第 50、
356、357、359、361、362、402、520
頁。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
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倫出版。——第 95、642 頁。

十 五 画

“誰来了!”(«Que Vive!»)——倫敦出版。
——第 28 頁。

十 六 画

“激进报”(«Le Radical»)——巴黎出版。
——第 28 頁。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2 年 3 月到 1875 年 4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八卷（1961 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有些著作在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所用文字以及有关的中譯文。其中“論住宅問題”、“論权威”、“‘共产党宣言’ 1872 年德文版序言”、“‘德国农民战争’ 1870 年版序言的补充”和“流亡者文献”这一組文章中的第五篇“論俄国的社会問題”，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訂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两篇，在譯校时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一书中的譯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張文煥、張奇方、刘焯星、李俊聰、丁世俊、孔令釗、王錦文。参加資料工作的有孔令釗、馮如馥、孙家衡、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